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達志通欲——

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

**COMMUNICATING LIKINGS AND NEEDS:
CHINESE INTERPRETERS OF CHOSŎN AND
SINO-CHOSŎN RELATIONS, 1600-1900**

LAW LOK-YIN

羅樂然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學院

2017

達志通欲——

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

**COMMUNICATING LIKINGS AND NEEDS:
CHINESE INTERPRETERS OF CHOSŎN AND
SINO-CHOSŎN RELATIONS, 1600-1900**

LAW LOK-YIN

羅樂然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學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7

Acknowledgement

謝辭——感激遇上

仍在步向而立之年，回望走過的學術路，我感恩遇上對自己影響深遠的師長、同道及關愛我的人。

自 2007 年一個下午參加了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課程簡介講座，修讀研究院的念頭就開始萌生。那時，我只是中學裡的一個平庸之輩。最終，如願順利入讀，但成績差強人意，當然跟直接升讀研究院無緣了。但感謝遇上范師永聰，他啟發我對朝鮮史的興趣之餘，還令我沒有停下追夢的腳步。還有各個支持我的師長，包括麥勁生教授、李金強教授、周佳榮教授、黃文江博士、譚家齊博士、鄺智文博士、羅婉嫻博士、區顯鋒博士、月媚秘書。我更要特別感激金師由美，帶領我踏出追夢的第一步，讓我畢業後留校擔任助理，從事歷史研究，學術路有了起點。

走學術路從來不容易，機會處處，但挑戰和障礙卻並隨。我慶幸一路遇上肯定我選擇和能力的師長。感謝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鄭煒明博士，不但支持我在不同場合發表研究成果，更給予我停薪留職的安排，前往新加坡升學。另外，感謝香港公開大學的趙雨樂教授，讓我兼教大學課程，累積經驗。

2015 年 8 月 9 日，我踏足北緯一度，在國慶慶典的一片歡騰中，開始在南洋理工大學的博士路。

衷心感謝接受我入學，並一直指導我的衣師若芬。與衣師的相遇可算是全球化的事例，從網絡認識，到互相討論課題，甚至面試入學以及商討論文內容，我們都用盡網絡的方便。老師有意或無意之間提供的意見，往往是我完成論文關鍵的一把。更要感激衣師的開明及理解，讓我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繼續論文寫作。在她的指導下，論文順利正式通過。在此，我也要向柯思仁博士、郭淑雲博士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昌偉博士致謝。他們先後通過我的研究計劃及最後論文，同時既給予欣賞和肯定，也句斟字酌提供建議，幫助我強化論文內容，以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犯錯。另外，評審過程中三位評審的意見，厥功實鉅，為我的論文提供了不少可行的新方向。

由當初萌生的念頭，只敢想像的夢想，到此時此刻，遇上的每位師長都成就了我這十年來的學術路。

當中，我不能不感謝一班不斷幫助與鼓勵我的師友：隔著太平洋互相支持的衣門弟子佳敏、俊賢、慧媛、令俐、潔琳與忠明，尤其是忠明在不少瑣事上的幫忙，甚至是安排吃榴槤的重要環節；在新加坡生活裡遇上的莊嘉穎博士、許齊雄博士、關詩珮博士、朴素晶博士、魏月萍博士、斯涵、賜圓、袖鳳、詩倫、漢津、錢昊、洪媛、治田、筱雯、征達、嘉嘉等人；在香港一直同行的大學、香港二百及中學戰友、饒館的同工、足球隊友；在海內外會議中認識的同道學友；曾經一起在浸大工作的金平、維理、瑋君、家怡師姐、貴軒、世民、嘉榮、詩機與婉往……對於我來說，他們每一條短信、一句問候甚至一場學術爭論，都是我在追夢路上的推動力。

當然，家人與好兄弟的信任及默許亦十分重要。自小由家庭不同成員照顧，無論是父母、外婆、姨母、家姊、阿姨等，感謝他們的照顧和默默支持我隨心的選擇，讓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感激在 2001 年的中學課室中遇上了三位好友——銘軒、泯凱、樂文，縱然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奮鬥，但一句「細佬」，就會兩脇插刀。

路上遇到不易，但這些年一直陪伴自己走每一小步就更難。是我畢生的幸運，有女朋友妙蓓做我的同行者。學術路是漫長且不明朗，但感激她一直伴我經歷每個起跌，分享每一個成果，闖每一個難關。當已經夜深自己一人仍然躲在圖書館寫論文的時候，她總會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太晚回家」；每次我外出參加會議，她總會在訊息中說一句「平安去，平安回來」。她對我默默的支持和關心，即使旁人不曉得，我感受到一切。因為她，追夢就有了原因。

學術路上令我最深刻的一句詩句是來自藕船先生的作品——「青衫何事滯春明，書劍飄零誤半生」。為學術奮鬥好像是付出了不少青春，但回頭一看，一切仍然值得，因為半生的學術路遇上了「您」。

2017 年 冬至

香港

目錄

	頁
圖表目錄	IV
摘要	V
ABSTRACT	VI
第一章 緒論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文獻回顧	10
1. 關於朝鮮譯官的先行研究	10
2. 關於中朝朝貢關係的先行研究	18
3. 關於朝貢的賓禮研究	24
4. 關於燕行錄與使行的先行研究	25
三、 研究問題	30
四、 研究資料	30
五、 研究方法	33
六、 研究大綱	36
七、 小結	40
第二章 服事天朝——17 至 19 世紀的中朝關係變遷	43
一、 明滿衝突與朝鮮的對應	44
二、 丙子胡亂後與朝鮮稱臣後的新秩序	55
三、 朝鮮北學興起的思想與思想轉移	66
四、 鴉片戰爭與東亞秩序的重塑	83
五、 小結	91
第三章 因譯以達——朝鮮漢語譯官的培訓與翻譯規範	93
一、 引言	93
二、 朝鮮社會制約與譯官的培訓及身份形成	94

三、 明清易代的譯官不足與社會期盼.....	100
四、 《象院題語》與譯官教材的翻譯規範.....	105
五、 小結.....	120
第四章 善爲周旋——朝鮮漢語譯官對清活動的職掌與禮儀履行	123
一、 引言.....	123
二、 中國的賓禮與朝鮮的對應.....	128
三、 朝鮮譯官對朝貢禮儀的落實與捍衛.....	138
四、 譯官的職責協調——使行期間的解難.....	153
五、 譯官金指南、金慶門與白頭山定界碑.....	167
六、 賚咨行與譯官的任務.....	177
七、 小結.....	183
第五章 雖不目見——漢語譯官為朝鮮士人提供的中國資訊.....	187
一、 引言.....	187
二、 譯官的晚明資訊與朝鮮「記憶所繫之處」	189
三、 朝鮮譯官的敘述與朝鮮士人的吳三桂歷史記憶.....	202
四、 譯官與清廷宮廷的情報收集.....	215
五、 清朝管治下的禮俗與社會.....	219
六、 譯官與在清域外人仕的交涉.....	233
七、 小結.....	240
第六章 藕船雅正——譯官的形塑與清人眼中的朝鮮.....	242
一、 引言.....	242
二、 董文煥的《韓客詩存》與清人的朝鮮文壇的認識.....	244
三、 譯官李尚迪與清人的朝鮮形象的形塑.....	256
四、 李尚迪與清朝文人對金正喜的關心.....	278
五、 小結.....	301
第七章 前古未行——19 世紀譯官的身份轉變：從周旋到開化	304

一、 引言.....	304
二、 金是瑜與明史朝鮮部份書寫與辨誣.....	307
三、 譯官在中國收集的西方勢力情報.....	313
四、 卞元圭的講究武備與東北亞活動.....	322
五、 吳慶錫與開化改革的倡議.....	331
六、 小結.....	345
第八章 結論——朝鮮譯官與東亞世界網絡.....	348
附件 1636-1893 年間的燕行使列表	357
參考文獻	382

圖表目錄

	頁
圖表 1 洛學思想承傳圖.....	72
圖表 4 朝鮮王朝譯官的學習教材.....	105
圖表 5 佚名繪《燕行圖・朝陽門》.....	139
圖表 6 太和圖宴圖.....	145
圖表 7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燕行圖.....	153
圖表 8 佚名繪《燕行圖・山海關》.....	200
圖表 9 國家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年間暹羅國金葉表文.....	236
圖表 10 《海客詩錄》曾點定入選的詩文集.....	249
圖表 11 佚名繪《燕行圖・琉璃廠》.....	275
圖表 12 李用霖摹《藕船先生像》.....	276
圖表 13 朱鶴年繪《秋史餞別宴圖》.....	290
圖表 14 許鍊摹《蘇東坡笠屐圖》.....	293
圖表 15 許鍊：《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	293
圖表 16 大韓民國文化財廳網站所示的《歲寒圖》圖像.....	295
圖表 17 《歲寒圖》讀者群.....	298
圖表 18 吳慶錫出使列表.....	337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朝鮮漢語譯官在明末清初至甲午戰爭間的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歷史轉變過程，在使行禮儀、交涉溝通、文化交流活動中，如何擔當中朝兩國間的文化媒介。他們不但在既定的禮節及邊界問題上，代表朝鮮與中國朝廷交涉。而且他們交涉過程中一方面以他們能運用漢語與中國士人及官員交流，以掌握更直接的情報與新知識，從而擴大了朝鮮對世界的了解，不再限於北京使行見聞的認識。與此同時，朝鮮漢語譯官與中國士人有相當頻繁的接觸，無論是直接的對談還是文學創作，譯官都代表著朝鮮的文化和社會。兩地彼此間的互動中，中國士人通過譯官作為媒介，認識朝鮮的社會。本論文透過中朝文人書寫與官方史料，探討漢語譯官在中朝關係中擔任的崗位、參與的交涉、與中國士人的酬唱等，說明他們如何在 17 至 19 世紀中朝關係中被視為交流的文化媒介，且探討他們的活動如何建構與士大夫不一樣的世界觀，改變兩國的關係以及文化交流互動的結果，並藉此提出「東亞世界網絡」的想法。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interpreters of Chosŏn in the China-Chosŏn cultural relations from 1700 to 1900. Arguing those interpreters as intermediaries, this study looks a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negotiating tributary rituals and border disputes with the Chinese Court, learning new knowledge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bridging relations with Chinese officers and academe by utilizing thei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literatures. Not only were these duties enrich and enlighten the Chosŏn Court and intellectuals, they were also representing Chosŏn cultures and rituals. Put in this light, this article is to begin with analyzing both Ming/Qing China and Chosŏn intellectuals' writings and official records. Thereafter the focus would be to examine the Chosŏn interpreters' significance in China-Chosŏ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bringing modernized values into their territory. This would bring in the argument that the Chosŏn interpreters' efforts were essential to the China-Chosŏn tributary rel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discussed as well as identifying the thought of "East Asian World Network".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東亞世界」為近年備受學界關注的課題，¹而所謂東亞世界的建構，採用日本學者西嶋定生（1919-1998 年）的說法，可謂最為透澈。其所觀察的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周邊各地，包括朝鮮、日本、安南等地因中國文化的傳播與政策而所形成的獨特文化圈。此文化圈主要由四大要素：漢字、儒教、律令及佛教所形成的。而受此影響之下，以漢字為媒介的文學交流、建基於儒學與律令而維繫的中華秩序與朝貢體系，形成了各地的共同性，但同時未有因此而取代了這些地區的在地文化的民族性與獨特性。²這種構想之下，我們可理解得中國文化雖然成為了東亞世界的共通性，但沒有因此而抹殺在地文化的思考，反而可引起更多關於中國文化與在地文化之間互動的討論，或是由他們的角度重新思考東亞，這種東亞文化的特性可從子安宣邦所說中呈現：「以大陸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圈之內，中國之外的個別地區、國家都可以從他們各自的立足點對這個文明提出新的學術觀

¹ 這種備受關注可以從各地近年相關的學會成立，如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研究計劃的合作，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計劃和「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國立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的「東亞經濟與文化研究計劃」、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復旦大學的「從周邊看中國」計劃等；以及期刊的發行，如國立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出版的《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東亞觀念史集刊》、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東亞文化交渉學會）出版的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等，均可看到這種研究風氣獲得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亦證明了東亞是一個有相當發揮空間的研究領域。

² 西嶋定生著，高明士譯：〈東亞世界的形成〉，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88-92。

點。『東亞』文明就是這樣一種新的文明論，或者是文化史的概念。」³於是，過去引起了各地學者注意漢字為基礎的東亞世界的文化交流活動，這些學者包括了張伯偉、⁴黃俊傑等，⁵他們不但探討了多個相關的個案來呈現他們的想法，更特別就此提出了各種新的研究方法論與構想，而這種學術關注的轉向，不單能夠觀察到中國文化向外擴展的影響力以及如何因此成為了這些東亞國家文化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最重要的是能夠了解中國文化與東亞其他國家文化的在地因素之間的互動，從而出現在地化的轉向，這些問題的討論均可證明東亞文化交流的過程值得再深入地探討。

東亞世界的文化交流，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建基於朝貢體系而進行各種形態的活動。⁶而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又以朝鮮被視為當中最重要朝貢國。⁷古代中國統治者用於掌控周邊地區的朝貢體系，是維繫自漢朝、

³ 子安宣邦著，童長義譯：〈「東亞」概念與儒學〉，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44。

⁴ 張伯偉對於東亞世界的理解為漢文化圈，故他的研究方法論則被稱為「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他不但撰寫專著，專門探討研究方法的落實，可參考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同時亦撰寫了一本專為對此研究方法有所興趣的研究生們，作為入門的參考材料，內容包括了研究的材料、目錄、工具書以及研究方法等，可參考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⁵ 關於黃俊傑就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可參考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55-77，並參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87-218。

⁶ 金鳳珍（Bongjin Kim）以 Edward Said（愛德華·薩伊德，1935-2003年）的東方主義為中心，質疑朝貢制度帶有西方學者觀察東亞秩序時，帶有偏見以及不全面的情況。他認為以禮與理為中心的觀念來了解儒家經典如何維繫東亞世界的社會秩序。關於他的進一步解釋，詳參 Bongjin Kim, "Rethinking of the Pre-Modern East Asian Region Order,"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2(2002): 67-101.

⁷ 在費正清舉辦的 Chinese World Order 研討會之中，基本上學者一致同意中國歷朝與朝鮮為最典型的朝貢體系。關於此，詳參徐耿胤、石之瑜：《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

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與周邊地區，包括朝鮮半島關係建立的重要基石，⁸其中學界經常把明清兩代與朝鮮之間的關係建立及發展作為探討朝貢體系之實踐以及東亞世界形成的典型例證。⁹在兩地漫長的歷史互動過程中，朝貢體系在學界引發了很多關於中朝關係史研究的長期辯論；在不同的時空及地域之中，怎樣體現朝貢體系，是學者們對中朝關係史的主要觀察。然而，中朝之間朝貢體系的落實，並非只能夠用作了解中國對外關係史，以及中國看待周邊國家的手段，並且亦可以透過體制落實的過程中，探討朝鮮的在地因素的影響下，朝鮮朝廷如何在中國朝貢體系下，實現有關體制下的規定，從而衍生各種文化現象以及相關的政治與社會轉變。這種視野的轉換，並配合各種新材料梳理及應用，將了解東亞在傳統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交流結構之中，如何因為周邊國家的考量，而對關係的變化，有新的角度理解。因此，這樣的視野轉移不但能夠有助重新書寫中朝關係史，同時亦可觀察東亞各國立足點所出發之角度，與傳統中國立場的觀察的差別，將會有助於學界可以思考更多有關東亞世界研究的面向與可能性。

鑒此，近來不同背景的研究者開始在已經整理編輯出版的朝鮮《燕行錄》材料之內，¹⁰展開以朝鮮使節前往北京的使行活動過程作為研究對象，

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頁42。

⁸ 關於古代朝貢體制的發展與落實，可參考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頁1-60。

⁹ Hae-jong Jeon,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0-111. 下文將作更詳盡的討論。

¹⁰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에 관한 韓中日 三國의 國際워크숍》（燕行使和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中關於中韓中日三國的國際工作坊）（서울[首爾]：

並日漸發展成為東亞文化交流以及中朝關係史中主要的研究課題，亦有不少學者撰有不少專著所肯定有關的研究價值，並提出了這些使行活動如何改變了朝鮮文化史的脈絡及兩地文化之間互動的歷史，都是當今學界，特別是華文學界所流行的課題。¹¹但是對於朝鮮使節前往中國的過程中，如何與當地人互相溝通，以及認知及建構對方文化的過程，似乎還有更多空間去探討和理解，特別是使節並不能完全單以自我的觀察或是文化體驗便能夠得到了更多的知識，而是關乎到一種知識傳播的過程。這種朝鮮使節的知識掌握與傳播的具體過程，稍欠深入的探討。故此，本文希望透過回顧過去的研究成果，並試圖尋找一個可行的新方向，就中朝關係史研究，甚至是東亞文化交流領域之中，產生的種種疑問，嘗試作出回應，使有關的學術價值得以彰顯。

在兩地之間的交聘過程之中，協助朝鮮處理大小事務的，除了被任命為使團正使的朝廷命官外，還有一群懂得各種中國應導語言的翻譯官。¹²除了作為朝鮮使臣的翻譯，他們亦需為朝鮮使團準備各種禮節安排，以維繫

박문사[博文社]，2014 年），頁 47-49。該文再刊於《南國學術》以供中國學界參考。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南國學術》，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76-89；並參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2010 年 9 月），頁 60-65。

¹¹ 以下為近年值得關注的華文專著成果，包括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年）；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2015 年）。

¹² 在明（1368-1644 年）清（1644-1912 年）時期，女真語、蒙語皆中國使行時或會涉及的常用語言，特別是在清代，滿語是官方語言之一，而不少貴族皆為蒙古人，故蒙語地位亦相當重要。所以，在朝鮮的譯官的譯學四學中，除了前往日本的倭學譯官外，另外三學分別是漢學、清學和蒙學，都是專為中國主要使行時所需用的語言。關於朝鮮四譯學的情況，詳參林東錫：《朝鮮譯學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 年），頁 189-260。

著朝鮮為「禮儀之邦」的名譽。¹³西嶋定生曾指出傳統中國與周邊地區的華夷秩序，重點的區別所在的「並非種族或者地域，而是對周室之『禮』的體會如何，易言之，是如何編入以周天子為中心的秩序體制。而區別的基準，定於『禮』之有無，關聯到後來『東亞世界』的形成。」¹⁴故對於朝鮮來說，無論在交聘的過程還是社會風俗等，禮的合乎，成為了重要的考量，因為涉及到擺脫被認為「夷」的想像，故無論從政治還是文化上，朝鮮半島歷代政權都對於禮，特別是交聘的賓禮相當重視，而履行有關禮儀工作時，譯官有極為重要的角色。

其實從《周禮》、《禮記》等早期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典籍中，已經展示出譯和禮的落實有密切關係。¹⁵自儒家成為了中國文明甚至東亞世界的主要思想來源以後，禮便視為維繫秩序的概念與方法，而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透過禮儀的落實以作為秩序運作的綱領。《禮記·王制》指出：「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¹⁶可見中國傳統以來，一直特別關注到譯官協調國家之間溝通過程的官職，而這種官職的安排，正是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關係與秩序所建構的，而周邊關係秩序的落實過程，則由禮制以及各種禮儀形式去維繫。《周禮·秋官·象胥》提到象胥，即譯人

¹³ 詳參金指南、金顯門、李湛編：《通文館志》（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年），〈通文館志序〉，頁1a；並參구도영（譯：丘洵榮）：〈조선전기 조명의교관계의 함수："예의지국"〉（朝鮮前期朝明外交關係的功能——禮義之國），《大東文化研究》，第89輯（2015年3月），頁159-203。

¹⁴ 西嶋定生著，高明士譯：〈東亞世界的形成〉，頁94。

¹⁵ Martha P.Y.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6), 42-48.

¹⁶ 鄭玄注：《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38。

的工作：「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¹⁷由此可見，傳統的禮儀經典也說明了譯官擔當的責任不但只是單純的「達其志，通其欲」，也是擔當「協其禮與其辭」的執行與輔助禮儀落實的工作，以展示朝貢國如何履行各種責任，而付出的努力。

而且，在朝鮮與中國交涉期間，不少使節因語言上的隔閡，未必能夠順利地與中國人溝通，亦未能更多深入認識中國社會，故他們需要依靠譯官，特別是漢語譯官的協助才能在中國順利完成使命，並藉此擴闊他們對中國的認識。¹⁸因此，透過觀察譯官於中朝交流期間的各種角色及職掌，不但能夠對擔任文化媒介的譯官有更深入的認識，亦可有助理解譯官如何發揮傳遞相關資訊的功能及詮釋中國有關的知識予朝鮮朝廷與士大夫。這種文化的傳播過程正是對於中朝關係史新角度的切入，可讓該領域從以往著重交流結果的研究，移轉到著重交流的經過及具體情況。

研究將聚焦於譯官於中朝交流之間的功能，包括譯官如何協助朝鮮王朝面向向使臣們或其他朝鮮士大夫傳遞的訊息，並非單純的語言翻譯，更

¹⁷ 本文採用晚清孫詒讓（1848-1908 年）的《周禮正義》的注釋作討論，雖然有學界對《周禮》的成書有各方面的質疑，但本文集中討論的是《周禮》對中國不同管治階層與外界接觸對禮儀掌握的想法。關於此，詳參孫詒讓注：《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9 冊，〈秋官·象胥〉，頁 3687-3690。

¹⁸ 1721 年出發的燕行使團，副使李正臣（1660-1727 年）透過譯官的介紹認識中國境內的西洋文化及傳教士後，直指自己「雖不目見，詳聞其酬酢之言，可喜。」由此可見，使臣依靠譯官讓他們對中國有更多認識。詳參李正臣：《櫟翁遺稿》，載於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年），第 53 冊，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3b。

包括在文化及政治上透過他們理解並詮釋而成的各種觀點。¹⁹因此，朝鮮使臣們在交流的過程中所掌握的知識及訊息，與譯官的行為有相當密切關係。而事實上，在中國與朝鮮過去歷史進程之中，多次因譯官的活動與工作，改變了外交、政治甚至是文化取態的轉變，各種從朝鮮與清廷留下來的材料，均可看見相關的事例，說明譯官的一舉一動，都對雙邊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由此背景脈絡之中可了解到，透過研究譯官不但可梳理中朝關係的具體運作過程，更讓朝鮮士大夫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下，譯官的翻譯工作及情報搜集過程擴大了他們有關中國的知識了解與資訊掌握，與此同時中國朝廷與士大夫則藉著朝鮮譯官的工作與禮儀，能夠了解朝鮮的文化、政局以及社會情況，相信有關的研究有助朝鮮文化史、中國對外關係史以及東亞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領域會帶來各種新的視野以及論據來回應舊有課題。²⁰

中原地區與朝鮮半島兩地之間的文化及政治交流，自漢四郡成立以後，開始有更頻繁的交往，²¹及後更發展出兩地之間的朝貢關係，²²而特別在元

¹⁹ 1765 年，陪同其叔父洪億（1722-1803 年）前往北京參與使行的洪大容（1731-1783 年）與傳教士劉松齡（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 1703-1774 年）對話時，當中都需要譯官洪命（1733 年-？）福從旁協助，才能夠與傳教士有深刻的對談，改變其西洋觀。關於此，可參考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0 卷第 1 期（2013 年 6 月），頁 324。

²⁰ 孔慧怡曾就如何重寫中國翻譯史的課題，就譯者的問題作出了討論，這一點相當值得借鑒了解朝鮮譯官的研究價值。孔氏指出過去譯者主要分為事務性譯者與文化性譯者，前者主要是滿足各種贊助人或僱主在翻譯上的需求，但因材料的考慮，過去學界對他們研究的「能見度」相當低，而被學界所忽略。然而，如能從制度上以及譯者的每一種翻譯及相關的媒介工作具體的探討，仍可發現各種相當大的研究價值。關於此，詳參孔慧怡：〈重寫翻譯史〉，《二十一世紀》，第 71 期（2002 年 6 月），頁 50。

²¹ 關於漢四郡的性質問題，涉及到雙方之間的歷史領土所屬問題，現時仍有相當多的爭議，故也不能完全妄下定論，但從地理的角度來說，朝鮮半島南北的百姓與中原地區的百姓透過了漢四郡的的建立，得到了更多的交流的機會，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故此議題的

代，因為更緊密的政治關係，合適的溝通人材更有所必要，而在元（1276-1368 年）明（1368-1644 年）之際的高麗（918-1392 年）和朝鮮（1392-1910 年），先後成立了通文館，後來被改名為司譯院，專門培訓各種中國語言的譯官，²³亦利用譯官展開了更具規模的交涉關係，成為兩地之間的重要溝通媒介。明中葉，東亞世界經歷了豐臣秀吉（1537-1598 年）發動的王辰戰爭，進攻朝鮮半島。明朝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 年，1573-1620 年在位）傾全國之力，守衛朝鮮，強化了朝鮮人對明帝國產生的好感，並產生「再造藩邦」的感恩之情。²⁴因此，其後發生的明清易代，不但對於中國社會，而且對於朝鮮亦有莫大的衝擊與轉變。朝鮮雖然接受了時為後金（1616-1636）君主的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 在位）所提出的條件，停止向明朝貢，轉為視後金，即後來清朝為宗主國。但是同時代的朝鮮士大夫對於這個新宗主國的態度極為蔑視，儘管清廷亦對朝鮮的規限亦較明朝時較為寬鬆，但是「視清為夷」日漸成為了 17 世紀朝鮮知識份子的主流觀點，但朝鮮上下考慮到現實情況後，無可奈何地需要維繫各種朝貢體系所訂下的禮儀活動。自此，朝鮮王朝便起用身份低微的朝

參考，務必兼及雙方以及更多方面的研究，包括奇修延：〈中國學界의 漢四郡 研究 동향과 분석〉（中國學界的漢四郡研究動向與分析），《문화사학》（文化史學），第 27 輯（2007 年 6 月），頁 1143-1160；趙紅海：〈漢四郡設置述評〉，《北方文物》，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46-48、77。

²² 全海宗：〈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의 鳥瞰을 위한 導論〉（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的概況導論），《동양사학연구》（東亞史學研究），第 1 輯（1966 年 10 月），頁 10-41。

²³ 關於高麗朝譯官制度及譯官活動，詳參이정신（李貞信）：〈高麗後期の 譯官〉（高麗後期的譯官），《한국중세사연구》（韓國中世史研究），第 38 期（2014 年 4 月），頁 373-401。

²⁴ 孫衛國：〈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101-102。

鮮譯官，取代士大夫執行不少職務，來處理各種涉及對清關係的各種活動，減少了士大夫前往北京時接觸職務的安排。因此，朝鮮譯官在明清易代以後，成為了朝鮮與清帝國之間文化交流媒介，無論是文化之間的互動，或是禮節上的交涉過程等，其重要角色都從中發揮出來。故朝鮮朝廷與知識份子在各種關涉於清朝活動以及中國觀建構的過程中，使得譯官的工作更顯得重要，較明朝時的單純的禮儀執行者與使行輔助者來說，有更多重的深層意義，更能展示出其作為文化媒介的特徵。

更值得關注的是，東亞各國包括清帝國和朝鮮，在 19 世紀中葉，面對西方列強紛紛嘗試打開各個東亞地區港口的局面時，本為專責參與對外事務的譯官們，特別是漢語譯官，當中有不少有志之士面對這個局面，並思參與應對局勢的變化，²⁵如譯官吳慶錫（1831-1879 年），更成為了日後對朝鮮史影響深遠的開化思想的倡議者，²⁶均可窺探出譯官的身份與職責，均在中朝關係，以及東亞局勢的轉變之中，角色亦因此隨之改變來爭取個人或國家利益。然而，甲午戰爭後，傳統的朝貢體系正式瓦解，而朝鮮漢語譯官的身份亦不再復存，而新的制度亦使朝鮮面臨著新的局面，故本文亦不旁及甲午戰爭後中朝關係變化與譯官的問題。

²⁵ 金良洙曾撰文探討譯官卞元圭在 19 世紀複雜的東亞政局之中，如何在俄國南下的背景下，進行各種外交活動，為朝鮮在東亞環境中，取得各種有利條件。關於此，詳參金良洙：〈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的 政治外交：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朝鮮開港前後中人的政治外交——以卞元圭等譯官於東北亞與美國相關活動為中心，《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12 輯（1991 年 1 月），頁 311-366。

²⁶ 關於吳慶錫的開化思想，可參考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吳慶錫的開化思想與開化活動），《역사학보》（歷史學報），第 107 期（1985 年 9 月），頁 107-187。

因此，17-19 世紀這個時段之中，²⁷經歷明清易代以後，至開港前後的東亞格局劇變，都反映出中朝關係有著很多值得探討的課題。而這些課題都均與譯官，特別是參與較多中國事務的漢語譯官的交涉活動相有關，故本文的研究時限設於明清易代至開港前後的 200 多年之間，以圖窺探清朝與朝鮮的互動過程中，如何因漢語譯官的職掌及角色影響下，產生一連串的轉變，這些變動是不能將譯官的角色抽離而論述的。

二、 文獻回顧

1. 關於朝鮮譯官的先行研究

雖則在問題構想的過程中，均呈現出朝鮮譯官，特別是漢語譯官在中朝關係及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具有特殊與顯要的功能，²⁸譯官及其相關研究一直只保留在韓國國別史或是語言史研究的課題之中，過往有一定數量的相關研究文章及書籍於韓國出版，以及少量以華文、日文與英語為寫作語言的研究成果。²⁹而這些研究成果較多以探討譯官制度為主，³⁰最早涉獵

²⁷ 其實更具體來說，本文將清朝為一個連貫整體的觀點出發作研究，而非單純的視此階段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度。詳參 William Rowe（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年），頁 12。

²⁸ 歷朝的中原王朝均在通過培訓通事作為與別國溝通與交流的媒介，而懂外語的人往往被受重視。不過，選擇不以中原王朝的譯官為探討中心，原因是這些譯員均為朝廷效力，缺乏了周邊國家對事情的重視以及權益問題，故本文以朝鮮的譯官為主，亦希望將翻譯的話題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東亞世界之中探討。關於一些海外通事的研究，詳參松浦章著，卞鳳奎、鄭潔西譯：〈明代的海外各國通事〉，氏著，鄭潔西等譯：《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2-55；並參馬一虹：〈古代東亞漢文化圈各國交往中使用的語言與相關問題——以唐、日本、新羅和渤海為中心〉，載石源華、胡禮忠編：《東亞漢文化圈與中國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99-119。

²⁹ 關於朝鮮半島譯學發展流程，華文研究包括了張敏：〈韓國譯學源流考〉，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 22 輯（上海：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2009

這領域的是姜信沆，他曾撰有相關文章，分別探討朝鮮時代的譯學政策，³¹以及對於初期，³²以及中期的譯學者活動的工作。³³林東錫的博士論文《朝鮮譯學考》，³⁴則有系統地梳理了從古到今，關於朝鮮半島相關的譯學的發展，全面性地，從沿革、制度、譯學政策與譯學書等多方面探討譯學在朝鮮的變遷。白玉敬的博士論文以及其後修改出版的專著，則以朝鮮王朝前期的譯官活動及體制作全面討論，既探討譯官的培養政策、職制與充員，又兼及譯官的活動與著述，以顯示其文化意義與歷史地位，³⁵與過去只重

年），頁 319-334；烏雲高娃：〈14-18 世紀東亞大陸的「譯學」機構〉，《黑龍江民族叢刊》，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頁 80-83；英語研究成果則可參考，Song Ki-joong,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Yi Dynas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54: 1-45; 55:1-63; 56:1-57;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に随行した倭学訳官について—捷解新語の成立時期に関する確証を中心に〉（朝鮮通信使隨行的倭學譯官研究——以《捷解新語》刊行期間的相關證據為中心），《朝鮮學報》，第 111 期（1984 年 4 月），頁 53-117；伊藤英人：〈高宗代司訳院漢字書字音改正について—「華語類抄」の字音を通して〉（關於高宗時期司譯院的漢字書字音改正——以《華語類抄》的字音為中心），《朝鮮語研究》，第 1 期（2002 年 3 月），頁 129-146

³⁰ 關於譯官制度的研究可參考，元永煥：〈朝鮮時代の 司訳院制度〉，南溪曹佐鎬博士華甲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現代史學の 諸問題：南溪曹佐鎬博士華甲紀念論叢》（서울[首爾]：一潮閣，1977 年），頁 257-280。烏雲高娃博士論文以《明四夷館及朝鮮司訳院研究——以「蒙古語學」為研究中心》為題，探析中朝的翻譯機構及其歷史，其後並發表若干論文討論朝鮮司訳院的研究，特別是蒙學方面的教習活動。詳參烏雲高娃：〈朝鮮司訳院蒙古語教習活動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及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4 期，總 137 期（2001 年 7 月），頁 122-123。

³¹ 姜信沆：〈李朝時代の 譯學政策에 關한 考察——司訳院, 承文院設置를 中心으로 하여〉（李朝時代譯學政策的相關考察——以司訳院、承文院設置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第 2 卷（1965 年月份缺），頁 1-31。

³² 姜信沆：《李朝時代の 譯學政策과 譯學者》（李朝時代的譯學政與譯學者）（서울[首爾]：塔出版社，1978 年）。

³³ 姜信沆：〈李朝中期以後의 譯學者에 對한 考察〉（對李朝中期以後的譯學者的考察），《成均館大學校論文集》，第 11 期（1966 年月份缺），頁 43-58。

³⁴ 其博士論文是由聲韻學與文字學專家林尹（1910-1983 年）以及莊子、思想研究、文字學等領域的專家黃錦鉉所指導。該文及後以韓文於韓國出版，林東錫：《朝鮮譯學考》（서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3 年）。

³⁵ 白玉敬：《조선전기 역관 연구》（朝鮮前期譯官研究）（서울[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大學院史學科博士論文，2000 年）；白玉敬：《朝鮮前期譯官研究》，（서울[首爾]：

視疏理過去譯學制度的研究，有明顯的突破。

另一方面，學者們對於朝鮮譯官的培訓的探討亦有一定的成果，如李建衡撰的〈朝鮮王朝의 譯學教育〉（朝鮮王朝的譯學教育）、³⁶岳輝的〈朝鮮時代漢學師生的構成及特徵分析〉、³⁷白玉敬的〈朝鮮前期譯官養成策과 制度의 整備〉（朝鮮前期譯官培養策略與制度的整備）、³⁸羅樂然：〈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才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等，³⁹都對這課題有所概說，其中梁伍鎮，曾撰文特別說明譯官培訓過程以及所面對的困難，特別是譯官面對貴族的歧視以及不公平對待。⁴⁰鄭光利用了較少學者採用的譯官考試試卷，來考察他們的教育水平以及能力，⁴¹為學界提

韓國研究院，2000 年）。

³⁶ 李建衡：〈朝鮮王朝의 譯學教育〉，《大邱教育大論文集》，第 16 輯（1980 年月份缺），頁 241-363。

³⁷ 岳輝：〈朝鮮時代漢學師生的構成及特徵分析〉，《學習與探索》，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2-173。

³⁸ 白玉敬：〈朝鮮前期譯官養成策과 制度의 整備〉（朝鮮前期譯官養成策與制度的整備），《역사문화연구》（歷史文化研究），第 12 輯（2000 年 11 月），頁 135-164。

³⁹ 羅樂然：〈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才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漢學研究集刊》，第 19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9-136。

⁴⁰ 梁伍鎮：〈한국에서의 중국어 역관 양성에 대한 역사적 고찰〉（韓國的中國語譯官培訓的歷史考察），《중국어언어연구》（中國語言研究），第 11 卷（2001 年月份缺），頁 1-33。

⁴¹ 鄭光：《朝鮮朝譯科試卷研究》（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75 年）；鄭光：〈譯科試券研究의 諸問題——朝鮮朝後期の 譯科試券을 中心으로〉（譯科試券的諸問題——以朝鮮朝後期的譯科試券為研究中心），《精神文化研究》，第 15 卷第 1 號（1992 年 3 月），頁 110-122；鄭光：〈朝鮮時代 燕行·通信使行과 譯官 教材의 修訂〉（朝鮮時代燕行·通信使行與譯官教材的修訂），載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燕行·通信使에 관한 韓中日 三國의 國際워크숍》（燕行使與通信使——燕行·通信使中的韓中日三國的國際工作坊）（서울[首爾]：박문사[博文社]，2014 年），頁 95-98。另外，鄭光亦有其他關於譯學書及譯官的研究成果，如鄭光：〈朝鮮司訳院の倭学における仮名文字教育—バチカン図書館所蔵の「伊呂波」を中心に〉，《朝鮮學報》，第 231 期（2014 年 4 月），頁 35-87；鄭光：〈司訳院訳書の外国語の発音転

供了更直接的角度了解譯官的語言能力。近年，部份韓國的研究生在這尚待更多方面去開發的課題中，開始進行探索，如高光一的碩士論文，從朝鮮時代的中國語教育角度出發，探討譯官的培訓與教材，了解到譯官如何學習漢語，從而了解到譯官在朝鮮的漢語教育發展上的重要性。⁴² 김남경（金南京）的《朝鮮時代 譯官과 翻譯史에 관한 研究：過舉의 譯官考察과 近代 翻譯史를 中心으로》（朝鮮時代譯官與翻譯史相關研究：以過去的譯官考察與近代翻譯史為中心），特別提出譯官的培訓以及其品位所帶來的社會地位作分析，指出譯官的身份與近代開港期的朝鮮近代化與社會變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⁴³

此外，關於朝鮮譯官培訓相關的課題，更為直接的是管窺培訓譯官的譯學書，而了解當中的教育情況，如梁伍鎮、⁴⁴鄭光等，⁴⁵都撰有專門書籍探討，這方面也獲得了很多各地學者所關注，因為朝鮮譯學書所留下來極為豐富的學術材料，⁴⁶無論是哪一種語言的譯學書，都可以讓語言學者用

写に就いて》，《朝鮮學報》，第 89 期（1978 年 3 月），頁 95-131；鄭光：〈朝鮮朝における訳科の蒙学とその蒙学書—来甲午式年の訳料初試の蒙学試差を中心として〉，《朝鮮學報》，第 124 期（1987 年 7 月），頁 49-82；鄭光：〈朝鮮朝の外国語教育と訳科倭学について〉，《紀要〈関西大・東西學術研究所〉》，第 23 期（1990 年 3 月），頁 57-84。

⁴² 高光一：《朝鮮時代 中國語 教育 研究：譯官 養成 및 教材를 中心으로》（朝鮮時代中國語教育研究：譯官培養與教材為中心）（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教科教育學科碩士論文，2007 年）。

⁴³ 김남경（金南京）：《朝鮮時代 譯官과 翻譯史에 관한 研究：過舉의 譯官考察과 近代 翻譯史를 中心으로》（朝鮮時代譯官與翻譯史相關研究：以過去的譯官考察與近代翻譯史為中心）（서울[首爾]：高麗大學校中國語翻譯學科碩士，2006 年）。

⁴⁴ 양오진（梁伍鎮）：《漢學書研究》（서울[首爾]：박문사[博文社]，2010 年）；양오진（梁伍鎮）：《〈漢學書〉老乞大 朴通事 研究》（서울[首爾]：제이앤씨[J&C]，2008 年）。

⁴⁵ 鄭光：《譯學書研究》（서울[首爾]：제이앤씨[J&C]，2002 年）。

⁴⁶ 汪維輝先後與幾位日本、韓國學者聯合點校及編輯了《朝鮮時代漢語書叢刊》及其續編，讓學界能一目了然地掌握各種漢語教科書。關於此，詳參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

作中古及近世語言學的探討，其中關於語音變遷、用字、音韻與語法等課題，都成為了學者們的論文主題，成果亦相當全面與顯著。⁴⁷可是，關於譯學書應用於譯官的訓練及對他們的思維的影響，這方面顯然是不足的，儘管梁伍鎮亦曾提出以有關材料作為文化史的探索題材，⁴⁸可是有所回應的成果不多。⁴⁹

可見在韓國學界之中，以譯官有關的課題其實不少，但是以譯官們為主題，並探討他們的歷史意義的卻相對較少。關於譯官工作與活動的研究，還可參考金良洙的研究，他曾撰有多本著作，分別是以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專門探討朝鮮後期譯官身份問題，⁵⁰他亦根據 18 世紀初期的金指南與金

教科書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共 4 冊；汪維輝、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共兩冊。當中的朝鮮漢語教材包括了不同版本的《老乞大》和《朴通事》、《訓世評話》、《華音啟蒙》、《你呢貴姓》、《學清》、《象院題語》、《中華正音》、《騎著一匹》、《關話略抄》、《漢談官話》等。英語世界中，出生於中國的白俄羅斯裔澳洲漢學家葛維達（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於澳洲國立大學修讀博士時，以《老乞大》與《朴通事》翻譯成英語，並對兩本書的材料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其中《老乞大》分析更是其 1977 年博士論文，詳參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Pak the Interpreter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Cultural Evaluation of the Piao Tongshi*,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6.

⁴⁷ 關於譯言學的語言領域相關的研究成果，將不區列出來，具體的資訊可參考遠藤光曉等編：《譯學書文獻目錄》（서울[首爾]：박문사[博文社]，2009 年）；編者們就各種朝鮮所出版的譯學書的版本作出了全面的整理，同時亦將相關研究的材料也羅列，而且有關資訊更新至 2009 年，故對於譯學書方面的研究趨勢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⁴⁸ 梁伍鎮：〈原本《老乞大》의 文化史의 價値에 대하여〉（探析原文《老乞大》的文化史價值研究），《中國學報》，第 47 輯（2003 年），頁 43-65。

⁴⁹ 陳遼：〈《朴通事》：元明兩代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中華文化論壇》，2004 年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76-81；王永超：〈《朴通事》所見元末北方官話區民俗〉，《民俗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23-144；周晏菱：〈《老乞大》與《朴通事》中的民俗文化探究〉，《台灣首府大學學報》，第 1 期（2010 年 9 月），頁 77-100；

⁵⁰ 金良洙：《朝鮮後期の 譯官身分에 관한 研究》（朝鮮後期的譯官身份研究）（서울[首

慶門父子的家族的經歷為個案，探討中人家族的變遷以及在朝鮮社會的角色的專著。⁵¹不少譯官其實一直都涉及到對外往來的經歷，其中在通信使的貢獻與角色比較多學者探討，⁵²但前往北京的燕行使行中，譯官的工作不能忽視，⁵³不但是中韓交流，也是東亞文化交流圈之中的重要媒介人物。⁵⁴可是，學界對於這方面並沒有太多關注，僅散見於不同的燕行使行研究之中說明到譯官在介入兩地士人的交流，⁵⁵或是曾經涉及過關乎他們潛商

爾]：延世大學校大學院歷史學科博士論文，1986年）。

⁵¹ 金良洙：〈朝鮮後期牛峰金氏의 成立과 發展——繼全公派의 金指南等中人을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牛峰金氏의 成立與發展——以繼全公派的金指南等中人為研究中心），《歷史와 實學》（歷史與實學），第33輯（2007年），頁5-74；金良洙：《조선후기 中人집안의 발전：金指南、金慶門등 牛峰金氏事例》（朝鮮後期中人家族的發展——金指南、金慶門等牛峰金氏事例）（서울[首爾]：白山資料院，2008年）。

⁵² 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多是關心譯官在朝鮮通信使時的貢獻及角色。例如康遇聖、洪喜男及金指南等譯官在通信使期間的經歷。類似的研究成果可參考，이상규（李尚奎）：〈17세기 전반 왜학역관 康遇聖의 활동〉（17世紀前期倭學譯官康遇聖的活動），《한일관계사연구》（韓日關係史研究），第24期（2006年4月），頁101-141；이상규（李尚奎）：〈17세기 초중반 왜학역관 洪喜男의 활동：통신사 파견시 수행역관 활동을 중심으로〉（17世紀前期倭學譯官洪喜男的活動——以通信使派遣時隨行譯官活動為研究中心），《한일관계사연구》（韓日關係史研究），第26期（2007年4月），頁233-272；백옥경（白玉敬），〈역관 김지남의 일본 체험과 일본 인식：《동사일록》을 중심으로〉（譯官金指南的日本經驗與日本認識——以《東槎日錄》為研究中心），《한국문화연구》（韓國文化研究），第10期（2006年10月），頁169-198；이상규（李尚奎）：〈17세기 전반의 조일관계 전개와 왜학역관 제도의 변화〉（17世紀前期的朝日關係展開與倭學譯官制度與變化），《朝鮮時代史學報》，第62卷（2012年8月），頁251-296。

⁵³ 近年開始亦有些研究，並非以譯官為主題，但卻肯定了譯官作為文化交流或情報收集的作用，可參考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考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東亞人文學》，第12輯（2007年12月），頁255-276。

⁵⁴ 最早把翻譯官員視為文化交流及外交媒介的研究可見於楊聯陞：〈中國文化的媒介人物——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〇次座談會紀要〉，《大陸雜誌》，第15卷第4期（1957年8月），頁32-33。

⁵⁵ 如葛兆光亦曾引用譯官金慶門（1673-1737年）與李正臣的對話為例，說明吳三桂（1612-1678年）事件成為了燕行使常談及的話題，而當中亦牽涉到譯官的角色。可參考葛兆光：〈吳三桂非姜伯約——從清朝初年朝鮮人對吳三桂的評價說起〉，氏著：《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79-101；關於金慶門的燕行角色，可參考羅樂然：〈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以金慶門

的問題，⁵⁶抑是明清易代以後譯官政治動向的轉變以及當中的活動，⁵⁷近年比較多的討論的內容，主要談及有名的譯官與中國士大夫之間的詩文交流，如溫兆海的專著以及相關的論文對李尚迪（1803-1865 年）的探討，⁵⁸以及孫衛國的〈清道咸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為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⁵⁹無疑都讓學界對李尚迪這位譯官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別是他與中國學人的交往以及詩文成就。然而，學者們雖均提及李尚迪為一位譯官，但是卻未有從譯官的脈絡重新認識李尚迪，而只是按其著作及活動而討論，此舉不能全面了解李尚迪在中朝關係之中的角色，以及譯官制度及培訓在中朝關係的意義。可見，儘管不少穿梭於中朝兩地的譯官，有很多值得學界注意

為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345-378。另外白玉敬亦曾撰文提及燕行使在收集情報的過程中，譯官有一定的角色。參考白玉敬，〈18 세기 연행사의 정보수집 활동〉（18 世紀燕行使的情報收集活動），《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38 期（2012 年 10 月），頁 201-229。

⁵⁶ 不少研究成果特別關注譯官在使行期間，利用了多次前往中國的各種機會，進行貿易，以賺取比他原來職務更多的金錢。此舉當然引起朝廷下的不滿。關於此，詳參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서울[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 年），頁 44-60；並參李哲成：〈18 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對清貿易 實態와 私商層의 성장〉（18 世紀後期朝鮮的對清貿易實況與私商層的成長），《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第 94 輯（1996 年 9 月），頁 113-150。

⁵⁷ 白玉敬：〈朝鮮後期 譯官의 政治의 動向研究——明・清交替期를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譯官的政治動向研究——明・清交替期為研究中心），《國史館論叢》，第 72 輯（1996 年 12 月），頁 127-149；在此課題中，經常被談及的譯官為懂滿洲語的譯官鄭命壽，關於其活動大多從道德上批判其活動，但亦有學者觀察他在貿易過程中的角色。關於此，詳參金宣旼：〈朝鮮通事 굴마흔, 清譯 鄭命壽〉（朝鮮通事古兒馬紅，清譯鄭命壽），《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41 輯（2014 年 4 月），頁 37-65；白玉敬：〈仁祖朝 淸의 譯官 鄭命守〉（仁祖朝淸的譯官鄭命壽），《이화여자대학교 대학원 연구논총》（梨花女子大學校大學院研究論叢），第 22 輯，（1992 年月份缺），頁 5-21。

⁵⁸ 溫兆海曾撰有多篇論文，及後將有關成果集結成專著。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淸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 年）。韓國方面的李尚迪研究，則可參考李春姬：《19 世紀 韓・中 文學文流——李尚迪를 중심으로》（19 世紀韓中文學交流——以李尚迪為研究中心）（서울[首爾]：세문사[思文社]，2009 年）。

⁵⁹ 孫衛國：〈清道咸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為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10 月），頁 95-113。

的活動，但很多時甚少學者將這些活動中，譯官的角色聯繫起來。⁶⁰近期，韓國學界所涉及的譯官研究，似乎為此領域，帶來了新的視野。장안영（張安榮）探討 18 世紀朝鮮使行的知識份子如何懷疑譯官的能力之下，對於譯官所提供的情報的不信用，而產生的討論與思考，是首次嘗試專注在譯官的對話過程之中，來了解他們的角色。⁶¹此外，王思翔曾探討譯官、語言知識及語文政治之間的關係，⁶²把譯官放置在語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來探討，突破了過去學界忽略了譯官角色對朝鮮社會，甚至是東亞政治的影響力。⁶³

無疑從上述的例子觀之，學界已積極地就譯官的角色及歷史價值作重新定位，也肯定了他們的學術意義，但同樣地，可發展的研究空間仍然

⁶⁰ 以譯官活動為主的研究成果包括，金良洙：〈朝鮮前期의 譯官活動（上）〉（朝鮮前期的譯官活動[上]（上）），《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7 輯（1996 年 1 月），頁 33-86；金良洙：〈朝鮮前期의 譯官活動（下）〉（朝鮮前期的譯官活動[下]），《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8 輯（1996 年 1 月），頁 5-66；朴成柱：〈朝鮮前期 對明 御前通事〉，《慶州史學》，第 29 輯（2009 年 6 月），頁 27-51；이규필（李奎泌）：〈오경석의 『삼한금석록』에 대한 연구〉（吳慶錫的《三韓金石錄》研究），《민족문화》（民族文化），第 29 輯（2006 年 12 月），頁 341-374；이상태（李尚泰）：〈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白頭山定界碑的設置與金指南的角色），《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33 輯（2007 年 9 月），頁 75-119。

⁶¹ 장안영（張安榮）：〈18 세기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역관 통역의 문제점 고찰——『노가재연행일기』·『을병연행록』·『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18 世紀知識人們眼中所反映的譯官通譯的問題考察——以《老稼齋燕行日記》、《乙丙燕行錄》、《熱河日記》為研究中心），《語文論集》，第 62 輯（2015 年 6 月），頁 349-372。

⁶² Sixiang Wang, “The Sounds of Our Country: Interpreters,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1392 – 1592),” in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 – 1919*, ed. Benjamin A. Elman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4), 58-95.

⁶³ 衣師若芬亦有留意到翻譯與政治取捨之間的關係，她利用了李邦翼漂流之旅的不同書寫，觀察到漢文與諺文之間，論述背後的文化與政治因素。詳參衣若芬：〈漂流到澎湖：朝鮮人李邦翼的意外之旅及其相關書寫〉，《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2008 年 5 月），頁 131-156。

相當廣闊，例如學界較偏重於朝鮮前期，即 17 世紀明清易代以前的譯官角色與工作，又未特別將翻譯與禮儀並行討論，嘗試從禮節安排的角度，了解譯官在這方面的工作性質與職能，又未有較少提及譯官如何在使行期間，進行傳譯的過程，讓朝鮮使臣對中國有更多認識或是帶來更多的討論，同時協助朝鮮使臣與中國官員與士人周旋與交往，為朝鮮掌握更多有用的資訊。諸例可引證譯官在中朝兩地交流的活動過程，是值得更多的探討。

2. 關於中朝朝貢關係的先行研究

研究朝鮮譯官活動的意義之一，是希望用作回應與補充明清中朝關係史的研究領域，現時所缺乏的觀點及思考角度。崔韶子曾歸納出中國與朝鮮兩地之間的交流及關係史現時研究課題可分為九種：⁶⁴（一）明末清初朝鮮外交政策研究、⁶⁵（二）丁卯、丙子胡亂研究、⁶⁶（三）清朝貢關係相關研究、（四）北伐、對明義理討論的研究、（五）國境設定問題研究、（六）朝鮮後期實學家對外認識變化研究、（⁶⁷七）清朝文人、學者之間的交流研究、（八）經濟交流相關關係研究、（九）接受西學、天主教相關研究。

⁶⁴ 關於此，詳參崔韶子：《18 세기 연행록과 중국사회》（18 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서울[首爾]：혜안[慧眼]，2007 年），頁 27。

⁶⁵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아시아의國際秩序에서〉，《梨花史學研究》，第 22 輯（1995 年月份缺），頁 183-196。

⁶⁶ 例如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年）。

⁶⁷ 韓國的實學者是一群主張改革朱子學所衍生的性理學思想在疆化的朝鮮社會中提倡各種不同方式的改革，以圖在現實社會之中，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像李睟光（1563-1628 年）本人所指：「以實心而行實政，以實功而致實效，使念念皆實，事事皆實，則以之為政，而政無不舉，以之為治，而治無不成。」關於此，詳參並參黃元九：〈「實學」私議——東亞에서의 實學의 異同性〉（實學私議——東亞中的實學的異同性），氏著：《東亞細亞史研究》，頁 358-359；葛榮晉：《韓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3。

雖然分為九類，但實際上若作出一定的整理，不難發現中朝之間的研究問題，主要涉及的是朝貢體系落實下，特別是明清易代之後，一連串的事件，包括兩次胡亂、朝鮮朝廷的更替，以及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及後來引伸的北伐與對明義理等的討論，甚至是對外認識的改變及文人的交流，都必從中朝的朝貢體系的角度之下延伸出來的學術課題。因此，必須了解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及他們所涉獵的課題，更能了解到譯官研究如何回應這一領域的研究不足。

全海宗可說是在此領域之中最早涉獵有關課題的韓國學者，⁶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年）當時邀請了全海宗出席 1965 年 9 月舉行的 Chinese World Order 學術研討會。⁶⁹該會舉辦的目的主要是針對費正清就中國傳統朝貢體系所提出的理論作出多角度的討論，以完善或思考其理論涉及之議題。費正清嘗試提出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之中，以朝貢體系聯繫周邊的國家，從中分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結構諸如朝鮮與安南等的「Sinic Zone」（中華區）、滿洲、蒙古與維吾爾等與中國文化有所距離，但仍屬於中華秩序之下的「Inter Asia Zone」（內亞區）和地理距離甚遠，關係較疏離，如東南亞各國、歐洲以及日本的「Outer Zone」（外部區）三種範圍，而三種分類也好，費正清認為此等國家都會以中國天子為中華秩序的中心，無論是文化上的向心，還是天子對化外民族開恩的觀念，無論如何都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貢活動之中，以貢物或是禮儀，以維繫中國

⁶⁸ 徐耿胤、石之瑜：《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頁 39-54。

⁶⁹ 該會議於 1965 年舉辦，先後邀請了多位重要學人參與其中，包括楊聯陞（1914-1990 年）、王賡武等。關於此，詳參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與朝貢國之間的關係。⁷⁰

當時，全海宗以韓國學者的角度，就費正清建構出的理論提出討論，當時就清代的韓中(或中韓)關係，所發表的“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引起了巨大回響，也可被視為學界第一次以韓國的角度從新理解傳統中華秩序與中國對外關係的問題。有關論文修改後，以韓文出版，⁷¹並後來在中國大陸被翻譯成為中文。⁷²其論文中除了提供了各種重要中朝朝貢關係下的各種重要事務的具體信息，包括關於使行的形式、使行的次數、人手的安排、貢物的要求，雙方的行使過程等，又提及到一些需中朝雙方合力處理的議題，如漂民、犯禁等清代獨特涉及，且需中朝雙方合力處理的議題，更關鍵的是，朝貢體系所築建的清鮮關係中，全海宗從朝鮮的角度出發，留意到經濟方面，其實朝鮮並沒有因此而獲得極大的利益，故試圖改變了傳統論述認為朝貢國能就此而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這種必然想像作出了澄清。

臺灣在此領域素有研究的張存武，則撰寫書評回應全海宗的觀點，包括認為應以「封貢」取代「朝貢」；質疑全海宗認為清朝為典型朝貢原則，原因是清朝對於朝鮮來說是一種征服，而非「修文德以徠之」的宗藩關係，亦反駁全海宗認為朝鮮經濟損失頗大的事情，也否定了全海宗指出清代禁

⁷⁰ 關於費正清的朝貢制度理解及有關課題的延伸，可參林孝庭的整理。林孝庭：〈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頁41-46。

⁷¹ 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震檀學報》，第29期（1966年12月），頁435-480。

⁷² 全海宗著，全善姬譯：〈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氏著：《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81-242。

令嚴苛導致文化交流過程中燕行使節的貢獻實為不足的觀點。⁷³

全海宗閱讀過張存武的評論後，以英語撰寫了回應文章，⁷⁴全海宗主要認為張存武出現各種誤解的原因，是對於韓國研究領域中的用詞、研究情況不太掌握而成的，也認為張氏作出評論時，帶有其先入為主的想法。儘管雙方之間的討論無法得到共識，但是有關討論提醒了後來學者務必在這領域中，必需兼顧不同背景的研究學人的成果，也肯定了這個領域還是值得深究的地方。

而事實上，有關的討論引起了張存武對此領域的興趣，後來亦因此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以及出版了兩本重要的專著《清韓宗藩貿易》、⁷⁵以及《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⁷⁶確立了他在臺灣中朝關係史的研究領域裡面的領導地位，⁷⁷其所涉及的研究成果不但包含了清代中國與朝鮮之間的朝貢體系

⁷³ 張存武：〈「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評介〉，《思與言》，第5卷第6期（1968年3月），頁48-49、51。

⁷⁴ Hae-jong Chun, “Notes on th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Remarks on Mr. Chang’s Review Article”，《歷史學報》，第37輯（1968年6月），頁127-129。

⁷⁵ 詳參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1978年）。

⁷⁶ 另外，張存武關於中朝關係的研究，亦散見於各期刊，如張存武：〈清韓封貢關係之制度性分析〉，《食貨月刊》，第1卷第4期（1971年7月），頁11-17、張存武：〈清韓關係，1636-1644〉，《故宮文獻》，第4卷第1期（1972年12月），頁15-37、張存武：〈清入關前與朝鮮的貿易，1627-1636〉，《東方學志》，第21期（1979年3月），頁187-193；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之變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頁105-125。這些研究亦收錄在他的論文集之中，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⁷⁷ 張存武的其中一位學生葉泉宏過去主要研究的是明代中朝關係的變遷，他的碩論以明朝與朝鮮前期的中韓國交為主題，詳參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他同時亦旁及使行的其他問題，如葉泉宏：〈鄭夢周與朝鮮事大交鄰政策的淵源〉，《韓國學報》，第15期（1998年2月），頁97-114；葉泉宏：〈僣氏家族與麗末鮮初之中韓關係〉，《韓國學報》，第12期（1993年11月），頁59-79等。

延伸的課題，亦關係到各種韓國史研究以及材料的發現及採用。⁷⁸

過去數十年，清代中朝之間朝貢體系的研究亦相當豐富，⁷⁹未因時間過久而淡忘，其中不少已經走出單純以制度史為主的角度，例如劉為的《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探討朝貢體系下兩地之間派遣使節時的制度以及具體情況。⁸⁰一些朝貢落實下的特殊議題也被學者多視野的關注，葉泉宏所撰的〈乾隆千叟宴與清朝宗藩關係(1785年)〉⁸¹和〈瀋館幽囚記(1637-1645)：清鮮宗藩關係建立時的人質問題〉，⁸²都關係到明清與朝鮮之朝貢體系下的各種延伸議題。⁸³另外，有關清初時滿州人在西元1627年的丁卯及西元1636年的丙子之役先後兩次入侵朝鮮，促使朝鮮降服清廷，放棄對明朝貢的課題，相當受到早期學者們的相當重視。⁸⁴此外，由於朝鮮對於清廷並非千

⁷⁸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年）；張存武：〈有關韓國的中國史料之考察〉，中國學論叢刊行委員會編：《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서울[首爾]：中國學論叢刊行委員會，1983年），頁645-656。張存武：〈韓人保留下來的明代公牘——吏文謄錄殘卷〉，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第五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1年），頁111-120。

⁷⁹ 付伯臣所編的書之中有不少篇幅涵蓋清中朝朝貢制度的課題，詳參付伯臣編：《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40-276。

⁸⁰ 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⁸¹ 葉泉宏：〈乾隆千叟宴與清朝宗藩關係(1785年)〉，《韓國學報》，第17期（2002年6月），頁283-297。

⁸² 葉泉宏：〈瀋館幽囚記(1637-1645)：清鮮宗藩關係建立時的人質問題〉，《韓國學報》，第18期（2004年6月），頁284-299。

⁸³ 其他的研究成果不於此文贅述，關於晚清的中韓關係，可參考林亨芬：〈近四十年來有關「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的研究回顧〉，《歷史教育》，第18期（2011年6月），頁135-166；另可參考較全面的整理，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14年6月），頁209-242。

⁸⁴ Erling Mende, "Korea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anchu,"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3(2003): 45-61.

依百順，而清廷亦對其立場有所警惕。因此，雙方對於接壤邊界多次進行討論，甚至曾派遣使團到邊境進行交涉，故此題材也常在清與朝鮮關係研究領域之中被學者談及。⁸⁵

文化課題一直受到各地學者關注，⁸⁶例如朝鮮人對滿清的意識以及華夷觀的轉變便是近年的重要論題。其中值得參考的例子，包括崔韶子的《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清與朝鮮——近代東亞的互相認識）、⁸⁷陳尚勝的《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⁸⁸葛兆光的〈大明衣冠今何在〉⁸⁹與〈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⁹⁰孫衛國的《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⁹¹宋慧娟的《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等……⁹²

⁸⁵ 例如 Andre Schmid, “Tributary Relations and the Qing Choson Frontier on Mount Paektu,” Da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126-150;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1(2007): 33-61; 中文學界亦有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年）。

⁸⁶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頁 42。

⁸⁷ 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

⁸⁸ 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年）。

⁸⁹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 10 期（2005 年 10 月），頁 41-48。

⁹⁰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8-58。

⁹¹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⁹²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 年）。

3. 關於朝貢的賓禮研究

中國朝貢體系的具體運作，包括清朝時期也好，禮儀如何落實是重要的課題。關於中國與周邊國家與勢力互動時的禮儀活動以及的種種「賓禮」安排的討論，華文和英文同樣豐富的論述，例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陳維新所著的《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⁹³他主要透過俄國與中國之間的交際過程之中，了解到外交禮儀體制之下，所帶出的各種衝突。而特別是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各種費正清構想中的「Outer Zone」的歐洲各國隨著地理大發現紛紛抵達東亞地區進行各種政治、經濟的活動，改變了東亞世界之中的原來秩序與禮儀體制，亦因此而引發了各種因此而所出現的討論。例如 James Hevia（何偉亞）曾引起美國漢學界重大爭議的專著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⁹⁴便嘗試關注到賓禮如何成為了中國對外關係秩序之中關鍵的因素，儘管 Hevia 受到 Joseph W. Esherick（周錫瑞）猛烈的批評，⁹⁵但是「特殊禮儀對於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合法化所起的特殊作用。」⁹⁶而不是單純的象徵性禮儀，這一點無疑是帶來新的思考，就是

⁹³ 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

⁹⁴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⁹⁵ 除了周錫瑞曾先後撰寫中英文書評，批評何偉亞外，羅志田亦就何偉亞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討論。關於周錫瑞的書評，詳參 Joseph W. Esherick（周錫瑞）著，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44期（1997年12月），頁105-117；並參 Benjamin Elman（艾爾曼）、Theodore Huters（胡志德）著，趙剛、孟悅譯：〈馬嘎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44期（1997年12月），頁118-130；再參羅志田：〈十八世紀清代「多主制」與《賓禮》的關聯與牴牾〉，《清史研究》，第4期（2001年11月），頁51-55。

⁹⁶ 周錫瑞著，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頁113。

在交往的過程中，過去被視為形式化的外交禮儀，如何背後反映出各種作用或權力關係。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研究都關注於看見明顯變化的「Outer Zone」國家，特別是英人來華後的各種衝擊與變化。相比之下，而對於「Sinic Zone」與「Inter Asia Zone」的「外藩」，特別是「朝貢國」如何看待賓禮的落實及賓禮對於中國與國家之間關係建構的意義，似乎可作更多深刻的探究。⁹⁷

4. 關於燕行錄與使行的先行研究

除了上述的方向外，近年清代中朝關係的研究大多討論燕行使及他們所撰寫的《燕行錄》，⁹⁸以此作為主題、個案或史料探討中朝關係之中各樣的學術課題。⁹⁹早於戰前，已有日本學者關注到燕行使的意義，但一直不成風氣。¹⁰⁰在 1960 年代，成均館大學編輯了《燕行錄選集》，讓韓國學界

⁹⁷ 郭嘉輝的研究試圖在明清不同的階段，試圖解決朝貢制度下，朝廷如何處理相關問題，其中他的博士論文主要以洪武（1368-1398 年）為研究對象，而他另有撰文比較明清之間處理有關問題時，中華帝國朝廷是如何對應的。關於此，詳參郭嘉輝：《明洪武（1368-1398）「朝貢制度」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郭嘉輝：〈明清「朝貢制度」的反思—以《萬曆會典》、《康熙會典》中〈禮部·主客清吏司〉為例〉，載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頁 42-79。此外，김문식（金文植）透過使臣接待的儀禮特徵及外交文書來方面來討論，是這課題的少有成果。關於此，詳參김문식（金文植）：〈조선시대 外交儀禮의 특징〉（朝鮮時代外交儀禮的特徵），《東洋學》，第 62 輯（2016 年 1 月），頁 77-98。

⁹⁸ 據黃洪九的分類，一般來說《燕行錄》可被分為「紀事體」、「敘事體」、「敘情詩」等三類，而書寫文字除了漢文體，亦包括諺文體。詳參黃元九：〈燕行錄의 世界〉（燕行錄的世界），氏著：《東亞細亞史研究》（서울[首爾]：一潮閣，1976 年），頁 280。

⁹⁹ 裴英姬將始於 20 世紀 30 年代迄至 2008 年的燕行研究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及文化史四個脈絡探討中朝關係及《燕行錄》的研究方向，具體研究成果參見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年）〉，《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219-255。

¹⁰⁰ 例如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歐人と朝鮮使臣：西歐キリスト教文化の半島流傳について》（清朝裡的歐洲人與朝鮮使臣——關於西歐基督教文化在朝鮮半島的流傳），《史學雜誌》，第 44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頁 1-30。這篇文章透過李頤命（1658-1722

開始深入探討各種與燕行錄相關的研究。¹⁰¹當時，金聖七曾撰寫一篇〈燕行小攷〉講述燕行的過程，但並未有全面說明《燕行錄》各種的東亞史料價值，卻展開了燕行研究的第一步。¹⁰²至於中文學界，當時有關研究還是少之有少。¹⁰³直到 2001 年，林基中整理了 100 種《燕行錄》資料，出版了《燕行錄全集》，並在 2008 年推出了《燕行錄續集》，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掀起新一波的中朝關係研究熱潮。這次的出版，不但在韓國引起了回響，¹⁰⁴這些《燕行錄》的出版物亦獲得各地學界許多圖書館購置，促成各地學者相繼利用燕行資料提出各種觀點補充了以往清代中朝關係研

年）和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的對話，及洪大容前往北京時與劉松齡（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 1703-1774）及鮑友管（Antoine Gogeisl, 1701-1771）的對話，來說明基督教文化在朝鮮的流傳經過。近年，夫馬進在《燕行錄》的研究，探索出各種不同方向的中朝關係史成果，可參考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¹⁰¹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 年）。

¹⁰² 金聖七：〈燕行小攷：朝中交涉史의 일 각〉（燕行小考——朝中交涉史的一察），《歷史學報》，第 12 期（1960 年月份缺），頁 1-79；在韓國學界，如《明清史學會》以及《中國史學會》等都有不少文章收錄，涉及以《燕行錄》，而韓文方面的燕行研究成果較華文的有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而當中主力以《燕行錄》發掘各種朝鮮和中國之間的歷史脈絡的學者，首推崔韶子、白玉敬、丘凡真等學人，他們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值得參考的地方。其中如丘凡真所提出的問題，是少有在中文學術所見的課題，可見因學術背景不同之緣故，讓《燕行錄》可開拓的題目相當的豐富。如丘凡真：〈1780 년 열하의 칠순 만수절과 건륭의 '제국'〉（1780 年熱河的七旬萬壽節與乾隆的「帝國」），《明清史研究》，第 40 期（2013 年 10 月），頁 177-217 及〈清의 朝鮮使行 人選과 大清帝國體制〉（清的朝鮮使行人選與大清帝國體制），《인문논총》（人文論叢），第 59 期（2008 年 6 月），頁 179-228。此外，韓國學者亦有不少以英語論述提出對《燕行錄》及燕行使亦有所關注。例如 Yoong-hee Jo,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d the Tradition of Yeonhaengrok,”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13:2(2010): 135-157; Jae-hoon Jung, “Meeting the World through Eighteenth-century Yonhaeng,”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3.1(2010): 51-69.

¹⁰³ 惟 1967 年張存武發表了一篇介紹該選集的論述，但卻沒有後續研究跟進。詳參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第 5 期（1967 年 1 月），頁 41-42。

¹⁰⁴ 例如崇實大學出版了一套共十冊的叢書，邀請了各方韓國學者共同探討各種燕行話題。關於此可詳見楊雨蓓介紹；楊雨蓓：《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343-353。

究的不足之處。¹⁰⁵

當然，主編《燕行錄全集》的林基中，亦就其編輯的工作所發現的研究及資料作出整理，於 2006 年出版了《燕行錄研究》，並將該書於 2014 年修補為《燕行錄研究層位》¹⁰⁶，更全面地探討燕行錄的整理及現存材料，以及各種可行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了 16-19 世紀燕行錄中關於和答詩、演戲記、幻戲、服飾、文物等燕行使節會參與的活動考察及分析，並同時涉及清與朝鮮之間對方意識的討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林基中對比了漢文與諺文燕行錄的差異，這亦是過去學界過份重視史料之應用，而忽略了語言或文字對於使行意識的影響，似乎林基中這部全面的專著，可被視為過去十餘年因《燕行錄全集》出版而成為顯學的中朝之間使行研究的經典之作。

《燕行錄》的應用或中朝之間使行的熱烈討論，並沒有只停留於韓國的學術圈，東洋史研究相當紮實的日本學界，亦有學人關注其中。最值得留意的，當然是夫馬進的研究。夫馬進最初並非從事中朝關係或日朝關係史的研究，而是研究中國善堂史為主。¹⁰⁷但隨著多種《燕行錄》的出版及整理，他亦將其研究領域擴大到研究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不同語言

¹⁰⁵ 近年一些中國的出版社亦將之選編、修輯和出版，如弘華文編：《燕行錄全編》（桂林：廣西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杜宏剛編：《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桂林：廣西範大學出版社，2008）；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等

¹⁰⁶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서울[首爾]：一志社，2006 年）；林基中：《燕行錄研究層位》（서울[首爾]：學古房，2014 年）。

¹⁰⁷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 年）。

的論文與著作，已多次被各地譯者翻譯出版，¹⁰⁸而被視為最全面反映夫馬進這方面研究的日文版則於 2015 年，由名古屋大學出版。¹⁰⁹該書將過去已發表，關於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課題的論文，也放置於這本共 744 頁的書之中，當中除了過去已被不少學人關注的洪大容對情的體驗、乾淨衛會友錄等方面的研究，亦特別討論了朝鮮的外交議題，如事大的原理，以及中國關於禮與問罪的問題。其中後者將禮放置於東亞各國之間交流過程中討論，是過去學界未有顯著嘗試的方向。因此，夫馬進一書肯定的是將《燕行錄》超越了純粹史料的運用，而是將撰寫《燕行錄》的使節為主題，從他們的經歷，貫穿了一段在東亞三國在 17 至 19 世紀之間的種種互動所呈現的各種意識與問題。

除了夫馬進外，三好千春關於《燕行錄》的研究也是值得留意的。她過去留意到過去近代朝鮮史研究之中，鴉片戰爭對朝鮮朝野帶來很大的震撼，而她透過整理各種《燕行錄》及其他中日韓文獻之中，留意到燕行使節於北京不只是單純地處理禮節活動，而是收集各種關於鴉片戰爭與英人活動的情報，¹¹⁰並將資訊轉達到朝鮮社會，亦使朝鮮因而加強了各種危機

¹⁰⁸ 韓文版於 2008 年出版，후마 스스무（夫馬進）著，정태섭譯：《연행사와 통신사》（燕行使與通信使）（서울[首爾]：신서원[新書院]，2008 年）；而中文版則由 2010 年出版，其中以中文版對於華文研究有很大的啟發，當中不少研究生就他的專著以不同的面向撰寫了書評，例如秦麗：〈評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311-318；吳政緯：〈評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99-205。

¹⁰⁹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年）。

¹¹⁰ 關於燕行使節在北京進行對外資訊及情報的收集，華文亦有相關的研究成果，包括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55-190；羅樂然：〈作為媒介的燕行使：柳厚祚 1866 年的燕行與朝鮮開港前的東北亞資訊認知〉，《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集），第 53 輯（2013 年 12 月），

意識，¹¹¹似乎留意到使行的過程中，除了一些文化上的考察，還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情報收集，似乎亦對於使行到中國的使行成員來說，相當重要。

另一方面，由於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周邊看中國的討論，華文學者亦對於《燕行錄》的研究有相當多的參與，近年也見不少系統性及值得參閱的專著。其中，楊雨蕾與徐東日的專書視為的代表。楊雨蕾的《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是以燕行錄作主題，探討中朝關係在明清時期的文化關係，特別著重西學、北學、華夷觀等話題作深入探討，聚焦觀察燕行使如何經歷燕行對其固有觀念帶來的衝擊及轉變。¹¹²徐東日則觀察燕行使筆下的清朝形象變化。¹¹³兩者只是近年興起的中文學界對《燕行錄》研究較整全的研究代表，¹¹⁴但同時亦反映了華文學界都著重於交流的結果，¹¹⁵而非交流的過程，即使有涉及到過程，但關懷的都是文化觀的轉變而已。故似乎將使行過程更完整及具體的呈現，¹¹⁶有助擴闊過去研究中朝關係或是東亞文

頁 393-418。

¹¹¹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燕行使關於鴉片戰爭的情報），《史艸》，第 30 號（1989 年 11 月），頁 28-62。

¹¹²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107-245。

¹¹³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中的中國形象》（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¹¹⁴ 相關的專書舉隅：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年）；趙興元：《燕行使視域中的清代北方社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年）。

¹¹⁵ 其中，楊雨蕾關心的是漢籍的傳入以及使行所進行的交往如何對於北學的興起及朝鮮西學的發展帶來的影響。

¹¹⁶ 一般來說行程離開義州後，便經柵門、鳳凰城、遼陽、鞍山、耿家莊、牛家榮、艦山、廣寧、錦州、山海關、深河、永平、豐潤、玉田、薊州、通州、北京等地。關於此，詳參黃元九：〈燕行錄의 世界〉（燕行錄的世界），氏著：《東亞細亞史研究》，頁 281-282。

化交流的視野。

三、 研究問題

學術界以往傾向討論中朝關係史中的交流結果，甚少以交流的過程作為主題，又譯官也甚少放置於文化交流脈絡下討論。著眼於先行研究不足之處，筆者在此研究規畫中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到底朝鮮譯官在清朝治下的朝鮮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過程之中擔當甚麼角色？當中所探討的不只是語言上的角色，而是在傳統儒學傳播到東亞各地後，朝鮮譯官如何在使行期間反映朝鮮的禮儀精神，以及履行賓禮的責任？此外，譯官如何利用了他們的獨特身份與責任，協助朝廷搜集各種情報及新知識？官員或許也肯定譯官的重要性，¹¹⁷但現實中的譯官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怎麼改變中朝之間的關係？而朝鮮士大夫及朝廷又是如何受到朝鮮譯官的活動影響，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同樣地，中國士大夫與朝鮮譯官的交流，又如何透過翻譯或詩文創作，來築構了各種友誼，擴闊了他們對朝鮮的認知？

四、 研究資料

收集與整理可靠及有意義的一手資料，是作為歷史研究關鍵的一環，而中韓國兩地關於清朝及朝鮮王朝相關的官方文件，都是呈現清朝與朝鮮

¹¹⁷ 在朝鮮英祖（李昉，1694-1776 年，1724-1776 年在位）年間，左議政金在魯（1682-1759 年）曾指出透過譯官才可以獲得各種語言書本以及理解蒙古語。他向英祖表示：「蒙古種類，最盛而強實，有他日之深憂，而其語音，有古今之異，故譯舌之誦習蒙書者，遇蒙人，全不通言語。頃年譯官李纘庚（生卒不詳）赴燕也，與蒙人相質言語，作冊以來，近又得《清蒙文鑑》，自此蒙學可以通解矣。請依譯院諸學例，設蒙學聰敏廳，勸課講習，而試取於雜科。」此例可反映時人對譯官對外文的認識十分重視。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 年），《英祖實錄》，第 44 卷，英祖 13 年 5 月辛丑日，頁 3b。

王朝之間文化互動過程的重要第一手資料。例如朝鮮王朝的官方檔案及史料紀錄《朝鮮王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當中包括了不少有關譯官的活動及朝鮮與清之間的互動過程。在中國資料方面，除了《清實錄》及《清史稿》等正史史料外，一些已出版的官方文件，例如《禮部則例》、《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也都是重要的史料來源。另外，中國歷史檔案館所編的《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收集了各種與朝鮮往來紀錄相關的清代檔案，亦可作為參考的史料。另外，本文亦將採用一些清人以往與朝鮮人的交往紀錄，說明譯官於交流過程之中的作用。¹¹⁸

官方對於兩地交流紀錄以外，與譯官切身有關的材料，則可參考《通文館志》及《同文彙考》兩種由司譯院譯官所整理的文獻。兩書均收錄了大量譯官的出行經歷以及他們的工作需求，亦包括了他們對自身工作的看法。¹¹⁹此外，近年各地的圖書館亦發現不少朝鮮譯官與中國士人之間的酬唱文集，並出版了如《韓客詩存》等材料，¹²⁰這些材料將可了解譯官的個人文藝創作，可反映他們的身份、價值觀及與中國士人的相互了解情況。而關於譯官如何吸收各種知識，則關乎到他們閱讀的書籍及接受的語言及文化教育。故朝鮮時代各種譯官的官方教材，如：《老乞天》、《朴通事》、《象院題語》等，都有相當豐富的中國使行期間資訊，可用於建構譯官的中國

¹¹⁸ 以劉靖〈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為例，氏著透過 19 世紀初期董文煥的《碩樵山房日記》和《韓客詩錄》等文人筆記，探討譯官在文化傳播的功能。詳參劉靖：〈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頁 255-276。

¹¹⁹ 《通文館志》主要紀錄出行的慣例及一些重大情事，《同文彙考》主要是將司譯院官員所採集到的各種資料——包括譯官出行的手本或官員的見聞——輯錄成書，以便往後的官員就類似情事預先進行安排。

¹²⁰ 錢志熙：〈從《韓客詩存》看近代的韓國漢詩創作及中韓文學交流〉，《동북아 문화연구》（東北亞文化研究），第 2 輯（2002 年 4 月），頁 97-119。

知識水平，亦能夠更具體呈現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與譯官的活動有密切關係。¹²¹

近年在中韓等地不斷編輯出版及數位化的《燕行錄》亦為關鍵資料，雖然《燕行錄》一直較少被用於燕行使活動以外的研究，但是從《燕行錄》可以觀察到在使團中的使節視野下的譯官，以其他們如何理解譯官的職掌，這些都可做為提出譯官之時代的重要論據。

除了一些已經出版的資料，不少重要的文獻仍收藏在亞洲各地的檔案館及圖書館，例如收藏於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譯官上言謄錄》是理解譯官個人想法的重要一手資料。¹²²除了奎章閣外，筆者曾到訪韓國各地的檔案館，掌握到不少朝鮮文獻的材料，亦有一些散落於民間或地方的檔案館，這些當中也有不少朝鮮譯官的背景資料。¹²³又一些不同漢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文集古籍亦收藏了很多關於朝鮮譯官的文獻，如譯官們贈詩及清文人的情況，或是譯官與朝廷交涉過程的資料，都可見於這些

¹²¹ 汪維輝曾先後編輯了《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和其續編，將大量司譯院及民間所整理的漢語教科書收編於叢刊之中，而另外國立首爾大學奎章閣和韓國的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亦有各種版本的漢語教科書的編訂，故材料並不難整理。雖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不少人都將這些書籍用作語言及文學上作探討，但從來忽卻了這些書籍的原來目的，就是讓譯官有效地在中國使行，故當中所教授的知識，直接與他們工作有關係，故探討有關的材料，可以更具體地了解譯官的知識來源以及他們如何發揮在燕行期間的文化媒介以及協助使臣解決各種疑難。

¹²² 關於《譯官上言謄錄》全文的譯注，可參考이현주（李賢珠）：《譯官上言謄錄譯注》（서울[首爾]：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古典翻譯協同科程碩士論文，2014年）。

¹²³ 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朝鮮譯官不少均來自今天朝鮮半島北方，所以可以掌握這些家族的材料不多，但是在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之中，仍可看到他們在地方上收集到的材料。如金良洙對牛峰金氏的認識，便通過他所擁有的一些家族材料。而鮮文大學的中韓文獻翻譯文獻研究所編訂了很多關於朝譯的語學材料及相關目錄，而所長朴在淵曾慷慨將該所的成果以供筆者參考。

特藏之中，¹²⁴透過整理這些材料都有助認識譯官的形象及在文化互動之中所產生的影響力。

所有資料的收集過程之中，希望所取得的資料是綜合了各立場的觀點，而非偏重某一方，並透過互相比對這些材料，並配合東亞文化交流史與翻譯史的研究視野，去認識譯官如何履行他們的朝貢職責，使朝鮮使團完成各種禮節活動，並擔當兩地之間官方及文化交流上的翻譯，從而擔當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物。

五、 研究方法

傳統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大多以中國視野出發，窺探東亞作為中、日、韓、越等國的交流空間，如何產生各種不同的互動結果及文化意義。然而，自古中國雖然是文化圈中的明顯領導者，但絕對不是決定此一空間之文化蘊含的唯一中心。¹²⁵朝鮮、日本、琉球以及越南對東亞世界的演繹也相當重要；這些地域與東亞其他文化交往時，需要經由媒介人物連繫，使文化在東亞各國之間經歷傳播後，出現「去脈絡化」或「再脈絡化」而

¹²⁴ 如東京都立圖書館小室翠雲（1874-1945 年）文庫收有徐有渠（1764-1845 年）的《金華耕讀記》（特 7641），徐有渠在該書之中有不少關於譯官活動的工作的記載以及見聞，是其他已出版文獻未有發現的資料。

¹²⁵ 這種概念可參考黃俊傑的說法：「數千年來的東亞文化交流圈並不是一場交響曲演出，並不是由作為交響曲指揮者的『中國』指揮著全體樂團成員依照樂譜演奏。相反地，在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與越南經由交流活動而形成自己的主體性之過程中，『中國』是『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但是卻不是指揮周邊國家『演出』的唯一的『中心』。」這種說法正反映出東亞文化交流圈並不只是以中國為主導，而是在各自以中國為『他者』的互動下，建構各自的文化脈絡。詳參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頁 60-61。

有所轉變。¹²⁶故此，透過探討中國以外的媒介人物的背景及他們在交流的各種舉動，有助我們將東亞文化的脈絡轉化情況更具體地呈現。

除此之外，本文特別著重的是文化交流史的過程經歷，而非結果。黃俊傑在〈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提出：「東亞文化交流史近年應該將研究可以將過去聚焦於文化交流活動之『結果』的研究，轉向聚焦於文化交流活動的過程，從而進行某種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典範轉移』。」¹²⁷這種想法可以改變傳統以中國眼光為中心的東亞研究，建立一個更全面的東亞文化共同命題。因此，從結果轉向至過程，正是本文的關鍵觀點，希望探討譯官在燕行使團或中國的活動之中的文化中介活動，在禮儀的執行或是情報的收集過程中，從而更立體地呈現東亞地區文化的多元性及特殊性。

翻譯史研究方法近年被應用於中國以及東亞歷史的重寫，張佩瑤（1953-2013 年）認為：「翻譯史其實就是人類文化交流史，涵蓋著不同時代的文化交匯與跨文化交流——無論那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並能說明文化間的各種關係，包括彼此的接觸、碰撞，能夠緩解差異的協商，良性的互動，以及不同程度的磨合；也包括競爭、衝突、一方被另一方征服、敗者與勝者融合等等。簡而言之，翻譯史所述說的，是文化間互相角力的故事。其所表達的觀點更深受治史者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

¹²⁶ 關於這兩個概念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的理解，詳參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頁 59-60。

¹²⁷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2。

的影響。」¹²⁸

其中在眾多的研究概念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翻譯規範與贊助人等概念均可有助了解朝鮮譯官在東亞的角色有莫大的幫助。顧名思義，所謂翻譯規範即指在語言之間翻譯過程中，因當時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等多種的因素決定了翻譯策略與行為的形態。¹²⁹而贊助人則指的是要求進行翻譯策略與行為的背後支持者，¹³⁰包括財政上或權力上要求進行翻譯，都需顧及其考慮因素，並對翻譯成果的期盼，而這種翻譯期盼往往影響最終的翻譯形式與結果。因此透過這些翻譯研究的概念，來探析朝鮮譯官的工作以及朝鮮朝廷的期盼之間的關係，從而更能掌握一些譯官的行為，包括與使臣的對話，禮節活動的協調，甚至乎是情報上的收集，都是直接關係到朝鮮社會對譯官的期盼，也能以更新的視野與觀點，認識朝鮮譯官，並且以譯官來了解更完整的東亞文化交流面貌。

本文將特別討論譯官中介功能；在本文之中，中介並非單向且避動搬運角色，中介讓文化與文化之間互相認識及詮釋，加強雙方彼此的了解。燕行或其他的中國任務之中，朝鮮譯官代表著朝鮮的文化及禮節，向中國官方呈現的是朝鮮對中國文化及朝廷的觀點。而在中朝交流的另一個方向上，譯官的手本以及與朝鮮使團成員的對話，將會是朝鮮人認識中國的關鍵。因此，對譯官的職掌及各種活動更仔細的認識，才可開啟中朝關係史

¹²⁸ 張佩瑤：〈從二元對立到相反相濟：談翻譯史研究的關鍵問題與太極推手的翻譯史研究路向〉，《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2卷第2期（2010年6月），頁22。

¹²⁹ Andres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1997).

¹³⁰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研究的方向，亦有助說明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價值。

本文以東亞文化交流史為中心，除了作一些傳統歷史學的方式爬梳與整理各種官方文書、《燕行錄》、譯官手本或是各種文字圖像。但歷史學的爬梳過後，希望不只是以文本主義的意識，閱讀過往譯官的經歷中，他們表面傳達的內容及各種歷史與文化現象。而是希望藉著他們的敘述，利用自新文化史思潮興起以後，對中西學界所引發以更多面向重新思考歷史的文化與社會概念，諸如文化認同、歷史記憶或是行動者網絡等，¹³¹並放置在東亞世界，來考察各個譯官的個案。本文藉此希望反映譯官的研究不再只是單純的描述，而是回應與挑戰過去單一面向的歷史書寫，而是建立一個多面向以及可對話的文化議題。

六、 研究大綱

除了說明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的緒論外，本文將分為以下章節：

第二章 服事天朝——17 至 19 世紀的中朝關係變遷

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提及 17 至 19 世紀朝鮮與新的宗主國清朝的政治關

¹³¹ 本文所引之新文化史的理解，可按李孝悌的說法：「他們反對過去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學家以建立科學的解釋為最終目的的基本立場。在福柯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文化史家主張所謂的真實，其實是深深受到每個時代所共有的論述（話語）的影響。而在 Clifford Greetz 的影響下，對意義的追尋和詮釋就成了文化史家的首要工作。」詳此，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氏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並參 Roger Charti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2008 年 6 月），頁 199-214。從此而看，文化史重視的是如何在某種話語與論述之中，讓史料再作閱讀，以了解各種文化、族群、人物的獨特性研究。因此，譯官在過去的經驗之中，不被受重視，故利用各種原來的史料，以各種概念再現譯官群體的課題與歷史價值。

係上的變遷，以及文化認同的轉變，本文將提供重要的歷史背景，描繪在這些文化及政治交涉之上，譯官如何需要有著重要角色，對比於 17 世紀以前，朝鮮漢語譯官的訓練有更加的必要性來擔當朝鮮對外的文化媒介以及禮節的協調者。因此，第一章將討論在 200 多年自丙、丁胡亂以後，到甲午戰爭前，朝鮮與清廷之間的關係的起伏，以及需要漢語譯官介入的可能。

第三章 因譯以達——漢語譯官的身份與教育背景

朝鮮漢語譯官並非在 17 世紀才有所培訓，培訓制度從高麗年代一直以來，但是不同年代的執政者以及社會文化氛圍的差異，他們對於譯官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透過分析不同時代，特別是 17 世紀以後的朝鮮譯學書，其書寫內容、文化特質等，可了解到朝鮮譯官的語言能力、文化水平以及朝廷對他們的社會期盼。時至今天，大家都會理解投考雜科而擔任譯官者大多為中人，而這種非兩班身份的中人，在朝鮮社會之中有著怎樣的定位，影響到這些譯官在出使時的舉動以及與使節核心成員之間關係。

第四章 善為周旋——漢語譯官的對清活動的職掌與禮儀履行

不同的譯官在使團之中，有著不同的職掌，有專門擔當禮節安排的，貢品管理的，亦有專責協助使團正、副使進行協調禮儀以及進行翻譯的工作等。他們當中亦需擔任非正式使行的負責人員，如擔任賁咨官處理各種越界、逃人等中朝邊境問題。此章將會探討各項他們專責的對清事務職掌，從而了解在甚麼渠道，需要他的角色所在。而且，朝鮮譯官經常需與中方交涉有關朝鮮各種禮儀的問題，而禮儀是否符合，均會影響到朝鮮本國

的聲譽以及中國朝廷對於朝鮮的觀感。因而探討譯官們如何協調、交涉各種禮儀活動的實施，將可了解到譯官如何避免朝鮮陷入失禮的局面，而使各種使行得以順利。

第五章 雖不目見——漢語譯官為朝鮮士人提供的中國資訊

從各種中朝史料之中，可以看見各種朝鮮士人透過譯官取得各種情報以及改變他們決定的事情。1721 年擔任副使的李正臣，如何因為金慶門的解釋與分享，加深對中國的了解。本文亦會通過 Pierre Nora 的「記憶所繫之處」的想法，探討譯官如何建構朝鮮士大夫的晚明歷史記憶。因此，這些在兩個世紀之間，在清廷提供予朝鮮人的文化交流空間的情況下，譯官們與士人之間的對話，可反映出漢語譯官如何透過他們的角色，使朝鮮士人也能從更多方面認識中國，而非單純自己使行期間的觀察。另一方面，譯官們定期將他們所見所聞整理寫成手本，呈至朝廷，故朝鮮國王及兩班官員，可以藉此掌握有關的情況。

第六章 藕船雅正——譯官與中國人認識朝鮮的媒介

與此同時，漢語譯官在擔當使行的活動期間，也成為了中國人對於了解朝鮮政治、社會、文化的重要媒介。本章以李尚迪及其周邊的譯官及中國文人為中心，了解 19 世紀初中國文人如何透過朝鮮的漢語譯官來了解朝鮮的文學與金石成果。不少的譯官詩文交流紀錄出版或發現，如李尚迪、卞元圭等漢語譯官等有著不少與清人之間的對話及酬唱交流，特別是李尚迪經常在其擔任使行譯官時，曾帶著其老師金正喜（1786-1856 年）晚年被

流放到濟州期間所贈的《歲寒圖》，讓其中國友人藉著這張作品，認識他的老師以及所面對的處境，並撰了各種題跋抒發感受。¹³²這些中國士人的題跋反映了諸如李尚迪等譯官如何成為了中朝之間的文化媒介，使中國的士大夫了解朝鮮的士大夫生活、所面對的困境，與一般士人之間的直接交流，了解到不一樣的朝鮮。

第七章 前古未行——東亞變局和漢語譯官角色的轉換

鴉片戰爭以前，譯官擔當的主要都是在朝鮮內部利益而爭取的，像是金是瑜為《明史·朝鮮傳》的書寫作出不少辨誣。然而，從 18 世紀轉變到 19 世紀，譯官的角色隨著東亞格局改變，也開始轉變。雖然朝鮮當時未有即時受到威脅，但是卻面對著各個西方勢力以及明治維新而新興的日本對於朝鮮半島開港的興趣，朝鮮漢語譯官作為一直在清代收集各種情報的前線人員，他們如何收集這些資訊，以使朝鮮朝廷作出相對的對應。與此同時，亦由於他們掌握較一般士人多的情報、資訊，故了解到東亞格局的變化，朝鮮需作出對應，如吳慶錫、李容肅、卞元圭等漢語譯官，亦因此而走上提倡開化的道路，不少譯官成為了第一代朝鮮開化派的成員，積極推動朝鮮的改革。朝鮮譯官從單純的周旋者、語言翻譯，轉為社會的開化倡導，改變了朝鮮社會對他們的角色了解，也意圖催化了朝鮮社會走向近代開化之路。

第八章 結論

¹³² 정후수 (鄭後洙) : 〈〈歲寒圖〉 관람 清朝 19 人 인물 탐구〉 (歲寒圖關聯的清朝 19 人人物探究), 《동북아 문화연구》 (東北亞文化研究), 第 14 輯 (2008 年 3 月), 頁 239-264。

本文在結論部份則試圖歸納各章的研究論點，並重申漢語譯官從丙丁胡亂到甲午戰爭期間的各方面活動與工作，如何改變中朝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交流的具體過程。譯官的工作涵蓋了上述的元素，並且發揮了改變兩地文人之間的相互認知，以及在各種兩地關係之中關鍵議題的解決，從而了解這個過去未被東亞文化交流研究史上所重視的群體。結論部份將整理全文所歸納的論據，以研究朝鮮漢語譯官，如何重構一些當代學術領域的論述。

全文除引言與結論外，均以章節中的重要元素或文句抽出作提綱，如中朝關係變化中以朝鮮「服事天朝」形式改變為中心了解時代的演變。因此，藉著每章的提句，讓讀者能了解整個章節的討論中心，以便藉此回應各種上述提出的論述和話題。

七、 小結

本文將定位在東亞文化交流史的視野出發，希望研究以協助重寫文化交流的過程為基調，揭示東亞文化交流種種結果的形成、不同思想的出現，都涉及文化媒介的翻譯及詮釋。文化交流後的結果，或出現脈絡轉向的情況，又或與原來的想法有一定落差。這些的落差與文化媒介的背景及能力有相當大的關係。譯者在朝鮮與東亞的文化地位及其研究價值。近年，翻譯史研究獲得了重視，而事實上中國的翻譯並非於晚清以降才開始。早於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往時，各地就開始需要譯官提供各種語言及禮節上的支援。¹³³然而，學界對翻譯群體的功能仍只有十分模糊的認知，故這

¹³³ 王宏志是推動譯者及譯史研究的重要學者，關於中國的翻譯史一些問題及研究價值，

篇論文可重新展現他們的貢獻，讓更多人就其他文化中的譯官及翻譯多作探討。

在東亞文化圈中，朝貢制度的維繫關鍵是禮儀。譯官的角色非但體現於言語方面；更多材料顯示譯官需要協調朝鮮使團的規模以及各種朝貢過程之中的禮儀工作。朝鮮自視為「禮儀之邦」，強調履行朝貢工作，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及對禮節的重視。¹³⁴因此，認知譯官的功能及貢獻，可說明朝鮮如何透過派出使團及參與朝貢活動，在達成與中國來往的禮儀要求，從而證明朝鮮對於維繫朝貢體制的禮儀十分重視，以維持著「禮儀之邦」及「朝貢國之首」等重要地位。

近年華文學界開始大量以「從周邊看中國」為方向的研究，通過引用朝鮮的資料去了解與重寫中國社會史及儒學問題。¹³⁵然而，似乎這些觀點還是從中國的視野去觀察東亞，或是利用東亞周邊材料，最終目標認識的只是中國。這方式的研究，無疑為中國史帶來新的刺激，但卻未能做到真正的脈絡轉移，對於東亞其他的角度將會有所忽略。故此，本文希望通過學術上某程度的範式轉移，擺脫利用域外資料研究中國的想法，或只以朝鮮為中心的角度去了解朝鮮的譯官以及中朝的關係史，而是希望以東亞文化交流作為一種視野來了解各種中朝關係所產生的文化議題。與韓國中的國史研究與朝鮮國別史研究不同，他們也許會更關心的是燕行對朝鮮社會

詳參王宏志：〈「叛逆」的譯者：中國交代翻譯史所見統治者對翻譯的焦慮〉，《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3 輯（2010 年），頁 3-4。

¹³⁴ 關於此，詳參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73-1894》，頁 25。

¹³⁵ 關於「從周邊看中國」，可參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

的影響，但東亞文化交流史視野，則從兩地脈絡並行觀察，了解東亞空間之中的文化互動與彼此間的形塑，藉此為學術界提出新的觀點了解東亞之中的文化交流的網絡。

第二章

服事天朝——17 至 19 世紀的中朝關係變遷

17 世紀以來的中朝關係史及相關的文化交流議題，現已成為了不同地區學者的主流研究，¹而其關係變遷已有不少學者有全面的研究，而本章主要針對各樣 17 世紀以降，涉及著朝鮮譯官所處理的重大議題，探析歷史背景，以便闡述何以在 17 世紀以降的中朝關係變化之中，譯官擔當角色變得顯要，從而彰顯論文的研究意義。在 17 與 19 世紀之間，橫跨 200 多年的中朝關係的歷史發展進程之中，首以丙子胡亂對朝鮮政壇、社會及思想界造成極大的衝擊，而有關事件留下了關鍵的因素，驅使朝鮮的漢語譯官較以往擔當更多的職責，而當中值得關注的是華夷觀之變化，亦即韓國學者現在所指的「朝鮮中華觀」或是華文學界所認識的「小中華意識」。²有關意識在 18 世紀前後有所轉變，其中以洪大容（1731-1783 年）為首對清學有重新思考，更引發北學的思潮，³倡議仿效清廷的社會與文化，進行朝鮮

¹ 李孟衡近年整理了韓國學界怎樣看待韓中及韓日關係的觀點演變，有助了解韓國學界在朝鮮對外關係史之中，在主體與他律之間遊走的特徵，此文有助華文學界掌握從 20 世紀以來的韓國學者就有關課題研究的觀點與爭議。關於此，詳參李孟衡：〈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戰後韓國學界的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特徵與論爭〉，《臺大東亞研究》，第 3 期（2015 年 10 月），頁 61-100。

² 朝鮮中華與小中華的討論，在韓文與華文學界有不同的認知下，有所不同的了解。朝鮮中華觀或主義，自於 1985 年，韓國學者鄭玉子提出，認為朝鮮在明亡以後，成為了中國與儒家道統的繼承者，並發展成為東亞文化中心。然而，王元周、孫衛國等中國大陸學者則認為朝鮮所持的是小中華觀，並否定鄭玉子的朝鮮東亞文化中心論的想法，故不認同以「朝鮮中華」一詞。近年中韓學者在討論明末清初的朝鮮及東亞史研究之中，都有這些論調作出爭議，詳參王元周：〈論「朝鮮中華主義」的實與虛〉，《史學集刊》，第 3 期（2009 年 5 月），頁 55；並參禹慶燮（禹慶燮）：〈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朝鮮中華主義中的學術史的傳統），《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第 159 輯（2012 年 12 月），頁 237-263。

³ 關於洪大容的北學思想構成情況，詳參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頁 299-345；並參楊雨蓓：〈朝鮮華夷觀的演變和北學的興起〉，

的改革，亦同時開始展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雙方之間的士人交往，一改自 17 世紀以來朝鮮士人蔑視清廷的觀感，當中各種的交涉，自然不乏譯官在場參與其中。而在 19 世紀初期，東亞世界隨著鴉片戰爭打破了原來的傳統，各國嘗試進行對應，清廷、日本以及被視為隱世之國的朝鮮，亦開始有各樣的改變，當中譯官為重要的改革人員。故透過闡述各樣重要議題，有助於了解朝鮮的漢語譯官實際如何擔當文化媒介的角色。

一、 明滿衝突與朝鮮的對應

14 世紀末年，高麗王朝(918-1392 年)派出右都統使李成桂(1335-1408 年)，出征遼東北伐新立的明朝。然而，行軍至威化島時，李成桂決定造反，回軍攻陷開京，並廢禡王(王禡，1365-1389 年，1374-1388 年在位)，另立昌王(王昌，1381-1389 年，1388-1389 年在位)，⁴及後更將之篡去，自立為王，並向明朝請臣，獲賜封號為朝鮮。⁵朝鮮亦順理成章奉明為宗主國，並展開了長達二百多年的事大關係。事大關係的建構是中國社會傳統，國家交鄰的指導思想，後來在東亞世界的形成過程之中，成為了大小國之間

氏著：《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200-245。

⁴ 此事史稱為威化島回軍，這是一場高麗末年的軍事政變，當時親元的崔瑩(1316-1388 年)建議當時的高麗禡王征討明軍，以取回高麗所轄的鐵嶺衛。李成桂被任命為左都統使，北征遼東，到威化島期間，最終回軍開京(即開城)，兵諫禡王，最終崔瑩與禡王先後被捕與被廢，史稱威化島回軍。關於此，詳參金正義：〈위화도회군에 관한 고찰〉(有關威化島回軍的考察)，《군사지》(軍事志)，第 16 號(1988 年 8 月)，頁 55-79。

⁵ 朝鮮初立國時，派出韓尚質(?-1400 年)到南京，邀請明朝從和寧與朝鮮兩者之間定國號，《朝鮮王朝實錄》有記載有關的出使情況：「遣藝文館學士韓尚質如京師，以「朝鮮」、「和寧」請更國號。」而《明太祖實錄》則載明太祖的回應云：「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曰『朝鮮』。」因此，李成桂將國號改為今天為人所知的朝鮮王朝。關於此，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 1，太祖元年 11 月丙午，頁 15a；《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204，洪武 23 年 9 月甲午條，頁 1a。

的關係。而事大思想最早的傳統歷史來源，可參考《孟子·梁惠王》之中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

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⁶

孟子（約前 372-前 289 年）的理念，顯示的是大小國之間的禮儀關係，大國對小國以仁，小國對大國則以忠與信，此想法影響到自先秦以來，中國士大夫及政權對於中央與蠻夷或非中華之間的關係，而這樣的思考亦構築了東亞世界之形成。國家與國家之間交流的禮儀過程，亦不離於此。而對於小國而言，「以小事大」除了一種禮儀秩序，也同樣如孫衛國與范永聰所云的：「保國之道。」⁷而事實上，自朝鮮於 14 世紀立國以後，這種傳統的小國與大國之間的禮儀精神，更被引用成為了國家的立國精神。《朝鮮王朝實錄》的總序中，明確說明有關想法：

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⁸

⁶ 朱熹：《孟子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2，〈梁惠王章句下〉，頁 213。

⁷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2009 年），頁 vii；孫衛國：〈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67。

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 年），第 1 冊，《太祖實錄》，總序，頁 22a。

明與朝鮮的關係中，當中涉及各種事件，使兩地關係經過不少起伏，⁹但整體而言明與朝鮮關係一直被視為穩定的朝貢關係。但直接關係到 17 世紀，中朝兩地明顯的政治及文化轉變的事件，則是 16 世紀末，統一了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發動的萬曆朝鮮之役（或稱文祿・慶長之役及壬辰倭亂）。¹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全國後，¹¹欲假道朝鮮進攻明朝，卻沒未獲朝鮮答覆下出兵朝鮮，朝鮮軍力無法抵抗日本進攻，故遣使明朝求援，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 年，1572-1620 年）見及此，便派兵支援朝鮮，並展開了長達數載的戰事。¹²戰爭對朝鮮半島的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¹³但卻強化了朝鮮與明朝之間的關係，朝鮮士大夫更視明軍援朝之舉為「再造藩邦」。¹⁴因此，萬曆以後朝鮮對明關係較明初更為緊密。一般學者均如吳政緯一樣的相近論述：

⁹ 明與朝鮮早期的關係，多見於一些朝貢制度實施下的各種，其中如范永聰留意到土木之變中，朝鮮留意到遼東情勢、英宗親征的事宜。而明朝亦曾向朝鮮徵兵，而朝鮮卻託辭了有關要求。詳參范永聰：〈明代土木之變與朝鮮的對應〉，《當代史學》，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64-70。

¹⁰ 關於萬曆朝鮮戰爭的研究成果與趨勢，可參考 Myung-gi Han, "A Study of Research Trends in Korea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Korea in 1592(Imjin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8.2(2013): 1-29;並參 Nam-lin Hur, "Works in English on the Imjin War and the Challenge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8.2(2013): 53-80.

¹¹ 關於此，詳參 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11.

¹²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年）。

¹³ 許南麟曾指出士族在壬辰戰事爆發時，嘗試利用嘗試了解士族如何通過儒家思想所帶來的學識賦予的特，而避免了兵役，即使在外力的威脅之下，士族仍未帶來改變，從中了解文與武之間的價值如何被放置在對立面。關於此，詳參 Nam-lin Hur "Confucian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osŏn Korea,"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8.1(2011): 51-84.

¹⁴ 關於此，詳參劉寶全：〈壬辰亂後朝鮮對明認識의 變化——「再造之恩」을 중심으로〉（壬辰亂後朝鮮對明認識的變化——以「再造之恩」為中心），《亞細亞文化研究》，第 11 輯（2006 年 12 月），頁 141-161。

朝鮮對明朝的感念其來有自，立國之初即力學中國之制，舉凡國家典章、學術思想與器物工法，莫不與中國同。朝鮮以朱子學立國，深以文明之國自居，此番建國氣象，在政治上的表現為奉行朝貢體系，在文化上則是親中慕華的中國情結。¹⁵

但明萬曆帝傾全國之力，以助朝鮮抗敵，使朝鮮上下大受感動，18 世紀的洪大容與其中國友人筆談時有以下的記載：

余曰：「我國於前明，有再造之恩，兄輩曾聞之否？」皆曰：「何故？」余曰：「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由於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今不已。」¹⁶

而宣祖（李昖，1552-1608 年，1567-1608 年）在位期間甚至刻寫再造藩邦的碑刻，以確認有關的想法。¹⁷可見，明清交替之際的朝鮮社會之中，在朝廷也好，還是士大夫的眼光也好，已建構一種「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也」的感恩心態。¹⁸學者如孫衛國過去對於明朝關係的研究，從事

¹⁵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頁 57。

¹⁶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外集卷 2，〈杭傳尺牘·乾淨衛筆談〉，頁 27a。

¹⁷ 關於此，詳參 Myung-gi Han, “The Inestimable Benevolence of Saving a Country on the Brink of Ruin’: Chosŏn – Ming and Chosŏn – Later Ji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olence, and Memory*, ed. James B. Lew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77-293.

¹⁸ 成大中：《青城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33-2734，卷 7，〈明隱記〉，頁 17b。成大中（1732-1809 年），是著名尊周思明的學者成海應（1760-1839 年）的父親。成大中本人與其子亦有強烈的尊周思明的想像，他

大與慕華觀的觀察來說明與朝鮮之關係長久以來都保持著朝鮮對明朝傾慕的關係。¹⁹但是，桂勝範（Seung B. Kye）提到朝鮮王朝的各種事大活動早期是基於兩國國王與皇帝的友好以及實質效益才維持事大朝貢關係。²⁰直至中宗（李懌，1488-1544 年，1506-1544 年在位）時期為了確保自己權位，而不斷派出各種特別的使節，希望在明朝皇帝的認同下，保障他的權力得到保障。於是，中宗甚至將原來是為了政治現實的事大關係，轉化為儒學理念建構下的事大關係，以鞏固，甚或強化他在朝廷的地位。此例所說明的是明朝與朝鮮之間的事大秩序，曾經歷不同階段的演變，而中宗時期得以逐漸被強化。²¹直至萬曆朝鮮戰爭以後，這種情緒進一步強化到一種「明之於我，即周之於魯也。」的想法。²²因此，這種尊明的思緒在明清交替以後，顯得更為強烈，這一點並非單純的儒學思想可解釋，而是現實政治環境之下，而使文化心態出現異動，故有關的討論必須放置於兩地之間歷史脈絡之中討論。

的書籍中所記載的明隱是一位明清交替之間因明亡而隱退的士人，學識所限，無法查考明隱是誰，但成大中的文集中記載明隱退隱的故事說明的是一種萬曆朝鮮戰爭以後，朝鮮社會如何建構濃厚的尊周思明的思想氣氛。關於成大中，詳參孫蕙莉：〈青城 成大中の史論 散文 研究 — 青城雜記——「揣言」을 중심으로〉（青城成大中の史論散文——以青城雜記的「揣言」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第 80 卷（2012 年 12 月），頁 367-399。

¹⁹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的問題研究》，頁 56-62。

²⁰ 他以明成祖與朝鮮太宗之間的友誼為例說明這樣的事大關係，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上國士人見殿下，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殿下過燕府，燕王親見之，旁無衛士，唯一人侍立。溫言禮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饋酒食，極豐潔。」當時仍為世子的朝鮮太宗到燕京時，得到時任燕王的朱棣的信任，不帶守衛情況下親自接待，可見兩人之間的關係。關於此，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第 6 卷，太祖 3 年 11 月乙卯，頁 17a。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5.1(2010): 42-43.

²¹ 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41-66.

²² 成大中：《青城集》，卷 7，〈明隱記〉，頁 18a。

在東北亞世界中，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滿人在 17 世紀於建州興起。他們的崛起旋即發展成具有體制的國家。²³在 17 世紀以前，還是部落聯盟的女真人利用羈縻衛所制的方式控制當地的族落，即容許當地的女真人歸附明朝，並以他們的部落領袖作官職，實際為一種招撫當地女真人的做法。與此同時，女真人也與朝鮮王朝保持友好的關係。關於這樣的女真人雙邊外交的關係，莊吉發扼要地指出：

永樂初年，明朝政府在鳳州設置建州衛，其後又增設建州左衛、建州右衛，三衛並立。建州女真輾轉遷移到遼寧婆豬江、寬突山即赫圖阿拉（hetu ala）之西烟筒峰（hūlan hada）一帶，以蘇子河流域為中心。建州女真由綏芬河、琿春江進入遼東境內後，獲得更多的可耕地，一方面憑著敕書與明朝維持封貢貿易關係；一方面因地理背景，繼續出入於朝鮮後門。²⁴

而早於朝鮮太祖（李成桂，1335-1409 年，1392-1398 年在位）期間，與女真族有若干的聯繫，尤如傳統中國宗藩關係。²⁵李成桂自幼出生於高麗王

²³ 關於努爾哈赤（1559-1626 年）如何塑造與發展滿族由部落成為國家的歷史過程，華文書籍中，首推劉小萌之著作。詳參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95-100。

²⁴ 莊吉發：〈他山之石——朝鮮君臣對話中的大清盛世皇帝〉，氏著：《清史論集》（二十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頁 129-130。

²⁵ 關於此論述在學界仍存爭疑，如河內良弘亦觀察到女真、朝鮮與明朝是一種兩元中心的朝貢體系，即一方面明朝管轄女真，而另一方面朝鮮亦以藩邦的態度對待女真諸部，如《朝鮮王朝實錄》之中可見女真族進貢與賞賜的形式出現。儘管孫衛國提出朝鮮王朝與女真並非真正宗藩關係，只是一種現實政治的考慮。但筆者認為有必要說明，女真在朝鮮與明朝之間，不同的部落均向兩邊來確保部落的安全或建立部落對外的關係。關於此，詳參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 年）；並參孫衛國：〈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第 16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99；王合一：〈韓國朝鮮王朝世宗大王時期與女真族關係研究〉，《中國邊政》，第 194 期（2013 年 6 月），頁 44-60

朝的東北，故其家門曾是女真族聚居的長官，故對女真族有親近關係，加上原女真族酋長之一的義兄李之蘭（1331-1402 年）的影響下，女真與朝鮮有緊密的交流與往來。²⁶

這樣的脈絡線索可以了解明朝、朝鮮與女真在建國以前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亦隨著建州女真建國為後金後，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建州女真在萬曆朝鮮戰爭之後，在東北亞崛起，²⁷1616 年，努爾哈赤將女真由部落制度發展為國家，而當時稱之為「*asisin gurun*」（滿文意譯為金國），同時自稱「天命金國汗」。²⁸獨立稱國後，擺脫與明朝的朝貢關係，並中斷與明的互市，²⁹透過戰爭進一步擴大其版圖。³⁰

1619 年在薩爾滸戰爭，努爾哈赤率領後金大敗楊鎬（1596-1629 年）率領的明軍，³¹一方面確認明軍在東北與後金長年的戰事，亦象徵明朝逐漸失去過去傾全國之力抵擋豐臣秀吉軍隊的能力，朝鮮在此戰事中，應明朝的要求派出了姜弘立（1560-1627 年）支援有關戰爭，但卻在光海君的默許下，朝鮮軍向後金也投降。³²是次戰役，對於明帝國打擊朝鮮當時的君

²⁶ 王永一：〈朝鮮初期女真族裔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中國邊政》，第 177 期（2009 年 3 月），頁 45-58。

²⁷ 當時建州滿州在明朝與日本戰鬥期間，打敗呼倫蒙古等九部聯軍，並滅長白山部，狀大了建州女真。關於此，詳參張存武：《清韓關係》，頁 3。

²⁸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61。

²⁹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頁 164-171。

³⁰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 年），頁 1-2。

³¹ 關於戰役的性質與爆發原因，可參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臺北：聯經出版，2004 年），頁 191-217。

³² 刁書仁：〈論薩爾滸之戰前後後金與朝鮮的關係〉，《清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2001

主光海君（李瑄，1575-1641 年，1608-1623 年在位），亦在此時維持兩線外交的策略，一方面保持原來與明朝的朝貢關係，³³另一方面與後金保持良好的關係。張存武對於薩爾滸戰爭，光海君的策略有正面評價，也同時客觀地說明了當時的國際形勢，他指出：

萬曆四十六年（1619 年）明朝徵兵朝鮮伐後金。光海君初無積極表示，後以大臣主張，派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率一萬三千兵援明。臨行光海君密旨：「觀形勢，定背向」及明兵戰敗，弘立即派人通敵，陳說出兵乃不得已之舉，並率眾投降。金國留其將遣其兵。其後弘立返國，立主與後金建立邦交關係。金兵敗楊兵乃不得已之舉，並率眾投降。金國留其將遣其兵。其後弘立返國，立主與後金建立邦交關係。金兵敗楊鎬大軍後，下遼瀋，進迫河西。朝鮮與金國強弱之勢大變。天啟二年（1622 年）毛文龍據皮島為東江鎮，圖恢復遼東。朝鮮對金明的外交益形艱難。綜觀光海君的對金政策，除嚴備國境防禦外，頗能及時把握明金雙方的正確動態，巧妙的保持觀望態度，採取不背明、不怒金的兩面外交政策。故能免於金人的侵略，即戊午援明一事，當時也

年 11 月），頁 43-50；並參白新良：〈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出兵〉，《清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1997 年 8 月），頁 9-15。

³³ 光海君在個人心態上，因其登基曾被明朝對其身份不認可，而對於明朝的事宜有所不滿，甚至抗拒的情況出現，故有學者認為有關的心態使他對明朝的外交策略與過去強調事大的歷代君主有所不同。關於此，詳參尹鉉哲、劉吉國：〈試論光海君的世子身份問題與即位初期的政策〉，《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1 期（2012 年 2 月），頁 136-140；並參許怡齡：〈從「光海君」統治正當性看朝鮮的價值觀——冊封、執政能力與儒家道德〉，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暨韓國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會編：《韓國學研究論文集（四）》（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5 年），頁 143-156；並參徐佳圓：《朝鮮王朝後期「事大」與「保國」政策的游移——以光海君到孝宗為中心（1608-1659）》（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35-56。

頗得金人的諒解。³⁴

直至1623年仁祖反正，將光海君被貶為庶人以前，光海君試圖在明金之間，確保朝鮮國內的穩定，故希望與努爾哈赤建立友好的關係。而事實上，光海君的策略，當時使朝鮮與後金有著相對穩定的關係。³⁵然而，在再造藩邦與日益強化的尊明事大之情之下，群臣對於光海君之舉極為反感，甚至利用各種方法阻止光海君的做法，甚至最終以儒家的正統觀念，發動政變，將他廢除。³⁶

《仁祖實錄》記載了朝鮮朝廷當時廢光海君的理由：

我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忘記。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丑四海。王人之來本國，羈縻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夫滅天理，廢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邦，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酣乎？茲宜廢之，量宜居

³⁴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頁4。

³⁵ 魏志江：〈論後金努爾哈赤政權與朝鮮王朝的交涉及其影響〉，《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3月），頁56-62；並參高志超：〈試論薩爾滸戰後朝鮮與後金的關係——以姜弘立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第2期（2009年3月），頁49-52。

³⁶ 孫衛國：〈試論入關前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頁103。

住。³⁷

從引文所知，光海君在朝臣以儒家的事大華夷觀之中，其行為遭到狠批。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段論述中，朝臣均強調「再造之恩」不可忘記，故在明清交替的過程中，萬曆帝積極介入朝鮮戰爭，使朝鮮士大夫的印象對其力量尤其深刻，即使事大外交在當時維持二百多年，但這種觀念的強化，尤甚於朝鮮戰爭以後的再造之恩感情，對於朝鮮面對明清改朝換代時的政治選擇與情感投射，出現更多的變化因素。

1623 年，仁祖反正以後，一改光海君的兩面政策，而轉向在明滿之間，支持明朝的行動。1626 年袁崇煥（1584-1630 年）在寧遠之戰中取得成功，³⁸明軍在戰事上得到了轉機，而努爾哈赤在明金之間的戰爭中得到了挫折，不久努爾哈赤便因病而逝，其子皇太極（1592-1643 年，1626-1643 年在位）繼位後則先行整理內部，避開了與袁崇煥硬碰，故明金之間換得了短暫的和平。³⁹而當時仁祖反正以後，為確保王位的冊封便結束了光海君的政策，並改為轉移向明朝效忠，而皇太極亦棄難取易，而先轉移向朝鮮出征。

此外，朝鮮一方面容許毛文龍（1576-1629 年）在朝鮮與後金之間活動，

³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卷 1，仁祖二年三月甲辰，頁 5a。

³⁸ 學界對袁崇煥研究相當完整，近年扼要介紹袁氏在東北戰事的成就者，可參袁展聰：〈投筆從戎——晚明袁崇煥及其部將之研究〉，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頁 196-222。關於過去的研究綜述則可參考王榮滄的整理，他嘗試整合中港臺以及海外的袁崇煥研究成果，主要針對軍事思想、議和、與毛文龍關係、人際關係、詩作與歷史地位等各方面，詳參王榮滄：〈百年袁崇煥研究綜述〉，《明代研究》，第 17 期（2011 年 12 月），頁 155-186。

³⁹ 王鍾翰：〈論袁崇煥與皇太極〉，《社會科學戰線》，1985 年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126-134。

⁴⁰毛文龍在朝鮮的默許下，駐守於朝鮮鴨綠江以南的鐵山、皮島等地，並經常突襲後金軍隊，使當時後金亦認為朝鮮刻意容許毛文龍在遼東地區活動，這樣對後金的後防安全有極大威脅。⁴¹因此，1627 年在皇太極就任後，便派遣阿敏（？-1640 年）等將領率軍渡鴨綠江先後擊退毛文龍軍隊，並迅速地攻克義州、平壤、定州、開城等朝鮮半島北部將要城鎮，而仁祖甚至要逃離至江華島。⁴²而皇太極此時擔心後金將受明朝襲擊，便向朝鮮議和，最終作出約定，同意訂立為兄弟盟約，並兩國開始進行互市，以及確保不再侵犯對方領土，而朝鮮則需停止使用明朝天啟年號。⁴³有關事件在朝鮮史冊中，稱之為丁卯胡亂。⁴⁴

胡亂以後，朝鮮稱後金為兄國，按約交往恢復和平。然而，朝鮮在此階段不斷的留難後金，而後金亦藉此關係，增加朝鮮所提供的禮貢，以符合接待明朝的準則。而朝鮮不依。而與此同時，亦有如孔有德（？-1652

⁴⁰ 關於毛文龍的研究，詳參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21-196。

⁴¹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頁 4。

⁴² 한명기（韓明基）：〈朝中關係의 觀點에서 본 仁祖反正의 역사적 의미——明의 조선에 대한 ‘擬制의 支配力’ 과 관련하여〉（從朝中關係的觀點看仁祖反正之歷史意義——關於明對朝鮮之 擬制的支配力），《南溟學研究論叢》，第 16 輯（2011 年月份缺），頁 239-279。

⁴³ 정석원（鄭錫元）：〈丁卯胡亂時 反清思想의 展開와 그 原因〉（丁卯胡亂時反清思想的展開與其原因），《중국어문학논집》（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5 輯（1993 年 8 月）頁 4。

⁴⁴ 關於丁卯胡亂經過，可參考金鍾圓：〈丁卯胡亂時의 後金의 出兵動機 - 後金의 社會發展過程에서의 社會經濟的 諸問題와 관련하여〉（丁卯胡亂時的後金出兵動機——後金的社會發展經過與社會經濟等問題的關聯性），《동양사학연구》（東洋史學研究），第 12、13 輯（1978 年 8 月），頁 55-93；並參南浩鉉（南浩鉉）：〈朝清關係의 초기 형성단계에서 「盟約」의 역할 - 丁卯胡亂期 朝鮮과 後金의 講和過程을 중심으로〉（朝清關係的初期形成階段中盟約的作用——以丁卯胡亂期朝鮮與後金的講和過程為中心），《조선시대사학보》（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78 輯（2016 年 9 月），頁 51-85。

年)、耿仲明(1604-1649 年)投降時,⁴⁵朝鮮卻拒絕提供任何幫助,同時亦有如越境偷參、⁴⁶逃人等問題,⁴⁷兩地之間的交涉也有嚴重的分歧。種種有意與無意的留難,引起了當時後金的不滿,而後金於 1636 年稱帝並改稱大清時,朝鮮拒絕向清廷稱君臣之禮,故皇太極以朝鮮違背盟約,便派兵攻打朝鮮,韓國學界稱之為丙子胡亂。⁴⁸清軍由皇太極親自率領大軍進攻朝鮮半島,仁祖儘管試圖派員抵抗,但始終清軍與朝鮮軍之實力差距明顯,使漢陽亦無可避免地被攻陷,仁祖逃難到南漢山城,最終清軍將他包圍,並迫令仁祖最終在三田渡與皇太極會面,更向皇太極實行三跪九叩之禮,使稱丁丑下城,而韓國學界則稱之為「三田渡的屈辱」。⁴⁹

二、 丙子胡亂後與朝鮮稱臣後的新秩序

三田渡的會面不只是單純的國王上的屈辱,而是中原政權與朝鮮半島

⁴⁵ 關於孔、耿等人投降的經過,詳參趙亮:〈論東江軍將領降(後)金及其影響——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為中心〉,《理論界》,2006 年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70-172。

⁴⁶ 關於此,詳參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1(2007): 33-61.

⁴⁷ 李孟衡:《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⁴⁸ 關於丙子胡亂相關的軍事史研究情況,可參考吳宗祿:〈壬辰倭亂~丙丁胡亂時期 軍事史研究의 現況과 課題〉(壬辰倭亂~丙丁胡亂時期軍事史研究的現況與課題,《군사》(軍史),第 38 輯(1999 年 10 月),頁 135-160。

⁴⁹ 三田渡該處立了清廷的功德碑,記述丙子胡亂以後,皇太極要求於三田渡成立太清皇帝功德碑,而該碑主要是希望朝鮮頌揚皇太極保全朝鮮社會百姓的功德,而停止出兵的內容。對於朝鮮社會與士大夫來說,是社會的一大屈辱。關於功德碑的研究,詳參宋康鎬:〈三田渡 大清皇帝功德碑의 研究 - 滿漢文 對譯을 中心으로〉(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研究——以滿漢文對譯為中心),《만주연구》(滿州研究),第 11 期(2011 年 6 月),頁 293-358;並參李銀順:〈李景奭의 政治的 生涯와 三田渡碑文 是非〉(李景奭的政治生涯與三田渡碑文是非),《韓國史研究》,第 60 號(1988 年 3 月),頁 57-102。

展開新形態交往的轉捩點。皇太極迫使仁祖接受，在《清實錄》記載了皇太極上親謁時，描述本人如何親率大軍，並使朝鮮接受新的形式進行朝貢安排，並阻止朝鮮視明朝進貢。

……於去年十二月（1636 年）、親統大軍往征。朝鮮王李倧、率其長子李湏、及群臣、遁入南漢山城。次子李湜、三子李潛、及其妻子、遁匿江華島。我兵圍南漢、朝鮮八道兵將來援。為我兵擊斬甚眾。又以舟師克取江華、獲其王妃、並李湜、李潛、及其妻孥、與群臣家屬。朝鮮王李倧、勢窮力屈。率眾出城。獻明國原賜冊印。執左袒明國建言敗盟之臣洪翼漢、尹集、吳達濟、縛詣軍前、請罪乞降。更兄弟之稱、執藩臣之禮。臣釋其前愆、還其妻子、令彼世守其國。每歲進貢。復以其二子李湏、李湜為質。誅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以警其餘。朝鮮既平、又率朝鮮水師、乘舟渡海。攻克明國毛文龍所居皮島。殺其總兵沈世奎、金日觀等、及士卒甚眾。海島遺孽。悉經蕩平。數月之間、兩成大功……⁵⁰

在此可得知皇太極在三田渡以後，對於朝鮮規定了他們需要交出明朝所賜的冊封印鑒，象徵的是朝鮮終止視明廷為宗主國，並將親明官員一一降罪。朝鮮不再以兄弟之稱看待兩地關係，而是要求朝鮮執君臣之禮。此外，清廷亦規定立世子為質、支援清軍攻打明軍、⁵¹遣送瓦爾喀人等均為當時的

⁵⁰ 《清太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6，崇德 2 年 6 月丙辰，頁 466a。

⁵¹ 關於此，詳參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頁 191-288。

要求，具體可見於《清太宗實錄》的記載：⁵²

是日、敕諭朝鮮國王李倬曰：「朕覽來奏，知爾欲保全宗社，束身來歸，且述二十日之詔旨，欲求信實，朕詔已出，寧肯食言，既盡釋前罪，將永定規則，以為子子孫孫、君臣世守之信義。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歸命，子孫世守信義，則當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躬來朝謁，爾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爾有不諱，則朕立爾質子嗣位。從此一應文移，奉大清國之正朔。其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之禮，並遣大臣、及內官奉表。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并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國舊例。朕若征明國、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處，數目限期、不得有誤。朕今移師攻取皮島，爾可發鳥鎗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大軍將還、宜備禮獻犒。軍中俘獲、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兩主之便，蓋我軍以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為詞。爾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許擅築。爾國所有瓦爾喀俱當刷送。日本貿易，聽爾如舊，當導其使者來朝，朕亦將遣使與彼往來也。其東邊瓦爾喀、有私自逃居於彼者，不得復與貿易往來。爾若見瓦爾喀人，便當執送。爾以既死之身，朕與生存，保全爾之宗社，復還所獲。爾當念朕

⁵² 亦可參考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頁 121-124。

再造之恩，後日子孫、毋違信義，則邦國永存矣。朕見爾國狡詐反覆，故降茲詔諭，每年進貢一次，其方物數目：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百對、豹皮百張、鹿皮百張、茶千包、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三百張、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順刀二十口、蘇木二百觔、大紙千卷、小紙千五百卷、五爪龍蓆四領、各樣花蓆四十領、白苧布二百疋、各色綿紬二千疋、各色細麻布四百疋、各色細布萬疋、布千四百疋、米萬包。」⁵³

朝鮮仁祖以此嚴厲的敕諭之要求下選擇了妥協，並向皇太極投降，為朝鮮半島換來了往後的和平。但卻驅使後來朝鮮社會與思想界帶來了極大衝擊，社會之間對於如何看待清朝以及了解華夷秩序，有了新的思考。

丙丁胡亂後，朝鮮士大夫對宗藩觀與華夷的想像有不少新思考與回響，如石室書院的創辦人金尚容（1561-1637 年）以自盡拒絕受辱，⁵⁴其弟金尚憲（1570-1652 年）則發展石室書院為一座以老論及明確華夷觀為中心的書院，該書院早期並帶有強烈的朝鮮中華意識的學風，而該書院的廟碑，由宋時烈（1607-1689 年）所題的「身任禮義之大宗，以樹綱常於既壞。」⁵⁵反映了當時朝鮮士大夫對於華夷觀的基本立場。

⁵³ 《清太宗實錄》，卷 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頁 431a-b。

⁵⁴ Login Lok-yin Law, “Kim Wŏn-haeng’ s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on Hong Tae-yong: The Case of Relations between Nakhak and Pukha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20.2(2015): 121-152.

⁵⁵ 宋時烈：《宋子大全》，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08-116，卷 171，〈石室書院廟庭碑〉，頁 20a-21b。

而作為朝廷重臣兼思想界大儒宋時烈則在當時也鼓吹一段崇明抑清的思想潮流。丙子胡亂爆發前，宋時烈已被安排擔任鳳林大君（即後來的孝宗）的老師。⁵⁶宋時烈因仁祖接受了南漢山城的和約，憤而辭職歸鄉，直至孝宗在瀋陽與北京擔當人質後，⁵⁷於 1649 年回國繼位後，宋時烈獲孝宗邀請再次出仕，共謀國事。而孝宗因極受尊明抑清的宋時烈影響，更曾計劃北伐。⁵⁸

據《顯宗改修實錄》記述了孝宗與宋時烈的對話，⁵⁹當中看到宋時烈如何精神與理論上並建構了孝宗的北伐想法。

己亥三月十一日，召對諸臣于熙政堂，臨罷，上命時烈獨留。
令中官洞開門戶，悉辟左右然後，上曰：「每欲與卿從容說話，等待屢日，終無其便。故今日予決意為此舉。予亦氣幸蘇快，庶幾罄吾所懷矣。」上因喟然曰：「今日之所欲言者，當今大事也。彼

⁵⁶ 김동환 (金東煥) : 〈尤庵 宋時烈의 著述과 刊行에 관한 一考察〉 (關於尤庵宋時烈的著述與刊行的考察), 《서지학연구》 (書誌學研究), 第 37 輯 (2007 年 9 月), 頁 9。

⁵⁷ 時為大君的孝宗，曾擔任人質，以維繫清與朝鮮的宗藩關係。關於此，詳參葉泉宏：〈瀋館幽囚記（1637-1645）：清鮮宗藩關係建立時的人質問題〉，《韓國學報》，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284-299。

⁵⁸ 關於孝宗北伐的計劃，詳參 JaHyun Kim Haboush, "Constructing the Center: The Ritual Controversy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Korea" in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oson Korea* ed. JaHyun Kim Haboush and Martina Deuch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71-72.

⁵⁹ 因西人與南人之間的黨爭，故當時《顯宗實錄》就禮儀上以及一些政治爭論上，士大夫有所爭議。當時南人派的許穆擔任正期間，大量關於宋時烈的事蹟以及禮訟等西人派的主張未有載於《顯宗實錄》，故在肅宗晚年西人派再次得政以後，他們再以《顯宗實錄》有所偏頗為由，而改編修成《顯宗改修實錄》。關於此，詳參張春海：〈論明亡後《大明律》在朝鮮地位的動搖——以「禮訟」為中心的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148-156 年。

虜有必亡之勢。前汗時兄弟甚蕃，今則漸漸消耗，前汗時人才甚多，今則皆是庸惡者。前汗則專尚武事，今則武事漸廢，頗效中國之事。此正卿前日所誦，朱子謂，虜得中原人，教以中國制度，虜漸衰微者也。今汗雖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勢不久。虜中事，予料之熟矣。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砲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俟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蓋直抵關外，有不甚難者。虜不事武備，遼瀋千里，了無操弓騎馬者，似當如入無人之境矣。且以天意揣之，我國歲幣，虜皆置之遼瀋，天意似欲使還為我國用矣。且我國被擄人，不知其幾萬，亦豈無內應者耶？今日事，惟患其不為而已，不患其難成。」時烈對曰：「聖意如此，非但我東，實天下萬世之幸。然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難平者事。』萬一蹉跌，有覆亡之禍則奈何？」上笑曰：「是卿試予之意也。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既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⁶⁰

當時甚至有完善的計劃，例如宋時烈曾向孝宗表示，應仿效高麗以密奏形式通報宋朝之法與南明聯絡：⁶¹

⁶⁰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顯宗改修實錄》，卷1，顯宗在位年9月癸亥，頁51b-52a。

⁶¹ 關於高麗密奏研究，中韓學界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如洪瑀欽：〈11世紀 高麗와 北宋關係에 대한 蘇軾의 上疏文〉(11世紀高麗與北宋關係中的蘇軾的上疏文)，《모산학보》(慕山學報)，第13輯(2001年10月)，頁149-166。

臣竊聞麗氏於契丹時，請醫於宋，密奏忠慮，而金虜之時，又有奔問宋朝之事，當時義之……竊聞今日一脈正統，偏寄南方，未知殿下已有麗朝之事，而機禁事密，群下有未得知耶？若然則天怒自息，民心自悅，我國其庶幾乎。如其不然，則未有大倫有虧，大義有壞，而天佑民服者也。萬里鯨波，信息難傳，而精誠所在，無遠不屆。一國軍民，文武之中，豈無忠信沈密，而應募願行者乎？伏乞殿下，默運神機，獨與腹心大臣，密議而圖之。臣雖駑劣，極欲懷符潛行，以達吾君忠義之心，以明祖宗誠憫之極，則聖上培養之恩，庶幾少效，而假使未達，溺死於萬丈層波，萬萬甘心，榮幸無窮矣。惜乎今病已矣，南望長慟，只自匪風之思而已。伏願殿下，潛留睿思無忽，則千萬幸甚。⁶²

同時，在軍事方面孝宗也嘗試作出一些改革以圖有足夠的軍力發動戰爭。雖然在現實的考慮下，北伐最終無法成功，還被清廷要求派兵協助征伐羅禪，⁶³但列舉宋時烈與孝宗之間的對話，一方面足以證明當時宋時烈對孝宗以及朝廷的主流政策想法有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造就了朝鮮士

⁶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卷 19，孝宗 8 年 8 月丙戌，頁 12b。

⁶³ 羅禪征伐是應清朝的要求，派出烏統手協助討伐當時影響清俄邊界的沙俄哥薩克軍隊事件。事件中朝鮮在不得不考慮的情況下，派出 100 名烏槍手，與八旗軍等會師助戰。有關事件對清鮮關係的象徵意義是，有助舒緩自丙子胡亂以後朝鮮與清廷之間的關係。關於羅禪征伐，學者亦有不少的研究，如 Hyeok Hweon Kang, “Big Heads and Buddhist Demons: The Korean Musketry Revolution a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s of 1654 and 1658,”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2:2 (2013): 127-189；李康七：〈朝鮮孝宗朝羅禪征伐과 被我烏銃에對한小考〉（朝鮮孝宗朝羅禪征伐與被我烏銃相關小考），《古文化》，第 20 輯（1982 年月份缺），頁 15-28；반윤홍：〈備邊司의 羅禪征伐 籌劃에 대하여——효종조 寧古塔 파병절목을 중심으로〉（備邊司的羅禪征伐籌劃——以孝宗朝寧古塔派兵條目為中心），《韓國史學報》，第 11 號（2001 年 9 月），頁 123-143。

大夫 17 世紀，甚至延伸百多年的仇清想像的重要例證。而事實上，宋時烈的主張在其學生輩的推動下，⁶⁴成為了當時朝鮮士大夫思想界的主流，甚至到 18 世紀正祖（李祿，1752-1800 年，1776-1800 年在位）年間，正祖手書宋時烈的墓碑為：「有明朝鮮國左議政允庵宋先生之墓」，⁶⁵又親賜書院大老祠碑：「明天理，正人心，使衣冠之倫，得免為披髮左衽，不與夷狄禽獸同歸者，大老之力也。」⁶⁶

由此可見，朝鮮思想與政界在後期，極力推舉宋時烈，其實可說明宋時烈已化成一種尊周攘夷，尊明仇清的思想呈現的例證或是傳播代表，而宋時烈的門人，如崔慎（1642-1708 年）、⁶⁷閔鼎重（1628-1692 年）等，⁶⁸以及其他受宋時烈影響的士大夫，⁶⁹也在各種論述中銳意強化宋時烈的地位

⁶⁴ 關於宋時烈在各地的弟子以及弟子的活動，特別是推動建構宋時烈道統的各個主張者，詳參이연숙（李娟淑）：《尤菴學派 研究》（大田：忠南大學校史學科博士論文，2003 年），頁 50-112。

⁶⁵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 152。

⁶⁶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4 年），第 86 冊，正祖 11 年 3 月 19 日，頁 28b。

⁶⁷ 姜智恩以宋時烈與崔慎的對話為例，說明宋時烈的朱子學的觀感，詳參姜智恩：〈東亞學術史觀的殖民扭曲與重塑——以韓國「朝鮮儒學創見模式」的經學論述為核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4 期（2014 年 3 月），頁 173-211。

⁶⁸ 閔鼎重曾於 1669 年擔任冬至使使節期間，與一名河北省生員交談，並藉此機會收集各樣反情報，可見他深受其師的影響。關於此閔鼎重的反清情報收集研究，可參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による反清情報の収集とその報告——1669 年閔鼎重の「王秀才問答」を中心に〉（朝鮮燕行使の反清情の収集與其報告——以 1669 年閔鼎重的「王秀才問答」為中心），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187-204。

⁶⁹ 關於此，詳參이연숙（李娟淑）：〈17~18 세기 영남지역 노론의 동향 - 송시열 문인가문을 중심으로〉（17-18 世紀嶺南地域老論的動向——以宋時烈學派為研究中心），《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史學），第 23 輯（2002 年 1 月），頁 81-116。

與角色，⁷⁰而事實上，宋時烈的各種主張與行為，如創立萬東廟、摹刻崇禎御筆以及成立華陽書院等，⁷¹都使宋時烈本人成為了一種尊周思明的象徵，而這種象徵在其弟子們的傳播下，成為整個朝鮮思想界 18 世紀的一種主流想法。

然而，思想界的一面仇清蔑滿，但現實外交政治之下，朝鮮丙子胡亂後，一面仍派遣使節到瀋陽與北京。據夫馬進整理，從 1637 年丙子胡亂甲午戰爭前夕，共計有 494 次，加上臨時派遣的 600 多次的賚咨行，可見平均每年有 3.7 次使節派遣的活動。⁷²這樣的派遣數量反映的是朝鮮仇恨的同時，仍在現實的政治考慮或經濟需要等因素下，使朝鮮在派遣使團上，對比明朝時有更多的材料與紀錄，記述相關的事情。換句話說，朝鮮常與清廷有不同程度的交涉，但士大夫在義理為先的思想主張之上，如何接納或如何應對這些接踵而至的交涉活動？

據李花子的研究整理，如順治年間便有 9 次的伐木或偷參的越界事宜，⁷³當中不少案件需要朝鮮派員交涉。又因為長久的越境問題，清廷亦與朝鮮衍生了邊界的問題。朝鮮過去與明朝的邊界未有明顯的爭議，故朝鮮並未有各種的論述，但朝鮮人普遍越過鴨綠江尋找各種工作與獲利機會。但

⁷⁰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 172-180。

⁷¹ 全用宇：〈華陽書院과 萬東廟에 대한 一 研究〉，《湖西史學》，第 18 輯（1990 年 12 月），頁 135-176。

⁷²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は何か〉（甚麼是朝鮮燕行使），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4-5。

⁷³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 年），頁 24-25。

滿清崛起於東北，故對東北的邊疆意識亦特別重視。⁷⁴但在丁卯與丙子之役後，朝鮮與清廷以鴨綠江為界，但兩地之間卻因朝鮮越界的頻密程度，使兩地有邊疆事宜處理的必要。而到康熙年間，甚至多次嘗試向朝鮮要求查界與定界，朝鮮多次的拒絕，最終在 1711 年，以李萬枝越界事件為由，⁷⁵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1664-1735 年）負責到中朝之間的邊界查明，⁷⁶而朝鮮亦因此而需要派出各種接伴使及譯官，去與穆克登進行交涉，可見邊界是中朝關係之間的重要議題。⁷⁷

另一方面，早於丙子胡亂以前，已有不少朝鮮人為了採參或伐木等原因而前往明朝所管轄的東北地區，即使後來努爾哈赤成立後金以後，朝鮮人亦有越境採參的記載。當時對邊境的定義模糊，但是越境活動極為平常，未有得到拒絕。而朝鮮與後金亦多次就朝鮮人越境採參一行進行磋商，而後金亦曾撰國書，向朝鮮抗議越境採參事宜。⁷⁸由此可見，朝鮮人越境問

⁷⁴ 圖們江下游在世宗期間曾設置慶源、會寧、慶興、鐘城、怎城富寧等鎮，鴨綠江、圖們江等作天險的領土，但女真人的反抗影響下，朝鮮很快就放棄了有關土地。因此，直到努爾哈赤興起以後，朝鮮與後金邊境之間才漸趨頻繁的交往。關於此。詳參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 2。

⁷⁵ 此事又稱為調原越界，《朝鮮王朝實錄》與《清實錄》亦有相關的記載。關於此，詳參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 70。

⁷⁶ 清聖祖實錄載道：「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關於此，詳參《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25，康熙 50 年 5 月癸巳，頁 6b-7a。

⁷⁷ Kwon Naehyun（權乃鉉）教授的研究留意到邊界地區因清代中朝關係的因素影響下，其實對平安道的經濟以及社會形成有莫大影響，關於此，詳參 Naehyun Kwon, “Chosŏn-Qing Relations and the Society of P’yŏngan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Chosŏn Period,”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Korea: History, Identity, and Culture*, ed. Sun Joo Kim, (Seattle : Center for Ko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0), 37-61；並參權乃鉉：〈17 세기 후반~18 세기 전반 평안도의 대청사행 지원〉（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支援），《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25 輯（2003 年 6 月），頁 145-172。

⁷⁸ 金宣旻：〈人蔘과 疆域 - 後金-清의 강역인식과 대외관계의 변화〉（人蔘與疆域——後金—清的疆域認識與對外關係的變化），《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2008 年 10 月），頁 227-257。

題，是後金與朝鮮之間成為了兩地間交涉的重要問題之一。

這些事宜與傳統的朝貢使節派遣不一樣，故亦同時衍生了一種使行模式名為賚咨官的派遣。⁷⁹賚者，有付給的意思。⁸⁰故賚咨實指的是傳遞信息的意思，意即將一些信息與資訊傳遞的官員。而一般來說，他們都是一些非重大事情而派遣的使臣，主要的是傳遞奏文、咨文、押解漂流人、向化人和犯越人的任務。有趣的是，因需與中方朝廷官員對話與交涉，故所派遣的都不是士大夫，而一般被派遣的是司譯院譯官，即他們能以漢語及漢文進行交涉。

因此，丙子胡亂以後，朝鮮與在思想界雖然產生了對於滿清政權的仇恨，但是礙於現實的環境之下，朝鮮派遣入京的使節卻沒有因此而減少，反而為了盡顯朝鮮的禮義之邦精神，在派遣使節期間，透過貢品的數量、使團的數量以及各種的安排配合，希望在清廷社會，盡顯禮義之邦的一面，這種禮儀的重視，除了是朝鮮社會與文化所塑造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刻意利用禮儀作為一種對於華夷觀表態的工具。然而，實行禮儀活動期間，普遍士大夫入京後，均拒絕或不太願意接受這些工作，而不少當時的工作轉嫁到其他職級的官員，興起的其中一群，正是漢語譯官。譯官職能得以重視是從這種時代背景所塑造的社會與文化因素而產生的。

⁷⁹ 李善洪：〈明清時期朝鮮對華外交使節初探〉，《歷史檔案》，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61。

⁸⁰ 《儀禮·聘禮》中有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賚皮馬。」據關於此，詳參顧寶田、鄭淑媛譯注、黃俊郎校閱：《新譯儀禮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290、295。

三、 朝鮮北學興起的思想與思想轉移

順治與康熙為了改善與朝鮮之間的關係，清廷亦嘗試作出穩定兩國關係的政策與措施，希望藉此改變朝鮮在丙子之役後反覆的舉動，改善兩國的關係。如 1644 年，清軍入京後不久，便容許昭顯世子回國。⁸¹據《仁祖實錄》所載，可見清廷此舉，實為一種釋出善意，改善兩地關係之舉。

十一日早朝，九王（註：即多爾袞〔1612-1650 年〕）招世子、大君，使龍將及孫伊博氏等傳言曰：「未得北京之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相替往來。三公六卿質子及李敬輿、崔鳴吉、金尙憲等，亦於世子之行，竝皆率還，而待本國夫馬入來即發。」⁸²

以誠信相孚正是清廷嘗試改善朝鮮的體恤之法，日後在貢品上的修改之中，清廷亦嘗試對於貢品及歲幣的要求有所減少，希望在經濟的利誘下改善朝鮮的壓力，從而有助抒緩朝鮮社會對清廷的仇恨之情。如在順治入京後，便將元朝、冬至、聖節三表貢使合為一，以彰顯柔遠之意，試圖改變丙子胡亂以後的緊張關係。⁸³而其中 1728 年（雍正 6 年，朝鮮英祖 4 年），雍

⁸¹ 一般學界對昭顯世子除了他被質於北京時，他更曾與湯若望有非常緊密的接觸。關於此，可參考日本學者山口正之的研究。山口正之：〈昭顯世子と湯若望——朝鮮基督教史研究其四〉（昭顯世子與湯若望——朝鮮基督教史研究其四），《青岳學叢》，第 5 號（1933 年 8 月），頁 101-117。

⁸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第 45 卷，仁祖 22 年 12 月戊午，64b。

⁸³ 李善洪：〈明清時期朝鮮對華外交使節初探〉，頁 57。

正帝更下諭寬減朝鮮的貢品與歲幣，⁸⁴亦成為了朝鮮以後百多年的常例。⁸⁵

除了貢品的減免外，使團成員的自由活動空間與安排亦作出了不少的放寬，故清康熙以後，朝鮮使節抵京後，能到處參觀，與清廷士人進行交往、筆談、買賣等。據宋慧娟的研究，1662 年（康熙元年），貢使可自由攜帶貨物，而無需以咨文列明各種名目與數量。⁸⁶使節在北京又到康熙晚期及雍正初年，甚至可以自由活動，正如洪大容所云的，引證著當時朝鮮使節使京期間，不再受禁制所限，而可自由行走於北京：

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遊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間也。清主中國以來，弭兵屬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解。然遊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數十年以來，昇平已久，法令漸疎，出入者幾無間也。⁸⁷

這些舉措無疑是，清朝對朝鮮警戒放鬆的證據，驅使朝鮮士大夫不再堅持著對於清廷有所偏見的觀點。而事實上，康熙中後期，隨著三藩之亂平定、⁸⁸臺灣鄭克塽（1670-1707 年）受封為海澄公等，⁸⁹清廷權力與社會為前所

⁸⁴ 「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百石。朕念該國路程遙遠，運送非易。著減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只貢江米四十石，足供祭祀之用。永著為例。」詳參《清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66，雍正 6 年 2 月甲申，第 7 冊，頁 1004b-1005a。

⁸⁵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9-50；並參張存武：《清宗宗藩貿易》，頁 25-26。

⁸⁶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頁 62。

⁸⁷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外集卷 7・〈湛軒燕記・衙門諸官〉，頁 15a

⁸⁸ 1673 年（康熙 12 年）前，吳三桂因活捉永曆帝有功，被封於雲南為藩王，擁有高度自

未有的穩定，故康熙年間也放寬貢使，⁹⁰特別是朝鮮使臣入京的安排，如表現出一些特殊的禮遇。⁹¹在康熙年間出使北京的，雖然有不少燕行日記的紀錄出版，但是總的來說，他們仍然帶有不少批判的。楊雨蕾引用姜銑（1645 年-？）在 1699 年（康熙 38 年，肅宗 25 年）出使時的例可反映有關的情況：「吾之生後，恨未見皇朝全盛之時，而今來拜跪於戎狄之庭，只增扼腕。」⁹²

思想界在 18 世紀出現變化，使士大夫對清朝的想像亦有所改變。17 世紀，宋時烈等人在老論提出了尊周思明的觀念，對思想界帶來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宋時烈的學生金昌協，當時向宋時烈請教關於人性與物性的討論。而金昌協亦在金尚容與金尚憲之後，負責繼承石室書院的精神，但此時金昌協更關心的是人物性討論。

治權。但自康熙親政以後，有感於藩王對中央政權的威脅，便提倡撤藩。於是，吳三桂對此反抗，便以反清復明為口號，並聯同南方其他藩王一同建國，引發起史稱為「三藩之亂」的事件。關於此，詳參 William Rowe（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31。

⁸⁹ 鄭成功（1624-1662 年）原為海盜世家，後於明清易代時，其父鄭芝龍於福州擁護牛車鍵為隆武帝，從此亦被視為抵抗清軍的南明水師將領，因當時被賜封國姓，縱使鄭芝龍曾受降於清，但鄭成功轉至金門，以抗清為其工作。雖然鄭成功及其兒子鄭克塽所維持在臺灣的政權本質仍有很多的爭議，但從清朝的管治角度來看，收復臺灣對穩定整個帝國有重要的意義。William Rowe（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31-33。

⁹⁰ 張禮恆以「厚往薄來」的原則使兩國之間自康熙以後，兩地之間變得典範的宗藩關係。關於此，詳參張禮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1626-1894 年間的中朝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00-107。

⁹¹ 楊雨蕾：〈18 世紀朝鮮北學思想探源〉，《浙江大學學報》第 37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88。

⁹² 姜銑：《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卷 28，頁 532-533；並參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215。

早於 15 世紀，朝鮮理學家就性理問題展開了數百載的討論，⁹³著名的是李栗谷就著退溪與奇大升的討論後，按奇大升的想法，嘗試反駁退溪，引來退溪的學生成渾（1535-1598 年），亦因此而展開了栗谷學派與退溪學派之間就著四端七情理氣之爭的展開。而在四端七情理氣之爭以後，在 17 世紀開端，韓儒對於朱子在《中庸》與《孟子》之間對性的論述有不同。朱子在《孟子》的註解中，強調「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但在《中庸》卻指：「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而事實上朱子註釋《中庸》時，說明「天命之謂性」，而在《孟子》之中，則強調「生之謂性」，故此朱子對性說解釋的不一致，因而引起了金昌協向宋時烈提出質疑。

雖然金昌協與宋時烈之間的討論沒有延續，但在同一年，權尚游向朴世採與權尚夏提出質疑，使權尚夏對此作出了回應，權氏引用朱子認為：「先生又印或人之問，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⁹⁴這象徵著人性物性並不盡同。而在其門下，李東對其說法有所不認同，於是與韓元震展開了一連串的爭論。⁹⁵他們二人的觀點不一樣之地方，朴勝顯認為：「李東基於『一原』的觀點提出『人物性俱同論』，韓元震基於『性三層說』觀點提

⁹³ 關於韓國治朱子學論述，詳參錢穆：〈朱子學流衍韓國考〉，《新亞學報》，第 12 卷（1977 年 8 月），頁 1-70。

⁹⁴ 關於此論述，詳參高在旭：〈導論：人物性同異論爭在韓國儒學史上的意義——人物性同異論之發生、展開及意義〉，《哲學與文化》，第 41 卷第 8 期（2014 年 8 月），頁 9-10。原文則參考權尚夏：《寒冰齋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726，卷 21，〈太極圖說·示舍弟李文兼示玄石〉，頁 6a。

⁹⁵ 楊祖漢：〈韓儒「人性物性異同論」及其哲學意義〉，載劉述先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頁 11-41。

出『人物性相異論』。對人物之性，態度相異，緣於看人類觀點之差異。李東對人與物，從本體論觀點出發，韓元震則從具體現實中所體現的重視現實差異的現象論觀點出發。」⁹⁶因此，兩者之間出現了極大的差異，亦影響到兩方面的不同思想者，互相的爭論，而由於爭議者來自不同的區域，而受到李東想法影響的士大夫，均是漢城府或京畿道出身，即所謂洛下地區，故稱之為洛派。而住在當今忠清道，即當時的湖西地區人士，則接受人性異性論，故稱為湖派，⁹⁷而這場爭論卻被視為湖洛之爭。⁹⁸

洛派的思想之中，李東的想法最為人所認知。李東認為人與動物之間同樣皆具五常，而韓元震卻認為動物不具五常，故從此概念出發，分別出人性與物性的了解，成為了湖洛兩派之間的差異。而其中洛派思想的代表李東，更從人與物皆具五常的角度出發，認為本物之性為一原，而影響各種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物之間的差異，則是通過氣來形成的。故聖凡差異或人物差異的出現，並非來自人性與物性有差異，而是來自氣，而因人與物皆具五常，五常亦即本然之性，故人與物本性是無異。⁹⁹主張人物本性的李東，透過「一原」與「異體」的區分，為朝鮮儒學思想界，總括了天人之性命與理氣之本末。

在同一時間，本著人性物性相同的金昌協與金昌翁兩兄弟，其思想雖

⁹⁶ 朴勝顯：〈巍巖李東人物性同論與心性一致論的研究〉，《哲學與文化》，第 41 卷第 8 期（2014 年 8 月），頁 66。

⁹⁷ 高在旭：〈導論：人物性同講爭在韓國儒學史上的意義〉，頁 8。

⁹⁸ Young-Jin Choi, "The Horak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Joseon," *Korea Journal* 51:1 (2011): 5-13.

⁹⁹ 朴勝顯：〈巍巖李東人物性同論與心性一致論的研究〉，頁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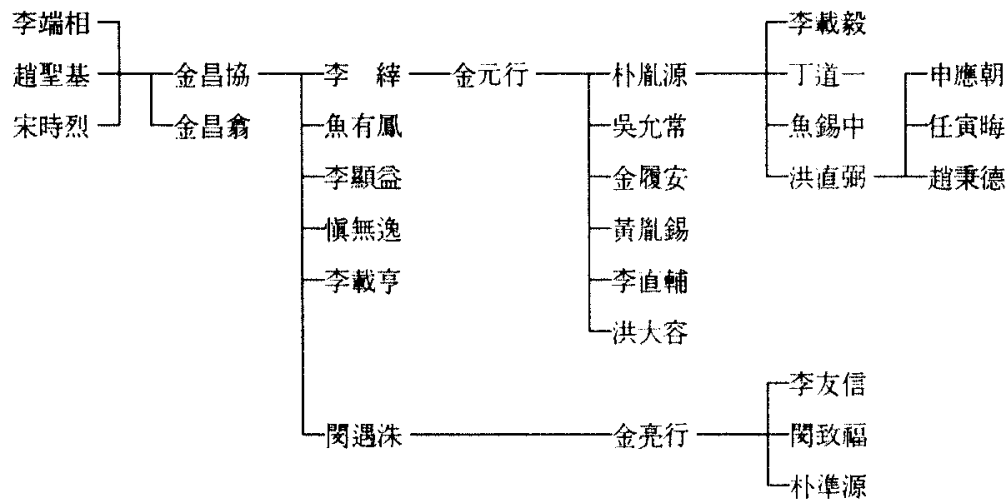
不及李東能解有所突破性的提出，但他同於洛下思想背景下，均認同人物性相同的思想，他們構築了朝鮮 17 世紀以降的人性與物性同異問題討論的平台。金昌協指出：「蓋子思言未發之中，只是與已發相對平說，其意本慾人就此思慮，未萌處，認取天命本體無所偏倚。蓋纔涉思慮則此心已有偏倚，而非復渾然在中之體矣。」¹⁰⁰換言之，金昌協認為在未發之心體上，不存在人與物之間的差異，同樣地亦不存在聖人與眾人之間的差異，亦即他所謂的「無所偏倚」。因此，儘管學界對於金昌協的思想是否人物性同論仍然有不少的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弟金昌翁將其想法定性之，並奠定了洛學之學問方向。金昌翁的想法之中，可以他其中一個說法來歸納，他指：「以本然氣質為二性，固為未安。若曰人有全太極，物有偏太極，亦豈不為二性者乎。本然真體不為氣困者，則箇箇五常已矣。」¹⁰¹金昌翁的這樣講法是指雖然人與物之間存在氣之差異，但所有個體內都有理存在，而差異之間的存在問題，主要來能否透過氣的擴充，而非理之不同。這樣的思想，亦確立了後來洛學思想家的想法，同時影響到後來北學的興起。

金尚容、金尚憲之後，17 世紀的石室書院則由金昌協與金昌翁繼承其志，如上文所說，金昌協向宋時烈提出人物性的討論以後，金昌協開始對人性物性展開討論，而金昌翁則定性金昌協主張人物性同論。而同樣地，石室書院亦漸漸成為了倡導洛派思想的書院，而金昌協的一脈，人才輩出，諸如李緯（1680-1746 年）、魚有鳳（1672-1744 年）、李顯益（1678-1717

¹⁰⁰ 金昌協：《農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48-252，卷 19，〈答道以〉，頁 10b。

¹⁰¹ 金昌翁：《三淵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53-257，卷 21，〈籤論李顯益禽獸五常說〉，頁 35a。

年)等，¹⁰²其中李緯將石室書院的洛學風氣傳授給金昌協的孫子金元行，而金元行成為了洛學發展至 18 世紀初期與中期的重要倡導人物。



圖表 1 洛學思想承傳圖¹⁰³

金元行安東金氏的一支，是金昌集的兒子金濟謙所生，母親則為宋浚吉的曾孫。金昌集（1648-1722 年）是金昌協、金昌翁的兄弟，而金昌集與昌協一樣也是由宋時烈所教導的。據金履安（1722-1791 年）為父親所寫的行狀提到早年金元行熱愛遊山，及後愛上讀書，程度甚至被形容為「手不釋卷，家人或失所，在輒獲於書樓中。」¹⁰⁴因辛壬士禍的影響，其祖父金祖集被判逆死，父親與長兄亦受到波及，故他奮然求道，專心讀書。即使金家得到平反後，他仍無意出仕，故積極專心經營石室書院，¹⁰⁵而石室書

¹⁰² 조준호 (趙峻皓) : 〈朝鮮後期 石室書院의 位相과 學風〉 (朝鮮後期石室書院的地位與學風)，《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11 卷（1999 年），頁 65-95。

¹⁰³ 趙峻皓：〈朝鮮後期 石室書院의 位相과 學風〉，頁 81。

¹⁰⁴ 金履安：《三山齋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冊 182，卷 9，〈先府君家狀〉，頁 9a。

¹⁰⁵ 李炯丘：〈金元行의 實心 강조와 石室書院에서의 교육 활동〉 (金元行的實心強調和石室書院中的教育活動)，《震檀學報》，第 88 輯（1999 年 12 月），頁 231-248。

院則由金元行將宋時烈學脈，經金昌協等人所倡之學風與思想繼承下來，當中為人所認識的是人物性同論的問題。

從他的文集集中的〈雜著〉揭示了一些對於人物性同論的想法：

天道純善，而人物或違之者，形之累也。人之性無不全而物有拘之者，氣之塞也。塞則不通，不通則不變。通故能反之而同於天，塞故終於物而已，此所以貴人而賤物也。人而不能反其性，是亦物焉耳矣。孟子所誦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者是已。¹⁰⁶

而可看到與金昌協的想法是一致的，金昌協在反駁權尚游時指出：

人、物之生，同氣同理，而人則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物則得形氣之偏而不能全其性……¹⁰⁷而性者，萬物之一源，非人之所獨得也。故章句解天命之性，必兼人、物而言。今某只言授與於人而遺卻物字，是天命之性，人獨有之而物不得與也，是全不識性命之理矣。道者，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為也。¹⁰⁸

石室書院成為了洛派學人思想承傳的重要基地以後，也明確地將人物

¹⁰⁶ 金元行：《溪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169-171，卷 14〈雜著·雜記〉，頁 273-274。

¹⁰⁷ 金昌協：《農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卷 15，〈與權有道再論思辨錄辨〉，頁 18a。

¹⁰⁸ 金昌協：《農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卷 15，〈與權有道再論思辨錄辨〉，頁 25b。

同性論的想法固定下來，甚至發展成為石室書院的學風與傳承思想。金元行甚至從人物同性論，開出對聖凡同心論，在他回應玄子敬關於人性與物性關係時，可了解到他這樣的想法，他指出：

五行各一其性，此性者為本然之性無疑，其意若曰其氣質既殊，則其所稟之理，固亦隨以不同。然即此不同，而亦非別是一性，即只是渾然全體本然之性。蓋亦明夫五行者，本皆具此本然之性也。譬如月之在水，水有江海川澗池渠行潦，其為大小濶狹哉。三淵從祖嘗論此，而曰只各一二字。氣異故曰各，理同故曰一，此言亦甚明白，今且卜論其他，此圖全篇大意，只是發揮此性之本善，通天下萬物，皆是這一箇之義。¹⁰⁹

金元行提到三淵，即金昌翁認為世間萬物，無論人或物之中，理同而氣異，故出現各與一，即人與物的理同為一，而氣致各異，關鍵在於如何發揮人性物性之本善，可見金元行的想法就著金昌翁的說法作出延伸。而聖凡同心論以及人物性同講，可以體現在金元行在石室書院的講論中，他特別說明普通人亦可以成為聖人，因為關鍵在於他們均有同樣的本性。

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覿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為此說者，豈故為亦若是大談高論，以誘人而為善也，誠有見乎此性之一同而無少差也，嗚呼，君之身，既有與聖人同者。則天

¹⁰⁹ 金元行：《溪湖集》，卷7，〈答玄子敬〉，頁2b-3a。

下之可貴可重，孰有大於此者，而尚可以安於暴棄而莫之反乎？¹¹⁰

可見金元行在石室書院推行的學術傳承，在於人物同性論開出的聖凡同心論，亦即使士大夫在學習的過程中，了解到他們與聖人同，只是在於是否「暴棄」其本性而已。而金元行更認為，如要能學習得著及實踐，則需「著實讀書，兼實持敬，著實力行。」¹¹¹實一詞在金元行眼中甚為重要，而所謂實者，實為「實心」，亦即發揮心之本性。他在答金大來（1729 年-？）時回應：「而顧學者，不能實心實力，未見其驗耳，此實心二字，最有味。」¹¹²因人性物性相同的基礎觀點之下，金元行引來關於聖凡同心的想法，使他認為凡人的心皆可透過「實踐」，而能夠與聖人齊名，這樣的思想建構，當然對於石室的學生有不少影響，¹¹³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想法如何建構北學思想，當中最值得注意的金元行學生之一洪大容。

由於祖父洪龍祚（1686-1741 年）為正三品大司諫，其交遊相當廣闊，當中石室書院的繼承人金元行也是他的好友。加上，金元行的妻子是洪大容另一位長輩洪龜祚的女兒，故洪家與金元行關係相當親密，因而洪大容透過相對的關係，入讀石室書院。¹¹⁴而如上所述，石室書院已發展成為一所重視人物同性論的「洛學」書院。

¹¹⁰ 金元行：《溪湖集》，卷 14，〈論石室書院講生〉，頁 24b-25a。

¹¹¹ 金元行：《溪湖集》，卷 11，〈答李城輔〉，頁 227-228。

¹¹² 金元行：《溪湖集》，卷 8，〈答金大來〉，頁 11b。

¹¹³ 李垌丘：〈金元行의 實心 강조와 石室書院에서의 교육 활동〉（金元行的實心強調與石室書院中的教育活動），《진단학보》（震檀學報），第 88 期（1999 年 12 月），頁 231-248。

¹¹⁴ 關於此，詳參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頁 274-276。

洪大容被視為北學思想的開導人物，他的想法成為了北學的思想泉源。北學者被視為一群主張破除對中國的偏見與執著的讀書人，而事實上，從洪大容這方面對人性與物性關係之討論，可見他的北學想法是從金元行的主張消化而來的。他指出：

所謂性者，何以見其善乎？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則固可謂之本心。若見玩好而利心生，油然直遂，不暇安排，則何得謂之非本心乎。且性者，一身之理而無理聲臭矣。善惡二字，將何以著得耶，言仁義則禮智在其中，言仁則義亦在其中。仁者理也。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所謂理者，仁而已矣。在天曰理，在物曰性，在天曰元亨利貞，在物曰仁義禮智，其實一也。草木不可謂全無自覺，雨露既零，萌芽發生者，惻隱之心也。霜雪既降，枝葉搖落者，羞惡之心也。仁即義義即仁，理也者，一而已矣，毫釐之微，只此仁義也。天地之大，只此仁義也。大而不加，小而不減，至矣乎。¹¹⁵

除了看到洪大容的人物同性的想法，與金元行幾乎是無異外，洪大容也認定，通過接受金元行教學後而確認了自己的想法的，在他為金元行撰寫的祭文之中，他提到：

竊嘗聞問學在實心，施為在實事，以實心做事，過可寡而業可成。從今以往，努存桑榆，隨分躋攀，庶報恩育之萬一，亦願尊陰啟其衷，俾分寸有成，卒免為門下之棄物，則此可以歸復於

¹¹⁵ 洪大容：《湛軒集》，內集卷 1，〈心性問〉，頁 1b。

他日矣。¹¹⁶

雖然祭文總不免過大或褒獎去世者，但仍可看到一些基本的想法。洪大容形容自己的學問受金元行的實心思想，得到金元行的教導，而他有其所學的，沒有得到拜其門下的身份。而除了洪大容一些學術想法外，他本人參與燕行的動機以及認識清廷各種文化與知識的目的，均受金元行的教學和金元行的人物性無差異的觀念影響，¹¹⁷使洪大容開始對明末清初以來，朝鮮士大夫所建構的華夷觀重新定義，¹¹⁸他認為華夷本性應是一樣，沒有善惡之分，正如清朝管治下的中國人、滿人以及朝鮮人等，本性也是一樣，只是本性發揮差別，而出現華夷差異，故他與過去的朝鮮士大夫有所不同的是，洪氏不只是為了單純好奇，又或是為了完成政治任命而被迫前往，而是為了希望對中國有更深刻的認知，而且認為儘管華夷有分，但實際上本性一樣，是有值學習的地方，故對於中國人的社會與文化，沒有明顯抗拒，使他希望前往北京，驗證心中所想，或是尋找會心人對談。

這可以從洪大容在回到北京以後，他所撰寫的〈鑿山問答〉中，顯示出這種他對於華與夷本性一致的想法，用他的說法即「華夷一也」。〈鑿山問答〉模擬兩位學者，一位隱居讀書三十年的虛子，另一位則是曾前往北京六十日的實翁之間的對話。¹¹⁹虛子影射的是出發前的洪大容本人，而實

¹¹⁶ 洪大容：《湛軒集》，內集卷 4，〈祭溪湖金先生文〉，頁 3b-4a。

¹¹⁷ 李相益：〈洛學에서 北學으로의 思想的 發展〉（由洛學到北學的思想的發展），《철학》（哲學），第 46 輯（1996 年 3 月），頁 5-34。

¹¹⁸ 趙誠乙：〈洪大容 역사 인식 - 華夷觀을 중심으로〉（洪大容的歷史認識——以其華夷觀為研究中心），《진단학보》（震檀學報），1995 年 6 月（第 79 號），頁 215-231。

¹¹⁹ 夫馬進對此亦有所涉獵，並認為此對於朝鮮知識界有極大的影響，而關於此書的誕生過程收錄了他近年出版的專書之中。夫馬進：〈洪大容 『匠山問答』 の誕生 —— 帰国

翁則是從北京回來後有新想法的洪氏，故兩者之間的對話，正是反映他前往北京前後的思考，可以看見他的思考如何受金元行的影響，並建構新的觀點。

虛子曰：「孔子作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夫華夷之分，如是其嚴。今夫子歸之於人事之感召，天然之必然，無乃不可乎？」

實翁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凡有血氣，均是人也。出類拔華，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門深濠，謹守封疆，均是邦國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題，均是習俗也。自天視之，豈有內外之分哉。是以各親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國，各安其俗，華夷一也。」¹²⁰

這段對話正反映洪氏從人物同性論角度出發，所持的華夷觀，正如人物同性論一樣，認為人物雖性同，但氣異，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同樣地，華夷之間有名義上及實際上的分別，但在本性上還是一樣的，故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沒有歧視對方的必要，只是本性發揮的問題。因此，在此關係之下洪大容對於中國各樣知識，無論是中國士大夫的文化與習慣、天主教、西洋知識以及各種各樣的有趣議題等，¹²¹都有特別深刻的關心，因為他沒

後における中国知識人との文通と朱子学からの脱却過程〉（洪大容《鑿山問答》の誕生——歸國後與中國知識份子的通信與朱子學思想脫離的過程），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391-416。

¹²⁰ 洪大容：《湛軒集》，內集卷 4，〈補遺・鑿山問答〉，頁 36b。

¹²¹ 關於洪大容的西洋觀與相關的討論，詳參金泰俊：〈科學的知識〉，氏著：《虚学から実学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頁 190-221。

有像過去的朝鮮士大夫一樣，帶有蔑視的角度去審視中國的各樣情況。故所看到的中國不一樣，同樣地亦接受清廷管治下的中國，有不少值得參考的知識。這樣的想法，可從他以虛子與實翁的對話亦有引證：¹²²

實翁曰：「……臟腑之於肢節，一身之內外也。四體之於妻子，一室之內外也。兄弟之於宗黨，一門之內外也。鄰里之於四境，一國之內外也。同軌之於化外，天地之內外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非其罪而殺之謂之賊。四夷侵疆，中國謂之寇。中國瀆武，四夷謂之賊。相寇相賊，其義一也。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諸侯衰弱，吳楚滑夏，寇賊無厭，春秋者周書也。內外之嚴，不亦宜乎。雖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變夷，興周道於域外，則內外之分，尊攘之義，自當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為聖人也。」¹²³

他以孔子用夏變夷的精神，認為朝鮮人不應排斥清文化，而是互相接受。而事實上，他亦結識了不少中國士大夫，並成為好友，¹²⁴並成為了當時中朝文人間，以及當今之間為所讚嘆的跨國友誼，¹²⁵其想法以及做法更影響

¹²² 關於虛子與實翁對話的討論，亦可參考金泰俊：〈虛子と実翁の出会い及び宇宙論——学者・学問論〉（虛子與實翁的見面及宇宙論），氏著：《虚学から実学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頁 190-221。

¹²³ 洪大容：《湛軒集》，內集卷 4，〈補遺・鑿山問答〉，頁 36b-37a。

¹²⁴ 關於洪大容在華的交友情況，可參考夫馬進：〈洪大容『乾淨衛會友錄』とその改変——18世紀東アジアの奇書〉（洪大容《乾淨衛會友錄》及其轉變——18世紀東亞的奇書），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361-390；徐毅：〈洪大容與清代文士來往書信考論〉，《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集），第 46 輯（2012 年 3 月），頁 289-324。

¹²⁵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国書刊行会，1975 年），頁 13-17；並參金泰俊：〈書き継がれる旅行記——清の学者との交友録〉（書寫繼承的旅行記——與清學者的交友錄），氏著：《虚学から実

到後來的朝鮮士大夫，諸如李德懋（1741-1793 年）、¹²⁶朴趾源（1737-1805 年）及朴齊家（1750-1815 年）等，均傳承著洪大容的想法，或是燕行時的做法，以新角度認識及接受中國不同的知識，建構了 18 世紀朝鮮士大夫間的新思潮——北學。¹²⁷北學一詞當然不是洪大容提出，但是他的《湛軒燕記》鼓勵當時的士大夫開始提倡向清朝學習，這種不只是對清廷的印象改變，¹²⁸而是朝鮮士人認為清朝是有值得學習的地方，甚至是可以用作改革朝鮮社會的參考藍本。而真正使用「北學」一詞的朴齊家，正是這種想法的倡導人物。

朴齊家本人也承認自己深受洪大容的影響，¹²⁹朴齊家曾題詩提到洪大容前往北京的經歷：

端正治園木，蕭閒結草廬。數弓秋逕細，一笠午簷虛。汲綆
時鳴院，風萱自弄除。未聞招隱操，空著絕交書。身入中原濶，
心於世俗疎。願逢知己死，不受每人譽。偃蹇眠被褐。婆娑飯帶

學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頁 113-147。

¹²⁶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第 22 期（2010 年 12 月），頁 60-85；王振忠：〈朝鮮燕行 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下）〉，《韓國研究論叢》，第 24 期（2012 年 8 月），頁 340-357。

¹²⁷ 關於北學的討論，韓國與華文學界有相當豐盛的研究成果，如李英順：《朝鮮北學派實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李泰鎮：〈「海外」를 바라보는 北學 - 『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俯瞰「海外」的北學。——以熱河日記為研究中心，〈한국사 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第 48 輯（2011 年 2 月），頁 185-209。

¹²⁸ 楊雨蕾提到清朝認識的變化，可參考楊雨蕾：〈朝鮮華夷觀的演變和北學的興起〉，氏著：《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224-229。

¹²⁹ 夫馬進：〈1765 年洪大容の燕行と 1764 年朝鮮通信使 —— 両者が体験した中国・日本の「情」を中心に〉（1765 年洪大容的燕行與 1764 年朝鮮通信使——以兩者在中國和日本對「情」的體驗為中心），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338。

蔬。壯懷天際薄。奇氣屋中噓。客去關門早。詩成倚杖徐。裊裊
今歲暮。臭味孰同余。¹³⁰

朴氏在詩指對於洪大容這種為了前往北京，願逢知己死，不怕當時人批判的去結識他的天涯知己的信念令他有很深刻的感受，與他的想法極為相似。¹³¹而朴氏亦曾閱讀洪大容的《乾淨術筆談》，並認識洪大容的中國友人潘庭筠。¹³²可見洪大容的燕行打開了當時朝鮮士大夫對中國的想像，並影響他們到北京的興致。而朴氏亦因此而參與了燕行，加上老師朴趾源（1737-1805年）的影響之下，撰成《北學議》一書。朴齊家在〈自序〉中指出：

今年夏，有陳奏之使，余與青莊李君（按：李德懋）從焉，
得以縱觀乎燕薊之野，周旋于吳蜀之士。留連數月，益聞其所不
聞，歎其古俗之猶存，而前人之不余欺也，輒隨其俗之可以行於
本國，便於日用者，筆之於書。並附其爲之之利與不爲之弊而爲
說也，取孟子陳良之語，命之曰北學議。¹³³

《北學議》的內容顧名思義，希望透過學習位於朝鮮北方的清朝的經濟、

¹³⁰ 朴齊家：《貞蕤集》（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年），詩集卷1，〈洪湛軒（大容）茅亭次原韻〉，頁24。

¹³¹ 關於朴齊家在北京的交友情況，詳參文炳贊：〈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為主〉，《船山學刊》，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頁177-180；並參金柄珉：〈朝鮮詩人朴齊家與清代文壇〉，《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6期（2002年6月），頁100-104。

¹³² 朴齊家通過洪大容認識到潘庭筠，更撰與潘庭筠有書信來往。「南海何時竭。楚岸連平地。相逢潘秀才，應詎前生事。」朴齊家：《貞蕤集》，詩集卷1，〈題洪湛軒所藏潘舍人庭筠墨蹟〉，頁45。

¹³³ 朴齊家：《貞蕤集》，〈北學議·自序〉，頁379。

社會環境或生活方式，以改變國家的落後情況。如說洪大容是提倡「華夷一也」，使朝鮮對於清朝的偏見有所改變，我們可說朴齊家與朴趾源主張的將有關的想法應用在改革，希望師夷攘夷。¹³⁴因此，與清人的接觸，和希望從清人的經歷之中，得到改革泉源，成為了 18 世紀以後，特別是 19 世紀初的朝鮮士大夫燕行的主要目標。¹³⁵而在這些交流過程，讀書人與士大夫如何掌握相關的資訊與情報源，以及各種影響他們決定與觀感的因素其實也是值得注意的部份。除了他們個人的經驗與看法外，應有一些媒介與中間人，讓他們掌握更多的信息，使他們能更深入與更具體了解當時的中國。

因此，18 世紀的朝鮮社會之中理學與北學之間過渡的同時改變了朝鮮對華夷觀的看法，而譯官在這處的角色亦不忽視。譯官為士大夫與使臣介紹以及分享各種在中國的見聞，或是與清人或其他於北京的域外人士的對話，也是通過譯官作實現。因此，北學的興起與形塑，同時與譯官的活動有密切的關係。譯官的活動確實在擔當一些資訊收集的工作，使朝鮮士大夫可對中國有不同層面的認識。而隨著民間交流頻繁，中國士大夫亦希望藉此了解朝鮮。故在 17 至 18 世紀之間，譯官不只限於朝鮮認識中國社會的渠道，也是中國文人對朝鮮認識的媒介。

¹³⁴ 楊雨蓳：〈朝鮮華夷觀的演變和北學的興起〉，氏著：《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232-235。

¹³⁵ 這批學者均主張對外開放，故或多或少都影響後來的朝鮮士大夫對外界的認識與想法。關於此，詳參孫承喆：〈朝鮮後期實學思想の對外認識〉（朝鮮後期實學思想的對外認識），《朝鮮學報》，第 122 期（1987 年 1 月），頁 117-122。

四、 鴉片戰爭與東亞秩序的重塑

隨著 18 世紀與 19 世紀的朝鮮讀書人開始嘗試利用北京作為認識外界的平台，他們透過北京獲得了各種新思想的啟發，或新技術的引入。同樣地，他們通過北京了解西洋人的宗教及文化，即天主教。一些翻譯成漢文的書籍、使節在北京的書寫與紀錄，¹³⁶使朝鮮社會對逐步對變化中的世界以及日漸發展中的西方宗教有局部的認識。19 世紀初，因朝鮮朝廷有感天主教傳教對朝廷有頗大威脅，故實行禁教，而引致多次教案的發生，而教案發生引伸的是往後朝鮮的鎖國政策與排外，直至 1870 年代，《江華島條約》的簽訂，朝鮮才轉移與整個世界的局勢接軌。而在此階段的朝鮮對清關係，也隨著東亞局勢的異動，而不能再單以傳統的朝貢系統下的運作，而鴉片戰爭的爆發，也改變了清廷的國家定位，同時亦波及了清廷與鄰近國家之間的結構，這方面也可體現在中朝關係之中。

1842 年（道光 22 年），清廷欽差大臣耆英（1787-1858 年）與伊里布（1772-1843 年）與英國的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 年）簽訂了《南京條約》，英國正式結束自 1839 年發動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動機在學術界有各種的討論，對於如何影響中國社會以及後來的政治局勢亦有相當豐富的論述。¹³⁷但有一點似乎稍為被學界忽略的，就是對於東亞的秩序與形勢所造成的刺激，這場由西方國家戰勝清廷的戰爭對於

¹³⁶ 關於此，可參考黃時鑒：〈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天主堂〉，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第 8 輯，152-167。

¹³⁷ 華文研究方面，當中值得注意的研究，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

當時的日本、朝鮮其實亦因此有很大的衝擊，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¹³⁸

早於 1980 年代，日本與韓國的學者其實已就鴉片戰爭，對於朝鮮的對外危機意識以及對應有相關的討論。如原田環專門開拓了這方面的研究，特別他注意到鴉片戰爭對於鴉片以及外來文化的傳入，加強了當中的危機意識。¹³⁹而閔斗基則注意到兩次鴉片戰爭與異樣船出沒的頻繁以後，朝鮮的各種對應，如拒絕與異樣船成員對話，或是進行驅趕，以及針對有關的侵略而進行的防守。¹⁴⁰

日本學者三好千春在上述的研究成果之下，利用了《承政院日記》、《朝鮮王朝實錄》以及由司譯院所整理的《同文彙考》，發現朝鮮政府在鴉片戰爭期間，利用了朝鮮的燕行使節收集的情報，了解當時的戰爭情況。而主要在當時的半官方與半民間的材料，如親身的與清人交談、實地的考察以及閱讀當地的《塘報》及《京報》等，成為了當時後來報告朝廷的資料來源。三好千春的研究擴闊了對燕行使節的研究，關注到他們成為了當時朝鮮了解世界以及中國各樣情況的情報收集來源。¹⁴¹

¹³⁸ 三好千春：〈兩次アヘン戦争と事大關係の動搖〉（兩次鴉片戰與事大關係的動搖），朝鮮史研究会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東京：綠陰書房，1990 年），第 27 輯，頁 47-68。

¹³⁹ 原田環：〈19 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對外的危機意識〉（19 世紀的朝鮮對外的危機意識），朝鮮史研究会編：《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 21 期（1984 年 3 月），頁 73-105。

¹⁴⁰ 閔斗基：〈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의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과 異樣船出沒에의 對應〉（19 世紀後半葉朝鮮王朝的對外危機意識——第一、二次中英戰爭與異樣船出沒的對應），《東方學志》，第 52 輯（1986 年月份缺），頁 259-279 年。

¹⁴¹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頁 28-62；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燕行使關於鴉片戰爭的情報源），《寧樂史苑》，第 35 號（1990 年 2 月），頁 21-32。

而鴉片戰爭以後使朝鮮對於西洋國家有所警惕，而國內先後發生的兩場教案。19 世紀初，在燕行使節抵埗北京，與傳教士交談之後，成為了朝鮮士大夫所好奇的內容。他們均將與傳教士見面的經歷或參觀天主教的感受，撰寫在他們的燕行紀錄之中，¹⁴²並且部份人更將傳教士的著作帶回朝鮮半島。因此，天主教的教義得以在朝鮮傳播。正值失去了政權影響力的南人社群，便心醉於天主教教義，當中以李承薰（1756-1801 年）、丁若銓（1760-1816 年）、丁若鏞（1762-1836 年）為首，成為了這種宗教思想風氣的士大夫代表。¹⁴³他們甚至多次要求北京派出傳教士到朝鮮半島，但是領導人湯士選（Alexander de Gouvea, 1751-1808 年）鑑於朝鮮國情關係，¹⁴⁴一直不願意派人當地，直至 1795 年才派出與朝鮮人樣貌相似的周文謨（生卒不詳）神父到朝鮮，展開有組織的天主教活動。¹⁴⁵然而，朝鮮朝野對西洋宗教相當小心，亦很快發現有關的活動，並將之視為邪教活動，及將天主教教徒處決，其中李承薰成為了第一次的辛酉邪獄的犧牲者之一，而丁氏兄弟亦因此被流放。¹⁴⁶而洪鳳周（?-1866 年）、南鍾三（1817-1866 年）

¹⁴² 關於此，申翼澈將燕行記錄中關於北京天主堂的記述，進行整理與編輯，以供中韓學者使用，關於此，詳參申翼澈編譯：《연행사와 북경천주당——연행록 소재 북경 천주당 기사집정》（燕行錄與北京天主堂——以燕行錄所載天主堂記事為中心）（서울[首爾]：보고사[寶庫社]，2008 年）。

¹⁴³ 關於黨爭的問題，詳參文玉柱：《朝鮮派閥鬭爭史》（東京：成甲書房，1992 年），頁 30-133。

¹⁴⁴ 楊雨菴：〈燕行使臣和朝鮮西學〉，氏著：《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 182-191。

¹⁴⁵ 周文謨是一位華籍傳教士，但具體的身份與故事卻無新的檔案介紹，但可參考蔡至哲：《東亞基督宗教歷史意識的建構——韓國天主教歷史初探》（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45-46；並參趙珖：〈清人周文謨來朝及其活動〉，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所編：《韓國學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第 4 輯，頁 234-241。

¹⁴⁶ 關於教案發生的原因，詳參王明星：〈朝鮮李朝末年教案探因〉，《東疆學刊》，第 17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29-32；關於辛酉邪獄的經過，詳參형지우（譯：邢志宇）：《朝鮮後期王朝에 끼친天主敎의 衝擊：辛酉邪獄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受天主

及法國傳教士張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1814-1866 年）則在 1866 年的丙寅邪獄之中被處決。¹⁴⁷此事的發生成為了法國攻打江華島的丙寅洋擾。

丙寅洋擾在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 年）有備而戰之下，¹⁴⁸先後將美國的舍門號以及後來的法軍一一擊退，¹⁴⁹也強化了大院君對於鎖國政策的持續落實，以防朝鮮出現如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常出現的「洋人不受中原節制，行其前所未有之事」。¹⁵⁰然而，此事使朝鮮與當時的潮流漸行漸遠，也強化了大院君本人與新立的高宗（李熙，1852-1919 年，1863-1907 年在位）王室的影響力與權威。

燒毀舍門號後，引起了美國在 5 年後，即 1871 年美國試圖攻打華島，卻再次遭到擊敗，¹⁵¹大院君更在全豎立「斥和碑」，上刻：「洋夷侵犯，非

教的衝擊的情況——以辛酉邪獄為中心）（全州：全北大學校教育大學院一般教會教育專攻碩士論文，1983 年），頁 25-45；並參馮瑋：〈辛酉教難及其對朝鮮西學發展的影響〉，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 輯，頁 279-297。

¹⁴⁷ 李基白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61 年），頁 410。

¹⁴⁸ 關於大院君對丙寅洋擾的對應，詳參연갑수（延甲洙）：〈丙寅洋擾와 興宣大院君 政權의 對應 - 《巡撫營膳錄》을 중심으로〉（丙寅洋擾和興宣大院君政權的對應——以《巡撫營膳錄》為研究中心），《軍史志》，第 33 號（1996 年 12 月），頁 189-214。

¹⁴⁹ 關於兩事的發生經過，可參考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Yongkoo Kim, *The Five years' Crisis, 1866-1871: Korea in the Maelstro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ncheon: Circle, 2001). 另值得一提的是，與舍門號船員溝通、翻譯與周旋的成員是譯官李容肅（1818 年-？）。

¹⁵⁰ 羅樂然：〈作為媒介的燕行使——柳厚祚 1866 年的燕行與朝鮮開港前的東北亞資訊認知〉，頁 412。

¹⁵¹ 1871 年，美國為了追究舍門號的下落，而引發的事件，史稱辛未洋擾。關於此，詳參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頁 11-12；並參李永春：〈試論大院君時期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丙寅洋擾」、「辛未洋擾」及朝鮮的對應為中心〉，《當代韓國》，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63-75。

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¹⁵²因此，全國一心進一步鎖國以及抗拒洋敵，直至 1873 年高宗主政以前。因閔妃與大院君之間的衝突，加上日本已有「征韓論」的影響，故大院君的鎖國政策在 1873 年被彈劾，而高宗京在閔妃的支持下，決定親政。

1875 年，日本以圖放棄原來的「交鄰關係」，¹⁵³轉為與朝鮮開國通商，日本並開始採用當時的國際法及各種強調「皇」、「敕」等字樣的書信，¹⁵⁴使朝鮮拒絕建立通商關係。於是，日本海軍派出雲揚艦在朝鮮半島沿海製造了事端，¹⁵⁵而希望得到如中國當日鴉片戰爭一樣，被西洋列國開港的機會。

主和迎戰與斥和的大院君派系官員當時得不到高宗的認可。於是，與大院君持相反意見的閔妃，及她的一群支持者，即開化派的主張者，則主張與日本議和，並藉此開放朝鮮，而進行各種改革。而事實上，日本亦希望利用這次事件獲得與朝鮮簽訂條約的機會。而朝鮮朝廷最終選擇了與日

¹⁵² 《高宗實錄》，卷 8，高宗 8 年 4 月甲申，頁 29a；李基白著，厲帆譯，厲以平譯校：《韓國史新論》，頁 276。

¹⁵³ 豐臣秀吉在 1598 年突然病逝，前線軍官決定撤軍，但這多年來的戰役，導致日本元氣大傷，讓德川家康利用這次機會擴大自己的勢力，最終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幕府，自己成為控制日本全國大權的征夷大將軍。德川建立幕府後，朝鮮王朝便重新解除對日本進行交涉的禁令。於是，朝鮮王朝因應各種的原因，先後向日本江戶德川政府，派送了 12 次通信使團。而日本亦有各種的使節與商旅到釜山。關於此，詳參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5 月），頁 33-74；並參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年），下冊，頁 242-244。

¹⁵⁴ 林子候：〈日韓江華島事件的檢討（上）〉，《食貨月刊》，第 14 期第 3/4 期（1984 年 7 月），頁 158-173；林子候：〈日韓江華島事件的檢討（下）〉，《食貨月刊》，第 14 期第 5/6 期（1984 年 9 月），頁 250-264。

¹⁵⁵ 關於雲揚號事件的經過，詳參姜世求：〈운양호사건에 관한 고찰〉（關於雲揚號事件的考察），《軍史》，第 15 輯（1987 年 12 月，頁 89-134。

本議和，並簽訂了《江華島條約》，¹⁵⁶使朝鮮半島由大院君鎖國的政策轉為對外開放，而開化派亦因此而得到認同，試圖推行各種的改革建議。

開化派從 1873 年獲得了執政的機會，再加上 1876 年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以圖進行各種改良，而當中開代派利用紳士遊覽團與領選使等方式，透過訪問的機會，在日本與中國社會收集各方面的情報，¹⁵⁷並利用這些機會去了解朝鮮進行開放與改革的可行方式，而當中如何掌握，使團成員如何理解當時的形勢，以及他們回國後的種種影響，以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也可見 19 世紀 70 至 80 年代，朝鮮面向一個開化的時代，希望利用改革，以避免朝鮮半島落後或被列強入侵。

而早在 1870 年以前，他們不只是單純地迎面東亞局勢的轉變，而開始思考改變的路向，而如何改變，路向的仿照，其實需要對外界有充份的認識，以及能夠有不同的渠道掌握各種最新的資訊與情報，故如何得以決定開化的選擇、外交上的支援等，這些情報來源是相當重要的，如何和由誰來掌握這些來源，是值得探討的話題。不過，開化派形成以及後來執政的過程，成為了後來朝鮮半島出現變局的重要關鍵。如 1882 年漢陽士兵因經濟因素以及閔氏族人專權的影響，而得不到應有的餉米，而發動兵亂，而當時士兵包圍大院君居住地雲峴宮，並向大院君求助，而大院君利用此而再次復出主政，史稱壬午軍亂。¹⁵⁸而大院君的政敵，閔妃被迫離開漢陽，

¹⁵⁶ 李泰鎮：〈1876 년 강화도조약의 명암〉（1876 年江華島條約的明暗）（19），《한국사 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第 36 輯（2005 年 2 月），頁 124-139。

¹⁵⁷ 關於紳士遊覽團的出發目的，經過以及各種相關討論，詳參鄭玉子：〈紳士遊覽團考〉，《歷史學報》，第 27 輯（1965 年 4 月），頁 105-142。

¹⁵⁸ 關於大院君與壬午軍亂的關係，詳參范永聰：〈朝鮮大院君與壬午軍亂〉，《歷史與

並聯繫開化派主要成員魚允中與金允植請求清朝出兵，而魚金二人則暗示大院君為軍亂的禍首。最終，清朝決定在壬午軍亂以後，強化與朝鮮的關係，以圖在複雜的東亞環境之中，仍能保持最後的藩屬國。

因此，清廷派出吳長慶（1834-1884 年）與馬建忠（1845-1900 年）率領軍隊平定兵亂。¹⁵⁹與此同時，日本亦因公使館被破壞而借機派兵到漢陽城，而當中如何取捨對清廷的關係，以及清廷如何面對他們的轉化成為了 1880 年代朝鮮士大夫的取捨之中，而清廷在此時亦進一步強化對朝鮮的管治，如派袁世凱（1859-1916 年）以「通商大臣」駐守朝鮮半島，及後更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以象徵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與身份。¹⁶⁰而親日與親中的士大夫一直在互相拉鋸，如 1884 年親日的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引日軍入宮，袁世凱則果斷地率兵擊敗日軍。¹⁶¹事件過後，中日則簽訂《中日天津條約》，希望強調朝鮮半島如有事情，則需知行通知對方才可派兵。¹⁶²但有關的條約似乎未有發揮效用，最終在東學黨起事以後，引發了中日之間在朝鮮半島與海上爆發了戰爭——中日甲午戰爭。¹⁶³而甲午戰爭的爆發象徵意義已有不少學者所研究，但對於中朝

文化》，第 3 卷（2007 年 5 月），頁 1-41。

¹⁵⁹ 范永聰：〈朝鮮大院君與壬午軍亂〉，頁 17-22。

¹⁶⁰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年）；Young-ick Lew, "Yuan Shih-kai's Residency and the Korea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1885-94,"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5 (1984): 63-108.

¹⁶¹ 林子候：《甲午戰爭前之中日韓關係（一八八二年—一八九四年）》，頁 61。

¹⁶² 于晨：〈1885 년 淸·日 天津條約의 재검토〉（1885 年淸、日天津條約的再檢討），《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43 輯（2015 年 4 月），頁 257-289。

¹⁶³ 林子候：〈關於「東學之亂」之再檢視〉，《韓國學報》，第 15 期（1998 年月），頁 231-236；李德超：〈從實錄考朝鮮東學黨之亂與中韓兩國之關係〉，《韓國學報》，

關係而言是，中國隨著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而結束了數百載的朝貢體系，朝鮮不再是藩屬國，而朝鮮亦同時邁向半島獨立的歷史。¹⁶⁴由此可見，19世紀的朝鮮半島成為了相當的複雜以及各國之間互相角力、接觸、距撞，而中朝關係的變遷亦是因此而不斷的轉變，而朝鮮的譯官亦因此在歷史的場景之中產生各樣的互動。

當時朝鮮半島不再是封閉的社會，而是一個急速透過與外界接觸，進行各樣變革的社會。故朝廷也好，士大夫也好都希望從中國、日本等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掌握各種新知識或相關的局勢情報，成為了朝鮮半島 19 世紀的時代特徵。因此，如何得知這些資訊，或進行對外的周旋，成為了 19 世紀朝鮮半島所面對的重要場合。研究主要對象朝鮮譯官在這些環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單純的協作者、禮儀的指引者，而是進一步成為了這種改革思潮的領導者，或是推動者，其中如吳慶錫更被視為開化派的主要人物，¹⁶⁵而他的學生先後包括了後來重要的人物，如金玉均（1851-1894 年）等人物亦受吳慶錫的影響而得以啟發了其改革的想法；¹⁶⁶另一位譯官卞元

第 10 期（1991 年 5 月），頁 229-236；並參 Pyong-uk An & Chan-seung Park,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asant War of 1894,” *Korea Journal* 34:4(1994): 101-113.

¹⁶⁴ 關於中朝之間由朝貢之國變為平行之國的研究，可參考이은자(李銀子)：〈韓·中 近代 外交의 실험, 1895-1905 年〉（韓中近代外交的試驗），《중국근현대사연구》（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8 輯（2013 年 6 月），頁 1-25；英文著作可參考 Andre Schmid,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¹⁶⁵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吳慶錫的開化思想與開化活動），《역사학보》（歷史學報），第 107 輯（1985 年 9 月），頁 107-187；並參金河元：〈초기 개화파의 대외 인식 : 오경석을 중심으로〉（初期開化派的對外認識——以吳慶錫為中心），《역사와 세계》（歷史與世界），第 17 輯（1993 年 6 月），頁 467-497。

¹⁶⁶ 金信在：〈金玉均의 正體改革論〉（金玉均的正體改革論），《경주사학》（慶州史學），第 14 輯（1995 年 12 月），頁 79-107。

圭亦推動「武備自強」的改革，¹⁶⁷也同時曾代表朝鮮王朝擔任外交使節，與中、美國從事外交活動。¹⁶⁸而李容肅亦在各種外交事務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可見在 19 世紀局勢的變動下，譯官從文化的媒介，轉為政策的直接介入者。

直至甲午戰爭以後，原來的朝貢體系徹底崩塌，而朝鮮王朝內部亦展開現代化的嘗試，推動了「甲午更張」，¹⁶⁹並由一群主張獨立的士大夫成立的獨立協會引導下，1897 年朝鮮王朝的高宗正式結束數百載的朝貢體系。¹⁷⁰他們認為朝鮮，放棄自明朝以來所賜的「朝鮮」國號應與清國皇帝地位同等，並宣布國號為大韓帝國，年號改為「光武」，朝鮮半島自此在政治、禮儀與外界等多種意義之中，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而隨著大韓帝國的成立，光武帝亦推動各種改革，昔日的譯官亦不再用從事使行活動，而國家亦與清朝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身份、職掌或貢獻亦在歷史之中所湮沒。

五、 小結

朝鮮半島歷代與中原地區的王權有緊密的聯繫，在中古史時代，唐朝在政治、軍事與文化上漸趨緊密，緊密的同時自然產生對話、衝突以及交

¹⁶⁷ 金良洙：〈朝鮮後期 譯官들의 軍備講究〉（朝鮮後期譯官們的軍備講究），《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19、20 輯（2001 年 1 月），頁 364-365。

¹⁶⁸ 金良洙：〈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的 政治外交：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頁 311-366。

¹⁶⁹ 在甲午更張時，朝鮮高宗已宣告洪範 14 條，首條即為：「割斷依附清國慮念，確建獨立自主基礎」《日省錄》，卷 415，〈詣宗廟辰謁行誓告〉，朝鮮高宗 31 年 12 月 12 日，頁 209；並參林亨芬：《從封貢到平行——甲午戰爭前後的中韓關係（1894-1898）》（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頁 105。

¹⁷⁰ Hyun-Nyo Rhim, "Yun Ch'i-ho and the Independence Club," *Korea Journal* 30:10(1990): 27-43.

涉，因此明清兩代，中朝兩國的朝貢制度發展到最成熟的階段。無數大小事情，兩地之間的衝突與議題，均需安排中介人作對話與交涉的代表，而擔當翻譯的人，文字傳遞的過程，都值得再探究。陳寅恪曾經說過翻譯史就是文化交流史。換句話說，國家之間的交流則需通過翻譯才得以落實，而朝鮮與中國的歷史進程的各種大小議題，到底翻譯這元素如何參與、塑造及介入各種中朝關係中的歷史課題，而對事情產生各種變化或帶動互動，是本論文的研究關懷。

丙丁胡亂到甲午戰爭以來的載百載，朝鮮譯官此群體的轉變是與朝鮮王朝與清朝建立的關係的變化有緊密的關係，一方面朝鮮譯官為朝鮮王朝在清代朝貢體系之中，所發揮的影響，以及所爭取的各種權益，另一方面東亞的文化的特徵塑造了朝鮮譯官在這些背景之中的意義以及他們的作用。因此，本文簡論兩地自 17 世紀到 19 世紀的關係演變，除了希望闡釋在此時期的社會文化脈絡外，也提供重要的證據，來討論朝鮮譯官如何在這種脈絡之中，產生各種的互動，形成了在這時期值得加深研究的特殊群體。從 17 世紀華夷觀的轉變，到 18 世紀的北學興起以及 19 世紀的東亞局勢異動，都顯示了中朝關係在明清易代以後的建構過程中，不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特徵形成，促使譯官的生活，他們所面對的事情以及需作的應對亦有所不同，過去學界對譯官從制度與社會身份觀察譯官，但卻較少關心他們對應。因此，本文刻意以描述 200 多年的時代變遷，對整個歷史環境的各種思想、文化、社會形態等作出交待，使譯官的角色以及他們的活動，有更具體的認識，從而確認他們的歷史意義。

第三章

因譯以達——朝鮮漢語譯官的培訓與翻譯規範

一、 引言

朝鮮王朝成立司譯院後，以語言把譯官分為四學：漢學、蒙學、倭學與女真學。¹四學之中，以漢學為主，在文獻的論述也是四學之首，故漢學或漢語譯官實際上是朝鮮譯官訓練的尤關重要的一環，這亦與朝鮮王朝立國以來，高舉「事大以誠」為國策有關。此章將剖析漢語譯官在朝鮮王朝自立國以來的歷史形象，特別是明清易代以後，他們的定位以及所接受的教育，如何反映著朝鮮朝廷或社會對譯官的需求以及翻譯活動的看法。

Gideon Toury (1942-2016 年) 提出「翻譯規範」的概念，他指出翻譯時所面對的各種來自譯入語社會及文化產生的制約，以了解直接影響譯者選用的翻譯策略。而特別是過去用於解釋在特定社會中，對譯者的翻譯行為及作品會產生影響的規律，當中亦包括國家機構、贊助人、讀者等各方面的期待以及所形成的權力因素。²因此，在朝鮮王朝的歷史進程而言，朝鮮的社會策略與文化環境，如何構成了朝鮮譯官的各方面的翻譯規範，從而影響他們的各樣翻譯行為與活動。雖然朝鮮王朝的文本文獻無法直接說明語言在翻譯活動過程中的具體情況，但一些譯官的記述以及所閱讀的教

¹ 女真學於康熙丁末年（1667 年）改稱為清學，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1，〈沿革・官制〉，頁 1a。

² Gideon Toury, “Studying Translational Norms,” i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79-92.

材可作為反映翻譯活動如何受制於各種權力因素規範，而所呈現的相關行動以及翻譯模式。而本章意圖利用 Toury 的想法，³探析朝貢活動如何建構朝鮮譯官的教育與培訓過程之中，了解各種社會制約，怎樣產生各種用語或翻譯行為。本章以敘述朝鮮譯官的培訓史來理解漢語譯官的教育與身份，藉此探討朝鮮譯官的語言水平及身份如何受朝鮮的文化與社會產生的制約所影響，特別以 Toury 所建構的翻譯規範概念，來剖析譯官曾採用的教材《象院題語》，說明清代的中朝關係建構過程，漢語譯官如何在朝鮮的社會翻譯規範與社會期盼之下，學習到不同的文化與語言知識，使他們能夠擔當中朝互動的文化中介者角色。

二、 朝鮮社會制約與譯官的培訓及身份形成

朝朝鮮王朝立國以來，一直需與外地，包括中國及日本保持各種官方及民間交流，並由司譯院負責安排有關人員及培訓的工作，故司譯院的創建，亦可視為朝鮮處理對外關係的手段。換言之，譯官的培訓與朝鮮對外關係建構有不可分開的關係。而這種培訓制度，則可追溯至高麗時代因應征東行省的成立後，⁴為對應頻繁的對元交往，而成立的通文館，⁵專門培

³ 在東亞或中國翻譯史之中，Toury 的想法被不少學者用作討論，諸如關詩珮：〈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範由晚清由中國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和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8 期（2008 年 7 月），頁 343-371；劉宜霖：〈「格義」之成住壞易——一個翻譯規範的考察〉，《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7 期（2014 年 6 月），頁 93-126；葉嘉：〈從「不忠」到「忠實」：從民初上海雜誌文本看翻譯規範的流變〉，《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3。

⁴ 高麗末年，中原被蒙古人全面控制，高麗亦被迫向蒙古稱和，並合併成為元朝（1271-1368 年）的「征東行省」。征東行省是高麗在元朝入侵後，議和後的結果。表面上，元朝將高麗合併於其版圖之內，與其他行中書省一樣。但實際上，高麗國王便是行省丞相，更掌管一切行省內行政及任命權，擁有高度的獨立自主。而元朝滅南宋（1127-1279 年），並統一中國後，有意征日，便以朝鮮半島作為跳板，故將朝鮮半島行省直接命名為「征東行省」。關於此，詳參丁崑健：〈元代征東行省之研究〉，《史學彙刊》，第 10 期（1980 年 6 月），

訓蒙古語或漢語的人材。⁶《高麗史》的〈通文館條〉記述了當時的設置原因：

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內學官等，外年未四十者習漢語……
時舌人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奸濟私，參文學事金坵建議
置之後，後置司譯院以掌譯語。⁷

可見，高麗培訓譯官希望避免有人「懷奸濟私」。而朝鮮最初的政制繼承高麗舊制，亦置司譯院，其文化與政治的動機更為顯著。立國之初，譯科被視為入仕七科之一，當時文、武科與其他科均為同等地位。⁸而七科中的譯科內，朝廷最重視的是漢語。《太祖實錄》明確說明「置司譯院，肄習華言。」

頁 157-190；烏雲高娃：《元朝與高麗關係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年）；高柄翊：〈麗代 征東行省의 研究〉（高麗時期征東行省的研究），氏著：《東亞交渉史의 研究》（東亞交渉史的研究）（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出版部，1980 年），頁 184-292。

⁵ 當然在高麗以前已有相關的文獻也提及關於譯官的培訓，如《三國史記》中記載高句麗「又置史臺，掌習諸譯語」，但當然更完整的譯官培訓制度與相關說明，則在高麗有更全面的發展。關於高麗時期的譯學與譯官活動，詳參이정신：〈高麗後期の 譯官〉，頁 373-403；並參박중연（朴鍾淵）：〈高麗시대의 中國語 通譯에 관한 연구——通譯官 選拔 養成과 名稱 問題를 中心으로〉（高麗時代的中國語通譯相關研究——以通譯官選拔養成與名稱問題為中心），《中國語文學》，第 62 輯（2013 年 4 月），頁 291-314。

⁶ 烏雲高娃：〈朝鮮司譯院蒙古語教習活動研究〉，頁 122-123；

⁷ 有趣的是在條目之中稱之為「通文館」，但是在文字的敘述則稱為「司譯院」，這或許是朝鮮朝的鄭麟趾在編寫《高麗史》時採用了當時時代用語而導致的，但從高麗到朝鮮一直到現在，「通文」與「司譯」基本上就是翻譯的代表或翻譯機關的代名詞。關於此，詳參鄭麟趾撰：《高麗史》（서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2 年），卷 76，〈百官一・通文館〉，頁 678-679。

⁸ 「定入官補吏法。凡初入流品作七科，曰門蔭、曰文科、曰吏科、曰譯科、曰陰陽科、曰醫科，吏曹主之；曰武科，兵曹主之。其出身文字，如前朝初入仕例，明寫年甲本貫三代，署經臺諫。不由七科出者，不許入流品。每除拜，所司考其出身文字，方許署謝。」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 1，太祖 1 年 8 月辛亥，頁 25a。

⁹家族有中原背景的外交官僕長壽（1341-1399 年）曾上書朝廷，¹⁰鼓勵培養翻譯人才，可反映朝鮮的譯學培訓與國家策略之間的相當密切：

臣等竊聞，治國以人才爲本，而人才以教養爲先，故學校之設，乃爲政之要也。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不可不習。是以 殿下肇國之初，特設本院，置祿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體式，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効。¹¹

僕長壽的上書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不可不習。」可見譯官並不只單純擔任語言傳話及翻譯的角色，而是為了服務與中國事務有關的工作。而事實上，自朝鮮與明朝建立事大政策以來，譯官一直擔當履行事大的主要執行者。因此，譯官的語言知識或學習內容，大多與朝鮮王朝事大國策相關。與此同時，僕氏特別強調訓練漢語人才最終目的是：「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効。」他眼中通過培訓懂得漢語的譯官是為了朝鮮在朝貢體系下，符合明朝的約定，彰顯「以盡事大之誠」的精神。這一點，如太宗時司憲府官員上疏時亦指出：「以小事大，古今之通義也。況我朝，僻處海陬，語音殊異，因譯以達，故司譯之任，誠爲重矣。」

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9 月辛酉，頁 50a。

¹⁰ 僕長壽是著名詩人僕遜（1319-1360 年）之子，是麗末鮮初跟從父親由中國遷居於朝鮮的著名外交家，同時亦是司譯院的重要官員。關於此，詳參陳尚勝：〈僕長壽與高麗、朝鮮王朝的對明外交〉，載黃時鑒編：《韓國傳統文化·歷史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年），頁 119-134；並參白玉敬：〈麗末 鮮初 僕長壽의 政治活動과 現實認識〉（麗末鮮初僕長壽的政治活動與現實），《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46 輯（2008 年 9 月），頁 5-40。

¹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 6，太祖 3 年 11 月乙卯，頁 17a-b。

¹²同樣的想法，到 15 世紀的成宗（李瑱，1457-1495 年，1469-1494 年在位）時期也見於大司憲尹繼謙（1442-1483 年）等人的上疏：「我國邈在海表，與中國語音殊異，而朝聘貢獻往來陸續，以為譯學不可以不重，故設司譯院，以專其事。」¹³這些充份的例子說明朝鮮的司譯院成立，為了培訓懂得漢語或其他外語的譯官為首要目的，而最終是希望幫助譯官執行職務時，他們能以流利的外語交談，在交涉、禮儀對應以及日常事務等工作上，解決各種困難。

既然司譯院的漢語譯官對於朝鮮王朝的國策落實相當重要，那麼譯官理應被視為重要的群體。然而，從譯官的取才制度，可以發現譯官的品位與他的職能有一定的落差。朝鮮科舉分為文、武、雜科，雜科即是文武兩科以外的實用科目，分為醫科、譯科、陰陽科與律科等。雖然朝鮮王朝沒有限定文武科的應考資格，《經國大典》條例僅列明有限定諸如罪犯、賊吏之子、再嫁失行婦女之子等人不能赴考：

文科則通訓，以下武科同。生員進士科則通通德，以下許赴。

守令則勿許赴生員進士試。罪犯、永不敘用者、賊吏之子、再嫁

失行婦女之子及庶孽子孫，勿許赴文科、生員進士試。¹⁴

在文本上，文科沒有具體限制應考的資料，一般良民也理論上可應試。但

¹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 8，太宗 4 年 8 月 20 日己丑，頁 4b。

¹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卷 67，成宗 7 年 5 月 15 日丁巳，頁 8b。

¹⁴ 崔恆、盧思慎、徐居正編：《經國大典》，卷 2，〈禮典・諸科〉，頁 1a-b。

是科舉對權力的保障有特殊的意義，故大家族通過文武兩科科舉固定了權力，並膨脹為「兩班」勢力。壟斷了文武兩科考試的兩班使中人和一般良民被排除在考試之外，以保護兩班的權益。¹⁵於是，雜學成為兩班以下百姓投身官場的渠道。相對於平民與兩班之間，投身於雜學的醫學、譯學、陰陽學等吏員，在朝鮮社會秩序中，位處於中層，故學者或歷史的論述中，稱他們為「中人」。

「中人」的地位與身份並不高，原因是雜學的考試均為兩班貴族不願參與的技術官僚。所以社會制度形成了朝鮮譯官等「中人」家庭在朝鮮社會地位並不享有優待，或在歷史論述也有意無意地忽略，原因是「中人」官職，如譯官、醫官等大多被視為是兩班庶孽、較上層的良人校生、鄉吏投身於朝廷官職的中下層渠道。¹⁶他們一方面既不是兩班，另一方面也不是被管治的階層，使朝鮮社會約定促成，將之名義為「中人」。

李成茂認為傳統朝鮮社會的兩班子弟深受儒家的君子不器想法的影響，¹⁷對於技術職級的工作有賤視與偏見的情況出現，¹⁸而曾於明孝宗(朱祐樞，

¹⁵ 而事實上文科及弟者隨著時代的轉變，由幼學考取功名者的比較越來越多，亦即透過兩班家勢而所開設的學科，透過此兩班貴族建構了他們的兩班門閥的社會與文化。關於此，李成茂：《韓國의 科舉制度》(韓國的科舉制度)(서울[首爾]：集文堂，2000 年)，頁 187-202。

¹⁶ 李成茂：《韓國의 科舉制度》，頁 207。

¹⁷ 李成茂：《韓國의 科舉制度》，頁 172。

¹⁸ 朝鮮後期的譯官詩人李尚迪(1803-1865 年)亦曾因其譯官的低層身份而有感抒發，「記曾身慕御爐烟，捐棄空箱值幾錢。但向酒家償宿債，一蓑歸老白鷗邊。」李尚迪以詩句慨嘆自身地位卑微，也許李尚迪並非能代表所有譯官，但可見直到 19 世紀譯官仍有這樣的抒懷，可見身份制度的限制對譯官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關於此，詳參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集卷 2，〈典朝衣〉，頁 10a。

1470-1505 年，1487-1505 年在位）年間出使朝鮮的董越（1430-1502 年），¹⁹所寫的《朝鮮賦》之中提到：「以先世嘗兼文武官者謂之兩班，兩班子弟止許讀書，不習技藝。」²⁰換言之，兩班子弟不會參與雜科考試，因為雜科的內容，即譯、醫、天文、律等，為非儒學「君子不器」的學問，所以兩班的子弟不會參與其中。換言之，考試資料成為了朝鮮身份階層的分野，也使大眾容易了解官職相當於社會形態，當時明文並沒有規定，但是朝鮮社會後來發展反映的正是如此。因此，譯官都被視為社會的中層，介乎兩班與平民之間，受制於朝廷兩班貴族的技術官僚層，這樣的社會身份，形成了譯官在生活以及工作上的特徵，都有其特殊取舍，或有一些與兩班士大夫不一樣的想法與觀念，這亦解釋說明了朝鮮的社會與文化如何構造了朝鮮譯官的身份。²¹

以上說明了朝鮮立國以來，培養譯官的主要目的。朝廷希望提倡漢語譯學，是與「朝聘貢獻」或「以小事大」等想法有所關連。語言能否「因譯以達」，以符合朝貢體系的要求，成為了當時朝鮮譯學訓練的核心指導想法。司譯院在成立之始，以顯示成立背後是配合事大政策，故翻譯策略在朝鮮的開始就與朝鮮國策不可分割。²²而這種想法也使譯官本身意識到，

¹⁹ Sixiang Wang, "Co-constructing Empir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Diplomacy, 1392 – 159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314-315.

²⁰ 董越：《朝鮮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94 冊，頁 2b。

²¹ 過去研究中人與譯官學者，均在此身份問題作出討論，如李成茂：〈朝鮮前期 中人層의 成立問題〉（朝鮮期中人層의 成立問題），《東洋學》，第 8 輯（1978 年），頁 272-284；朴星來：〈朝鮮 儒教社會의 中人技術教育〉（朝鮮儒教社會의 中人技術教育），《大東文化研究》，第 17 輯（1983 年月份缺），頁 267-290。

²² 《經國大典》指出：「司譯院掌譯諸方言語。」關於此，詳參崔恆、盧思慎、徐居正編：《經國大典》（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年），卷 1，〈吏典〉，

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朝聘應對的。譯官金指南、金慶門等在編寫關於譯官活動及司譯院各樣職掌的《通文館志》時，也明確寫道：「本朝譯院專掌事大交隣之事，上下數千年間，朝聘應對，有能以紓惠……」²³故可見他們有著明確的意識，譯官是與朝廷自立國以來所倡導的「事大」政策的需求有密切的關係。

但另一方面，朝鮮立國高舉性理學，無論朝廷還是兩班貴族都同時受君子不器的影響，故大多不主張讀書人執行語言溝通的職務，故朝鮮則依賴這些地位較低的中人官員。中人官員的教育、目光與知識水平與讀書人不同，從此看來可見他們所形塑的文化交流的意象或是政治關係的建構也與一般以讀書人目光出發的話語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將重點放於譯官，正好通過他們不太高層的身份地位，如何能夠回應朝鮮的社會需要的同時，也能夠揭示著不同的文化交流的面向。

三、 明清易代的譯官不足與社會期盼

譯官的身份在明清易代以後，朝鮮社會面臨各種危機與轉變，有著不同的面貌。胡亂以後，朝鮮可從事翻譯的譯官人數大量減少。如《譯官上言謄錄》之中，²⁴記述無論中央與地方均有譯員不足的情況，紛紛上言向

頁 27a。

²³ 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顯門、李湛編：《通文館志》，〈通文館志序〉，頁 1a。另外，司譯院官員李玄（?-1415 年）早已於明初擔任陪臣，從北京接待明朝前來的使臣，處理有關表箋的問題。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卷 9，太祖 5 年 6 月庚子，頁 9b；另參朴元燾：〈明初文字獄與朝鮮表箋〉，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編輯組編：《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22-538。

²⁴ 關於《譯官上言謄錄》的收藏資料，可參考國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網站：

朝廷要求，加派翻譯人材，故可了解朝鮮在經歷危機後，急需大量譯官從事各一面的工作，可見朝廷增加了他們的需求。像崇德五年（1640 年）的一則上言可見，雖然有部份身份是譯官的官員，但他們不少人是不通漢語的：

……金克仁洪慶俊等，名雖譯學，實不能漢語，以名帶率，無處可用，而金克仁段，猶不可備數是白在果，洪慶俊段，已試其舌，決難帶去是白置。堂上譯官李賢男，堂下譯官李海壽等，請令該曹，急速差送事……兵使越海之行，不可無解語漢譯，依狀啟，堂上譯官李賢男，堂下譯官李海壽等，令本院，急速催促發送，如何？……²⁵

而缺乏能解語的譯官事實將影響到外交關係，像一位司譯院官員指出：「近來，各樣彬業，漸不如舊，而其中譯學尤甚。新進之輩，無意學習，尋常

http://kyujanggak.snu.ac.kr/home/_Print/HEJ/HEJ_NODEVIEW.jsp?setid=544610&pos=0&type=HEJ&ptype=list&subtype=jg&lclass=10&cn=GK12963_00&savetype=print&savesize=7，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編號：奎 12963）。該資料主要記述從該書為 1637 年至 1692 年，即仁祖到肅宗年間，譯官向朝廷上書，表達各種對應及想法的文書，文書之中包括了譯官對人事的需求、待遇改善的安排以及各種關於東亞形勢及貿易問題應對的想法，可被視為朝鮮時代最接近譯官想法的材料。學界採用此材料作研究的學者不多，其中值得參考的包括김남윤（金南允）：〈명자호란 직후（1637—1644）朝淸관계에서 「淸譯」의 존재〉（丙子胡亂以後朝鮮關係中的清譯之存在），《韓國文化》，第 40 期（2007 年 12 月），頁 249-282；然而，該材料採用大量的吏文書寫，沒有吏文訓練的學者與讀者很難了解當中的內容，李賢珠的碩士論文以此作為材料，利用現代韓語翻譯與注解，使今天學界能夠克服語言的困難，能全面地認識及使用該材料，李賢珠於 2016 並將其論文出版。關於此，詳參李賢珠：《역관상언등록 연구——17 세기 조선 외교사를 담당한 역관들의 생생한 기록》（譯官上言謄錄研究——17 世紀負擔朝鮮外交史的譯官們的活現紀錄）（坡州：글항아리[字瓮]，2016 年）。本文將一方面參考原文，並以李賢珠的譯注作對比，下述的注釋均表明李賢珠學位論文。

²⁵ 〈啟請漢學李賢男等帶去事〉，《譯官上言謄錄》，庚辰二月十六日；並參李賢珠：《『譯官上言謄錄』譯注》，頁 38-39。

說話，亦不能曉解。蓋自朝天路絕之後，渠輩生理無門，雖有南北差遣之任，元額不多，不能輪回遍及。通四學累百人口，所仰望者，只是些少祿職、祿遞兒，而緣國家經費不足，累次減省，所存者無幾……」²⁶

譯官過去依靠在朝天之路賺取利潤維持生計，但明清易代後，無法恢復過去的人材足夠，從這些資料顯示朝廷一直憂慮譯官不足日問題。同樣地，為了獎勵任譯者真的能通語言，司譯院亦多番提出要求再次培訓相關的譯官，為的就是好讓譯官並非有名無實，而無法執行職務。當時的國王顯示亦特別關注指：「不解言週之譯官，雖多無用，前期定限試才，不通其言者，盡為汰去，只存若干能言者，可也。」²⁷

在他的關注之下，朝鮮有關方面的官員馬上提出建議：

取考司譯院各學通事，自古訓誨之規，條目非不詳盡，而其有名，而無其實，徒為文具之故，如此而已，則雖往年閱歲，萬無成才之望，必使提調兼教授，每朔之內，或四巡或六巡，開坐本院，試閱本業，而不專主於諳書，必令以日用言語，至相答問，今日通一語，明日通一語，則庶幾有一分成就之望，而毋論祿官、前御、教誨、年少聰敏、被選、別遞兒、上次上通事等級、堂上、堂下，凡不解言語者，並今一體訓習，不通者，施罰一如，榻前

²⁶ 〈癸未五月二十日條〉，《譯官上言謄錄》；並參李賢珠：《『譯官上言謄錄』譯注》，頁 48-50。

²⁷ 〈譯官等試才〉，《譯官上言謄錄》，壬寅八月初二日；並參李賢珠：《『譯官上言謄錄』譯注》，頁 69。

定奪，而試才年限遲速，則令該院商量啟下，宜當……²⁸

有關建議其實象徵朝廷上下相當關心是否有足夠的譯官，原因是譯官的工作與培訓關乎到朝鮮的政治策略、經濟命脈及外交關係，特別是貨物流動，譯官扮演重要的角色，像譯官崔貞弼提到一樣：「御供藥材貿易，其事極重，而該院每以貧寒譯官，勒定差遣為白臥乎所，北京稀貴之藥，不得買來，其勢固然。令本院，參商事勢，無緊遞兒中，一番差遣，似為無妨。此意，分付該院，何如？」²⁹由此可看到，譯官在朝廷眼中的角色是執行一些跨國的貿易任務，故語言的培訓相重要。對於朝鮮來說，培訓足夠可通言語的譯官，可視為表面屈服的朝鮮，作為對清政策的表態，藉譯官的語言才能爭取更多的權益。

從政策面轉移目光到行動面，以朝鮮的士大夫的眼中，譯官的語言知識對他們的使行過程相當重要。以 1721 年出使的李正臣的《燕行錄》為例，當他在北京看到一些陌生的漢字或聽到奇怪的漢語時，他便希望依賴譯官的解釋。³⁰以下的一段引文，就是他希望深入漢語，而向譯官金慶門請教的例子：

²⁸ 〈譯官等試才〉，《譯官上言謄錄》，壬寅八月初二日；並參李賢珠：《『譯官上言謄錄』譯注》，頁 71-72。

²⁹ 《譯官上言謄錄》，庚寅十月初八日。

³⁰ 李正臣在北京時聽到一些叫賣的聲音時，於是請教另一位譯官金昌祚（生卒不詳）有關柴、燒、煤等字眼的漢語及韓語的分別。「北牆外過去胡商，每日朝夕，呼怪底聲而過去，細聽之則曰強자오云云。其聲音每如此，招問譯官金昌祚曰：『此何言也？』對曰：『此處之人朝夕飲食熟設時，不用柴，而但用石炭，故胡商之必於朝夕持此而過去，喚聲求買者，蓋以此也。所謂強자오者，強音買音之誤也，자오者，燒字之意也。若從實言之，則此商當喚買燒煤，而如是誤喚者，此商乃山西人，故語音如是謬誤云，吾又問曰：『買燒煤之煤字，何義也？』對曰：『煤炭之煤也云云。』」關於此，詳參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15b-16a。

吾又謂金譯曰：「漢語之尋常言語，吾不知，甚沓沓，願聞之，汝坐而言之。」吾乃發問曰：「天字何音也？」金曰：「與我國同音。」吾問曰：「地字音，何以呼之？」答曰亦同云。問曰：「아비를何以呼之？」答曰：「父親云。或曰：여애云，여애者，爺爺也。或曰，나오嫗云，나오대者，老大也。라오二音，以字書之，則但是老字也。」問曰：「어미를何以呼之？」答曰：「早親云，漢語之早者，乃母字音也，又漢語中呼母，不敬之稱曰媽媽云，其音마마也。」問曰：「한아비를何以呼之？」答曰：「主父云，漢音以祖稱主。」問曰：「아자미를何以呼之？」答曰：「若伯叔則曰버父云，漢音以伯爲버也，季叔則曰누누云，漢音以叔爲누也。」問曰：「아미를何以呼之？」答曰：「若伯叔之妻，則曰버낭云，버者，伯音也。낭者，娘音也。若季叔之妻，則曰신무云。신者，孀者之音也，孀母者，季叔之妻也，무云者，漢音以母音謂母也。」問曰：「한미를何以呼之？」答曰：「主母云，漢音以祖音謂主，母音謂母也。」³¹

從此可見，明清易代以後，譯官因需要為使臣擔當翻譯，自然需懂得漢語，故各種詞彙如何翻譯，還是需要作出培訓，以應付使行所需。而譯官金慶門卻可滿足到使臣的需要，符合到朝鮮社會對漢語譯官的職責期盼。然而，進一步值得思考的是，朝鮮立國以來，如何設立翻譯機構及制定語言培訓方式，訓練適合的漢語譯官，以符合及滿足上述士大夫及朝廷的需求以及各種的社會期盼。

³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16a-16b。

四、譯官教材《伍倫全備諺解》、《象院題語》的翻譯規範

朝鮮譯官，特別是本文關注的漢語譯官，需要閱讀怎樣的材料他們才可掌握不同的資訊。這些教材包含的文本，讓譯官需要閱讀，其實可理解為朝鮮社會與文化所建構的翻譯規範以及社會期盼。朝鮮朝廷對譯官所需擁有的翻譯知識、文化及所需採取的策略，通過提供各種教材，及要求他們閱讀並掌握，以符合社會對譯官的期盼，為朝鮮在對外交涉過程，以語言及文化知識，爭取各種有利朝鮮權益。因此，通過了解譯官所需閱讀的教材，特別是《伍倫全備諺解》、《象院題語》兩本書籍，為漢語譯官獲取關於使行必須相關知識的教材之一。

據《世宗實錄》，朝鮮朝廷最早採用作為漢語譯官取才之用的書籍，包括：《書》、《詩》、四書、《直解大學》、《直解小學》、《孝經》、《少微通鑑》、《前後漢書》、《古今通略》、《忠義直言》、《童子習》、《老乞大》、《朴通事》等。³²據梁伍鎮對比《經國大典》、《通文館志》等材料的整理，將這些材料分為五類，即經書、史書、吏文、法制、譯語等：

種類	朝鮮譯官使用的教材
經書	詩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
史書	小微通鑑、前後漢書、古今通略、忠義直言等
吏文	吏學指南、吏文謄錄、事大文書謄錄、製述：奏本、啟本、咨文
法制	大元通制、至正條格、御製大誥、經國大典等
譯語	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學、直解孝經、五倫全備等

圖表 2 朝鮮王朝譯官的學習教材³³

³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14 冊，卷 47，世宗 12 年 3 月戊午，頁 28a。

³³ 改寫自 양오진：《漢學書研究》，頁 54。

如觀察譯官學習的教材，可以發現譯官的學習不單純是語言上的認識，也需要兼顧經史，也要對當時的文書與法制有基本的認知，相關的原因可追溯至太宗時期司憲府對譯學的觀察以作出的建議：

近來司譯之學，但習漢語，以不知經史之學，朝廷使臣有語，及史則懵然不知，失於對應，深為國之所羞。願自今，擇善於漢語而明經學者，為訓導官，敦諭後進，博通譯語，詳明經學，以達朝廷使臣之意。³⁴

從此譯官除了語言資訊學習外，也希望他們能夠掌握一些經史之學，以便對應，故可見朝鮮的譯官訓練不限於像《老乞大》和《朴通事》等的口語訓練，³⁵也同時包括一些儒學知識或使行所需的原則。後來提供予譯官學習的《五倫全備諺解》，便是為培訓譯官有相當經史知識水平的教育的教材。

《伍倫全備記》原是明人丘濬（1421-1495 年）所寫的戲曲，³⁶丘氏為明朝

³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 8，太宗 4 年 8 月己丑，頁 4b。

³⁵ 16 世紀時，崔世珍獲委派將《老乞大》和《朴通事》翻譯為諺解版，一方面作出了當中的語音修正。當中以《老乞大》為例，先後經歷 1670 年的邊暹（1631 年-？）、朴世華（1637 年-？）的版本和 1745 年刊行的申聖淵（1690 年-？）、卞燾（1694 年-？）的版本，在漢語部份與崔世珍版本並無差異，但是在諺語上作出各方面的修正，以配合時代的需要。此例說明在 17 世紀以後，《老》、《朴》二書還是譯官學習口語對答的主要材料。

³⁶ 在研究戲曲學界，大家對作者是否丘濬有所爭議，但據高建旺的整理，他指出：「筆者傾向於丘濬，原因有五：1.奎章閣藏本《伍倫全備記》序中有『赤玉峰道人所作《伍倫全備記》三卷國朝赤玉峰道人瑯台丘濬撰』；2.《百川書志》著錄《伍倫全備記》與奎章閣藏本《伍倫全備記》相似點甚多，而奎章閣藏本《伍倫全備記》的發現正是好多懷疑丘濬是該記作者的有力證據等……(從略)」所以，本文按高建旺的想法，視丘濬為《伍倫全備記》的作者。關於此，詳參高建旺：〈意識形態的戲曲樂化——《伍倫全備記》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84 期（2014 年 11 月），頁 152-153；並參李焯然：〈通俗文學與道德教化：明代傳奇《伍倫全備記》與韓國漢文小說《彰善感義錄》探討〉，氏著：《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23-125。

一代官員及士大夫，曾任職於文淵閣大學士，³⁷學者大多分析該書的成型時，均強調他對於以戲曲傳道，特別是三綱五常與理學的內容，而當中戲曲的內容相當豐富。簡單來說，伍倫全備記是說太平郡首伍典禮的伍氏家庭故事，三子在繼室范氏撫養下，各種倫常道德故事，如伍典禮的長子被胡人所俘時，寧死不屈感動到胡人的故事。³⁸由此可證明，該書有強烈的三綱五常勸化的倫常道德的意識，故事與文體方面亦與《老》、《朴》二書有所不同。

本文所觀察的是《伍倫全備諺解》如何被應用為朝鮮王朝譯官所採用的學習教材。雖然今天沒有史資料說明《伍倫全備記》何時傳入朝鮮半島，但是學者們留意到朝鮮景宗即位年（1720 年），該書已被諺譯，並有漢字註釋各種字詞。³⁹而該書於 1746 年的《續大典》之中規範為朝鮮漢語譯官的考試材料之一，可見《伍倫全備諺解》當時也是朝鮮政府認為有助於譯官學習當時漢語的書籍。⁴⁰

據譯官高時彥（1671-1734 年）撰的序提到：⁴¹

³⁷ 關於丘濬的研究，詳參李焯然：《丘濬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³⁸ 高建旺：〈意識形態的戲曲樂化——《伍倫全備記》論〉，頁 155。

³⁹ 據《通文館志》載：「伍倫全備諺解本，康熙庚子教誨廳官等纂修以納。」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8，〈書籍〉，頁 8b。

⁴⁰ 李焯然：〈通俗文學與道德教化：明代傳奇《伍倫全備記》與韓國漢文小說《彰善感義錄》探討〉，130-131。

⁴¹ 高時彥應為該書的校正者之一，而高時彥在序中亦提到：「自丙子歲，本院命若而人撰修諺解未幾廢輟，越至己丑復令教誨廳官等賡修，而累年聚訟就緒無期，逮夢窩金相國（註：金昌集[1648-1722 年]）領院另加獎掖頻復，提命至其釐訛質疑之，最難者多所稽考以相其後，由是遂不住手以庚子秋告訖。凡句讀之，解訓義之，釋無不備矣，相國暨而嘉之，而前銜劉克慎等自請捐縉刊布，仍令不佞等益加校正以印之，於是諸人屬不佞為文

中華之語，天地正音，國無內外，所當通曉。況我東世謹俟
度辭令繹續則華語為重，又非諸象鞮之比而已故自 祖宗朝每令
文士質語于 中朝。今其責在譯院，有本業講肆之方，而其字母
清濁之辨，齒舌闔闢之用，古今雅俗之別，皆有妙理，非以方諺
繙釋，則莫得以盡其形容，而使人易曉，此本業之不可無諺解者
也。本業三書初用《老》《朴》及《直解小學》，中古以小學非漢
語易以此書，蓋其為語雅俚並陳，風諭備至，最長於譯學，而老
朴則前人皆已奉， 教撰諺解為後學南針。獨此書口耳傳來，師
說互殊，訛謬胥承物名語類又多，難曉虞學者病之。⁴²

過去漢語譯學者一般以老、朴二書為主要教材，並兼讀《直解小學》，但朝
鮮後期因《伍倫全備記》：「雅俚並陳，風諭備至」，朝鮮譯官通過此書了彌
補《老》、《朴》二書不足。原因《伍倫全備記》包含了既雅亦俗，又有強
調儒家禮儀思想的逆明。而高時彥特別強調一般譯學書主要與《老乞大》
與《朴通事》性質相近而出版，但《伍倫全備諺解》對譯官的重要性卻是：

華語異於方言，專用文字，文皆有義，字皆有訓，若昧其義
難通其話況，此編以丘瓊山之賅博，所引用多出於經史百家，語
意深奧文義講究，尤不可闕故茲致意於註釋。⁴³

序其顛末……」從中可見，金昌集倡議，並由劉克慎等贊助印刷，而由高時彥本人作最後
的校正，故高時彥則以序解釋本書出現的來龍去脈。關於此，詳參高時彥：《伍倫全備
諺解》（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5年），卷1，〈序〉，頁1b。

⁴² 高時彥編：《伍倫全備諺解》，卷1，〈序〉，頁1a-b。

⁴³ 高時彥編：《伍倫全備諺解》，卷1，〈凡例〉，頁1a。

《伍倫全備諺解》的示例，華語的文字皆有意義，而《伍倫全備記》原文因滿載三綱五常故內容使文義變得相當複雜，故編者認為有其必要將《伍倫全備記》進行諺解，以協助譯官懂得與掌握各種文字內容。而此亦說明採用《伍倫全備諺解》作為翻譯教材的意義，也可看見當中有複雜的語言與文字，也解釋到漢語或華語需要作出各方面的註釋，才能理解發音該詞的意義。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出發，掌握語言的同時，也需掌握文本背後的意義與文化。而事實上儒家倫理道德的《伍倫全備記》符合當時朝鮮社會，特別是丙子胡亂後，理學與中華思想高漲的時代，這樣編寫而成的書籍符合當時朝廷的期盼。⁴⁴故譯官們將之翻譯為諺解版作為後來譯官的教材，也可說明與當時朝鮮朝廷對譯官的社會期盼相關。因朝鮮士大夫對於理學的見解越趨深化，即使在翻譯教材之中，亦有相關的投射，使譯官的語言掌握，亦需建基於儒家的道德倫理之中。

如《伍倫全備諺解》在朝廷官員的意向直接投射，而司譯院譯官自行編寫與官方有版印的《象院語題》在折射的是，朝鮮社會以及事大政策等因素如何建構譯官的角色與身份。在語言培訓中，看到朝鮮社會對譯官的期盼。因為在《象院題語》這本書中，與上述的譯官教材所不同，這為反映職務的一本譯官教材。

據李在弘與朴在淵老師的介紹，《象院題語》是一本以介紹朝鮮對明關係中，所涉及的使行程序與儀式的書籍，而這書並非使用文言文，而是使

⁴⁴ 在高時彥的序中提到是金昌集建議，並加獎譯官鼓勵此書出版而成的，金昌集當時被稱為「相國」，代表的朝廷決策層，也是士大夫的代表，故可由此理解為諺解本是當時朝廷對於翻譯需求而所需編撰的。關於此，詳參高時彥：《伍倫全備諺解》，卷1，〈序〉，頁1b。

用當時北京流行的白話作紀錄，⁴⁵也可被視為一種中國資訊的參考書。⁴⁶該書現存於不同地方的檔案館，如木版本則可見於（1）韓國的，首爾國立大學的奎章閣（奎 7493/8600）、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藏書閣（2-4181）、國立中央圖書館（b1 2709-1）、漢陽大學校圖書館（915.2-상 653）、成均館大尊經閣（C14B-0059a），（2）日本的，東洋文庫（VII-1-39/VII-1-39 複）、小倉文庫（L44758）、東京外大圖書館（K-IV-9）、天理圖書館（2922-3629）等，而筆寫本則分別藏於韓國的國立中央圖書館（BA091-3）、日本的小倉文庫（L44759，L44760）、中國的遼寧省立圖書館（000220，朝鮮史編修會鈔本）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⁴⁷

然而，不同《象院題語》的版本，均沒有明確的日子交代，而這書的內容亦沒有提及到具體的成書日期，而且亦沒有如《老乞大》等有明確的時間性史料說明。然而，從書中內容顯示，可以肯定是曾用於明朝間，其所採用的字眼，包括了「帝都」、「天朝」等等，這些字眼在清人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後，在朝鮮材料中，幾乎不會出現，故可肯定該書必定成書於明朝。而專門記載司譯院職責及工作的《通文館志》曾有兩項資料，可顯示

⁴⁵ 如以《象院題語》之開首內容作例，即〈帝都山川風俗〉，可看見書中內容以白話撰寫，與一般常見的朝鮮官方文書，以文言撰寫大為不同：「皇城北邊有天壽山，西邊有西山，中有萬歲山。萬歲山是造的山，那山上有廣寒樓，是北京城的鎮山，離京一百里地。」關於此，詳參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10年），頁3。另外，該叢書供收錄了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所收錄的兩個版本，而且亦有其他之材料，可是為了研究的完整性以及本文目標非在於字詞之變化及版本問題，除了特別列明，全文所引之《象院題語》均以該院所藏之版本（編號：奎 8600）為準。

⁴⁶ 李在泓、朴在淵：〈奎章閣 所藏 譯學書 『象院題語』에 대하여〉（關於奎章閣所藏譯學書《象院題語》），《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4號（2010年10月），頁553-573。

⁴⁷ 關於《象院題語》之原始資料的分佈，可參考遠藤光曉等編：《譯學書文獻目錄》，頁152。

出該書應成書於明朝中葉，並於清朝仍有流行運用。

《通文館志》卷7〈人名〉的「南好正條」中載道：「南好正，能文下筆立就，更不加點而辭意備悉，且於馬上急報文狀，細書成文，凡文字一覽輒記，嘗隨節使赴京時，門禁甚嚴，不通柴水，使臣欲令共撰乞解門禁之文，書狀官：『呈文令譯官構草，不亦羞乎？』自撰文成，多有不愜處，使招公問如何，對曰：『若用此文，非但所請不成，且被嗔怪。』仍代撰手不停筆，一揮而就，使稱其切實，其文今載《象院題語》，然恃才驕，竟坐言辭被禍，出《象胥故事》。」⁴⁸雖然至今沒有足夠史料論證南好正的生卒年，⁴⁹但是從《朝鮮王朝實錄》之中，可以看見南好正在於壬辰倭亂期間，多次擔當譯官，與中國軍隊協調。⁵⁰故此，可以推斷的是《象院題語》的內容必定於明朝末年有使用的跡象，因南好正的事蹟記載於宣祖期間，說明了該書的出版時代。

另一方面，據《通文館志》卷8〈書籍〉一項，也特別記載了，「象語題語一本」的記錄，⁵¹在「什物」條中亦記有「象院題語板」，注云：「康熙庚戌以鑄字印行，己卯濟州譯學吳震昌刊板輸納。以上板材藏於大廳兒

⁴⁸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7，〈人物〉，頁410-411；關於《象院題語》記載南好正的事宜，見於該書中的〈門禁白活〉，是說明中後期，朝鮮士大夫不獲安排四處遊走的事情。詳參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22-24。

⁴⁹ 李在泓、朴在淵：〈奎章閣 所藏 譯學書 『象院題語』에 대하여〉，頁559。

⁵⁰ 南好正其中的工作紀錄，可參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宣祖25年12月癸卯，頁21b；並參허태구(譯：許台九)：〈임진왜란과 지도·지리지의 군사적 활용〉(壬辰倭亂與地圖、地理志的軍事運用)，《사학연구》(史學研究)，第113號(2014年3月)，頁188。

⁵¹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8，〈書籍〉，頁8b。

房上藏書樓。」⁵²由此可知，濟州譯官吳震昌（1661 年-？）將有關材料複刻，故可見《象語題語》一書曾被使用，並傳播到朝鮮社會不同地域，供不同譯官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在奎章閣的《象院題語》的各個版本之中，其中有一版本（奎 7493）有紀錄：「初授副奉事再除僉正」。⁵³可引證的是下至最普通的譯官副奉事到較高層的僉正也會獲得該書作閱讀。⁵⁴在官方的文獻之中，並沒有其他更精準的資料，說明譯官是否需使用該書作應考，但從以上材料的整合，幾可肯定漢語譯官，或會有機會接觸《象院題語》一書，作為學習漢語的閱讀材料之一。

《象院題語》有助我們了解當時的譯官所需要掌握的知識。按汪維輝等人的解題，內容大致可分為五類，分別是（一）關於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山川風物、名勝古跡的；（二）有關明朝制度的；（三）有關赴京使朝貢事宜的；（四）有關朝鮮本國資訊的，⁵⁵以及（五）一個不能分類在上述內容的，記載了南好正的〈門禁白活〉故事。⁵⁶而事實上，如若將譯官的工作與這些材料之間對照，就能發現《象院題語》全書，正是譯官在北京工作時需負責的工作或是面對的環境，而所需要學習的中國有關的文化與知識。

⁵²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8，〈什物〉，頁 7b。

⁵³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

⁵⁴ 據李、朴二人認為，該藏之書曾被用於執行日常職的副奉事，再及後轉交較高級的僉正。雖然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出使北京的譯官參考與學習的譯學書。

⁵⁵ 這樣分類來自汪維輝等編定的解題，詳參汪維輝、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編：〈《象院題語》解題〉《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上冊，頁 3。

⁵⁶ 汪維輝、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編：〈《象院題語》解題〉，上冊，頁 3-4。

在《老》、《朴》、《伍》等書欠缺關於使行期間禮節的口語對話，但在《象院題語》之中，卻可見到不少的記述。雖然該書與其他教材不同的，是沒有諺解本，但似乎該書重點不是培訓譯官的語音，而是相關的文化知識，其中又以禮儀尤為重視。朝鮮社會對於人稱之稱呼，禮與不禮等關於禮節問題相當關心，因為他過去參與朝天或燕行時，主要參與禮節活動，身份上代表的是朝鮮。⁵⁷朝鮮作為「禮義之邦」，如在燕行期間被中國方面認為不合禮以及不合時宜時，則會對於朝鮮的朝貢地位，有著重大的影響，也對於朝鮮朝野上下帶來重大的衝擊。⁵⁸故某程度上，朝鮮朝廷相當依賴譯官能夠掌握各種禮儀知識，因為朝鮮譯官背負著不只是單單的語言翻譯，也是文化認同及東亞世界地位的關鍵。

在《象語題語》之中，亦讓譯官們學習到有關朝貢期間，他們所需要對應的部門以及工作人員，除了「筭手」、「催車」等這些禮儀活動過程中會碰上及交流的中國方面官員背景及職能有所說明外，⁵⁹例如〈考夷語〉中，譯官們亦會了解到禮部方面的序班——即天朝所派遣的翻譯人員，其形象是會帶有冠帶和帶上「牙牌」的。⁶⁰又例如〈光祿寺酒飯〉，是專門介紹接待上馬宴及下馬宴安排的部門——光祿寺，⁶¹〈鴻臚寺大通事〉專門與朝

⁵⁷ 羅樂然：〈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才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頁 125-126。

⁵⁸ 關於事大使行過程中，關係到各種行為或會影響到朝鮮「禮義之邦」之名的問題，可參考夫馬進：〈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外交中的「禮」和「問罪」〉，頁 291-292。

⁵⁹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19-22。

⁶⁰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18-19。

⁶¹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12-13。

鮮使節交涉的中國官員等等，⁶²可見，《象院題語》是協助譯官認識中國禮節及相關制度的重要工具書。除了不同的涉及見面的官員及工作單位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聖節千秋冬至演禮〉，這篇正介紹燕行使團前往北京時的不同時間的禮儀所進行的不同禮節及安排，由於使團成員需參與上各種禮節活動，故無論譯官還是使團成員，都有必要了解有關的情況。⁶³

聖節、千秋、冬至的演禮，在前聖節是靈濟宮，千秋是慶壽寺，冬至是朝天宮。如今慶壽寺燒火，重修又燒火了，靈濟宮是齋戒的宮，不許演禮了，因此都到朝天宮行了。演禮的規矩，比這裡一般。朝天宮院落裡，文武千官分東西朝北站住，左右串廊簷下，糾儀御史排行站在後頭，錦衣衛校尉也是排行站住。又有教城司的樂工每穿著斑斕之衣，拿著各樣樂器站住，這們整齊後頭纔行禮。行禮的時節，鴻臚寺官叫班齊，千官每咳嗽後頭，鳴鞭三遭後頭動樂，千官每行五拜三叩頭，作揖三舞蹈，跪下聽三呼之聲，千官每行五拜三叩頭，作揖三舞蹈，跪下聽三呼之聲，千官每一時叫「萬歲萬歲萬萬歲」。這般三遭後頭，又行四拜，禮畢後頭，次兒出來。⁶⁴

此外，在與禮部官員接見時，大家如何安坐也是一個大學問。〈禮部坐起節次〉正說明了這一點。

⁶²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13-14。

⁶³ 趙冬梅：〈朝鮮時代漢語教本《象語題語》的編寫特色〉，《中國學論叢》，第 33 期（2011 年 8 月），頁 4-5。

⁶⁴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5-7。

三位堂上、四司郎中、員外主事，各有火房。退朝後頭，不論前後進來，各在火房裡歇一歇。都到的齊了呵，一個外郎打雲板，高聲說「坐堂，坐堂」，郎中以下都是正堂簷下伺候，堂上每出來作揖，各位裡坐定，郎中、員外主事、觀政進士，進前作揖，堂上也舉手，歷事監生、辦事官也這般行禮。當該外郎們到月臺上禮畢後頭，一個外郎拿著卯簿，就堂上根前受押，郎中以下到那裡畫押。畫押便一個皂隸拿著投文牌出來，大門外頭饋人看了，一個投文的、呈狀的、口詞的，跟牌進去，院落裡跪下呈狀，一個外郎收拾，稟堂上打印了，送下司務廳，司務廳查看，四司裡分送，教他稟堂上行公事後頭，一個外郎叫說「堂事畢了呵」，堂上還入火房，郎中每各司裡下來。⁶⁵

在儀式上，各官員坐下的位置，人與人之間碰面時的禮儀，表面看來並非特別事情，但是放置在朝鮮在明清時代的脈絡之下，這些行為就是「事大以誠」的表現，而活動的過程，外界對朝鮮人的形象，則從這些小舉止以及儀式的表現之中呈現。⁶⁶當然飲食也是重要的關鍵，故在《象院題語》也說明了上下馬宴時的安排以及應注的禮節，⁶⁷以及在遼東地區的宴會的禮儀，也有所記載。⁶⁸可見，對於朝鮮人而言，他們甚為著緊這些活動，特別這些活動當中涉及的禮儀，故在《象院題語》之中，為了滿足當時社

⁶⁵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16-18。

⁶⁶ 《象院題語》記述關於門禁的問題時，亦特別提到「本國雖在海外素守禮法，敬事朝廷，無不盡心。朝廷也優禮厚待比海內王府一般接待。」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22-23。

⁶⁷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6-48。

⁶⁸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8-49。

會對於譯官的期盼，《象院題語》的編寫者對於當時國家的需求，而特別設計的教材，是希望譯官能夠可以了解並解決到使華期間使團成員將會涉及的禮節相關事務。

除了官方的禮節活動及程序安排外，《象院題語》之中，亦涉獵到北京城內的風景，作為教材，其中其開首第一篇就是〈帝都山川風俗〉：

皇城北邊有天壽山，西邊有西山，中有萬歲山。萬歲山是造的山，那山上有廣寒樓。天壽山是北京城的鎮山，離京一百里地，永樂以後，皇帝皇后的墳都在這山裡。東有潞河，南有蘆溝河，西有西湖，也有玉河。風俗是比本國，三綱五常都一般，只有醜風俗，和尚道士得官隋，動樂送殯，父母沒了呵，停屍在家對客喫酒，這等風俗看的不好了。⁶⁹

又可見到該書亦具體說明了北京其他的景點，包括了北京八景、⁷⁰天壽山、⁷¹國子監、⁷²夷齊廟、⁷³醫巫閭山等等，⁷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子監，《象院

⁶⁹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3-4。

⁷⁰ 北京八景又名燕京八景，歷朝因語言採用有不同的名稱，但實際上所指之地方還是一致。按《象院題語》之排序分別如下：「蘆溝曉月、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晴波、瓊島春雲、薊門煙樹、西山霽雪、金陵夕照」參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39-40。

⁷¹ 天壽山是朝鮮使臣經常前往拜訪之地，如曾擔任朝天使書狀官的李民宥（1570-1629 年）之文集《敬亭集》之中的〈朝天錄〉便曾紀錄了他前往的經歷，也題了〈劉德徵上陵還有贈〉：「帝鄉空望白雲歸，聞道仙郎肅寢扉。天壽山前連御路，黃花鎮北控皇畿。神臯蔥鬱垂玄佑，玉殿森嚴象紫微。獨有侍臣餘白首，淚霑園草正霏霏。」關於此，詳參李民宥：《敬亭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901-903，卷 5，〈朝天錄〉，頁 16a-b。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0-41。

⁷²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1-42。

題語》之中，特別把國子監與成均館作比較，並說明實際上國子監「是天朝太學館，比這裏成均館一船（般）」。⁷⁵可見，朝鮮譯官需對北京不同景點與環境有一般的理解。

《象院題語》特別有不少篇幅介紹了北京的風景之地，例如提及天壽山是「千峰萬壑，爭高奇妙，皇都第一箇名山」，⁷⁶又指醫巫閭山所在地是「天下北鎮山，那山上有聖水盆，天寒不凍，又有仙人巖在前……」，⁷⁷這些材料出現在《象院題語》這本漢語教材，相信因為這些地方均是朝鮮士大夫出使北京時，曾參觀及體驗的地方，故譯官可透過掌握相關地點的背景資料，有助介紹給使團成員了解有關地方的景象及文化。如喜愛小說的李承召（1422-1484 年）擔任朝天使團成員時，⁷⁸在購買《大明一統志》，從書肆間留意到關於北京八景之地，雖然他未有親自到訪八景，但仍特別題有〈次北京八景詩〉，表達其對風景之讚嘆。⁷⁹一些晚明的使團成員，如金尚憲（1570-1652 年）的《朝天錄》中包括了〈燕都八景〉，⁸⁰金地粹

⁷³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51-53。關於朝鮮士人與夷齊廟這個地方之間的關係，詳參王元周：〈夷齊論與朝鮮朝後期政治〉，《韓國研究論叢》，第 25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28-147。

⁷⁴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53-54。

⁷⁵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1-42。

⁷⁶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40-41。

⁷⁷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象院題語・華夷譯語》，頁 53-54。

⁷⁸ 關於李承召對小說的興趣研究，詳參崔溶澈：〈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中正漢學研究》，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335。

⁷⁹ 李承召：《三灘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11，卷 8，〈次北京八景詩〉，頁 10a-12a。

⁸⁰ 金尚憲：《清陰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77，卷 9，〈燕都八景〉，頁 31a-32b。

（1585-1636 年）於 1626 年所撰之《朝天錄》中亦記有〈燕都八景〉，⁸¹金德承（1595-1658 年）的《天槎大觀》中同樣有記述北京八景的題詩。⁸²雖然譯官與使臣具體的對話未見相關的八景圖介紹，但是用此連結下來，相信《象院題語》的設計緣起，考慮到使臣對八景的好奇，已有所收錄，使譯官既學習當中的語言同時，又可掌握這些景點的具體知識與文化，有助使行成員對中國有更多的認識，故《象院題語》有不少的篇幅，羅列北京城內外各景點的具體地點及相關知識，與燕行使行參觀習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見有關的知識掌握後，可滿足參與使行的士大夫在北京的種種好奇。

過去學者大多視《象院題語》為一種了解明清時期漢語的語學材料，或是外語教材的例子來認識，卻忽略了在朝鮮王朝對中關係建構過程中，譯官擔當的角色，而司譯院有必要有合適的教材培訓譯官。因此，透過以翻譯規範作為學術概念的切入，來考慮當時朝鮮的國家政策與社會文化的規範之下，編寫教材的譯者為了滿足到國家機構、接受者的需求，而設計出一份如《象院題語》一般，不但兼及譯官所需的語言內容，而且教材的內容是按照社會的需求與規範而編成的。翻譯研究者採用 Toury 時的想法時，可以看見譯作以及文化接受的過程之中，社會產生的規範如何決定翻譯的形態與生產過程。⁸³徐正居在《譯官指南》的序曾寫道：⁸⁴

⁸¹ 金地粹：《苔川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7 年），冊續 21，卷 2，〈朝天錄・燕都八景〉，頁 23a-26b。

⁸² 金德承：《少菴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續 27，〈雜著・天槎大觀〉，卷 2，頁 51b-52b。

⁸³ 這些想法被 Edward Gentzler 與 Theo Hermans 進一步採用，詳參 Edward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05-9, 114-25;

人生天地之間，囿於形氣之中。既有形氣，斯有聲音。然四海八荒之天，風氣不同，故語音亦異。吾東邦自殷太師受封以來，禮樂文獻，倖擬中華。但語音不得不局於風氣，是可嘆已。欽惟皇明馭宇，文軌攸同，我國家聖聖相承，至誠事大。⁸⁵

因此透過翻譯規範來重新闡釋《象院題語》之內容，可了解到漢語教科書關於前往中國的使行知識的建構，⁸⁶是如何受到朝鮮社會的期盼而影響到，而讓朝鮮譯官能夠有效地解決各種使行上的問題及工作安排，滿足各方面的期盼。《象院題語》等漢語教材讓譯官了解到禮節性的知識，也了解到赴華期間涉及的風俗文化，譯官們閱讀《象院題語》時，有關知識有助在參與使行活動期間有效處理各種問題。這些知識並非自然而生的，因為涉及的不少都是社會風俗、技術性及禮節性的問題，而這些知識在四書或五經未必能體現出來，是考慮到有關的知識與士大夫掌握的知識與文化是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領導使團的燕行使者往往都會將有關的知識忽略，編寫者特別考慮到這些因素，而將譯官所需的語言知識，結合在他們需要面對文化及禮節場景，這一點無疑是過去單純的研究中未必能可以窺探的現象。

Theo Hermans,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 R. Al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25-51.

⁸⁴ 此書已失傳，無法了解具體的內容是什麼，故不能在本文之中引用及討論。

⁸⁵ 徐居正：《四佳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0-11，卷 4，〈譯語指南序〉，頁 31a-32b。

⁸⁶ 當然，除了教科書外，譯官的各種經歷，如多次派往中國地區參與中朝邊界事務，又或是於朝鮮邊界擔任外任官（全國如黃州、平壤、義州等北部地區、釜山等南部地區均有所需語言的譯官駐守）等等經歷，都對於提昇他們的漢語水平及掌握更多不同種類的中國相關知識有莫大的幫助。

故本章旨在以翻譯規範的概念來梳理各種漢語教科書，特別是《伍倫全備諺解》和《象院題語》在朝鮮社會與譯官之間關係，甚至是東亞世界互動的重要性。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出發探討，特別是在以漢字中心的文化交流圈內，雖然漢字的存在解決了很多文化交流的不便，但是語言還是一障礙。因為不少交涉活動不能夠單以筆談或漢字交流，而且使行實際上有很多的複雜的禮儀要求，故需要譯官在不同場合的介入。而朝鮮王朝實際上需要依賴他們作履行「事大以誠」國家政策的重要棋子，故透過編寫各種規範性的語言內容、儒家倫理知識等來培訓譯官，讓他們可掌握相關的知識，應對各種對外交涉期間的活動。由此可見，朝鮮王朝的政治、外交考慮投放在對外翻譯的培訓之中，通過翻譯規範的觀念，觀察《象院題語》、《伍倫全備諺解》等漢語譯官的教材，除了說明朝廷在培訓譯官能有口語溝通的訓練外，也充實了譯官在文化、政治、外交禮儀等方面知識，以確保他們在使行之中仍能符合朝鮮朝廷的社會與文化期盼。

五、 小結

通譯的歷史近年日漸被翻譯研究的學者所重視，2016年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的出版，反映不同學術與地域背景的學者開始有意識探討通譯、譯員、譯官等在不同的歷史場景所飾演的角色，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下，如何了解通譯過去的存在以及有關的角色對當今翻譯研究的意義。⁸⁷Jesús Baigorri-Jalón（譯：賀蘇斯·白格里）和 Kayoko Takeda（武

⁸⁷ Jesús Baigorri-Jalón & Kayoko Takeda, "Introduction,"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ed. Jesús Baigorri-Jalón & Kayoko Taked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vii. 如 Pöchhacker 亦認為歷史是當今通譯研究最重要的新話題，Franz Pöchhac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72.

田珂代子)指出了一點研究通譯歷史的重要,「如果歷史是過去的詮釋,而通譯的歷史或就是通譯的詮釋。通譯的歷史也許就可以被理解為對過去的具體解釋或是詮釋此專業範疇的歷史。」⁸⁸因此,通譯的歷史及其背景值得我們更具體的深究,像 Kayoko Takeda (武田珂代子)與 Jesús Baigorri-Jalón (譯:賀蘇斯·白格里)提到一般,他們基於 Anthony Pym (譯:安東尼·皮姆)的想法指出研究通譯者歷史時應注意他們所身處的背景:

研究通譯者的媒介作為溝通的促進者以及文化衝擊的庇護需要考慮以下數點元素:所獲得的文化與語言技巧,通常都是通過他們的社會背景自然所得的,例如居住或成長於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空間以及遠離或移民的脈絡(有時是因為工作需要的搬遷);培訓(通常是在工作期間)以及招募(高層或權威通常不考慮條件,但期望他們效忠於僱主);履行職責的言行舉止(有時需要在不同地域活動、預設各種風險以及各種職責上的表現。⁸⁹

本文將此想法放置於朝鮮與清朝之間對外交流的脈絡,可以了解若要全面

⁸⁸ 原文:「If history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is, as it we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history could thus be understood as a specific explanation of the past or as the history interpreting trade or profession.」Baigorri-Jalón & Takeda, "Introduction," x.

⁸⁹ 原文:「An examination of interpreters' agency as facilitators of communication and shields against cultural shock would demand consideration of a series of elements, including: the acquisition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kills, often a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ir social backgrounds, such as growing up or living in multilingual/multicultural settings and diasporic or migration contexts (sometimes work-related dislocations); the training (frequently "on-the-job") and recruitment of employment (where seniority or power were not always fully dependent on qualifications, but often on loyalty to the employer);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sometimes requiring geographical mobility, the assumption of risk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 variety of functions.)」Baigorri-Jalón & Takeda, "Introduction," x.

地研究朝鮮譯官作為文化的對外促進與溝通者，需要認識他們如何在社會與文化的背景之下形成了他們的身份，並獲取各種與其工作相關的文化與語言知識，同時也可了解朝鮮王朝以及他們本人如何在明清易代以後的社會期許，故特意說明朝鮮外交國策、社會制度以及翻譯規範如何塑造譯官擁有相關的知識及能力，促使他們成為促進中朝文化交流的媒介，亦藉此能以更全面的角度認識朝鮮漢語譯官在中朝關係史上翻譯、文化以及外交上的意義。

第四章

善爲周旋——朝鮮漢語譯官對清活動的職掌與禮儀履行

一、 引言

清朝入關以後，按照明朝舊例，與朝鮮透過禮儀作為兩國關係細致的規定及交往的形式。人際如何交流，物品如何交換，在文化史的觀念下，一直得到不少學者多方面的關注，但卻忽略了禮儀制度在明朝立國以後的意義。禮儀並非如一些學者認為「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¹而禮儀程序的制度、詳盡背後不只是一些繁文縟節，而是禮儀如何連結到國家的社會與身份，朝貢國如何選擇與遵守。但是，朝貢國怎樣遵守各種禮儀，過去學者均所忽略，但這些內容卻可幫助我們更能了解朝貢國之間如何看待國家的地位或思想的形態。

自明朝建構更嚴密的朝貢禮儀制度後，朝鮮在中國的各種文獻論述，不單被視為其中一個朝貢國，更是高度認可為各個朝貢國之首，這歸功於他們對禮儀的重視。因此，當探討朝貢禮儀的落實過程的相關課題，不應局限於理解禮行執行的經過，而應從朝貢禮儀的建立過程了解不同朝貢國的目標，而同時亦驅使宗主國對朝貢國的認可。本章透過這樣的想法，女以說明朝鮮在履行朝貢職責的過程，特別是明清易代後的文化觀重構以後，

¹ 栞凡曾提到：「我們不厭其煩地引用了大段的史料，目的是想從形式和內容上表現中朝朝貢制度完善到怎樣的程度，至於跪幾次、拜幾次，在今天的研究中並沒有甚麼重要的意義，只想說明明朝對朝貢的禮儀程序的規定十分細致的……」無疑朝貢過程的禮儀繁雜，而且不少都是重複，但是禮儀之中可以體現的文化意涵比栞凡想像的多很多。關於此，詳參栞凡：〈明代中朝朝貢禮儀的制度化〉，《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2期（2008年12月），頁109-112。

禮儀的履行不再只是履行與不履行的問題，也不是文化傾慕與否的問題，而是禮儀履行是體現禮義之邦精神的象徵，並從此強化朝鮮在東亞秩序的代表性及中華文化傳承的身份，這應與朝鮮明清易代後的不斷膨脹的華夷觀相關。與此同時，如何重視或在禮節場景中履行，有助了解禮儀如何在中朝關係佔有重要的地位。

而譯官則是禮儀順利履行的關鍵。朝鮮立國以後，士大夫的出使並非恆常工作，但不少譯官出使中國次數相當多，如洪命福（1733 年-？）便先後在 1765 年以及 1790 先後協助北學的重要人物洪大容、朴趾源等在燕行使節過程中擔任譯官，²而 1790 年甚至擔任首譯。另一譯官例子李尚迪，曾先後 12 次往返中國。³除此之外，一些邊境事務或賚咨行都是由譯官處理。當時的士大夫大多對於進行對外交涉活動甚為抗拒，朴齊家《北學議》中提到：

清興以來，國朝士大夫，以中國為恥，雖黽俛奉使，而一切事情，文書，言語之去來，悉委之於譯。自入柵門至燕京二千里，所過州縣官員，無相見之禮，接供其地方芻秣糧饌之費而已，此

² 洪命福曾與徐命膺一同編寫《方言類解》的辭書，是一本專門記載各種中國各地方言及特別用語的辭書，該書的成品，絕對與朝鮮譯官及使臣需要與來自不同地域的清人所需知道的用語。關於洪命福所編的《方言類解》，詳參李凡：〈《方言類解》中「中州鄉語」價值〉，《漢字研究》，第 13 輯（2015 年 12 月），頁 129-144；另外洪大容記載，他與西洋傳教士劉松齡交流時，就是由洪命福協助翻譯。關於此，詳參羅樂然：〈朝鮮燕行使視野下的乾隆禁教期耶穌會士——以洪大容的《湛軒燕記》為研究中心〉，《明清研究》，第 19 輯（2015 年 12 月），頁 129。

³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452。

未必出彼之意，亦由我之厭薄不顧而然也。⁴

因此，參與對清使行的士大夫均「以中國為恥」，不願處理各種文書與言語交涉的事宜，全部「悉委之於譯」，使譯官在這些朝貢活動的責任與角色變得多元及重要，也因為譯官來往中國的次數，遠較士大夫接觸中國的機會多，⁵故培訓譯官的資料顯示，無論是語言教材還是他們司譯院中所載的文籍，大多與朝貢禮儀知識的掌握有關。⁶由此推論，譯與禮之間的關係，值得更多的關注，譯官他們不單只有語言翻譯的身份，同時也擔當朝鮮禮儀的代表。故譯官的話語、使臣對譯官的觀感，以及譯官的各種交涉活動，如何體現朝鮮禮儀，並由此來塑造朝鮮對禮義之邦的觀感，從而去了解禮儀履行在清代中朝關係的意義。

翻譯與禮儀是文化交流不可忽略的元素，兩者之間實際是互為結合的觀念。而譯官的職責就是體現翻譯與禮儀的互動。他們被派遣到清朝，在中朝文化交流有著不可排除的媒介角色，不單只是一位維繫朝鮮禮儀之邦的代表，也同時間是中朝關係的協調者，甚至是朝鮮在中朝關係的權益爭取者。

因此，本章先交代中國自明代建立的藩王朝貢禮的各種儀式，並探討明清易代後的儀式轉變，其後探討當中的儀式參與過程中，朝鮮士大夫與

⁴ 朴齊家：《貞蕤集》，〈北學議·內編〉，頁 413。

⁵ 朴齊家也提到：「又使臣年年新差，使事年年生疎。」朴齊家：《貞蕤集》，〈北學議·內編〉，頁 413。

⁶ 如《通文館志》、《同文考略》、《事大考例》等，絕大部份資訊均與朝貢禮儀相關的資訊。

譯官如何參與其中，並特別了解譯官的禮儀履行的角色以及背後的意義。燕行使臣李正臣曾記載到，所有使行的禮節領賞及活動安排，都是由譯官與禮部交涉安排。「凡使行領賞，而又受上下馬宴之後，乃送首譯及上通事于禮部。」⁷此外，一般使節均停留北京一段不短的時間，期間在北京的各種大小事，譯官均分擔協調、解難的工作。另一方面，朝鮮邊界或涉及對清事務的問題，也需由譯官代表朝鮮一方進行周旋或周涉。因此，本章將了解譯官在中朝關係的政治制度構建下，他們需協調或履行的各種禮儀以及事務職掌，既一方面可說明禮儀作為一種朝貢體系下的規定，如何在中朝關係中產生不同的文化話語，特別可揭櫫禮與譯之間的關係，更可立體地了解譯官如何在中朝文化交流之間的擔任中介者。此外，朝鮮譯官的各種細節上的工作，實際上也影響著中朝關係的變遷以及各種事情最後發展的結果，故也需同時顧及。

據《經國大典》記載，朝鮮王朝一般只列明正使、副使與書狀官出使的情況，⁸卻未有載有關於朝鮮譯官的任務與執行政序。故譯官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的《通文館志》正補充這方面的不足。⁹在金慶門所撰的序中指出：

⁷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閏六月〉，頁 30a。

⁸ 據全海宗說法：「正使與副使由正三品以上的宗室及官僚中選拔，書狀官由四品至六品官僚中挑選，並各提升一品。稱正使、副使、書狀官為三使。書狀負責每日見聞，直到歸國以後向國王稟報『聞見之事』。」關於此，詳參全海中著、全善姬譯：〈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氏著：《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88。當中比較特別的是書狀官的工作，他們主要是紀錄各種使行見聞，待回國後向朝廷報告，《通文館志》載：「書狀官逐日記事，回還後啟下承文院（出經國大典），國初，趙文剛、末生回，自京師以耳所睹記，別為條啟書狀官為，聞見事件自此始。」由此可見，書狀官作為三使之一，主要工作如今天一般所理解的秘書或秘書長之類的工作。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赴京使行〉，頁 2b。

⁹ 《通文館志》編寫原為整理各種司譯院兼及的事大與交鄰事宜的文獻，以便作為體例。如金慶門的序中所寫：「博採國朝以來史典所錄及諸家傳記，參以聞見編之為書，原其

「……從事官或多或少，而無實額，故經國大典只書使、副使、書狀官、從事官從人之品馬乘馱，而未言該數中間，有上通事，又有堂上通事，仍居從事官之上，而從事官則自教誨以下，各有外目外，有醫員、寫字官、畫員，共四十員。」¹⁰因此，《通文館志》的出版記載，如金慶門的序所寫：「本朝有司譯院，專職事大交鄰之事，上下數千年間朝聘應對，有能以紓患，當時垂法後來者，而文獻不足率皆湮沒無徵，皆不惜哉。乃者存窩崔相國提舉是院慨然於此，以慶門大人習於院中典故令，與二三同僚修輯其所傳故事為志。」¹¹該書雖然是後人所記，但書中亦有載全書所引用書籍，¹²包括當時的朝鮮與中國的各種古籍或文集，如《大明會典》、¹³《海東諸國記》、¹⁴《荷谷朝天錄》、¹⁵《經國大典》，¹⁶或一些已失傳的材料，如《象

沿革官制及大小程式，斟酌會通類以成例，作為一實之制，若夫朝聘傳導之儀、周旋吐納之節、享幣贈酬之數、奏咨移揭之式、其他水陸程途之迂徑、行人錫賚之旭儉，至於交鄰儀節靡不備載，務令該暢」但有趣的是，《通文館志》亦記述一些譯官個人的事蹟，如金慶門所言：「而且書前任人之有功於邦家及其言行，可觀感於後人者，附于於其下，使人開卷秩然如貫珠，歷歷在目。」故該書同時亦有部份內容是通過文獻及譯官們所知的一些譯官個人貢獻。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通文館志序〉，頁 1b。

¹⁰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赴京使行〉，頁 1a-b。

¹¹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通文館志序〉，頁 1a。

¹²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引用書目〉，頁 1a-2b。

¹³ 《大明會典》等典籍會通過使臣往返中土而被帶回朝鮮，據《同文彙考》便有相關的記載。詳參〈呈禮部文〉，《同文彙考》，原編卷 34〈陳奏二〉，頁 26a-b。

¹⁴ 《海東諸國紀》是朝鮮申叔舟出使日本時的各種觀察，關於《海東諸國紀》的內容與相關的研究成果，詳參羅麗馨：〈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和記錄——以申叔舟《海東諸國紀》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 12 月），頁 81-120。

¹⁵ 《荷谷朝天錄》是 1574 年許筠（1551-1588 年）出使明朝時的使行紀錄，該書亦被朝鮮社會以及當今學術界，用作認識明朝朝天活動的主要著作。在朝鮮不同的文書，如上述所提的《通文館志》、《象院題語》等，或一些朝鮮後期的士大夫也均引用《荷谷朝天錄》作為證據補充。關於許筠的使行經歷，詳參金東珍：〈許筠의 大明使行과 陽明學 變斥〉（許筠의 大明使行與陽明學變斥），《문화사학》（文化史學），第 21 輯（2004 年 6 月），頁 825-853；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以許筠與袁黃為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0 期（2009 年），頁 55-84；王鑫磊：

胥故事》、《訓上手本膳錄》等，¹⁷故《通文館志》所提及的故事或記載，雖然當中經編修者有所增修，但不少均有原來史料所載，故從中可看到更多關於朝鮮王朝官方文獻如《承政院日記》及《朝鮮王朝實錄》缺少記載的譯官協調的任務與執行經過。¹⁸然而，《通文館志》、不同的《燕行錄》或其他記述揭示了譯官掌握的不只是語言翻譯，同時也是朝鮮如何履行禮儀職責的重要官員。

二、 中國的賓禮與朝鮮的對應

接觸空間（Contact Zone）是美國人類學家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觀察歐洲殖民者在美國開發與擴張期間，與美國土著間互動而得出的理論。而所謂接觸空間就是指兩個沒有聯繫的文化因地緣關係而開始接觸，甚至對雙方造成各種協調或不協調的影響。¹⁹但她指出接觸空間是不同群體在一個跨文化的空間，以通過選擇不同的形式，以滿足空間主導的文化

〈從 16 世紀末中、朝士人的陽明學辨論看東亞儒學資料——以許筠〈朝天記〉為中心〉，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 27 輯（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181-192；許齊雄：〈事大至誠——從十六世紀末「昭雪國疑」和「壬辰請援」看朝鮮李朝政治核心對中國的想像和期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334-345。

¹⁶ 關於《經國大典》的特徵，詳參정성식（譯：鄭成植）：〈경국대전의 성립배경과 체제〉（經國大典的成立背景與系統），《동양문화연구》（東洋文化研究），第 13 卷（2013 年月份缺），頁 35-61。

¹⁷ 像這些書籍只見於《通文館志》或其他的材料，但卻在今天韓國各地的大學或檔案館亦不見。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引用書目〉，頁 1a-2b。

¹⁸ 雖然《通文館志》當中卷 8 的不少內容均是譯官的故事，難免讓人懷疑譯官自我建構與書寫，但是書中記載各種故事都會引用相關書籍來證明，如申繼黯的故事與貢獻，在《通文館志》中說明有關的故事記述內容是《啟辭膳錄》。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7，〈人物〉，頁 20b。

¹⁹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1-11.

的需求。²⁰從此觀點看之，我們可將普拉特所指的接觸空間放置在東亞的文化圈中討論，而這空間之下最重要的主導文化是禮儀。無論是中國歷代禮部還是外來的朝貢國，都自然按照朝貢的禮儀以滿足。禮儀作為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角色與角色之間的約定俗成的常規定例，在中國與東亞地區，透過禮儀使社會之間的倫理、規則有一定的約束，而禮儀的了解及採用，成為了穩定社會，甚至是國際秩序的渠道。乾隆欽定《大清通禮》時的上諭，²¹亦特別提到：「朕聞三代聖人，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彫敝也。」²²可以看見大清整理禮儀過程中，也注意到禮與儀，背後是配合人的行為與情感而去約定俗成的，關於禮和儀的落實，亦可參考汪德邁的想法：

禮治是治理社會的一種很特別的方法。除了中國以外，從來沒有其他的國家使用過類似禮治的辦法來調整社會關係，從而維持社會秩序。這並非說儀禮這種現象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此現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國傳統中各種各樣儀禮被組織得異常嚴密完備，而成為社會活動中人與人

²⁰ 黃俊傑一直採用普拉特的「接觸空間」想法中，作為研究東亞的地域概念，他認為東亞這個區域是各國家、民族、文化在不對等的支對與臣服關係之下，進行各種交流活動。因此，黃俊傑重視的是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各地區、文化均根據從普拉特的「接觸空間」所述，文化之間的遭遇而引發的各方議題。關於此，詳參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1。

²¹ 《大清通禮》為乾隆年間為有助士大夫與民間能夠掌握吉、凶、軍、賓、嘉等禮而就會典所載內容所修改的內容。來保（1681-1714 年）、陳世倌（1680-1758 年）、王安國（1641-1709 年）、嵩壽擔任總裁官。乾隆帝諭中寫道：「本朝會典所載卷帙繁重，民間亦未易購藏，應萃集歷代禮書，並本朝會典將婚宴祭一切儀制，斟酌損益，彙成一書，務期明白簡易，俾士民易守。」詳參來保等編：《欽定大清通禮》（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版，〈上諭〉，頁 1b。

²² 來保等編：《欽定大清通禮》，〈上諭〉，頁 1a。

關係的規範系統。這個系統及其原則，中國古典稱為「儀禮」。²³

汪氏的論文雖然旨在討論禮治與法權之間的關係，但其描述禮儀與禮治的作用及現象，可讓我們了解到禮儀如何在社會之中，建構人與人之間種種關係時的規範。但自商（約前 1675-前 1029 年）周（約前 1029 年至前 256 年）以來，禮書的記述及流通，使禮儀從士大夫之間傳播，亦隨著《周禮》的成書，使禮儀的精神從人與人之間，擴大至社會之中。而通過《周禮》的五禮（吉、嘉、賓、軍、凶）之一的賓禮，國家對外之間的禮儀細節，亦從此而起。禮儀自先秦逐漸建構，直到鄭玄（127-200 年）將《禮記》、《周禮》、《儀禮》等書作注後，²⁴加上漢朝以後朝廷置禮於國家制度之中運作，使禮漸受到更多的重視與應用。²⁵而關於國與國之間的賓禮，在唐朝的開元禮奠定了中國與其他朝貢國之間的關係，亦成為了重要的禮學課題。然而，過去學界對於禮學的研究都主要就六點討論，分別是小學、禮學思想、名物、考古學給合、會通群經及禮學史研究，²⁶但禮儀在社會的實踐卻是其最重要的存在價值。本文所涉及的朝貢禮儀，正是《周禮》中所指的賓禮。不過，其背後的思想來源卻較少人關注。彭林提出了這個值得我們更多考慮的想法：

禮是道德之器械，是上古聖賢為治國、平天下而作。「禮之所

²³ 汪德邁（Lion Vandermeersch）：〈禮治法治——中國傳統的儀禮制度與西洋傳統 JUS（法權）制度之比較研究〉，中國孔子基金會、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編：《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頁 207。

²⁴ 關於鄭玄研究的情況，詳參潘斌：〈近二十多年來鄭玄《三禮注》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87-90。

²⁵ 彭林：《三禮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4-20。

²⁶ 彭林：《三禮研究入門》，頁 42-72。

尊，尊其義也」，歷來的學者都把探求「聖人制作之本義」，作為禮學研究的終極目標。古聖賢是依據怎樣的原則制禮作樂的？它們希冀藉此表達哪些理念？²⁷

如果以彭林的說法來說，在春秋時期當然士大夫對於社會的認識停留於邦國之中，對於邦國與邦國之間的交流與想像卻較其他的範圍較淺薄，但《周禮》、《禮記》等古籍一早構築了一些關於賓禮如何看待的想法，例如《周禮·秋官·行人》之中提到大行人的工作：「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災。」²⁸當中可見包括朝覲以外，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亦包括時聘、賀慶、解決諸侯之國的問題。雖然漢代以後的諸侯已非如周代時般有著高度的獨立自主權，但仍可藉此被轉化為諸國入朝的接待賓禮。這些賓禮的細節有不少學者利用小學的方法，²⁹作出種

²⁷ 彭林：《三禮研究入門》，頁 42-43。

²⁸ 在《周禮》之中，除了大行人，小行人的工作也是與接待外賓有關之工作，據《周禮》所指：「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依禮籍接待四方之使者。」關於大行人與小行人的性質，詳參閻麗環：〈春秋「行人」初探〉，《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2005 年 5 月），頁 63-65；並參而事實上明朝重用「行人」作為宣示國令的官職。關於此，詳參孫衛國：〈試說明代的行人〉，《史學集刊》，1994 年 1 期（1994 年月份缺），頁 11-16；並參郭嘉輝：〈明代「行人」於外交體制上之作用——以「王辰倭禍（1592-1598）」兩次宣諭為例〉，《中國學報》，第 70 輯（2014 年 12 月），頁 319-343。

²⁹ 小學是西漢劉歆（？-23 年）提到此詞，他提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主要是指古代漢語主治語言與文字的學科，如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方式等去學習。關於此，詳參許逸之：《中國文字結構說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106-114。

種的考證。³⁰但如彭林所說禮學背後的思想亦值得我們心思的，特別是歷朝是如何想像，李雲泉在這方面嘗試提出了獨到的想法：

在古代中國「調整社會關係，維持社會秩序」的禮，還有另一重要功能，即被用以調整對外關係，維持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朝貢禮儀，而且同樣「被組織的異常嚴密完整」。朝貢禮儀作為朝貢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歷來為中國封建君主所重。³¹

他認為朝貢禮儀實際是維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穩定，同時亦是強化宗主地位，而所制定的整套禮儀文化。³²但禮儀的作用不只是強化宗主地位，禮儀展示的空間，³³從各種新的研究方法思考下，也可為我們對賓禮之下所產生的各種禮儀或禮俗問題可以有重新的認識。³⁴朱溢對於唐到北宋時期賓禮的禮儀空間的探討，為我們了解到禮儀空間可有助反映宗主國對各地朝貢國的待遇差異、各種規格的差別可體現朝廷對朝貢國的觀感及對政治

³⁰ 如張亮：〈考霸孟銘文釋西周賓禮〉，《求索》，2013年第2期（2013年2月），頁81-83；姚小鷗、李文慧：〈《周頌·有客》與周代賓禮〉，《學術研究》，2011年第6期（2011年6月），頁142-146；折輔民：〈《五禮通考·賓禮》校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3期（1994年6月），頁43-45。

³¹ 李雲泉：〈賓禮的演變與明清朝貢禮儀〉，《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39。

³² 李雲泉：〈賓禮的演變與明清朝貢禮儀〉，頁141。

³³ 可參考青木保的小書解釋禮儀的象徵意義及對國家形式產生的影響。詳參青木保：《儀禮の象徵性》（儀禮的象徵性）（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頁163-248。

³⁴ 華文學界中何淑宜的研究通過使節利用了參與賓禮活動的過程之中，對北京各種禮俗相關的課題研究。另外，韓國學者金文植則以朝鮮王朝的外交儀禮為題，探討各種김문식（金文植）：《조선왕실의 외교의례》（朝鮮王朝的外交儀禮）（서울[首爾]：世昌出版社，2017年）；何淑宜著、박미애（朴美愛）譯：〈17-18세기 조선사절의 중국 예속 관찰〉（17至18世紀朝鮮使節的中國禮俗觀察），《국학연구》（國史研究），第16輯（2010年6月），頁537-574。

形勢的觀感。³⁵而到明清時期，朝鮮被視為各朝貢國之首，其所接受的禮儀以及各種禮儀活動的空間等，均反映朝鮮與別國之間的差異。如隆慶五年（1571 年），禮科給事中張國彥（1525-1598 年）等上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義之邦，與諸夷不同，宜仍復舊班，以示優禮。」³⁶而朝鮮亦有專屬的官員及獨特的人使安排，這些禮儀的規定與循守，其實不只是反映明清帝國對朝貢國的認識差別，也可反映朝鮮在列國之中所享有獨特的地位。

朝鮮在明清帝國體制之下，日漸成為朝貢國之首。而過去朝鮮社會以及國內如何看待這樣的朝貢秩序中的排位，既然事大以誠之下的想法，朝鮮國內自然對朝貢活動亦變得更加重視。但如何回應及對待賓禮安排，如何在朝貢與禮儀的空間，取得各種得著、肯定或榮譽，其實在中朝關係史的脈絡中卻被忽略，更不用說譯官如何協調這些安排。雖然李雲泉認為：「朝貢禮儀僅僅是一種象徵，其演示功能遠遠大於政治功能。」³⁷但是各種政治功能，並非即時在當下可看見，而是在朝鮮社會之中一直催化，故此李雲泉的推論忽略了背後的思想以及當中的各種操作。故此，有必要了解整個中朝之間的賓禮的運作及背後的思想來源，同時對賓禮的形成過程作檢視。

³⁵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實禮的禮儀空間〉，《成大歷史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195-241。

³⁶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61，隆慶 5 年 9 月辛酉，頁 1a-b。

³⁷ 李雲泉：〈賓禮的演變與明朝貢禮儀〉，頁 140。

早於唐代已有「蕃主朝見禮」，³⁸有關的文化在宋朝亦有強化相關的禮儀規定。³⁹元代亦因應蒙古帝國的建立亦有一定的調整，但成為禮儀的常例以及對帝國有深遠的影響，自然是明太祖立國後，大規模改革禮儀制度，各種禮儀都有嚴格的規定。⁴⁰洪武 2 年（1369 年）已定有「蕃王朝貢禮」，儀式分前期準備和正式朝拜的部份，當中前期包括的是接伴、宴勞與習儀。⁴¹

這些儀式進行過去的禮制史的學者研究，均會關心的是明清如何實行。但是朝貢國，鄰國是否等於參與之中，卻沒有太多關心。如陳成國認為「洪武朝為諸蕃國制定遣使進表之儀，足證朱家皇帝做天下主信心不足。但是諸蕃國遣使進表之前是否實行此禮，我們沒有在眾多文獻裡找到證據，估計耐煩行此禮的蕃王不會太多吧。」⁴²然而，陳成國的想法卻在朝鮮禮制以及遣使入使的脈絡下被否定，朝鮮在這些禮儀之中，均按著要求配合及完成，甚至有譯官在各場合配合禮儀的實行。可是，過去學界對於朝鮮如

³⁸ 蕭嵩等撰：《大唐開元禮》（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 79，〈蕃主奉見〉，頁 1a-7b。

³⁹ 如金成奎指出宋代因應有對等國的出現，縱使宋代仍維持世界中心的想像同時，在形態與唐代的一致賓禮有所差異。宋代的賓禮採取的是多元化的賓禮，以配合國家的不同面向與需要，這樣的改變，亦使賓禮不再限制於統一的原則，亦有多變的可能性。關於此，詳參金成奎：〈宋代 東아시아에서 賓禮의 成立과 그 性格〉（宋代的東亞賓禮形成與內容），《동양사학연구》（東洋史學研究），第 72 輯（2000 年 10 月），頁 53-87。

⁴⁰ 吳恩榮：〈元代禮失百年與明初禮制變革〉，《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101-109。

⁴¹ 據陳成國的研究，其實會發現明朝的禮儀體制各種安排，都是參考或按照傳統禮經、周禮等的規定，如到京後由禮部官慰勞的安排，則是《儀禮·覲禮》中提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關於此，詳參陳成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80-383；另參顧寶田、鄭淑媛注譯：《新譯儀禮讀本》，〈覲禮第十〉，頁 327-329。

⁴² 陳成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頁 382。

何配合，沒有很多探討，但我們稍為舉一些清代的朝貢禮儀過程例子，⁴³並通過朝鮮使臣的眼光與清朝史料的對比，可以發現當中禮儀得以全面落實，對朝鮮來說，不只是「承認朱明皇帝為天下共主」，⁴⁴是超越單純的演示功能，而帶有各種政治、文化以及經濟利益的考慮。但在此之前，亦需了解禮儀，特別是賓禮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採用的情況。

禮儀很早就在朝鮮半島落實，彭林指出中國古禮自三國時代通過各種文化與外交交往，傳播至朝鮮半島。⁴⁵而在高麗派遣使節到南北宋時，亦隨著如此的頻密的交往，在書籍輸入、朝貢制度以及遣留學生等形式，強化國內的儒家禮儀的應用。⁴⁶如高麗光宗（王昭，925-975 年，949-975 年在位）曾「令百官衣冠，從華制」⁴⁷可見於高麗王朝即使以佛學為主導的文化思想，⁴⁸儒家禮制在高麗一直有穩定的發展，彭林直指高麗成宗（王治，960-997 年，981-997 年在位）對禮制落實最有貢獻：「成宗制禮，並非簡

⁴³ 其實明朝《朝天錄》亦有相近的禮儀活動證明，但因本文集中討論清朝的禮儀履行，故以清朝《燕行錄》為論述中心，如 1539 年出使的權檣（1478-1548 年），在他的《朝天錄》提到他們入京後，禮部派員接待及設宴款待的經歷：「是日，凌晨詣闕，以下馬宴，往會同館。千秋使以上馬宴亦往。尚書先入，俄而太監麥福亦入。尚書率臣等西向行望闕禮後，與太監南面而立，率下人行再拜。禮訖，分東西而坐，衆樂并作，雜戲俱呈。」詳參權檣：《冲齋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582，卷 7，〈朝天錄〉，頁 7a。

⁴⁴ 陳成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頁 382。

⁴⁵ 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42。

⁴⁶ 此處必須補充一點了解是從高麗到朝鮮，朝鮮半島對禮儀觀念均大多圍繞著禮在家庭、倫理之中所發揮的意義，因此《朱子家禮》在朝鮮社會最明顯看到相關的端倪。關於朝鮮禮學的落實，詳參黃元九：〈李朝 禮學의 形成過程〉（李朝禮學的形成過程），氏著：《東亞細亞史研究》，頁 53-76。

⁴⁷ 鄭麟趾：《高麗史》，卷 2，〈光宗世家·光宗 7 年〉，頁

⁴⁸ 李基白著，厲帆譯，厲以平譯校：《韓國史新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4 年），頁 138-141。

單模仿中原禮儀，而是有著明確的以禮為教的理念，故每每下教，向國中宣示禮儀的內涵。」⁴⁹而回到賓禮方面討論，在高麗王朝已有賓禮的落實，但主要書寫的為迎接中國，實際即是大明使節的儀式。而在朝鮮王朝成立以後，對賓禮進一步落實，更能體現朝鮮的事大精神，以及確定了在明清朝貢體制之中，朝鮮的定位。⁵⁰彭林以《國朝五禮儀》的編纂以及頒布為例，說明朝鮮的事大色彩：「一是降低禮的等第，除了前面提到的不敢智天子之禮外，在行禮規模、器種類、供品數量等方面，也都降等減殺，以示不敢與大國抗禮。二是增設了某些涉及明王朝的禮儀，如《正至及聖節望闕行禮儀》、《皇太子千秋節望宮行禮儀》、《迎詔書儀》等，以表示與明室的特殊關係。」⁵¹上述其實可以看見《國朝五禮儀》進一步強化迎接明朝使臣時應有禮儀的，以展示朝鮮對大明的尊崇。與此同時，朝鮮在後來大清帝國體制之中，也在朝貢禮儀之中，得到高度的肯定，這種肯定可以在接待之中體現。過去學者研究朝鮮賓禮時，均以迎接中國使臣禮儀為中心，強調朝鮮對此的重視，但朝鮮出使到明清兩朝，刻意遵守各種禮制約定，也可從接待之中看到朝鮮背後的目標。

以清廷的接待為例，可見朝鮮與其他貢國待遇不同，而這種不同與朝鮮對出使禮儀的執行有密切關係。據《禮部則例》中指「朝鮮入貢，由盛京將軍給與路引鳳凰城守尉派防禦一員伴送貢使。」而其他貢國家則「該

⁴⁹ 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頁 48。

⁵⁰ Martina Deuchler, “Neo-Confucianism in Early Yi Korea: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Ye,” *Korea Journal* 15:5 (1975): 12-18.

⁵¹ 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頁 211。

省文武員中派二三員伴送入京。」⁵²貢使人數亦可見相關的待遇差距，如「外國貢使隨從員役不得過百人，赴京不得過二十八餘皆留邊聽，賞進貢船不得過三隻，每船不得過百人，朝鮮不在此例。」⁵³而商業活動亦特別只開放給朝鮮與琉球，如《禮部則例》說明：「凡外國貢使來京頒賞後，在會同館開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鮮、琉球不拘限期。」⁵⁴

因此，朝鮮在朝貢制度之下，刻意遵守有關儀式，特別在清朝管治中，尤以重視，背後就是這些好處，當然亦有其他方面的文化意象值得我們考察。而清廷的接待禮儀是繼承明朝的演儀這一禮儀傳統，也是希望能夠宗主國與朝貢國彼此之間能夠有著應有的責任完成禮儀，以強化國家的地位及維繫國際秩序。據《明史·禮志十》「蕃王朝貢禮」條，提到：

凡蕃國遣使朝貢，至驛，遣應天府同知禮待。明日至會同館，中書省奏聞，命禮部侍郎於館中禮待如儀。宴畢，習儀三日，擇日朝見。陳設儀仗及進表，俱如儀。承製官詣使者前，稱有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問使者來時，爾國王安否？」使答畢，俯伏，興，再拜。承製官稱有後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又問，爾使者遠來勤勞。」使者俯伏，興，再拜。承製官覆命訖，使者復四拜。禮畢，皇帝興，樂作止如儀。見東宮四拜，進方物訖，復四拜。謁丞相、大都督、御史大夫，再拜。獻書，復再拜。見

⁵²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卷171，〈主客清吏司·朝貢通例〉，頁1a-b。

⁵³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卷171，〈主客清吏司·朝貢通例〉，頁1b-2a。

⁵⁴ 雖然規定不可收買史書、兵器及各種違禁品，但可見有關的待遇是明顯看得出差距的。

左司郎中等，皆鈞禮。⁵⁵

明朝通過嚴格訂下國家對內、對外的禮儀，希望改革元朝帶來的社會問題，而清朝將這些朝貢禮儀大部份繼承下來。換言之，如同明朝一樣，入京後除了獲得禮部派官員接待以及宴客後，使行官員一行則需穿官服習儀三日，並擇日朝見。⁵⁶習儀或演儀一舉，在清代亦沿襲，基本的安排與禮儀均是沿用明朝舊例。然而，為何需要演儀？洪大容的說法解答了這個疑慮：「十二月二十九日，一行往鴻臚寺演儀。蓋以外國貢使，不閑禮貌。預令演習朝班，不失儀，亦明朝舊制也。」⁵⁷洪大容提到演儀目標是不失儀，故無論如何在百多年恆久不變的朝貢活動之中，還需要進行演儀，背後的想法正是以不失儀為最終的目的。

三、 朝鮮譯官對朝貢禮儀的落實與捍衛

正因如此，相對於明清兩帝國，朝鮮為了不失儀，對此事更為重視，故朝鮮譯官亦從中作協調，希望避免正式朝見時，出現不失儀的情況。故此，演儀是正式朝恭前，使臣們都需要預演儀式的過程，是不得拒絕亦且恆常參與其中的使行的重要活動之一，一般來說三使以及專門負責翻譯的需要參與其中。據 1832 年參與使行的金景善（1788-1853 年）所撰的《燕

⁵⁵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56，志 32〈賓禮・蕃王朝貢禮〉，頁 1423-1424。

⁵⁶ 一些明朝朝天使，如 1602 年出使的李民宬、1636 年出使的金堉等都有提到有關的經歷。關於此，詳參李民宬：《壬寅朝天錄》，《敬亭續集》，卷 3，頁 9b；金堉：《朝京日錄》，《潛谷遺稿》，卷 14，頁 323b，

⁵⁷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外集卷 9，〈鴻臚禮儀〉，頁 28b。

輶直指》：⁵⁸「因禮部知委，午時，與正副使及諸任譯，往鴻臚寺演儀，琉球使亦參。」⁵⁹而金景善亦特別提到譯官需要一同演習禮儀：

我三使北面序立於庭南，諸譯又序立於三使之後。舊時，自堂上譯官下至押物官二十七員，分為三行，從職品每行九人云，而今則不然。琉球三使，又序立於諸譯之後。我國從人及琉球從人，又立於其後而觀光。排班畢鳴贊，二人分立於龍亭門左右。臚唱，舊時，通官以我音傳之云，而今則不然，臚聲甚洪亮。於是，行三拜九叩頭之禮，曾聞官員糾檢行禮，如或參差，則雖三四巡，更令演習云，而今不然。禮畢，復入左月廊，換着平服而歸。⁶⁰



圖表 3 佚名繪《燕行圖·朝陽門》

⁵⁸ 關於金景善出使相關的研究，可參考曹虹：〈《燕輶直指》的清朝觀〉，《嶺南學報》，復刊第 6 輯（2016 年 7 月），頁 231-245。本文所用的《燕輶直指》為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卷 70 至 72，因全文沒有古籍葉，故改用《全集》的頁碼。

⁵⁹ 金景善：《燕輶直指》，卷 3，〈留館錄[上]〉，壬辰年 12 月 26 日條，頁 285。

⁶⁰ 金景善：《燕輶直指》，卷 3，〈留館錄[上]〉，鴻臚寺演儀記條，頁 286-287。

使團的禮節活動除演儀以外，入京後重要的事情之一，則是需入禮部呈交咨表文。據《大清通禮》記載，朝鮮官員入使時進表咨文時的程序如下：

貢使就館翼日，檢其方物表文暨從官各服朝服以俟，禮部儀制司官設表案於堂上正中。黎明，館鄉朝服，率貢使詣部，由左角門入恭俟，鰭下之左，正使奉表在前，副使次之，從官在後，禮部侍郎一人出詣案左立，儀制司官二人，鴻臚寺鳴贊二人，分立於左右，楹南均朝服館鄉。先升階立左，楹鳴贊之右，鳴贊進表，司賓序班二人，引貢使升階立，副使從升少，後立從官隨序立贊跪。貢使以下階跪贊，接表正使舉表館鄉，恭接以授侍郎。侍郎受表陳於案正中復位，贊叩興正使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序班引退館，鄉率以出儀制司官，送表內閣俟。⁶¹

李正臣在 1721 年入使時，便提到譯官需協調各樣禮儀的活動，如譯官需陪同甚至協助使臣處理兩國之間的表咨文呈上的過程。

首譯入告曰，明日日未出，三使臣當陪表咨文，進呈于禮部。趁曉起寢之意，預告云云。⁶²

譯官輩，先持表文咨文兩櫃子。置於府堦鋪陳上後。三使臣從東階升階，列立於東階上，俄而上副使進詣廳前，上使奉表櫃，副使奉咨櫃。上副使皆與譯官，同為跪進於正間卓子上。⁶³

⁶¹ 來保等編：《欽定大清通禮》，第 6 冊，卷 43，頁 2b

⁶² 李正臣：《櫟翁遺稿》，〈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83a。

⁶³ 李正臣：《櫟翁遺稿》，〈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1a-b。

進呈表咨文是燕行使節的重要禮節事情，據《事大考例》：

進於皇上曰「表」(進於攝政王，亦稱『表』)，進於皇太子曰「箋」，
進於皇后曰「狀」(只有方物狀)，有事而陳於皇上曰『奏』，有事而
報於禮部，冀其轉達曰「咨」。其陳奏之時，進於皇太子曰「啟」，
進於皇后曰「單」(只有方物單)。大喪之時，政府大臣，報於禮部
曰「申文」。使臣有事，陳於禮部曰「呈文」，其體各殊。」⁶⁴

而黃梓(1689年-?)在擔任1734年使團書狀官時，他的經歷可引證
進呈表咨文全由譯官所負責：

李樞來言，署班謂繙清文書，皇帝覽下中堂 將回奏云。余
曰：皇帝覽奏若別有旨意，則斯謂之特旨，若循例下議，則自歸
於禮部，且有譯輩曾謂文書下禮部。然後凡事方可周旋視禮部如
射者之的矣。今也不然，不出於特旨，不下於禮部，便歸於別處，
此何故也？金是瑜曰：此所謂交饋中堂事可速諧矣。余曰：何謂
也。對曰：禮部覆奏或不免見尼於中堂，而中堂回奏便是磨勘，
可無遲滯之患矣。余曰：中堂回奏之善不善何可知耶？李樞、金
是瑜，並對曰：「查事既明，且合於藩，奏保無他虞矣。」兩譯之
言雖如此，余意則終有所不信者矣。⁶⁵

儘管黃梓的例子中，看到他不太信用金是瑜與李樞二人的安排，但是在文

⁶⁴ 丁若鏞：《事大考例》(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동아시아學術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2008年)，卷24，〈表咨考一〉，頁1a。

⁶⁵ 黃梓：《甲寅燕行錄》，卷3，〈留館錄·九月二十九日辛丑晴〉，頁90-91。

件傳遞的安排，只可帶著懷疑，依賴仔他們的幫助。不過，文件上的禮儀，⁶⁶其實已有嚴格的規定。因此，對於一般的使節來說，即使不能掌握，故很使臣自然出現像黃梓一般的想法。不過，《通文館志》指司譯院內收載了各種禮儀文書的範本，各種方物表、方物狀、奏本、咨文、表箋如何書寫，書寫方法，具體內容都見於司譯院官員的文本裡面。⁶⁷換句話說，假設使臣不懂如何書寫，但司譯院的譯官仍然可以協助使臣書寫，不會導致因表箋問題再發生，而很多時候譯官都代為處理表箋事宜，如譯官金是瑜曾為仁祖反正的事撰寫於明史之中，在表箋上私自修訂，可作相關的證明。⁶⁸當然最實際的工作，就是譯官負責將有關表文呈上，如麟坪大君（李滉，1622-1658 年）出使期間，曾提到譯官張炫（1613 年-？）協助將表咨校點，並將之呈往禮部，以避免音語不通而導致的麻煩：「留別館，表咨點檢。迺行臺之職。而相分後音問不通。故去夜率諸譯。點檢表咨。類類分置。今朝衙譯齊到。催呈表咨。送譯官張炫，趙東立，崔振南等。賁持呈于禮部。」⁶⁹1723 年礪山君李枋與禮曹參判金始煥（1673-1739 年）擔任正副使的陳慰

⁶⁶ 范永聰曾提到表箋對朝鮮的文化、禮儀與朝貢落實的意義：「朝鮮王朝自立國以來，即以對明朝事大朝貢為外交政策，並以此確立王權，解決經濟上物質交流的需要，且進而引入中國的先進文化。由於要力行事大外交，故此表箋一類的文書遂成為朝鮮向明朝通交及表達意見的最重要工具。事實上，朝鮮朝廷也十分著重表箋之學，故明清兩代五百餘年間，朝鮮的表箋都經常受到中國君主的讚揚。」關於此，詳參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 192；並參李光濤：〈記朝鮮國表箋之學〉，載李光濤：《明清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上冊，頁 42。而有趣的是《通文館志》亦提到「慶賀表箋俱頒有實式，惟朝鮮國每歲更換文辭。」朝鮮使團經常更換文辭，某程度上是一種刻意象徵國家對表箋的重視，以及希望獲得中國君主的認同與讚揚。關於此，詳參《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14b。

⁶⁷ 《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14b-21b。

⁶⁸ 《通文館志》，卷 7，〈人物〉，頁 26a-b；關於金是瑜與明史改寫問題，將於後面章節再作討論。

⁶⁹ 麟坪大君：《松溪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8 年），續冊 35，卷 7，〈燕途紀行·下〉，丙申 9 月 23 日，頁 1a。

兼進香使時，也有提及他們出使時，需要先經譯官檢查表咨文，以便相關文件能完備呈交禮部：

臣意則齎去咨文作為二本，一本則以五字書填，一本則以一字書填。入燕後使譯舌先探禮部前例，呈納咨文，則似為完備，故敢此仰達。⁷⁰

所以譯官可讓朝鮮使團避免失禮，這種考慮基於明初時朝鮮曾因表箋問題與明朝禮部引發多次禮儀衝突。⁷¹《通文館志》也有記載譯官在進呈表咨文時，需要作出參與協調的工作，以避免問題再發生：「今則尚書（或侍郎）與郎中具公服，面南立于大廳，大通官引三使，奉表咨文，跪進郎中，受安于卓子，上通官引使而退。」⁷²有關論述與上述李正臣在使行期間所書寫的經驗幾乎是一致的，可見譯官擔當作為協調禮節活動的角色。

演儀和呈交表咨文後，各國使臣便需正式覲見。而入殿的禮儀才是整個使團行程的最主要活動。由於這是正式的儀式，其實無論是各地入貢的外國使節，還是一些朝廷各級官員均需要參與。過去學界並不關心這些定

⁷⁰ 《承政院日記》，第 548 冊，景宗 2 年 12 月 27 日，頁 131b。

⁷¹ 明初時，朝鮮派出使臣表貢時，被當時明太祖認為表文內「輕薄戲侮」而被問罪，故有禮與無禮與否，是朝鮮保障國家的存亡的最佳辦法。自此，朝鮮對表文的書寫甚為重視，而專管外交禮儀事務的司譯院自然對此有相當的認識與資訊掌握。關於明初的表箋問題，詳參朴元燾，〈明初文字獄과 朝鮮表箋問題〉（明初文字獄與朝鮮表箋問題），《史學研究》，第 25 輯（1975 年 6 月），頁 83-101；並參葉泉宏：〈權近與朱元璋——朝鮮事大外交的重要轉折〉，《韓國學報》，第 16 輯（2000 年 6 月），頁 69-86；亦參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 192-196。

⁷² 《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43a。不過據金文植教授的考察，他指出到清代，大多數由侍郎代表，而非尚書。關於此，詳參김문식（金文植）：〈조선시대 外交儀禮의 특징〉（朝鮮時代外交儀禮的特徵），頁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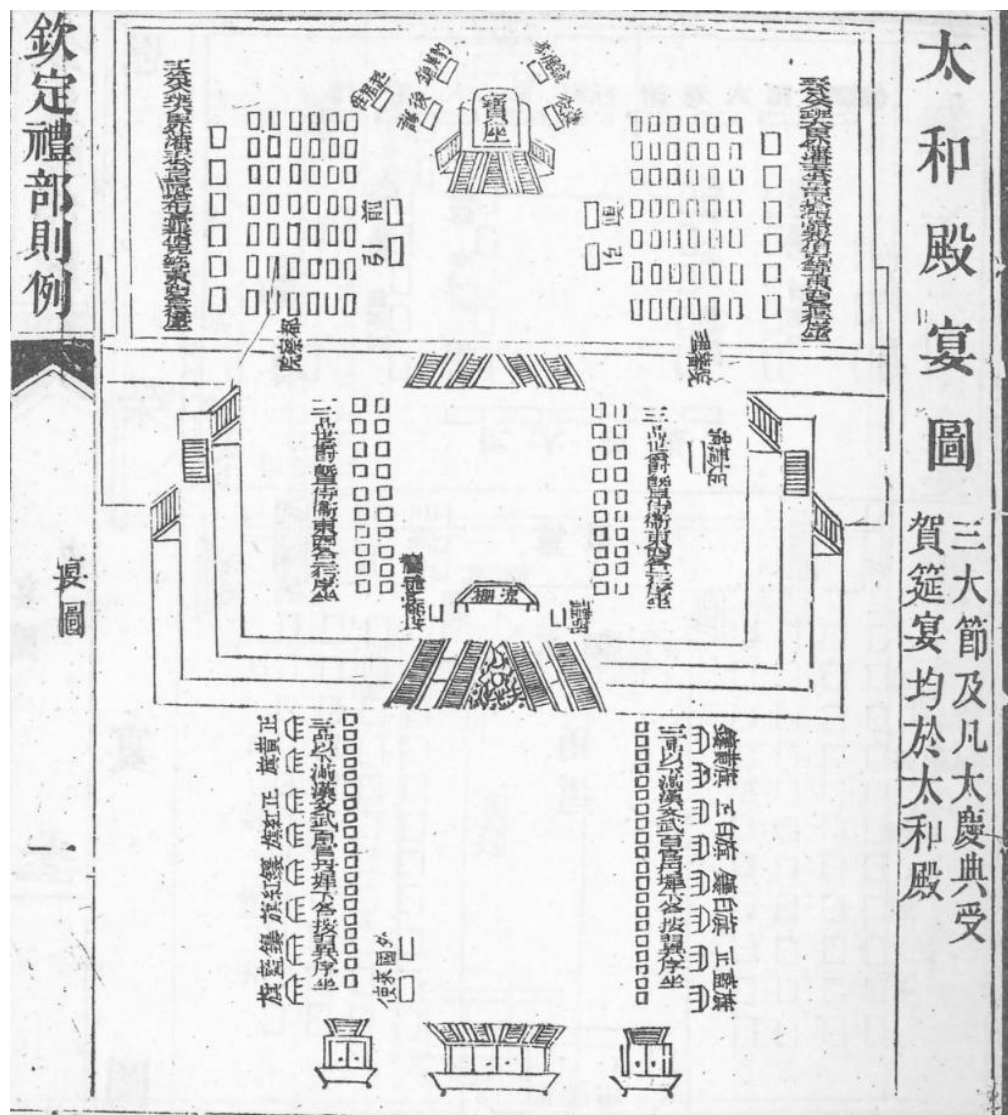
期與有嚴格規限的禮儀不太感到興趣，⁷³因為都是一些既有程序，除非這些禮儀活動過程裡，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讓他們感到興趣才加以討論。⁷⁴

不過，當通過朝鮮使臣對於正式朝見的經歷及各種書寫作為考察與研究的對象時，可發現朝會及覲見不只是履行禮儀的過程，其實也是朝鮮使臣對於國家形象的建構、東亞世界的秩序以及對於帝國或世界觀再認識的重要切入點，故他們在入宮覲見的經歷與各種見聞都是值得觀察及考究的。一般來說，外國使臣均都被安排在百官之後，但是朝貢國之首，大部份時間都通常以朝鮮使臣為先。據《禮部則例》：「外國貢使在西班牙百官之末行禮，以朝鮮國領班。」⁷⁵因此，朝鮮被視為一種朝貢國之首的心態與形象，於大殿的禮儀空間之中呈現。

⁷³ 何新華的研究且則有詳細的說明，亦有不少篇幅顧及屬國來華的朝貢禮儀，但是何氏的研究還是更關心的是一些 18 世紀以來西洋國家來華的交涉過程，如中荷、中葡、中俄、中英以及晚清的各種朝貢經歷等。關於此，詳參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年）。

⁷⁴ 尤淑君的專著，通過各種官方材料，包括《大清通禮》、《清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事例》、《欽定禮部則例》等大清整理了屬國貢使一般在北京的禮儀活動，由入住館舍、禮部進表、安排覲見、大朝朝覲、常朝朝覲、便殿召見、虔覽、頒賞、賜宴、辭別謝恩等，各活動的具體儀式，則視乎是否有常朝日或是使團入貢時間。關於此，詳參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43-44。縱使尤氏的研究對賓禮體制有所研究，但她亦強調「本書只談儀式的象徵意義，不再贅述儀式的安排。」因此，這些煩瑣的資料之中，採取新的角度，可引證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活動的空間以及活動空間所產生的文化互動。

⁷⁵ 特登額等纂：《禮部則例》（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卷 2，〈儀制清吏司·朝賀通例〉，頁 4b-5a；而《大清通禮》亦載：「外國陪臣立位隨西班牙末，拜位亦如之。」《欽定大清通禮》，第 4 冊，卷 17，頁 9a-b



圖表 4 太和圖宴圖⁷⁶

如《欽定禮部則例》圖示太和殿宴圖的位置，可見西班中的「外國來使」正是則例中說明「朝鮮領班」等屬國參與朝會、慶典活動時的禮儀活動空間。⁷⁷各屬國亦會視朝賀的空間作為互相競爭的場合，像 1841 年使團派出

⁷⁶ 特登額等纂：《禮部則例》，〈宴圖〉，頁 1a。

⁷⁷ 如圖所示，空間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太和殿內，第二層則為以親王、郡王等貴族及一、二品官員所站立的丹陛，即太和殿外的檐下月台，而第三層亦是最多人所站列的大和殿廣場。而三層的空間亦分別了官位的分別，因此外國來使的次序，何以由朝鮮領班，也

朝賀，原來次序上大南（即越南）應在各使節之前，但當年卻被安排了次於琉球、暹羅、南掌等使節之後，引起皇帝相當的不滿：

禮部預撰如清使部應對語並稽查我使班次以奏。帝曰：班次一事，是年前清國禮部失于排列耳。初豈有我使在高麗、南掌、暹羅、琉球之次之例乎？且高麗文獻之邦，固無足論。若南掌，則受貢於我，暹羅、琉球並是夷狄之國，不寧立在諸國之下，這事作為要著。此外則隨事應答，不必印定。阮廷賓奏請抵燕京日，先納貢賀表文，即將班次事稟到禮部辯說，以觀其意。如或不許，則具表候旨。⁷⁸

雖然事件發生在大南的順序問題，並不涉及朝鮮國本身的排位與身份問題，⁷⁹但是此事的發生可有助我們了解在清朝禮節的空間，一切的排序與安排，不只是純粹為了方便而設的儀式。這些禮儀所產生的文化影響，還會對國家的華夷秩序產生關係，而華夷秩序的高低決定，則由禮儀文獻與否為定論。例如上述所提到的禮儀失誤，或被安排較後的排序，均影響國家在朝貢秩序的地位。⁸⁰因此，朝鮮對此自然會甚為小心，以避免失禮，或在禮節方面捍衛自身的權益與身份，其中的辦法便是通過譯官協調與加入。因

反映了朝鮮在朝貢體系與國際秩序的地位。關於禮儀空間的安排，詳參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頁 57。

⁷⁸ 張登桂等編纂：《大南實錄》（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1981 年），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明命二十一年十二月，卷 220。

⁷⁹ 當年出使的金貞益記載道，了解朝鮮使團旁的不是越南，反而是南掌，引證了越南使節的講法。他說：「我國使臣坐于回子國人之左，南掌使則坐于我使之左。」金貞益：《辛丑北征日記》，卷 2，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서울[首爾]：尚書院，2008 年），第 135 冊，〈玉河聞見〉，318。

⁸⁰ 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頁 58。

此，使臣都會帶同身份地位較低的譯官入內，以便提供各種幫助。

恭遇萬壽聖節、元旦、冬至、朝賀，及皇帝陞殿之日。如待以優禮，是日入班會集之漢滿大臣，咸蟒袍補服，按翼侍立。禮部堂官，引貢使，至冬墀行禮畢，引由西階升，入殿右門，立右翼大臣之末，通官隨入，少後立。皇帝降旨賜坐，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入班會集之滿漢大臣，及禮部堂官，一叩頭，序坐。貢使隨跪一叩頭坐。賜茶，尚茶進皇帝茶，眾跪叩。侍衛徧授大臣及貢使茶，咸跪受一叩頭，飲畢，跪如初。皇帝降旨慰問，禮部堂上承旨俱如前儀，禮畢，禮部堂上，引貢使出，至朝房，承旨賜貢使尚房飲食訖，館卿率以退，翌日黎明，午門外謝恩。鴻臚寺傳贊西班，引貢使就丹墀西北面，行三跪九叩頭禮如儀。⁸¹

從此段《禮部則例》關於禮儀空間的論述，可見朝貢國除了容許三使臣進內外，亦會邀請譯官參與其中。朝鮮使團為例，金昌業（1658-1721 年）有提到在朝會期間使臣們的坐次及譯官的位置，與《禮部則例》所呈現的圖與記載是幾乎一致的：

入門百餘步，三使臣列坐於西庭，余就坐伯氏（註：即該使團正使，金氏長兄金昌集）後，東西庭文武官列坐者，不知其數，燭籠或來或去，而籠上各書官名，班列嚴肅不聞喧嘩之聲，通官輩坐

⁸¹ 特登額等纂：《禮部則例》，卷 171，〈主客清吏司·朝貢通例〉，頁 11a-b。

於使臣不遠處。⁸²

上段所提的金昌業其實不是使團的官方代表，他只是長兄金昌集的緣故可到北京，故按其所說「除官員外，甲軍皆驅出西門外。」理應要離開會場。不過，他幸得當時熟習朝會的譯官告知「皇帝入時不必出，可以黑衣混眾觀之。」⁸³另一位使臣李宜顯（1669-1745 年）曾於使行期間，記載了他進入朝會的空間後的所見所聞。最值一提的是，譯官在其中的工作：

與副使書狀並坐西廡下，積雪滿階，寒氣逼人，到此痞證頓除，蓋行步頗遠，故疎散而然也。文武官列坐東西庭，其數甚多，持燭籠往來者絡繹不絕，而籠上各書官名。譯輩以通官之言來傳，皇帝方往太廟，還後當受賀。⁸⁴

禮部官員一般不會直接通知使臣各種安排與程序，而需按著禮節，由譯官與禮部的通官之間作溝通。因此，使臣是不會從中國的官員方面接收任何信息，而是經身份低微的譯官去處理。故使臣需要注意的事情，則經譯官作傳話。這種信息傳遞的過程，其實是在朝貢空間之中應遵守的禮儀與行為，故譯官與禮儀之間的關係。李正臣為例，他本人雖然擔任副使，但是完全不知道朝賀的安排，需要從譯官方面了解：

吾問於譯官曰：「正朝陳賀時，儀節何如？」

⁸²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 4，正月初一，頁 1b。

⁸³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 4，正月初一，頁 2a。

⁸⁴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上卷，頁 18a。

對曰：「皇帝乘小黃轎，出御太和殿，東西列儀仗前陞。安大香爐，炳沉香，動蹕三聲。文武分班，立庭下，諸王在殿陞殿上致詞，聲動廣庭。讀畢動樂，仍又禮部侍郎一人，科道一人，立於殿前臚唱。千官一齊三拜九叩頭，內外庭人員，絕無喧譁聲。千百軍卒，亦各依次排立，不小雜亂云。」⁸⁵

由此可見，譯官熟悉禮儀，使朝鮮使臣不失於禮節。畢竟使臣並非恆常出任使節職務，故可明白他們對禮儀與使行安排的認知相當淺薄，故可見極需依賴譯官的幫助。

正式朝會的空間不只是單純的禮節活動，對朝鮮士大夫而言，也是朝鮮衡量本國社會與文化水平的場地。1666 年到燕京出使的許積（1610-1680 年）回國報告參與使行經歷時，憲宗問道：「彼國朝會禮法何如？」許積的回應正可反映朝鮮士大夫對禮儀的態度：

臣前日奉使入參朝班，大臣在殿西，學士列于楹外，殿上衛卒，幾數千。又有及內大臣，此則不與朝議，而以狎客，與清主戲謔者也。常時則班行不多，而冊后賀禮時序立者，可近萬。拜禮叩頭等事，整齊可觀，而但任意平坐，或亂吸南草矣。⁸⁶

許積的記述顯示了他對清廷的朝會安排稍有微言，也認為縱使人多拜禮叩頭均可觀，但仍有值得批判的地方。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朝鮮使臣對禮

⁸⁵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閏六月〉，頁 33b-34a。

⁸⁶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憲宗實錄》，第 16 冊，卷 16，憲宗 7 年 9 月丁酉，頁 8a-b。

儀的要求相當高的。而事實上，禮儀的失誤隨時會遭到清帝的懲罰。金景善曾載當年朝鮮使臣入宴時，⁸⁷被禮部侍郎安排次於琉球使節上階，及後譯官打聽得知該禮部侍郎受到嚴厲懲罰。⁸⁸雖然是次禮儀出錯不在朝鮮一方，但可反映禮節上出錯，將會使國家面臨極大的危機。因此作為協調者的責任更加重要。

與其他屬國使臣不同的是，朝鮮使臣一般都會獲邀入殿面見清帝。一般過程來說，譯官均需入殿協助三使臣其中以便各種協調以及對答，與其他職級的從屬人員的工作安排有所不同。據 1650 年（順治 7 年、孝宗元年）李時白（1581-1680 年）的陳奏使團過程中，⁸⁹該團的書狀官鄭知和（1613-1688 年）載道：「使臣及中使羅業，譯官李馨長、張炫入參殿內，其餘員役皆在庭。」⁹⁰李可見，除了譯官外，一般的從員均不能入內參與禮儀和面見清朝皇帝。而安排這群低級的譯官入殿的原因，自然是希望譯官擔當翻譯。《大清通禮》提到：「皇帝降旨慰問，尚書承傳，通事翰諭貢使，貢使對辭，通事譯言，禮部尚書代奏。」⁹¹因此，譯官在正式覲見時不得不進宮的原因，是因為譯官在使臣面聖時，需要擔當口語對答的翻譯。

⁸⁷ 一般的坐次，應像徐浩修記載朝鮮使臣入燕時的情況一樣：「余等坐於各國使臣班而首為 朝鮮，使次為安南，使次為南掌，使次為緬甸，使次為生番……」詳參徐浩修：《燕行紀》，卷 2〈起熱河至圓明園〉，頁 3b。

⁸⁸ 「聞通官輩傳言，禮部侍郎被重勘，問其由。則今日宴席令琉球使先登殿上，朝鮮次之，以做錯為罪云。」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3，〈留館錄[上]〉，壬辰年 12 月 30 日條，頁 321。

⁸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第 5 冊，卷 5，孝宗 1 年 9 月庚午，頁 9b。

⁹⁰ 〈謝恩行書狀官李齊衡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頁 14a。

⁹¹ 來保等編纂：《欽定大清通禮》，第 6 冊，卷 43，頁 4a。

不過，背後更進一步的考慮是，口語對答的順利其實也是希望避免使團在面聖時失禮。1780 年（乾隆年，正祖年）朴明源（1725-1790 年）出使到熱河謁見乾隆帝時，《正祖實錄》記載朝鮮的三使時攜帶了譯官，幸而避免了語言不通導致失禮的問題：

卯時，皇帝出御宮門，禮部尚書德保，引三使臣及三譯官，進跪御座前。皇帝問曰：「國王平安乎？」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問曰：「此中能有滿洲語者？」通官未達旨意，躊躇之際，清學尹甲宗對曰：「略曉。」帝微笑。⁹²

此段記載使團幸得有譯官在場，才能夠回答皇帝，這對答反映譯官在入殿禮儀活動之中在場，一方面可避免在使臣入殿時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彰顯朝鮮人避免於皇帝面對失禮，繼續維繫禮義之邦的美譽。而朝鮮使團每次通過譯官及各級成員在禮節上的協調成功，多次獲清廷讚頌，並取得各種優厚待遇。

朝鮮國，世守藩封，素稱恭順。歲時職貢祇愼，可嘉。間遇特頒勅諭及資送歸國等事。如琉球等國，亦俱奉章陳謝，惟朝鮮國，備具土物，附表呈進，藉達悃忱。向因耑使遠來，若令齎回，徒滋跋涉，是以歷次例准，留作正貢，以示優恤，而該國恪貢職守，屆應貢時，仍復備物呈獻，往來煩複，轉覺多一儀文。我君臣推誠孚信，中外一體，又何必為此煩縟之節？今歲朕七旬，萬

⁹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第 10 冊，卷 10，正宗 4 年 9 月壬辰，頁 24b。

壽該國，具表稱賀，對已宣命來使，前赴行在，隨朝臣行禮宴。
齎其隨表方物，此次即行收受，以申該國慶祝之誠。嗣後除歲時、
慶節正貢，仍聽照例備進外，其餘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概行
停止，毋庸備進，副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着禮部傳
諭，該國知之。⁹³

清廷對朝鮮的禮儀恭順高度認可，雖然朝鮮或只希望利用朝貢機會而賺取更多利潤，⁹⁴但是從這種皇帝的下旨來看，可以看到朝鮮能夠獲得朝廷寬免朝貢物呈上的效果，與他們在禮儀儀式之中履行各種應有的責任。賓禮的研究過去通過關心的是中國如何訂立各種禮儀，各級官員按著這些規條以執行各種活動或儀式。但是透過重構禮儀的各部份，包括以參與者的視角來了解禮儀，可發現各種被以為是恆久不變的形式主義背後，實際仍有更多值得探討的課題，例如禮儀如何完成或有誰在當中參與其中，背後實際涉及各種文化與權力因素所影響。譯官如何成為禮儀的協調者、知識的掌握者甚至是中朝官員之間的媒介。朝鮮王朝如何透過譯官的工作或他們的語言知識，以遵守各種禮儀規範，而藉著這些規範在文化空間之上取得更多政治上、文化上甚至是經濟上的利益，實際幫助朝鮮社會的權益以及國際秩序的地位。其實這樣對朝貢禮儀的重新認知，其實可以對中朝關係史以及東亞世界形成的過程有更多新的了解。

⁹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第10冊，卷10，正宗4年9月壬辰，頁25a-b。

⁹⁴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頁104-105。



圖表 5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燕行圖⁹⁵

四、 譯官的職責協調——使行期間的解難

朝鮮王朝歷代安排的正使、副使、書狀官大多為士大夫擔任，⁹⁶而他們絕大部份均不懂漢語或滿語溝通。故譯官在禮節協調以外的使行工作，最首要的目標就是處理三使語言的困難，其實這也是禮儀問題。畢竟當使臣不能對應時，便會有失禮的情況。因此，交涉與周旋空間，譯官倘若在場，無論是漢語還是清語譯官，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李澱（1722-1781年）於乾隆 43 年（1778 年，朝鮮正祖 2 年）出使時，乾隆帝出門練射事時，剛巧被朝鮮使臣碰上，乾隆便與使臣稍作對話。據使臣的報告：

皇帝問：「爾們中有能滿州語者乎？」臣等使清學譯官玄啓

百進告曰：「昨蒙皇上曠異之典，親筆既下於本國，賞典遍及於從

人。陪臣等歸奏國王，當與一國臣民，感戴皇恩矣。」

⁹⁵ 據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指為金弘道（1745 年-？）參與燕行期間繪畫的使節活動紀錄。詳參〈《燕行圖》為金弘道作品〉，http://china.join.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20627，（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13 日）。

⁹⁶ 《通文館志》：「冬至行使一員，正二品結銜從一品；副使一員，正三品結銜從二品；書狀官一員正五品結銜正四品隨品兼臺料檢一行。」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正官〉，頁 2a-b。

皇帝點頭而含笑，又問曰：「汝善爲滿州語。汝之使臣，亦能爲皇語乎？」啓百對曰：「不能矣。」皇帝又問曰：「漢語則能爲之乎？」啓百對曰：「亦不能矣。」皇帝笑而前發。⁹⁷

假如對話過程沒有譯官在場，這段書寫或這次使行結果很大可能不會如此。所以這些譯官微不足道的溝通過程，其實對國家的地位、士大夫的身份或朝鮮相當重要的。李枋與金始煥亦指出：「彼中凡事，專在我國譯舌之善爲周旋，而今行員譯輩，循次充數，故率多初行生疎之類，當此有事之日，設有居間宣力之端，不可不另擇一院中解事人，別爲帶去。譯官金弘祉、李樞，累次往來，熟知事情，至如金慶門，則雖在堂下，而觀其爲人，可合任使，一依堂上例。傳曰，依爲之。」⁹⁸

此情況正可說明在清朝期間，朝鮮比明朝時期更多的機會接觸皇帝與朝廷各級官員。晚明時期的魚叔權所撰的《稗官雜記》記述，明朝的使臣出使北京，其實很難得到機會與明朝大臣與一般百姓交談，他提到：

中國之法，不得與外人交通。雖本國官者之入仕中朝如金義、陳浩者，時送下程陪臣而已，不會相訪於館中。近歲龔修撰用卿、吳給事希孟、華侍讀察、薛給事廷寵，相繼來東，及其還朝，例訪陪臣於館，且致下程，其舍人等云老爹輩議于閣老諸公皆謂朝鮮禮義之邦，世爲中國藩屏，何石以外人侍之。陪臣之來公輩任

⁹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卷6，正祖2年9月丁酉，頁46a。

⁹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548冊，景宗2年12月27日，頁131b。

其訪問云云，故每來相訪耳。⁹⁹

所以直到晚明後期，中朝之間的使臣才慢慢有對話、交流的機會，這使譯官的角色變得漸漸重要的原因。如果使行間沒有能通漢語或滿語的譯官陪同使臣的話，在公在私均會遇上困難。明中葉出使的徐居正（1420-1488年），他在北京期間本希望與一對父子交談，但剛巧身旁沒有譯官使他們無法交談：

是日，有一人父子。鬚眉皆皓白。父年可八九十，子年可六七十。適相遇於道觀。與語移時。但無譯官，粗識十中之一二耳。¹⁰⁰

隨著清朝政策的放寬，朝鮮使臣的使行多了宮廷禮儀以外的出遊機會，他們需要與當地人交談。除非使臣本人懂得漢語，否則只可依賴譯官陪同，通過譯官的翻譯，進行深入交談或是查詢各種有趣的事情，或是解決了使行各種禮節以外的困難。例如 1732 年出使的李宜顯擔任正使出使北京期間，禮部的官員通過譯官金是瑜稱讚他，而李氏寫道：「禮部諸官語譯官金是瑜曰，正使年紀似近七十，而肌膚精力甚旺健，必享遐壽之人。聞是你國閣老，乃知貴人氣象，自與餘人有別也云。」¹⁰¹當時李宜顯聽後一笑置之，沒有任何回覆，亦沒有甚麼延伸的話題。但是如果以譯官的角度來解讀，其實金是瑜讓李宜顯了解到清人在談論和描述他，無論李宜顯開心與否，都可

⁹⁹ 魚叔權：《稗官雜記》，卷 1，頁 19-20。

¹⁰⁰ 徐居正：《四佳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0-11，詩集卷 7，〈寧遠衛道觀〉，頁 11b。

¹⁰¹ 李宜顯：《陶谷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972，卷 30，〈王子燕行雜識〉，頁 31a。

足以證明李宜顯需要依靠金是瑜的分享，才能得知清人說他「貴人氣象」，所以這一點說明譯官在使行之中其中的重要任務，就是讓使臣能夠得以與清人對話。

1725 年趙文命（1680-1732 年）出使期間，譯官韓永禧在使行中和各地官員酬酢過程中擔當翻譯，例如在永平與一守備官張自立交談，也需請韓永禧協助，這種紀錄的對話，可發現是以口語記載他們之間的對話：

戊寅至永平府，其處守備官（此官如我國兵虞侯之類）張自立為名者。自言相人貌，來見三使臣。先言曰：「你國王之接待欽差，誠禮曲盡，吊祭時哀憾動人，欽差阿大人歸奏吾們，萬歲爺聞而大加欣悅，竊為諸大人賀。」臣使譯官韓永禧問曰：「誠如你言矣，但萬歲爺之欣悅與否，汝何從知耶？你亦其時同為入侍否？」自立曰：「阿大人復命時，予適有事進京，而予與阿大人相親，故與其一家親舊，同在闕門外等待矣。俄而阿大人自內出，詳道此事如此，此何異於吾所親入侍也云。」¹⁰²

張自立所提到的欽差阿大人，應是先後 4 次前往朝鮮出使朝鮮的阿克敦（1685-1756 年）。¹⁰³雖然我們沒有其他文書記載到阿克敦大人對於入鮮經

¹⁰² 趙文命：《鶴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92，卷 6，〈燕行日記・六月〉，頁 59a-b。

¹⁰³ 據廉松心的研究，阿克敦先後在 1717 年（康熙 56 年，朝鮮肅宗 43 年）、1718 年（康熙 57 年，朝鮮肅宗 44 年）、1722 年（康熙 61 年，朝鮮景宗 2 年）、1725 年（雍正 3 年，英祖元年）出使朝鮮，主要原因包括送贈治眼疾藥予肅宗、告訃、冊封、賜祭等活動。他將所見所聞的內容將之整理為《奉使圖》。關於阿克敦及《奉使圖》，參廉松心：〈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結晶——《奉使圖》〉，《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35-39。

歷的觀感，康熙帝或是阿克敦是否相當高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通過譯官韓永禧擔當中介人，趙文命得以與張自立交談，並將這樣的書寫紀錄下來，而趙文命的記載，亦可使當時朝廷了解到他們的接待獲得了肯定。而韓永禧在趙文命的書寫之下，亦被提及他曾協助趙氏與滿人交談：「宿章京張阿藍太家，章京即我國哨官之類也。阿藍太滿人，年今五十八。氣頗傑豪，臣使譯官韓永禧與之酬酢。」¹⁰⁴可見譯官多時獲士大夫委派，協助他們與中國的不同階層對話。¹⁰⁵

另一個較多人認識的例子，則不是與清人交談，而是與居於北京的西洋人對話。過去很多成果指出洪大容很希望和傳教士交談。洪大容入京後，得知兩位傳教士劉松齡與鮑友管在京時，¹⁰⁶因知「蓋泰西，海外絕國，書不同文，二人居中國久，雖略通漢字書，不足以達意。」¹⁰⁷因此，他與兩人見面時，使請「譯官洪命福，同車而往，命福頗聰明習漢語，將以通話

¹⁰⁴ 趙文命：《鶴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92，卷 6，〈燕行日記・六月〉，頁 60a-b。

¹⁰⁵ 衣師若芬曾提及金昌業參與使行期間，曾請一位譯官幫忙，介紹中國畫家羅延協助他為其兄金昌集畫畫像。詳參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57。

¹⁰⁶ 關於劉松齡的研究成果，學界有相當全面的成就，如羅樂然：〈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中國史研究》，第 82 期（2013 年 2 月），頁 93-114；高王凌：〈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11 月），頁 166-173；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劉松齡研究之二〉，《清史研究》，第 3 期（2008 年 8 月），頁 93-100、Mitje Saje, ed.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 劉松齡：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9.)等。關於此書的介紹，詳參羅樂然：〈書評：Mitje Saje, ed.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 劉松齡：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漢學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13 年 3 月），頁 333-339。

¹⁰⁷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外集卷 7，〈劉鮑問答〉，頁 10a

也。」¹⁰⁸使臣或士大夫出使北京，礙於漢語的困難，無法仔細的交談，譯官正可解決有關的問題，而事實上西洋傳教士縱使懂得漢語，但在洪大容的記載裡，發現劉松齡與鮑友管二人其實不太懂漢字，故難以通過筆談與朝鮮使節對話。故洪命福在場的協助，便可使洪大容能夠與兩人對話，而撰下了那段珍貴的交流紀錄，才得以了解洪大容的西洋思想的形塑，以及劉鮑背後的西洋傳教士的知識框架以及在禁教期的活動情況。¹⁰⁹此外，洪大容在等候朝貢儀式的過程中留意到一些琉球使行從人，他們亦在外等候，於是他請譯官幫忙溝通，了解他們琉球社會情況：¹¹⁰

琉球使席在我國使後，其從人皆不入焉。余使一譯扣與語，
一人果能爲華語。自云非通事，到福建半年而入京，沿路學習，
而然其國俱有中國書，字同而音異，其王姓尚云。時朝參已罷，
不能長語。¹¹¹

較洪大容早出使的書狀官李震休（1657-1710 年）曾在康熙時期記載，他們與安南使臣交流的經歷，也是通過譯官實踐有關的對談，使雙方彼此之間得以對談：

¹⁰⁸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48，外集卷 7，〈劉鮑問答〉，頁 10a-b。

¹⁰⁹ 關於此，詳參羅樂然：〈朝鮮燕行使視野下的乾隆禁教期間耶穌會士——以洪大容的《湛軒燕記》為研究對象〉，《明清研究》，第 19 期（2015 年 12 月），頁 101-134。

¹¹⁰ 關於朝鮮使節在北京收集琉球情報的來源，沈玉慧有詳盡的分析，詳參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頁 165-170。1534 年被派遣到明朝的朝鮮使節曾於北京遇上琉球使者，關於這段交往，詳參松浦章著、鄭潔西譯：〈嘉端十三年的朝鮮使者在北京所遇到的琉球使節〉，氏著、鄭潔西譯：《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頁 56-77。

¹¹¹ 洪大容：《湛軒燕記》，外集卷 7，〈藩夷殊俗〉，頁 40b。

正使及臣率譯官等進禮部坐於東廊，安南國使臣適到後，院臣等於于提親並即往見。渠中亦有通官善漢語，遂憑譯官問答，而渠等先致寒暄曰向日路上相逢未得，語殊可悵也。臣等答曰然。問姓名答曰正使阮名儒阮貴德、副使阮榮、陳璫。臣等問其官，則或稱兵工部侍郎，或稱都察御使。又問本國地方，曰五千里。問官制及設科之規，曰與中國無異。問喪制，曰行三年。問土產，曰多犀象。問道里，曰九月程。問何時還，曰明年六月，可以得抵。問曰何處乘船，廣東也。渠等亦問臣等科第年甲，隨即答之……¹¹²

朝鮮人與西洋傳教士、安南、琉球等例正反映的是在東亞世界的交流，單是筆談不一定能作出深入的對話，故掌握漢語卻是成為對答的關鍵。因此，如果只觀察交流結果，這些或許只是無意義的應酬。但當放置在朝鮮使臣與周邊國家使臣對話的經過時，可留意到一些譯官在場作交流的媒介，使得以取得更詳盡的資訊以及仔細話題的。¹¹³

譯官在京行使期間，也需顧及使臣的起居、行程以及娛樂。使團居住的玉河館有人因病而死，也是譯官通報清廷，並由禮部協助解決喪葬問題。

¹¹² 〈謝恩兼陳奏行書狀官李震休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3，〈使臣別單三〉，頁2b-3b。

¹¹³ 沈玉慧曾提到：「朝鮮與暹羅、南掌、緬甸、蘇祿等國使節則因接觸次數少，加上無法如琉球、安南使節能直接以漢文交流，多透過重譯或是使節團中稍通漢語的隨行人員進行交流，其交談次數目次僅見一、二次，且未見學界有相關的探討。」沈玉慧對燕行使節在中國收集外國的情報有相當豐富的認識，故她亦特別留意到朝鮮燕行使節與外國使臣對話時，也需通解漢語的譯官或相關人員陪同。關於此，詳參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2年12月），頁112。

¹¹⁴不過，一些朝鮮士大夫也意識到過份依賴譯官會帶來重大的困難。如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曾指出：

任莫重於首譯，人不可不擇。凡館中買賣折價高下與行中聚斂多少、驛奴黜陟，皆在首譯之手。自我國商賈驛卒，至彼人中館夫輩，待首譯若待其主……以此論之，首譯可謂執兩國之權。使臣有問行事者，首譯未答之前，他人不我開口。聽其所言，從而為辭，以此首譯所欲諱者，使臣無從得聞，良可寒心。¹¹⁵

金昌業的想法無疑讓我們知道譯者權力過大，甚至使臣也不得不聽從。但用另一個角度重新解讀金昌業的說法，無論使臣在使行期間的各種生活與安排，都不得不依賴譯官的安排。像金景善記載譯官被委派尋找幻戲者到玉河館向使臣演戲：「是日，天氣晴和。館中無事，使任譯招致幻者，以供一觀。」¹¹⁶金景善也提到使臣對中國形勢不熟悉，譯官亦會及時阻止他們，避免做出失禮行為：

轉至庶常館，館在太清門外稍東不遠處，即翰林肄業之所也。諸學士間數日輒一至，考核詩文云。故欲入見矣，譯官止之曰：「舊時我人之入燕也，或至此館，討論文史。近來則輒阻閤不得入，蓋翰苑多古家名族，其文章見識，皆非常品。與東人稍相親狎，

¹¹⁴ 「今始行之差人金始達奴萬敵病死館中，譯官通于大通官轉告禮部，則給漆棺一部、大布一匹，使出城埋葬。」〈冬至使書狀官李慶果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1，〈使臣別單一〉，頁20b。

¹¹⁵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4，癸巳年正月17日，頁88上。

¹¹⁶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3，〈留館錄〉上，壬辰年12月28條，頁299。

則輒問曰：『何忍薙髮左衽，從官本朝乎？』聽者厭苦之，自是戒門者。禁東人之出入云，故不求入見，而直還云。」¹¹⁷

尤淑君曾提到「貢使是不可隨意外出，嚴禁收買中國史書、兵器及各式違禁品。貢使及從人若要出外活動，必須先通知禮部、步軍統領，派兵保護。」¹¹⁸但是有趣的是，歷代朝鮮使臣出使期間，往往都可以取得一些珍貴的文獻或是甚至一些關於軍事相關的物品，如譯官金指南在 1692 年擔當使行譯官時，曾獲該使團副使的要求，協助尋找煮硝的方法。硝為製作火藥的重要元素，¹¹⁹而當時朝鮮苦無渠道尋得。《通文館志》曾提到：「本國煮硝，素無善方，用功而所得少，壬申隨閔判書就道赴燕，尚書命公購求其方試之，所得倍蓰品，又精猛藥泉。」閔就道在〈得硝法始末〉中提到：「煮硝一方自祖宗朝，欲得其妙，而終不能致之，爾若求得幸莫大也。」¹²⁰金指南以其個人的能耐與網絡，打聽有關書籍的下落，最終金指南於東北查到一老人而取得該書，並收錄成書。閔就道對此十分配合：「指南於是購求其方，靡不用極，而無處不脫。歸抵遼陽，潛叩村舍，得一人焉遺之，金而問之始得其術。」¹²¹最終，金指南此貢獻獲得了高度的肯定，¹²²朝廷甚至

¹¹⁷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3，〈留館錄〉上，壬辰年 12 月 21 條，頁 222。

¹¹⁸ 尤淑君：《賓禮與禮賓——外使觀見與晚清涉外體制》，頁 45。

¹¹⁹ 趙翼的《甌北詩鈔·古詩十九首》曾提到「硝磺製火藥，世乃無利兵。」故練硝對軍事與火器上的應用，有相當大的貢獻。關於此，詳參趙翼：《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446 至 1447 冊，集部別集類，據嘉慶 17 年湛貽堂刻本，〈齋居無事偶有所得輒韻之共十七首〉，卷 32，頁 16b。

¹²⁰ 閔就道：〈得硝法始末〉，載金指南編譯：《諺解新傳煮硝方》（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662.2-G421s），頁 19。

¹²¹ 閔就道：〈得硝法始末〉，載金指南編譯：《諺解新傳煮硝方》，頁 19。

¹²² 《日得錄》是正祖的語錄，他也肯定了金指南在朝鮮的煮硝技術方面的貢獻，他指：「我國煮硝之法，自完豐知取路上土代用，品猶不精，譯官金指南購求於燕肆，功效大

請金指南翻譯此書。由此可見，譯官的特殊身份與人際網絡，購得一些理論上在朝貢體系下限制不能購得的書籍。

相近例子可見於其他使臣的紀錄之中，譯官會在不同的渠道之中，取得一些重要的材料，這些材料不少都不一定是朝廷願意讓朝鮮使臣取得的。如趙文命使行期間，在譯官金樞的幫助下，取得了《內閣循簿》：「初一日丙寅，因譯官金樞得見內閣循簿，如我國政院日記之類，或曰環簿，或曰題奏事件。諸冊所錄，或有詳略，而反復參考，不無一二可觀者矣。」¹²³雖然朝鮮士大夫對於此書的實用性有所猜疑，但是事實說明的是，譯官可收集到這些珍貴的材料。書狀官沈琰記載道：

譯官朴熙蔓購得彼中秘藏書冊，其中爵秩全覽二冊、八旗官爵一冊、轉政要覽一冊、中樞備覽一冊、定例全篇三十四冊、題駁公案十冊，竝四十九卷，俱是新刻康熙皇帝為政之制度出治之規例，極甚纖悉靡有闕漏，至於我國方物件記表箋文字亦多詮載，末乃以雍正皇帝嗣後政事之要切者，添補於後，自成一家史。前後譯官之購得彼中塘報循報者何限而此，書之備載彼中事情，比諸塘報循報，尤為緊重茲敢，附陳以備乙覽¹²⁴

朝鮮譯官通過多種方法，或許是收買、行賄，或是通過他們的人際網絡購

著。因右議政尹著東言，又修明之，重刊其書，名之曰新傳煮硝方。」關於此，詳參朝鮮正祖：《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62-267，卷 164，〈日得錄·卷 4〉，頁 42b。

¹²³ 趙文命：《鶴巖集》，冊 6，〈燕行日記·8 月〉，頁 65a。

¹²⁴ 〈謝恩兼進賀行書狀官沈琰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4，〈使臣別單 四〉（雍正 2 年 10 月 16 日），頁 25a-b。

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購得的，大部份都是珍貴、罕有，甚至是嚴禁流出的，可是譯官卻有辦法取得，例如雍正時期的天下輿全圖就是最好的例子：

雍正畫出天下全圖，副本留在畫師，實為絕寶而秘藏，嚴禁故前後使行欲見不能，今行譯官韓致亨多般致力，幸而圖得則其中，亦有朝鮮輿圖，而山川州邑纖悉領略。以此推之，則中國十六諸省、蒙古四十九部、險夷近遠如在目中，此正朝家之不可無者，故秘齋以來 乾隆十四年 月 日¹²⁵

另外有趣的是，譯官有時亦會出使過程之中，均會撰寫「手本」或「別單」。¹²⁶使臣別單是朝鮮使臣赴清的聞見所感以及種資訊情報收集的過程，雖然一般來說書狀官為主要的書寫人員，但是隨著賚咨官均由譯官擔任，有時首譯亦會書寫使臣別單。¹²⁷因此，這些豐富的別單材料，不少來自使臣書寫，當中使臣別單包括一些論述與周邊記載，很多時這些記述也是通過譯官掌握一些材料與資訊而整合而成的。朴趾源對此有一些有趣的觀察：

且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為謊說，其言務為新奇，皆恠恠罔測，以賺譯輩贖銀。時政則隱沒善績，粧撰批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恠，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

¹²⁵ 〈進賀行正使趙顯命副使南泰良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5，〈使臣別單 五〉，頁31b-32a。

¹²⁶ 曾撰寫別單的譯官，如金慶門、洪命福等，而金慶門的手本甚至收錄在閔鎮遠的《燕行日記》之中，下一章將有更詳盡的討論。

¹²⁷ 關於使行紀錄的研究，詳參김경욱（金景綠）：〈朝鮮時代 使行과 使行記錄〉（朝鮮時代使行與使行記錄），《韓國文化》，第38輯（2006年12月），頁193-230。

百性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錄，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為聞見事件。別單書啓，其不誠若此。告君之辭，何等謹嚴，而豈可浪費銀貨，買得虛荒孟浪之說。¹²⁸

朴趾源認為一些中國的通官或序班為了得到一些銀財利潤，便將各樣情報均賣予譯官，這種知識傳播的確實使我們可以質疑對譯官是否掌握最正確的知識，但是從文獻提及的證據，卻顯示譯官是使臣了解中國的渠道，無論譯官掌握的情況有誤與否，是他們所購回來的情報，抑或自己親眼看到也好，都成為了朝鮮士大夫或朝廷認識外邊世界的主要渠道和媒介。

過去學者過去研究朝鮮譯官，與本文關注他們的媒介角色不同，他們大多均圍繞著譯官在使行期間的貿易的角色與利潤。據裴英姬的說法可基本了解譯官在使行期間的工作：「譯官透過燕行的機會進行商業活動，不但幫忙使節和中國商人從事書籍或花草等物品買賣，而且透過『玉河館開市』，進行商業活動。」¹²⁹金泰俊、金一煥二人以舉吳大齡（1701 年-？）和李彥瑱（1740-1766 年）兩位譯官出使日本的經歷以及各種思想的探討過程中，特別提到「三使把譯官看做一種手段，庶孽文士把譯官看成牟利的商譯。」¹³⁰所以其實大家對於譯官與商業活動之間並談而論述之。

¹²⁸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52，卷 14，〈熱河日記・別單〉，頁 72b。

¹²⁹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頁 49。

¹³⁰ 金泰俊、金一煥：〈子弟軍官和譯官們的使行時代〉，載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에 관한 韓中日三國의 國際위크숍》，頁 505。

中朝之間的貿易過去可分為公貿易、私貿易和密貿易。公貿易者即兩地政府容許的八包貿易和包外越送。八包者即限制他們每次使行的資本額，一般來說堂上官的八包的經費多於其他官員，使他們在前往北京時，通過他們的資本來購買各種商品。¹³¹而包外越送則是通過譯官在八包以外從事各種貿易，換句話說可讓譯官可以有一種私下的貿易機會。¹³²

當然除了八包貿易、譯官所擔當的「代理中央宮府衙門及廩貢人業務」外，也包括地方機關自派別將赴後市貿易，以及居於中朝邊界義州的私商，他們亦多被稱之為灣商。這些商業與貿易之間的競爭，過去學者已經很多的探討，而我們重視的是譯官如何通過貿易，為中國、朝鮮與日本之間的商品互相交流，雖然不少譯官均以謀取暴利為主要的動機。¹³³而 1790 年擔任冬至兼謝恩使書狀官的李祉永所書寫的報告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對此事的理解：

行中弊瘼歲滋年增，若論其太甚，而不可不及今釐正者，則譯官空包之弊為最，刷馬驅人之弊次之。蓋其空包之弊，則比歲以來銀路漸艱，所謂八包無以充數。雖以今行言之譯官輩，一人所受不過十八兩，比前未及十分之一，則行路盤纏之艱難。渠輩生涯之凋殘，概可知矣。以此象舌子侄莫肯為業大比，譯科雖或

¹³¹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頁 92。

¹³²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頁 31。

¹³³ 朴趾源曾提到：「使行時書冊筆墨賣買，皆序班輩主張，居間為駟儉，以食剩利。」反映不少使行間的譯官都以獲利為目標。關於此，詳參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52，卷 14，〈熱河日記·別單〉，頁 72b。

充額，其實則能通清漢語者甚少，今行所帶譯官合爲二十一人，而漢學則惟洪命福、趙明會二人，清學則惟崔道健一人，可與彼人酬酢，其餘率皆魯莽。若值兩國有事使价旁午之時，則將何以應接乎？此蓋由於八包未充燕行無利之致，前後爲掇弊之論者，或言罷八包、或言減譯員，而今則不罷八包，而包自空矣。不減譯員，而譯將無矣，豈不寒心哉？

夫八包之未充，專由於燕商之潛貨潛商之弊，近益層加奸竇百出非一朝一夕所可防禁者。包容成習，僞濫轉加。臣於今行稔知此弊，故自渡江時痛加禁斷，而當其比包之際，諸種物貨校諸入冊之時，終覺過多。臣之失職之罪方自訟不暇，而如欲痛革此弊，入冊時詳細稱包，出冊後較計打撥物價，一一準秤。雖有稱托無少撓奪，則厥數必將滿包而有餘，以此分給行中應受之數，則譯官空包之弊，自可少紓燕商潛貨之習，亦可自戢庶，可爲公私之益矣。¹³⁴

李祉永的見聞清楚說明譯官因各自的經濟需要，而違反過的貿易規定，用作自己潛貨之用。李祉永提到譯官出使以行商為利，而多於為使團及朝鮮權益為主。但不能否定的是，朝鮮使行制度容許譯官在使行的商業與貿易機會謀取利益，但期間譯官可通過這種特殊權利把物品從中國帶回朝鮮，都有益於朝鮮社會。貿易之弊也許是過去學者們咎病於譯官，但不能否定譯官們確實主導了物品的交流與互動。

¹³⁴ 〈冬至兼謝恩行書狀官李祉永聞見事件〉，《同文彙考》（乾隆 56 年 3 月），補編續，〈使臣別單一〉，頁 15a。

五、譯官金指南、金慶門與白頭山定界碑

從字面上看，譯官的工作主要負責翻譯。但通過閱讀各種材料，可發現譯官在翻譯以外，亦兼顧各種對外關係，特別是邊界的事情。除了出使期間與清人接觸外，他們都需要兼顧各種對外的職責，各種涉及邊界、犯案或糾紛，譯官都在不同層次、規模之中，擔當不同的角色。因此，譯官在各種使行以外的事務的處理、擔當以及成效，均值得深入的考察。

據《同文彙考》的紀錄，¹³⁵於康熙年間，有十多次的紀錄，¹³⁶記載朝鮮人因各種原因，包括採集人蔘、¹³⁷伐木、狩獵、偷竊等原因，越江前往東北地區時，被清廷官員捉拿，然後禮部知會，而朝廷每次都需要對清國為這些問題作出解決辦法，¹³⁸其中最嚴重一次是在康熙 24 年（1685 年），

¹³⁵ 《同文彙考》是朝鮮時代對外文書的重要輯錄，雖然大多都是文書的輯錄，但其史料價值其實亦相當高。據林侑毅的研究指：「過去在東亞交流研究上……《同文彙考》多被視為輔助參照的文獻資料，而非主要分析對象。這是因為《同文彙考》具有外交文書集成的文獻屬性……儘管如此，在《同文彙考》中，仍有部份外交文書不對外公開，僅作為向朝鮮國王呈報清朝政治、社會現況，並以北京為平台，廣蒐周邊諸國資訊之用的秘文。」關於此，詳參林侑毅：〈由《同文彙考》「使臣別單」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35(2016.11): 343-371；並參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 年）；韓翠花，〈一部研究中、朝關係史的珍貴資料——《同文彙考中朝史料》評介〉，《東北史地》，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80-81。

¹³⁶ 有關的紀錄，詳參崔韶子的著作，關於此，詳參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頁 35-40。

¹³⁷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 ŏ n Korea," 37-39; 並參金宣旻：〈人蔘과 疆域 - 後金-淸의 강역인식과 대외관계의 변화〉（人蔘與疆域——後金・淸的境域認識與對外關係的變化，《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2008 年 10 月），頁 227-257。

¹³⁸ 如康熙 29 年（1690 年）林戒先等朝鮮人越界偷蔘後，朝廷需處治這些朝鮮人外，亦特別提到將邊界官員作處治，以讓淸廷放心。關於此，詳參〈禮部咨會遣官審擬咨〉，《同文彙考》，卷 52，〈犯越〉，頁 15b-16a。

朝鮮人以鳥槍射傷正測量地勢的清廷官員，而清朝最終罰銀來解決事件。¹³⁹然而，這些邊界事件成為了重要的催化劑，引起清廷有意釐清中朝邊界，希望因此避免犯越問題再發生。

其中，李萬枝事件的越境為重要的導火線，¹⁴⁰亦引發了穆克登到當地處理有關事宜，並藉此到朝鮮邊界進行勘界。¹⁴¹1711 年，李萬枝（生卒不詳）等人越江前往採蔘期間，被人發現，於是便將十多個清人殺掉，後被朝廷捉拿，並要求朝鮮派人前往會審。¹⁴²結果，刑曹參議宋正明（1670-1718 年）便前往鳳凰城參與有關會審，以及譯官金指南兒子金慶門處理有關事務，維護朝鮮人的權益。¹⁴³而同時間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亦藉此機會到當地查案的同時，利用此機會前往朝鮮邊界進行勘界。

另外，金慶門於 1711 年擔任當年的冬至使使團譯官期間，特別向朝鮮

¹³⁹ 此事稱為三道溝事件，事件情況可參考李花子《朝清國境問題研究》（서울[首爾]：集文堂，2008 年），頁 91-108；並參金宣旻：〈雍正——乾隆年間葬牛哨事件與清朝——朝鮮國境地帶〉，《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65-73。

¹⁴⁰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 ŏ n Korea," 45-46.

¹⁴¹ 關於穆克登查界的研究華文與外文學者均有所關心，如張存武：〈穆克登所定的中韓國界〉，氏著：《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頁 275-303。馬孟龍：〈穆克登查邊與《皇輿全覽圖》編繪——兼對穆克登「審視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85-99；陳慧：〈穆克登碑問題研究——清代中朝圖們江界務考證〉（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李花子：〈康熙年間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會科學輯刊》，2011 年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188-196；Andre Schmid, "Tributary Relations and the Qing-Choson Frontier on Mount Paektu," in *The China State at the Borders*, edited by Diana Lary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126-150.

¹⁴² 崔韶子：《清과 朝鮮——근세 동아시아의 상호인식》，頁 38-39；並參〈禮部知會再追查官會同前遣司官按查咨〉，《同文彙考》，卷 53，〈犯越〉，頁 31b-32b。

¹⁴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0，肅宗 37 年 3 月庚子，頁 12a。

朝廷匯報，有關清廷希望調查犯越事宜的情況：

回還冬至使，到瀋陽狀啓曰：「譯官金指南、醫官李時弼等，聞瀋陽將軍之言，禮部郎以主事河順，爲查官，今聞以主事秩卑，郎中一員竝來，故瀋陽改以副都統托六，爲初定差官蘇馬拉之代。且聞北京差官，三月十日離發，四月四五日間到瀋陽，與瀋陽官，初十日間當往鳳城。皇上分付差官，必令住在鳳城，查得殺人處，而勿爲過江，貽弊於朝鮮，犯越事查奏後，仍往白頭山，而皇旨使從大國地方作行，或不得已自朝鮮地方過去，勿令朝鮮支持云矣。」¹⁴⁴

從上述《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獲悉朝廷派京官到瀋陽查犯越事宜，並非由一般的朝鮮使團在禮部與禮部官員見面，或在北京交遊期間獲知。而是譯官從瀋陽將軍方面所知的。可見，視事大使行為工作一部份的譯官，經常於北京以外的地區與官員接觸，讓他們能夠知道更多中國朝廷事情以及官方活動無法獲得信息。其次，朝廷及後委派金指南擔當接伴成員之一，是由於他及早得知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 年，1661-1722 年在位）有意派人前往朝鮮邊界，¹⁴⁵故及早有所

¹⁴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0，肅宗 37 年 3 月庚子，頁 12b。

¹⁴⁵ 康熙皇帝查界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中朝邊界不清，以致私相越界從事各種伐木、採參等經濟活動。但更重要的是，1707 年起，康熙著手派人編纂《皇輿全覽圖》期間，並在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年）、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 年）等人協助下，在傳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 年）、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0 年）、費隱（Ehrenbert Xavier Fridell, 1673-1743 年）等人實際進行探查地形，完成了《盛京全圖》、《烏蘇里江圖》《黑龍江口圖》、《熱河圖》等。然而，朝廷卻發現長白山地區，特別是鴨綠江、圖們江之間不甚詳細。為了解決有關地理勘查的問題，朝廷決定派人前往當地進行勘界。關於此，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

準備，以使後來的勘界團，金指南參與接伴期間有特別充足的準備。

雖然表面來看清廷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¹⁴⁶以調查當年所發生的朝鮮邊民越境殺人的事件，¹⁴⁷但實際上康熙皇帝希望他「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¹⁴⁸曾嘗試於 1711 年，事前未有知會朝鮮，朝鮮領土登山勘界，卻被朝鮮官員以各種籍口，成功阻止了他前往長白山天池的勘界計劃。¹⁴⁹因此，1712 年清廷正式發出通知朝鮮，他們將派出官員查界。

1712 年，清廷發出了正式咨文，而展開派員到中朝邊境查界的計劃。¹⁵⁰接伴使由議政府右參贊朴權（1658-1715 年）擔任，熟悉當地事務的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一同陪同。而熟悉清與朝鮮之間情況的譯官金指南被任

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88-93；並參秦國經：〈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2 月），頁 38-39；並參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1636-191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¹⁴⁶ 穆克登，是滿洲鑲黃旗官員，曾在京城擔任皇帝侍衛，及後調遷到吉林擔任總管，並奉康熙帝之命處理朝鮮人越境以及中朝之間邊界問題。關於他的生平，詳參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年），卷 283，列傳 70，〈覺羅武默訥〉，頁 10177。

¹⁴⁷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 67-75。

¹⁴⁸ 《清聖祖實錄》，卷 25，康熙 50 年 5 月癸巳，6b-7b。

¹⁴⁹ 當時派往接待的宋正明，引領穆克登走入地勢絕險的道路，促使穆克登認為無法前往長白山天池進行勘查，只好回國覆命，再從長計議。詳參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頁 96-100。

¹⁵⁰ 「平安監司俞集一，以勅使牌文出來事啓聞。其文曰：『欽差正使頭等侍衛阿齊圖護獵總管穆克登，奉命前往朝鮮國，五月初二日起行。詔書一道、御杖一對、欽差牌貳面、回避肅靜牌四面、黃傘貳柄、五官司曆。六品通官三員、跟役十九名。』」關於此，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3，肅宗 39 年 5 月壬辰，頁 499。

命為穆克登（1664-1735 年）查界團的隨團譯官。¹⁵¹

對於朝廷而言，能操流利漢語，與清廷官員對話，最為有利，以捍衛朝鮮的權益。然而，金指南由於年老關係，與朴權及李善博一樣，未有實際陪同穆克登到白頭山的天池，改由金指南兒子金慶門及年輕的譯官金應瀾（1663 年-？）陪同前往。¹⁵²不過，金指南卻為整次查界的各種經歷，撰寫了《北征錄》，記錄了事情經過，¹⁵³可見作為譯官對於涉及朝鮮與對外關係時，即使未能親身直接參與交涉，仍需處理若干重要的工作。¹⁵⁴

此外，雖然是次接伴使為朴權，但似乎他對於如何爭論卻無從入手，可以從《朝鮮王朝實錄》的資料提及到他只是臨危受命，¹⁵⁵儘管委以重任，但亦不知如何以有力的證據與清廷一方爭論邊界。他曾嘗試提出以《盛京通志》作證明，白頭山以南為朝鮮境之說。但是，及後卻被朝廷其他官員

¹⁵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6 月壬戌，頁 32b。

¹⁵² 《萬機要覽》是 19 世紀初著名學者沈象圭（1766-1838 年）及徐榮輔（1759-1816）所編的著作，是一本朝鮮晚期重要的百科全書，在〈軍政篇 5〉的白頭山定界提到：「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道巡察使李善溥（1646-1721 年），譯官金慶門等，接應克登。克登以權與善溥年老不許偕行，率慶門等，上白頭山……」關於此，詳參沈象圭、徐榮輔編：《萬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8 年），頁 621；並參李花子：〈清代長白山踏查活動及對三江源的記述〉，《韓國研究論叢》，第 23 期（2011 年），頁 425-465。

¹⁵³ 金指南引錄了當時陪同穆克登的金慶門、金應瀾等馳報及手本而組成的資料，故金指南雖然未有親自前往天池，但是仍然對於整件事件起了重要的作用。關於此，詳參李花子：〈康熙年間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會科學輯刊》，第 197 期（2011 年 12 月），頁 189。

¹⁵⁴ 關於金指南在穆克登登山的過程之中的貢獻與作用的討論，詳參 이상태：〈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頁 75-119。

¹⁵⁵ 朝廷原定任命接伴使權尚游，但「接伴使權尚游，巡撫湖南時，重傷水土，疾病不輕。似當許遞，而宰臣中朴權，明敏善應變，請代送。」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3 月戊戌，頁 16a。

質疑，此為禁書，不可讓清廷得悉有關事情，故只好再從長計議。¹⁵⁶

那麼，朝鮮一方由誰與穆克登爭論？《朝鮮王朝實錄》曾提到朴權在接伴穆克登期間，「使譯官越去候問」。¹⁵⁷但到底是甚麼譯官負責與穆克登呢？然而，再考察金指南所撰寫的《北征錄》便可發現，與穆克登討論兩國界線的人，提出朝方主張，正是熟悉中國事務的金指南及其兒子金慶門。

在行程期間，金指南努力向穆克登表示朝鮮王朝就江源及邊界的主張。在金指南的《北征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金指南如何代表王朝去爭取朝鮮的主張。當時，金指南表示：「總官招余謂：『我們此行，專為看審邊界而已。雖上天入地，當依你們所指示而往。你今明說你國邊界，果何如耶？』余答曰：『長白山巔大池之南，是吾邊界之意，當初有訴，今何改說。』總官曰：『然則勢將登山以去。』」¹⁵⁸

金慶門亦以相同的論調，嘗試與穆克登交涉。《朝鮮王朝實錄》與金慶門口述，洪世泰（1653-1725 年）撰之《白頭山記》均有記載有關啟狀：¹⁵⁹

¹⁵⁶ 「接伴使朴權辭陞啓言：『清國《盛京誌》，明有白頭山南，是朝鮮境之說，請齎往行中，如有爭端，以此書為證。』上從之。其後議者多言：『《盛京誌》是禁物，彼若詰問其從何得來，則生事可慮。』上又從其言，命勿為出示。」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3 月丁未，頁 17b。

¹⁵⁷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5 月丁亥，頁 22a。

¹⁵⁸ 本文所採用的是《白山學報》所編整的《北征錄》，詳參金指南撰：《北征錄》（壬辰年 5 月初 5 日丁亥），《白山學報》，第 16 號（1974 年 6 月），頁 220。

¹⁵⁹ 洪世泰《白頭山記》的開端提到：「金慶門以善譯從，既登山定界而還，為余道其事如左。」此處說明金慶門邀請洪世泰撰寫有關登山定界的經過。關於此，詳參洪世泰：《柳下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67，卷 9，〈白頭山記〉，頁 15a-b。

總管曰：「爾能明知兩國界耶？」

答以：「雖未目見，而長白山巔有大池，西流為鴨綠江，東流為豆滿江，大池之南即我國界。上年皇帝招同時，亦以此仰對矣。」

又問：「有可據文書耶？」

答以：「立國以來，至今流傳，何待文書耶？」

又問：「白山之南，連有把守耶？」

答以：「此地絕險，人跡不至，故荒廢無把守，有同大國柵門外之地耳。」¹⁶⁰

而穆克登不受他們影響，仍決定登山勘界。穆克登考慮金指南年老關係，不讓他陪同，導致金指南未能親身前往天池。但是穆克登在天池的觀察及最終的決定，卻如當初金指南告訴他的說法一般，而穆氏仔沒有特別過份質疑金指南的見解。而且，隨同穆克登則是金指南的兒子金慶門。穆克登到達天池後，得到金慶門的協助與確認，接受長白山天池正是鴨綠江與圖們江之間的分界，並決定於當地立碑。¹⁶¹

穆克登在金慶門等譯官與其他軍官的陪同下，洪世泰的《白頭山記》記述了穆克登與金慶門兩人之間的各種對話，當中亦記載了穆克登如何決定立碑的經歷：

¹⁶⁰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5 月丁亥，頁 22a；洪世泰：《柳下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67，卷 9，〈白頭山記〉，頁 15b-16a。

¹⁶¹ 後世對於立碑的正確位置有很大的爭論，有學者認為朝鮮人故意讓穆克登到小白山頂，後來才移至長白山。因為長白山是鴨綠江與松花江的分水嶺。然而，這種說法並沒有足夠的史料支撐，而本文亦只集中討論譯官的意義，故不詳述相關爭論。關於此，詳參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 183-184。

始得鴨綠之源，有泉泡泡從山穴中出。其流汨洑漂疾。不數十百步。峽坼爲大壑。中注之。掬而飲之爽然。又行東轉踰一短岡。得一泉。西流三四十步而別出二派。其一派流與西泉合。一則東下而其流甚細。又東而踰一岡。則有泉東流。可百餘步，而中泉之歧而東者來合焉。克登坐中泉汙水間，顧謂慶門等曰：「此可名分水嶺，立碑以定界乎？」慶門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當與此山而終古矣。」其水勢分作人字，當中有小巖石，狀如伏虎。克登曰：「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龜趺也。」下山昏黑，宿幕次。甲午，克登謂土門源流，間斷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輕議豎碑。乃令其二人同愛順往審水道，金應瀨，趙台相隨後，行六十餘里日暮，二人者還白水果東流矣。克登乃使人伐石，廣可二尺長三尺餘，又於分水嶺取龜趺，碑既具，列書其額，大清字稍大。其下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勒石爲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貼式蘇爾昌、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相、差使官許樑、朴道常、通官金應瀨、金慶門。遂鑱而立之，既竣事下山，歸到茂山。」¹⁶²

金慶門等人陪伴穆克登一行人走過不少艱困的路登山的過程，除了他們定期向朴權等人馳報外，金慶門通過洪世泰的書寫《白頭山記》，說明了穆克登在登山過程中，提出了很多風土與疆域上的質疑，而人人解答的均是金慶門本人，而在穆克登決定於天池之中定碑立界時，也徵詢金慶門的意見。

¹⁶² 洪世泰：《柳下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67，卷 9，〈白頭山記〉，頁 22a-b。

由此可見中朝之間的邊界確立，不能忽視金指南及其兒子金慶門，兩位譯官的各種周旋或是有意無義的對應。¹⁶³

此外，朴權與金指南等官員雖然因年老不能上山，故特別向穆克登要求登山後的「山圖」，而穆克登很慷慨地指只要白頭山為朝鮮國界自然會協助繪畫地圖。¹⁶⁴當中金指南與穆克登之間交涉對話收錄在其所撰的《北征錄》：

總管曰：「你於我，有何難說之話乎？」

余起而言曰：「小官，是朝鮮之人，白山亦是朝鮮之地，而傳稱宇內之名山，故願一登覽。平生素志，而道里絕遠，無由遂願。今行，又因大人憐憫小官之老病，不斗同行。白山真面，一見之願，未免墮空想。大人必令劉畫師，圖出山形倘以一件畫本見惠，則猶可以贖小官平生之願，大人恩德，何可量哉。」

總管曰：「大國山川雖不得圖畫以給，白山既是你國之地，則畫給一本，有何難哉？」

¹⁶³ 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 45。當然其實我們有另一個想法的是，金慶門其實有意強化自身的角色與重要性，因應除了《白頭山記》外，其實並沒有別的敘述，但他同為譯官，但薄有名氣的洪世泰撰寫，相信也是希望通過洪世泰讓更多人了解到善譯的金慶門，為國家作出了怎樣的貢獻。這種推論其實說明譯官在朝鮮社會的低微，不受重視的身份，所以即使立了汗馬功勞，但在官方文書上，卻不見他們的蹤影，所以我們只能在譯官寄託別人的書寫之中，得到認許與肯定。

¹⁶⁴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50.

余又曰：「如其大國之山，則何敢生意仰意乎？」¹⁶⁵

從金指南此舉動來看，可了解到他希望讓接伴使有文件向朝廷作證據，免除兩人無法上山的責任，這是作為接伴使領導朴權也沒有想得這麼仔細與周全的安排。¹⁶⁶在《同文彙考》之中，記載朴權向穆克登請求畫師協助畫圖以協助他完成任務：

閣下倘選跟隨中躋捷明敏者數三人，與敝邦譯官及知路人偕往看審，且令畫師圖寫以來則水源、山逕，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以此歸奏，恐無不可。未知閣下以為如何耶？¹⁶⁷

由此可見，朴權通過此卻可以得到保障，維護了他們這次工作，避免遭受朝廷作秋後算賬。這次的查界期間，穆克登發現大批朝鮮平民，到大量清朝所屬土地大規模伐木及從事各種經濟活動，而穆克登本來有意向朝廷匯報，但金指南的解釋讓他改變了主意，不向朝廷舉報：

前日臣權，到茂山時，首譯金指南來言：「侍衛以佃獵事，越往彼邊，還後密言曰：『大國境樹木，無數斫伐，車載船運之跡，極其狼藉。爾國吏民，可謂不畏法禁矣。』」指南答以：『江邊無識之民，有此可駭之事誠極寒心，而此事一發，當死者甚多，以老爺惻隱之心，何忍為此耶？』侍衛曰：『吾當含默，但隨行人之口，

¹⁶⁵ 金指南撰：《北征錄》，頁 225。

¹⁶⁶ 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頁 40-41。

¹⁶⁷ 〈接伴使請偕行白山帖〉《同文彙考》，卷 48，〈疆界〉（康熙 51 年 5 月初 7 日），頁 7b。

恐難盡掩也。』」¹⁶⁸

上述的例子可見，無論作為使團的成員，還是接伴使的助手，金指南等不只是在語言從事翻譯，同時在禮節、朝鮮權益上，均是一位盡責的譯官。不但在語言上的翻譯，協助朝鮮解決了若干疑難，金指南與他的兒子金慶門，均在邊界問題上取得了有利於朝鮮的結果，通過了解中介人之間的交涉，可了解到當中的重要決定當時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成就。而最終他更被推恩加階至「知中樞府事」。¹⁶⁹

雍正年間清廷要求朝鮮在中朝邊界作出水路防衛措施，而避免邊界導致各種問題。1711年，金慶門曾與其父金指南一同於白頭山接待穆克登，而金慶門成功說服穆克登，按照朝鮮的要求訂立邊界界碑，從朝鮮的立場來說是莫大的成就。因此，當清廷再就邊界事宜，要求朝鮮解決時，朝鮮再次派遣金慶門，將朝鮮的請求及觀點呈上。¹⁷⁰由以上的例子可見，在邊界的一些立場問題上，譯官為朝鮮的意見向清朝反映，甚至是爭取，確保在朝貢體系之中，朝鮮取得更有利的待遇。

六、 賚咨行與譯官的任務

明清易代以後，朝鮮與清廷的事情更多，故賚咨行成為了朝鮮後期的

¹⁶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1，肅宗 38 年 6 月壬戌，頁 32b。

¹⁶⁹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7，〈人物〉，頁 26b。

¹⁷⁰ 據《英祖實錄》，朝鮮希望該文書乃由宋寅明秉寫，後來則派遣金慶門對邊界作解釋，可見在實際的交涉，文字的書寫當然是文官所負責，但直接的交涉，均倚重於譯官執行，成為了朝鮮對外交涉的典型方式。詳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英祖實錄》，卷 7，英祖 7 年 6 月庚申，頁 45b。

一種特殊的遣使活動。與一般的人京使不同，賚咨的意思是訊息傳遞的活動，據《戰國策·齊策四》指：「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釐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樹，孟嘗君。」¹⁷¹賚有傳遞的意思，咨者本有文件意思，故賚咨則為傳遞文件的意思。而《通文館志》亦表明：「凡有事奏稟，而關係不重，不必備正副品使者，撰才堪專對院官，咨行禮部。」¹⁷²早於朝鮮初期，賚咨行一直是其中一個使行的活動，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最早的賚咨行可追溯到 15 世紀初，太宗時期，曹士德因其舅李子瑛死於明朝，而賚咨赴京。¹⁷³

賚咨一般的工作，據岳陽指：「攜帶奏文或咨文，呈報清朝禮部，處理漂民、犯越等具體外交事務。此外，還擔當著押解漂流人、犯越人的任務，每年一度的皇曆賚咨行也由賚咨官完成。」¹⁷⁴而據全海宗的統計，崇德至光緒期間，共實行 183 次賚咨行。¹⁷⁵賚咨行一般來說都指的是臨時的具體外交任務，但《通文館志》特別強調選拔賚咨官時應：「勿論堂上堂下，有履歷才幹者另選，而必用漢學出身……」¹⁷⁶意旨在司譯院尋找能操漢語的譯官擔當賚咨官，以助各種事情，而事實上賚咨官的不少任務，均需作出

¹⁷¹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 11，〈齊 4·齊人有馮援者〉，頁 399。

¹⁷²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57a。

¹⁷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 24，太宗 12 年 10 月癸亥，頁 19b。

¹⁷⁴ 岳陽的碩士論文主要探討的是清代朝鮮的賚咨行，故只沿襲全海宗的講法，沒有提及早於明代，朝鮮亦有派出賚咨活動，亦沒有解釋次數的變化。關於此，詳參岳陽：《清代朝鮮賚咨行初探》（濟南：山東大學中外關係史專業碩士論文，2010 年），頁 20。

¹⁷⁵ 全海宗：《中韓關係史論文集》，頁 194。

¹⁷⁶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58b。

報告，或與清廷各級官員或平民交涉。

譯官多時處理漂流人時，都需要利用他們的語言知識，處理並協助解回各地的中國漂流人。¹⁷⁷1688 年金指南曾到濟州處理，並留下問情手本，於其《東槎日錄》之中。¹⁷⁸從金指南本人所撰的問情手本，可見譯官在這些對清事務的角色與重要性。據《同文彙考》指：「報濟州漂人押解咨，云云。福建商人楊登興六十三人船敗洋中，滄死四十八人，生存十五人，漂泊濟州。專差司譯院正卞鶴年押解云云。（出通文館志）。康熙二十七年 月 日」¹⁷⁹

在金指南的手本之中，可得知金指南獲委派到潮州，以口語調查這批從潮州一帶普陀澳發船到南京等地經商的商旅，如何因天氣關係漂流到朝鮮半島的經過，透過精通漢語的金指南到濟州訪問一行船人時，¹⁸⁰不但可調查這些中國人漂流的原因，也能因此而掌握一些情報。而 1727 年（英宗 3 年）譯官李樞協助浙江寧波府商人周大順等人漂到朝鮮半島後的護送事情。¹⁸¹

¹⁷⁷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58a-b。

¹⁷⁸ 박현규(朴現圭)：〈1688 년 조선 濟州島에 표착한 潮州 출항선 기록 검토〉(1688 年漂流到朝鮮濟州島的潮州出發船隻紀錄研究)，《동북아 문화연구》(東北亞文化研究)，第 14 輯（2008 年 3 月），頁 29-46；並參金指南：〈戊辰九月初四月濟州漂漢文處問情手本〉，《金譯士東槎日錄》，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30-136。

¹⁷⁹ 〈報濟州漂人押解咨〉，《同文彙考》，卷 70，〈漂民 5・上國人〉，頁 2b；並可參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9，〈紀年〉，肅宗 14 年，頁 42b。

¹⁸⁰ 或許武斷指金指南是精通漢語，或引來各種質疑，但在手本之中的調查內容多處都是以一般的漢語對話，如金指南調查船民的心情時，可看見漢語是對答的內容，因這些並非一般漢文書寫所見的對答：「又問：『你等父、母、兄、弟、妻、子皆有之乎？想必倚閭而望矣。』沈電如改坐垂淚而言曰：『小的家有八旬衰親，而如是漂落，彼此不知存沒，此間情事為如何哉……』」關於此，詳參金指南：〈戊辰九月初四月濟州漂漢文處問情手本〉，頁 130-136。

¹⁸¹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10，〈紀年續編〉，頁 8b。

情報與手本的問題，據《通文館志》，一般的譯官或其他擔當賚咨行的官員都需要填寫情報：

渡江及入柵時報由備局，還渡江之日竣，事事及沿路見聞具書同
灣尹狀啟以送。¹⁸²

手本對朝鮮士大夫對中國的認識相當的重要，因朝鮮譯官有多次出使的經驗，他們對中國國情相當了解，而他們所到之地，卻比一般的士大夫為多，故他們的手本很多時候可協助朝廷或朝鮮士大夫掌握各種資訊，這些手本很多時甚至有助朝廷向清廷禮部作出各種爭取的證據。如 1722 年在入柵的過程時，朝鮮使團被一名「加佩」（實稱為胡嘉佩）的包攬商人向朝鮮使團進行勒索，¹⁸³故譯官金慶門代朝鮮朝廷將咨文送至禮部，以調查有關事情。¹⁸⁴該事情最終被呈至朝廷，金慶門並代表朝鮮與禮部侍郎吳爾泰交待以及參與調查，而朝廷最終在鳳城認定胡嘉佩有罪。¹⁸⁵當中胡嘉佩的案情、事發經過以及審問經歷都被金慶門仔細紀錄，以供朝廷參考。¹⁸⁶正如金慶門、劉再昌的手本之中提到：「吳侍郎曰：『嘉珮等連日取供而終始稱屈。蓋其侵剝爾等之處，咨內既不指謂何事，故自我亦難開端，窮詰爾等今已委來，

¹⁸²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3，〈事大〉，頁 59b-60a。

¹⁸³ 包攬商人一般稱為攬頭是主要對朝鮮入京使團貨物以及鳳城柵門中朝級方邊境貿易的商人，最初主要協助他們作為協助使團運輸貨物，因驛站無法繼續維持貢物以外的運輸，故在康熙 29 年，一些東北商人看中此生意，而獲得了協助朝鮮使團運輸的壟斷權。

¹⁸⁴ 《景宗實錄》，第 5 冊，卷 10，景宗 2 年 10 月辛未，頁 10a。

¹⁸⁵ 關於此，亦可參考宋慧娟：〈清代中朝關係中的司法制度〉，《東北亞論壇》，第 15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8。

¹⁸⁶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 4，〈使臣別單·四〉，頁 14b。

必須詳對以便究覈。此係奉旨，審理不可草草了當，爾等若會文字卽以書對，俾不朦朧。』卑職等對曰：『小官等意亦如此，文字有跡勝於言語，尤便於歸報。』」¹⁸⁷

戶部侍郎吳爾泰先後向金慶門與劉再昌二人提出三問，分別是：

據爾國王呈部咨文內稱：自胡嘉珮等請設攬頭拉包以來，種種侵剝等情，皇上柔遠撫恤爾等外邦小國特差大臣嚴審胡嘉珮等。爾等俱係來往京師貿易行走之人，胡嘉珮等如何侵剝爾等之處？從實盡情供出，本部堂詳明查審，以體皇上柔遠撫恤爾等外邦小國之至意。¹⁸⁸

爾等言攬頭之車固從徑道先到，而故匿於遼陽夥裏托以路險不來。據胡嘉珮等供稱在路多走一日，多費銀數十兩，多走十日多費銀數百兩我們怎肯遲滯等語？胡嘉珮等爲何匿於遼陽而不來，爾等必知其詳，可從實訴出。再爾國王原咨內稱：「穿包竊貨今爾等竝未訴出，亦應將被竊之處，共幾次所竊何物逐一訴出？」¹⁸⁹

胡嘉珮等如此種種侵剝穿包竊貨，爾等從前可曾在盛京禮部，竝京師禮部，及此處城守尉處申訴否？¹⁹⁰

¹⁸⁷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頁15a-b。

¹⁸⁸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頁15b-16a。

¹⁸⁹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頁18a。

¹⁹⁰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頁19a-b。

金慶門、劉再昌兩位譯官作為邊境貿易糾紛之中的朝鮮代表，以朝鮮的權益為依歸，作出各方面的解釋以及提供證供予清朝中央官員，以說明在當地的攬頭如何欺壓朝鮮使團，搾取朝鮮使團成員的收入或盜竊了朝鮮使團的物品，通過二位譯官的證供與解釋，據當時兩人的記載指，負責審訊的戶部侍郎吳爾泰認為：

前後所書言皆詳盡而意自明白，我們心快也。我們來時面承聖諭，皇上以為朝鮮，自先帝時所言皆直。今來咨稱，應是實狀，攬頭勒措之罪，即宜聲明治之。而但其文內泛稱種種侵剝，其如何欺騙，如何操縱，俱不說明。爾可查得明白來奏有是特旨，故我們來此幾番盤詰，而攬頭等終始抵賴。我們來此悶慮，今而得此攬頭所供欺飾之言，可認而知不必更問。皇上覽此必喜，豈非幸事乎？我們奏上之日，攬頭必罷而其人應死云。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¹⁹¹

從此案例可見，朝鮮朝廷在正式禮儀使節活動以外，不一定派遣堂上官員參與這些活動，反而會依靠的是朝鮮譯官。一方面他們有漢語能力，另一方面，譯官對中國情況相當熟悉，可作為貿易衝突與糾紛之中的主要調解者。而事實上，他們對商業活動的了解，以及掌握各種對答用語，使他們在交涉與周旋之中，有助朝鮮爭取最合宜的結果。

¹⁹¹ 〈別遣譯官劉再昌金慶門等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頁19b-20a。

七、 小結

明清易代以來的譯官，張安榮曾爬梳不同的燕行使節記錄指出士大夫對譯官的職掌有所質疑，¹⁹²1723 年出使的李枋和金始煥便曾提到：「彼中凡事，專在我國譯舌之善為周旋，而今行員譯輩，循次充數，故率多初行生疎之類。當此有事之日，設有居間宣力之端，不可不另擇一院中解事人，別為帶去。譯官金弘祉、李樞，累次往來，熟知事情。至如金慶門，則雖在堂下，而觀其為人，可合任使……」¹⁹³

早於 18 世紀初的士大夫之中，金昌業已留意到相近的問題，在他筆下的描述之中，對主要的譯官行為最為不滿，他曾提到：

譯官無通漢語者，其中一二人，號為稍勝，而觀其與彼人酬酌者，為十言無二三言分明。此所言則彼不解聽，彼所言則此亦不解聽，見之可悶。兩國之情，只憑通官譯官通之，而譯官既如此，通官亦不能為我國言，凡言語雖備說，尚荃使人解聽。今以數少之語，擇而為之，其於曲折煩多之事，彼此豈有通情之理？是以，若有一事則不能析理爭之，無論大小，惟務行賂，寧有如許寒心者乎。¹⁹⁴

金氏認為其實很多譯官根本不能溝通，很多事情都只能通過行賂解決問題，類

¹⁹² 장안영 : 〈 18 세기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역관 통역의 문제점 고찰 — 『노가재연행일기』 · 『을병연행록』 · 『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 頁 349-372。

¹⁹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 548 冊，景宗 2 年 12 月 27 日，頁 131b。

¹⁹⁴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 4，癸巳正月 17 日乙未，頁 87 下。

似想法也看到上文中引述的朴趾源，指出譯官依靠購買情報來協助書狀官完成使臣別單的書寫。朴齊家也提到「今譯學衰替，號稱名譯者，不滿十人，所謂十人者，未必盡拔等第，一經等第，則雖口不能出一漢語，亦必使之充行，以食窠銀，如是則譯之一窠，為譯生輪回商賈之地而設，非所以通兩國之言，不至於奕事失對之歸者矣。」¹⁹⁵可見，不少士大夫對譯官並不留情地作批判。

因此，學者研究譯官的成果，始終不及探討士大夫的研究豐富。長期關注朝鮮譯官的金良洙指出韓國文化與歷史的學者均集中研究兩班士大夫，而同時提到因此而對朝鮮譯官有定型塑造，導致大家忽略了譯官的活動以及作出的貢獻，¹⁹⁶而且，士大夫如朴齊家、朴趾源或是金昌業的書寫之中，儘管帶有各種批判，但其實也可看到不少關於譯官的工作與活動，因此他們的書寫仍可讓我們看到朝鮮譯官在對外活動時的虛與實。

本章目的不是評價譯官的貢獻多否問題，而是通過譯官在朝貢禮儀以及使行活動上的角色，了解譯官如何及為何作為禮儀實踐的代表，以及權益爭取的象徵。而且，譯官在工作上如何導引使臣，或支持、幫助和有意與無意的誤導等，都說明的是朝鮮譯官如何在語言、禮制、使行過程之中，擔當文化與政治上的中介人，搭築清廷與朝鮮互相認知的橋樑，即使這種認識背後可能帶有很大的局限以及偏見，但是朝鮮與中國，正是在這種禮儀、語言及各種其他面向的因素所建構下的朝貢制度裡，如何互相維護雙方的立場，或維繫關係的持續及禮儀的落實。因此，通過各種清朝與朝鮮的材料，了解禮儀在清代的落實情

¹⁹⁵ 朴齊家：《貞蕤集》，〈北學議・內編〉，頁 413。

¹⁹⁶ 金良洙：〈조선시대의 譯官등 中人活動을 찾아서〉（探索朝鮮時代的譯官等中人活動），《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39 輯（2009 年 9 月），頁 222。

況，以及朝鮮對應有關禮儀的各種安排，當中包括如何通過譯官的協助及配合，以避免朝鮮失禮，造成各種外交風波，禮儀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落實的文化交流空間，同時用作衡量、定制東亞文化交流圈之中秩序的方法。朝鮮歷任國王或出使成員，縱使對於清朝的管治有所抗拒，但是作為維繫華夏文化的禮儀的重視，還是相當積極。

過去學者對國家賓禮研究的興趣減少，主要是我們只對朝貢中心的中國的各種規條以及安排探討，反而東亞各國派遣人員入貢的經過，派遣人員如何對應賓禮，則過去沒有很多學者的關心。黃俊傑過去曾提出：「每一個地域的人的『自我』與『他者』的互動、衝突、重塑、轉化或融合。因此，東亞文化的共同命題或價值理念，就不是抽離於東亞各國之上的唯一「中心」或具有宰制性的單一核心價值。相反的，東亞文化的共同命題，只能在各國的具體互動過程之中形成，而東亞文化交流史也就可以被視為東亞各國建構各自的文化主體性的過程。」¹⁹⁷所以，我們需要關心各地之間的互動，通過這些互動過程了解東亞各國的文化主體與及其認同。本章以朝鮮以譯官主導朝貢禮儀與使行活動的例子，來了解朝鮮在明清易代以後的社會與文化的主體思考。

朝鮮漢語譯官在清代的使行過程中被重視，不只是單純的語言的優勢，更重要的要考慮士大夫像朴齊家所說：「國朝士大夫，以中國為恥。」既然如此，他們便順勢將文書、交涉重責交由譯官處理，並協助朝鮮爭取各種利益。本文所探析的各種史料，而舉隅的例子中，均反映著朝鮮如何在對清職責及禮儀上需要譯官，而譯官如何因這樣的背景下角色更多元化，這背後關鍵的是華夷觀

¹⁹⁷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6。

的改動以及清朝對於朝鮮的朝貢要求的改變，而作出的對應，使譯官有更多的使行角色以及協調人員。雖然因這樣的多元化的背景下，導致他們被士大夫批評，以致研究者對他們的了解認識甚少，但是在歷史書寫之中，大人物與民眾之間，亦有一群不被受重視的媒介人物，在朝廷與社會之間、中央與邊緣之間，中國與東亞之間。本文的研究對象朝鮮譯官，他們的事跡，他們的故事，正為我們了解「之間」的歷史，如何通過譯官們，得到更多深刻的對話與互動。

第五章

雖不目見——漢語譯官為朝鮮士人提供的中國資訊

一、 引言

過去不少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的學者著墨於朝鮮士大夫，了解他們書寫下的中國形象或各種觀感。然而，作為跨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文化中介者的譯者卻備受忽略。*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 的作者 Ruth A. Roland 指出受忽略的原因：

翻譯者與口譯者被歷史學家所忽略的原因有二，其一為完全缺乏歷史史料。有權力與影響者在過去甚少視僅僅一位翻譯者的名字值得紀錄。其次，不少歷史學家局限於「重要」事件和書本吩咐的限制，故不可以期望將所有趣聞涵蓋。但這樣就不值得關注這些政治史之中的重要人物嗎？¹

Roland 主要關心的是譯者在世界政治與外交的角色，他特別指出過去學者受制於歷史材料的限制，而無法書寫更多關於譯者的歷史。而且，他特別提到紀錄與書寫權來自有權力的人，自然作為中介的。換言之，朝鮮脈絡看來，《朝鮮王朝實錄》等官方史料由讀書人負責編修，故譯官的職責甚少被紀錄下來。因此，過去研究朝鮮譯學史、譯者史的學者經常遇到材料不

¹ 中文為筆者翻譯，原文詳參 Ruth A. Roland, *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World Politic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2), 8.

足的困難。不過，隨著近年不少朝鮮文獻的再整理以及數據庫的支援，²朝鮮文人的文集與《燕行錄》的出版，我們通過參與燕行使團的士大夫在使行期間有意與無意的書寫，³可梳理一些譯官使行期間的痕跡，以重構譯官在中朝之間的活動與作用。這些書寫不約而同提及譯官幫助他們認識世界。

相比於明朝，譯官在清朝提供了更多朝臣有興趣的資訊，內容無所不包。當中，最能引起朝鮮士大夫的興趣的情報，是明亡的歷史書寫與流傳。清朝士大夫或朝廷均對明朝如何滅亡，甚至一些後明朝叛亂或人物，都相當關心，在同一時空下的朝鮮朝臣也有相近的想法。但他們更希望清朝的管治得以瓦解，或有相關的想像。所以在這些事情上他們甚為關心，故特別倚重譯官收集相關情報，從而作出判斷，建構對當時清廷或明亡的想法。故此，朝士大夫亦對清廷的權力核心轉變感到好奇。按常理，作為外臣不可能掌握到皇宮內的變動，但譯官似乎為他們的好奇找到方法滿足。在 18 世紀的上半葉，朝鮮朝廷與使臣目光均放在吳三桂及其後代的活動。吳三桂作為引清兵入關的山海關總兵，及後則於雲南發動三藩之亂。他對清初管治帶來一定的衝擊，故朝鮮使臣對吳三桂是生是死及其歷史定位，都甚為關心，而通過譯官的情報讓他們據之作出各種想像與思考。⁴此外，清廷以異族入關，但朝鮮則以禮義之邦自居，故對於清人管治下的中國社會文

² 關於韓國資料庫的規模與成就，詳參河惠丁：〈韓國漢學文獻收藏及資料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 118 期（2011 年 5 月），頁 31-39。

³ 韓國文集的出版，可參考衣若芬：〈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與《韓國文集叢刊》的編纂與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203-208。

⁴ 葉高樹曾以《朝鮮王朝實錄》為材料為主，了解朝鮮對三藩之亂的立場與想法。關於此，詳參葉高樹：〈從《李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對「三藩之亂」的反應〉，《慕山學報》，第 8 輯（1999 年月份缺），頁 385-416。

化感到好奇，特別是一些地方風氣與社會禮俗等，譯官都能通過解釋滿足使臣的求知慾。而明朝利瑪竇成功在中國傳教後，西洋的傳教士或商旅亦利用了歐洲列國的網絡來到東亞等地，亦建堂於北京。西洋人引起了朝鮮人的興趣，但譯官幫助他們破除語言的障礙，成為了使臣們與西洋世界或世界各地之間的橋樑。最後，本章希望藉著一些過去朝鮮人關於中國的歷史形象書寫或是經中國所牽引而建構的各種知識，均通過朝鮮漢語譯官掌握這方面的信息，而所建構而成的認知。

二、譯官的晚明資訊與朝鮮「記憶所繫之處」

丙子胡亂後，朝鮮的中華觀重構，一方面接受政治現實而履行朝貢活動，另一方面思明、慕明思想持續延伸與深化。因此，不少士大夫藉著使行所途經的地方，嘗試對物思明，並藉此重構明代歷史，強化對於明亡歷史的想像與再認識。而譯官在這些朝鮮士大夫對明史的歷史記憶之中，產生了重要的作用。法國史的名家 Pierre Nora（皮耶·諾哈）受到 Maurice Halbwachs（阿博瓦胥，1877-1945 年）的影響，⁵提出了 lieux de mémoire（記憶所繫之處）的概念，⁶有助我們重新了解過去事件與當下歷史論述之

⁵ Maurice Halbwachs（阿博瓦胥，或譯霍布瓦克）是法國的社會科學家，早於 1928 年提出記憶從個人、家庭等私有領域或是心理層次跳出來，作社會共同分析的話題。他認為社會群體共同的經歷所成的認知，有助於個人記憶的形塑，對他來說歷史與記憶是對立的，因為記憶是主觀與情感的，歷史是客觀與實證的。但是 M. Halbwachs 的社會大眾的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理論讓 P. Nora 日後將歷史與記憶互動與並行討論，作為後來研究法國史的主要問題意識。關於 Maurice Halbwachs 的研究，詳參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並參戴麗娟：〈譯者導言〉，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卷 1，頁 9。

⁶ lieux de mémoire 的中文翻譯，譯者戴麗娟提到：「由於『lieux de mémoire』在法文中是個新創名詞，因此不容易以現成的名詞來翻譯。如前所述，法文原文中所用的「lieux」一詞，很容易讓人使用空間、場域有關的詞彙來翻譯，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外文版本都直接

間關係，他其中提到：「我們不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是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⁷其實這樣的想法不局限於法國史，亦可放置在東亞世界的歷史事件及變化的過程，如何被建立以及被傳承。以晚明的局勢變動，以及各種反清力量的演變，朝鮮使臣當然對這些議題很關心，這些關心與建構背後的考慮是朝鮮社會的尊明蔑清的社會氣氛持續影響，形成了朝鮮社會與明清易代史之間的關係。本文利用 Pierre Nora 的想法，了解朝鮮使臣與士大夫共同記憶的塑造過程，雖然他們無法改變歷史，但是按著他們面對的建學，如何追蹤晚明的史事。這樣的共同記憶如何得以被操作與認識，關鍵在於朝鮮譯官的知識。如上文所述，譯官在使行期間，通過他們的人際與情報網絡，使他們可以在一些相識的下層官員方面，掌握各類史料或訊息。以譯官張禮忠為例，根據使行的聞見報告，負責書寫的書狀官提到因為張禮忠與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的屬官有聯繫，使他們可追溯相關的歷史：

譯成記憶之場、記憶之域、記憶之處。但是若深入瞭解整套書的選題與闡述手法就可看出，書中所處理的不僅是具體的歷史建築、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等，也牽涉到許多象徵概念……譯者選擇較冗長的『記憶所繫之處』，而不採取看似較易朗朗上口的『記憶之處』，甚或『記憶亮點』這類名詞，為的就是避免此書被誤以為是用來強調紀念碑、紀念日、紀念物的重要性……」而事實上本文所探討的晚明話題，其實也包含了歷史建築，也有一些事件的回憶，因此戴氏翻譯的用詞，可說明到有關的概念在本文之中凡應用，因此本文則沿用「記憶所繫之處」作為 *lieux de mémoire* 的中文翻譯。關於此，詳參，戴麗娟：〈譯者導言〉，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卷 1，頁 12-13；另參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1989): 7-24.

⁷ 皮耶·諾哈：〈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氏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卷 1，頁 18-19。

孔耿率下將官過此，與譯官張禮忠相識，探問消息則言，立於南京者乃福王子，而年號弘光。九王令分兵二路，一向南，一追流賊，而今在黃河外……⁸

譯官的網絡與士大夫不同，原因是他偏低的身份階層，使他們可以與一些清廷的中下層官員交流，也許史料不能確認這些下層官員的來歷，但以張禮忠為例，可了解譯官在中國確實有其獨特的人脈網絡。譯官的人際關係，很多時都是與名不經傳的官員、下層成員或是技術官僚有緊密聯繫。亦因此，他們所打探到的消息，比很多使臣無法獲知的消息，這樣亦可了解使臣為了構築他們在明亡歷史的共同記憶時，譯官成為了重要的助力。當時一些像張炫的著名譯官，也曾在歷史論述的過程扮演一定角色。⁹張炫無論在朝鮮王朝的史料記述也好，還是文學書寫也好，都是一位多人所認識的譯官。¹⁰他的從姪女張玉貞曾因張炫犯罪而被沒入內人，亦因此而獲肅宗所寵幸。但張炫為後世所認識的除了其姪女的故事外，更重要的是，他曾是「國中巨富」為歷史所記述，當中的關鍵是他因為他曾擔任譯官，¹¹在周旋的過程之中，從貿易之中賺取各樣利潤而致富的。¹²但另一方面，張

⁸ 〈冬至行書狀官李奎老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1〈使臣別單·一〉，頁5a。

⁹ 金良洙：〈朝鮮後期中人집안의活動研究（上）——張炫과 張禧嬪등 仁同張氏 譯官家系를 중심으로〉（朝鮮後期中人家族的活動研究（上）——以張炫與張禧嬪等仁同張氏譯官家系為研究中心），《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1990年9月），頁28-34。

¹⁰ 2013年的韓劇《張玉貞，為愛而生》，張炫便被創作為一位希望改變兩班身份的譯官及商人。

¹¹ 《肅宗實錄》記載張炫有以下的論述：「封張氏為淑媛，初譯官張炫，以國中巨富，為楨、枏心腹……」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17，肅宗12年12月庚申，頁57a。

¹² 《孝宗實錄》曾載張炫因私賣參貨，受到處分：「參貨乃國之大禁，而張炫、張燦齎去最多，衆口喧騰。不有國法，擅利自恣之狀，殊甚痛惡。衙門移咨，至有定數之言，此輩假託之迹，據此可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卷

炫因多次往返中國，成就了他能得到豐富的情報，以了解中國各方面的信息。而關於早期的明亡史，朝鮮朝廷便可通過張炫等人了解各種資訊的記述：

譯官張炫問永曆存沒於衙譯，則七月初并其太子被殺於吳三桂家，眷三十餘人拿致北京，繫在光祿寺，女年十二待，其長配諸王子。¹³

南明永曆帝（1623-1662 年）雖然曾獲朝鮮寄予了厚望，認為可有助於明朝復國或阻止清朝全面統治中國。但是張炫查問一些清朝衙譯便知道永曆帝已被吳三桂所殺，而吳三桂自此更遭朝鮮文人所痛恨。由此可見，他們相當準確地掌握晚明的史事。當時清軍進攻與明軍抵抗的過程，張炫都能仔細及具體地論述：

過松山，譯官張炫言：癸未年間大將祖大樂守此城，清人攻之三年不下，殺傷甚衆。及城陷，大樂死，清人怒其堅守，盡坑其民，夷其城。今有新集之民居之，亦凋殘已甚。又云松山之急也，洪承疇將吳三桂等十三總兵，以衆十餘萬來救奪。據城北山清人大懼龍馬二將，請以東兵六百充前列發砲，仰攻所擊盡死。南兵震駭，承疇棄師而走，軍遂敗。炫又言松山陷時，先王與昭顯世子同在軍中，因指示城東南小阜曰，此卽御座處。又言炫其時隨侍適後，及追至先王諭以破城時，事聖懷慘然者，久之夕至

11，孝宗 4 年閏 7 月丙申，頁 15a。

¹³ 〈進賀兼陳奏行書狀官李東溟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頁 18a

杏山堡，杏山亦祖大弼所守，城陷而死。大弼，大樂之從弟也。¹⁴

張炫本人身歷明清易代，甚至是陪同過昭顯世子作為人質久居於瀋陽，自然對明亡的經過有相當豐富的認識。當然他遊走於清鮮之間，也促使他能夠比起一般的士大夫及使團成員，更能認識明亡的歷史。然而，即使時間到康熙晚期，中原經歷多年休養生息，康熙帝亦對朝鮮又大加寬待，以使朝鮮更加歸屬於朝廷。但是明亡，仍然是朝鮮士大夫甚為關心的議題，甚至是難以放下的記憶或是延續想像的對象。

有趣的是，在士大夫的使行經過不少的地方，如山海關、¹⁵寧遠等地，都成為了他們的想像、憑弔以及重組明代歷史記憶的地方。Pierre Nora 論述最重要的部份，在於地方、地景或遺跡與歷史記憶之間創造的過程。¹⁶他認為一種物質或非物質實體，經由人類或時間轉變，而成為一個社群的象徵性遺產，觀光景點的美好不是最主要討論的地方，而是同一個空間內，如何產生各種記憶而衍生的故事。在中國史研究的脈絡下，韓子奇曾嘗試以陳伯陶（1858-1930 年）、賴際熙（1865-1937 年）等南來文人在清亡以後，遷居至香港以後，追溯香港宋王臺的遺蹟及其歷史，以塑造宋王臺成

¹⁴ 〈冬至行書狀官朴世堂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頁 25a。

¹⁵ 在燕行紀錄的材料之中，山海關的內與外很多時候被朝鮮使節用作比較華夷、滿漢分別的界線，詳參張杰：《韓國史料三種與盛京滿族研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 年），頁 11-16。

¹⁶ 當然他一再強調其實場域亦包括一些概念，例如節日、音樂等也可以作為「記憶所繫之處」。因此，在所編輯之中的內容，亦包括了 Georges Vigarello（喬治·維加黑洛）探索環法單車賽與法國社會記憶的關係，如環法單車賽在不同的年代修改路線，以符合各種政治與社會的需求。關於此，詳參 Georges Vigarello, “Le Tour de Franc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ed. Pierre Nora (Paris: Gallimard, 1997), 885-925.

立了他們這些清朝遺老以及南來文人的「記憶所繫之處」。¹⁷而回到 17 至 18 世紀的脈絡之下，東北也許成為了朝鮮王朝使臣的「記憶所繫之處」。因東北既為使行必經的道路，而各個明清戰爭均發生於東北地區，他們每經過一些地點，均會查問晚明的事蹟與經歷。

「唯有在想像力賦予了象徵光環時，它才會變成記憶所繫之處。」

¹⁸Pierre Nora 這句說話所反映的地方歷史需要通過群體對物件以及事蹟作出想像與詮釋，群體與社會才會強化與加深各種記憶湧現。在朝鮮使團每所路經之地，他們經過明代的不同歷史場景如山海關、寧遠等，但歷史記憶如何被勾起，或再浮現，士大夫怎樣引證這些歷史的記憶？在這些場景之下，他們的想像力的憑證，來自譯官的解釋與引述。1721 年擔當燕行使團副使的李正臣使團到達寧遠後，¹⁹看到一個由磚石所築而非常破落的雙石城。城中有一煙台，台旁有一枱，名為「嘔血枱」。²⁰據說該枱是太宗看

¹⁷ 韓子奇指出陳伯陶等南來文人，把宋代歷史建築的「宋王臺」作為他們對於懷念故國的記憶。他們通過重塑宋代歷史在九龍城的過程，追憶宋王室在九龍城被元軍迫徙之下的經歷，而擁有共同命運的南來文人，諸如賴際熙、區大典(1877-1937 年)、朱汝珍(1870-1942 年)等利用酬唱將南宋覆亡與清室勢台的歷史聯繫而談，藉此發思古之幽情，以宋代的遺蹟展示作為忠清的遺民的文化認同。關於此，詳參 Hon Tsz-ki, "A Rock, a Text, and a Tablet: Making of the Song Emperor's Terrace as a Lieu de Mémoire," in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ed. Marc Matten (Leiden: Brill, 2011), 133-165; 並參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避地景觀〉，《臺大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3 年 6 月），頁 277-279，281-316。

¹⁸ 皮耶·諾哈：〈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頁 27。

¹⁹ 是次燕行，朝鮮使臣主要為了感謝滿清在肅宗離世時，派出大臣來唁的謝恩使團。領導使團的包括了正使行判中樞府事趙泰采、副使戶曹參判李正臣、書狀官司僕寺正兼司憲府執義梁聖揆，並由上通事金泰禎及申命瑞帶同擔任前正的金慶門等譯官、各式各樣官吏及僕役，於 1721 年 3 月從漢城出發，經陸路，渡過鴨綠江及東三省各地，於 4 月 29 日，抵達京城。並在 5 月 1 日起，開始與禮部進行各種禮節上的交涉，一行人亦有機會在北京不同地方參觀。在閏 6 月 7 日，完成禮部舉行的下馬宴，並於翌日起程，並於 8 月 2 日完成使行，回到漢城。

²⁰ 關於嘔血枱（臺）在朝鮮不同時期的《燕行錄》記載之中，有不同的呈現，具體的研究，可參考金一煥：〈燕行錄에 나타난 '嘔血臺' 의 의미 연구〉（「嘔血臺」呈現在

見崇煥修復石城速度極快，大驚後嘔血的故事。李正臣對有關故事並不理解，於是，便向金慶門請教當地的故事：

吾問故事於譯官金慶門，則對曰：「曾聞中國人傳說，清太宗時，袁崇煥鎮守寧遠，以遏進關之路。太宗攻之數年，不能拔，常與謀士坐台上，俯瞰城中，而講究必破之策。一日別作大砲，打壞城之一面，議以明朝督精銳，長驅以入，復來登臺，方欲麾兵而進，望見新堞完然，崇墉屹屹，其毀者已完於一夜之間。太宗大驚曰：『何其神也。』魄褫心死，嘔血數升，仍即退軍，當其放砲毀城之日。守者奔告崇煥，崇煥方對客圍碁，點頭而徐答曰：『已知之矣，慎勿煩言。』而驚惧眾心，招從事一人，附耳語數句，從事唯唯而退。作大布帳畫輓築之形，以蔽其毀處，潛自其內修築，不日而城完。太宗追聞之，歎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崇煥在時，不敢復侵。未幾，崇煥殺死，祖大壽代之而城遂陷，台之名嘔血以此云。」²¹

其實與李正臣相近經歷，在其他燕行使的論述亦可經常看到。如洪萬朝（1645-1725 年）曾撰下了燕行詩：「鏖兵斬將笑談中，三至流言誤聖聰，自是威風曾破膽，北軍猶鮮畏袁公」²²金景善的《燕轅直指》另曾撰《嘔血臺記》，當中內容特別提到：「嘔血臺世傳袁崇煥守寧遠地，清太宗引兵

燕行錄的意義研究），《한국문학연구》（韓國文學研究），第 43 期（2012 年 12 月），頁 197-233。

²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45b。

²² 洪萬朝：《燕槎錄》，〈寧遠衛憶袁軍門崇煥〉，頁 39-40。

襲之時，我國譯官適過此，入見袁公。公積書萬卷，靜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將入白事，公點頭，而已引我譯上小樓，拓窓俯瞰少頃，城外砲聲如雷，無數清兵飄騰於煙焰之中，蓋預埋地雷炮於城外，敵至而發也。翌日，公登城臨視，歎曰：『殺人此多，吾其不免乎？』清太宗僅以身免，與十餘騎逃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後勿更來。』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藥氣者，飲酒則死，吾之送酒，有若誘人致死，非義也。』令追還而不及，清太祖果憤恚至此，嘔血而殂，故因以名臺云。」²³金景善同樣提及到上述的，均是譯官路經戰場之下，而記載了嘔血臺的經歷。

無論是李正臣抵寧遠得到金慶門的介紹，還是金景善的記載，嘔血枱這個到底有否存在的物件，就像 Nora Perrie 所說的記憶所繫之處，被人作為延續各種想像與論述。群體，即朝鮮士人，通過嘔血臺，塑造一些論述與故事，即袁崇煥的英勇衛國以及能夠擊倒清軍的重要場景為主，朝鮮士人在情感上，對於袁崇煥的成就，帶有認同、肯定與同情。雖然在洪萬朝的論述之中，不能確認他是怎樣得悉袁崇煥的歷史，但李正臣與金景善的例子說明了譯官與歷史記憶形成與建構的關係，通過譯官的記憶，建構了他們對袁崇煥的英雄形象的想像。

李正臣抵寧遠時，已距離寧遠之戰（1626 年）接近百年，而金景善更超過 200 年，他們當然沒有親歷戰爭，而是通過旁人的解話，才可得以認識寧遠以及嘔血枱的事蹟，以及其背後的故事。這可歸功於長期往來中朝兩地，如金慶門般的譯官，成為了群體與記憶所繫之處間的媒介，同時強

²³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2，〈出疆錄〉，12 月初 8 日，嘔血臺記條，頁 63-64。

化了對袁崇煥英勇衛國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亦影響到他們對尊明思緒的建構。所以，記憶所繫之處如何產生各種歷史記憶，還需要從旁的人或是掌握知識的人，來強化、改變以及重構地方與群體之間所產生的記憶。

同樣在寧遠，有另一座的歷史遺跡，同時也是與晚明史有關的，但所產生的歷史印象與記憶卻有所不同，就是位於寧遠的祖大壽（？-1656 年）與祖大樂牌樓。²⁴與相約時間參與另一次燕行的俞拓基曾於其《瀋行錄》撰寫路經祖氏樓牌的經歷：

街上有祖大壽、大樂牌樓，柱梁亦補上尾，傍壁皆用文石雕畫，雲龍花卉窮極奇麗，不可殫記。一樓橫刻四世元戎四字，下刻松價如新，培慶善于四世。琳琅有赫貴永譽于千秋。一樓橫刻登壇駿烈四字，下刻桓桓興歌，國倚干城之重，絲綸錫寵，朝隆鍾鼎之褒。楣顛皆刻玉音二字。其下列刻誥贈某官，祖鎮、祖仁、祖承教、祖大樂、祖大壽、祖澤溥、澤沫、澤洪、祖膽等字。中土人凡有科名官爵，輒自揭牌坊於其門，州縣官亦送扁相賀，有金馬大隱奕世冠冕貞節篤孝等許多稱譽關以內累累相望其中高官又必立碑坊於所居地，施以丹碧填以金彩，或刻誥命，或刻官爵，其下又列其祖考姓名以及子姓間亦多以石為之者，而未有若此之侈麗宏傑。祖家父子兄弟受恩如此，自大如此，而大壽兄弟甘心

²⁴ 祖大壽是晚明極具爭議性的邊將，他在袁崇煥被調走後，曾領導明軍能夠與清軍持平。然而，後來因種種軍事的策略，人事問題等等，最終被迫而降，最終清軍亦順利盡快入關，建立新朝代。關於祖大壽的生平及其評價，詳參李洵：〈祖大壽與祖家將〉，《社會科學輯刊》，第 61/62 期（1989 年 1 月），頁 159-165。

降虜倒戈，本朝痛矣，本朝痛矣。²⁵

李光濤（1902-1984 年）曾在其研究之中引用金景善的「祖家兩牌樓記」探討祖大壽史料時，²⁶金氏提到兩牌樓乃：「世所稱燕行奇觀之一。」²⁷他對於祖氏於寧遠之中興建歌頌祖氏自家成就時，亦認為：「距國亡不過五六年耳，不思與士卒同甘苦，而厚自封殖，憑恃寵靈，起樓止第，競奇務新，畢竟身為俘虜，墜盡家聲，為天下僂，豈不惜哉？」²⁸

李正臣與金景善、俞拓基等一樣，抵達寧遠看到明末將領祖大壽在寧遠看到一牌樓時，與他們不同的是，李正臣得到譯官金慶門的幫助，通過具有一定中國歷史與社會知識基礎的他，了解到當時寧遠牌樓的故事以及背後所傳載的記憶：

吾問此牌閣於金慶門曰：「此是誰人所造，而事實何如？」慶門對曰：「大壽者，即壬辰倭變時，初將一枝兵，來敗於平壤地，皇朝遊擊祖承訓之子也……蓋承訓，仍任關東兵僕，陞至總兵。其子大壽、大樂等，世為兵官，而崇禎天子，至以大壽為元戎，以代袁崇煥，夫妻日捧銀七十兩，以寵異之，如此跋扈次代猛虎也。大壽不思盡心禦敵以報國恩，耗費軍餉，作此牌樓，自以為

²⁵ 俞拓基：《瀋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 38，頁 56-57。

²⁶ 李光濤：〈記明季虜禍之大凌河戰役〉，氏著：《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 年），頁 538-539；並參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2，〈出疆錄〉，12 月初 8 日，祖家兩牌樓記條，頁 66-71。

²⁷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2，〈出疆錄〉，12 月初 8 日，祖家兩牌樓記條，頁 59。

²⁸ 金景善：《燕轅直指》，卷 2，〈出疆錄〉，12 月初 8 日，祖家兩牌樓記條，頁 59。

誇耀一世，流芳百年，及其敦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開門納降，猶恐不及，寧遠一陷，關外勢如土崩，以致明朝三百年社稷，一朝灰燼，此皆大壽之罪也。」

窃以爲大壽雖死，而牌樓尚在，人得而指點而唾罵之。其所願誇耀而流芳者，適足以遺臭而聲罪也云。²⁹

金慶門向李正臣解釋祖大壽以牌樓來誇耀自身成就，而李正臣從金慶門口中得知後，牌樓的存在本作一種祖氏對自己功績成就的肯定。但最後落入後世，特別是朝鮮士人群體的記憶與理解中，成為了遺臭萬年的建築。儘管不少士大夫都知道祖大壽的經歷，但通過如譯官金慶門的說明，士大夫可從中有知識與歷史的知識，築建了自身對祖大壽樓牌的觀感以及想像，以及所信仰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燕行使團抵北京前，大多途經山海關，而正如黃普基的分析：「朝鮮使者在奉命出使中國之前，便已經通過前輩們的使行記錄等各種渠道，大致了解了山海關的存在。因此，每個將要使行到中國的朝鮮人，心裡都充滿了對山海關的想像和期待。在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跋涉之後，當朝鮮人終於看到這座守偉的『中華建築』時，其感慨可想而知。事實上，這些感慨都被寫進了他們的使行紀錄中。」³⁰正如黃氏的敘述，在明代也好，還是清代也好，似乎相對於寧遠，山海關更具有繫上文化記憶的「中華建築」。但到明清易代以後，山海關被論述及再現新的意義。它由保護中原國土與

²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47b-48a。

³⁰ 山海關是燕行使團必經之路，故不少使臣常對山海關有所興趣，詳參黃普基：〈明清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4期（2013年7月），頁81-85。

文化的重要關口定的功能，轉變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所在地，³¹悲傷的感受，不敢回想的記憶，在朝鮮的使節的想像與談論中得以看見。1721 年擔任正使的趙泰采（1660-1722 年），他便提到：

何年虜騎入關門，往事傷心不忍言。大地即今殊內服，外夷
從古亂中原。衣冠盡化氍裘俗，堡壘渾成羯狗村。天壽山空香火
冷，小邦無複答皇恩。³²



圖表 6 佚名繪《燕行圖》山海關

山海關成為了國家滅亡，外夷亂中原的痛苦傷感之處。擔任同行副使的李正臣，抵山海關後，本想請教山海關的歷史由來，但卻被金慶門把討論的重點延伸到吳三桂打開山海關的故事：

吾問譯官金慶門曰：「此是秦代所築，年久自然如此乎？」慶
門對曰：「曾觀明季人袁儼（1581-1627 年）所撰九邊畧，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遼東在於瀋北開元之外，而遼陽又在於瀋東。其文

³¹ 黃普基：〈明清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頁 84。

³² 趙泰采：《二憂堂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176，卷 1，〈永平途中〉，頁 9a。

曰：『棄外遼東，而形勝日蹙。』據此則今之遼陽，恐非秦時築城處也。山海關則傳聞初續築之，自長城南，抵海八百餘里以為防，此必載村山海關志，而未得目見，今不敢強以為說也。以此推之，門扁天下第一關五字，又非李斯所書明矣……皇明之末。以吳三桂為捻兵，率重兵守之，以拒塞清人。癸未，清太祖殂，太宗新立，年甫八歲。清人以此退保瀋陽，姑無侵犯之意。甲申之歲，皇朝為闖賊李孜省所亡，自成竊據神器，而畏三桂之在東。執三桂父讓，使讓貽書三桂，勸其來降。三桂答曰：『父不得為忠臣，子安得為孝子？』自成怒殺讓，駟大兵來擊之，三桂窮蹙，遣其副將，請兵於清。時太宗之弟號九王者，居攝任政，聞即起兵，三日而到關外，止舍於十里地。三桂治道以迎之，九王不肯進兵，令三桂躬請軍前計議。三桂不得已以數十騎出而見之，九王執而薙其髮，又不許由門進城。使三桂，先入鑿城開道，然後翌曉整眾以入，軍皆黑巾裹帽。列騎於內城之外，馬尾依城而馬首向西，及朝日出上而去其中，帽皆紅。自成兵望見，長城一面，皆清兵，奪氣而自亂，聲若天崩。九王初以三喊為號。第二喊策馬進擊之。追殺四十餘里。自成兵無一遺者。自永川府以西。所過州縣，焚香迎接。自成載其金銀重寶，奔至長安。九王長駟數日，直入燕宮，官民耆老，莫不出迎，此乃天也。今此城缺之處，不即修塞，抑或以得天下之由，此竇故耶云。」³³

李正臣對山海關的記憶與好奇，本單純停留於山海關創建之歷史起源，但

³³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117-118。

金慶門卻從秦代所建山海關的話題轉移到討論吳三桂於山海關駐守及開關的傳聞。金慶門指雖然一些開關內容是存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不是吳三桂是否因父親而決定開關，還是九王多爾袞在入關後的軍事成就，而是在朝鮮的文獻之中呈現，朝鮮譯官等把山海關直接刻入於朝鮮文人的記憶中，就是將明亡的歷史，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故事，這些歷史記憶雖然不一定是正確，但卻是朝鮮群體之中的共同記憶，這種共同記憶的生產，譯官作為這些記憶生產的主要的資訊媒介與知識供應者。集體記憶是一種主觀的共享的思考，很多時被建構為群體所共同經歷與傳承的事情，而再現的形式與方法，很多時候通過某種媒介來反映與延續。譯官便把朝鮮使臣及士大夫對明亡的記憶重組及再現，利用了使行途經的地方的建築，以傳承著他們所塑造被固定與延續的歷史記憶。

三、 朝鮮譯官的敘述與朝鮮士人的吳三桂歷史記憶

既然明末的歷史與各種記憶，是朝鮮後期社會的主要華夷觀思考來源，而明末清初關鍵的人物，自然是極具爭議的吳三桂。王明珂是華文學者強調「歷史記憶」研究方式的學者，他主張以迥種新的態度來閱讀史料：

我認為，歷史記憶研究不是要解構我們即有的歷史知識，而是以一種新的態度來對待史料——將史料作為一種社會記憶遺存。然後由史料分析中，我們重新建構對「史實」的瞭解。我們由此所獲知的史實，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陳述的人物與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選擇、描述與建構中，探索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與個人情境（context），特別是當時社會人群的認同與區分體

王氏的論文通過歷史記憶的觀念，嘗試列舉西周到漢初的歷史人群認同，來了解古代史裡，社會人群如何從史料裡形塑華夏認同。同樣地，以王氏的想法轉化來了解各種中國、朝鮮方面關於吳三桂的史料時，亦可發現吳三桂被視為朝鮮士大夫群體裡形成的共同記憶。但本文更關心的是吳三桂如何被塑造，以及資料背後的選擇與描述，由誰來區分與定義，在朝鮮各種針對吳三桂所書寫的文獻，大多也與漢語譯官的情報相關。而譯官的個人環境以及他們對資料的選擇，可作為我們深入了解吳三桂的歷史知識與記憶流傳於朝鮮的關鍵。

吳三桂作為極具爭議性的人物，葉高樹曾提到 1980 年代以來，華文學者有感於吳三桂被清廷的史料影響下，而被論述為「投降主義」或「勾結外人」的代表，於是開始重新對吳三桂重新研究，亦因而就此引發了論戰。³⁵於是，吳三桂的歷史定位因而再重新的討論，而葉高樹整理清代的各種文獻，為學界梳理了吳三桂形象形成與轉變，亦有助我們了解吳三桂如何不斷層累地建構的各種評價與想像。³⁶而近年史料的擴闊，學者亦特別留意朝鮮的記載也是重要的史料來重塑中國歷史的論述，³⁷故也使一些學者

³⁴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2011 年 11 月），頁 139。

³⁵ 關於此，詳參葉高樹：〈大陸學者對吳三桂「降清」問題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2 期（1991 年 9 月），頁 114-120。

³⁶ 葉高樹：〈清代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與評價〉，《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2000 年 6 月），頁 85-108。

³⁷ 其中可作全面了解的研究，可參考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頁 209-242。

也聚焦朝鮮士人如何理解吳三桂形象變遷，當中較多人注意的是葛兆光曾撰文探討其評價的轉變，當中葛兆光曾整理道吳三桂被書寫的因由：

吳三桂開關納降，清人直取北京，成為明清歷史的一大轉折點，也使吳三桂成了朝鮮人眼中的歷史罪人。吳三桂作為明朝大將，不御敦於國門之外，反而開門揖盜，引韃虜進入關內，使神州淪陷，在始終眷念大明帝國的朝鮮人看來，這是十惡不赦的惡過。嚴守華夷界限的朝鮮人，對於忠烈與叛逆的愛憎甚至比中國人還要分明。³⁸

葛兆光的論述不單看到歷史把打開山海關的吳三桂，定性為明亡的歷史罪人，而且吳三桂在清初的行為多變，也使朝鮮人對他的行動與各種演變也甚為關心。因此在一些燕行錄的書寫之中，可以看見不少關於吳三桂的論述。葛兆光特別提到三藩之亂期間，燕行使節如何觀察以及收集各種消息。可是，葛兆光主要通過《燕行錄》以及《朝鮮王朝實錄》來探討，但是《同文彙考》之中，書狀官呈交到朝廷的材料裡，均提到這些材料的主要來源，是譯官的查訪所得知的。據《同文彙考》所載，關於康熙 12 年（1673 年）李宇鼎（1635-1692 年）擔任書狀官的使行過程的聞見資料，曾提到使團成員已打聽到吳三桂已有與尚可喜及耿精忠等人共叛的消息，並派出譯官去打聽。當時打聽到的消息，只有吳三桂自己發動的叛亂，而三王合叛只是虛傳。當然吳三桂的起事後的發展推翻了這種論調，但是重點是，譯官成

³⁸ 葛兆光：〈吳三桂非姜伯約：從清朝初年朝鮮人對吳三桂的評價說起〉，氏著：《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笥記》，頁 84。並文另外亦曾以單篇形式發表，葛兆光：〈亂臣、英雄抑或叛賊——從清朝朝鮮對吳三桂的各種評價說起〉，《中國文化研究》，2012 年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22-31。

為了他們去了解這些情報的重要渠道：

使譯官更探三王共叛與否，則衙輩曰：「即今所捕者蓋是三桂子駙馬所屬也。尚耿兩王親族之在職者頗多，而晏然供仕，三王共叛之說實是虛傳云。因問出師之期則答曰：一陣則今廿八當發，一陣則來初三當發，一陣則來初十當發，而一陣所屬之兵不下三四萬云，合以計之則近十萬，而實難的知又聞。」或者曰：「吳三桂，自雲南多送其徒黨散處閭閻，皆以白帽紅帶為標，將期日舉事人有上變旋，即搜捕傳相告引舉皆就服。昨日刑七十餘人，今日刑六百餘人云。」³⁹

在同一別單裡，李宇鼎也提到譯官朴有炰、朴廷蓋、金時徵先後取得多種文書，分別提到湖廣總督蔡毓英的奏本指「滇黔已失，楚省危在朝夕，仰祈皇上速發救兵云。」又關於吳三桂實為獨叛之舉，而非與尚可喜與耿精忠合作：「因三桂之叛，停止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搬移之舉，而以照舊管理封疆之意，別為下諭者也以此觀之，則前聞吳三桂獨叛之說果不誣也。」亦提到當時聯同了王輔臣（?-1681 年）一同共叛：「吳三桂差人送書于陝西總督王輔臣，約與共叛，則輔臣執其來人，遣子馳奏併達其書，皇帝以茂著忠貞克篤臣節之意，別為下諭矣。」⁴⁰從當時譯官所收集關於起義的情報以及北京朝廷所掌握的資訊，基本上是同步的。由此可見，譯官收集了關於吳三桂詳盡而豐富的材料。而當中這些情報不少均由張炫所

³⁹ 〈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李宇鼎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康熙 12 年，頁 34a。

⁴⁰ 〈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李宇鼎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康熙 12 年，頁 34b-35a

收集的，據姜碩耆（1632 年-？）的記載：

瀋陽甲軍自關內適到，言于張炫等曰：「皇帝教以吳三桂，馬九百匹時在錦州衛放牧野中，三桂已叛。其馬不可置關外，可令瀋陽甲軍竝驅入關內，故俺等領馬交付關內。」……

通官奴自王子家來密言于炫等曰：「王可臣叛後，江西十三府七十縣大半離叛以應吳。」自三四日內急報，連絡入來又言：「吳三桂及鄭耿三將專力江西，而九處分路進與清兵抗，故清兵不能防遏，連續請援北京之累，出兵實因江西之危急也。」炫等答：「以江西一省，大半離叛出兵頻數，京城空虛，豈非可憂哉？」申奴曰：「南征之師雖多，精兵三萬長留京城坊曲把守，戒嚴領將在十字閣未嘗暫離云。」張炫等問于通官金德之曰：「曾聞爾言十月初三日發兵，而今聞初二日出兵何急而然耶？德之曰：「近因浙江省密報，初二日出兵四川等地，又因平南王尚可喜密報初六日發精兵三千出廣東，而貝勒王第四子安親王為大將領去云。」通官金德之與張炫等，相對閒語忽附耳言曰：「近聞兵部密奏以為吳兵日盛我軍數敗，若非東國烏銃難可制敵，通于本國取用。為當皇帝答以『彼新遭國恤姑待封王勅使之行可以取用。』」炫等問：「其銃數幾何？」答以：「今姑未聞。」且再三戒飭曰：「此事甚秘慎勿出口云。」其後得兵部密奏果有此……⁴¹

據姜碩耆擔任書狀官的出使過程之中，適逢康熙 13 年（1674 年）吳三桂

⁴¹〈陳慰兼進香行書狀官姜碩耆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康熙 13 年，頁 38b-39a。

開始發動三藩之亂，從這樣的時代背景看來，會明白當年的朝鮮官員與朝廷都對吳三桂的事件甚為關心。當時的正使金壽恒（1629-1689 年）特別派出譯官金時徵（1634 年-？）先行回國送回狀啟，讓朝廷能夠短時間內掌握吳三桂興兵經過。

謝恩使金壽恒等，使譯官金時徵先來，其狀略曰：「吳三桂不欲北還，拘執使者而舉兵叛。三桂子應熊，曾為順治帝妹夫，留仕北京，清人拘囚闕中，後竟絞殺。又曰，西山有朱姓人，稱崇禎第三子，聚眾萬餘，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放火北京城中，因謀作亂，事覺逃竄，分捕其黨，隨即誅殺。以多夏所紅王，為上將，領兵十餘萬，往討三桂，王即古八王之孫，於帝為再從親也。勇略過人，清人倚以為重云。又三桂密送書陝西提督王輔臣，約與共叛，輔臣執其來人，遣其子馳奏，竝達其書，皇帝降旨獎諭云。」⁴²

朝廷其實對吳三桂的事變相當的關心，而譯官就此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為持續為朝廷提供了重要的情報，如得知吳三桂改稱國號、鑄錢幣以及戰事的情況：

譯官李芬得丁巳九月通報，則吳三桂改國號周，稱重興四年，鑄重興通寶，雲南、貴州、四川、漢中、湖南諸邑俱經使用云。卞爾輔得通報二度：一、丁巳九月初七日吳三桂遣其姪吳大、吳

⁴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第 22 冊，卷 22，顯宗 15 年 3 月丙寅，頁 8a。

三領精兵十萬，自雲南貴州至漢中百里一壘相望不絕，攻取陝西，
又得四川云。一、同月十九日，吳三桂遣將軍十九員，自雲南陸
續發行，前進湖南移駐岳州云。⁴³

而除了得到通報外，譯官亦從清情報中得知吳三桂的死。據康熙 18 年（1679 年）李華鎮的聞見別單之中提到首譯安日新曾查問當地清人後，得知吳三桂已死，岳州等地已收復，只是雲南四川猶為吳所佔據的消息。⁴⁴所以譯官通過語言及其情報的網絡，為朝廷掌握了各種吳三桂的情報，甚至是清廷如何看待吳三桂的部下，譯官也似乎掌握得相當的全面。康熙 20 年，書狀官李三錫記載，該使團譯官曾向杏山堡主人了解到吳三桂女婿馬寶（1628-1681 年）被擒後不肯於康熙前屈膝的經過以及馬氏表明自己「吾以敵國之將不幸就擒，豈云叛耶。」⁴⁵

這些情報的收集，當然不全是譯官的功勞，而譯官看來只是作為資訊傳播的媒介而已。情報如何閱讀以及產生各種思想與討論，或許我們不能看到很具體的影響。但將之視為一種閱讀經歷，譯官的情報以及詮釋還是有其價值。畢竟譯官介入其中，朝廷與士大夫才可了解吳三桂以及閱讀其相關的資訊，產生各自對吳三桂的觀感。如李正臣在 1721 年 4 月 20 日出使期間，北京城前，他經過沙河站附近後，李正臣被馬頭誤導，以為當地

⁴³ 〈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孫萬雄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2，〈使臣別單二〉，康熙 16 年，頁 2a-b。

⁴⁴ 〈進賀兼謝恩行書狀官李華鎮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2，〈使臣別單二〉，康熙 18 年，頁 4a-b。

⁴⁵ 〈謝恩行書狀官李三錫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2，〈使臣別單二〉，康熙 20 年，頁 11a。

的四大碑乃吳三桂的塚：

馬頭告曰，此乃吳三桂塚也，又行一馬場，村中有四大碑，
第一碑，刻曰皇明勅贈榮祿大夫都督府都督同知王公承勳神道云。
第二碑，刻曰皇明勅贈榮祿大夫都督府都督同知王公徵神道云。
第三碑，官啣上同，忠菴王公神道云。第四碑，官啣上同，惠軒
王公神道云云。此必上所謂吳三桂墳者，非三桂也，即王承勳世
葬地也。⁴⁶

而當時糾正李正臣的是譯官金慶門，李正臣記載道：「譯官金慶門謂我曰：
『清皇帝盡殺三桂之九族，盡掘三桂之先塚，況三桂死於南方，豈葬於此
乎？』」⁴⁷李正臣生活於康熙晚年，與康熙 13 年爆發的吳三桂事件相距超
過 40 年，而他自然所知的幾乎不多，於是他主動請教多次往來中國的金慶
門，了解更多關於吳三桂的情況：「吾謂金譯曰，君知三桂事顛末乎？試為
我言之。」金慶門表示：「甲申闖賊之變，大明覆亡。此際吳三桂持重兵守
大藩，不顧父死，請兵於清朝，殺賊報讐。天下之論三桂者，毀譽紛紛，
要觀末稍所為。其後三桂果起兵，幾得天下半，旋忽身死而兵敗。前日之
譽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氣焉。」⁴⁸

在這段說話之中，金慶門很簡單概述了有關的資訊，不過他續下來說：
「小的於十年前，以事久留鳳城，偶與三桂舊將之子，減死徒關東者及四

⁴⁶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51b-52a。

⁴⁷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52a。

⁴⁸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52a-b。

川人目擊三桂時事者，同榻數月，得其事顛末甚詳。」⁴⁹因為工作緣故，金慶門停留在東北一段時間，期間與三桂舊部曾有交談，當中說明了譯官所掌握的情報，與朝鮮朝廷一些想像自然所有不同：

蓋其反清朝，非爲故君之地，實自爲之計也。初則受封爲西平王，俄奉清朝之命，攻永曆皇帝於緬甸，生擒永曆皇帝，俾絕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他及後舉事，自稱大周建元昭武，則其身死而兵敗者，不獨清朝威武之所加，想應明朝列聖在天之靈，陰有以滅絕之也。其無父無君之罪，可勝誅哉。此與前日所聞，大相逕庭，故嘗著一文字，獻于諸大人，今承明問而路次忽卒，未能詳記，當竣故國，敬以其文字呈覽矣云云。⁵⁰

其實金氏將此段紀錄轉給閔鎮遠，而閔氏的《燕行日記》之中就有收錄了金慶門的手本〈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⁵¹全文手本分為幾個部份，王政堯曾對此作出分析，分別是「所記吳三桂的起因和當事人簡況」、「概述吳三桂降清和三藩之亂始末」、「朝鮮使官對吳三桂的認識與評價」。⁵²然而，筆者認為值得重新閱讀該材料的是，金慶門如何得知有關的材料，據金慶

⁴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52b。

⁵⁰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52b-53a。

⁵¹ 但按閔鎮遠的《燕行日記》記載，金慶門並不屬於當時他出使副使時的隨行譯官，但暫時無法了解到，何以閔鎮遠會將其手本收錄，他如何取得，值得更多的討論，但此例可說明士大夫。

⁵² 王政堯曾撰文引用金慶門此段手本為例，探討《燕行錄》在政治方面的意義與價值，關於此詳參王政堯：〈《燕行錄》初探〉，頁4-5。當然王氏論文主要探討《燕行錄》作為材料的價值，但本文採用金慶門一文卻說明譯官在朝鮮士大夫對吳三桂以及明亡史的情報、形象建構與歷史記憶之中的作用，論文方向及探討目的，與王氏有所不同，但王氏卻較早把這種材料引用，作為中朝關係史或中國史探討的學者。

門自己說指：

辛卯夏，自燕東歸，到鳳凰城寓於項繼聖家，繼聖父琬曾為吳王桂將王緒之掌書記。三桂敗後，徙家關東，故繼聖詳知三桂事首尾。禮部筆帖式黃儀，四川人以渭源犯越查官來住城中，亦言三桂事。⁵³

當然該文相當具體交代了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到三藩之亂的過程，偶有文字記述的誤差，但學界均認為金慶門掌握的情報，如當時其他的材料資訊基本上是一致的。⁵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譯官的他可在一些下層官員之中如項繼聖或黃儀等人取得各種情報。雖然這些人不入史冊，但是似乎這種形式情報的網絡，成就了譯官協助朝鮮士大夫能有豐富的了解。在金慶門手上所掌握的吳三桂起事的材料之一，包括了尚善敘述吳三桂的五不義之舉：

有尚善貝勒者，崇德皇帝從叔也，有才智，世謂之賽孔明，為三桂素所敬。至是貽書三桂，責其五不義。書不能記，而其意略曰：「自成之入，公手握重兵不能一戰退賊而恐視父死，乞兵清朝。及其君父之讐既報，宜即退伏田野以避，利達之餘而乃受王封身享富貴，此其不義一也。永曆寄身南裔，朱氏血食只一片土。

⁵³ 閔鎮遠：《燕行日記》，〈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頁 127。

⁵⁴ 例如金慶門文中提到吳三桂的將軍時，他提到「桂將王會、王緒、王屏垣、馬三寶、吳國貴等」王屏垣應為王屏藩，但王政堯文中曾誤讀該句為王會、王緒、王屏垣為三寶，實應王會、王緒、王屏垣和馬三寶（1628-1681 年）。馬三寶為馬寶的別名，故此資料之中實際上沒有記錄錯誤，只是解讀上出現了誤會。關於此，詳參閔鎮遠：《燕行日記》，〈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頁 128。

公以 明寓世臣甘心擒獻，而自王其地，此其不義二也。大清封公為王，侍以不臣之禮，嫁女娶婦，恩若骨肉，德至聖也，尚何忍反？此其不義三也。公既反則宜推戴，故君之子揭示天下，以不忠本之意，而公乃汲汲自取此，其不義四也。公只有一子二孫，而時在京師，公之祖墳在寧遠，九族之在關東者甚多，其必將鋤滅盡矣。而公猶悍然不顧，此其不義五也。夫蜂釀蜜成而身則斃。公年今七十餘，日無幾，竭力經營，子孫無托，公其為誰而作此舉耶？」三桂見之，流涕不能答，病遂死。⁵⁵

據當時其所得知的書信指尚善批評吳三桂的起義行為有五不義，既對於清朝不義、對父親不義、對明朝不義、對本職不義、對家族不義等，可見當時尚善這種論述是確定了吳三桂是裡外不是人的形象。而據王政堯的研究，進一步解釋到當時尚善的《五不義書》，實即今天文本可見的《寄吳三桂書》。而《燕行錄》如何有助我們解當時《尚善》的《寄五三桂書》在民間社會廣泛流傳：

《五不義書》與《寄吳三桂書》不僅在內容上、同時在行文上均有相近、相似之處。其次，《五不義書》之言者有言在先，『書不能記，而其意略曰』，更何況此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因此，筆者以為以上二信似應同屬於一封信，不知確否。另外，就當時的形勢而論，尚善也不大可能再給吳三桂寫類似內容的信了。簡言之，朝鮮使官於康熙五十年記錄的這封信，說明此信在事隔三十多年後仍在民間傳播，進而說明尚善此信在當時就已流傳，並

⁵⁵ 閔鎮遠：《燕行日記》，〈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頁 128。

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康熙帝命尚善寄書吳三桂的目的。《五不義書》出自當時人之口，從而為《寄吳三桂書》提供了一個極其有力的證據，加深了它的可信程度，促使人們對之更加重視，予以研究，由此擴而廣之，《燕行錄》對我們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了。⁵⁶

王政堯的研究指出《燕行錄》幫助我們了解當時吳三桂起義的消息流傳情況，但站在其研究之上，藉此補充金慶門仍然可以多年以後在民間搜集到這種消息。由此可推論，朝鮮的譯官因長期於中國民間活動，以使他們有足夠的消息來源掌握相關的情報與資訊。因此通過一些下層官員以及其所見所聞，使金慶門對吳三桂起兵有深刻的認識：

三桂之初起兵也，我東聞中原人皆以為三桂必將復立皇明子孫，以圖興復云。今聞黃儀之言，大異所聞嗚呼，甲申之變，尚忍言哉！三桂力不能卻自成，引敵入關，遂以天下與之，而又擒獻永曆，仍王其地，及後舉事，則改元建國，肆然稱帝，夫豈有朱氏之心哉。以此觀之，其罪有浮于自成，天下萬世之逆賊也。儀言三桂事錄如此，而此外亦多研聞，書以記之中路見逸，及今追思，茫然姑記大略，以俟他日考異云。⁵⁷

金慶門道出的一點，也許是重塑朝鮮在三藩之亂期間曾經產生的錯覺，即誤以為吳三桂是復立朱氏。譯官張炫亦曾獲得漢人的情報：「吳三桂立朱氏

⁵⁶ 王政堯：〈《燕行錄》初探〉，頁5。

⁵⁷ 閔鎮遠：《燕行日記》，〈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127-130。

後，渠方在雲貴地，使鄭耿兩將，水陸相抗。三桂已據有南方三省之地，而處處起兵應之。」⁵⁸然而，這種想像沒有引起了朝鮮反清的想像，亦沒有像朝鮮孝宗一樣計劃北伐，反過來小心地關心各方的情報。然而，不久朝鮮亦意識到吳三桂其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復明義舉，而以金慶門所告知李正臣的內容為例，可以確認的是譯官擁有士大夫不同的情報渠道，獲得了相當不同的資訊，但同時他們作為文化的翻譯，他們經過自身的詮釋與考量，而使成員對吳三桂事件有基本的了解，並按著他們的論述而作出一些評定。葛兆光曾指出：「無論是大清國官方『十惡不赦』的定論，還是漢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惑懷，還是朝鮮官員懷念大明鄙視大清的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吳三桂釘在了耻辱柱上。」⁵⁹如把這一點的論述如再放置在金慶門與李正臣之間對吳三桂的論述，可見朝鮮官員的吳三桂論述，是一種被譯官去再轉化以及引導而成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結合了譯官當時的所見所聞，其人際網絡使他能接觸的資訊，以使李正臣等朝鮮官員相信以及接受這一種記憶為他們對歷史的認知。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金慶門的說明，轉變了朝鮮士大夫對吳三桂事件的解釋，衝擊了過去帶著尊明斥清想法的朝鮮使節的思想，⁶⁰對於為前宗主國滅亡的原因，有新的想法，亦都有助改善朝鮮人對清廷態度的負面態度，不再視清為「滅明仇人」。由此可見，譯官在使團的作用，不只是單純的語言翻譯，而是實際上影響著使團使節對外認知的關鍵人物。

⁵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1，肅宗元年 11 月 7 日丙寅，頁 24b。

⁵⁹ 葛兆光，〈吳三桂豈是姜伯約？——清初李朝朝鮮君臣對吳三桂的觀察〉，頁 100。

⁶⁰ 葛兆光，〈吳三桂豈是姜伯約？——清初李朝朝鮮君臣對吳三桂的觀察〉，頁 71-81。

四、 譯官與清廷宮廷的情報收集

當明清易代已定成事實，朝鮮士人的目光亦不再單從東北地方的景物來建構自己對明亡、晚明的記憶，而是更好奇於清人管治以及他們與明朝之間的差異。其中可窺探一二的，就是宮廷內裡的情況，成為了譯官讓士人了解的情報主要內容。譯官經常出入於北京以及朝廷，與各級官員均有聯繫，故一些王室與宮廷內如太子廢立與繼位形式的問題，譯官通過他們的網絡，可從中國方面收集相關方面的情報，像《同文彙考》中記載在康熙晚年，使臣臨昌君李焜（1663-1724 年）在出使期間，請託使團首譯了解太子廢立的事情。

皇太子廢立事情，使首譯每加探問，則大通官文奉先以爲頃年皇帝問大臣近臣曰：「太子已廢，爾等各言所懷，諸臣中多有言八王賢者。」皇帝曰：「天下神器，不可人人而授之。怒罷，朝自是內外諸臣，尋常悚慄。文奉先又曰：「近來皇帝之待太子比當初頗緩，太子有三子常時不得任意出入，太子所近日皇帝時許入見，且太子所坐多因讒言其實頗冤枉。而太子貌類皇帝，畢竟似當復位。」文奉先又曰：「皇帝自有太子事以後，居常不平，諸臣或有意外遭譴者，不但一時革職而止，輒令沒其家財。太子幽在養正宮，而常封鎖外門而已。妃嬪使喚許令同處。今十月三日皇太后生日也。太子願得一見太后，太后亦思見之。皇帝暫許來拜，卽還故處。通官金士傑以爲，今番慶科庭試，皇帝親以放太甲於桐

宮爲題。朝野皆知其微意，以爲太子非久復位。⁶¹

康熙年間，皇帝康熙先後兩度廢黜太子，背後的考量當然包括太子胤礽（1674-1725 年）的個人性格因由而致，但因廢除太子後，引起了爭奪太子之位的政治鬥爭，故康熙帝改以秘密立嗣的形式來處理。臨昌君李焜（1663-1724 年）可以通過譯官掌握這樣機密且重要的資訊，而譯官則在朝廷之中的網絡之中，掌握到這些宮廷之中的情況。縱使這些情報與朝鮮社會不一定有直指影響，但國王對於中國的宮廷內事仍相當關心，如肅宗 40 年（康熙 53 年，1714 年），使臣趙泰采回國後便被肅宗查問關於胡皇太子的事，而泰采便回答：「皇帝當初防禁甚嚴，而近來少寬之，且以放太甲於桐宮，出試題，故彼人亦謂終當復位，而但太子不良，雖十年廢囚，斷無改過之望，締結不逞之徒，專事牟利，財產可埒一國，德琳之獄，亦由於此。」⁶²可想而知，對朝鮮國王與朝廷而言，中國宮廷的各種秘聞及爭執似乎是他們好奇的事情，故譯官深入各種清宮之內的各種宮廷內政。其中一項，即為秘密立儲的制度。1783 年擔任首譯的洪宅憲在乾隆年間解說正大光明匾額後，收藏了欲立者的名字，而有趣的是，在洪氏的情報中，似乎這種秘密的儲君者，實際上他也暗中得知不同時期的立儲皇子之名以及其情況。

清朝自立國以後，廢預建之規書。所欲立者名藏之乾清宮正

大光明匾額，不使外臣知。傳授之際，始拆其封。皇帝卽祚之初，

⁶¹ 〈謝恩行正使臨昌君焜副使權尙游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 3，〈使臣別單 三〉（康熙 52 年），頁 39a-b。

⁶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卷 55，肅宗 40 年 3 月戊辰，頁 5a

以皇次子孝賢皇后所生嫡子醇良，端重可堪承統藏名匾額待以儲君，未久而卒。皇帝悲悼，傳訃外藩喪葬一如皇太子禮。又以孝賢所生皇七子藏名匾額未幾又卒。又以皇五子藏名匾額又未幾而卒。癸巳復書皇子名藏之匾額，默祝上天暗告太廟及各處陵寢，皇帝之所屬意外，人雖不知而物議皆言，近年郊廟皇帝不能親祭，則必以皇六子永瑤攝皇駕外巡，則軍國大事亦令就決於永瑤，其他期遇供奉與他皇子異云。⁶³

似乎他們對宮廷各個繼承人或是不同代的王子及郡王都相當了解，像譯官張濂（1725 年-？）般報告予朝鮮朝廷了解，也清楚列明不同皇子以及後人的情況。

皇子十七人而存者今五人，第六子多羅質郡王永瑤、第八子多羅儀郡王永璇、第十一子永璜、第十五子永琰、第十七子永璘，皇孫存者十人，貝子綿德、定郡王綿恩、皇一子和碩安親王永璜之子貝勒綿惠、皇四子履端郡王永城之子貝勒勤、綿億皇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之子貝勒綿慶、皇六子永瑤之子貝勒綿志、皇八子永璇之子貝勒綿懃、綿懿、綿聰、綿僊、皇十一子永璜之子也皇曾孫今存者二人，輔國將軍奕純皇孫綿德之子奕紹、皇孫綿恩之子也奕純生子載錫實為皇玄孫。⁶⁴

⁶³ 〈冬至兼謝恩行首譯洪宅憲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6，〈使臣別單 六〉（乾隆 48 年），頁 36a-b。

⁶⁴ 〈謝恩兼冬至行首譯張濂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6，〈使臣別單 六〉（乾隆 49 年），頁 39a。

1784 年擔任首譯的張濂除了講述在乾隆 49 年時，乾隆帝仍在世的皇子外，當中最為有趣的是，皇玄孫已經出生。他是由皇太子永璜（1728-1750 年）的長孫奕純（1767-1816）所生的長子，名為載錫（1784-1821 年）。而洪命福亦提到當時歷朝宗人付的命名排行，因載為奕字之後，故載錫以此命名。

皇帝得玄孫命名載錫，諭以太祖以下瓜瓞繁衍本支極盛。太祖子孫今為十一世，宗人府則名字排行唯許近宗。而朕今有五世同堂之慶，當勉百代為親之義。從今以後係宗派者，無論遠近名字皆令排行於皇子皇孫云。蓋皇子永瑤，以永為行。皇孫綿恩，以綿為行。皇曾孫奕純，以奕為行。皇玄孫載錫，以載為行。而載下行則以奉字預定云 乾隆四十九年 月 日。⁶⁵

即使當時朝鮮士大夫與清朝文人有不同方式的雅聚，但卻忽略的是清廷宮中的內容，並非一般清朝士大夫可以公開與人交談的內容，畢竟朝鮮作為異國客人，與有君臣之禮的清人情況不同。但譯官卻在毫無這種禁忌的考慮下，收集到這些情報，使朝鮮社會對這方面有多一點的認知。雖然相對於歷史的記憶，清廷內部的資訊並非甚麼驚訝的秘密與記載，但是朝鮮宮廷，特別是國王似乎是很有興趣了解相關的情況。故作為下屬的譯官們，在不同的形式之中，協助朝鮮朝廷，收集到各方面與清廷相關的耐人尋味的宮廷情況。這些資料不見於朝鮮士大夫的《燕行錄》或是清人自身的書寫，卻可見於朝鮮這些譯官的情報手本之中。

⁶⁵ 〈謝恩行首譯洪命福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6，〈使臣別單 六〉（乾隆 49 年），頁 43a。

五、 清朝管治下的禮俗與社會

華夷觀的轉向，使朝鮮對清朝的認知亦不同，特別在乾隆以前的士大夫，他們似乎對清廷無論是管治、風俗與禮俗都不太熟悉，甚至他們藉此作為一種文化上的比較，以了解漢人是否已被胡化。但因在行程途中，大多使臣均無法直接與中國平民以筆談溝通，一方面他們不通文字，二來行程其中似乎亦並非有充餘時間，作各種筆談活動。因此，身邊的譯官自然順理成章地解釋漢人對自己社會與風俗情況的，當中 1725 年出使的使臣趙文命到通遠堡時，便遇到此情況：

至通遠堡，入商胡盧成進家止宿……成進即兀金条，金条即崇德初援遼東後。漢人之投降而入於旗下者子孫，仍謂之兀金条……自山海關內至北京則漢人居多。惟東八站，則兀金条居多云。成進略通文字，自言其祖先仕 明時云。故臣使善語譯官韓永禧問喪葬祭祀，尚能用漢制否？答以頗多用之，而仍極論火葬之非。問其與清人婚娶否？答以不願為婚，而清人強之則不得已從之。而妻妾間皆如是云？問渠亦有妻妾否？答曰有妻無妾。仍問曰吾聞皇帝好色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爾獨無何也？曰家有妻妾必妬，妬必生亂階。家道不齊，是以不有之也云。若此語者，不可以夷狄待之。仍問曰此處亦有文廟否？答曰孔聖天下孰不尊敬，而第東八站小處也，無文廟，而大處如遼東等地則有之。⁶⁶

⁶⁶ 趙文命：《鶴巖集》，卷 6，〈燕行日記〉，頁 50b。

成進是一位降清漢人，故作為一位居於遼東的漢人之後，引起了趙文命的好奇，故他拜託同行的譯官韓永禧了解他的情況，但從趙文命的問題，可發現他感到興趣的，都是圍繞著關於禮俗，甚至認為皇帝好色，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趙文命也問及在遼東地區，有否儒家文化的建築象徵：文廟。由於言語的阻礙，於是譯官韓永禧成為了趙文命認識成進及其背後的東北的漢人社會禮俗。較趙文命早 3 年參與使行的李正臣更是清朝管治下的社會最感好奇的使臣。然而，他卻一無所知。最引起他本人興趣的是，他入京時，剛巧康熙帝在位接近 60 年。明清以來，幾乎沒有這麼長期在位的皇帝，故李正臣也不禁向譯官請教當時清廷的禮節活動安排，為他解釋的，還是身旁的譯官：

吾謂譯官曰：「皇帝六十年在位，頒慶與否，何以舉行乎？」
譯官對曰：「上年春，皇旨至嚴耳。」吾又問曰：「其嚴旨辭緣，何以爲辭？」譯官答曰：「上年正月，諸王閣臣等上書，盛稱皇帝功德，請舉在位六十年頒慶之禮，胡皇辭而不受，其答略曰：『西陲用兵，軍民勞苦。去歲正月朔日食，七月朔，又值日食，海洋颶風，漂沒官兵。山東三府，黎民飢饉流離，屢次起蛟。黃淮大水，人之風俗未修，官之政事未正，此正君臣殷殷求治之時，屑屑慶賀之禮，不在朕之目中。朕之御極，雖在順治十八年，現今時憲，係以五十九年，此亦不可不審云。』以此觀之。皇帝未易聽從矣云云。」⁶⁷

⁶⁷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8b-9a。

這位譯官雖仍稱康熙皇帝是「胡皇」，但就康熙皇帝對於社會大事的關心程度，可以讓李正臣對中國有更正面的觀感，對於李正臣評價清與朝鮮之關係有深一層次的思考。此外，作為使團副使的李正臣對於中國禮節儀式的問題，居然亦問於譯官，可見他對於中國的一切毫不知情，是十分需要依賴譯官。與趙文命一樣，李正臣也對各種中國的禮俗感到相當好奇，他路經高橋堡時，他好奇於當地人設殯的方式，於是便向譯官請問：「彼設殯者，何不於家中，而乃於路傍耶？」譯官則告訴李正臣：「此處之俗，雖父母喪，喪出後，則不留家舍，即移尸床，設殯於家前街路云，可謂無知莫甚焉。」

68

在東北的二帶子堡附近，李正臣看到了一座「粉牆寺刹」。與一般朝鮮人所認識的廟宇色彩不同，故他便問同行的譯官金尚密，與寺內人對話：

使譯官金尚密往問寺名，則歸言非寺也，乃天皇堂也。以紅紙題榜，故金譯問守直人曰，天皇誰也？守直僧對曰：「玉皇上帝也。」觀其塑像，則以粉塗面，着以白袍，左右有侍臣，而皆着彩衣。守直僧且曰：「吾之姓名，乃白煖之也。吾本通州寺僧，而皇帝建此堂，必擇白姓人守直，故吾被擇而來，乞食資生云云。」寺前有柵木，金譯問其名，僧曰柳木云。⁶⁹

由此可見，每當李正臣路經各地充滿好奇的地方，均會找譯官作為引導或翻譯，以便他了解更多的情況。不過，他對各種風俗的理解，大多時都按

⁶⁸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43b-44a。

⁶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51a。

照朝鮮性理學的想法出發，故無論是殯葬、宗教還是男女之情，都以性理學的角度出發去向譯官查詢，而譯官則按現實的情況一一告知。譯官金慶門讓李正臣了解到，清廷治下的盛世社會，對於男女疏離的要求，不及朝鮮一樣嚴格。男女幾乎沒有太多的隔閡，除非是長輩與後輩的男女關係，可見金慶門讓李正臣知道的風俗，都是一些朝鮮與清廷的差異之處，也可見出於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男女關係，對李正臣帶來文化上一定的新衝擊：

男女相與之際，則往來雖頻，無由看得分明，而然而聞其朋友相訪，不隔內外。至於舅姑之子女，以親屬言之，則為內外兄弟。而年長十歲，則男女不敢相見，避而遠之，甚於他人，蓋以人家多自中表間結婚故也。且路見登車婦女，無論貴賤，多不設帷幔，公主在途，露面顧視，無異男子，據此可知其大略也。⁷⁰

即使抵達北京後，在北京城市的環境，他也不太好奇於各種文人的學術，反而對北京這個清朝管治的中心，當中的社會與文化和朝鮮的差異，特別是在關內外的風俗及制度分別，故他再次向金慶門打探有關的資訊，使自己能夠對中國有更多面向的認識：⁷¹

吾謂金慶門曰：「清人風俗，關外則何如，關內則亦何如？試為我言之。喪葬祭之禮，何如？科取之制，何如？買賣之事，亦何如？男女相與之際，亦何如？此外與我國判異可駭於耳目者，

⁷⁰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7a-7b。

⁷¹ 當時對於清廷入關以後的情況，朝鮮並不了解。例如曾擔當輪流人質的麟坪大君（1622-1658 年）所撰寫的滿人都是被妖魔化的。關於此，詳參徐東日：《朝鮮朝使臣中的中國形象》，頁 65-95。

可得聞歟？皇帝所處熱河，聞在長城之外，從何門而出入耶？熱河地，寧古塔所管耶？盛京所管耶？蒙古地近處耶？並言之。」⁷²

李正臣向金慶門先後問及（一）關內外喪葬祭禮、（二）科舉事務、（三）買賣商業情況、（四）男女關係、（五）熱河、寧古塔、盛京及蒙古等關外地區之所在地等各種涉及各種風土及文化等複雜的問題，而當時金慶門亦十分詳盡地逐一回應，並首先從東北地方人士的喪葬祭祀等宗教活動談起。

金譯對曰：「清人始在寧古塔時，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自入瀋陽，設官牧民，隨俗而治。至于入關，混一，而大抵皆襲明制。今則普天之下，莫非紅纓之帽。漸漬百年，明之遺民，並不見有思先代之衣冠者，關內外皆同，酷尚佛教，閭閻之間，寺剎相錯，僧俗雜處。其相遇之際，僧右於俗，生子必以佛字觀音字命名，如我國之用道德字聖賢字者。其四禮則人生而剃頭，寒則煖帽，熱則涼帽，冠禮固無可言之地。明制擇駙馬，不曰名胄華閥，而曰軍民人等才貌，中國之不貴門地，其來自古，而至於今世，尤無分分，專以粧奩豐薄年貌稱停，為主。人死則清人火葬而埋骨，此亦釋教也。漢人雖棺檢墳葬，而其貧不能起墳者，或置棺於原野，或委殯於路側，任其腐朽暴骨，反不如火葬之潔淨也。且國恤，用以日易月之制，其私喪則可知，國哀初喪之服，在內則不知其如何。而但看公私，皆着白襖，去其帽上之紅纓而已。私喪則無論親疎，其哭臨者，皆去其帽纓，停其剃

⁷²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4b-5a。

洗，而關內或見有大布造巾而承之帽上者，有繸麻爲帶而其長曳地者。送喪之日，必庭中造棚如大廈，而置棺其中，傍樹三丈紅竿而高掛銘旌，鼓吹三日，廣聚僧徒，念經招魂，其狀可駭。⁷³

朝鮮因以儒學為治國策，對禮甚為重視，⁷⁴而延續下去之喪俗及社會風俗也是按著儒家的典章，如以《朱子家禮》作為準則，⁷⁵故對於滿州人受佛教影響之東北禮俗文化並不熟識，故從金慶門的對話之中，才能掌握到當時清人普遍以佛教進行禮俗。而及後李正臣看見喪家行喪的事情時，⁷⁶此與上述金慶門所載之事相符，認為他們失卻禮節，視之為「無知莫甚焉」作為批評。⁷⁷若佛教作為清朝管治下，改變民間信仰的主要例證，堂子信仰更是清朝入關後，最為獨特的宗教活動。而金慶門似乎對此亦有所認識，並將之告訴李正臣。

天子之享祀，自有歷代遵用之大典，宜其無闕遺，而今但有

⁷³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5b-6a。

⁷⁴ 17-18 世紀因禮學特別發達，故學者高英津指出當時朝鮮為禮學的時代。高英津：〈朝鮮時代的國法與家禮〉，載於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內秩序與國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10。

⁷⁵ 朱子（1130-1200 年）所撰的《文公家禮》並在高麗朝傳入朝鮮半島後，對朝鮮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由於無論是考試也好，還是朝鮮的法令也好，都使《文公家禮》對於朝鮮人的禮制及習俗得以跟隨朱子以來的儒學價值觀來維繫禮制。而後來如金長生（1548-1631 年）所著述之《家禮輯覽》更確認了朝鮮王朝一代的實際施行冠、婚、喪、祭之禮之法，可見在朝鮮後期的士大夫，對於各種祭祀禮俗都希望均以性理學及儒學之論述作為基礎。關於此，可參考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3-183。

⁷⁶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 44a。

⁷⁷ 李正臣從金慶門方面認識到當時一些清人風俗後，才加以自己的判斷，故可見當中李正臣的東北風俗知識的判斷是受金慶門的影響。於李正臣就有關佛教與儒學禮俗的討論，可參考何淑宜：〈17・18 세기 조선사절의 중국 예속 관찰〉，頁 549-552。

異古之一廟，其名曰堂子。帝必於元朝子，早先詣焚香，然後乃受群臣朝，年年以爲常。堂子所奉之神，或云，鄧將軍，或云，清國之祖宗。其所謂鄧將軍者，不知爲何代之人，而所謂祖宗者，又非其所生先代之稱也，其臣民則但於三節日上墳，而無他祭，俗喜奉神。家家圖畫神靈，朝夕香火，通稱曰祖宗。漢人則或有奉神主，不忘其本者，而神主之制，人各異樣，又不見有立祠堂置祭器者。至於關王像，釋氏像，則富家別立廟宇，貧人奉之堂宇，無論京外貴賤，無一人不敬事之者，其所謂三節日，即三月之清明，七月之上元，十二月之二十七日。而此三節，又不如東國四名日之必於其日內定行節祀也，前其三日，後其三日，合作七日，而人家擇其內無故之日而行之。七月之既望，又稱爲鬼燈節，上墓祭先，祭必焚紙錢，加一土塊於墳上而歸云。蓋天下之大體，未有出於冠婚喪祭，而其異如此，其他可知也。⁷⁸

金慶門介紹了漢文化不包括的清人獨特的堂子祭拜活動，⁷⁹並說明一役的清朝的平民一般都於三節，即清明、上元以及 12 月 27 日進行祭祀，與朝鮮之四名日有所不同，藉此讓李正臣明白到祭祀活動上，朝鮮與清朝之間的差異。反而在科舉方面，因清朝沿用明制，而朝鮮亦相約，⁸⁰金慶門相

⁷⁸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6a-b。

⁷⁹ 堂子祭拜是一神秘的活動，從瀋陽與北京都可看見有關場所，但由於有關祭拜只限於皇族參與，故漢人以及朝鮮份子都對於有關事情感到好奇，也覺得甚為神秘，其中如慶門所云一樣，皇帝在新一年接受群臣朝拜前，先到堂子焚香，加上堂子的背景眾說紛紜，更增加了朝鮮文人的好奇，而有所紀錄。關於朝鮮文人對堂子的書寫及有關的文獻記錄，可參考張士尊：〈盛京「堂子」考—以朝鮮文獻爲中心〉，《鞍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2013 年 2 月），頁 22-28；並參考葛兆光：〈堂子或祀鄧將軍？正月初一所見之大清宮廷秘事〉，《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劄記》，頁 165-178。

⁸⁰ 李成茂：《韓國의 科舉制度》，頁 94。

信李正臣會對此熟悉，故沒有詳盡的解釋，只說出「科取之法，則三年一大比，而其鄉會試文武之數，悉倣明制云」之語後，⁸¹便輕輕帶過。其實可以看到的是，譯官掌握使臣的知識面，故會選擇性介紹他們不懂得以及有明顯差異的資訊，反而如科舉般朝鮮與清相接近的話題，卻數語帶過。

而譯官作為朝鮮使臣的主要媒介，他們的興趣當然會引導使臣思考或作出各種配合的。上文曾提及，在八包貿易或其他形式的貿易過程之中，無論是否掌握語言技能的譯官，均對於使行所帶來的貿易機會及商業成就感到相當的興趣。故金慶門自然便會向李正臣介紹關於貿易買賣之利的情況：

買賣之事，則俗不賤賈人，市井之子，爲卿相，卿相之子，亦爲市井，故末利遊食之民，多於負耜之農夫，天下之資財鉅萬者，比漢唐時尤衆，及至今朝，凡河口津涉，出入關隘，皆置監督。京城崇文門及城內東西牌樓，日稅銀滿萬，抽稅甚苛，利歸於上者，一年數百萬兩。而買賣之利，稍殺於前云。⁸²

上述李正臣與金慶門之間的禮俗與社會環境的情報的問答可見，譯官會按自己的認知以及判斷，作各方面長短不一的解釋，以滿足使臣的需求。而事實上，身為朝鮮高官的李正臣，對於清廷管治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毫不知情，很多外來資訊都依靠使團譯官金慶門。⁸³而金慶門對中國的認

⁸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7a。

⁸²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7a。

⁸³ 除了上述的歷史事蹟、清人風俗外，還了解了各種當時的種種其他事情，例如：臺灣的海賊、胤禵（1688-1756 年）征準噶爾等等，李正臣都需要從金慶門及其他譯官的口中，

知則可見於他曾因公務留於北京及鳳城。⁸⁴留於中國的經歷了及其語言的優勢，使他可從中國官民中，取得不同種類的資訊。其中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金慶門告知李正臣，有關他從清官黃儀方面，⁸⁵獲知有關朱一貴事變以及清初以來的臺灣局勢發展的訊息。⁸⁶

吾問金慶門曰：「所謂臺灣在何處？而臺灣見失顛末，可得聞歟？」慶門對曰：「上年海賊竊發，賊魁有朱一貴者，犯臺灣，五月殺總兵以下大小官并五十餘員，而入據之。皇帝命發江南、浙江、福建三省水軍，往討之，今方出師，而人謂此地異他郡邑，急攻誠難，以此騷屑。小的昔年以事留鳳城，聞清差黃儀之言，則臺灣者，卽一島名，在福建海中，長八百餘里，廣半之，幅員幾二千餘里，四圍以高山鑿壁峻崖，飛鳥不得過，而但於北面開一門戶以導水，其中則爲沃野，且多寶產，人蓄甚繁，卽所謂別乾坤者也。一島之水，他無所洩，合爲江，從門倒海，若建瓴然，舟不得往來，乃於水口兩崖，置鍊環鍊鎖，曳舟上下，故從內出之易，而從外入之難，久爲紅毛賊所據。皇明起自南方，江浙閩

才能認識有關事情的虛實。關於此，詳參李正臣：《櫟翁遺稿》，〈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9a-11a。

⁸⁴ 〈別齋咨官金慶門手本〉，《同文彙考》，補編卷 4〈使臣別單·四〉（雍正 3 年 8 月 20 日），頁 29a-31b。

⁸⁵ 據金慶門與閔鎮遠對話時，所留給他的手本之中，曾提到黃儀是禮部筆帖式四川人，這亦可更能夠了解到譯官在中國之中的交際網絡是與一些較低級的官員有密切聯繫。關於此，詳參閔鎮遠：《燕行日記》，〈譯官金慶門所記吳三桂事〉，頁 127。

⁸⁶ 朱一貴事件是起源於康熙年間臺灣地區的起義，當時臺灣鳳山縣縣令王珍（？-1721 年）兒子的惡政，導致當地民間引起極大的反抗，各地便接連起事，慢慢將朱一貴視為明室後代，高舉「反清復明」旗號反清。經歷一連串的抗爭，最終清軍很快從廈門出海平定朱一貴的起事。關於朱一貴起事的研究，詳參莊吉發：〈身穿清朝衣 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歷史月刊》，第 153 期（2000 年 10 月），頁 64-70。

廣次第平定，而至於此地，則官軍不得入擊，以是不入於版圖。逮至甲申，天下皆薙髮，而獨有紅毛遺孽鄭錦，留髮自在，不肯歸順。清朝乃於其對岸澎湖，置水師營，廈門置按察司，以備其侵掠而已。康熙癸亥，海溢而潮入水口，平地水高數丈，浸沒人家無算，而水不退者凡八日，澎湖官軍，乘時進船擊之。鄭錦之裔克塽，窮蹙請降。今皇帝封克塽，為漢軍一等公，移置京師。臺灣置一府三縣，歲課地丁額銀萬餘兩，解京又置總兵一員，軍三千以鎮之。兵官自總兵以下，有副將、參將、遊擊、守備、都司、千總、把總等官。民官則有知府、知縣、同知、縣丞、典史等官。黃儀足踏其地，而詳言如此。故其地之險夷，官之多少，略曾聞之矣。」⁸⁷

黃儀作為當時臺灣局勢的親歷者，而金慶門則因留守鳳城時，曾與黃儀交往而掌握這些訊息，並最終轉達到朝鮮使臣。這些情報是否正確與真實其實用今天的學術目光來說，有很多的疑問。但是朱一貴事件雖發生於臺灣，但通過譯官的分析與觀察下，也許使士大夫認識到臺灣與朱一貴事件的發展，也許影響到朝鮮社會以及各種商貿活動。故金慶門轉述黃儀的考察後，更提供了自己對臺灣與朱一貴發展的意見予李正臣，使他對中國與周邊局勢有更全面的掌握。

蓋皇明之制，既棄臺灣，又惡倭寇，恐人之來往，嚴法禁洋。知有官舶八十艘，載紬絲往長崎，貿銅而已，而不許私船出海，至清朝猶然。及得臺灣，始許民入洋貿易。而置沿海抄務，益收

⁸⁷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8，〈燕行錄·辛丑閏六月〉，頁34a-35a。

船利之稅，厥后海寇漸熾，出沒劫掠，商船之被搶者，前後相屬，而近又有金州之警，朝臣多欲言於上，禁洋如初。而帝利其商稅，不聽，故清人或有望朝鮮，以荒唐船弊為言而勸帝，則庶幾更禁者。此則小的於其時手本中，亦條陳其詳也。今聞一本，因官吏政虐，人心怨叛，與其軍民和應，為亂殺其眾官云。若能鎮定而因仍雄居，則海賊自今已有窟宅，料其形勢，雖不能超海長駟，若夫沿邊之民，則將無奠居之日矣。」⁸⁸

朱一貴事件，本為清帝國邊陲的一場民變，即使朝鮮為重要的朝貢國，對於這種地方事務，似乎沒有渠道，亦無必要去理解，特別是這些牽涉到地方混亂及事變的問題，在官方的交聘過程中，無從得知。然而，譯官因各種職務能留待北京及中國東北地區，並搜集各種重要的情報，⁸⁹如金慶門所云，他曾「以事留鳳城」又有手本「條陳其詳」，可見這些與中國社會的資訊，傳遞予朝鮮的過程中，譯官有不可忽視的媒介角色。

此外，當金慶門談及發生民變的臺灣時，他指出該處一直存有不少海盜問題，而金慶門卻明白到有關的事件或對朝鮮造成影響，特別指出沿海居住的朝鮮邊民可能受到威脅，故特別說明後，並引起了李正臣向金慶門請教有關朝鮮應該以什麼態度處理這件事情。而金慶門認為應說服朝廷重新實施海禁，不止為朝鮮海洋帶來安穩，還會為朝鮮帶來商機。

⁸⁸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閏六月〉，頁 35a-36a。

⁸⁹ 關於譯官作為燕行使的情報源，可參考白玉敬：〈18 세기 연행사의 정보수집활동〉，頁 201-229。

吾又問之曰：「若然則於我朝鮮將如何也？」對曰：「皇帝若能禁洋，則自可無事，且此係福建地方，福建循海以北，過浙江江南山東，至朝鮮，延袤萬里。而數十年前，嘗有臺灣人漂到者，亦言其海路萬里。寧有漂海萬里，而犯人城地者耶，必無可虞也。抑有一焉，我國產息不繁，而其中銀貨又貴，故公私貧窶，最弱於天下諸國。從古取資於南北通商，自其海船解禁以來，江南絲緞，直航倭國，而燕貨短少，倭銀亦絕，以致益耗。果令賊勢盛而海路梗，則不待皇帝之禁洋，而商船自可不通，倭必輸銀於釜館，依舊求市，而燕中絲貨，亦似有裕矣。」⁹⁰

金慶門為使團運作人員，熟悉使團在朝廷海禁期間如何可以從中國方面取得貨品後，透過通信使網絡，轉移向日本銷售，賺取白銀。⁹¹然而，當海禁令解封後，朝鮮在對倭貿易無法壟斷有關的好處，⁹²故特別向李正臣這樣說明。於是，金慶門這樣的回饋，讓作為朝廷決策層之一的李正臣，掌握了如何處理中國邊陲地區問題對於朝鮮帶來的影響，對於朝鮮就有關海

⁹⁰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8，〈燕行錄·辛丑閏六月〉，頁36a-36b。

⁹¹ 由於早期清廷實行海禁，日本等海洋國家無法直接與中國貿易，但同時間清廷卻容許朝鮮使團實行八包貿易，即可讓朝鮮使團於北京、東北城等地區與當地商人進行貿易。而朝鮮使團往往帶回半島後，便經通信使使團將該等貨品直接向當時無法與中國貿易的日本銷售，而日本則提供白銀作回饋，形成了一個以朝鮮為中介的中日貿易，而朝鮮當中取得豐厚的利潤，由於當中涉及的操作比較複雜，故一般都是由熟悉使團運作的人壟斷有關貿易，亦即經常參與使行活動的譯官。關於此，可參考劉為：〈清代朝鮮使團貿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貢貿易研究之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2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36-42。

⁹² 李正臣與金慶門所處於後遷界時代，遷界令原於順治年間實行，希望藉此打擊反清力量，但於康熙年間，不論臺灣還是三藩亦均平定，故康熙帝亦有感遷界令沒有必要維繫，便於康熙23年（1684年）取消遷界令，中國商人便可自行到日本與當地商人貿易，而不用依賴朝鮮，這對於朝鮮亦相當不利。關於遷界令與中日直接貿易的關係，可參考李隆生：《清代的國際貿易：白銀流入、貨幣危機和晚清工業化》（臺北：秀威資訊，2010年），頁29-30。

洋的問題帶來很多的影響。而事實上，金慶門等譯官所提供的資訊，並非只讓李正臣等使團成員獲知，而是這些成員都獲取有關資訊後，回饋於朝鮮朝廷之中。

在李正臣前往北京期間，先後多次撰寫別單，讓隨行者先送回朝廷，讓朝廷官員先獲知有關資訊。在他於義州所送的別單中，他提到「且聞通官序班輩之言，則近日以福建、臺灣為賊所奪據，殲盡州縣等官，勢甚猖獗。飢饉之民，將化為盜是如為白去乙……」⁹³李正臣不但特意交代朱一貴事件後對臺灣沿海事態的發展，甚至把有關官員表報清廷的謄本，也交至朝廷，該謄本特別提及到「……即沿海諸省，亦不無受賊驚擾之憂矣。但海洋寥濶，務宜謀獲萬全，方克有功。」⁹⁴可見，李正臣受金慶門影響，特意以此謄本希望朝鮮朝廷想辦法，對海洋事務提出意見。金慶門為譯官，譯官在朝鮮史中被視為商人，他們在八包貿易以及相關使行期間均會獲利的機會，故對海洋事件的關心，超越了他們譯官的職責範圍，可見其社經背景，影響到他們的視野，從而向朝廷亦提供相關的建議。

除了消息的情報資訊外，使團成員亦可通過譯官的整理，而得到一些珍貴的文本與書籍。如李正臣在按著既定的燕行路線路經東北期間，對當地的各種地理環境充滿很大的興趣，⁹⁵故他希望尋找金慶門，了解如何得到盛京的地圖：

⁹³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前後去來時狀啟謄本〉，頁 90a。

⁹⁴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前後去來時狀啟謄本〉，頁 91a。

⁹⁵ 東北不少著名及重要地方，都是燕行必經之地，例如山海關、寧遠、瀋陽、沙河堡、高橋堡、柵門等，這些東北之地，李正臣都既有的行程而經過。關於此，詳參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7，〈燕行錄·路程記〉，頁 7a-10a。

二十七日，譯官金慶門入謁。吾問曰：「盛京地圖，何以則得見乎？」對曰：「曾前因南領府事分付，求買一本，南領府事，仍為入梓，故小人亦印一本而藏之，返節後取覽何如？」吾曰：「可矣。」⁹⁶

李正臣可以藉著譯官自我收藏的一些珍貴圖籍窺探當時的中國情報。故此，當時朝鮮社會譯官才會容易取得的書籍。縱使金慶門指他是獲委任求買一本地圖，但譯官們均會將認為重要的材料與文獻複雜收藏，以便他日後有像李正臣的使行成員有意閱讀。而譯官在這方面的作用不只是自我收藏的中國資料供予使行成員，自己的一些經歷記憶，也是他們認識中國的重要媒介。金慶門曾與李正臣說，他願意將其見聞的文本紀錄給予李正臣閱讀：「小的曾於辛卯歲，賁咨至燕，適值事故，留京最久，歸路又以帝勅，留鳳城數月，以故於彼中法度風謠可記者，頗多聞見，歸而錄，獻於朝廷，今雖不能記憶，而原本尚在備局，還都之日，可以覓得以塵下覽矣云云。」⁹⁷金慶門因需擔任賁咨官，故停留於中國一段長時間，故將各種可記材料一一收載，以便朝鮮朝廷了解當時情況，而李正臣亦可藉著金慶門的記載，一覽有關中國社會與政治情況。

從各種使臣與譯官之間交流的故事，特別是李正臣與金慶門之間的對話，可以看見朝鮮的譯官因工作關係多次往返中國，對中國社會有較全面的了解，無論是人際網絡、實際見聞觀察還是各種旁人的憶述，都建構了他們認識中國的認識與記憶。也許士大夫均可通過自身的方法，如自我的

⁹⁶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7，〈燕行錄·辛丑四月〉，頁74b。

⁹⁷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8a-b。

探訪、筆談等去認識各種面向的中國社會，但是譯官協助朝鮮士大夫，看到不同的面向、層次的中國社會，這一點說明了譯官在使行之中的特殊價值。因此，上述的中國形象並非如一般士大夫的《燕行錄》就學術、文學、科技或儒學討論，而是一個更民間及平民的中國社會。

六、譯官與在清域外人仕的交涉

如緒論曾提及到的洪大容與劉松齡的對話，過去研究者都聚焦在他們之間深入的就基督教與儒學、天文科技以及傳教士的日常生活，以及洪大容如何作為西洋文化傳入朝鮮半島的關鍵媒介。但很多人卻忽略了洪大容是次得以與劉松齡、鮑友管對談的原因，是洪命福在兩人之間擔任翻譯，作為兩種文化之間的語言翻譯，雖然我們不能還原當日之間如何進行交涉，但史料提供了我們一些重要的線索，朝鮮譯官是朝鮮士大夫與外界，特別是非華人或清人之間的重要對話媒介。除了像洪大容這典型的例子外，一些朝鮮的外交史料，像《同文彙考》也有記述一些由譯官說明朝鮮和琉球之間使節的對話媒介：

琉球使臣來接提督館，通官謝宣亦隨使臣來。寓只隔一牆，欲探耿精忠及鄭錦事情，而彼此門盡堅鎖，甲軍把守不得接面。故使譯官密書問閩越事情。其答書曰：「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耿精忠起兵，閩中殺總督知府等官，使其將曾江二人出浙江江西二路與清兵相持。鄭錦襲其後，興章泉三府已盡為其有。十六年和碩康親王帥師至閩，精忠復投降，仍為所執和。碩親王與鄭賊戰烏龍江，鄭賊敗歸台灣，故福建盡平即。今總督姚啓圖、撫院

吳興祚，乃社稷臣也撫摩得宜，而但不幸處變亂之後，風俗小變云。」又書問鄭錦事情，則答曰：「鄭錦所據台灣島大而土瘠，人稀油麻棕鐵木料全無，正在福建之東直距五千餘里，島內兩山相對，山頂有兩城，城內有石橋一座，過此行十有八日無人之境，方是鄭賊所居。龍江戰敗之後，擁衆不出，而與日本相距一萬二千餘里云。此則不佞得之通洋者之言，不知其信否，而但不佞以琉球地方計之，則其言似然矣。」⁹⁸

從全球史的角度，地理大發現打開新航道，讓歐洲的商旅或是傳教士利用全新的航道抵達東亞地區，進行各種貿易、傳教以及文化的交流。⁹⁹北京成為了普拉特所指的接觸空間，¹⁰⁰來自東亞的朝貢國按既定的程序抵京，進行朝貢及相關禮節活動。而另一方面，歐洲在南亞、東南亞等地佔有據點，嘗試與中國展開各種溝通，其中一例為荷蘭。曾短暫佔據臺灣的荷蘭以巴達維亞為中心，維繫其於東亞的貿易網絡，而她曾以朝貢的形式，與清朝接觸。¹⁰¹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體均聚集於北京，彼此之間展開互

⁹⁸ 〈奏請兼冬至行書狀官申琬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2〈使臣別單 二〉，康熙20年，頁13a-14a

⁹⁹ 全球史或地理大發現來了解東亞，是一種以西方視野來閱讀東亞的想像，但這種出發大多在東西方學界的普及知識生產過程中，認為早期世界在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活動頻繁，大多因這種貿易與傳教而產生。當然亦有像德·弗理斯嘗試指出的，全球化概念來了解當中的貿易過程，亦有一些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與局限。關於此，詳參 Jan de Vrie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3(2010): 710-733.

¹⁰⁰ 而因禮儀或朝貢貿易之需要，各國都需要就著朝貢體系限定下的形式，一種臣服的方法，嘗試獲得中國的認可，而從事各種貿易、傳教或封貢的安排。而在元朝建都於大都，明成祖由南京遷都至北京，以及清朝沿用北京作首都。北京基本上是東亞完善的朝貢制度之中的文化中心，因此代表各國的使節們、商旅都在北京——這個「接觸空間」上所遭遇。關於此，詳參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11.

¹⁰¹ 詳參 Yong Liu,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Leiden: Brill, 2007).

動。抵京後，朝鮮譯官對他們的報告與理解，卻與我們今天了解的荷蘭自然有差異，但可以看見當時的知識傳播情況：

衙譯言於譯官曰：「荷蘭國在廣東海外數千里，去北京幾至萬里，其國人今方來貢，入接驗糧廳衙門。臣等領賞之時，所謂荷蘭國人領其所貢之物，亦入午門前。觀其容貌恰似我國漂來南蠻國人，而被髮冠服之制殊極奇怪，所貢之物則車載白檀大如柱者二株，胡椒亦數車，其他箱籠亦多，而其中皆是珊瑚寶貝等物。康熙六年 月¹⁰²

除了荷蘭，當時暹羅亦入貢於清廷：

暹羅國在南海距廣東省水路萬餘里。自廣東省距燕京五千里，而其國長新立，遣使請封。正使一人三品官，副使二人四品官，從人五十餘名。禮部知會廣東省，留四十餘名開市買賣。使正副使及從人十名，進京納貢呈表。其表文名曰金葉表，字行橫書怪異，全不可解。使暹羅通事，僅翻漢以奏 乾隆四十九年 月 日¹⁰³

¹⁰² 〈謝恩兼陳奏行書狀官慶宸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1，〈使臣別單〉（康熙 6 年），頁 22b。

¹⁰³ 〈謝恩兼冬至行首譯張濂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卷 6，〈使臣別單 六〉（乾隆 49 年），頁 39b。



圖表 7 國家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年間暹羅國金葉表文

兩例可以看見朝鮮使團成員能夠在北京與不同國家的貢臣和隨行成員接觸，但是礙於語言以及出行的原因，只有譯官才可對這些外國使節進行各種觀察，甚至對談。朝鮮譯官形容荷蘭國人為「被髮冠服之制殊極奇怪」，亦同時發現暹羅人的呈表為「其表文名曰金葉表，字行橫書怪異，全不可解。」這些資訊整理為報告帶回朝鮮，譯官使朝鮮人對世界觀有新的了解，不再限制於較封閉的空間。而北京作為「接觸空間」，不同的文化代表交匯於此。由於能操漢語的使臣不多，故懂說漢語的朝鮮譯官，幫助朝鮮使臣與其他國家到來朝會的使團成員互相認識。雖然討論的內容並不算深入，但從此卻可提出重要的一點，朝鮮半島的士大夫與君王並非完全不懂世情，他們通過譯官的協助，在北京認識世界。

自明朝利瑪竇來華後，天主教在華傳教模式得以確立後，西洋傳教士長居於北京。他們的定居也引起了朝鮮文人的興趣。其中，他們希望了解

洋傳教士的天文知識而多於他們對於天主教感受到的好奇。因此，譯官多次被朝廷或使臣委派到欽天監與教堂了解西洋人測量天文的方法，或是購入他們所編的測量及天文相關書籍：

曆象考成自觀象監，專委堂上譯官高時彥前此求買於欽天監，而索價過多矣。高時彥今善周旋，并賂給與冊價以正銀五十兩，相約此亦過多，而係是禁書，且無私藏圖出。本監餘件則與他冊買賣不同，故不得已以不虞，備五十兩許給，圖得全秩四十四冊，行中齋來。¹⁰⁴

《曆象考成》是當時清朝是於康熙年間在欽天監的耶穌會士戴進賢作主編，¹⁰⁵是當時推算曆法的官修著作。¹⁰⁶一般來說，書籍不能直接於市面購買，故他們需要依靠譯官的協助與交涉，才可取得這西洋人所編訂的《曆象考成》來了解當時西洋人對曆法的研究：

觀象監草記以曆象考成落篇，及日月食稿，火星緯度八線表等事入送。日官李世澄，而又別定行中。解文字曉語譯官金裕門，與世澄訪問於欽天監。西洋國人則今皇帝御製，有律曆淵源七十二卷大秩，而曆象考成即其秩中篇名也。初以欽若曆書，更加釐

¹⁰⁴ 〈冬至正行正使尹淳副使趙翼命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 4，〈使臣別單四〉（雍正 6 年），頁 41b。

¹⁰⁵ 李頤命曾與著名耶穌會士戴進賢對話，從中了解到天主教教義、教堂建築特色及傳教士的生活，是研究朝鮮天主教史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頤命：《燕行雜識》，卷 19，收於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年），第 34 卷，〈與西洋人蘇霖戴進賢〉，頁 461。

¹⁰⁶ Martha P.Y.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2: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 (London: Routledge, 2016), 154.

正名之曰曆象考成，而添之以律呂正義數理精蘊二篇，以成書三編，相爲表裏，刊之未久，而所謂八線表載於精蘊，其法甚詳，易以測推矣。曆象今春雖有貿去者，而既不釐正，又無線表，不得檢表而推籌。今既知有全書，不可不購得，故艱難尋覓，僅幸貿取而依本監草記，出給運餉不虞正銀六十二兩。¹⁰⁷

購書以外，他們需要了解曆法的使用以及定期釐正。因像戴進賢等傳教士，其實無法以漢文與朝鮮士大夫筆談。加上這些技術性的資料收集，並非士大夫的身份與知識層面選擇會處理的事情。因此，朝鮮朝廷處理曆法的更新，是由譯官以及專門負責天文的日官負責：

觀象監曆法釐正事，別定譯官卞重和，與日官安國麟，往天主堂見戴進賢、徐懋德。進賢西洋人明於曆理，康熙二十五年來住天主堂，今假銜禮部侍郎。懋德亦西洋人，康熙六十年來住天主堂，今欽天監副加四級也。問曆法差謬則進賢言：五星用甲子爲元之法，而日月交食則不專用甲子之法，參用八線表及對數。八線表推以驗天，則其所食分數，違於天者尚多，故交食表，今方窺測釐整，而完工當在來歲云。其日食籌稿一本、月食籌稿一本懇求以來，而來歲完工者，交食表及日月食叩籌也。今法雖不脗合於天度，此亦當時之用故，百般周旋，貿得日食、月食、交食表、八線表、對數八線表對數闡微表、日月五星表、律呂正義

¹⁰⁷ 〈謝恩行正使驪川君 增副使宋成明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雍正7年），頁43b-44a。

數理精蘊等十三冊而來。¹⁰⁸

西洋傳教士很多時候，與朝鮮官員或使臣交涉時，大多對他們的認識限於只住於天主堂以及任職欽天監，以及各種科學技術知識的權威和代表。反而，他們具體的身份、形象還是信仰也不太了解。像使臣李正臣也期盼能夠在北京獲得與這群異邦人接觸的機會。可惜，李正臣的願望在該次使行中落空，無法與傳教士見面。他只好向一位譯官請教有關傳教士的一切。

招問譯官輩曰：「西洋國老僧，吾雖不得見，君輩若以前日與彼酬酌之言告我，則異國消息，庶可以知，可得聞歟？」譯官曰：「當告之矣，小的年前赴燕時見之，則西洋國兩老人，爲見使臣，來到玉河館。蒼顏白髮，頗奇古，與雜胡不同，從容對坐。『問西洋距中國幾里？』對曰：『九萬餘里云。』又問曰：『來中國幾年？』答：『三十餘年也。皇帝待以師禮，不許遣還矣。』又問曰：『西洋國幅圓幾許？風俗亦如何？』對曰：『地方二千餘里，有八省，屬國三十，君長稱大王。人民或剃頭，或否，或着濶袖衣，或着今時服云。』又問曰：『西洋亦同文否？』對曰：『否，解漢字者絕少云。』而仍出示其冊，字體畧似胡書。又問曰：『西洋距西域似近，俗尚佛道否？』對曰：『距天竺，隔海幾二萬里。無佛法，專尚天主教云。』渠仍問曰：『東國所尚如何？』小的答曰：『孔周五倫之外，無他所學。』老人斂衽答曰：『素聞朝鮮尚禮義，今見使行，大明遺制猶存矣云云。』」此乃譯官傳告之言也，雖不目

¹⁰⁸ 〈冬至行正使驪善君 壁副使鄭彥燮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 5，〈使臣別單 五〉（乾隆 6 年），頁 25a-b

見，詳聞其酬酢之言，可喜。¹⁰⁹

該位譯官憶述他當年與傳教士對話的紀錄，作為使臣李正臣可通過譯官的經歷，了解西洋傳教士背後的種種風俗與文化。縱使李正臣無法親眼看到傳教士，也無機會與他們對談，但是曾有機會接觸傳教士的譯官，轉述他的經歷後，李正臣不但沒有感到不快，反而還指出「雖不目見，詳聞其酬酢之言，可喜」。而北京作為東亞世界匯聚多方文化的接觸空間，彼此之間可在前往北京時，互動溝通。但值得一提的是，朝鮮譯官等文化交流的媒介卻在交流過程，協助朝鮮使臣避免各種語言障礙，與中國朝貢體系其他國家派出的使臣，甚至是來自全球的天主教傳教士，都可在北京展開不同層次的對話。然而，儘管史料上的限制，沒法更具體了解語言的交流具體情況，但在史料提供的形象，可說明到朝鮮使臣對各種中國以外方面的意象以及詮釋，或多或少受譯官的翻譯協助而所建構。

七、 小結

總括而言，學術界以往對燕行使對朝鮮社會的影響研究，都會認定這是朝鮮文人與士大夫在中國與其他知識份子互動或他們耳聞目睹的一切，得出的文化結果。誠然，士大夫在其教育與文化背景的牽引之中，他們關心的是在學術上得到體會的交流，認識的是與他們學術背景有直接關係的人。朴齊家曾指自明清易代以後，不少士大夫均不太願意擔任一些交涉與清人直接對談的工作。在職權調整之下，譯官自然成為了這種交涉的重要代表。而工作量增加的同時，譯官對中國社會亦有更多接觸的時間。因此，

¹⁰⁹ 李正臣：《櫟翁遺稿》，卷 8，〈燕行錄·辛丑五月〉，頁 3a-b。

與士大夫不同的，他們可了解到不同層面以及群體的歷史與社會現象，通過他們的認識與闡述，使朝鮮社會與士大夫群體，都需要通過他們的眼光作為媒介，來了解中國以及其相關的議題與資訊。

無論是吳三桂的經歷，還是明末的歷史記憶，抑或是當時清朝管治下的中國社會，譯官的眼光，為朝鮮社會帶來不一樣的中國形象。這些描寫與敘述也許是表面，也許是帶有譯官的偏見，但是卻可以說明的是，朝鮮譯官成為了朝鮮士大夫認識中國的主要渠道，而這種知識建構過程過去均被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學者所忽視，但從上述所提及的例子，卻可說明到譯官的媒介卻相對於士大夫自己的考察以及分析來看，卻是不同層次與面向的眼光。，看不到不一樣的中國歷史記憶、社會風俗以及中國朝貢制度所建構而可認知的世界觀。

第六章

藕船雅正——譯官的形塑與清人眼中的朝鮮

一、 引言

學界近年對東亞的中介者，如何影響區域的文化互動，提出了不少具體的研究成果及框架，廖肇亨在編輯《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的論文集時曾提到：

共相與互相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多岐，中介者的角色在東亞文化意象形塑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程度的選擇與定調作用。本論集雖然從文學、思想、宗教、藝術的面向出發，但對於中介者的角色始終著意有加，特於使節、翻譯者（通事）、海商、僧侶於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功能深入探究文化交流過程中改編、挪用、重寫、傳譯過程裡的誤讀（包括刻意與無意）令人目眩神迷。中介者的位置雖說隱而不顯，然而其影響與作用卻往往出乎意外的巨大，而扮演了極其吃重的角色。無論如何，透過對於中介者的研究，對東亞共同文化圈的形態與論一形成的過程，應該會有更深刻的理解。¹

廖肇亨這一論點旨在強調中介者在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看似位置隱而不顯，實則影響頗為巨大。然而，如何隱而不顯但影響卻巨大，石守謙則指

¹ 廖肇亨：〈中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蠡探〉，載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年），頁19-20。

出：「在面對這些問題（文化意象之形塑的選擇）時，中介者各式各樣的『人為考慮』正是促使某一書籍開始進入中介『過程』的必要脈絡。」²

通過兩位學者的觀點，在此處特別指出，在史料的限制之下，也許我們無法全面了解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中介者作出每個決定、對答甚至選擇時的背後原因。然而，一點必須說明的是，由於中介者的參與，造就各種人為考慮，通過演繹或形式、塑造或改變，從而使文化現象得以某種形式被傳遞、了解以及認識。因此，本章希望探討清朝與朝鮮在緊密的文化互動過程中，譯官如何在兩地之間，扮演文化互動的中介者或媒介的角色。故本章將通過一些資料的考察，試圖了解他們在文化交流過程之中，如何經由他們的介入，而使清人對朝鮮的各種認識，產生不一樣以及更深刻的理解。

以《同文彙考》一則資料作例，清朝管治下似乎沒有視朝鮮與日本派遣通信使作交鄰手段為之禁忌，反而可以看出清廷與皇帝均認為可以通過朝鮮來了解日本的情況：「常明言皇帝及十三王，欲知倭國風俗規制，一一錄示問於倭學譯官，洪舜明略略錄送。」³於是，長期執行赴日職務的譯官，⁴所書寫的日常紀錄以及各種情報，便不只成為協助朝鮮使臣與社會了解日本的材料，同時亦讓中國皇帝與官員對不在於朝貢限域內的日本，作一定

²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載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頁3。

³ 〈冬至正行正使尹淳副使趙翼命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4，〈使臣別單四〉（雍正6年），頁41b。

⁴ 허지은（許智恩）：〈조선후기 왜관에서의倭學譯官의 정보수집〉（朝鮮後期倭學譯官在倭館中的情報收集），《일본역사연구》（日本歷史研究），第36卷（2012年12月），頁63-96。

程度的認識。⁵因此，朝鮮譯官在東亞的各種文化地域中，擔當交流的中介人，構築的是雙向互動，而非單方面的。當然因立場以及知識面的差異，他們所產生的意義的側重點有所差異。本章以李尚迪及其周邊群體為中心，了解譯官如何作為中介人建構清人對朝鮮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的面向，通過各種文學交流與詩文酬唱而得到更深入的了解。首先，清人相對於明人對朝鮮使團成員有更多的描寫，如一些士大夫的對話以及白塔派與清人的交流，例如 19 世紀初董文煥（1833-1877 年）對譯官有深刻的描寫，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董文煥與李尚迪及其弟子李容肅等譯官之間的對話，從中可看到董文煥如何通過這些譯官掌握到朝鮮的文壇情況。故本文希望進一步通過李尚迪與他的其他中國友人的交流，了解譯官如何成為清人了解朝鮮的社會與文化的重要渠道。最重要的是，學界過去忽略了李尚迪的譯官身份與其老師金正喜（1786-1856 年）的《歲寒圖》創作有相當大的關係。而且，《歲寒圖》得以被清人所認識，甚至以《歲寒圖》作為探索的中心來認識朝鮮的政局、文壇以及社會環境。通過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譯官群體，特別是李尚迪，他的個人情感、語言能力以及人際關係形塑了清人對朝鮮認識的面向。

二、 董文煥的《韓客詩存》與清人的朝鮮文壇的認識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朝鮮漢語譯官在史料上的記載不再單是情報與政治周旋的身份，譯官的名字也經常被清人的文集以及詩集所記錄。雖然 19 世紀以前，譯官早已成為使行之中的媒介，諸如洪純彥（1530-1598

⁵ 關於倭情的匯報情況，詳參程永超：〈通信使關係倭情咨文と明清中国〉（通信使關係的倭情咨文與明清中國），《史林》，第 99 卷第 6 號（2016 年 11 月），頁 803-836。

年)、⁶李和宗等為人所認識，⁷但鮮有中國人對譯官的活動或各種互動紀錄與書寫。當然，譯官活動不見於早期的史料，自然引起學界質疑研究譯官的價值，特別是他們在文化互動之中所擔當的中介人角色。但石守謙在了解中介者對東亞文化形塑的影響時提到：「他們(中介者)之所以常被忽視，基本上可說是某種不得不然的結果，因為他們通常不是研究者在探討意象形塑時所仰賴文字或圖像資料的作者，甚至於他們自己也沒有留下任何參與到此過程中的資料，故而在資料面來看，等於被迫居於次要的位置。雖然如此，東亞文化意象形塑之研究既然賦予『過程』以高度的關注，這些外圍中介者所起的作用，就必須要超越資料面的限制，設法由對其『行動面』的重建來彌補我們對此『過程』思考中的不足。」⁸

石氏指出譯官被迫居於次要的位置，但是他提醒學界需要從一些文化活動的層面超越過去的資料表面限制，進而了解這些中介者的作用，才可擴闊對東亞文化交流過程的認知。朝鮮漢語譯官的作用，則需從清代的東亞世界空間來看，原因無疑是在明朝時朝鮮士大夫的活動空間本來很小，俯視清康熙乾隆以前的朝貢關係，確實人與人之間可交往的空間、機會較康

⁶ 據金英淑分析，他曾在宗系辯誣、壬辰請兵之中立下了很多功勞，曾多次通過其語言能力、人際網絡在明朝與朝鮮之間的交流之中有明顯的媒介作用。詳參金英淑：〈譯官 洪純彥과 朝明外交〉（譯官洪純彥與朝明外交），《中國史研究》，第 70 輯（2011 年 2 月），頁 195-221。

⁷ 李和宗為出身於慶州的漢語譯官，因精通漢語而聞名，在《通文館志》之中記載他在北京曾於禮部呈交公文時，解釋朝鮮使臣於北京購書有助於禮儀的履行，故請求解禁不可貿書的規定。關於此，詳參金指南、金顯門、李湛編：《通文館志》，卷 7，〈人物〉，頁 4b-5b。另外，據《芝峰類說》所述，曾有一位前來朝鮮半島的明朝天使曾問鯔魚的俗名，有一位譯官不懂而稱之為水魚。而譯官李和宗上前解釋：「此名秀魚，非水魚，以魚中之秀故名，天使以為然。」李晬光：《芝峰類說》（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4 年），卷 20〈禽蟲部・鱗介〉，頁 1a。

⁸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頁 2。

雍乾或以後時期少，正如前章所引的洪大容亦指出使節的活動空間到康熙中葉以後才得以擴闊。而另一方面，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等被學者形容為「北學派」的 18 世紀中葉燕行使者擴闊了朝鮮文人對清朝的想像，⁹從過去的蔑清轉為應了解清朝社會，倡導向清朝學習，並帶動此類思考氛圍，亦因而開始了與清朝一些名氣大的學者所交流。

如朴趾源的學生朴齊家（1750-1815 年）曾與紀昀（1724-1805 年）的交往成為了顯例，¹⁰一些同期的師友，如李德懋、¹¹柳得恭（1748-1807 年）、李書九（1754-1825 年）等，都在其使行過程中，與清友人交流，留下各種文句、詩詞。朝鮮文學史之中，視四人為白塔詩派。¹²白塔詩派的詩集《韓客巾衍集》，最後通過柳得恭之叔父柳琴（1741-1788 年）傳入中國，獲獲得當時中國的一位文人李調元（1734-1803 年）的青睞，並親自為紀念詩集撰序出版。¹³這些兩地文人之間的對話與文學交流，學術界已經有豐碩的成果，故不再多論述，但筆者卻關心的是在這種文化氣氛之下，兩地文人之間的互動已經成為了朝鮮使臣前往北京例必參與的事情，而譯官自身也在身份與工作的容許範圍內，盡可能廣闊活動的空間和時限，並四處認識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雅士。自此不再只是朝廷官方活動上的媒介，而是亦

⁹ Daehwan Noh, "The Eclectic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Statecraft from the 18th to the 19th Century," *Korea Journal* 43.4(2003): 87-112.

¹⁰ 金柄珉：〈朝鮮詩人朴齊家與清代文壇〉，《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100-104。

¹¹ 李德懋的文學成就、著作以及其生平，詳參徐東日：《李德懋文學研究》（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 年）。

¹² 韋旭昇：《韓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94-395。

¹³ 李調元為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在詞林與詩學界皆有名氣，其中他在飲食方面亦有著名的成就，撰寫了《醒園食譜》。關於此，詳參孫德彪：〈朝鮮四家詩人與李調元的詩文友誼〉，《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 10 期（2010 年 10 月），頁 164-167。

在文學上或私人交誼上，成為清人認識朝鮮文學及社會的中介人。

晚清的山西文人董文煥的文學活動，可作為切入點來考察譯官如何作為中介人並發表作用。¹⁴董氏曾編輯《韓客詩錄》一書，書中記述 39 位韓國文人共 402 首作品外，他還在篩選及評點後另外編輯成書。《韓客詩錄》沒有在董氏在世期間出版，而且稿件已經散失了，¹⁵但董文煥刻意收錄了不少譯官的作品，並加以評論的情況，在他的日記之中均可看見。現在讀者雖然沒法閱讀當時董文煥的評論，但是通過李豫、崔永禧的輯校，重新將董文煥的日記，其他的詩文集或手稿及其他刻本等所有的詩集整理後，輯出的《韓客詩錄》曾有提及及點評的詩集，輯錄成《韓客詩存》。¹⁶對於朝鮮與晚清文人的文學交流研究，有關材料對學術界有重大貢獻。

據李豫、崔永禧二人整理董文煥的日記中可以發現，《韓客詩錄》之中包括的朝鮮詩集有 35 種，詳參下圖：¹⁷

	作者	詩集名	備註
1	李彥瑱	松穆館集	漢語譯官
2	李彥瑱	李虞裳詩稿	漢語譯官；選數十首

¹⁴ 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頁 255-276。

¹⁵ 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8。

¹⁶ 錢志熙：〈從《韓客詩存》看近代的韓國漢詩創作及中韓文學交流〉，《동북아시아문화학회 국제학술대회 발표자료집》（東北亞文化學會國際學術大會發表資料集），（2001 年 10 月），頁 61-76。

¹⁷ 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頁 10-12。季南的論文所指應為 36 種，兩者所不同的，季南指出多了的是朴永輔的《雅詩堂詩鈔》、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懷古》不列於李豫、崔永禧的整理列表之中，但李、崔的書卻收錄多了南樵的《正雅集、海客詩錄》。但季南沒有解釋所發現的材料的來源，故在獲得更多資訊以前，不以季氏之文作表，而以李豫、崔永禧的書為基礎。筆者再據兩人的整理，再修正部份筆誤或補充作者資料。

3	金炳陸	金雨觀詩草	朝鮮生員
4	朴鳳彬	蓬桑錄	朴永輔的兒子
5	朴永輔	燕槎錄	
6	鄭顯德	海所詩草	選 13 首
7	李近憲	峨洋詩錄	未選入
8	朴霽鴻	雲巢山房詩草	
9	沈英慶	鍾山詩稿	選 5 首
10	楊士彥	蓬萊詩草	
11	李廷稷	天籟詩稿	漢語譯官；選 15 首
12	南樵	正雅集、海客詩錄	選 15 首
13	李尚迪	恩頌堂前後集	漢語譯官；選數十首
14	趙舜韶	金剛山記	
15	金敬之	惕若集	
16	金國卿	恭齋集	
17	金叔度	朝天錄	朝鮮初期文臣
18	金麟孫	金麟孫詩集	朝鮮初期文臣
19	金謹思	金謹思詩集	朝鮮初期文臣
20	金宗直	金宗直詩集	朝鮮初期文臣
21	金淨	金淨詩集	朝鮮初期文臣
22	白光鎮	白光鎮詩集	共選光鎮、光斗兄弟詩 13 首
23	白光斗	白光斗詩集	共選光鎮、光斗兄弟詩 13 首
24	李豐翼	友石詩冊	選 7 首
25	崔性學（輯）	《海客詩鈔》 ¹⁸	漢語譯官
26	不知撰人	東國諸家詩	
27	卞元圭	卞蛛船詩稿	漢語譯官
28	金秉善	金丹史詩稿	漢語譯官
29	金求爵	存春軒詩鈔	
30	徐相雨	鼎金章詩草	1882 年後任統理機務衙門
31	李穡	李微隱詩集	朝鮮初期文臣
32	洪元燮	太湖集	
33	李廷柱	夢觀詩	
34	趙性敏	趙韶亭詩草	

¹⁸ 「譯官六家」等譯官的詩文與詩集被董氏所收錄之。當中，崔性學將「譯官六家」的詩稿，名為《海客詩鈔》。韓國學界關於《海客詩鈔》，詳參劉婧：〈조선 역관 6 인의 시선집 『海客詩抄(해객시초)』에 대한 고찰——3 종 필사본을 중심으로〉（6 名朝鮮譯官的詩集《海客詩抄》的考察——以 3 種手稿為中心），《漢文學報》，第 28 輯（2013 年），頁 229-270。

35	鄭夢周	鄭圃隱詩草	朝鮮初期文臣

圖表 8 《海客詩錄》曾點定入選的詩文集

上表 35 種之中詩集，其中不少來自譯官，如李廷樞（1781-1816 年）、李彥瑱（1740-1766 年）、¹⁹李尚迪、卞元圭（1837-1896 年）、李容肅、²⁰姜海壽（1824 年-？）、金秉善、²¹崔性學（1842 年-？）等人，²²而董文煥與譯官之間關係尤為緊密，因此董氏能獲得譯官們的文本，而在董文煥的日記之中，有提到如李容肅等譯官，是把這些材料帶給董文煥的主要媒介，在此脈絡之下，董文煥自然會閱讀及認識更多來自譯官的作品。因此，董文煥視野以及他對朝鮮文壇的認識，則全賴譯官的書寫、幫助以及轉介。雖然今天學者們也無法再了解董文煥的具體點評，但可以看見在《海客詩錄》的編輯過程中，譯官是不可被忽略的，否則此書基本上亦不會出現。

¹⁹ 李彥瑱在文學成就以及漢詩的水平受到東亞各地學人高度評價，關於他的文學水平詳參李春姬：〈明 王世貞の文学思想と虞裳李彦瑱の漢詩〉（明王世貞の文學思想與虞裳李彥瑱的漢詩），劉建輝編：《前近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三国の文化交流と表象—朝鮮通信使と燕行使を中心に—》（前近代東亞三國的文化交流與表象——以朝鮮通信使和燕行使為中心）（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11 年），頁 269-283；李春姬：〈貧窮和憤懣的和弦——十八世紀朝鮮李彥瑱之詩歌〉，《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192-194。

²⁰ 關於李容肅的活動，詳參金麗華：〈조선 후기 역관 李容肅의 행적과 작품 개관〉（朝鮮後期譯官李容肅的行蹟與作品概況），《민족문화》（民族文化），第 49 輯（2017 年 6 月），頁 261-291。

²¹ 關於金秉善的活動，詳參金榮鎮：〈韓中文學交流資料의 總集《華東唱酬集》〉（韓中文學交流資料的總集《華東唱酬集》），《漢文學論集》，第 44 輯（2016 年月份缺），頁 371-393。

²² 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據清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朝鮮檔」中整理的奏摺之中提到崔性學曾擔任賚咨官到北京處理咨文事宜：「詢之在津之朝鮮司鐸（司譯）奉事崔性學，言該國王尚有咨禮部公文一角。該通事已於十二日進京投遞，並聞將續派三品文職於七月十五日，由該國起程來報王妃之訃，亦崔性學聞諸通事者也。」關於此，詳參郭廷以、李毓澍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年），第 3 卷，頁 824。

據劉靖利用董文煥的日記分析，發現朝鮮譯官在協助編輯《韓客詩錄》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她所舉的例子是李容肅。李容肅是李尚迪的學生，同時本人也是譯官，²³在《韓客詩錄》的編輯過程中，董文煥多次提及到李容肅將鄭夢周（1337-1392 年）的《鄭圃隱詩草》、楊士彥的《蓬萊詩草》、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懷古》、李尚迪的《恩誦堂前後集》、李尚迪父親李廷稷的《天籟詩稿》等朝鮮譯官與文人的著作帶到北京交付予董文煥。²⁴朝鮮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譯官的李彥瑱，²⁵雖然本人沒有赴華，亦英年早逝，但身為漢語譯官的他，撰寫了各種出色的作品，使當時的朝鮮詩壇相當佩服。李尚迪在他死後為他的詩集編為《松穆館集》。這本書亦是由李容肅帶到北京，將之轉遞到董文煥手中，使董文煥將李彥瑱的詩收錄入他的詩錄，讓中國文壇能對李彥瑱有所認識。據董文煥的《硯樵山房日記》指出：

同治一年二月初五：午刻，同顧齋詣城內中和參局，為李鍾山並菊人（註：即李容肅）小棠送行，筆談竟日，屬書屏對，并寄琴泉、桓卿、蘭西、秋潭諸友人信，俱面交矣，薄暮旋寓，接

²³ 李尚迪曾撰詩〈送菊人游燕〉：「天子三旬稱壽日，行人千里聚糧餘。關風伏雨遼河路，多少前車戒後車。東南半壁尚烟塵。小醜游魂今幾春。聞說故人多殉難。九泉不負讀書身。萬頃荷花萬樹蟬。九天風露記清妍。至今一片尋詩夢。長在金鰲玉棟邊。一醉陶然納晚涼。碧蘆滿地似江鄉。客中逃暑無多處。恨未曾尋萬柳堂。離席怱怱日暮何。棟花飛盡綠陰多。春明舊雨如相訊。傳唱樽桑濯足歌。」此詩一方面說明了李容肅需賀壽到北京，而且他作為「前車」身份對他的學生作一些關心與，頁 7a-b。

²⁴ 劉靖：〈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頁 260-268。

²⁵ 1763 年，他曾擔任漢語譯官陪同成大中出使日本，協助執行通信使使團的活動。該次通信使團中，成大中、李彥瑱等組織了一批日本的文人，展開了各式各樣的筆談酬唱。關於此，詳參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文學遺產》，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2 月），頁 114-131。

讀鍾山午間候札，小棠是日以外出未晤。²⁶

李尚迪的編輯以及由李容肅轉遞給董文煥詩集的過程，可看出李彥瑱這位英年早逝的譯官，逐漸被董文煥所了解的過程。此外，李容肅將大量的詩集贈給董文煥，例如董文煥的日記便曾提到：「同治二年正月十八：菊人送來藕船函寄天籟詩稿、恩頌堂前後集。」²⁷可見，李容肅促使董文煥能夠欣賞不同的朝鮮詩人作品，特別是譯官的作品，也可藉此將之收藏並編入《韓客詩存》之中。而李春姬形容李彥瑱為懷才不遇的譯官，故可藉此看到李容肅或李尚迪傳贈該書的背後原因。無論是董文煥本人在日記中的紀錄，亦或是編輯《韓客詩錄》都說明了他利用了一些交流的機會，閱讀到了譯官的詩集作品。透過朝貢使行活動的機遇，譯官能夠多次到訪中國，與其中國友人交流。而這些中國友人可透過如李容肅、²⁸卞元圭等譯官的收集，與其一同閱讀其他朝鮮譯官與朝鮮文人的詩，在當時清代文人眼中，朝鮮譯官尤如媒介，尤如詩壇交流的橋樑。李春姬特別提到在這時代的韓中文學交流中，是建基於同道與知己意識之下而產生的，朝鮮的譯官，與董文煥等願意與李尚迪等譯官交往的清人，產生了共鳴以及互動的意識。²⁹像董文煥般的清人，可通過無障礙的酬唱、文集、詩集的收藏以及寄贈，而在某種程度的意識之中，對朝鮮文學與文人發展產生一定的認知。

²⁶ 董文煥：《硯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第1冊，頁43。

²⁷ 劉靖論文曾引該段，但其所引之內容與原文有誤，故應參董文煥：《硯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頁174。

²⁸ 劉靖提到李容肅先後將李尚迪的《恩頌堂前後集》、李廷稷：《天籟詩稿》帶予董文煥，關於此，詳參劉靖：〈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頁262-263。

²⁹ 李春姬：《19世紀韓·中文學交流——李尚迪를 중심으로》，頁36

譯官不只是限於傳遞書籍的中介，甚至是清人作為酬唱的對象。董文煥曾於咸豐年間作秋懷唱和八首，他本人提到：「辛酉夏，閉關習靜，吟咏自遣，性本幽憂，逢秋多感，良宵漸永，蟹緒無端，習習於中，不能自己，遂成八首，命曰《秋懷》，出以示人。顧齋見而善之，股評反歌，輒以呈海秋、魯川兩先生，俱蒙首肯。一時同人屬和遂多，人事好乖，吟侶俄復星散，既以出稟裝襲篋衍。」³⁰秋懷本自唐宋以來，都被文人作為對於社會的困境而產生無力感，而通過詩詞作出抒發愁悶的意象，晚清複雜的社會自然對本有抱負與情懷的士大夫有所呼應，自然吸引到很多清人和唱董文煥的秋懷。董文煥的友人間傳示後，和唱的人相當多，而有趣的是，一些朝鮮友人包括李容肅、朴永輔（1808 年-？）、林致學、林鳳彬、李尚迪、趙徽林（1808 年-？）、卞元圭、沈鍾山等，將他們的詩作寄回給董文煥。而董文煥整理後，於 1862 年與 1870 年在他的書齋龍文齋先後刊行了《秋懷唱和詩》、《秋懷唱和詩續》。朝鮮友人當中得到一種秋懷的意象共鳴，也是因朝鮮同樣面對著相近的情況，他們彼此之間，通過詩作的交流，彼此之間得到了對應。而當中有回響的，如曾擔任使團成員的林致學等，也包括像李尚迪、卞元圭與李容肅等都是多次往返中國的朝鮮譯官。但當中更深刻的交流，則是李尚迪與李容肅兩位譯官。如 1864 年（同治 3 年，朝鮮高宗元年），李尚迪擔任譯官抵京便與董文煥見面，過程中贈予董文煥詩〈山海關中途中口占示清珊〉：「登臨渤碣嘆勞生，髀肉全消兩鬢明。古戍草深多牧馬，荒村花落未聞鶯。自期誓墓將終老，不道乘槎又遠征。只有故人

³⁰ 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同治壬戌京城龍文齋刻秋懷唱和詩序言〉，頁 224。

重見日，不遵春酒證蘭盟。」³¹

從後來的歷史脈絡來看，李尚迪回國後不久便逝世。而他詩中也可看見，他提到自己年華老去，仍需遠赴北京，但是能夠有機會與故友董文煥見面，還是在其此生涯中有所慰藉。而董文煥的日記也記載了在 1864 年 3 月與李尚迪見面時與交往的經歷：

三十晴，同顧翁赴伯寅邀陪朝鮮李藕船，飲暢譚竟日，同坐者實大蓉州，午橋若農香濤誼亭海老，伯寅示其新刊王孟調明經西鳧草，藕老贈朴氏竹西詩稿一冊，並索書楹聯橫幅。藕老此來，凡十二度矣，亦罕事也。宜亭擬繪春明餞春圖，同人分題，其後即用藕老途中口占韻，與顧翁夜話。³²

過程中，除了兩地文人的直接交流以外，書畫互贈、酬唱也是交流的重要方式。董文煥亦為此回贈李尚迪一詩：「婪尾初殘夏已生，無端此會又春明。空將幽夢留芳蝶，不耐閒愁怯曉鶯。帝裡春仍前度別，關門人是隔年征。彼圖莫嘆垂垂老，會向花間續舊盟。」³³從李尚迪的經歷為例，李尚迪因其譯官身份來往中國 12 次，³⁴對董文煥這位清代文人來說，也知道是很罕

³¹ 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同治壬戌京城龍文齋刻秋懷唱和詩序言〉，頁 219-220。

³² 董文煥：《硯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同治壬戌京城龍文齋刻秋懷唱和詩序言〉，頁 420。

³³ 董文煥：《硯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饒春圖為朝鮮李藕船題同次原韻〉，頁 385-386。

³⁴ 李氏第一次擔任譯官是在 1829 年（純祖 29 年）出發的冬至兼謝恩使行，最後一次則是 1864 年（高宗元年）告訃請謚兼承襲使行，橫跨 30 多載。關於此，華文研究中，以溫兆海的列表，最為方便讀者了解李尚迪的出使情況。詳參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 年），頁 1-2；並參李春姬：《19

有的事情，而通過李尚迪，亦得以獲贈一些朝鮮文人如朴竹西的文集。³⁵清人可通過朝鮮譯官的眼光及其網絡，而對朝鮮的社會與文化有某程度的了解。³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早於這次見面前，已有緊密的交流，而李尚迪的學生李容肅也因此與董文煥保持聯繫。在日記之中，也可看到相關的記載：「初十晴午後，海客李菊人同其副使朴錦齡、嗣漪園過，留飲暢譚。」³⁷在此說明的是譯官的職責和特殊身份，形成他們獨有的網絡，而從此脈絡觀之，他們因此便在清人的作品與日記中，留下了不少的記憶與作品，而清人憑藉與他們交談，亦可從他們眼中了解到朝鮮的社會、生活以及文學創作。

就此，讀者很容易產生了疑問，何以董文煥日記所記的朝鮮客人以及文學創作對話的主要都是譯官，譯官從甚麼時候開始，被歷史紀錄不再單單視為富商、情報收集的形象，而是成為朝鮮文學的代名詞呢？就此，劉靖提出的觀察很值得留意：

朝鮮後期譯官階層經濟上的富有，必然促使他們文學活動上的活躍。他們的文學活動在朝鮮內主要體現為詩文創作、詩社活動、編撰詩文集和中人階層的選集等方面。例如，譯官階層組織

世紀 韓·中 文學交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頁 53-54。

³⁵ 朴竹西並非傳統的兩班貴族，故與李尚迪等譯官的身份背景更為接近，關於此詳參元珠淵：〈박죽서 시에 나타난 그리움의 세계〉（朴竹西詩中的懷念的世界），《한문고전연구》（漢文古典研究），第 22 卷（2011 年），頁 149-168。

³⁶ 像黃爵滋（1793-1853 年）、葉名澧（1811-1859 年）等當時清人名家，均藉著認識董文煥的關係，而可了解李尚迪的文筆，並藉此酬唱與回應。因此，可以了解譯官所塑築的文學網絡，不限於所對唱的清人，也包含其背後的文化與文學團體與網絡。關於他們的詩作，詳參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頁 97-102、104-107。

³⁷ 董文煥：《硯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頁 168。

詩社的同時也編撰了《昭代風謠》、《風謠續選》、《風謠三選》等規模較大的詩選集。當時這些詩選集的編撰不僅表明他們在文學素養上的提升，同時，在書籍刊印裏是大士夫階層專利的朝鮮社會，也顯示出譯官階層在經濟上的實力。³⁸

劉氏所舉的想法，李春姬亦有提及相關的分析，而李氏更進一步補充，指出譯官的漢語能力也是關鍵，李氏列舉了《通文館志》中，朝鮮後期譯官所閱讀的書籍來證明相關的能力，與此同時也提及到貿易為譯官帶來的知識生產。³⁹

不過，除了語言與財富以外，更重要的是，因朝鮮是一個基本上通過世襲與家庭背景，來維繫著原來身份的社會，而譯官的工作與身份一般而言也是很難得以改變及面對。從這種背景的分析，可了解譯官面對職責與社會的無力改變，固然轉投於尋求立場與氛圍更加貼合的環境，故通過創作，希望尋求更多人的認同，這亦是朝鮮的閭巷文學在 18 世紀興起的原因。因此，一些像高時彥所編的《昭代風謠》、⁴⁰洪世泰的《柳下集》等書的出版，也象徵著士大夫之外的平民與中人為中心的漢文創作委巷文學的興起。

³⁸ 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攷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頁 270-271。

³⁹ 李春姬：《19 世紀 韓・中 文學交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頁 37-42。

⁴⁰ 一位兩班官員李得臣（1742-1802 年）閱讀過昭代風謠後指「多清新雋警語，意謂國朝右文之化。」黃宅厚：《華谷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209，李得臣：〈華谷集序〉，頁 1a。昭代風謠是高時彥聯合蔡彭胤（1669-1731 年）所編的，主要是收錄一些於兩班以外的一般百眾茶餘飯後聚集的詩會內容，故當中不少譯官與非士大夫群體的成員在這些詩會之中，參與一些漢詩的創作。平民與中人之分野一般在於漢文的閱讀與運用，故一般來說委巷文學所相對的概念便為中人的創作。關於此，詳參閔丙秀：〈朝鮮後期 中人層의 漢詩研究〉（朝鮮後期中人群體的漢詩研究），《東洋學》，第 21 輯（1991 年 10 月），頁 155-174；另參簡江作：《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臺北：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132-133。

譯官在原來的工作以外，獲得了一個機遇，展示自己的能力、水平，擴闊了譯官於朝鮮社會的文化活動空間。⁴¹而閭巷文學的其中一個特徵，是他們的面向不只是朝鮮民間，也通過譯官的網絡，將這些作品，帶到中國，讓清人得以認識朝鮮的文壇。如上述所提及的文學作品所形成的文壇風氣，實際上反映譯官藉著原來的身份所獲得的語言、權力以及財政的機遇，使他們得以在文學交流上也擁有中介人的身份。而董文煥亦通過這些譯官的幫助，獲得了珍貴的書稿、掌握了文壇的情況，更重要獲得了深刻的交談，我們雖然無法看見董文煥最終如何評論譯官詩作，但從行動面的觀點來看，董文煥有意編輯此書，其實已經可看到他對朝鮮的文壇感到相當大的興趣。

三、 譯官李尚迪與清人的朝鮮形象的形塑

董文煥的例子可讓我們了解，清人可通過他的朝鮮譯官好友，建構文化網絡，讓他或其他人能了解朝鮮的文壇與文人風氣，其與董文煥接觸較多的一位譯官是李尚迪。李尚迪，字允進、惠吉，號稱藕船先生，是朝鮮晚期重要的一位譯官。他出生譯官世家，父親金命裕也曾擔任司譯院的僉正，而在 1825 年（道光 5 年）考獲朝鮮的譯科一等及格。⁴²據了解他曾出使 12 次，平均每 3 年來華一次。據李春姬與溫兆海等人的研究與整理，⁴³

⁴¹ 許敬震：《朝鮮委巷文學史》（서울[首爾]：太學社，1997）。

⁴²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4650-4），卷 2，道光乙酉式年條，頁 26b。

⁴³ 關於李尚迪的研究華文、韓文學者也有不少先前的研究，如鄭俊洙：《李尚迪 詩學研究》（李尚迪的詩文學究）（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博士論文，1987 年）、華文來說則可參考孫衛國、李春姬、溫兆海等人研究。

共超過 100 位清人曾有和李尚迪交遊的痕跡，⁴⁴當中又以文人的風格、學術與地域所在分為阮元學派、⁴⁵常州文人、⁴⁶桐城派、⁴⁷宣南學社（或稱消寒詩社）等，⁴⁸學界已有不同學者通過各種的面向，來了解李尚迪，已得到頗為豐碩的成果。然而，本章欲以李尚迪的經歷為例，如何使清人藉著他的文學創作，形塑他們對朝鮮的社會、文化以及文學的認識。他對朝鮮社會的想法，並通過他的詩詞、酬唱，讓清人所了解。通過此，可補充及回應過去學者所忽略的一個面向，就是一種通過中介作為文化形象塑造的歷史。

雖然李尚迪沒有如洪大容等士大夫撰寫燕行錄，但是通過其《恩誦堂集》的詩句大抵可了解他擔任譯官的經歷，除了途徑一般燕行所經之地，例如瀋陽、姜女廟、會寧嶺、山海關等，此外也需擔當一些情報收集的內容，李尚迪曾有詩提到：「日邊消息杳難尋，爆竹千門散積陰。燕柳含煙春

⁴⁴ 李春姬以李尚迪的《懷人詩》、《續懷人詩》、《西笑編》為例整理其友人約為 101 人，關於此，詳參李春姬：《19 世紀 韓·中 文學交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頁 86-88。

⁴⁵ 關於阮元研究，詳參 Betty Wei Peh-T' 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⁴⁶ 關於常州文人各派群體，詳參周佳榮、丁潔：《天下名士有部落：常州人物與文化群體》（香港：三聯書店，2013 年）；並參楊旭輝：《清代經學與文學：以常州文人群體為典範的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⁴⁷ 桐城派是在清朝重視古文，並主張經世致用的文學派別。一般學者視方苞（1668-1749 年）、劉大櫆（1698-1779 年）、姚鼐（1731-1815 年）等學者為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關於桐城派研究，詳參王基倫：〈《春秋》筆法與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的古文創作〉，《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203-221；並參曾光光：《桐城派與清代學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⁴⁸ 他們主要是一批翰林院官員，而大多在宣武門外的地方交往，而燕行使節於北京大多聚居以及活動的地方亦是宣武門附近一帶的地方，因此他們之間在北京的空間之中，產生了一些文化認可。關於宣南文人群體研究，詳參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色淺，唐花如雪客愁深。三盃灑灑傾藍尾，萬里懸懸隔素心。莫遣鷄入催箭漏，今宵一盞值千金。」⁴⁹此外，他亦在北京曾與中國人，就漢語發音問題與人交流：「一方自有一方音，謾把諧聲辨古今。心折傳翁曉人語，汀芒喚起顧亭林。」⁵⁰可見，李尚迪的一般工作與其他譯官無異。

以張曜孫與李尚迪的交往為例，可看出作為譯官的李尚迪與張曜孫交往後，張曜孫等清人可藉著李尚迪的感受與書寫，了解朝鮮人所面對的困難和所經歷的社會。張曜孫（1803-1863 年），字仲遠，江蘇陽湖人，為常州文人代表。父親為張琦（1764-1833 年），著有《宛鄰詩文集》等，其伯父為著名的詞學家與經學家張惠言（1761-1802 年），兩人並稱「毗陵二張」。雖然在文壇上，張氏家族得到一定的認可，但張曜孫家中並非富有，僅以行醫自給。自道光 23 年（1843 年）中舉，則開始在各地擔任知縣等地方低級官員，曾參與抵抗太平軍的戰役，張曜孫著有《謹言慎好之居詩》、《產孕集》以及未完稿《續紅樓夢》。

張曜孫本人在清人文壇之中並非最有代表性，但張曜孫的家庭卻是在清廷文壇頗為著名，其中最為人所認識的是他家中的母親湯瑤卿（1761-1831 年）、⁵¹大姊張縉英、⁵²二姊張紉英等，他們都為著名的清代女

⁴⁹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卷 5，〈燕館除夕 正使邀諸賓小酌 次杜共賦〉，頁 5b。

⁵⁰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續卷 10，〈燕館與人論華語〉，頁 10b。

⁵¹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9-61.

⁵² 她是著名的晚清女詩詞家，特別能反映晚清的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潮。關於張縉英的文學成就，詳參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性作家，且曾出版詩集，而三姊張綸英則是著名的書法家。⁵³Susan Mann（曼素恩）曾先後撰寫《綴珍錄》及《張家才女》兩種書籍並分別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來了解 18 世紀至 19 世紀期間的清代女性作家，如《綴珍錄》以 18 世紀女性作為中心來重新探討婦女生活與清代社會變革的互動；⁵⁴而《張門才女》以微觀史學為研究方法，觀察居於江南常州的張門才女。Mann 利用各種零散的史料重整家庭關係、社交網絡以及情感生活，來了解清朝的女性才女或作家的私人世界、書寫模式以及女性視角中的社會。⁵⁵Mann 在論述中亦特別提到，這些張門女作家作品得以出版，實際上是張曜孫協助出版。⁵⁶

張曜孫幫助他們家中的女性成員的作品出版過程中，實際上亦經過李尚迪等能夠多次往來朝鮮與中國的譯官，把這些作品帶到朝鮮半島，使朝鮮文壇對清廷女性視角可以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張曜孫的大姊張縉英的《澹菊軒集》通過了李尚迪，交予其老師金正喜，金正喜亦題詩肯定張縉英的成就：「廿四品中澹菊如，人功神力兩相於。墨緣海外全收取，讀遍君家姊

⁵³ 曼素恩（Susan Mann）著，陳志明譯：〈張綸英〉，載劉詠聰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0-221。

⁵⁴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1-226.

⁵⁵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62-129.

⁵⁶ 《澹菊軒詩初稿》原由張曜孫出版，惜於太平天國之亂後，其版完全被燒毀。李尚迪從其書信往來之中，亦得知此事：「粵西烽焰延三房，傷心梨棗委灰塵。」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卷 9，〈仲遠重刻伯姊孟緹夫人《澹榮軒詩集》屬題一言〉頁 3b-4a；並參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頁 53-54。從此例可見，張曜孫是讓其家中的女性成員的詩作得以出版的關鍵，而這一點在朝鮮文人，特別是李尚迪的書寫之中可以證明。另外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121-122.

妹書。」⁵⁷而金正喜亦就張曜孫的三姊張綸英的《綠槐書屋圖》題詩：「閨藻天然古北碑，更從隸法點波奇。綠槐影裏傳家學，龍虎雄強屬黛眉。」⁵⁸張曜孫家中的女性成員的文學成就，並非本文主要探索的對象，但是金正喜從來沒有與張曜孫見面，但卻在這種由譯官所築構的人際網絡中，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認識，以及為對方的作品題詞撰句。沒有見過張曜孫的金正喜卻知道張曜孫醫術高明：「張仲遠世守黃法。仲遠父子，醫理極精，第以燥土降逆煖水蟄火之法為問，得其藥方，並叩現證，要一良劑似好，伏未知如何。燥土降逆之法，恐有相合處矣。卸却重擔，決理閒裝，消搖林泉，寔為勝服清涼幾劑，然未敢知果能諧此否。」⁵⁹這些例子背後所說明的是，一方面是金正喜在北京的名聲，已為人所讚譽，但更重要的是，李尚迪作為當中的中介人，使金正喜能被清人所認知，甚至是希望金正喜作為張曜孫出版家中著作的主要導讀及認證人。因此，李尚迪與張曜孫本人之間的關係，值得再作更深入的探討。

張曜孫本人雖然創作上不及其家中的女性成員，但可見張曜孫出生於這類詩書世家，而本人亦因在北京長年生活關係，接觸各地士人，亦藉著文壇所形成的人際與社交網絡，接觸到朝鮮與其他文人團體，彼此之間保持著緊密聯繫。1836年，李尚迪擔任使團譯官，從朝鮮半島抵北京，當時李尚迪拜訪吳贊（1785-1848）。吳贊即張縉英的丈夫，當時吳贊所居的蔣園，位於宣南地區，是中朝文人之間交往的重要地點。⁶⁰吳贊與李尚迪彼

⁵⁷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10，〈題澹菊軒詩後〉，頁9a。

⁵⁸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10，〈題張曜孫四姊綠槐書屋圖〉，頁9a。

⁵⁹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3，〈書牘・與權彝齋〉，頁11a。

⁶⁰ 如文人朴永元（1791-1854年），曾撰詩題他曾參與蔣園的餞春活動。關於此詳參朴永

此之間得以對話，而在吳贊的人際網絡之中，張曜孫就成為了這次雅聚的成員之一。據李尚迪的《續懷人詩》中，便包括了吳贊的名字。《續懷人詩》、《懷人詩》等，是李尚迪用作「益寄懷海內朋舊之作也。」其即他到北京擔任譯官期間所認識的友人，利用詩句去對這些友人作回憶，今天我們通過李尚迪的詩，可了解他的人際網絡，例如詩集中包括了汪喜孫（1786-1848年）、⁶¹黃爵滋（1793-1853年）、吳式芬（1796-1856年）、潘曾瑋（1818-1886年）、潘遵祁（1808-1892年）等，而當中少不了的當然是吳贊。李尚迪是這樣形容這場雅聚的：「白頭迭唱酬，好速樂鐘鼓。竹裡芰荷香，留客共消暑。欲將鷄絮哭，池館已易主。」⁶²李尚迪所指的是吳贊當時提供了場地讓各人彼此可以唱酬，亦因此張曜孫可以在這空間之中，能夠與李尚迪交流。

張曜孫在吳贊家中認識李尚迪，但卻在第一次見面時沒有深刻交流，故希望與他能夠再見面。幸而在翌年，李尚迪再次來華，這次張曜孫有機會對話。故他自言：「道光丁酉孟春與藕船仁兄相識，匆匆握別未暢所懷。越六月，復以使事來都，晤於客館。」⁶³而張曜孫對於兩人交往的詩之中

元：《梧墅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年），冊302，卷3，〈蔣園錢春後和大始台見示韻〉，頁17a-b。

⁶¹ 據《東鄰尺牘》中，汪喜孫寄給李尚迪的書函中曾提到：「前山泉（注：金命喜）書來索海內治齊魯韓三家詩，及公羊春秋之學者。今後張仲遠處，覓得魏默復（注：深，即魏源）《詩古微》及《劉申甫集》。申甫治公羊者也，容即面致，乞歸里轉交山泉，並乞寄語秋史侍郎。」從此處可以看到李尚迪與汪喜孫之間的交流，其中大前題與金命喜拜託汪喜孫幫忙，而汪喜孫則通過張曜孫聯繫之下，而獲得了金命喜希望得到的書籍。這裡反映關於此，詳參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汪甘泉喜孫條，頁2a。

⁶²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續卷4，〈偉卿吳比部〉，頁11b。

⁶³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서울[首爾]：國立大學

第一句明言：「清飊從東來，肅肅戾坻賓，披襟億宿昔。」⁶⁴其實簡單的一句詩句，已經可以了解到張曜孫對於李尚迪到來，並且能夠彼此交往的期盼。而張曜孫在寄給李尚迪的書信中多次強調的是：「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君以相許，仆何敢辭？」⁶⁵表面看來，只是友人之間對於感情重視所表露的言語。但是，如將張曜孫的家庭與社會背景，再對比李尚迪的社會地位就可以發現兩人之間當中的書寫背後的關係。

據孫衛國探討，張曜孫與李尚迪於吳贊之家見面時，並將雅會經過繪畫了《海客琴尊圖》，而孫曜孫看後並將之自題海客琴尊圖，其句如下：

黃金台空馬骨死，此地胡為著張子。十年作賦思問天，不信
天門竟萬里。一車碾破長安塵，揮灑不惜丹壺春。士安多病輯靈
素，扁鵲鬻技游齊秦。朝出都門暮九陌，溽暑嚴寒苦相逼。滿目
瘡痍望救心，微權斟酌回天力。儒冠儒術誠無用，倒屣公卿絕矜
寵。鹵莽時名得失休，消磨心力年華送。鶯花尺五東風天，玉驄
金勒多少年。主人憐我苦抑鬱（謂吳比部偉卿留客納涼之館），手辟三徑
供流連。一笑紛紛皆熱客，歌笑無端激金石。野性難辭軫蓋喧，
同心零落岑苔跡。忽然海客天外來，握手便覺忘形骸；飄流入海
渺一葉，眼底直已無群材。招要裙屐蓬門開，勝賞那復辭深杯；
高吟一篇琴一曲，天風海水浮蓬萊。歡宴方闌促征役，客歸我亦
還江國；倦侶棲遲白下游，神交浩蕩滄溟隔。吳君知我憶舊遊，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3441-40），頁 5a。

⁶⁴ 張曜孫：《謹言慎好之居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藏清光緒 30 年（1904 年）刻本），卷 2，頁 1a。

⁶⁵ 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乎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張曜孫書信條。

寫出新圖增感激；事業中年剩友朋，遭逢一例傷今夕。青山青青
白日白，良會浮生幾回得；但結清歡便不孤，苦求知己終何益。
披圖我正感索居，驛使忽送雙魚書；謫仙文彩秀東國(時適得朝鮮李
藕船書，索作分書並刻印石)，愛我翰墨如明珠。鯨波千丈招靈桴，銀
台瓊館神仙都；揮弦獨賞伯牙曲，痛飲好臥長房壺。相攜世外足
千古，局促塵壤胡為乎？嗚呼，局促塵壤胡為乎，古來騏驎駉耳
多鹽車(道光十九年三月張曜孫自題于白門節署，右拙詩呈政並乞題賜征詠)⁶⁶

據孫衛國所指，這首詩「清楚地交代了《海客琴尊圖》的來歷……深深地
表達了結交李尚迪時的，他內心之激動」，他並以夫馬進以洪大容與嚴誠之
間為例的東亞世界中的情來闡述張與李之間的友誼乃東亞情的世界延續。
⁶⁷而溫兆海則所指張曜孫本人考取科舉名落孫山的悲憤心情以及李尚迪讚
許過張曜孫的文才，所以使張曜孫對李尚迪的到會有如此感動。⁶⁸然而，
兩篇文章沒有聚焦兩人之間彼此的身份與遭遇才會產生如此的情感。在張
曜孫寄贈《海客琴尊圖》後，並請李尚迪接受，為《比屋聯吟圖》和《海
客琴樽圖》題詩，李尚迪當然亦欣然接受：

有酒如澠琴一曲，竹深荷淨無三伏。(丁酉夏君與余讌集于偉卿，
留客納涼之館)醉來握手貴知音，後會寧歎難再卜。青衫何時滯春

⁶⁶ 張曜孫：《喜晤李藕船即贈》，載《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頁 7a。

⁶⁷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友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
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100。

⁶⁸ 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頁 121。

明，書劍飄零誤半生。痛飲離騷為君讀，大海茫茫移我情。⁶⁹

李尚迪一句「醉來握手貴知音，後會寧歎難再卜」感歎因地緣問題，兩人估計難以有再見面的機會，而後面的一句「青衫何時滯春明，書劍飄零誤半生。」更明確指自己因讀書，在外做官浪費了半生時間。李尚迪背後當然說明的是同情張曜孫與自己因功名方面浪費了時間，卻得不到人所肯定之感歎。張曜孫所面對的現實悲哀，以及知音難覓，無法在清朝社會找尋到認同。反而張曜孫在李尚迪這裡獲得了安慰與滿足，只要再將李尚迪的背景與身份並排來看，就可了解張曜孫何以與李尚迪呈現這樣的情感，而李尚迪亦對他的想法有深刻的回應。李尚迪作為譯官，即使文采頗受清人文壇歡迎，但畢竟他只是中人階層，卻未能因各種貢獻，獲提拔為兩班，而兩班亦未有對他的詩作高度欣賞與評價，這是受制於朝鮮社會階級制度下的譯官命運。所以身份為中人的李尚迪曾寫詩道：「記曾身慕御爐烟，捐棄空箱值幾錢。但向酒家償宿債，一蓑歸老白鷗邊。」⁷⁰慨嘆自身地位卑微，可見在思想上李尚迪對於自身沒法獲得更高的待遇有所失望。

因此，當面對同樣情景的張曜孫，故能放心與李尚迪大談此問題，而李尚迪亦有所感同身受。由此可見中人譯官的身份使這些失落於科舉的清文人，能夠對對象作出抒發，而往往有所回應。此點似乎是過去學者未有特別注意的。而事實上，不少與李尚迪等譯官有深交的文人，實際上大多也是在仕途上並非一帆風順，故此譯官被這些清代文人所留意，並且嘗試

⁶⁹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卷7，〈張仲遠 曜孫 囑題比屋聯吟海客琴樽二圖〉，頁1b-2a

⁷⁰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續卷2，〈典朝衣〉，頁10a。

進行交流，並留下各種書寫，背後關鍵的因素是譯官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失落、慨嘆與迷茫，他們有著共同命運的想像，故彼此之間的感情變得特殊，也成為後人所讚頌的因由。而兩者之間的感情由此而產生，張曜孫再創作《海客琴尊第二圖》時，並再之邀請李尚迪題韻：

十載重揩眼，西山一桁青。題襟追漢上，修稷續蘭亭。顏髮俱無恙，莊諧輒忘形。今來團一席，昔別隔層溟。記否懷人日，依然逐使星。馬諳燕市路，槎泊析津汀。往跡尋泥雪，良緣聚水萍。延陵佳邸第，平子舊居停（讌集於吳偉卿比部留客納涼之館，時中遠寓此）。凍解千竿竹，春生五葉箕（時乙巳新正五月也）。勝流皆國士，幽趣似山扃。投轄從君飲，焦桐與我聽。盃深香灑灑，調古韻泠泠。此日傳清散，何人賦罄瓶。願言鍾子賞，休慕屈原醒。北海存風味，西園見典型。古歡等觀樂，中聖劇談經。文藻思焚筆，詞鋒怯發硎。已知交有道，矧感德惟馨。海內留圖畫，天涯託性靈。百年幾相見，萬里即門庭。⁷¹

譯官和其他士大夫不同的情況是，他們可以有機會回到中國，並再次與他的友人見面，延續彼此之間的話題。朝鮮士大夫也許與清人亦有交往，但可能最終延續的只有能依賴書信，始終不及與譯官交談深刻。故譯官身份所建構的文壇網絡是過去所忽略，但是有其存在的原因。

此外，張曜孫的小說《續紅樓夢》可引證作為譯官的李尚迪，如何使

⁷¹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卷9，〈追題海客琴尊第二圖二十韻〉，頁3b-4a。

張曜孫能夠對朝鮮社會與環境有更深刻認識的例子。崔溶澈曾提及中國小說與朝鮮社會的關係：「朝鮮文人中關心小說、喜歡小說的人，曾多數參加燕行使節，有機會接觸龐大的中國小說世界。雖然在文集中少有明確記載，但他們赴燕機會接觸大量的小說作品，並購買書籍帶回，應該是一個站得住的推測。帶入朝鮮的書籍最初在狹窄的範圍內輪流閱覽，後來有人推動出版，廣泛流傳。」⁷²由於燕行活動的興起，帶動了中國小說在朝鮮社會流傳以及接受，與此同時，朝鮮文人可藉此從中認識中國社會與文化，崔氏指出：「在他們（朝鮮文人）的眼裡，中國文言小說，即便屬於『怪力亂神』的不經之文，但仍可以從中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社會、人情和風物，在消閑之時，開闊眼界。」⁷³由崔氏的想法可延伸，中國的小說當時是朝鮮人認識中國情況的重要媒介，而另一方面從一些晚清的小說文本作考察，亦可發現小說的文本生產，亦把朝鮮的情況與文化放置於這些小說之中。

趙旻祐引用 Martin W. Huang 指出 18 世紀至 19 世紀形成了一個紅樓夢續寫的潮流，張曜孫所撰的《續紅樓夢》便在此風氣之中，⁷⁴而趙氏發現《續紅樓夢》與朝鮮社會有相當密切關係的部份就是關於「歲寒」一詞的使用。⁷⁵《續紅樓夢》提及林琮玉請林黛玉到即將完工的園子觀察，當中看到一個最為合適讀書作畫之所，黛玉則建議稱之為歲寒樓：

⁷² 崔溶澈：〈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頁 348。

⁷³ 崔溶澈：〈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頁 337。

⁷⁴ Martin W. Huang,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⁷⁵ 關於趙氏的研究，詳參趙旻祐：〈張曜孫『續紅樓夢』 중 “歲寒樓”와 秋史 金正喜〉（張曜孫《續紅樓夢》中的「歲寒圖」和秋史金正喜），《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102 輯（2017 年 2 月），頁 269-292。

黛玉走進上首一間，見中間一層冰紋細槁，兩扇小圓門。進去，裡面安著床。瓊玉走至床後，將一小壁櫥房門拉開，進入里間，說道：『這裡可以靜坐。』又出來到下首二間，說道：『這裡可做讀書作畫之所。』黛玉道：『這都是與四姑娘相稱，他必定合式的。就這裡，定了罷。此地的樓名，我倒有了，這極現成的。』瓊玉道：『該叫什麼？』黛玉道：「這就叫歲寒樓。」瓊玉道：「好得很，真是恰切。」黛玉道：「卻與你的用意不背，都該括了。」瓊玉道：「不但該括，而且還映著這時的時景。」⁷⁶

歲寒一詞即可聯想的是李尚迪當時手上由金正喜所贈的《歲寒圖》，我們在下一節將有更詳盡的討論。但此處旨在探討張曜孫與李尚迪的友誼原因，使當時張曜孫能夠有機會拜述李尚迪手上的《歲寒圖》，他對李尚迪以及金正喜的遭遇十分感慨，他對歲寒圖自然有深刻的記憶。而當次與李尚迪見面的酬唱宴會，也是由張曜孫本人安排，而且《歲寒圖》亦有他的題跋，成為了歲寒圖的共同創作者之一，而趙氏指出《續紅樓夢》以歲寒命名林瓊玉當時的新園地的中心建築，其實反映了《歲寒圖》在張曜孫佔有重要的回憶。⁷⁷本文舉此例特別旨在說明，李尚迪因把金正喜所贈的《歲寒圖》帶到中國，並與其清友人酬答，但金正喜本人從未與張曜孫見面，但彼此卻有書信往來以及互相認識，當中緣故實乃李尚迪的多次往返擔任各種職務，使張曜孫可認識金正喜，而通過李尚迪，體會到金正喜的遭遇、學識，並對此難忘，於是張曜孫便將「歲寒」放置在自我書寫的小說之中。因此，

⁷⁶ 張曜孫：《續紅樓夢未竟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30。

⁷⁷ 趙旻祐：〈張曜孫『續紅樓夢』중 “歲寒樓”와 秋史 金正喜〉，頁280-284。

張曜孫這本未完稿的《續紅樓夢》，有著金正喜的痕跡，可見李尚迪為兩地文學創作如何得以互動，也把朝鮮當時的文化意象，帶到中國，使其中國友人對朝鮮有認識外，更甚是將之投入在其文學與小說創作之中。

譯官不只是了解朝鮮文化與社會的渠道，清人也視譯官作為兩地文物傳遞以及文人溝通的橋樑，如著名的金石學家劉喜海（1793-1852 年），在編其《海東金石苑》時，他已認識了不少重要的朝鮮金石學專家，如金正喜、金命喜、趙寅永（1782-1850 年）等。據朴現圭的研究解釋到何以劉喜海會與朝鮮士人，特別是金正喜兄弟有相當密切的聯繫，他指出：

查閱朴齊家和金正喜，紀昀和劉氏的關係，由他們之間的關係，金正喜有機會結成了與劉氏一家之間的因緣。年輕的朝鮮學者朴齊家，到中國時，拜見了當時的大學者紀昀；此時紀昀已經是六十七歲的高齡，但他不顧年齡差異，格外喜歡朴齊家的學問和人品，而與朴齊家進行了學問交流；朴齊家回家以後，通過外交使臣，給他寫信，表達對他的懷念。他們之間的交流，在當時的朝鮮朝廷和文壇上認為一種特大好事。

紀昀是劉統勳（劉喜海曾祖父）的門生弟子，與劉墉（劉喜海祖父之兄）為朋儕，與劉鏞之（劉喜海父親）是同年（同年進士）。他經常與劉墉一起欣賞書畫，接了劉統勳的贈與硯臺，當時紀昀與劉家有密切的關係。金正喜以朴齊家為老師，修養各種學問，比其人人更早認識中國文化，而且因介紹而在北京認識劉氏一家等中國學者。

後來，金正喜以子弟軍官的身份，到中國時，與平日敬仰對

金石學、書法名望高的劉氏一家結成了因緣。⁷⁸

因此金正喜與劉喜海彼此之間通過了師緣與家緣，在北京相見，建立了緊密的文化聯繫。然而，金正喜此程之後，並再沒有機會遇到劉喜海。到底他如何可以把朝鮮的金石學材料收錄在他的著作中？畢竟當時的朝鮮人不能經常往來北京，他們不可能自行把材料親手交付給劉氏。⁷⁹但在劉喜海自己編的《海東金石苑》之中，寫的序文提及他們如何把朝鮮碑文拓本送給劉喜海：⁸⁰

麥宗巡狩日，光大二年秋。遺蹟搜黃草，殘碑冠海陬。濟麗
無此作，歐趙未曾收。誰復編金石，臨風憶舊游。道光辛卯，劉
燕庭方伯輯海東金石苑，首載此碑。屬余書序文，近聞燕庭身後，
其書亦湮沒焉，可勝愴惜。⁸¹

據藤塚鄰（1879-1948 年）保留的金正喜材料之中，也說明李尚迪就是把他們所擁有的材料及拓本送給劉喜海的關鍵媒介。⁸²他發現劉喜海與金命喜

⁷⁸ 朴現圭：〈《朝鮮書目》介紹及關於劉喜海與朝鮮學者之間文遊的研究〉，《慕山學報》，第 8 輯（1999 年月份缺），頁 59-104。

⁷⁹ 趙寅永、金正喜等也只是因家庭因素，而偶爾獲得機會參與使行之中。趙寅永只有在 1815 年擔任子弟軍官，隨其堂兄趙鐘永（1711-1829 年）前往北京；而金正喜則隨著父親金魯敬（1766-1840 年）。

⁸⁰ 劉喜海：《海東金石苑》，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1989 年），第 93 冊，據 1873 年觀古閣叢刻本影印，頁 2a。

⁸¹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卷 8，〈小棠索題新羅眞興王巡狩碑拓本〉，頁 6a

⁸² 藤塚鄰原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科畢業，亦曾留學中國學習漢文，1926 年他始擔任京城帝國大學教授，專門負責支那哲學、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等，期間完成其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朝鮮的清文化的傳入與金阮堂》。1940 年他於京城帝大退休回到日本，先後擔任東京文理科大學、大東文化學院、東京高等學校等，1948 年於東京逝世，終年

之間的書信中，看到李尚迪作為兩者交流的重要媒介，也解釋到金氏等人與趙寅永均將他們珍貴的拓本交由李尚迪轉遞。雖然今天只能轉引藤塚的材料，但仍可一窺當時李尚迪如何把劉喜海與金正喜之間聯繫起來。1829年（道光9年）9月，時任兩廣總親的阮元所編的《皇清經解》得以完稿，⁸³該書又稱為《學海堂經解》，共收73家，記書188種，凡1400卷，只「以人之先後為次序，不以書為次序。」⁸⁴該書被視為乾嘉學術的重要整理與總結，儒學經解集大成成果。金正喜與阮元一直有所聯繫，於是他得知《皇清經解》編妥後，便馬上聯繫阮元的長子阮常生，⁸⁵希望獲得該書。

阮常生慷慨答應，並委託當時於廣州的劉喜海把《皇清經解》從廣東運至北京後，將之轉交給朝鮮使者。因當時他們了解到將書信、物品傳至朝鮮，均需通過朝鮮的燕行使團，劉喜海因認為此書珍貴，故不敢尋找不

70歲。他在朝鮮半島期間，搜集了大量有關金正喜在清朝結交的好友往來的書信以及各種文學創作，並將之整理以圖了解金正喜如何將清朝當時的文化，如考據學、經學等傳入朝鮮半島，是首位現代學術意義上，以文化史視野說明金正喜如何利用中朝關係燕行活動，建構兩地的文化互動的學者。然而，大部份這些書信原件，都隨著二戰時東京大轟炸的影響下，被完全燒毀，故我們只能通過藤塚鄰的專書，來了解當中的書信內容。關於此，詳參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頁348-391。

⁸³ 18世紀的經學與考據學在清朝文壇中興起。當中以乾嘉學派為主軸。清初經學從理學的主流轉向辨偽為主的清初經學，而乾嘉之間則從辨偽的經學為投於以小學、名物考訂為主的乾嘉經學，故此為乾嘉學派之由來。乾嘉學派中又以江南，特別是揚州學派最為傑出，被視為實事求是的傳統，而阮元被視為當中重要一員及代表。關於乾嘉學派研究，可參考賴貴三：〈清代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的成果與貢獻〉，《漢學研究通訊》，第76期（2000年11月），頁588-595。

⁸⁴ 阮元：《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卷1，頁1a。

⁸⁵ 阮常生實為其姪輩，因阮元妻江氏卒，當時阮元父便以族子常生為江氏出，故實為其養子。李尚迪一直作為阮常生與金正喜之間的橋樑，阮常生在書信中曾提到：「蒙示願悉，令業師金秋史仁兄望為致意。恕匆匆不及寄函矣。家刻六種聊以報命，望察權此。覆諸惟朗鑒不具。真州阮堂生啟。」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乎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阮伯長常生條，頁30a。

相識的人員協助，當時劉喜海撰信予金命喜時提到：

再啟者，阮雲臺先生，有寄令兄《皇朝經解》一大麓，前小雲出守永平時，北將此書交存弟處，本擬此次貢使東歸，託其帶交，奈三行人，俱與弟不相識，無緣托寄，悵甚悵甚。望閣下將此轉致長令兄，並囑令兄，今冬覓一使人，持書至弟寓，取歸此物，可耳，又及。⁸⁶

因此，1831 年李尚迪帶著金正喜的信件與劉喜海見面，確認金正喜希望拜託的人就是李尚迪，在劉喜海手上取到《皇清經解》。劉喜海便把《皇清經解》交給李尚迪後，亦向金正喜交代了此事：「秋史仁兄閣下，九月杪藕船來，交到手翰，雒誦再三，如親謦欬，藉諗興居如意，心跡雙清，頓恥遠懷，是勝抃頌，承惠法書便面，並妙香寺碑，收到，謝謝……經解一書，已交藕船，囑其妥為捆載，望即檢收。」⁸⁷李尚迪是年便把《皇清經解》，大約 1831 年末至 1832 年初，使金正喜得以閱讀。而同時期的百科全書式學者李圭景曾提到阮元編的皇清經解東傳的情況：

此後今閣學阮學經元，有《皇清經解》幾卷。謹按王考青莊先生《盞葉記》，正廟戊戌，沈涵齋念祖使燕，購朱竹垞《經解》，今藏于大內皆有窩。阮學經《經解》亦入我東云，然姑未知誰所

⁸⁶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381。

⁸⁷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384。

藏棄。⁸⁸

有趣的是當時李圭景不知道誰藏該書，⁸⁹從此可推論當時李尚迪以私人身份幫助自己的老師而暗地處理此事。無論如何，李尚迪因此事與劉喜海結成好友，自此李尚迪亦成為了劉喜海尋求朝鮮各種古碑拓本的重要媒介。⁹⁰

劉喜海最初對李尚迪有所懷疑，但不久卻完全信任，甚至是劉喜海請求李尚迪為他的《海東金石苑》撰寫書序與題詩，背後李尚迪亦指出各個譯官為此書完成的關鍵人員：

燕庭今歐陽，千卷藏金石。奎光照眉宇，嗜古成瘡碧。

剔秦風漢雨，臨碧碣禹畫。編摩厥有書，尚嫌寰宇窄。

⁸⁸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年），卷58，下冊頁854-856。

⁸⁹ 李圭景所寫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被視為朝鮮中後期的「百科全書」。儘管李圭景的長箋有很多有價值的資訊，但是圍繞著他本人的經歷及想法的研究，在學界並不多。如鄭州大學的黃卓明探討李圭景對《說文解字》的認知，並從其〈說文辨證說〉證明朝鮮時代知識份子對《說文解字》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準。詳參黃卓明：〈李圭景《說文辨證說》探微〉，《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第35卷第8期（2012年8月），頁65-67。除此之外，李圭景亦對詩歌有很多的認識，亦有學者對此作研究。不過，關於李圭景本人的想法，以及有關他對技術上、習俗上及其他文化層面的話題，在韓國學界之中，當然亦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討論的空間仍十分廣闊。1992年就有一篇成均館大學韓國哲學科碩士論文提及到李圭景的實學思想，論文作者林善英以《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作為探討對象，以展示李圭景的實學思想的發展及特點。林善英：《五洲 李圭景의 實學思想 研究》（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韓國哲學科韓國哲學專攻碩士論文，1992年）。而2009年，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科博士畢業生金菜植亦以《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為中心，聚焦李圭景的學問及其博學精神。詳參金菜植：《이규경의 『오주연문장전산고』 연구》（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研究）（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韓文學科博士論文，2009年）。另外，筆者也曾就李圭景的西洋知識掌握作出了分析，詳參羅樂然：〈開港前朝鮮知識份子對西洋地理的認知與考辨——以李圭景和其《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為研究中心〉，《동서인문》（東西人文），第2輯（2014年10月），頁105-130。

⁹⁰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385。

象罔求海珠，旁蒐窮獫狁。荒碑挾苔蒼，殘幢剝鐵赤。
鑿藏集換鵝，興法存返璧。蜿蜿暹潮字，熊熊白蓮額。
千祺溯羅麗，百編象儒釋。秋雲良同好，樵拓無今昔。
嘉貺替縞紵，萬里憑重譯。含咀遍侯鯖，補綴類瓠臑。
愛奇擴異聞，闡幽恐泯迹。繕寫付鈔胥，烏絲蠻牋白。
複壁供秘玩，一部當典冊。文物斯為盛，賴免青邱僻。
鰕生藉流芳，幸作燕南客。客牕識韻語，黃花澹將夕。⁹¹

詩中李尚迪提到劉喜海此書全憑譯官作協助，得以成書，當中其實可闡述在近現代的東亞世界中，在外地的物品與文書，均需要媒介者作當中行動，而譯官則扮演此角。李尚迪詩集的另一首詩中亦曾提到此事：「一通車笠便忘形，文正之孫有典型。萬里才函心耿耿，十年重見髮星星。家聲黼黻傳清白，古學琳琅訂汗青。記否烏絲曾索字，塗鴉慚絕換鵝經。（君昔屬余書海東金石苑序，贈蘇詩一部為潤筆）。」⁹²李尚迪訴說了劉喜海與他之間的友情，以及《海東金石苑》編訂的背景，但李尚迪對劉喜海這樣的決定，實際是相當高興的，因李尚迪不受其譯官身份所限，獲得了劉喜海的認同。而事實上，劉喜海曾與金命喜交往時，提到事情由李尚迪處理較理想：「壬辰冬便，務祈惠我德音。俾釋遐想，是荷，即交藕船轉寄，似更妥也。奉覆金石各條，別詳別楮，專此，敬候近祉。」⁹³故清人對於譯

⁹¹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卷2，〈劉燕庭輯海東金石苑 屬書題辭 兼索一言〉，頁8a-b；並參劉喜海：《海東金石苑》，〈題詞〉，頁1a。

⁹²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卷5，〈劉燕庭刺史薦卓異入都入伴送琉球使臨別索贈一言賦驢其行〉，頁5b-6a。

⁹³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384-385。

官的身份相當重視，特別認同他們在文藝交流上的意義。而李尚迪對劉喜海編撰金石集也是特別深刻，故撰《懷人詩》亦提到：「好古劉燕庭，少無軒冕氣。言將一麾去，足支文墨費。平生金石錄，關心剝刷未。」⁹⁴可以看見李尚迪相當重視劉喜海的好古精神，而劉喜海亦藉著李尚迪的重視以及如此緊密的關係，從李尚迪方面取得各種朝鮮古碑或了解朝鮮學界情報與資訊。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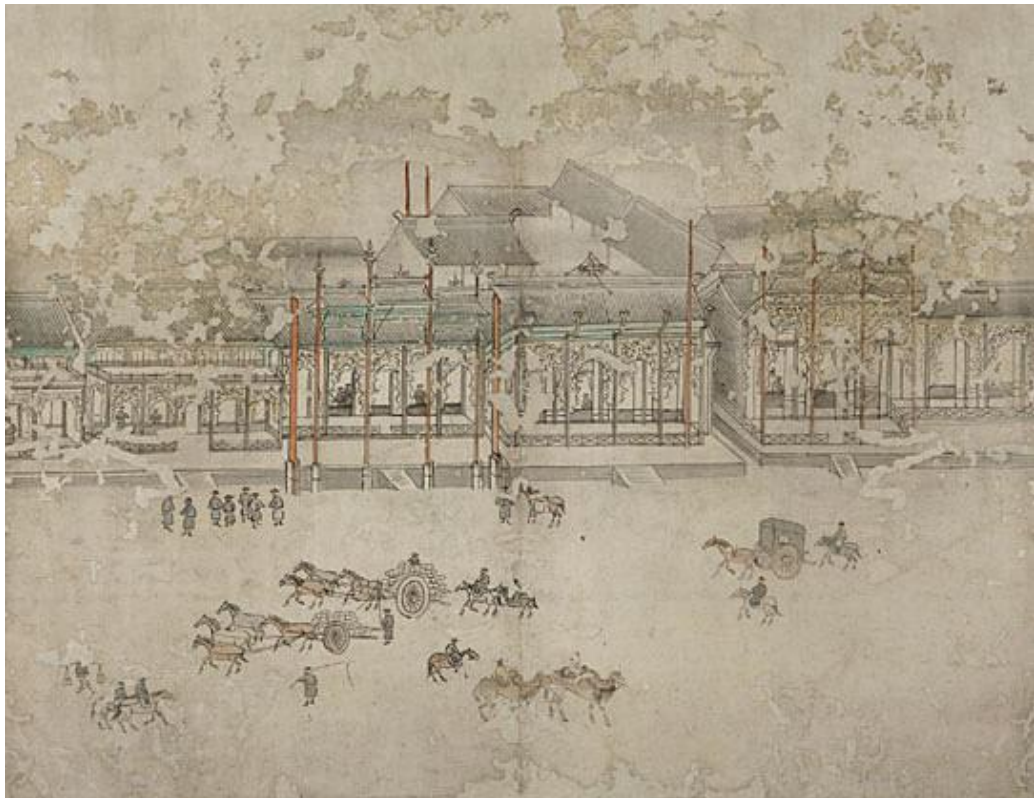
此外，李尚迪的著作在北京的出版，也許更能看到李尚迪的詩集如何被清人所重視，而清人也可藉著他的詩集了解朝鮮。據李尚迪自識，他指出《恩誦堂集》在琉璃廠出版的背景：

尚迪少承家學，壯資師友。粗涉文藝，略有撰著。上下三數十年，交遊唱酬遍海內外。屬草盈篋，而未嘗有收錄焉。頃者前席，承聆玉音，琅然吟誦臣舊作。繼以文筆之近，於中國頗嘉之。榮感惶慙，曷有至極！噫，古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猶足為詞林文苑之所羨慕無窮，而況特受華袞於人主也乎！竊敢不計譴劣，手輯詩文若干卷，自署其首曰《恩誦堂集》，蓋紀恩也已。⁹⁶

⁹⁴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卷3，〈劉燕庭喜海〉，頁6b。

⁹⁵ 呂佺孫和呂侶孫曾與李尚迪書信聯繫，希望李尚迪代為轉送一些朝鮮的書籍與文物：「祈有以教之，前承允惠東國海東三韓諸品古泉，東使來時，乞附便寄下，為幸行人倚裝，拉雜書此。」詳參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呂堯仙佺孫、呂星田佺孫條，頁13a。

⁹⁶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自識〉，頁2-3。



圖表 9 佚名繪《燕行圖·琉璃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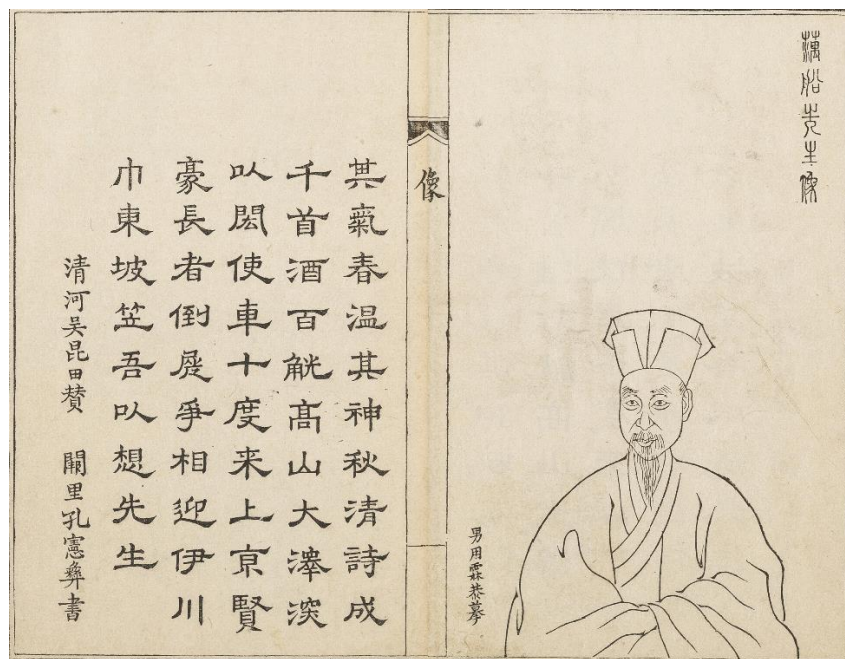
據孫衛國分析：「從《恩誦堂自識》中，可以看出，李尚迪之所以編輯文集，乃是因為被朝鮮憲宗國王召見之時，憲宗曾吟誦其詩，他深受感動，故而 1847 年在北京期間，他開始編輯詩文集，取名為《恩誦堂集》。」⁹⁷如翻開恩誦堂集的其他部份，《恩誦堂續集》的封面，是由一位清人「大興劉銓富」為此書署名，又有吳昆田贊李尚迪像，孔憲彝為其贊所書：「其氣春溫，其神秋清，詩成千首酒百觥，高山大澤深呻閔，使車十度來上京，豪長者倒屣爭相迎，伊川巾東坡笠吾呻想先生。」⁹⁸這些例子可反映清文

⁹⁷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友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頁 110-111。

⁹⁸ 孔憲彝：〈恩誦堂集畫像〉，《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

人對李尚迪的文彩相當的欣賞，而李尚迪甚至請來一位清朝文人許宗衡為此書作序，在許宗衡的序中道出李尚迪詩集在北京得以出版的原因，同時亦解釋了李尚迪的詩集何以在北京出版：

李君藕船，以賀正旦來京師，遂同止而觴焉，君凡十至京師，與孔君為舊交，而葉君潤臣、馮君魯川、潘君伯寅，亦先後各以文讌相酬。接余與李君竹朋吳君稼軒、王君少鶴、張君良哉，則初見也坐間。君以詩索席，孔君屬余為之。余既慙弗文，且初識君，又未盡觀君之詩，安敢序。然國家聲教之訖，友朋應求之，故文字之，感既契於同心，切劇之義，無間於異域，海天瀕洞恍惚如舊相識，序亦何敢辭。」⁹⁹



圖表 10 李用霖摹《藕船先生像》

⁹⁹ 許宗衡：〈序〉，收入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集，頁 1a。

從許宗衡的說明，李尚迪多次往來北京，在北京既有舊交亦有新友，而即使李尚迪生於「異域」，但亦無損兩地之間的友誼。由此可見李尚迪的詩，讓他交得一批北京的清人，因此自然通過認同其文才的清人，在北京出版，對李尚迪的成就是一種認可，與此同時許宗衡說明這些清人對於李尚迪的詩能夠協助認識朝鮮情況亦有相當的幫助，許氏續指：「詩之為教，其實契於神明，而顯徵於事物，其託詞於諷諭，而歸義於忠孝，深之於學問，積之於閱歷，本天理之感，召達人心之微，茫其所散布為境且萬而窮原竟委，靡不本乎情之真，因其情之真，可以知其文之至。然則，余雖未盡觀君之詩，而君詩之善則無不可見也。」¹⁰⁰

清人大多對李尚迪的詩風及其意涵相當欣賞，而選擇在北京出版的李尚迪的詩集，一方面讓清人能夠通過他的詩集，認識當時朝鮮的社會、文化以及風氣，在其詩集之中，除了描寫到燕行的經歷外，也提及一些朝鮮內部的情況，例如他的老師金正喜的遭遇、¹⁰¹朝鮮半島獨有的歷史文物與話題、¹⁰²朝鮮燕行使節前往北京的經歷等。¹⁰³這些有別一般清代文人所寫

¹⁰⁰ 許宗衡：〈序〉，收入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集，頁 1a-1b。

¹⁰¹ 如他曾撰寫了〈立春後一日龍湖訪金秋史學士〉、〈謝金秋史閣學贈墨蘭啟〉、〈奉輓秋史金侍郎〉等，來記述他與金正喜的情誼，同時亦通過各種詩句，說明金正喜被貶的經歷。詳參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卷 1，〈立春後一日龍湖訪金秋史學士〉，頁 7b-8a；卷 2，〈謝金秋史閣學贈墨蘭啟〉，頁 4a-b；續卷 3，〈奉輓秋史金侍郎〉，頁 10a-b。

¹⁰² 如安市城、箕子墓等，詳參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07，續卷 1，〈安市城〉，頁 1b；續卷 1，〈箕子墓〉，頁 1b。

¹⁰³ 一般來說燕行使均為各地的途中撰詩作句，從朝鮮的燕行文學角度來看，並非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李尚迪詩集出版於北京，讀者不再只是朝鮮半島的文人，而是對清人來說，這些朝鮮使者的經過，所觀察的中國，是過去燕行錄中所不見的。

的內容，他在北京的好友可通過閱讀李尚迪在北京出版的詩集，了解當時的朝鮮各種面貌。而另一方面，李尚迪作為譯官，在朝鮮國內不可能與身份較高的兩班和唱。因此李尚迪只能以張曜孫、劉喜海、許宗衡、孔憲彝等留京或路經北京的文人作為交流或抒發情感的對象。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清人眼中的譯官與過去朝鮮文獻之中關心的譯官有所不同，他們沒有受制於朝鮮社會的身份，而願意與譯官作深刻交流，與此同時，這些與譯官交流的文人，當中不少其實都是在朝廷或社會得不到認同，或有著深深不憤或遺憾，但像李尚迪般的譯官，卻請他們寫序，或題詩，¹⁰⁴使他們雙方引起更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使他們兩地的人能有更深刻的交流，而這些清人如何藉著譯官，而了解到當時朝鮮社會，體會到譯官的困境以及譯官書寫與創作下的朝鮮文壇與社會風氣。

四、 李尚迪與清朝文人對金正喜的關心

1732年雍正年間出使的李宜顯曾有漢人員生跟他說：「吾輩忝生中華，雖與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遺風為快也。」¹⁰⁵通過此，一些朝鮮使臣，會如李宜顯這樣的士大夫，流露對清朝社會的批判，並暗中強化朝鮮的自我意識。然而，這種想法在 18 世紀隨著朝鮮思想界對性理學的批判與爭論，經歷了洪大容、朴齊家、朴趾源等人對清朝文化的再認識及掌握各種知識新認識，改變了一些想法。像孫衛國所說一般：「朝

¹⁰⁴ 蘇州三傑之一潘世璜(1765-1825 年)的兒子潘遵祁(1808-1892 年)和潘希甫(1828-1893 年)曾向李尚迪求字：「前託仲遠求題次冊，並條翻一枋求書，想俱揮就。乞付讀茲，帶呈先大父盡蘭一聯，又別集一本、先嚴遺書一種（拙面）一握希鑒留之，另扇二枋，懇即賜揮行草數行，俄錄近作，尤妙此上藕船尊兄吟席。」，頁 23b。

¹⁰⁵ 李宜顯：《陶谷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972，卷 30，〈王子燕行雜識〉，頁 36b。

鮮燕行使踏著洪大容的足跡，紛紛來到北京，積極與清朝學人交往，吟詩論文，交流思想，訴說情感，從此中朝學人進入一個大交往的時代。」¹⁰⁶實際上在 19 世紀以降，朝鮮士大夫不再抗拒接觸清人，甚至通過清人作為抒發情感的對象，其中金正喜是其中一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金正喜是朝鮮後期的一位能夠呈現多種形象供後世學者研究的學人。一方面他在經學史上佔有一要角。在 19 世紀，他在性理學逐漸瓦解的朝鮮社會之中，¹⁰⁷高舉禮學的重要性，¹⁰⁸同時亦受清人學術思想的影響，¹⁰⁹引起朝鮮學界對考據及漢學的再認識。¹¹⁰另一方面，他是一位書法家與畫家。¹¹¹他所處的時代以及各種朝廷經歷，造就了他的人生，故創作了各種畫作以及建構了屬於他獨有的書法技巧——秋史體。¹¹²

¹⁰⁶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友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頁 95。

¹⁰⁷ 從 1910 年以後，殖民地以來，朝鮮性理學儒者均被加以批判，因韓國國家主權的喪失，全因朱子學的偏頗。關於此，詳參姜智恩：〈東亞學術史觀的殖民扭曲與重塑——以韓國「朝鮮儒學創見模式」的經學論述為核心〉，頁 175；並參許怡齡：〈從「儒學」到「儒教」的脈絡性轉換：「西學」與朝鮮思想史的轉換點〉，《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01-126。

¹⁰⁸ 禮堂是金正喜的自號之一，他曾撰有〈禮堂說〉，解釋自己對禮的理解以及高舉的原因，並解釋禮對社會的意義。關於此，詳參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1，〈禮堂說〉，頁 23a-24b。

¹⁰⁹ 關於此，詳參徐珂遙：〈18 世紀韓國儒學與考證學〉，《儒教文化研究》，第 9 輯（2006 年 2 月），頁 96-106。

¹¹⁰ 賴貴三：〈考古証今——山海崇深——韓儒金正喜與翁方綱、阮元的書法與經學交流〉，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74-82。

¹¹¹ 關於其藝術成就，詳參김현권（金炫權）：〈추사 김정희의 묵란화〉（秋史金正喜的墨蘭畫），《미술사학》（美術史學），第 19 期（2005 年 8 月），頁 35-67；김현권：〈秋史 金正喜의 산수화〉（秋史金正喜的山水畫），《미술사학연구》（美術史學研究），2003 年第 1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81-219。

¹¹² 曹悅：〈清代中國書法對朝鮮王朝的影響——以金阮堂為中心〉，《或問》，第 29 期（2016 年），頁 119-130；曹悅：〈清朝與朝鮮王朝的書法交流——以金正喜隨父入燕

日本學者藤塚鄰的研究被視為最早以現代視角觀察金正喜學術意義的學者。他的著作開展了大家對金正喜的認識。他於京城帝大任教以來，積極整理與從事關於金正喜的研究，先後出版了不少學術論文以及今天為人所認識，由其兒子所整理編訂的大著。¹¹³而金正喜的阮堂《歲寒圖》更被視為東亞學術研究的重要珍品，該圖更被大韓民國視為國寶，故學界自然對此很多關心。¹¹⁴

較整全的整理以及剖析，可見於 Kim Sunglim 的文章。¹¹⁵她全面整理《歲寒圖》的各種文字與圖像，並將各種題跋、詩文翻譯，使學界更方便閱讀《歲寒圖》。Kim 的研究特別將《歲寒圖》放置在東亞上閱讀，她指出從金正喜送給其學生李尚迪，李尚迪將之展示給其清友人，並再到 20 世紀初藤塚鄰在朝鮮半島購得該圖後帶回東京，孫在馨通過多次的請求，終將之購回朝鮮半島，使《歲寒圖》作為一幅難得通過東亞網絡之中，跨越年代，跨越國界遊走的畫像，使我們了解這件珍貴的藝術品如何在跨時代，距地域的方式，在東亞世界中移動。¹¹⁶而金正喜在當今學界，被再次展露

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1 月），頁 180-182；並參趙太順：〈書法家跨越時空之相遇——略論蘇軾對翁方綱及金正喜之影響〉，《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 27 期（2007 年 6 月），頁 67-100。

¹¹³ 藤塚鄰的兒子藤塚直明後來把家中的資料、藏品等轉贈果川市秋史博物館。果川市秋史博物館亦特別設置一個紀念廳分享及介紹藤塚鄰的學術成就。關於此，詳參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果川：果川市秋史博物館，2014 年）。另外，筆者於 2016 年 10 月曾到訪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當時得到博物館學藝研究師許洪範先生幫忙，介紹了館中各種館藏，並贈送各種博物館館藏圖錄，特此鳴謝。

¹¹⁴ 《歲寒圖》屬於大韓民國第 180 號的文化財國寶，詳參〈金正喜筆 歲寒圖〉，http://www.cha.go.kr/korea/heritage/search/Culresult_Db_View.jsp?mc=NS_04_03_02&VdkVgwKey=11,01800000,11#，（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29 日）

¹¹⁵ Sung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ō :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ŏn Korean Masterpiece,” *Archives of Asian Art* 56(2006): 31-60.

¹¹⁶ Sung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ō,” 40.

於研究者眼前的原因，是美國學者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被金正喜的經歷及其藝術作品所吸引，開始探討金正喜如何作為認識清朝乾嘉學術的重要切入點，展開一連串的研究，並藉此了解朝鮮文人如何看待清中葉興起的經學思潮。¹¹⁷

金正喜被放置作為學者及主要人物探討，已有豐盛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譯官為中心，試將金正喜《歲寒圖》的文與圖做更深入的了解，將圖與文之間進行互文討論，思考背後譯官如何引發或聯繫的東亞世界網絡，表達中朝兩地的政治訴求，以及李尚迪、金正喜和其他參與《歲寒圖》的文人間互動。同時探討金正喜及其《歲寒圖》如何被李尚迪帶到清朝，而使清人對金正喜以及《歲寒圖》的內容，作出了怎樣的書寫，從而以新的視野再了解李尚迪的譯官身份以及在朝鮮與清廷之間的文化交流的角色，特別是清人對朝鮮社會與文化的認識，則可呈現不一樣的學術意義與關懷。

衣師若芬在研究題畫文學的過程中，引伸研究文與圖之間的關係，亦通過各種文與圖的關係之案例，漸形成一種學術視角去了解文圖。她認為：「『文圖學』的文，包括廣義上各種文體的文學，過去統稱為『詩』。然而，二十世紀以來，書寫形態和生產工具樣式繁多，未必皆符合文學性，也未必具有詩意，只能說是文字或文字的組合。『文圖學』的『圖』（image），過去統稱為『畫』，如今含括所有影像、線條、印刷等視覺藝術。『文圖學』關心『詩畫關係』、『詩畫比較』、『詩畫互文』，還涉及生產機制、社會網絡、

¹¹⁷ Benjamin A. Elman 先後在曾於臺灣、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加拿大等重要學術演講與活動之中，均分享他對金正喜認識的各種想法，也形成了一種對金正喜重新思考的潮流。主要的論文成果，可參考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世界漢學》，第 14 卷（2014 年 12 月），頁 35-48。

政治訴求、消費文化、心靈思想等課題。」¹¹⁸故本文將特別聚焦的不只是單純閱讀文字和觀看圖像，而是將之互為作用，並探討《歲寒圖》背後產生的與李尚迪的譯官身份之間的關係，而清人如何通過《歲寒圖》體會金正喜的遭遇及了解朝鮮社會。

18 世紀末的洪大容通過漢字版本的《湛軒燕記》讓朝鮮士大夫對燕行產生興趣，¹¹⁹因而使去燕行仍為一種建構自己想法的渠道。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其好友朴趾源。朴趾源解釋他燕行的啟發，是受洪大容的影響：「我東之士，生老病死，不離疆域。近世先輩，唯金稼齋、吾友洪湛軒，踏中原一隅之地。」¹²⁰而事實上，朴趾源撰寫了《熱河日記》，通過每日每事在北京的經歷，與人的交往，一步步地建構了對於清朝器物文化的渴望，從而提倡朝鮮社會參考清朝，這當然是深受洪大容的影響。¹²¹

而將這種想法直接實踐，甚至提議為一種政策或思想主張推動的人，

¹¹⁸ 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1920-30 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3 期（2015 年 10 月），頁 162-163。

¹¹⁹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頁 114；除了漢文的《湛軒燕記》，洪大容因應其家中女性成員及讓自髡閱讀，便以諺文撰寫《乙丙燕行錄》。關於《乙丙燕行錄》所折射的世界觀，詳參 Hyung-dae Lee, “Hong Dae-yong’s Beijing Travels and His Changing Perception of the West-Focusing on Eulbyeong yeonhaengnok and Uisan mundap,”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9.4(2006): 45-62. 劉琳曾嘗試利用對比兩者的紀錄方式的不同，來了解洪大容在北京的交友經歷以及書寫的不同。關於此，詳參劉琳：〈洪大容與清王子“兩渾”的友情及“兩渾”的真實身份考〉，《中國史研究》，第 95 輯（2015 年 4 月），頁 65-86

¹²⁰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52，卷 14，〈熱河日記·山莊雜記〉，頁 29b-30a。

¹²¹ 當然更具體的說明是，應該說是朴趾源最受李德懋的直接影響，而李德懋則曾仔細閱讀過洪大容在北京的種種書寫。關於李德懋與洪大容的關係，詳參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頁 114；而朴趾源的《熱河日記》，不少部份均參考了李氏的《清脾錄》，可見之間的微妙關係。詳參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冊 252，卷 14，〈熱河日記·避暑錄〉，頁 63b。

則是朴趾源的學生朴齊家。朴齊家走著同樣的步伐，希望前往北京。朴齊家特別指出洪大容的書寫是刺激到他欲參與燕行的主要原因：「《會友記》送去耳，僕常時非不甚慕中原也。及見此書，乃復忽忽如狂，飯而忘曬，盥而忘洗……今湛軒先生，一朝結天涯知己，風流文墨，極其翩翩，其人者，皆依依焉往日卷中之人也。其言者，皆歷歷焉吾輩心頭之言，則彼雖漠然不知，相隔於此千里之外，吾安得不憐之，愛之感泣而投合也哉。」¹²²而朴齊家為人所讚頌與認識的故事，當然首推他曾與四庫全書的總裁官紀昀結為好友，雙方互相書信。他們二人曾以撰詩來互相唱酬，紀昀先撰詩贈朴齊家曰：「貢篚趨王會，詩囊貯使車。清姿真海鶴，秀語揔天葩。歸國憐晁監，題詩感趙驂。他年相憶處，東向望丹霞。」¹²³朴齊家送給紀昀的詩：「辱題僧孺館，勝御李鷹車。披扇驚文藻，陳詩媿正葩。蟲心猶慕鵠，驚足敢先驂。喜我書厨潤，歸沾玉井霞。」¹²⁴

不過，學術界過去探討清人與朝鮮士大夫的交流過程時，大多會觀察他們的文獻以及各種文學、藝術作品，來探討彼此之間的關係。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重要一點，由誰作為彼此之間的中介人。以金正喜的《歲寒圖》為例，為甚麼會看到如馮桂芬、張曜孫等清人題字。如以石守謙與廖肇亨的想法討論，我們應探討的是，單純是金正喜的文采並非可決定《歲寒圖》的閱讀者是誰，同時亦考慮當中由誰接受並傳播該畫，亦即作為獲贈人李尚迪，他如何或為何選擇這些清人好友。而譯官作為交流與對話的

¹²² 朴齊家：《貞菴集》，文集卷 4，〈與徐觀軒〉，頁 347。

¹²³ 朴齊家：《貞菴集》，詩集卷 3，〈次韻禮部尚書曉嵐紀公昀詩扇見贈·原韻〉，頁 88。

¹²⁴ 朴齊家：《貞菴集》，詩集卷 3，〈次韻禮部尚書曉嵐紀公昀詩扇見贈〉，頁 87-88。

中介，縱使在歷史文獻上，我們較困難有更全面的角度認識他們，但是透過認識譯官的一些基本知識與背景，或許更能明白，《歲寒圖》的故事何以在中朝文化交流過程中得以流傳。

一些譯官，像李尚迪他能夠在使行期間，充份利用各種時間，在北京進行各種私人探訪，當中主要的是和不同群體的文人展示各種文學與文化上的交流。衣師若芬指出：「蓋李尚迪諳漢語，能與中國文人流暢流通而無須筆談，且出使頻繁，廣結善緣，圖像與文字交輝，成為特殊景致。」¹²⁵上文已提到李尚迪即使得到不少清人認同，但他卻對於朝鮮社會自身的仕途相當悲觀與失望，畢竟朝鮮是一個身份階層鮮明的社會。然而，李尚迪在清人眼中，卻是一位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詩甚至被符葆森放入《國朝正雅集》。¹²⁶可見李尚迪獲中國文人高度評價和肯定，這也是證明李尚迪為何願意接觸那麼多不同背景的文人。除了李尚迪本人的詩才得到認同外，更重要的是與金正喜的學術淵緣，清人因得悉李尚迪為金正喜的學生，所以李尚迪便先後與宣南詩社、阮元學派等文人有所交流。¹²⁷李尚迪對於他本人作為金正喜學生的身份，表現得相當重視：

海國通儒舊見推，北翁南阮幸同時。仲翔豈但專治易，莊鼎
原來善說詩。袖裡星經兼地志，案頭姬碣與秦碑。千秋江漢英靈
在，墜緒茫茫纔者誰。

¹²⁵ 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 68。

¹²⁶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 6-7 年（1856-1857 年）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

¹²⁷ 以張曜孫為例，衣師若芬提到：「金正喜與張曜孫之父張琦、叔父張惠言相識，李尚迪因金正喜之故，於 1836 年於燕京結識張曜孫。」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 67。

炎荒十載賜環面，北海風霜老更衰。盡道書追秦漢上，誰知
畫逼宋元來。覆盆冤恨終難雪，末路心期摠似灰。慟哭先王恩未
報，屢策蘇軾是奇才。

江潭憔悴采芙蓉，不復歸開長樂鐘。牛斗無靈韓吏部，龍蛇
入夢鄭司農。名善祇是天應忌，才大難為世所容。知己平生存手
墨，素心蘭又歲寒松。（公謫居時寫寄歲寒圖及墨蘭諸畫並有題識期勉過
情。）

白頭猶記賦高軒，薄藝多慙早及門。零落山邱偏下淚，歸來
江水為招魂。石倉雨塌芸香沒。總帳風翻燭影昏。那得龍眠重寫
照，荷花時節酌清罇。（擬摹遺真。祝公生辰。）¹²⁸

在他的《奉輓秋史金侍郎》中，除了展現自己受學於阮堂先生時的感受，也說明了其老師金正喜各方面的成就，也特別提到「素心蘭又歲寒松」。由此可反映對李尚迪來說，金正喜的《歲寒圖》是他對金正喜最深刻印象的表述。金正喜繪此圖最初的目的只是感激李尚迪不怕勞苦到濟州贈書的經歷，但是金正喜本人沒有想像過，《歲寒圖》被轉化成為中國人認識朝鮮社會以及他個人經歷的關鍵媒介。擔任譯官的李尚迪基於職務上的方便，容許不同的清人觀賞閱讀。換句話說，《歲寒圖》的讀者群，決定權不在金正喜本人，而是獲贈《歲寒圖》的譯官李尚迪。

慶州金氏在朝鮮時代屬於貴族之一，故金正喜在貴族家庭成長，他的生父是金魯敬。但伯父金魯永沒有子嗣，故魯敬當時將金正喜過嗣予金魯

¹²⁸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707，續卷3，〈奉輓秋史金侍郎〉，頁10a-b。

永，但正喜與其生父魯敬關係仍然相當密切，後來亦因他的關係，可以有機會前往北京。¹²⁹金正喜早年深受朴齊家的學問影響，特別是朴齊家對於「北學議」的想法。金正喜本人曾揚言：「慨然起別想，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為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己。」¹³⁰

其實這種想法與洪大容當初在北京希望尋找懂得自己的會心人想法是一致的。¹³¹而當時只有 24 歲的金正喜抵達北京後，因他擔任子弟軍官，並非使行的重要成員，故無需兼顧各種禮儀或工作，反而使他得到更多機會，和當地文人接觸。另一方面，北京不少名士之中，都是早有與朝鮮文人有交流習慣的，故得悉金正喜到來也願意與他對談。如曹江，他為乾隆年間進士，後在北京書肆中，認識了柳得恭，因而結為好友。曹江曾贈一扇予柳得恭，扇面寫道：「柳君惠風，予遇之書肆中，一見如故，相與訂交，既半月敘，君又將歸東海，正未知相逢何日，能不悵然。君屢索拙作，自顧不堪呈教，君行有日，情不能已，姑踐曹言，知君他日偶一展玩，或憶及今日之敘云爾。海上玉水暫未定艸。」¹³²因此，曹江與朝鮮文人之間的友誼而大開，故曹江得知金正喜與柳得恭等所認識，故特邀他相見，並寫下：「東國有金正喜先生秋史、年今廿四，慨然有四方之志，嘗有詩云：『慨然起別想，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為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

¹²⁹ 國家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純祖實錄》，卷 12，純祖 9 年 10 月乙卯，頁 49b。

¹³⁰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77-78。

¹³¹ 金研希：《十八世紀清朝與朝鮮文士交流 — 以洪大容與杭州文士的互動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¹³²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80。

己。』其趣尚可知也，與世寡諧，不作功令文字，放浪形骸之外，能詩能酒，酷慕州，自以謂東國無可交之士，今方隨貢使入來，將交結天下名士，以效古人為情死之義云。」¹³³

如曹江般的士大夫得知金正喜來華後，如徐松（1781-1848 年）、翁方綱（1733-1818 年）父子、¹³⁴阮元等人，這些士大夫並非忽然與金正喜相遇而受其感動，而是一種中朝文人之間的文化傳承，洪大容展開朝鮮士大夫到北京結交名士的潮流，¹³⁵朴齊家、朴趾源與柳得恭等均有這樣的傾向，而金正喜在 1810 年到訪北京時，所接觸的人，均像曹江一樣，過去亦曾與朝鮮士大夫有所接觸，如朴齊家亦曾與翁方綱見面，¹³⁶而阮元也是朴齊家與柳得恭的重要好友。¹³⁷由此可見這些中朝士大夫之間的交流，其實是有背後的人脈關係，而金正喜正利用這種渠道，與不同學派的士大夫建立各段深刻友誼。

交流的過程中，除了一般的詩詞酬唱外，有趣的是兩地之間的士大夫亦會交流各自的著作。其中金正喜與中國友人交流的不再只是純粹的性理學上的討論，而是來自不同方面的學問，如翁方綱和金正喜就著蘇東坡

¹³³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77-78。

¹³⁴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域外漢學研究》，第 11 輯（2015 年 10 月），頁 350-355。趙微：〈論金正喜與翁方綱的學術交流〉，《漢字漢文研究》，第 8 期（2012 年 12 月），頁 31-47。

¹³⁵ 韓衛星：《洪大容文學與中國之關聯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33-168。

¹³⁶ 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 63-64。

¹³⁷ Benjamin A. Elman：〈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頁 38-40。

(1037-1101 年)的相關遺作或畫像，進行了討論。金正喜曾看到翁方綱所收藏的《天際烏雲帖》時，他回國後得知申緯(1769-1845 年)出使燕行時，特別提及當日他能有機會從翁方綱手上看著蘇東坡的真蹟，而撰寫的絕句：「樓前山日澹餘紅，快雪紛箋說異同，萬里許君青眼在，曾於扇底覓春風。」

138

而在金正喜與清友人的交流中，以阮元為最深刻的交流，在京期間，金正喜獲阮元贈送各種著作，其中如《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教勘記》等，¹³⁹又或是通過阮元的兒子阮常生所贈的《皇清經解》，而阮元的經籍編輯影響到金正喜的經學與禮學的看法，也使金正喜確立了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¹⁴⁰而有趣的是，阮元不只是作為學問的輸出者，同時他也通過金正喜而獲得了一些珍貴的古籍，例如《算學啟蒙》一書，¹⁴¹在中國已不可復見，但金正喜指出朝鮮已印行出版，十分容易取得，及後阮元通過金正喜而獲得了這本在清朝失傳的書籍。

上述的例子可見，金正喜與清人交涉，話題相當廣泛，從來沒有限於朝鮮士大夫只著重的性理學，反而更重視的是一些實物，如考據、地理學或是金石學等，也可從金正喜的事例看出北學學人的學術共同特性，就是日漸放棄傳統的性理學包袱，轉移興趣到其他知識面向。他本人曾撰有一篇〈實事求是說〉，背後指的是學問最重要的方式為實事求是，而不應以不

¹³⁸ 金正喜：《阮堂全集》，卷 10〈送紫霞入燕〉，頁 10a

¹³⁹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 105-114。

¹⁴⁰ 關於此，詳參金正喜：《阮堂全集》，卷 1，〈實事求是說〉，頁 25b-26b。

¹⁴¹ Benjamin A. Elman：〈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頁 36。

實之事為便，導致空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為：「故為學之道，不必分漢宋之界。不必較鄭、王、程、朱之短長。不必爭朱、陸、薛、王之門戶。但平心靜氣，博學篤行，專主實事求是語行之可矣。」¹⁴²其實背後對朝鮮社會帶來很大震撼，因朝鮮在過去因理氣問題論爭數百載，且各自而產生各方陣型，彼此間互不信任，與此同時，對各種新思想也十分抗拒。但金正喜認為求學之道不必對學術分界限，只要「實事求是」即可，所以金正喜對於後來李尚迪以及其他 19 世紀的知識份子，對於清朝以及各種新文化的認知，有不同層面的影響。

從此可見，金正喜何以期盼與清人見面，而事實上他在北京活動期間獲得不少清人的重視。在他離京東歸前，獲得一群清人設宴送別他。據當時有份題記的，除了主辦該雅集的朱鶴年以及阮元外，還包括李林松（1770-1827 年）、洪占銓（1762-1834 年）、譚光祥（1776-1823 年）、劉華東（1778-1841 年）等人一同參與該次雅集。這些參與其中的清人除了贈書送字給予金正喜外，朱鶴年還通過繪畫《秋史餞別宴圖》，¹⁴³去形容當天雅聚的情況，從圖中可以看見幾位穿清服的文人與穿朝鮮士大夫服飾的金正喜進行熱烈的交流，與此同時外來還有人赴會，從此看來朱鶴年藉此說明他們高度重視與欣賞金正喜，並亦在圖像中展露出不捨的心情。

¹⁴² 關於此，詳參金正喜：《阮堂全集》，卷 1，〈實事求是說〉，頁 26b。

¹⁴³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20-21。



圖表 11 朱鶴年繪《秋史餞別宴圖》

通過圖像中服飾的描繪可以分辨出金正喜來。因圖像之中金正喜穿上朝鮮的官服，而周邊的清人均穿上清朝官服。除了一方面分辨我者與他者之外，更重要可反映的是宴會中，不少清人均希望前來送別金正喜，且有不少人正趕往赴會。從朱鶴年的作品中，足以證明這群與金正喜交流、相處的清人，是對金正喜的到來，相當期盼，亦不捨他即將回國。圖中需沒注明誰為阮元，¹⁴⁴但圖旁的題句：「勝會同集者，揚州阮芸臺……」¹⁴⁵可見在宴會中阮元為席上客，而此宴會亦反映金正喜與阮元所建立的跨域的深厚友誼。

¹⁴⁴ 據衣師若芬分析：「朱鶴年以俯瞰的視角，畫怪石古松圍繞的庭園屋舍裡，五人聚桌而坐，一裡僕人侍立於側。五人中，頭戴笠子、穿著朝鮮服裝的人，即為金正喜。金正喜右側舉杯致意的人，想必為主人阮元。」詳參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 65。

¹⁴⁵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21。

阮元曾因與朴齊家和柳得恭有深入的交流，使金正喜與朝鮮其他文人對他有深刻的認識，因此金正喜亦希望藉此次燕行與他相見，而金正喜在此次入京中能夠圓其多年心願。¹⁴⁶阮元在會面期間贈送了大量他的著作給金正喜，使金正喜獲益良多。其中，金正喜說：「此擘經堂文集之第六卷，庚午春，謁雲臺先生於泰華雙碑之館，抽贈此卷，時原集未盡校勘矣。」¹⁴⁷即使阮元仍未完成校勘，但急不及待地將之贈予金正喜，可見阮元對金正喜的重視。與此同時，金正喜亦在思想上受阮元的影響，亦在他東歸以後，開始由原來常用的自號「秋史」改為「阮堂」，¹⁴⁸其實亦足以反映他希望向阮元致敬，並向他學習的精神。回國後，金正喜曾撰寫〈我生九夷〉詩，該詩可反映他在清朝的經歷，當中特別說明阮元在文學、經籍以及金石學等方面啟發了他：

我生九夷真可鄙，多媿結交中原士。樓前紅日夢裡明，蘇齋門下
辦香呈。後五百年唯是日，閱千萬人見先生。芸臺宛是畫中觀，
經籍之海金石府。土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入門初自
鑒螭齋，緣覃阮攀其提携。君是碧海掣鯨手，我有靈心照點犀。
埜云墨妙天下聞，勾竹圖曾海外見。況又古人如明月，卻從先生
指端現。翁家兄弟聯雙壁，一生難遣愛錢癖。¹⁴⁹

¹⁴⁶ 陳東輝：〈阮元在中朝關係史的若干事跡考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2期（2006年3月），頁43-46。

¹⁴⁷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頁114。

¹⁴⁸ 陳東輝：〈阮元在中朝關係史的若干事跡考述〉，頁45。

¹⁴⁹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9，〈我入京 與諸公相交 未曾以詩訂契 臨歸不禁悵觸 漫筆口號〉，頁18a-b。

金正喜撰此詩，是因為有感於自己為「九夷」，能夠有機會認識「中原士」是慚愧的事。朝鮮文人的華夷論在 18 至 19 世紀時，明顯可以看出華在朝鮮，夷在清。但在金正喜的論述，卻自稱為「九夷」，實際展述的是自身的學識不及當時的清朝名流，如阮元與翁方綱等。所以，亦可看見在金正喜眼中，「實事求是」的思想成為了他的主導，他拋棄了朝鮮社會氛圍下的華夷觀，而是視清人為學術承傳。而事實上，金正喜東歸以後，並不如他在中國時那麼愉悅，最明顯的是，他面對了多宗獄案，先後因安東金氏與豐壤趙氏之間的勢道之爭，因此而被流放，其中最著名的是 1840 年，因他被安東金氏與豐壤趙氏之間的衝突，因他與趙寅永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好友，故被連累下流放到濟州島。

被流放到濟州島，是金正喜最困擾的時段。當時，他的一些學生紛紛到濟州島探望他，以示支持。如許鍊（1809-1892 年）以蘇東坡被流放到海南島的經歷來比照金正喜被放到濟州島的遭遇，繪畫了《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來描述他被流放的慘況與控訴有關的不公平。¹⁵⁰

¹⁵⁰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頁 356。



圖表 12 許鍊摹《蘇東坡笠屐圖》¹⁵¹

圖表 13 許鍊：《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¹⁵²

這個被喻為蘇軾貶至瓊州一般的濟州島也是引發金正喜創作《歲寒圖》的地方。李尚迪曾與許鍊一樣到濟州島探望金正喜，而李尚迪每次到來均贈送一些取自或購自中國的書籍，如桂馥（1736-1805 年）的《晚學集》、¹⁵³惲

¹⁵¹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46。

¹⁵²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47。

¹⁵³ 桂馥為清朝乾嘉年間的金石學的學者，他曾著有《說文解字義證》、《歷代石經考略》等，而《晚學集》為其全集，有包括其論、說、書、志銘等書寫。關於桂馥的研究，詳參沈寶春：《桂馥的六書學》（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並參孫雅芬：《桂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敬（1757-1817 年）的《大雲山房文庫》、¹⁵⁴魏源（1794-1857 年）與賀長齡（1785-1848 年）編的《皇朝經世文編》等書。¹⁵⁵而被貶至濟州的金正喜以及李尚迪帶來的書等經歷，如何促使《歲寒圖》的創作，當中與清人認識朝鮮社會又有帶來甚麼關係？

《歲寒圖》的組成分別有圖像與文字說明的部份：畫名為《歲寒圖》，是阮堂贈送給其弟子李尚迪的，一般學界稱為阮堂《歲寒圖》，以辨別其他的《歲寒圖》。《歲寒圖》三字旁為「藕船是賞 阮堂」一詞，也代表畫的創作人及收藏人，即金正喜贈予李尚迪。而全畫共有四個印章，分別是正喜、阮堂、秋史三個金正喜本文與自號的印章，並在全畫的右下角印有「長毋相忘」。此外，《歲寒圖》亦有金正喜書寫畫作的創作緣由的文篇。該畫原大為 22.3 cm × 108.3 cm，後來經過李尚迪將之帶到中國後，經其友人鑒賞後，加上了各種詩詞、題句，使全畫的長度由 108.3cm 延長為 1388cm。¹⁵⁶畫像的延伸，反映了在中國的再創作，使畫的內容更豐富，更有其意義。

¹⁵⁴ 惲敬，江蘇常州人，考獲舉人，主力致古文，曾撰有《大雲山房文稿》，主張為文者需文才與學識並重，其古文與桐城派學人有接近的關係。關於此，詳參王國瓊：《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2014 年），下冊，頁 714-715。

¹⁵⁵ 《皇朝經世文編》為一冊專門關心經世之學的時代文獻，包括了學術、治體甚是六部具體事務的內容，故同時在史料學的角度來說，此為重要的晚清的政治、外交、經濟方面的史料。1825-1826 年，魏源和賀長齡二人共同編成，更被當時的學人視為：「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關於此，詳參劉廣京：〈《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氏著：《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90 年），頁 77-167。

¹⁵⁶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52-56。



圖表 14 大韓民國文化財廳網站所示的《歲寒圖》圖像¹⁵⁷

為甚麼金正喜會將這幅《歲寒圖》贈送給李尚迪呢？其實前面已論述不少李尚迪與金正喜的交往，而更重要的是李尚迪該次到訪濟州島時，把《晚學集》、《大雲山房文稿》、《皇朝經世文編》等書帶給金正喜。根據《歲寒圖》的文字敘述：

去年以晚學大雲二書寄來，今年又以藕耕文編寄來，此皆非世之常有，購之千萬里之遠，積有年而得之，非一時之事也。且世之滔滔，惟權利之是趨為之，費心費力如此，而不以歸之權利，乃歸之海外蕉萃枯槁之人。太史公云：「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君亦世之滔滔中一人，其有超然自拔於滔滔權利之外 不以權利視我耶？太史公之言非耶？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松栢是貫四時而不凋者，歲寒以前一松栢也，歲寒以後一松栢也，聖人特稱之於歲寒之後。今君之於我，由前而無加焉，由後而無損焉。然由前之君無可稱，由後之君亦可見於聖人也耶。

¹⁵⁷ 〈金正喜筆 歲寒圖〉，
http://www.cha.go.kr/korea/heritage/search/Culresult_Db_View.jsp?mc=NS_04_03_02&VdkVgwKey=11,01800000,11#，（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29 日）

聖人之特稱，非徒爲後凋之貞操勁節而已。¹⁵⁸

文字的描述，正反映金正喜對於李尚迪不計較自己的處境，仍然作出種種貢獻與幫助的感動和讚揚。金正喜以太史公之言為例，¹⁵⁹認為人會以權利去衡量各種事情以及工作，處於劣勢的他認為李尚迪卻不以權利視之，且不計較任何回報，並以孔子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為說明，¹⁶⁰指君子特別在歷經亂世與逆境之後，仍能夠不變節操的，更值得人佩服。可見，他高度肯定李尚迪為自己所做之事。

文字的論述，當然已可單純了解到李尚迪的舉動及貢獻，但從《歲寒圖》的圖像配合，更可呈射出金正喜描寫中的李尚迪，他所感嘆以及欣賞的地方。《歲寒圖》由幾部份所組成：分別是一雙松樹之中，右邊的年老松樹向左邊年輕、筆直、茂盛的松樹傾斜，呈現依靠的樣子。老松樹有分叉分枝，一邊直接向天，另一邊則有新葉正生長。兩樹後面則有一小屋，有一月門。遠方則有兩棵枝繁葉茂的栢樹。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松樹被視為有志難伸的視覺表現傳統。而金正喜亦以此描述自己的困境，但與其他《歲寒圖》不同的是，在圖中以自己喻為老垂的松樹，身旁卻有一棵年輕、茂盛的松樹支撐著，亦即象徵李尚迪支撐著金正喜，甚至不只是單純的支撐，而且使他仍可新葉再生長，象徵生命的延續。

如通過整個文與圖之間的互動再重新了解背後的脈絡，可知李尚迪把

¹⁵⁸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52-53。

¹⁵⁹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42，〈鄭世家贊〉，頁 1777。

¹⁶⁰ 此語出於《論語·子罕》。詳參何晏集解，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5，〈子罕·第九〉，頁 17b-18a。

中國的各種書籍，例如惲敬的《大雲山房全集》、¹⁶¹賀長齡與魏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編》等，與金正喜想法相貫連，藉此了解清朝的經學與社會情況，使金正喜大受感激，也可讓他的學術生命得以延長。因此，文與圖並排而看，才可將整個議題得以呈現，金正喜把自己象徵著年老但可得到支撐之下而仍有新機的松樹。

李尚迪獲贈該圖後，深受感動，當時他回信予金正喜指出，他將會把信帶到中國，與其友人分享，並希望他們能夠題上他們的題句。於是，1844年李尚迪隨著其職務需要，再次前往北京，並攜帶該圖，在吳贊舉行的雅聚之中展示，獲得大批清代文人一同鑑賞、分享，抒發他們對金正喜經歷、創作、畫功等想法。這群清文人包括：章岳鎮、吳贊、趙振祚（-1860年）、潘遵祁（1808-1892年）、潘希甫、潘會璋、馮桂芬（1809-1874年）、汪藻、曹楙堅（-1853年）、陳慶鏞（1795-1858年）、姚福增（1808年-？）、吳淳韶、周翼墀、莊受祺（1810年-）、張穆（1805-1849年）、張曜孫。但當中除張曜孫外，實際上這群清文人與金正喜從來沒有見過面。除此以外，另有四位朝鮮人亦參與在這幅《歲寒圖》的創作之中，分別是其後人金準學在1854年的題句、吳慶錫的兒子吳世昌、李始榮（1868-1953年）、¹⁶²鄭寅普（1893-1950年）等人，¹⁶³後三人均是在1940年代，孫在馨從藤塚鄰手

¹⁶¹ 補充一點，惲敬是張曜孫的伯父張惠言的好友，他們同屬陽湖派，提倡古文及喜作駢文，與金正喜想法不謀而合。

¹⁶² 李始榮，字城翕，號始林山人一位主張性理學的朝鮮王朝文臣及獨立運動家。在日韓合併期間，在中國東北參與抗日活動，又轉於上海參與臨時政府的工作，並獲委任為法務總長。二戰結束後，在大韓民國成立時短暫擔任過副總統（1948-1951年），後因不滿李承晚的作事方法，憤而辭職。關於李始榮在韓國史上的定位，詳參李殷羽：《臨時政府與李始榮》（臨時政府與李始榮）（서울[首爾]：汎友社，1997年）。

¹⁶³ 陽明學家，實學家。詳參鄭仁在：〈韓國現代實學者為堂鄭寅普的實心思想〉，《鵝湖》，第38卷第8期（2010年2月），頁14-22。

上購自日本後，所題字來記述與記述之事的。

	姓名	時齡	出生地	科舉經歷
1	章岳鎮	不詳	江蘇 陽湖	
2	吳贊	60	江蘇 常熟	
3	趙振祚	40	江蘇 武進	1835 年進士
4	潘遵祁	37	江蘇 吳縣	1845 年進士
5	潘曾瑋	27	江蘇 吳縣	蔭生
6	潘希甫	34	江蘇 吳縣	1836 年舉人
7	馮桂芬	36	江蘇 吳縣	1840 年進士
8	汪藻	31	江蘇 吳縣	
9	曹楙堅	69	江蘇 吳縣	1832 年進士
10	陳慶鏞	50	福建 晉沖	1832 年進士
11	姚福增	40	江蘇	1832 年進士
12	吳淳韶	?	浙江	進士
13	周翼墀	?	江蘇 無錫	舉人
14	莊受祺	?	江蘇	1840 年進士
15	張穆	40	山西 平定	貢生
16	張曜孫	37	江蘇 陽湖	1843 年舉人
17	吳儁	?	江蘇 江陰	
18	秦緬業	32	江蘇 無錫	副貢
19	黃秩林	31	江西 宜黃	1843 年舉人

圖表 15 《歲寒圖》讀者群¹⁶⁴

根據鄭後洙的研究，在題詞之中共有 16 人，另有 3 人不在《歲寒圖》之中的題詞，3 人分別是畫家吳儁、秦緬業、黃秩林，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時間與地方曾接觸過《歲寒圖》。而鄭後洙整理過各人的人物背景以後，發現這些李尚迪所接觸的清人有以下的特徵：（一）從 20 代到 60 代、（二）絕大部份為江蘇省，特別與陽湖派有關的、（三）中下層的士大夫、（四）同情

¹⁶⁴ 轉引自鄭後洙：〈《歲寒圖》關聯清朝 19 人的人物探究〉，頁 242。

金正喜的遭遇及欣賞其情節。¹⁶⁵

本文目標旨於討論的不是歲寒圖本身的各種文學結果，而是藉此了解李尚迪在此事中的角色以及使清人藉著《歲寒圖》對朝鮮的深入認識。李尚迪將之帶到中國後，並再次到吳贊家中，與各方好友分享。而吳贊與張曜孫分別就著他們的人際網絡，再邀請各人到來。因此，他們欣賞《歲寒圖》的過程中，了解李尚迪與金正喜在朝鮮的經歷與故事。唯一曾見過金正喜的是吳贊，在題贊中可看見其對金正喜的遭遇感受尤其深刻：「林木似名節，松栢有本性。君子窮益堅，不容復何病。榮枯亦儔然，豈與凡卉競。時邁霜雪嚴，氣得天氣正。傳習後凋心，希賢以希聖。——奉題歲寒圖即請 藕船尊兄大雅正之，海虞吳贊呈稿。」¹⁶⁶吳贊藉著譯官李尚迪得悉金正喜被貶的故事，對他展示無限的同情，亦肯定他的精神。與此同時，他亦可了解到朝鮮社會各種的不公與黑暗。這一點亦可由未曾見過金正喜的潘會瑋的題贊詩所見：「金君海外盍，夙昔聞盛名。盛名毀所歸，輒為世網嬰。滔滔視流俗，誰知士之情。懷念風塵中，早識賢友生。高誼篤終始，歲寒無渝盟。始彼松與栢，本性同賢貞。貌此後凋質，用以答厚情。」¹⁶⁷可見，沒有見過金正喜的潘會瑋卻因《歲寒圖》了解到朝鮮社會的俗流損毀了他的盛名。

如果清人當中認識金正喜的，也許可通過書信或各種網絡，早已了解

¹⁶⁵ 정후수: 〈〈歲寒圖〉 관람 淸朝 19 人 인물 탐구〉, 頁 243-256。

¹⁶⁶ Sung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ŏ,” 43.

¹⁶⁷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54-55；Sung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ŏ,” 45.

到金正喜的遭遇或朝鮮的社會現況。但看《歲寒圖》的人，更多像曹楙堅本人所寫的「早聞秋史名，惜哉未一面。」¹⁶⁸或是張穆提到的「曹從徐孺子，獲耳阮堂名。」¹⁶⁹都可以了解到，他們是不認識金正喜的，而是通過李尚迪、吳贊或張曜孫的網絡而有機會了解到金正喜被貶的事情。金正喜在李尚迪回國後得悉《歲寒圖》的各人題跋的鼓勵深受感動，但他確實是不認識當中的一些人，如趙振祚便為一例：「歲寒詩中趙宮詹振祚，知是何等人耶？能得其淺深耶？詩場酒所，流連光景，與他人等耶？此為申受先生之甥也，申受先生於諸甥中，特重宮詹，以申受先生之特重，知其人之出群拔類，必有外氏風也。故心竊嚮往有年，無緣梯及，今何幸歲寒詩中遇之也，必為我轉叩之，使知海外有想望趙宮詹先生風采者可也。」¹⁷⁰

由此可見，金正喜雖曾聽其名，亦知其家世，卻未曾認識過趙振祚，而李尚迪在《歲寒圖》文學的交流之中，確實是決定閱讀群的關鍵。所以，《歲寒圖》文與圖的創作與再創作，金正喜被黨爭連累是創作的最初原因，但《歲寒圖》如何被演繹以及此圖完成後的讀者群，甚至其再創作的過程，不再是金正喜所決定，而是由譯官李尚迪所形塑，因此李尚迪將之帶到中國，讓其友人，認識、了解甚至同情《歲寒圖》背後的故事。而這些清人則通過李尚迪作中介，可認識朝鮮社會的種種問題。

而有趣的是，這些清人大多不是極負盛名的大家，不像朴齊家、金正

¹⁶⁸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54-55；Sunglim Kim, “Kim Ch ŏ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ŏ,” 46.

¹⁶⁹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 54-55；Sunglim Kim, “Kim Ch ŏ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ŏ,” 48.

¹⁷⁰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4，〈書牘・與李藕船[六]〉，頁 32b-33a。

喜來華時，接待與交流的都是翁方綱、紀昀或阮元等，反而只是一些在社會上地位一般的讀書人，如進士或甚是地方舉人。從身份觀之，這也是與李尚迪作為譯官，其網絡與認識的群體，與一般士大夫自然有所不同。而且，李尚迪與不同的清人可以自由以漢語交談，減低了溝通的障礙，使得經歷不同、身份不同的文人也會有機會接觸李尚迪。

可見，通過文圖學的理念可協助我們重新認識《歲寒圖》的各種意象，了解金正喜因感激李尚迪的不離不棄，還艱辛地贈送珍貴書籍，而創作了《歲寒圖》。李尚迪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到中國得到清人的和應而撰寫了各種題跋。他們不論身份，通過文學、畫作，進行交流與對話。李尚迪的身份在朝鮮社會得不到很多人的和應，但卻可在清人文壇中得到高度肯定，題跋鼓勵了金正喜的生活，使金正喜大為感動。同時也說明了李尚迪作為譯官在中國的網絡，如何讓更多人關心金正喜的遭遇，同時清人可藉李尚迪等譯官，了解朝鮮社會的狀況，甚至作為一種互相感嘆的對象。李尚迪將《歲寒圖》帶回給金正喜，亦引起朝鮮本土對金正喜的支持，例如權敦仁(1783-1859年)的創作足可證明之。而特別是藉著文與圖之間互相對比，互相配合，來呈現更不一樣的心態、思想以及社會網絡，譯官作為中介人，所產生的文化互動過程。

五、 小結

中介人產生的作用是雙向的，聆聽者是雙向的，表達者也是雙向的。過去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之中，因礙於研究角度的問題，導致一種學術錯覺，誤以為文化的交流或許是單方面的傳播。但以譯官活動為例，可見

文化媒介是雙向的，一方面是朝鮮文人認識中國、了解清朝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清人接觸朝鮮以及其社會文化的主要中介群體。

從清人眼中，譯官在文人社群之中，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認識朝鮮的話題，還有文化交流，文學創作以及心靈的共鳴中。譯官們創作獲得清代文人的認同，文人的創作也受到譯官多加讚賞，這樣的交流之中，使得譯官不再受制在過去於朝鮮社會所限制的身份，而受到更多的目光關注，或找到不同的清人成為好友。因此，朝鮮這群譯官來到中國，除了背負的朝鮮社會寄望的政治與文化責任以外，也搖身一變，成為備受當地文人所重視的群體。譯官受到如此重視，反而在朝鮮社會無法得到的。因此，譯官將自己的創作、個人感受等，均讓清人知道，而清人藉此發現朝鮮譯官的文采，以及朝鮮譯官對本國社會的控訴，自身身份的不安等。譯官們個人的感受及他們的眼中的世界，從朝鮮脈絡之下無法窺探，但在清人眼光之中，卻可看到不一樣的朝鮮譯官眼中的朝鮮世界。

金正喜與李尚迪的故事，反映的是譯官決定了清人所認識的朝鮮社會與面貌，李尚迪選擇了將金正喜的《歲寒圖》帶到中國，與吳贊與張曜孫等人分享，藉此來說明他們在朝鮮社會所面對的困境，以金正喜被貶的遭遇成為了他們所認識朝鮮的視角。石守謙曾指出：「『外圍的中介者』在文化意象的移動過程中如何運作？其運作又如何對意象之形塑產生作用？這些問題很難僅從外在的制度運作去理解，而需要同時顧及那些中介者的『人』的層面，去思考其之所以作為的動機、盤算以及在中介過程中的各種可能的臨場因應、自我調整。」¹⁷¹所以，《歲寒圖》在外在的制度運作，是不能

¹⁷¹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頁 2。

了解其傳播的意義，故學者均以金正喜的創作背景探討，但將之放置於東亞的文化意象形塑來看，卻可看到作為中介者的李尚迪，是決定該圖由誰來閱讀以及閱讀的感受的主導者。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朝鮮漢語的譯官在東亞文化交流的脈絡中，不只是擔任朝鮮人認識世界的媒介，更決定了朝鮮的文化意象，社會形態以及個人遭遇如何被表現和形塑，讓他們所認識的中國文人了解、感受以及同情。

第七章

前古未行——19 世紀譯官的身份轉變：從周旋到開化

一、 引言

19 世紀的東亞除了面對歐美各國向東亞區域各地的擴展，同時間這些東亞區域在傳統的交涉過程及框架之下，分別主動及被動地回應這些局面上的轉變。很多學者如費正清提及到挑戰與回應的觀點，¹在西力東漸背景之下，才出現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清朝（1644-1912 年）的洋務運動以及朝鮮的開化運動，這些意圖進行近代化及改變傳統的變革。²學界不少學者對此作出討論，試圖從這些社會的傳統與這些思想轉化的過程並論而談，以朝鮮的開化運動為例，不少過去學界均歸咎於歐洲勢力的來臨，對朝鮮半島以及東亞產生重大威脅，而作出的對應。³然而，「挑戰與回應」這種思考方式已經在學術界有豐富的討論，甚至有學者對此作出質疑。⁴故此，關於 19 世紀東亞社會變動的研究，應從過去未有採用的視野及材料來審視時

¹ 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9。

² 「挑戰與回應」當然被視為以西方中心出發的亞洲史觀點，但諸如徐中約（1923-2005 年）的《近代中國史》和 Andrew Gordon（安德魯·戈登）等都在不少篇幅談及兩國的近代改革嘗試。筆者認為這兩本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史的通論著作值得作為了解兩國史的入門，甚至是深化研究內容的參考著作，詳參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0); 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³ 關於開化思想的全面說明，詳參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頁 267-302。

⁴ 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興起，他們主張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的長時段的研究，亦因此而帶來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而這種社會史轉向，據 William Rowe 所指「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11。

局，才可更擴闊東亞近現代史歷史的課題可能性。

譯官自明清易代以後，成為了朝鮮文人或是朝鮮朝廷與外界接觸的前線媒介，他們在 19 世紀以前，大多維繫朝貢制度的禮儀或是擔任朝鮮與中國文化活動之間的中介人及周旋者。同時間，他們長期留在中國，使他們掌握關於中國或外界的各方面的情報。踏入 19 世紀，朝鮮半島朝廷與知識份子亦不獨善其身，他們改變了原來對清的傳統朝貢活動，展開了現代意義的外交事務，當中包括與日本或其他歐洲國家等議定各種通商或貿易安排。朝廷安排這些事務，大多安排朝鮮譯官等人執行，相信與他們過去均被派往外國擔任文化媒介的背景有關。而這些譯官之中更在各種 19 世紀的政局變化中，意識到開化在社會的意義，並在朝鮮社會培養了後來的開化派中堅份子。⁵

關於朝鮮的開化思想，一些學者從朝鮮傳統儒學觀點出發，特別關注北學與開化的承傳關係，但是朝鮮開化思想的研究，無論是從亞洲史的「挑戰與回應」的角度，⁶或是朝鮮性理學思想史的觀點，均忽略了開化思想倡導者們在社會身份和文化背景。其身份和文化背景，實際上對他們對開化

⁵ 林亨芬在其近著以引用姜在彥所指開化運動最早為第一階段以開明的兩班為中心的運動，可是單純的將所有參與開化運動及提倡開化思想之知識份子定義為兩班並非妥當。當然早期的開化思想並非完全相等於後來以金允植（1835-1922 年）及魚允中（1848-1896 年）等人投入的實際的開化運動，只是舉此例來指出學界對於朝鮮社會身份之間的張力及對思想建構的影響不太特別的著重。參林亨芬：《從封貢到平行——甲午戰爭前後的中韓關係（1894-1898）》，頁 27-28。

⁶ 相近的觀點可參考如下文章，魯學海：〈略論朝鮮開化派基本思想〉，《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1985 年月份缺），頁 96；朱明愛：〈朝鮮開化思想詮論——以穩健開化派為主的探索〉，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107。

的理解，以及外來資訊的接受，有實際的影響。⁷而事實上，早期一些被視為開化派的人物，像劉鴻基和吳慶錫等皆出身自中人家庭，⁸他們均為朝鮮譯官。因此，這種背景並非巧合，是相反譯官的背景，才驅使他們倡議在朝鮮發起及鼓動開化運動。

故本章先說明，19 世紀以前，譯官都是以周旋活動為主，其中以《明史·朝鮮傳》的書寫為例，來了解譯官如何利用其網絡和手段為朝鮮在《明史·朝鮮傳》之中取得他們期盼及應有的權益，藉此希望了解歷史書寫的過程中，譯官如何被認定在語言、人脈及周旋能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到 19 世紀時，從一些譯官對西洋列國活動的情報收集以及中國應對為例，可見譯官在東亞地區的變化過程中，他們一方面仍保持著過去收集情報的責任，而另一方面朝鮮譯官身份與角色亦有日漸明顯的改變。以卞元圭的經歷為例，他代表朝鮮直接與清廷的李鴻章就外交事務進行交涉，可見譯官在此時已站在東亞外交舞台的前端。另一位漢語譯官吳慶錫的經歷，⁹則讓我們了解到譯官如何從他的譯事、外交活動的經驗，轉化為推動朝鮮社會開化改革的動力。學界過去整理吳慶錫的活動，以了

⁷ 姜在彥：《朝鮮の開化思想》（東京：明石書店，1996 年），頁 79-164；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頁 267-279。

⁸ 姜在彥：《朝鮮の開化思想》，頁 115。

⁹ 關於吳慶錫的專門研究學界實際不多，亦大多散見在一些韓文論文之中，而這些論文都主要關注其開化思想的探討，或是分析他在韓中文人交流之角色，因為他曾有相關的材料，紀錄了他與中國文人之間的交往。這些研究可參考如下，最完整的研究，可參考慎鏞廈：〈吳慶錫의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歷史學報》，第 107 輯（1985 年 9 月），頁 107-187。另外，關於韓中文人之交流的研究，可參考이문호（李文豪）：《吳慶錫의 韓中 交流 研究：『中土簡牘帖』을 中心으로》（서울[首爾]：漢城大學校大學院韓國語文學科國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關於吳慶錫的金石碑刻研究，則可參考이규필：〈오경석의 『삼한금석록』에 대한 연구〉，頁 341-374。關於吳慶錫的對外認識，可參考金河元：〈초기 개화파의 대외 인식 - 오경석을 중심으로〉（早期開化派的對外認識——以吳慶錫為中心），《釜大史學》，第 17 輯（1993 年 6 月），頁 467-497。

解他的開化思想的形成與主張。而長期擔任漢語譯官的吳慶錫，因語言能力，以及朝貢制度或通信使活動容許往來國內外，獲得多次接觸外界的機會。而吳慶錫亦隨著他的見識，希望推動開化思想。雖然他未能見證到社會的開化，但卻引導了開化派的出現，在朝鮮進行最後一次的國內社會現代化嘗試。從東亞的變局之中，除了看到朝鮮社會的轉變外，也可看到譯官角色在時代之中亦有所改變，從過去只是作翻譯、情報收集或權益周旋，蛻變為朝鮮前線的外交官或是社會的改革者。因此，本章把譯官的活動以及角色的轉變放置得多變及複雜的 19 世紀東亞，可了解其身份與角色如何被轉變，以及最終淡出歷史的舞台。

二、 金是瑜與明史朝鮮部份書寫與辨誣

明清易代以後的朝鮮，在正史書寫之中，有感於清朝或過去明朝的文獻之中，有史實記載之誤。¹⁰故丙子之役後，朝鮮通過各種消息渠道，掌握到明史即將編寫的信息，於是朝鮮便開始派出使臣到北京向清廷辨誣，根據孫衛國的分析，辨誣主要處理的問題有三，第一無論是《皇明祖訓》，¹¹還是《大明會典》也好，¹²均誤記李成桂為高麗末年權臣李仁任（？-1388

¹⁰ 其實早於明萬曆年間，朝鮮朝廷已發現明室修編《大明會典》的過程之中有所需辨誣的地方，當中最明顯的是，高麗末年的李仁任並非李成桂之父的誤會問題，因此便派出使臣到北京作出辨誣。關於以權檣的《朝天錄》來了解使團的經歷與成效，詳參權仁溶：〈明中期 朝鮮의 宗系辨誣와 對明外交： 權檣의 『朝天錄』을 中心으로〉（明朝中葉朝鮮的宗系辨誣與對明外交——以權檣的《朝天錄》為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第 24 輯（2005 年 10 月），頁 93-116。

¹¹ 《皇明祖訓》於洪武 6 年（1373 年）時最初頒布，及後於洪武 28 年（1395 年）9 月修定後再頒布，主要用作訓誡子孫的書籍，但實際上是通過創建禮儀、法律、職制等方式，來作為治國的理念想像。關於此，詳參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史學集刊》，1991 年第 3 期（1991 年 8 月），頁 20-29。

¹² 大明會典始制於洪武 26 年編修，先經歷弘治年間成書、正德年間重校，以及神宗年間重修而成，今天大多可見乃申時行修之版本，實即明萬曆會典。關於此，詳參瞿林東：《中

年)的兒子、¹³第二是太祖得國事問題、¹⁴第三是仁祖登極事。¹⁵早於朝鮮孝宗時，已有使節得見順治時明史稿本時，對此事加以留意，並請求國王希望派人做辨誣：「鄭斗源赴京之日，得見《明史》，則有不忍聞之說；我太祖開國，應天順人，可謂名正言順，而《明史》亦加以不測之說，逮于改宗系，始得辨誣。」¹⁶而據《清世祖實錄》，當年：「御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并博選文，行鴻儒、充總裁纂修等官。」¹⁷所以，朝鮮便自明清易代以後，歷朝官員已有為明史書寫作出辨誣的想法。而具體的因由，則可參考 1732 年李宜顯出使時，朝鮮作辨誣的因由：

前此清國所纂《明史》中，有誣及仁祖反正時事者。楨、桷

國史學史綱》（臺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580-582。

¹³ 明萬曆會典有以下的紀錄：「祖訓 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自洪武 6 年至洪武 28 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卷 105（禮部卷 63・主客消吏司・朝貢一）〈東南夷上・朝鮮國〉，頁 2a。於是朝鮮一直積極以各種形式、方法在不同時代，向明朝作出辨解，詳參高艷林：〈朝鮮王朝對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義〉，《求是學刊》，第 38 卷第 4 期（2011 年 7 月），頁 141-147；黃修志：〈「書籍外交：明清時期朝鮮的「書籍辨誣」〉，《史學月刊》，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81-95。

¹⁴ 朝鮮初立時，雖通過與明朝建立事大關係，以確保朝鮮的合法性與權利，但明初兩國確曾有各種文化與政治上的摩擦，例如表箋、貿易等問題，故據孫衛國的分析，李成桂被記載為篡奪而來的，詳參孫衛國：〈清修《明史》與朝鮮之反應〉，《學術月刊》，第 40 卷第 4 號（2008 年 4 月），頁 125。但當然在《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中，朝鮮史官認為是「恭惟殿下，應天革命，初登寶位。」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奪祖實錄》卷 1，太祖元年 7 月己亥，頁 40a

¹⁵ 孫衛國：〈清修《明史》與朝鮮之反應〉，頁 125；並參楊艷秋：〈《大明會典》《明史》與朝鮮辨誣——以朝鮮王朝宗系辨誣和「仁祖反正」辨誣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79-91；韓明基：〈17・8 세기 韓中關係와 仁祖反正：조선후기의 「仁祖反正 辨誣」 문제〉（17 至 18 世紀韓中關係與仁祖反正——朝鮮後期的「仁祖反正辨誣」問題），《한국사학보》（韓國史學報），第 13 輯（2002 年 9 月），頁 9-41。

¹⁶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卷 13，孝宗 5 年 9 月戊子，頁 14a。

¹⁷ 《清世祖實錄》，卷 15，順治 2 年 4 月癸亥，頁 17a。

在顯宗朝使燕歸，陳請辨誣，而朝議參事，寢卻不施。甲寅後，楨輩復申前說，權奸依其言，遣使辨之。彼國不唯不許，詰問其何由得見禁書。我國遂不敢復言。因為停止者，近五十年。至乙巳，趙文命以書狀回來，以不復辨誣為慨惋語，書之日記以啓，上見之以為「此當亟行辨晰」，遂遣使陳辨。彼國雖許改纂，而遷就不許者又六七年。昨歲節使之往，又申請刊頒，彼國謄示改正之本。我國以此為恩，有此遣使之舉矣。¹⁸

當然，士大夫通常作為使臣，負責爭取權益和辨誣。但根據《同文彙考》的紀錄，朝鮮掌握漢語材能的譯官，通過他們的人脈與周旋技巧，獲委派在不同渠道協助朝鮮使臣掌握明史書寫的情況，甚至為爭取朝鮮的立場作出辨誣。如譯官崔壽溟（1626年-？）通過滿州貴族常明，掌握到一些宮廷之中的信息，希望藉著常明與當時主政明史編輯的張廷玉（1672-1755年）以及皇帝的關係，而協助辨誣：

譯官崔壽溟，自辛亥以後屢以史事往來於常明，使探其完役早晚壽溟因常明旗下次通官朴費楊阿要見常明。常明回報曰：「皇帝初政之時，難與外國人私往來，且去年行查以後，人言亦可畏。如有往復，則使此通官言送云。」壽溟以史冊印頒實，一國顛俟者，願終始宣力，取我國列傳先為印付，俾得藉手而歸。常明回答曰：「俺於你國事，豈敢歇後，史事既已告竣，當與總裁官張廷玉相議，更報其後。」費楊阿來傳常明言曰：「日昨委見張閣老，

¹⁸ 李宜顯：《陶谷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972，卷30，〈王子燕行雜識〉，頁22b-23a。

懇懇言及，則以爲明史雖已脫藁。皇帝今加校正始印，事體尤不可以外國傳紀獨請刊頒，要不出秋冬可見刊本云。」皇帝兒時，常明保護之功甚多，雍正令新皇帝就學於邵基，而靜處別殿。外人不敢出入，獨常明晝夜伏侍，故卽位以後寵遇尤別云。¹⁹

1731 年時，朝鮮已通過辨誣的過程之中，通過常明的協助而確認了仁祖登極事與太祖立國事已改正，但他們希望藉此獲得已編妥的《明史·朝鮮傳》以確認他們的想法得以落實。²⁰雖然上文提到張廷玉指不能單獨發刊朝鮮傳，但據《清實錄》見雍正接受了有關的要求，先將有關內容抄錄，以慰遂國王懇求昭雪之心。²¹這反映了朝鮮的譯官們會代表朝鮮向清廷各方官員周旋，並向清朝反映，使清朝了解朝鮮的需要以及建構他們對朝鮮的觀感。《明史·朝鮮傳》的編寫和刊印確可反映這樣的想法。在多次的辨誣，譯官金是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據譯官所編的《通文館志》中，對他的活動高度肯定：

金是瑜，未子柔，慶州人，稟姿明詳，以最嫻華語名，前後赴燕凡二十餘，遭 國有大事，使臣輒啟，請委仗，辛丑 英廟冊封奏請時，禮部及滿漢會議峻塞將不諧，公素與履親王善獨往

¹⁹ 〈冬至行正使驪善君 壘副使李德壽別單〉，《同文彙考》，補編卷 5，〈使臣別單五〉，頁 15b-16a。

²⁰ William Rowe 曾指清朝展開修纂《明史》除了保存歷史外，更希望藉此對「已覆滅之前朝具有特別知識或懷舊之情」的士人消磨其精力。關於此，詳參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34。

²¹ 「該國王急欲表伊先世之誣，屢次陳請，情詞懇切。著照所請，將《朝鮮國列傳》，先行抄頒示，以慰該國王懇求昭雪之心。」《清世宗實錄》，卷 116，雍正 10 年 3 月戊午，頁 7b-8a。

見之，指陳事實，涕隨言下王感悟，明日面奏特許準請。鶴巖趙相國文命，嘗曰金某辛丑之功，百世可紀。丙午隨辨誣使赴燕，即仁廟被誣於明史事也。先是屢請未獲許，公竭誠周旋，竟得刪改。明史中，以太祖大王受命時，事多誣逼語，庚戌節使行，上下教曰，今行善周旋必改，而後歸，人皆難之。公獨自擔當，往見莊親王，又與總裁官張廷玉、留保等會於王府，反復爭陳取皇明史悉刊句語如公言。上於筵中獎之以明敏解事，賞之以奴婢田結，官示崇祿知中樞，秩既高，愈恬謹謙恭扁，其居曰知足。及歿，上屢示嗟惜。²²

據此，可了解金是瑜因與常明、莊親王（允祿，1695-1767 年）等清朝貴族有聯繫，通過人脈的關係，掌握到相關的聯繫，《朝鮮王朝實錄》亦有記載到 1723 年的使臣李饒回國後，解釋金是瑜如何協助明史改寫：

饒曰：「留保，是彼國主文之人，與常明姻好，且是摠裁官張廷玉之親友也。常明於我國，素所盡心者，邀留、張二人，涕泣請改，兩人感而許之。常明言于臣曰：『國史中所欲改字句，並即拈示。』云，故臣等以朱筆，點纂字、攬字及自立等字，而送之。常明示留保，答書曰：『丙午年，皇上已特許之，可隨意改之也。』由是，事得順成。但自立云云，常明云：『是野史中語，而明史則無之，既云無之，則何必請改？』蓋彼言既可信，文勢亦非倉卒間構出者。譯官金時瑜（應為金是瑜），與常明相面，則常

²² 金指南、金慶門、李湛等編：《通文館志》，卷 8〈故事〉，頁 26a-27a。

明曰：「刊本當出送於冬至使之行，當以五六千金爲謝也。」仍求善馬及明珠兩箇。胡人雖有文學者，於財則甚吝，獨留保不受賂。遺曰：「送史冊而國王有禮謝，則不當辭。」云矣。²³

其中常明與留保、張廷玉關係甚好，而金是瑜等譯官則與常明素有交往，如《朝鮮王朝實錄》另一個紀錄曾提到：「蓋是時，彼國金常明者，自稱我國人後裔，故譯官李樞、金是瑜者，自稱常明之族黨，夤緣往來，至謁常明父祖之廟，以欺他人之耳目，而納賂圖事，故每有使行，必帶去兩譯。」²⁴因為這樣的關係之下，朝鮮的歷史書寫，可通過譯官爭取。雖然我們不合道明史修改的具體內容如何，而且有官員投訴常明和金是瑜有不軌之途，但似乎官方自此沒有再追問歷史書寫的問題，也許對修改的內容是滿意的。

而金是瑜在周旋的活動中，均獲得士大夫與朝廷所高度認可，趙泰億（1675-1728 年）曾提到：

臣待罪司譯院提調，慣知譯舌不善通話之狀矣。曾前則勅使言語，使通官傳言。故譯舌雖生疎，與通官酬酢，能不阻闕。而今番勅行時，勅使不信通官，事事而疑之，不由通官，直招譯官而面言，諸譯多不解聽。獨堂下譯官金是瑜，能善漢語，每當難

²³ 《英祖實錄》，卷 29，英祖 7 年 4 月癸巳，頁 16b。

²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英祖實錄》，卷 38，英祖 10 年 4 月辛未，頁 11a。

處之事，能隨事爭執，善得繡縫，其功勞誠不細矣。²⁵

從歷史書寫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熟知的《明史》是清人通過剪裁、編校、參考各方面的材料，撰寫而成的正史。²⁶但是《明史》之中的朝鮮部份，特別是明清交際社會混亂的記述，都是朝鮮相當關心的內容。而朝鮮的歷史記載，則是依靠這些善於周旋的譯官，向他們友好的清廷要員爭取，才得以按著朝鮮的立場而撰寫。加上，19 世紀以降，仁祖反正在明史之中得到正統的處理，也被朝鮮的士人認可為金是瑜的功勞。

《明史·朝鮮傳》的書寫闡析清廷展開了明史的工作過程之初未有了解朝鮮的立場及實際情況，大多只按著明朝的典籍作為基礎作書寫。但以朝鮮的脈絡觀察之，朝鮮一方則認為不少史事早在明時已有紀錄失誤，而朝鮮朝廷多次往復都無法改變有關事實，但當朝鮮譯官在介入，成功改變清朝書寫的內容和方式，在一些實錄以外的材料，可看到朝廷實際利用譯官在語言、人脈及周旋的技巧，使《明史·朝鮮傳》的書寫，符合朝鮮的期望。金是瑜等譯官的周旋與辨誣反映的是朝鮮譯官在 19 世紀以前，他們充份扮演著爭取朝鮮權益的角色，只是按照的都是朝廷期盼，直到 19 世紀以後，角色才慢慢轉移。

三、 譯官在中國收集的西方勢力情報

與 17 至 18 世紀不同，19 世紀的東亞局勢已大致被歐洲列強的勢力所

²⁵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 555 冊，景宗 3 年 6 月 20 日，頁 131a-b。

²⁶ 關於清修《明史》的編校過程以及一些新發現，詳參南炳文、魏淑寶：〈張廷玉《明史》重要擬稿徐氏《明史》試探之一——序言作者韓方卓乃沈朝初之號說〉，《史學集刊》，2016 年第 3 期（2016 年 5 月），頁 81-86。

主導。英國在 18 世紀末通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與莫臥兒帝國的戰爭，²⁷確立了亞洲地區的勢力擴張。而通過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網絡，²⁸中國與英國開始彼此之間有著一定的物資以及文化交流。在馬禮遜來華前後的英國貿易商旅或是英國社會，對中國仍然有相當的重視與正面的討論。²⁹在英國不至於視中國為需被拯救的社會，但隨著東印度公司於 19 世紀中葉日漸瓦解，英國政府失去了傳教士－東印度公司的一手情報資訊，轉移相信及依賴由英商直接主導中國觀的認知。因此，中國被視為文化落後，等待被救贖的形象，英政府亦日漸轉為認同英商視中國與遠東等地為擴張對象的想法。一些英國商人希望擴展其社會與帝國網絡，這一點相當容易理解。³⁰於是 18 與 19 世紀之間，西洋人在中國的認知出現很大的轉變，原因在於歐洲各地，特別是英國社會轉換了對漢學或中國的定義，認為殖民地以及對帝國發展的意義。因此，英國等歐洲各國在東亞的形象便由原來的貿易或朝貢列國之一，轉變為遠征東亞的列強。

而鴉片戰爭的爆發，其實朝鮮已開始相當關心戰爭的情況，三好千春研究之中，已指出朝鮮已收到當時燕行使節在北京所搜集得到的社會現象而作出了各種判斷。例如鴉片的販賣與銀貨關係、英人戰爭期間對中國社會的滋擾等。³¹因朝鮮使節依賴的材料，都是從中國社會而來，自然產生

²⁷ C. A. Bayly,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I.1: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²⁸ 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6.

²⁹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52-168.

³⁰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168-171.

³¹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頁 28-62。

了對西洋列國的偏見。因此，朝鮮對一些歐洲國家相當的戒心，每當海域周邊有各樣異樣船的往來，他們都相當的小心，可見朝鮮並沒有完全忽略局勢的轉變。其中，譯官成為這些資訊往來的情報收集者。據《同文彙考》，朝鮮憲宗（李旻，1827-1849 年，1834-1849 年在位）國王曾撰咨文提到在 1845 年時提到一艘異樣船停泊於旌義縣斗滿浦牛島，³²當時便由譯官李寅和（1784 年-？）協助前往問情：

譯官李寅和該地方官旌義縣監任秀龍馳往問情，不通言語替用文字詳探。來歷稱是紅毛國人，又稱大英國人。而二年前自本國始發，本年四月初四日自廣東開船，本月二十二日到此，為摸畫山川云。同船者總計二百人，問船票有無，船主嘆叨稱其國船本無照票。察其形貌或黑或黃，髮如羊毛。上下服着表黑裏白，極狹且小。二人踞床而坐，其餘腰環刀手烏銳，銳有三刃鎗。以繩索遍量島勢，築石，塗灰，插鐵，釘焚香，祭拜。其中解文字者一人，辮髮垂後容貌衣服與彼不同，故問之則稱：大清國廣東省香山縣人，姓吳名亞順者，作為通事云。船製前後平低豎三桅，桅上有三層橫木，船左右鑿穴數十穴裝大砲。船中什物欲為一一點檢，則稱以但裝、火藥、大砲、柴糧而已，不肯開示。此與尋常漂風商舶，絕異勢強難迫搜查。³³

從上述的咨文之中，所指的是當異樣船抵朝鮮半島時，朝鮮都異常緊張，

³² 斗滿浦牛島即今天濟州島東邊城山里的日出峰對岸的牛島。

³³ 〈請禁斷英夷船來往咨〉，《同文彙考》，原編續，〈漂民六 上國人〉（道光 25 年 7 月 28 日），頁 14b-15a。

亦相當抗拒，可見他們受當時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情況的情報影響了他們的判斷，故希望清朝能夠禁斷這些「英夷」到朝鮮半島海域活動，故當時朝鮮憲宗最後甚至向清朝以人臣無外交為理由，拒絕與英人繼續維繫任何關係：

小邦僻處東隅，雖未詳此夷極西極北之事情。如何若如傳說所聞，則此夷專以交易為事，恒處廣東洋中如澳門等處是也。然則此夷之欲與小邦開市交易之計有難預測，而揆以藩臣禮度，斷不可有外交也。且況小邦物產鮮少在彼無可易之資，銀貨乏絕在我無可交之需，而一自此舶逗遛作梗之後，民情繹騷難以底定。苟或有日後之患，漸致滋蔓難圖之境。則小邦之弊姑捨勿論，其在密邇天朝，無異內服之地亦豈無仰貽憂虞之慮哉。茲庸備悉事，由有此咨，陳煩乞貴部，轉達天聽，特降飭諭於海徼番船之管理處，以為先事禁斷之道，俾小邦得藉隆庇永底安靜千萬幸甚云云。³⁴

由於異樣船早於 19 世紀初，已多次以澳門為中心，在東亞海域交流。故這些船隻的到訪被朝鮮臣民認為不友善的到來。拙文曾提及：「朝鮮對於澳門的認識，往往與其當時朝鮮半島面臨的局面而有所連繫。他們漸漸透過北京獲得的資訊，留意到鴉片戰爭以後歐洲不同勢力紛紛來到東亞地區之後的注意，加上異樣船量的增加，亦引起了他們對於所處的環境有所關注，故特別留意到這些異樣船及相關的勢力來臨，均是以澳門為外洋船抵達東亞地區的門戶，所以亦對於有關船隻的來歷特別關注，並甚至上書朝廷，要

³⁴ 〈請禁斷英夷船來往咨〉，《同文彙考》，原編續，〈漂民六 上國人〉（道光 25 年 7 月 28 日），頁 16a-16b。

求當局正視有關問題。」³⁵因此，他們意識到異樣船的問題，而譯官成為與異樣船交涉的重要成員。而異樣船活動的出現，也使到當時的譯官在北京收集的情報，不再限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而是利用北京所見所聞，把當時的西洋列國在華或東亞地區的活動紀錄，而這些紀錄或情報，或多或少都受到當時中國社會氣氛所影響，故情報亦展露了當時中國人對形勢的看法。

《龍湖閒錄》是朝鮮晚期的朝廷官員宋近洙（1818-1903 年）所編輯關於國內外政治關係文獻的史料與紀錄書。所以，一些 19 世紀的聞見文本，被宋氏收錄於《龍湖閒錄》之中，內裡看到一位譯官在 1860 年英法聯軍之役期間，熱河對於朝廷政局的一些考察，他留意到當時的亂事極多，但官員卻無從辦法：「而近年以來，南匪外，如回匪、苗匪、捻匪、嘯匪、教匪、土匪等許多名目，在在猖獗，往來滋擾，商路阻梗，人心危懼，宵旰之憂，日甚一日。而王大臣等，文恬武嬉，終無出力抒患之策是如爲白齊。」³⁶此外，他亦留意到在十多年以來地方官員嘗試以銀貨與外人交涉，仍得不到解決問題辦法：「……蓋其所爲，雖曰叵測，而十數年來，以依其願來往交易事。皇帝前，進獻禮物，曾經兩廣總督及在部權臣處，行賂銀貨，不知幾千萬兩，而至今令無字回示，致此無前變亂。用事諸人誤國之罪，良可痛惋，是如爲白齊。」³⁷從他的情報得知英人入京後，便由奕訢、桂良等人負責善後，而英人入京居後，社會卻相當平靜：「自皇帝駕幸熱河之後，

³⁵ 羅樂然：〈東亞文化圈視野下朝鮮後期對澳門的認知〉，《成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6 年 6 月），頁 23。

³⁶ 宋近洙：《龍湖閒錄》，卷 3，〈熱河使行中譯官聞見事件〉，頁 6。

³⁷ 宋近洙：《龍湖閒錄》，卷 3，〈熱河使行中譯官聞見事件〉，頁 7。

恭親王奕訢、滿大臣桂良、漢大周祖培，留都辦理，招入英夷，定約條。而該夷等，分住王府之處，屋上，插三色旗一面，門外，貼約條一通，渠輩所謂衙門鋪舍，方張始役，而工匠役夫汲水人外，並不許出入，亦無殺戮掠奪之患，故市肆閭閻安堵如常是白齊。」³⁸

從上述的情報之中，可以看見譯官站在第一線上，了解到英法聯軍之後，咸豐帝遷至熱河後的社會情況。似乎在譯官眼中，他留意到的不是英法聯軍帶來的破壞，反而看到的是清人之中毫無解決問題之法，導致問題延續，而譯官卻特別提到的是英法聯軍入京後，並「無殺戮掠奪之患，故市肆閭閻安堵如常。」這與一些既定的一些聯軍暴行的歷史想像的論述明顯有所不同，可以看見朝鮮朝廷從這些譯官的資訊之中，在動蕩的中國局勢之中，掌握到各方面極度重要的外交情報，以便對應各種情況的發生。

前章提及的李尚迪於 1864 年擔任燕行使團的首譯。該次使行，他除了與其好友進行各種文學交流外，他亦像其他的譯官撰寫聞見事件，其書寫的內容可以和上述《龍湖閒錄》所記的手本互相對照，可藉此了解 1860 年代經歷了南京與北京條約後的以後中國社會面貌，當中自然聯繫的是《天津條約》以後，洋人獲得北京駐守與居住權後的形勢：

自洋夷留住皇城以後，與俄羅斯聲氣相通往來無間。於是俄夷憑藉其勢，漸有凌侮中國之意。近日俄夷欲廣拓其館舍，勒買民家，民不能堪控訴于議政王。王慮其有生釁之端，首鼠未決。而洋夷則城內各處買宅入居者年增，歲加又欲築室於東華門內。

³⁸ 宋近洙：《龍湖閒錄》，卷 3，〈熱河使行中譯官聞見事件〉，頁 7。

蓋其陰蓄虎視之志，先試蠶食之計，推此可知云云是白齊。³⁹

在李尚迪當時擔任隨行首譯時的情報中，可了解外人隨著《天津條約》的簽訂，⁴⁰西洋各國使節及商旅可藉此而留居於中國。⁴¹據李尚迪指出當時官員無任何方法面對有關問題，使民家受苦不堪，然後他推論這些外人之志，指出洋人來華的目的，或許是蠶食之計，所以他特別留意到一些洋人的舉動。他發現洋人來華後，讓他們的子弟學習華語，⁴²又帶一些華人子侄到外國，⁴³李尚迪認為要深慮這些行動的目的：

洋夷駕海九萬里，流入皇城今已五年。洋女稍稍來留生子生女猶屬餘事。而五六歲兒亦復率來肄習華語於華人。爲華人者則利其金而授之語，其亦可駭彼類之學語。其意何居，且彼類往往收買華人之子侄。年未滿十四五歲者，移送其國究厥所爲尤極巨

³⁹ 〈告訃請諡兼承襲奏請行首譯李尚迪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二〉，

⁴⁰ 《天津條約》為 1858 年基於第 2 次鴉片戰爭（或稱英法聯軍之役）以後清廷與英、美、法俄所簽訂的條約，當中英法被容許官員進駐北京。而由於美國有最惠國條款，故當時容許了這些國家的條約也使美國也可一體均沾。

⁴¹ 1863 年隨著北京的開放，著名的美國傳教士丁韜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年），便從寧波移居至北京，繼續傳教活動。後來，甚至獲委派擔任北京同文館總教習。因此，丁韜良之例，可作為引證當時歐美人仕在中國的活動空間的移動。詳參傅德元：《丁韜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

⁴² 詳參岳嵐：〈晚清社會變遷與西洋人的漢語學習〉，《清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5 月），頁 122-129。

⁴³ 早於 1847 年，容闕便被當時的傳教士勃朗牧師（Samuel Robbins Brown）返回美國，並考入耶魯學院（Yale College），成為首位留學美國的華人。關於容闕的活動與其文化認同，詳參陳瑋芳：〈西學之子——容闕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223-265。

測識者，爲之深慮云云是白齊。⁴⁴

從兩方的觀察，可以看見當時他們並非單憑各種中方的資訊所論述而報告當時洋人到華後的情況，而是在北京實地了解，並將他們所見的及收集的情報當時洋人對社會帶來的衝擊，以及應該預警的事情告知朝廷。但李尚迪的情報之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李尚迪不是盲目批判，而是指出各種未來應注意的各種會出現的可能性。

而自中國被打開了通商貿易的方式後，譯官的情報手本之中，除了過去一般所留意到的各種社會問題，如一些地方騷亂以及人事變動，定必留意不同國家在華的活動與去向，或因此而產生的各種矛盾，例如玄鐸留意到貿易的活動如何產生英法之間的不信任，而引起了衝突：

洋夷部落之中，暎法兩國鳩聚各樣物貨交易於中國，取其利剩，兩國相分，自是定規。而挽近物貨之辦備，每每暎多法少，及其分利則依舊相半。兩國之甘苦懸殊，自生釁端。暎夷竟至於舉兵侵法屢月爭鬪是如是白齊。⁴⁵

玄鐸指英法雖然在中國貿易活動之間一直均分，但其實際上的利益均是英多法少，故兩者之間彼此之間有所衝突。但玄氏的報告，時為 1871 年 3 月，當時他指的「英人舉兵侵法，屢月爭鬪。」似乎所指的應為普法戰爭。當

⁴⁴ 〈告訃請諡兼承襲奏請行首譯李尚迪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二〉（同治 3 年 5 月 23 日），頁

⁴⁵ 〈冬至兼謝恩行首譯玄鐸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二〉（同治 10 年 3 月 22 日），頁 85b。

然，譯官在情報收集上，絕對有可能有情報出錯的情況，或是對當時的情況並不完全掌握。因此，不同譯官的手本變得很重要。如翌年出訪的譯官李應三，則留意到普法戰爭之間因事而引發了衝突：

年來洋夷之來住京師者，不知爲幾百名而恣行，不法莫敢誰何矣。西洋諸國中最強者即布國，而伐法國戰爭不息，故京師天津等處洋夷之來住者，漸次還歸是如是白齊。⁴⁶

李應三指當時西洋諸國最強者為布國，布國為清代稱普路士，即後來的德意志帝國的稱呼。從李應三的觀察中，得知法國因普法戰爭，使軍民留於北京的人數減少或有所出入。譯官雖然也無法確認自己所記述紀錄的真偽。但是，譯官們的聞見事件或情報，卻確實讓當時的朝廷意識到這些外來勢力的威脅，半島不能再藉此孤立於東亞與國際世界以外。

與此同時，朝鮮譯官亦在 19 世紀之中，成為了國家之間的情報交流的媒介。像是李容肅擔任 1876 年朝鮮派往日本的修信使的譯官時，他亦按著傳統的中朝之間的咨表模式，特別向清朝朝廷報告，當時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光緒二年三月初九日小邦差送修信使禮曹參議金綺秀於日本，緣由已有具咨轉報于上國。而修信使始於六月初一日無事竣還，詳探日本事情則方與十七諸國通商。而自小邦復修舊好之後，值此信使之來邀接館餼照例無虧。外務卿政府大臣俱各設宴施禮，而國君引見勞問。其大臣貴官以魯西亞占據地方逼近朝鮮北界，深以為憂密語，叮囑使之歸告。本國早

⁴⁶ 〈冬至兼謝恩行首譯李應三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 二〉（同治 11 年 4 月 30 日），頁。

爲備禦之策，又言將以開港商辦細節目，事派遣理事官當在修信使還國後旬日之內……」⁴⁷從上述裡面，朝鮮制度所形成的東亞帝國網絡，使朝鮮即使已需展開了條約外交的方法，但是仍通過傳統禮儀的咨文形式，通報各種日本的消息。而這種消息確實對中國亦相當重要，因為中國在面對朝貢體系日漸瓦解的過程中，只可通過朝鮮繼續維繫原來的傳統。

19 世紀以降，譯官的記述更多聚焦在一些洋人在華的活動以及國家勢力背後的各種環境。他們站在中國的前線，能夠讓朝鮮朝廷可藉著他們的所見所聞，或各樣的情報，衡量當時的局勢。因此，通過譯官的情報網絡，朝鮮仍保持著對世界各方面的情報認知，即使該資訊是否完全準備也好，朝鮮譯官仍在朝鮮對外界情報收集上有一定貢獻，而非完全對外界無知。而另一方面，朝鮮朝廷大多時候，會就著這些譯官在北京的情報，決定以及改變他們的對外政策及國家施政的關鍵資訊。1866 年丙寅洋擾時，大院君便是通過當時使團收集到關於法軍的情報，而落實了鎖國政策並當時下令抗擊法軍。最終在兩敗俱傷之情況，取得了抗擊的勝利。此例子說明，這些情報帶回朝廷以後，朝廷會藉著這些資訊而判斷各種往後的行動。

四、 卞元圭的講究武備與東北亞活動

卞元圭字吉雲，為 1855 年漢學考試的狀元，並獲授教誨崇祿知樞一職。多年來往返中國，與李尚迪一樣，曾與清人作各種詩歌酬唱，⁴⁸但在 1880

⁴⁷ 〈報與日本使臣商辦開港通商等條約咨〉，《同文彙考》，原編續，〈倭情〉（光緒 2 年 7 月 14 日），頁。

⁴⁸ 《海客詩鈔》中，崔性學將卞元圭的 46 首詩收錄，並將之交予董文煥收錄。關於此，詳參劉婧：〈조선 역관 6 인의 시선집 『海客詩抄(해객시초)』에 대한 고찰——3 종 필사본을 중심으로〉，頁 238。

年代之中，卞元圭卻扮演著不一樣的角色。他在 1880 年（光緒 6 年，朝鮮高宗 17 年）委任為別齎咨官，曾於天津與李鴻章見面。《同文彙考》紀錄提及卞元圭於 1880 年 9 月 14 日，帶同小通事二名從人二名，前往天津與李鴻章交涉。⁴⁹當時處於江華島條約簽訂以後，朝鮮社會意識到外在環境的轉變，對社會帶來的衝擊。本來已熟悉外界事務的譯官，在此時刻之中卻由一般的使團協調成員，轉移為擔任前線的外交官，並協調、草擬甚至是與清朝或其他地方官員交涉作各種外交決定。卞元圭的外交活動可讓我們了解譯官的角色如何隨著局勢而有所轉移。他抵京後，便獲得與李鴻章會面，並呈交了中國協助朝鮮改革武備的《講究武備咨文》，該文主要希望中國容許朝鮮派員到天津學習各種重要武備，該咨文由卞元圭帶往，與李鴻章交涉。該咨文提到：

一國輿論：「咸以為上國器械精利，以威天下。天津廠等處，寔四方巧工之所會，各國神技之攸萃也。亟宜選送明幹人員，情願學造器械，為今急務。」仍伏念皇上威靈，達于四極，睇眴流于萬區。小邦常飲醇和，最被覆燾。苟此輿情之得徹，庶幾寵施之不靳，而惟猥越是懼，不敢具奏。先茲悉陳于部堂大人。仰冀曲察導達，特降隆旨，俾小邦匠工，學造於津廠。且簡選解事人員，或於邊外習教，隨處方便，竟能有成，則內而竭屏翰之職，外而盡禦侮之方。環東土幾萬生靈，永賴以妥靖。頌戴帝力，豈特與穹壤而無窮也？不任誠懇祈祝之至。專差副司直卞元圭，齎

⁴⁹ 〈禮部知會齎咨官派通官伴送天津咨〉，《同文彙考》，原編續，〈軍務〉（光緒 6 年 9 月 9 日），頁 10a。

咨前往，合行移咨，請照驗轉奏施行，須至咨者。⁵⁰

當時《朝鮮王朝實錄》敘述當時的情況：「齎咨官卞元圭以九月十六日抵天津，見機器局、製造局、軍機所及西沽儲備火器、火藥各庫。旋於二十二日，會見李鴻章，商議來津學習製器練兵分條，朝鮮來學製造操練章程。」

⁵¹當時卞元圭的工作相當明確，就是與李鴻章商議來津學習。《清實錄》記載道卞元圭來華商議，得到朝廷派員接待外，也提到：

前因禮部奏朝鮮請派匠工學造器械，當令齎奏卞元圭前赴天津。由李鴻章詢問情形，奏明辦理。茲據李鴻章奏，與該使往覆籌議學習製器練兵各條。開具節略，尚屬周妥，著照所議。即由禮部咨照朝鮮國王自行酌辦，並飭令卞元圭即行回國。另片奏、酌議該國員弁來學製造操練章程四條，著一併咨照該國王照議辦理。⁵²

而據《同文彙考》指李鴻章收到卞元圭的咨文後，便馬上向朝廷會報，可看到當時李鴻章相當支持朝鮮的建議：

朝鮮國王姓 特遣齎奏官卞元圭齎到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該國器械不利，求往天津廠等處學造器械，竝簡選人員於邊外教習等，情懇為據咨轉奏謹抄錄原咨，恭呈御覽可否准其

⁵⁰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高宗實錄》，卷 17，高宗 17 年 7 月乙亥，頁 18a-b。

⁵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高宗實錄》，卷 17，高宗 17 年 7 月乙亥，頁 18b。

⁵²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120，光緒 6 年 9 月甲午，頁 13a-b。

前往天津學習製造之處，伏候聖裁……⁵³

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當時支持朝鮮的行動，主要原因是 1879 年李鴻章曾撰信予當時朝鮮的執政李裕元，建議需要「密修武備，籌餉鍊兵，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李裕元因此回信，同意李鴻章的建議，但問題是在於朝鮮可從哪一方去接納，最終他回信李鴻章請清朝協助強化武備，他指：「蓋上國規模，譬則天地之大也。巨細咸宥橐籥，嫩惡畢就鈇規，麟鳳蛇龍，無適無莫，時式制宜，而旋措泰盤，因萬方所歸極。而小邦遽欲，則傲不猶監雞之學阜鳥乎？」因此朝鮮朝廷便派了卞元圭與李鴻章接洽。

據《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之中，李鴻章將之上奏於朝廷後，便獲得朝廷的正面回應，接納卞元圭的意見。⁵⁴而從《清實錄》記載中，可看見卞元圭時與李鴻章商量以後，回國後便協助草擬《朝鮮國員弁來學製造操練章程》：

一擬選派三十八人分入東南兩局學習製造，以兩員分管之通事傳語者，東局用二人，南局用一人。又選派精明強壯弁兵四十人，分隸親軍槍砲營內，學習操練。亦以兩員分管之通事傳語者二人，以上共以八十七人爲額。資斧火食等項，皆朝鮮國自備，惟住房由中國借給。

⁵³ 〈原奏〉，《同文彙考》，原編續，〈軍務〉，頁。9a。

⁵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6 年），〈直隸總親李鴻章奏遵籌朝鮮講究武備並說土儀應否收受折〉，頁 25-26。

一朝鮮國朝貢信使往來所經道路，自必永遵成憲。惟此次派人來學，係屬破例之舉。若得徑從海道，更覺便捷，且製造操練等事一二年內當可探討門徑，為期不至過久。擬請酌量變通奏咨。立案暫由海道來往，不在朝請常行公事之列。除來學之弁兵學徒委員通事從人而外，別人別事不得援照辦理。至朝鮮國請中國代購軍械機器等件，俟購到後，由中國咨照朝鮮，方可派員從海道前來領運。

一委員弁兵學徒通事人等，由北洋大臣衙門給發空白憑票，交朝鮮國按名填給，并造名冊呈送北洋大臣衙門及禮部備查。到中國後遵守中國規矩，專心聽教，倘或不遵約束，由中國官發交派來委員查核辦理。至隨從之人數用為止，不必多派亦按名給予憑票，附列冊末一體遵奉，約束不得私帶商販，及一切貨物。一凡屬練兵學藝購器軍務公文，由朝鮮國王分咨禮部及北洋大臣衙門以歸便捷。⁵⁵

雖然朝鮮國員弁來學製造操練章程只是一文件的草擬，但以譯官身份轉移的角度來看，可見過去只擔任通事與翻譯的譯官，卻為朝鮮草擬並提交關於朝鮮到華學習軍務的教學與公務章程。此信函的意義不但見於身份上的轉變，亦看到卞元圭對當時國際形勢與環境的相當熟識，並清楚交待各種公文的遞交以及各種程序的安排。

在這次行程之中，卞元圭也曾與李鴻章詳談關於關港以後的通商問題，

⁵⁵ 〈謹將朝鮮齎咨官卞元圭與津海關道鄭藻如等擬議該國員弁來學製造操練章程錄呈御覽〉，《同文彙考》，原編續，〈軍務〉，頁

李鴻章特別提醒卞元圭，朝鮮應在通商過程之中，應多加小心，在李鴻章的奏議中提到：

此次貴奏官卞元圭來津謁見臣，與筆談良久，觸類引伸俾徐悟保邦之大計，即臣上年七月致李裕元一函。彼亦知為忠告，因與開誠布公，迎機善導，剴切而詳示之。聞朝鮮與日本通商數年尚未收箱，彼並不知稅額重輕，臣告以西洋各國通例，勿為日本所蒙，且知重稅之有裨國計。朝鮮與法美有怨，慮其見侵。臣告以法美志在通商，並無用兵強迫之意。而俄人則窺伺甚急，朝鮮東北海口俄接界，防禦太疎。臣告以德源永興口，既准日本開埠，倘俄以兵船闖入，或先禮後兵，應派員把機接應。⁵⁶

兩人之間亦就著各種問題之中，進行詳盡的筆談，一方面李鴻章可從卞元圭口中，得知朝鮮對通商、邊界防守，特別針對俄人的威脅之中，了解了朝鮮的情況。另一方面，如李鴻章向朝廷所奏報一般，他亦提示朝鮮應按當時國際情況收取合適的稅項，以及通過全面通商，因為他認為「一國不能獨佔，佔之則必群起而爭」，⁵⁷故他強烈請朝鮮必須考慮各國的通商，以維護朝鮮的國家利益。而筆談最重後，也最重要的部份，李鴻章向卞元圭問：「貴國所求派人學習製器練兵各事業，令諸位道台與之妥議數日。昨呈略摺大端已甚，詳晰貴官能遵允否？」⁵⁸卞元圭回答：「此事係前古所未

⁵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報與卞元圭筆談朝鮮現與各國通商情形片〉，頁 29-30。

⁵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與朝鮮貴咨官卞元圭筆談清單〉，頁 34。

⁵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與朝鮮貴咨官卞元圭筆

行，素意行不蓄，乃敢咨請者仰恃 大朝之於小邦有籲，無從不遂之。德意亦維我中堂眷芘之惠漣，如有所教不奉遵。」⁵⁹卞李之間的筆談，一方面象徵著清朝隨著《江華島條約》及琉球合併事件以後，刻意強化清朝在朝鮮的大國身份，改變過去不干涉及評論朝貢國事務的方向。另一方面，朝鮮亦意識到國家的命運需得到清朝的支持與確定。因此，兩人的筆談可用現代意義與目光來觀察，是一場外交合作的會議以及合作對談。而事實上，兩國亦因此而得到一些合作的方式以及商議後得出的行動。

此次交流以後，朝鮮朝廷便多次在外交事務上多次起用卞元圭，與李鴻章等清朝官員處理各種對外的通商章程以及外交身份問題，特別是中朝兩國的對等問題。陳尚勝指出朝鮮安排卞元圭交涉的考慮：「朝鮮國王首選卞元圭赴華議約建交，則是由於卞元圭早在 1880 年就與李鴻章在天津相識並在此後有過多次接觸。由卞元圭承擔建立中韓兩國新型外交關係任務，朝鮮國王顯然考慮到李鴻章在中朝與中俄關係上的特殊影響力，以便借用清政府力量影響俄國，並以中俄合力來牽制日本。」⁶⁰從陳尚勝的論述可以看見，過去只是作為譯官的卞元圭，在外交事件上有主導角色，亦考慮到譯官在中國的人際關係。而最終朝廷就《中朝商民陸貿易章程》的協調或 1883 年派出駐津大員時，亦派遣卞元圭陪同就任。⁶¹

談清單》，頁 34。

⁵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與朝鮮賫咨官卞元圭筆談清單〉，頁 34。

⁶⁰ 陳尚勝：〈徐壽朋與近代中韓關係轉型〉，《歷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57。

⁶¹ 金良洙：〈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の 政治外交：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頁 339-341。

1883 年，朝鮮派員赴津就任駐使，其實在朝鮮或東亞史之中有重要的意義。⁶²朝鮮從朝貢藩屬體制，走向當時國際認可的對等、協商形式的外交模式。在這種形式的轉變中，朝鮮試圖從過去「人臣無外交」蛻變過來，為著朝鮮社會及外交上的利益。而據陳紅民的研究，李鴻章專責處理中朝問題之上，清朝仍堅持著中朝之間保持著藩屬朝貢關係，文書之間保持原有的形式與禮儀。而派遣使節期間，亦希望朝鮮能夠以中國欽差先行。⁶³這些問題其實在朝鮮社會之中帶來了很多的不便，特別 1880 年代以後，朝鮮各級大臣試圖在對外關係上，從清朝手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權，於是朝廷把這種外交的爭取與周旋重責，再次放在卞元圭手上。

1891 年，卞元圭與李鴻章見面，試圖改變三端的要求。⁶⁴三端者，據陳紅民、林亨芬等人所引的一段「三端」原則：「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再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自不拘定；一遇有朝會公宴酬酌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之後；一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此皆屬邦分內應行之體制，與各國無干，各國不能過問。」⁶⁵三端者實即朝鮮派使出國時，應注意的禮節。⁶⁶而中方在此仍

⁶² 1882 年清與朝鮮鑑於壬午軍亂以後，希望強化中朝兩國間的宗藩關係，特別是希望藉此與日本勢力作周旋，故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據此章程之中，清朝北洋大臣將派商務委員到已開口岸照顧中國商民，而朝鮮亦應派駐大員到天津及其他成員到已開口岸，以平行相待的方式往來。因此，1883 年以後，朝鮮便。關於此，詳參廖敏淑：〈西力東漸前後的中朝關係：兼論〈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李宇平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 年），頁 29-106。

⁶³ 詳參陳紅民：〈晚清外交的另一種困境：以 1887 年朝鮮遣使事件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119-131。

⁶⁴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頁 223。

⁶⁵ 《清光緒朝中日交渉史料》（永和：文海出版社，1963 年），上冊，卷 10，第 578 號文書，頁 202-203。

堅持過去的禮儀秩序，即朝鮮使臣必須隨中國使臣之後，甚至重要大事都必須得到欽差核准。對於試圖改變朝鮮外交命運的知識份子卻對此制事件之初，李鴻章表現得相當強硬，但清朝意識到在清朝與朝鮮之間，維繫的是上國的尊嚴，而他卻派出羅豐祿、潘志俊等人與卞元圭再談朝鮮修改「三端」的事情。最終在交涉的過程中，卞元圭在清朝所認同及支持的立場上，為朝鮮取得所滿足的周旋目的。

縱使有學者認為卞元圭欠缺漢語的溝通能力，需以筆談與李鴻章交談，⁶⁷但是卞元圭作為譯官身份而擔任資咨官，他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消息傳達者或是情報收集者，而是在 19 世紀東亞變局中，他被朝鮮朝廷委任，擔當朝鮮對外事務的執行者。他的職責與身份因此而有很大的轉變，朝廷亦重視他們周旋的能力，安排他與當時專門負責戎務與外務的李鴻章交談。⁶⁸而朝廷亦在 1882 年朝鮮便仿效當時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統理機務衙門」專責外事的部門。而⁶⁹卞元圭在 1883 年與趙秉弼、金玉均、李祖淵等獲委任擔任交涉通商事務參議的工作。由此可見，因應東亞的政局，朝鮮日漸起用各種諸如漢語譯官等中人，擔當各種外交事務，為朝鮮在外務上取得更多合理的權益。⁷⁰基本上，從上述的例子之中來看，卞元

⁶⁶ 三端的起因，來自朝鮮需派出朴定陽（1841-1904 年）出使美國而引起的。關於此，詳參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頁 170-225。

⁶⁷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 129。

⁶⁸ 據李容肅所指出，譯官群體及朝鮮朝廷均知道李鴻章為當時的對外事務的主管。關於此，詳參〈冬至兼謝恩行首譯李容肅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 二〉（光緒 4 年 4 月 5 日）。

⁶⁹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之變通〉，氏著：《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頁 150。

⁷⁰ 《朝鮮王朝實錄》中記載，《江華島條約》後，朝鮮需派出修信使前行日本，漢語譯官李容肅亦擔任使行的譯官，並撰寫了修信見聞事件，詳參〈修信行別遣首譯李容肅聞見事件〉，《同文彙考》，附編，〈信行別單 一〉。

圭在 19 世紀已經以譯官的身份前往北京，但不再只是協助使臣處理各種外交事宜，而是在外交問題上，走在外交的最前線代表朝鮮，為著國家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官員面對面的交涉，以求得到最有利的成果。

五、 吳慶錫與開化改革的倡議

19 世紀朝鮮史在學界的研究中，很多時候都被學者以「開化」的名詞把各種材料連結起來，以解釋朝鮮晚期的士大夫或者知識份子如何嘗試力挽狂瀾，改變朝鮮社會的面貌。開化一詞原自於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最早的字句來源為「文明開化」，是著名的社會改革與思想家福沢諭吉（1835-1901 年）所提出的。他在《文明論之概略》中，提出通過學習西洋文明的由來，並比較日本與西洋之分別，並指出文明所指的是包括從工商企業、科學技術甚至文學智慧等，凡為人類社會的物質與精神財富應被包含在內。⁷¹而文明開化所指的，亦即日本應從人類社會各方面的物質與精神價值改變，以達到一種進步的社會標準與狀態。⁷²朝鮮社會隨著 1876 年簽訂《江華島條約》後，並且在 1882 年統理機務衙門的成立後，分別在通商與朝貢的過程中，從中國與日本了解當時各地社會的變化。而部份朝鮮知識份子受到兩地之間的變革所影響，⁷³於是便主張在朝鮮社會中推行各方面的現代化變革，而這些知識份子大多被定義為開化派。

⁷¹ 福沢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文庫，1993 年）。

⁷² 詳參高橋弘通：《福沢諭吉の思想と現代》（福沢諭吉的思想與現代）（福岡：海鳥社，1997 年）；並參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⁷³ 王恩美以開化與西勢東漸的背景之中，探討朝鮮知識階層對西方文明以及基督新教信仰的接受轉變，詳參王恩美：〈朝鮮知識階層「文明觀」的轉變與對「基督新教」信仰的接受——以《皇城新聞》與「皇城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心的討論〉，《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 59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63-94。

開化派深信朝鮮通過開國以後，從社會各方面推行現代化變革，並經歷文明化、西洋化及富國強兵等步驟，從而實現「全民開化」的精神，⁷⁴其改革精神與明治維新的構想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然而，朝鮮除了面對如丙寅洋擾、⁷⁵辛未洋擾等外力問題，⁷⁶而朝鮮朝廷亦在大院君強烈抗衡及維持封國的策略之下，延誤了開化派的主張。而開化派亦受到大院君的抵制，國內都因黨爭而產生了各方主張與階層之間的互相不信任與衝突。⁷⁷學者歸納出，他們認為開化派相信朝鮮需向外吸取新知識，從新知識之中改變朝鮮的社會現況。這些新知識的來源，實際是由朝鮮性理學蛻變而成的實學及北學為主導的思考模式，其中又以金正喜之實學思想最值得關注，因為其思想實際上影響了不少譯官，包括吳慶錫等人，對開化思想的倡議。⁷⁸

前數章中提到洪大容的燕行及北學思想受到金元行及其洛派思想下提倡的人物性無差異的觀念下，驅使他認為有必要放棄自明末清初建立起來的華夷之別，並倡導不同的人的本性是一樣，沒有善惡之分。故清朝管治下的中國人以及域外人與朝鮮的朝鮮人，本性仍是一樣。因此，洪大容相信人物為一致，而且華夷也應為一也。而華夷一也對 18 世紀末，19 世紀

⁷⁴ 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頁 267-268。

⁷⁵ Kim Yong-kii, *The Five Years' Crisis, 1866-1871: Korea in the Maelstro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ncheon: Circle, 2001), 20-22; 並參李基白著，厲帆、厲以平譯：《韓國史新論》，頁 275。

⁷⁶ 辛未洋擾的背景則是來自 1866 年一艘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駛近朝鮮後，被朝鮮官民於大同江附近燒毀的事件，而美國在 1871 年為了追關於此，詳參伊周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1-12；並參李永春：〈試論大院君時期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丙寅洋擾」、「辛未洋擾」及朝鮮的對應為中心〉，《當代韓國》，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63-75。

⁷⁷ 李基白著，厲帆、厲以平譯：《韓國史新論》，頁 278。

⁷⁸ 姜在彥：《朝鮮の開化思想》，頁 115。

初的朝鮮文人影響甚深，使到當時很多人深信燕行為他們理解社會改良辦法或是吸取新文化及知識的最佳方法。⁷⁹故此，如朴趾源、朴齊家和金正喜等，便隨著洪大容的步伐，透過燕行去了解世界。朝鮮人從學術思想得以解放，不少人日漸接受外來文化，特別是對於各種科學及實用新知尤為重視，從而改善社會及經濟的變革。⁸⁰而這種被稱為「北學」的思想，實際上是嘗試改變過去性理學治國的問題，而是強調經世致用的精神。⁸¹因此范永聰指出金正喜的想法，如何使朝鮮產生開化思想，提出了精闢的意見：

在思想上，金正喜最突出的是提出「禮為聖學」的想法。他認為「禮」是「聖學」的主體，而絕非「理」。由此可見，金氏否定「理」在傳統儒家學說中絕對崇高地位；他認同儒學是「聖學」，但不認同作為朝鮮王朝立國指導思想的「性理學」完全等同儒學。在金正喜的心目中，只有《論語》中所強調的「禮」，才是「聖學」的最重要本體。這種思想充分展現了 19 世紀韓國實學的批判性特質，它敢於向主宰朝鮮王朝政治文化數百年的性理學提出控訴；也揭示了實學知識份子在接受西學的洗禮後，嘗試對僵化、空疏的舊學問發動革命的實況。由此觀之，於 19 世紀末出現、以力陳改革

⁷⁹ 姜在彥：《朝鮮の開化思想》，頁 80-85。

⁸⁰ 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頁 273-277。

⁸¹ 所謂「經世致用」，引用 William Rowe 的說法：「從宋代以來，理學思想中一直強調『治術』，此日益增長的自我意識傳統通常被稱為『經世』，這個詞在英文習慣翻譯為 statecraft（治國之道），但如果逐字翻譯應該是 ordering the world（治理世界），如此翻譯才能跳脫『國家』的概念，並且捕捉住追求治理秩序，同時也追求宇宙秩序的精神。」詳參羅威廉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65。

重要性為主調的開化思潮，與實學思想之間，可說甚有關聯。⁸²

范永聰所指的「禮為聖學」是金正喜的重要學術思想，金正喜在〈禮堂說〉一文中，指出

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⁸³

金正喜文中批判性理學失卻了儒家原來聖人精神，金氏認為從書籍和禮儀之中，才可體現聖人之學，故提出聖學禮也的想法。而金氏此想法使朝鮮文人從華夷觀之中釋放，改變了性理學所形成的華夷身份的認同與立場，

⁸² 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頁 277。

⁸³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1，〈禮堂說〉，頁 24a-b

使朝鮮願意放棄傳統的性理學爭論，而接受各種新文化的原點。由湖洛之爭到華夷一也，又由「華夷一也」開出北學，並建構了金正喜對於外來思想重視及支持，並特別是聯繫了「華夷一也」與「開化思想」之間緊密的關係。即從先進思想與制度學習，應放棄傳統竹的華夷觀念，不只是單純的歧視清朝為胡人之華夷觀念，更重要的是強調朝鮮的正統性及民族自主的傳統，⁸⁴無需要拘泥於傳統的朝貢體制，或是華夷秩序，向好一方發展。由此可見，開化思想的形成與整個性理學的蛻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其實值得補充的一點是，譯官吳慶錫的老師，就是金正喜。在《阮堂全集》中，可見兩師生曾就詩詞字句、金石古碑問題等問題交流，金正喜更曾在書文中提到：「近日綠陰滿眼，村日如年，甚思君不已。」⁸⁵從這些書信往來的經歷中，可見金正喜視吳慶錫為重要的學生之一。

最早研究吳慶錫的學者慎鏞廈指出吳慶錫是開化思想的鼻祖，也是整個開化思想最早的提倡者。⁸⁶而他成為譯官是推動開化思想的關鍵，或應該這樣說，他成為了一位慢慢提倡開化思想的人，與其譯官背景及身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亦即是說與他家中背景有關係。吳慶錫家門為海州吳氏，其八世祖吳志恆（生卒不詳）開始，直到其父吳膺賢（1810-1877 年）皆為譯官，而海州吳氏實為中人家庭，其世代都以譯科或相關中人職位，朝鮮社會之中，有明確的身份秩序，非兩班人士，不能參與文科考試，作為世代均為技術官僚的家族，即中人，只可以參與雜科考試。因此，吳慶錫在

⁸⁴ 姜在彥：《朝鮮の開化思想》，頁 80-85；並參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頁 278-279。

⁸⁵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4，〈與吳生[四]〉，頁 37b-38a。

⁸⁶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07。

1846 年，取得了當年的漢學譯科合格，是當時的一等三名、二等七名、三等九名以外的其餘十九位及格譯官。⁸⁷當時，吳慶錫被任命為司譯院的漢學習讀官，開始其擔任漢語譯官的生活。⁸⁸

與其他章節提及的其他譯官一樣，吳慶錫獲得不少機會前往北京。吳慶錫第一次前往北京的機會是在 1853 年 4 月，當時他跟隨由正使姜時永（1788 年-？）、副使李謙在（1800 年-？）及書狀官趙雲卿（1800 年-？）率領之使團前往的燕行行程，前往北京，及後在 1855-1875 年期間，先後共 13 次擔任各次的燕行活動及其個人的工作，⁸⁹前往北京，擔當譯官或執行執務，慎鏞廈通過《朝鮮王朝實錄》、《燕京書簡帖》、《吳慶錫·吳世昌年譜》等整理了其出使的時間列表：

次數	年度	正使、副使、書狀官名（依次）
1	1853 年 4 月-1854 年 3 月	姜時永、李謙在、趙雲卿
2	1855 年 10 月-1856 年 3 月	趙得林、俞章煥、姜長煥
3	1856 年 10 月-1857 年 3 月	徐載淳、任百經、李容佐
4	1857 年 10 月-1858 年 3 月	慶平君李皓、任百秀、金昌秀
5	1860 年 10 月-1861 年 3 月	申錫愚、徐衡淳、趙雲周
6	1862 年 10 月-1863 年 4 月	李宜翼、朴永輔、李在聞
7	1863 年 10 月-1864 年 3 月	趙然昌、閔泳緯、尹顯岐
8	1866 年 5 月-1866 年 10 月	柳厚祚、徐堂輔、洪淳學
9	1868 年閏 4 月-1868 年 8 月	賁咨官
10	1869 年 8 月-1869 年 12 月	李承輔（正）

⁸⁷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卷 2，道光丙午式年條，頁 37b。

⁸⁸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15。

⁸⁹ 慎鏞廈：〈개화사상의 형성과 동학의 창도〉（開化思想的形成與東學的倡導），載國史編纂委員會編：《한국사》（韓國史），第 37 輯（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2002 年），頁 96。

11	1872 年 7 月-1872 年 12 月	朴珪壽、成彝鎬、姜文馨
12	1873 年 10 月-1874 年 3 月	鄭健朗、洪遠植、李鎬翼
13	1874 年 10 月-1875 年 3 月	李會正、沈履澤、李建昌

圖表 16 吳慶錫出使列表⁹⁰

從上表可見，作為譯官可以有豐富的北京使行機會，這遠較擔任使行正使、副使等人的機會為多。表中可見，除了擔當使行譯官以外，吳慶錫還多次因各種任務，擔當賚咨官，前往中國。例如高宗 3 年（1866 年，同治 5 年），就報當時朝鮮半島發現洋船情形，而前往北京。⁹¹又高宗 5 年（1868 年，同治 7 年）閏四月，再就「報洋夷情形」進行賚咨行，前往北京。⁹²譯官往來中國的機會較一般官員為多，與中國知識份子及各階層碰面機會亦自然較多。而由於他懂得漢語的關係，加上他對書畫與金石文有濃厚興趣，⁹³以致他在多次往返中國的機會之下，讓他能夠在北京，結交了不少當時的名流，成為了中朝之間的韓中交流的代表。⁹⁴而當時與他交流之人物，大多是當時的名家，而且不少都是書籍家或是文人，擁有豐富的文化及文學根基，例如陶彥壽（生卒不詳）、范維卿（生卒不詳）、符保森（生卒不詳）

⁹⁰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32-133。

⁹¹ 〈謝恩兼冬至行首譯吳慶錫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 二〉（同治 13 年 3 月 30 日），頁 83b。

⁹² 〈謝恩兼冬至行首譯吳慶錫聞見事件〉，《同文彙考》，補編續，〈使臣別單 二〉（同治 13 年 3 月 30 日），頁 84a。

⁹³ 金正喜曾與他探討原州興法寺的古碑殘字本：「菊天且暮，但覺頭上跳丸之飛騰，即承來槭，攬時感物。美人遲暮之思，安得不黯消。古碑只有此原州興法寺半折殘字一本，是集唐太宗書，中國之所傳者皆在此，如覃溪、曉嵐諸人，無不寶重者耳。息慎石磐，頃為李君收去，苦無遺儲，斷不於君秘惜也。來紙與舊囑紙簞，姑未究竟，第當收拾神思。趁萬里囊中，一試之耳。從近一面甚企，都留不宣。」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4，〈與吳生[二]〉，頁 37b

⁹⁴ 關於此，李文豪的博士論文，通過未被學界曾採用的「中土簡牘帖」作為研究的文獻，來探討吳慶錫與中國友人之間的往來，以說明當時他在北京的活動情況。關於此，詳參李文豪：《吳慶錫의 韓中 交流 研究：『中土簡牘帖』을 中心으로》，頁 38-129。

就是書畫家，其中范維卿更是書籍商，⁹⁵讓吳慶錫購得重要的書籍，這些名家是不容忽視的。而吳慶錫亦從這些文人之中，取得了大量的書籍，和他倡議開化思想，有一定的關係。

除了一般在書畫交流的文人外，值得一記的是，吳慶錫所交往的都是當時朝廷的官員，是中國朝廷有決策地位的官員，也是他交際之友人之一，例如內閣中書孔子的 73 代孫孔憲彝（生卒不詳）以及禮部尚書萬青藜（1821-1883 年）等，⁹⁶甚至當時洋務運動主要的倡導者張之洞（1837-1909 年）也曾和吳慶錫有交談。⁹⁷由此可見，吳慶錫在北京期間，其活動層面頗廣，除了滿足其個人興趣與文學層面外，吳慶錫也有機會與當時重要的中國官員領導層見面，從中展開不同面向的深度交流，就著國家、外交等問題相談。

所以，當吳慶錫在中國進行各種任命時，他利用了使行的機會，和中國士人接觸，而這些接觸對於吳慶錫的開化思想形成有很大的作用。雖然朝鮮社會裡北學及實學思想漸漸形成，亦鼓勵了當時的各階層知識份子對於外來文化及知識接觸，但是實際上如何開化，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不得不從中國方面所學習及獲得相關的知識與情報。而由於吳慶錫的身份是朝鮮漢語譯官，角色的方便讓他可往返北京多次，而他在北京活動的範圍

⁹⁵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34。

⁹⁶ 其中萬青藜對於中朝之間當時的情報傳播以及清廷對於朝鮮的關心有一定的貢獻，在 1866 年時，當時萬氏得知法國人準備從中國前往朝鮮半島該處，希望處理丙寅邪獄的問題，時任禮部尚書的萬氏，就向當時柳厚祚率領的燕行使團通報，使朝鮮使臣及時向當時朝廷作出提醒，在法國軍隊進攻江華島時作出對應。關於此，詳參羅樂然：〈作為媒介的燕行使：柳厚祚 1866 年的燕行與朝鮮開港前的東北亞資訊認知〉，頁 407-408。

⁹⁷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41。

亦相當大，他所前往的地方也相當自由，如書店、飯店、琉璃廠等，⁹⁸接觸的人層面相當廣泛，故他所獲得的書籍之廣亦相當之多，學者慎鏞廈的研究之中，以列表指出吳慶錫從中國所獲得書籍，包括了：魏源（1794-1857年）的《海國圖志》、徐繼畲（1795-1873年）的：《瀛寰志略》，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年）所撰的《博物新編》、姚滌山（生卒不詳）：《粵匪紀略》、何秋濤（1824-1862年）的《北徼彙編》、佚名所著的《揚水機製造法》、《地理問答》等等不同種類值得注意的是參與第一次向外交流使團的斌椿的《海國勝遊草》和《天外歸帆草》，以及《中西見聞錄》等書籍。⁹⁹

其中，《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兩本對於當時無論是中國還是朝鮮的知識份子的傳統世界觀來說是一大衝擊，¹⁰⁰兩書均對傳統的華夷秩序的思考帶來不同樣的觀點，儘管兩書的撰寫態度及觀點還是以原來華人自身的角度出發，去了解世界的形成，但是，當中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呈現著「師夷之長技以制夷」，¹⁰¹這一種向外學習，特別是向當時他們稱之為夷人的西洋人學習，這一種思考對於當時的知識界來說，是一種進步，而吳慶錫帶著這一本書返回朝鮮半島，連同其相當的思考，便形成了當時要求朝鮮放棄鎖國政策，提倡開國的思想。這一種想法，與《海國圖志》所

⁹⁸ 李文豪的論文對於吳慶錫與中國知識份子交流之地點，也作出了相關考察，詳參李文豪：《吳慶錫의 韓中 交流 研究：『中士簡牘帖』을 中心으로》，頁 110-129。

⁹⁹ 慎鏞廈：〈개화사상의 형성과 동학의 창도〉，頁 99-100。

¹⁰⁰ 李紀祥：〈輿圖史與接受史中的海國與大地—清季世界新圖之分型〉，《輔仁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9 年 1 月），頁 27-94；並參彭明輝：〈外國史地引介與晚清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0 年 5 月），頁 197-228。

¹⁰¹ 魏源：《海國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籌海篇一・議守上〉，頁 1b。

提倡的是一脈相承。

在吳慶錫的著作之中，¹⁰²其實有不少經已散失，故部份資料只可以透過其兒子吳世昌（1864 年-？）的轉載，¹⁰³將吳慶錫的知識及想法，重新揭櫫，但從這些散落的材料，各種資料的補充之中，可以看見吳慶錫如何是第一人，對於開港持開放態度，亦鼓勵朝鮮應參考當時清廷的洋務運動進行改革，雖然作為中人，其思想無法最終讓完全朝鮮朝廷採用，但至少在知識界之中，作出了種種衝擊，讓日後的朝鮮社會對於開化及如何開化，作出了不少爭論，這種結果，與吳慶錫的工作相關。

1866 年，吳慶錫擔任柳厚祚擔任正使的使團譯官，¹⁰⁴亦在使團以後再擔任資咨官，協助朝廷收集關於法國的情報。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吳慶錫撰寫的《洋擾記錄》中，可留意到當時吳慶錫洋擾的記錄，除了從官方獲取一些洋擾情報外，更重要的是他當時採用了大量其中國友人的想法，意圖顯示外交活動的必要以及西洋艦隊對當時朝鮮朝廷的威脅與影響。當時被紀錄於《洋擾記錄》的清人意見，包括張丙炎、王軒、吳懋林、劉培芬、萬青藜等，他們都在清朝朝廷佔有一地位。其中萬青藜的主張，指英

¹⁰² 其著作包括《三韓金石錄》、《三韓訪碑錄》、《天竹齋筭錄》、《隨意快讀》、《洋擾記錄》、《初祖菩提達大師說》等等，關於此，詳參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17-120。

¹⁰³ 其中《天竹齋筭錄》今天可看到的材料，實際也是因為見於其兒子吳世昌的《槿域書畫徵》之中。吳世昌的《槿域書畫徵》是韓國畫家與書法家的傳記記錄，故吳世昌的整理雖然為二手資料，仍然是值得參考的材料。關於此，詳參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18；並參 Sunpyo Hong, “O Sech’ ang’ s Compil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sa 槿域 書畫史 (History of Korea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ching 槿域 書畫徵 (Biographical records of Korean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trans. Jungsil Jenny Lee & Nathaniel Kingdom, *Archives of Asian Art* 63.2(2013): 155-163.

¹⁰⁴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33。

國與法國均視財利為主要的目的，除了俄羅斯深不可測外，¹⁰⁵其實應開放與西歐國家通商，並容許他們行文傳教，以避免產生正面衝突。萬氏的想法，其實亦可與當時柳厚祚文集中所提到「今貴國武備少弛，覓於講求，恐有不逮，愚意此事當先以理析之。朝鮮之法，向來如此，不自今始，今所殺洋人少而本地之人多，且止知為莠民，不知其為鄰國之教士也。自今以後，如有外人之入我本境傳教者，本國之法，但加於本國之民，鄰國之人，以禮遣之，絕不殺如此。相約於理甚足，而彼亦無可置辯，然後以其暇日，遂將練兵之自國之策，得數十年，即可自強矣，以為如何？」¹⁰⁶從兩種史料之間的對比，可以看到當時吳慶錫相當重視萬氏的想法，認同開港為有利於朝鮮的考慮。因此，慎鏞廈認為吳慶錫強調朝鮮應以自主張開化政策主動開國，以走近近代國家。然而，他以圖在 1871 年辛未洋擾時，再次提倡開港，可是時為執政的大院君繼續實行鎖國政策。而如此的鎖國政策使吳慶錫相當失望，但吳慶錫仍積極在外交事務中參與。1875 年日本利用「雲揚號事件」試圖打開朝鮮的港口。在此時朝鮮已經無法主動開港，而需如中國般採用被動的開港方式。因此，一些與日本交涉的事情再次由這些前線的譯官參與。其中，於 1876 年日本與朝鮮已決定簽署《江華島條約》，當時朝廷便委派了吳慶錫和倭學譯官玄昔運等專門負責問情，¹⁰⁷並接待日本的官員森山茂。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

¹⁰⁵ 關於燕行使對俄羅斯的認識，詳參三好千春：〈燕行使のロシア認識〉（燕行使的俄羅斯認識），《駿台史學》，第 96 號（1996 年 1 月），頁 117-144。

¹⁰⁶ 柳厚祚：《洛坡先生文集》（서울[首爾]：大譜社，1994 年），〈柳大人台啟：丙寅燕行時與禮部尚書萬青藜筆談〉，頁 1005。

¹⁰⁷ 問情的報告，詳參東北亞歷史財團編：《近代韓國外交文書》（서울[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 年），卷 3，《朝日修好條規》，頁 357-358。

江華留守趙秉式狀啓：「彼船通議次，發送訓導玄昔運、譯官吳慶錫于仁川地矣。回告內：『彼船已爲起煙上來，不得相接追及項山島留碇處，見森山茂，則彼言以爲：『日前聞仁川地方官所傳，則貴國大官來留江華云。明日下陸入城，接見留守，講定相見大官儀節。而貴國兵民，若或有暴舉，俺亦有自當道理』云』爲辭矣。在我初不先犯，而任他下陸，則臣之接見，奚暇更論？若當此境，職縻防禦，不勝惶恐」啓。

吳慶錫在擔任接待人員過程中，亦代表朝鮮與森山茂先後交涉與了解停泊江華島的安排以及日後的程序。而在條約簽署之後，吳慶錫曾與森山茂作深度的對話，從二人之間對話，可以看見吳慶錫對大院君的政策不太欣賞，以及他對朝鮮半島問題的看法：

茂 聞院君與其兄意向反對，議論相軋蓋真乎？

錫 誠然。

茂 何爲然乎？

錫 院君主戰，其兄與國王主和也。

茂 國王旣主和則百官有司從，王命固其所也。而和戰不決特派院君愛顧之大臣，以謀此次大事豈無疑乎？

錫 國王柔弱，院君剛愎。故百官皆不能明言和議。

茂 聞李公卽爲領議政，而非統理國家之器如何？

錫 所以不能主意也，雖然院君今不得如前秉權。

茂 目今和事不成，戰端旣開，則兩黨所爲如何？

錫 皆無定算，各爭口舌而已。兵亦不多，又無紀律。

茂 僕向相遭仁川府防禦使尹暎人，此人頗憂方今之形行，
先生知此爲人乎？

錫 此人表裡不同，向與先生所言之事，已達朝廷，欲爲阻
塞計此，是院君舊親人也。

茂 與僕相遭，唯言志耳。而以相遭之故，爲阻塞之計，不
可解也。

錫 以先生之言，粉飾添詞以誣之也，朝廷皆信之，而小生
獨知其意耳。

茂 僕欲得貴國京城之地圖書久矣，而未能得之也，冀先生
給之。

錫 京城無圖，只有今八道全圖。然耳目煩多，今不敢奉納
悚々。

茂 問京城及八道戶數人口幾千乎？

錫 京城人口無的確數，又況八道乎？非僕不詳知也，朝廷
亦不知。是以可歎見此，則國規可以諒悉。

茂 不能知其詳細面然，只以大約所目示之如何？

錫 現多逃散無幾千人，兵則老弱合不過數千人耳，仁川狼
兵千餘云。

茂 八道人口大約幾千乎？

錫 屢十萬人

茂 恐可不過一千萬口也

錫 誠然，此時事或不成一朝。院君復得正權必大動干戈，
多殺生靈，豈不極可悶乎？望須今般竣事，切勿空返，

以救我八道人民。¹⁰⁸

從上述的對話之中，可以看見吳慶錫對大院君的鎖國立場、舉動以及其所屬下的人員相當反感，他對大院君大動干戈表示反感，故希望通過外交方式，能夠為朝鮮打開國門，為朝鮮開化作出準備。在對話之中，吳慶錫多番強調朝鮮的軍備薄弱，可見他對開化的渴求極為明顯。可惜的是，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時的朝廷所認可，使他早在 1860 年代，轉移為在文化上倡議，作為開化思想者的主者人。

據古筠記念会所編的《金玉均傳》中所指，吳慶錫有感於往來中國期間，在中國的見聞以及列國的歷史與政治情況感到慨嘆，但無奈其改革無法得到改變，因此歸國與友人劉鴻基等閱讀他從中國所帶回來的各種新學書籍，從而開導一些當時抱有改革信念的知識份子，這些人大多的都是居住於北村的上流階級兩班子弟，以圖通過教育為朝鮮社會帶來改革的希望。¹⁰⁹而據慎鏞廈所指，當時一些的兩班弟子，包括了金玉均，¹¹⁰都受到吳慶錫的影響。而金玉均實際上就是 1884 年發動由日本背後支持的甲申政變的主張者，雖然其政變試圖清除朝鮮的保守派，但袁世凱的介入，使金玉均的改革想法不能得以落實。¹¹¹縱使他被一些學者認為「親日派」，但金玉均

¹⁰⁸ 東北亞歷史財團編：《近代韓國外交文書》，卷 3，《朝日修好條規》，〈與吳慶錫筆談〉，頁 433-434。

¹⁰⁹ 林毅陸編：《金玉均傳》（東京：慶應出版社，1944 年），頁 49-50。

¹¹⁰ 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43。

¹¹¹ 1884 年朝鮮較激進的改革者，如金玉均與朴泳孝（1861-1939 年）等開化派試圖聯繫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1842-1917 年）密議政變，並發兵要脅朝鮮高宗，要求朝鮮擺脫清朝獨立。保守勢力邀請駐軍朝鮮的袁世凱出兵阻止政變，竹添進一郎事敗自焚使館。日本藉此派出軍艦到朝鮮與中國交涉，兩者最終在天津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雙方派兵需要互相通知，此引發了東學黨之亂爆發時，雙方均派兵而衍生甲午戰爭的導火線。

的主張反映，當時一些開化黨的朝鮮知識份子希望透過社會改革，特別是體制上的改革，使朝鮮走向富國強兵之路，而他的路向採取的是參考日本明治維新的方式。¹¹²而他強烈渴求朝鮮走上開化之路的原因，幾可肯定的是，受當時吳慶錫等人的主張所影響的。

因此，吳慶錫作為譯官，他的角色與身份不再單純為朝鮮朝廷或使行成員協助他們認識中國的社會或世界其他國家，而是通過他譯官的身份，掌握到的知識，希望得以轉化到國家的社會與外交政策之上。¹¹³雖然礙於黨爭及其文化身份的問題，其主張得不到當時大院君的認同，因此他逐漸轉為開化思想的倡導者及教育家。可見，譯官角色因應在 19 世紀的東亞局勢，已不再只單純履行其職責之下的禮儀或翻譯的工作，而是作為外交官。

六、 小結

1894 年朝鮮半島爆發東學黨之亂，以征討日寇為由，引起全國起義。¹¹⁴朝鮮高宗立刻聯繫北京，希望藉清軍平定叛亂。而因《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雙方派軍時，需互相通知，故日本亦因而派軍到朝鮮半島。然而，日本抗絕要求，希望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日軍甚至囚禁高宗，以圖迫令朝鮮接受日本的內政改革建議。李鴻章意識到事態嚴重，便急速派軍，

關於此，詳參 Yong-ho Ch'oe, "The Kapsin Coup of 1884: A Reassessment," *Korean Studies* 6(1982): 105-124.

¹¹² 權赫秀：〈近代朝鮮開化派金玉均的日本觀及其東亞史意義〉，《日本研究》，2012 年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96-103。

¹¹³ 金開元：〈초기 개화파의 대외 인식〉（初期開化派的對外認識——以吳慶錫為中心），《釜山史學》，第 17 輯（1993 年 6 月），頁 467-497。

¹¹⁴ Choon Sung Kim, "Donghak: Towards Life and Spirituality," *Korea Journal* 42:4 (2002): 158-186.

其中租借英商的運兵船高陞號被日艦擊沉，最終引發清朝在 1894 年 7 月初一，正式對日發表宣戰詔書，並派出北洋水軍、以及劉坤一所率的各支東北各地、淮軍、湘軍各營等所組成的陸軍支援是次戰爭。¹¹⁵

然而，這場在中國歷史中，被視為見證洋務運動成效的甲午戰爭，反映自 1860 年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嘗試最終隨著黃海海戰等重要戰役中慘敗，並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被迫便結束中國的朝貢活動，並廢止各種朝鮮與清朝過去的朝貢、禮儀以及各種相關的活動形式。朝鮮在這場戰役之後，必須從清廷之中擺脫朝貢國的形象，而踏上獨立之路。朝鮮宮廷與朝廷，在戰後大臣與知識份子一直在親日開化黨、親中事大黨以及甚至是親俄派之間等立場搖擺，高宗更甚至在明成皇后被日人暗殺後，日人勢力日漸強大的背景下，逃往俄國駐朝鮮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¹¹⁶日本受制俄羅斯的干預，對朝鮮的控制稍為緩和。而在俄人支持與保護下，加上獨立協會在輿論上鼓動國民，1897 年朝鮮高宗宣佈將朝鮮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被視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將年號改為「光武」。¹¹⁷

連同 1894 年甲午更張廢除一府六曹制，¹¹⁸到金弘集（1842-1896 年）與朴泳孝起草的 1895 年的洪範 14 條，¹¹⁹抑或是到大韓帝國的成立，可以

¹¹⁵ 麥勁生：〈海上大戰——甲午戰敗〉，氏編：《中國史上的著名戰役》（香港：天地圖書，2012 年），頁 166-167

¹¹⁶ 詳參潘曉偉：〈略論 1895—1898 年俄日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博弈〉，《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7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88-92；尤淑君：〈甲午戰爭後的中朝關係〉，《山東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26-35。

¹¹⁷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年）。

¹¹⁸ 柳永益：《甲午更張研究》（서울[首爾]：一潮閣，1990 年），178-222。

¹¹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高宗實錄》，高宗 31 年 12 月甲寅，頁 69b。

看見朝鮮尋求外交甚至主權獨立的過程之中，朝鮮內外的社會政局或國際形勢，驅使到朝鮮放棄原有通過儒學以及朝貢禮儀所維繫的社會秩序與管治方式。這種社會格局之上的轉變，也逐漸使到屬於傳統朝貢體系產物的朝鮮譯官，日漸不再需要履行原來的職責，不再負責翻譯，而當時相對於西歐語言或日語，漢語變得並非重要。譯官亦不再失去了原來的角色，換來的就像吳慶錫的兒子吳世昌，以大學語言老師、記者、畫家、外交家或是革命家的身份，被歷史書寫所記述。¹²⁰反而，他的譯官身份卻早被世界所遺忘。直到日治時期的學者以及戰後的韓國學人為了各種政治及社會需要，以學術的眼光，探索朝鮮的譯學史、譯官們的教材以及譯官在歷史中的身份，譯官便因此由一些對歷史產生時代意義的人物，轉變為被用作探討過去的群體。

¹²⁰ Sunpyo Hong, “O Sech’ ang’ s Compil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sa 槿域書畫史 (History of Korea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ching 槿域書畫徵 (Biographical records of Korean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155-157.

第八章

結論——朝鮮譯官與東亞世界網絡

從丙子胡亂至甲午戰爭，清朝與朝鮮之間的關係起伏，不但是兩國的國別史之中重要的課題，¹也是東亞關係史中近年熱門的學術議題。而本文以兩地的關係歷史變化的過程中的各種歷史事件進行考察，特別了解朝鮮譯官的群體形成過程以及他們的身份，特別關注他們在禮儀、翻譯以及文化活動的介入，從中重塑了朝鮮譯官在歷史書寫記載的形象。除了譯商或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外，本文旨在探討朝鮮譯官作為中國與朝鮮兩方不同層面互相了解的媒介。而漢語譯官群體的身份，使大家互相認識的角度，與過去較重視的士大夫群體的筆談所看到的話題有所不同。朝鮮譯官因工作關係，他們認識的都是一些平民大眾，或是一些中下層官員，故他們藉此而看到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與士大夫所建構的中國社會不盡相同。

與此同時，他們在朝鮮的社會身份不及兩班貴族，只是被視為中人技術官僚，故當清人與朝鮮譯官交談過程中，他們所看到的就是朝鮮譯官情感或經歷之中所塑造的朝鮮社會的各種現象與環境。因此，本文通過整理各種不同朝鮮文人的紀錄、清人的文獻或是譯官的各種報告、書寫以及詩

¹ 韓國學的研究，白永瑞提出了重要的特點：「正如主張主體性和實踐性的朝鮮學運動根源於民族主義，韓國學與民族主義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其實可以看見如中國史的書寫一般，韓國學研究畢竟受制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觀察。雖然白永瑞指出韓國學者以嘗試以『開放的民族主義』的視角，試圖重構韓國學，但是沒有得到具體確定，韓國學亦有回到民族主義框架的危險。關於此，詳參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臺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258-260。另關於韓國歷史書寫情況，詳參 Henry Em,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Modern Korea,”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5, ed. by D. R. Woo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59-677.

文，看到相關的文化意象。而在 19 世紀隨著局勢的轉變，原來的制度不再容許譯官的角色，而他們逐漸轉向其他身份，在不同範疇之中，在近代歷史的不同場景之中遊走。

回顧全文的論述，第一章的〈緒論〉和第二章〈服事天朝〉交代整個研究的方向與歷史背景，了解漢語譯官在歷史舞台的研究價值，當中希望能有完整的歷史脈絡；第三章〈因譯以達〉通過朝鮮漢語譯官在明清易代的社會需求轉變，從而重新探討培訓制度及歷史，並通過翻譯規範的概念，了解譯官的語言與禮儀的學習與朝鮮當時的社會與事大政策相關，藉此說明譯官在肩負朝廷對文化、外交及翻譯的各種期盼；第四章〈善為周旋〉則從不同種類的史料之中，說明譯官在翻譯、禮儀及職責不同面向的活動中，藉此闡析漢語譯官一般執行的工作，其中包括的是就禮儀活動的周旋及安排的協調。而金指南、金慶門兩公子在白頭山的周旋可作為重要的例子來了解譯官如何為朝鮮的權益作出周旋，並取得合理的期望；第五章〈雖不目見〉在 18 世紀以來的譯官，像金慶門般，在使行的過程之中，如何引導以及形塑朝鮮士大夫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採用了 Pierre Nora 的 *Lieux de mémoire* 構想，觀察譯官如何把燕行使途經的地點作為勾起晚明史及明亡歷史的記憶回想的對象，而李正臣在不同場合之中，得到了譯官的幫忙構築在學術、華夷觀以外的中國社會的認知；第六章〈藕船雅正〉以李尚迪的經歷為個案，探討清人與李尚迪之間如何建構的社會網絡，如何促成彼此之間的文學及文化交流，而金正喜所贈的《歲寒圖》，李尚迪如何穿連清人與金正喜，使清人亦可與金正喜感同身受，體會到朝鮮的社會；第七章〈前古未行〉顧名思義指譯官在 19 世紀以後隨著時代的變化，他們的工作

不再只是限於權益的周旋，轉移為作為與外界交涉、擔當前線的外交官，甚至是提出社會改革的倡議者。總括來說，本文在丙子胡亂至甲午戰爭之間的中朝關係的歷史脈絡之下，理解不同漢語譯官的職責，以說明譯官如何在周旋、交涉、翻譯等文化過程之中，為朝鮮社會主張或個人立場為中心，以求「達志」與「通欲」的目標。

白永瑞在探索韓國學在當代的歷史論述過程中，他提出將韓國學重構為「全球地域學」(Glocalogy)的，他所強調的即「既可以批判西方中心的普遍主義，又可以在注重韓國這一空間性的同時，不局限於特殊性，實現追求普遍性的學術之路。」²其實白氏所強調的是在全球普遍性及民族國家的特殊性之中取得互動的元素，也是當今學術研究之中的重要價值。而回顧整篇論文之中，通過對譯官群體的描寫與論述，可以看到在他們所穿連的東亞世界中，譯官如何在反映朝鮮社會的特殊性及爭取朝鮮的權益外，也藉著與中國官員、文人與民間互動之中，了解東亞的普遍性意識如何驅使他們作出某些回應。地域或在地的特殊性與東亞的普遍性，在譯官群體的活動中，得以綜合起來，而這亦是本文一直強調以東亞世界為中心的視野來處理朝鮮漢語譯官與中朝關係的背後目的，便是將東亞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能投射於譯官的論述之中。

而本文以東亞世界為中心，並重視的是譯官與中朝關係以及背後所建構的文化交流。歷史學家在 20 世紀，隨著與社會學、計量科學及人類學等新興學科的互動之下，學術視野及領域受到不同層面的衝擊，諸如社會史、

² 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頁 264。

微觀史學、心態史等課題在學術界開拓了學者對歷史材料重新解讀的視野。

「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思考影響下，³學者亦藉著西方的史學發展之中，通過中國的歷史現象以引證及討論。而 20 世紀末，隨之而興起的便是通過「語言」、「再現」、「論述」等方式，改變歷史學的過去視野，像 Roger Chartier 所說：「史學家們在閱讀文本或圖像時，不再直接將其視為資料性文獻，而是要就其所象徵的意義來了解各種個體行為或集體性的儀式。」⁴因此，本文以中朝關係為討論的中心，但背後希望觀察的是在漢語譯官所執行的任務以及爭取的權益中，背後如何了解譯官在不同的行動、儀式與過程之中，如何構築中國與朝鮮彼此的認知，擔當地之間的中介人。而這種的論述之中的再現，不但為東亞文化交流史帶來新的反思，也可形塑一些課題的新視野。

近代中國或東亞翻譯史之中，大多會從語言或文字之中的翻譯，特別是彼此之間文化有明顯差異的社會中，通過文本的對照、翻譯的策略以及各種因翻譯而產生的議題，例如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中英翻譯議題，彼此之間文化有各種差異，才可展開各種值得探討翻譯而產生的各種語言與文化議題。按翻譯史往常的論述，東亞以漢字為交流的中心，中國與朝鮮之間並無翻譯的必要，因筆談已可處理大部份的交流事項。然而，朝鮮的漢語譯官訓練過程中，不但只是一種語言的翻譯培訓，而是看到的是一種當時朝鮮社會期盼的禮儀、文化的培訓，故在語言以外，譯官也肩負禮儀與文化的責任。因此，翻譯史之中從「語言」轉向至「文化」，亦使翻譯的意涵

³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⁴ Roger Charit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頁 200。

從過去放置在文化有明顯差異的角度，轉為彼此接近的話題。而且，朝鮮派遣使團或譯官執行邊界公務時，除了筆談不便外，而且不少接觸的清人不一定能夠以文字與朝鮮使臣或譯官對話，而譯官的角色不限於翻譯，情報交換、禮儀執行以及外交周旋等，其實也存在譯官的角色之中，因此在整個交流過程之中，是有著不可被忽視的角色，而翻譯史的轉向提供了重要的想法。

另一方面，本文強調朝鮮漢語譯官在明清易代後角色在歷史書寫之中受到重視，亦可藉此說明譯官的活動可看到中朝之間的文化觀感轉移。自元朝以來，高麗朝已培訓熟習漢語的譯官作為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而元明易代以後，朝鮮因「事大政策」，而培訓各種譯官以處理各種職務，但實際均為一般協調的工作。直至丙子胡亂以後，譯官隨著士大夫階層受制於「小中意識所引起的排清意識和自尊意識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⁵他們被委以重任，作為朝鮮維繫事大禮儀及爭取權益的主要代表。如王元周指出直到 18 世紀末，像朴思浩（1784 年-？）、朴趾源等均批判使臣將行事務全部交由譯官處理的做法極為不恰當。⁶但他們兩人對問題的提出，實際正華夷觀所引起的意識，讓使臣依賴譯官已成明清易代以後的慣例，而朝鮮使臣或士大夫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被朝鮮譯官確認了對中國的認識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華夷觀、朝鮮的中國觀等課題無論在今天的中國明清史學界還是韓國朝鮮史學界都是仍相當熱門的題材，但大多均從士大夫的眼光出發，卻沒有意識到士大夫與譯官之間的互動中，了解華夷的想像。

⁵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 75-76。

⁶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 128-129。

因此，本文嘗試讓學界對中朝關係或東亞文化交流之中流行的課題提出了新的觀點以及新的材料應用。

西嶋定生提出儒學為四大元素之一，華夷意識本已是重要的東亞儒學課題。華夷意識特別在朝鮮、越南等儒者眼中已是他們的學問的重要組成部份。另一方面，朝貢制度的禮儀活動，亦應視為東亞世界的典型儒家思想於現實落實與執行的例子。而朝鮮王朝無論在朝貢文書、迎接體制還是出使禮儀，都有全面及完整的程序處理，可見朝鮮對禮儀活動的重視。⁷而本文亦指出朝鮮的譯官培訓過程，反映到譯官對儒家文化、帝國朝貢禮儀程序有豐富的知識，而譯官亦是執掌禮儀的負責人員。由此可見，朝鮮譯官的研究，同時也是東亞禮學的研究。譯官研究可用作了解東亞儒學思想的形成及落實，特別是儒家對社會與國家秩序實際操作的影響。

本文縱使嘗試收集各種史料來了解朝鮮漢語譯官的群體，但是礙於過去歷史論述的面向，有意與無意忽略作為中介人的譯官。因此，本文遺憾的是，譯官書寫的材料遍少，即使存有譯官本人的書寫，當中亦或帶有強烈的個人觀點，或是過於散略。因此筆者閱讀各種譯官們所寫的材料的時候，也特別注意他們與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雖然本文也視譯官群體為考察的對象，但畢竟亦配合與對比各種譯官的材料，仍能窺探譯官的活動軌跡。然而，未來研究可將隨著譯官各種自我書寫的材料作整理，從譯官的眼光重新摸索，他們的自我意識以及對身份的想像與認同，似乎可補充學界對朝鮮譯官的研究。

⁷ 金文植：《조선왕실의 외교의례》，頁 63-176。

本文就著朝鮮的漢語譯官的研究的脈絡，最終希望藉此課題回應東亞世界的知識與文化的構成過程。Ulrike Hillemann（烏爾里克·希里曼）在研究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延伸過程中，強調帝國下的一些外地群體，如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或一些自由的貿易者，如何組成一個英國的帝國網絡，使不同的資訊、想法在當時東南亞、倫敦或華南地區之間流傳，這種流傳的過程如何促成當時的英國在遠東地區的知識掌握，特別是英人對中國的理解的判斷。⁸Hillemann 採用了法國社會學家 Bruno Latour（布魯諾·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提供的想法，⁹指出社會或社會的解釋並非固定實體，而是不同的行動者通過網絡的聯繫的過程之中不斷變化而形成。換言之，以英國為例，英國在遠東的擴張或英帝國並非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通過帝國之內的行動者的網絡與聯繫所形成，Hillemann 說明英帝國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在帝國的網絡之中在不同脈絡之中形塑及重構。

如中朝關係下的朝鮮譯官放置在 Hillemann 的眼光中觀察，可發現雖然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或是整個中國傳統朝貢制度並不能與英帝國視之，但是從她的觀點，也許在本文的各個譯官的活動為例，可見清朝與朝鮮之間的互相認知，並非單純地視為自身角度的觀察，而是經過作為媒介的譯官的經歷、語言能力或是有意無意地的表達選擇，確立了對雙方的文化認同感。因此本文借用 Hillemann 的帝國網絡觀念轉借為東亞世界網絡，欲指出中國歷代朝貢制度，特別是以明清兩朝而引伸的各式文化交流活動：

⁸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1-15.

⁹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如朝鮮、琉球、越南派遣燕行使節、西歐或東南亞各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活動過程中，因應東亞世界構成：如漢字、儒學等元素的形塑，驅使網絡中不同行動者彼此間的聯繫，如本文中譯官如何論述三藩之亂改變朝鮮社會對明清易代的立場；李尚迪把金正喜的《歲寒圖》帶到中國，讓清人對朝鮮的身份問題與內部黨爭有更深刻的認識；卞元圭與吳慶錫如何利用自己的網絡與知識爭取朝鮮在外交的權益等。均可看見朝鮮漢語譯官作為東亞的文化交流的行動者，在文化互相聯繫的網絡中，在各種文化形構築兩地之間的各種認知以及文化觀感。

本文通過中朝關係的演變去了解譯官的活動與角色，建構出「東亞世界網絡」的想法。黃俊傑過去積極推動東亞文化交流史的構想中，提倡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應不再只是重視交流結果，進行範式轉移，關注交流的過程。他也特別提出在東亞文化研究之中，重視脈絡，而非單純對文本的解讀。他指出：「從東亞文化交流的經驗來看，文本或概念在異域的交流互動之中，都有其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甚至交流活動中的人物之言語也都有其特定之語境或『語脈』，因此，文化交流中互動雙方人物都應被視為歷史舞臺上的演員，而思想則應被視為『歷史事件』。文化交流史中的諸多事件也可以被視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正是從這個論點出發，我們可以轉入關於東亞文化交流史中『再脈絡化』現象的研究方法。」¹⁰因此，本文藉著譯官的活動，可回應黃俊傑的想法，指東亞之中的各種語言、文本均有脈絡，而非單純的歷史事件。而廖肇亨和石守謙不約而同地也提出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均需了解當中的行動者與中介者。「東亞世界網絡」

¹⁰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66。

的倡議是希望不把中國或東亞其他各國視為一種單純的形容對象，而是從東亞的歷史脈絡之中，透過各種的文人的詞句、政府的公文或是畫家的圖像，認識網絡聯繫之間如何形塑各種文化之間的了解，像本文以中朝關係為例，中國與朝鮮彼此的利益與立場都是決定事情轉變的關鍵，從此角度而看，很多東亞的課題亦可放置在「東亞世界網絡」中討論。它的應用不只限於中朝關係，亦可放置於中日關係、日琉關係、日鮮關係、越朝關係討論，甚至是跨國的議題，如海盜、漂流、傳教士等等議題，亦可藉此來了解跨地域的網絡聯繫，如何構成各種文化意象。

總結而言，朝鮮漢語譯官的研究並不只是作為探討中朝關係或相關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部份議題，也可以作為了解儒學建構下的東亞，特別是禮儀落實的重要實例。本文亦可同時為新文化史、翻譯史、歷史記憶、域外漢文學等新興學術課題，注入新想法，為這些領域延伸各方面的討論或是批判，以及形塑相互對照的例證與論述。因此，本文不只局限於構築朝鮮漢語譯官在「東亞世界網絡」的作用，也希望像白永瑞所說：「不拘泥於對過去客觀的敘述，而應以通過故事重現過去為目標，並藉此擴展更基本的溝通領域，更貼近讀者才是。」¹¹亦即把論述過程之中所得出的經驗、概念以及價值，通過再現的方式，與其他當下大眾共同關心的話題展開對話，諸如全球地域化、當代東亞局勢等，也可通過本文而可望有所助益。

¹¹ 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頁 249-250。

附件

1636-1893 年間的燕行使列表**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37	從事官				金宗一：《瀋陽日乘》	
1637.4	謝恩使	李聖求	懷仁君 李德仁		蔡祐後	
1637.9	謝恩陳奏 兼聖節冬至使	崔鳴吉	金南金	李時樸		
1637.12	正朝使	韓亨吉		李後陽		
1638.1	謝恩使	申景禎	李後遠	李禍		
1638.5	陳奏使	洪寶		金重鎰		
1638.9	謝恩陳奏 兼聖節冬至使	朴瀾		柳愔		
1638.11	正朝使	金榮祖		鄭泰齊		
1638.12	問安使	尹暉				
1639					申濡：《瀋館錄》	
1639.2	奏請使	尹暉	吳竣	鄭致和		
1639.6	進賀使	沈悅	林潭	成楚客		
1639.8	謝恩使	申景禎				
1639.9	聖節冬至使	權大任	鄭之羽	李元鎮		
1639.11	謝恩兼正朝使	崔鳴吉	李景憲	申翊全		
1640.3	謝恩兼陳奏使	李聖求	鄭廣敬	李棟		
1640.9	謝恩兼聖節冬至使	懷恩君 德仁	安應亨	尹得悅		
1640.11	陳奏兼謝恩正朝使	申景禎	韓會一	李慶相		
1640.12	陳奏使	懷恩君 李德仁		李以存		

** 此列表主要各種一手史料以及以下各種著作：林基中編：《燕行錄研究》，頁 12-45；李春姬：《19 世紀 韓・中 文學文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頁 53-54；慎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頁 132-133 等以及其他。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41.9	聖節冬至使	元斗杓	李景嚴	郭聖龜		
1641.11	正朝使	崔來吉		李哲		
1642.5	清賀兼陳奏使	麟坪大君李滉	卞三近	洪處亮		
1642.9	聖節冬至使	南以雄	金耆國	鄭昌胃		
1642.閏12	正朝使	尹履之		南溟翼		
1643.5	謝恩使	沈器遠	金南重	丁彥璜		
1643.5	世子右部賓客				李昭漢：《瀋館錄》	
1643.9	陳慰兼進香使	麟坪大君李滉	韓人及	沈東龜		
1643.10	冬至使	密山君李滌	曹文秀	金泰基		
1643.11	正朝使	鄭良弼		李明傳		
1644.1					昭顯世子	
1644.2	謝恩使	李景輿	洪茂績	李汝翊		
1644.5	謝恩進賀兼陳奏使	金自點	李必榮	沈魯		
1644.9	冬至兼年貢使	崔惠吉	金守賢	李奎老		張禮忠
1644.10	正朝使	鄭泰齊		吳翹		
1644.11	聖節使	金素		洪纘緒		
1645.3	進賀兼謝恩使	麟坪大君李滉	鄭世規	成以性	李滉：《燕行詩》；成以性：《燕行日記》	
1645.8	謝恩兼奏請使	金自點	洪振道	趙壽益		
1645.9	三節年貢使	李基祚	南銑	李應著		
1646.2	謝恩兼陳奏使	李景奭	金埴	柳淦	李景奭：《燕行錄》	
1646.9	謝恩使	柳延亮	李厚源	朴吉應		
1646.10	三節年貢使	呂爾載	崔有淵	郭弘祉		
1647.4	謝恩使	麟坪大君李滉	朴遜	金振		
1647.11	謝恩兼冬至使	洪柱元	閔聖徵	李時萬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48.3	謝恩使	李行遠	林潭	李遜然		
1648.11	三節年貢使	吳竣	金靄	李埰		
1649.3	進賀兼謝恩使	鄭太和	金汝鉦	睦行善		
1649.6	告訃兼奏請使	洪柱元	金鍊	洪瑱		
1649.11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仁興君李瑛	李時昉	姜興載	李瑛：《燕山錄》	
1650.3						
1650.6	陳慰兼進香使	金埴	密山君李潔	李尚逸		
1650.6	謝恩使	麟坪大君李滉	林潭	李弘淵		
1650.6	護行使	元斗杓	申翊全			
1650.11	謝恩進賀三節年貢使	麟坪大君李滉	李基祚	鄭知和		李馨長、張炫
1651.2	鎮慰兼進香使	柳延亮	朴遜	李晚榮		
1651.3	進香兼謝恩使	韓興一	吳竣	趙珩		
1651.11	謝恩進賀兼三節年貢使	麟坪大君李滉	黃屎	權瑀		
1652.8	謝恩使	李時白	申濡	權玲		
1652.10	三節年貢使	李澥	鄭攸	沈儒行		
1653.1	謝恩兼陳奏使	麟坪大君李滉	柳橄	李光載		
1653.閏7	謝恩兼陳奏使	洪柱元	尹絳	林葵		
1653.11	三節年貢使	沈之源	洪命夏	金壽恆	沈之源：《癸巳燕行日乘》	
1654.2	謝恩使	具仁晝	趙啟遠	李齊衡		
1654.9	謝恩兼陳奏使	李滉	李時楷	成楚客		
1654.10	進賀謝恩兼冬至使	麟坪大君李滉	李一相	沈世鼎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55.4	謝恩兼陳奏使	柳廷亮	吳挺一	姜鎬		
1655.10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錦林君李愷胤	李行進	李枝茂		
1656.8	謝恩使	麟坪大君李滉	金南重	鄭麟卿	李滉：《燕途紀行》	張炫
1656.10	三節年貢使	尹絳	李哲	郭齊華		
1657.5	謝恩使	麟坪大君李滉				
1657.5	進賀謝恩兼陳賀使	元斗杓	嚴鼎耆	權大運		
1657.10	進賀兼謝恩三使年貢使	沈之源	尹順之	李俊耆	沈之源：《丁酉燕行日乘》	
1658.4	進賀兼謝恩使	柳廷亮	李應著	宋時喆		
1658.11	三節年貢使	許積	姜瑜	金益廉		
1659.閏3	謝恩使	嶺陽君李儼	南老星	睦兼善		
1659.6	告訃兼奏請使	鄭維城	柳淦	鄭楹		
1659.11	三節年貢使	蔡裕後	鄭之虎	權尚矩		
1660.1	謝恩使	洪得箕	鄭知和	李元禎		
1660.10	三節年貢使	趙珩	姜栢年	權格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姜栢年：《燕行路程記》、《燕京錄》	
1661.2	陳慰兼進香使	洪柱元	李正英			
1661.2		沈之溟	李衫	李東老		
1661.3	進賀兼謝恩使	元斗杓	洪琢	金宇亨		
1661.11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錦林君李愷胤	柳慶昌	吳斗寅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62.7	進賀兼陳奏使	鄭太和	許積	李東溟		張炫
1662.10	三節年貢使	呂爾載	洪處大	李端錫		
1663.3	進賀兼謝恩使	鄭維城	李曼	朴承健		
1663.5	陳慰兼進香使	朗善君 李俣	李後山	沈梓	李俣：《朗善君 癸卯燕行錄》	
1663.11	三節年貢使	趙珩	權玲	丁昌燾		
1664.2	謝恩兼陳奏使	洪命夏	任義伯	李程	洪命夏：《癸巳 燕行錄》	
1664.10	三節年貢使	鄭致和	李尚逸	禹昌績		
1665.10	三節年貢使	金佐明	洪處厚	李慶果		
1666.2	進賀兼謝恩使	沈益顯	金始振	成後高		
1666.9	謝恩兼陳奏使	許積	南龍翼	孟胄瑞	許積：《燕行 錄》；南龍翼： 《燕行錄》	
1666.11	三節年貢使	鄭知和	閔點	趙遠期		
1667.3	謝恩使	檜原君 李倫	金徽	慶取		
1667.11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貢使	鄭致和	李翊漢	李世翊		
1668.5	進賀兼謝恩使	福昌君 李楨	閔熙	鄭樸		
1668.10	三節年貢使	李慶憶	鄭鑰	朴世堂	朴世堂：《西溪 燕錄》	張炫
1669.10	三節年貢使	閔鼎重	權尚矩	慎景尹	閔鼎重：《老峰 燕行詩》、《老峰 燕行記》	
1670.6	進賀兼謝恩使	鄭載崙	李元楨	趙世煥		
1670.10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貢使	福善君 李栢	鄭楹	鄭華齊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71.10	問安使	朗善君 李悞				
1672.6	謝恩兼冬 三節年貢 使	鄭致和	李晚榮	鄭積		
1672.10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昌城君 李倖	李正英	姜碩昌		
1673.11	謝恩兼三 節貢使	金壽恆	權堦	李宇鼎		
1674.4	告訃使	俞瑒		權階		
1674.7	鎮慰兼進 香使	閔黈	睦來善			
1674.7	陳慰使	靈慎君 李滢		姜碩耆		張炫
1674.10	謝恩兼告 訃使	沈益顯	閔耆重	宋昌		
1674.11	進賀兼三 節年貢使	福昌君 李楨	尹深	洪萬鍾		
1675.6	謝恩使	昌城君 李倖	李之翼	閔黯		
1675.11	進賀兼三 節年貢使	權大運	慶寂	柳譚厚		
1676.7	進賀謝恩 兼陳奏使	福善君 李栢	鄭哲	李瑞雨		
1676.10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吳挺緯	金禹錫	柳夏謙		
1677.4	進賀謝恩 兼陳奏使	福昌君 李楨	權大載	朴純		
1677.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瀛昌君 李沆	沈梓	孫萬雄	孫萬雄：《燕行 日記》	
1678.閏 3	陳慰兼進 香使	李夏鎮	鄭櫟	安如石		
1678.10	謝恩進賀 陳奏兼三 節使	福平君 李楹	閔黯	金海一	金海一：《燕行 錄》、《燕行日 記》	
1679.7	進賀兼謝 恩使	朗原君 李侃	吳斗寅	李華鎮		
1679.10	三節年貢 使	李觀微	李端錫	李潁		
1680.6	陳慰兼陳 奏使	沈益顯	申晷	睦林儒	申晷：《燕行錄》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80.11	謝恩陳奏 告訴兼三 節使	金壽興	李袖	申懷		
1681.9	謝恩使	昌城君 李倖	尹堦	李三碩		
1681.10	奏請兼三 節年貢使	李原君 李漵	南二星	申琬		
1682.2	問安使	閔鼎重		尹世紀		
1682.7	進賀謝恩 兼陳奏使	瀛昌君 李沉	尹以齊	韓泰東	韓泰東、韓祉： 《兩世燕行錄》	
1682.10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金錫胄	柳尚運	金斗明	金錫胄：《擣 椒錄》	
1683.11	三節年貢 使	趙師錫	尹攀	鄭濟先	尹攀：《燕行日 記》	
1684.2	告訴使	李濡		李著晚		
1684.10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南九萬	李世華	李宏	南九萬：《甲子 燕行燕錄》	
1685.3	謝恩使	朴弼成	尹趾善	李善溥		
1685.11	陳奏兼謝 恩三節年 貢使	朗原君 李侃	李選	金滢		
1686.1	陳奏兼謝 恩使	鄭載嵩	崔錫鼎	李墩		洪世泰
1686.6	謝恩兼陳 奏使	南九萬	李奎齡	吳道一	南九萬：《丙寅 燕行雜錄》；吳 道一：《丙寅燕 行日乘》、《燕槎 錄》	
1686.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朗善君 李倖	金德遠	李宜昌		
1687.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東平君 李杭	任相元	朴世憐	何相元：《燕行 詩》	
1688.2	陳慰兼進 香使	洪萬鍾	任弘望	李萬齡		
1688.10	告訴使	尹世紀		金洪福		
1688.11	三節年貢 使	洪萬容	朴泰遜	李三碩		
1689.8	進賀謝恩 陳奏兼奏 請使	東平君 李杭	申厚載	權持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89.10	陳慰兼進香使	朴泰尚	金海一	成瓘	金海一：《燕行日記續》、《燕行續錄》	
1689.11	三節年貢使	俞夏益	姜世危	趙湜		
1690.5	進賀謝恩兼陳奏使	全城君 李湜	權愈	金元燮		
1690.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瀛昌君 李沆	徐文重	權纘	徐文重：《燕行雜錄》、《燕行日錄》	
1691.7	謝恩兼陳奏使	閔黯	姜碩賓	李震休		
1691.10	三節年貢使	李宇鼎	尹以道	成儁		
1692.10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朗原君 李侃	閔就道	朴昌漢		金指南
1693.5	謝恩使	臨陽君 李桓	申厚命	崔恆齊	申厚命：《燕行日記》	
1693.10	三節年貢使	柳命天	李麟徵	沈枋	柳命天：《燕行日記》、《燕行別曲》	
1694.8	陳奏兼奏請使	朴弼成	吳道一	俞得一	吳道一：《後燕槎錄》；俞得一：《日記草》	
1694.11	三節年貢使	申琬	李弘迪	朴權		金指南
1695.7	謝恩使	全城君 李湜	李彥綱	金演		
1695.11	三節年貢使	李世白	洪受疇	崔啟翁	洪受疇：《燕行錄》	
1696.7	謝恩使	臨昌君 李焜	洪萬朝	林胤元		
1696.11	奏請兼三節年貢使	徐文重	李東郁	金洪楨		
1697.3	奏請兼陳奏使	崔錫鼎	崔奎瑞	宋相琦	崔錫鼎：《椒餘錄》、《蔗回錄》	
1697.11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臨陽君 李桓	柳之發	柳重茂		
1698.7	謝恩使	徐文重	閔鎮周	李健命	李健命：《寒圃齋使行日記》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698.7	問安使	全城君 李滉		尹弘萬	尹弘禽：《瀋行錄》	
1698.11	三節年貢使	李彥綱	李德成	李坦		
1699.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李平君 李杭	姜銑	俞命雄	姜銑：《燕行錄》、《看洋錄》	
1700.11	三節年貢使	李光夏	李埜	姜履相		
1701.9	告訃使	宋廷奎		孟萬澤		
1701.10	三節年貢使	姜錫	李善溥	朴弼明		
1702.8	謝恩使	臨昌君 李焜	沈桴	李世奭		
1702.11	奏請兼三節年貢使	臨陽君 李桓	李墩	黃一夏		
1703.9	清恩使	礪山君 李枋	徐文裕	李彥經		
1703.10	三節年貢使	徐宗泰	趙泰東	金栽		
1704.8	謝恩兼陳奏使	臨昌君 李焜	李世載	李夏源		
1704.10	三節年貢使	李頤命	李喜茂	李明浚	李頤命：《燕行詩》、《燕行雜識》	
1705.10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鄭載崙	黃欽	南迪明		
1706.10	三節年貢使	俞得一	朴泰恆	李廷濟	俞得一：《燕行日記鈔》	
1707.10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晉平君 李澤	南致薰	權僕		
1708.11	三節年貢使	閔鎮厚	金致龍	金始煥		
1709.7	謝恩兼進賀使	臨陽君 李桓	柳集一	李翊漢		
1709.10	三節年貢使	趙泰耆	任舜元	具萬理		
1710.10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鄭載崙	朴權	洪禹寧		
1711.3	參覈使	宋正明				金指南
1711.6	參覈使	趙泰東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11.10	謝恩陳奏 兼武節年 貢使	礪山君 李枋	金演	俞命凝		
1712.2	謝恩使	朴弼成	閔鎮遠	柳述	閔鎮遠：《燕行 日記》	
1712.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金昌集	尹趾仁	盧世夏	崔德中：《燕行 錄》；金昌集： 《燕行墳笈 錄》、《老稼齋燕 行日記》	
1713.7	進賀兼謝 恩使	臨昌君 李焜	權尚游	韓重熙		
1713.10	三節年貢 使	趙泰采	金相稷	韓祉	趙泰采：《癸巳 燕行錄》；韓泰 東、韓祉：《兩 世燕行錄》	
1714.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晉平君 李澤	權愔	俞崇	李澤：《兩世疏 草》	
1715.11	謝恩陳奏 兼三節年 貢使	鄭載崙	李光佐	君陽來		
1716.10	謝恩兼武 節年貢使	礪山君 李枋	李大成	權煥		
1717.11	三節年貢 使	俞命雄	南就明	李重協		
1717.12	謝恩使	李弼成	李觀命	李挺周		
1718.2	陳慰兼進 香使	礪原君 李柱	呂必容	金礪		
1718.11	三節年貢 使	俞集一	李世瑾	鄭錫三		
1719.8	進賀兼謝 恩使	礪山君 李枋	俞命弘	宋必桓		
1719.10	三節年貢 使	趙道彬	趙榮福	申皙	趙榮福：《燕行 日錄》、《燕行別 章》	
1720.7	告訃兼奏 請使	李頤命	李肇	朴聖輅		
1720.11	三節年貢 使	李宜顯	李喬岳	冉榮世	李宜顯：《庚子 燕行雜識》、《庚 子燕行詩》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21.3	謝恩使	趙泰采	李正臣	梁聖揆	李正臣：《燕行錄》	金泰禎、申命瑞、金慶門
1721.10	陳奏奏請兼三節貢使	李健命	尹陽來	俞拓基	俞拓基：《燕行錄》	
1722.10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全城君李滉	李萬選	梁廷虎	趙錫命：《燕行詩》	
1723.1	陳奏兼進香使	礪山君李枋	金始煥	李承源		
1723.4	進賀使	密昌君李穡	徐命均	柳萬重		
1723.8	陳慰兼進香使	吳命峻	洪重禹	黃晷	黃晷：《癸卯燕行錄》	
1723.10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西平君李橈	李明彥	金始煥		金是瑜
1724.3	進賀兼謝恩使	益陽君李檀	權以鎮	沈埈	權以鎮：《癸巳燕行日記》	
1724.10	告訃兼奏請使	密昌君李穡	李真儒	李尚奎		
1724.10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礪原君柱	李夏源	柳綈		
1725.4	謝恩兼進奏奏請使	礪城君李楫	權懔		趙文命：《燕行錄》	韓永禧
1725.11	三節年貢使	金興慶	柳復明	崔命相	金興慶：《燕行詩贈季君》	
1726.2	謝恩兼陳奏使	西平君李橈	金有慶	趙命臣		
1726.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密豐君李坦	鄭亨益	金應福		
1727.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洛昌君李槿	李世瑾	姜必慶		
1728.1	謝恩兼陳奏使	沈壽賢	李明彥	趙鎮禧		
1728.8	謝恩兼陳奏使	西平君李橈	鄭錫三	申致雲		
1728.11	三節年貢使	尹淳	趙翼命	權一衡		高時彥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29.8	謝恩使	驪川君 李增	宋成明	尹光益		
1730.8	告訃使	慎無逸		南泰良		
1730.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西平君 李橈	尹惠教	鄭必寧		
1731.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洛昌君 李槿	趙尚綱	李日躋	趙尚綱：《燕槎 錄》	
1732.7	進賀兼謝 恩使	李宜顯	趙最壽	韓德厚	李宜顯：《王子 燕行雜識》；趙 最壽：《王子燕 行日記》；韓德 厚：《燕行日 錄》、《承旨公燕 行日錄》	金是瑜
1732.10	三節年貢 使	李真望	徐宗燮	蔡吳瑗		
1733.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密昌君 李穡	閔應洙	尹彙貞		
1734.7	陳奏使	徐命均	朴文秀	黃梓	黃梓：《甲寅燕 行錄》	李樞、金 是瑜
1734.11	三節年貢 使	尹游	洪景輔	南泰益		
1735.7	陳奏兼謝 恩使	陽平君 李檣	徐宗伋	申致瑾		
1735.10	陳慰兼進 香使	洛昌君 李槿	李壽沆	李潤身		
1735.11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驪善君 李塋	李德壽	具宅奎		
1736.3	進賀兼謝 恩使	咸平君 李泓	鄭錫五	任挺		
1736.10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 貢使	長溪君 李棟	金始炯	徐命珩		
1737.7	陳奏兼奏 請使	徐命均	柳儼	李喆輔		
1737.11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 貢使	海興君 李樞	金龍慶	南渭老		
1738.7	進賀謝恩 兼陳奏使	金在魯	金始煥	李亮臣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38.11	三節年貢使	趙最壽	李滄	金光世		
1739.2	陳慰兼謝恩使	密陽君 李梈	徐宗玉	李德重		
1739.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綾昌君 李櫛	李屆德	李道謙		
1740.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洛豐君 李楸	閔亨洙	洪昌漢	洪昌漢：《燕行日記》	
1741.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驪善君 李壘	鄭彥燮	金宗台		
1742.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洛昌君 李槿	徐命彬	洪重一		
1743.7	問安使	趙顯命		金尚迪	趙顯命：《歸鹿集》、《燕行錄》	
1744.1	進賀兼謝恩使	陽平君 李檣	李日躋	李裕身		
1745.11	三節年貢使	趙觀彬	鄭俊一	閔百祥	趙觀彬：《燕行詩》、《悔軒燕行詩附月谷燕行詩》	
1746.4	進賀兼謝恩使	驪善君 李壘	趙榮國	李台重		
1746.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海興君 李檀	尹汲	安儼	尹汲：《燕行日記乾・坤》	
1747.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洛豐君 李楸	李喆輔	趙明鼎		
1748.5	陳慰兼進香使	海運君 李槿	趙明謙	沈鏡		
1748.10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鄭錫五	鄭亨復	李彝章		
1748.12	參覈使	金尚迪				
1749.9	進賀兼謝恩使	趙顯命	南泰良	申暉		
1749.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洛昌君 李槿	黃晷	俞彥述	俞彥述：《燕京雜識》	
1750.4	參覈使	南泰耆				
1750.11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海春君 李楸	黃梓	任堦	黃梓：《庚午燕行錄》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50.12	進賀兼謝恩使	洛豐君 李楸	尹得和	尹光纘		
1751.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洛昌君 李槿	申思建	趙重晦		
1752.7	進賀兼謝恩使	海運君 李槿	韓師得	俞漢蕭		
1752.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海興君 李樞	李命坤	鄭純儉		
1754.7	問安使	俞拓基		沈璫	俞拓基：《瀋行錄》	
1754.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長溪君 李棟	李宗白	李惟秀		
1754.12	謝恩使	海春君 李楸	金相奭	沈璫		
1755.10	進賀兼謝恩使	海運君 李槿	黃景源	徐命膺		
1755.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海蓬君 李楸	鄭光忠	李基敬	李基慶：《飲冰行程曆》	
1756.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長溪君 李棟	曹命采	任師夏		
1757.4	告訃使	金宗重				
1757.4	告訃使	安僊		李命植		
1757.6	參覈使	李彝章				
1757.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海興君 李樞	金相翼	李彥衡		
1758.11	謝恩陳奏兼三節貢使	長溪君 李棟	李得宗	李德海		
1759.10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海春君 李楸	趙明鼎	權筠		
1760.7	進賀兼謝恩使	海運君 李槿	徐命臣	趙憲		
1761.10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海興君 李樞	南泰會	李宜光		
1762.11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咸溪君 李樞	李奎采	朴弼達		
1763.2	謝恩兼陳奏請使	長溪君 李棟	洪重孝	洪趾海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63.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順悌君 李烜	洪名漢	李憲默		
1764.3	參覈使	金鍾正			金鍾正：《瀋陽日錄》	
1764.11	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	全恩君 李墩	韓光會	安杓		
1765.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順義君 李烜	金善行	洪櫓	洪大容：《湛軒燕記》、《乙丙燕行錄》	洪命福
1766.10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咸溪君 李樞	尹得養	李亨達		
1767.10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全恩君 李墩	李心源	李壽勛	李心源：《丁亥燕槎錄》	
1768.10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順義君 李烜	洪梓	洪樂信		
1769.10	三節年貢使	徐命膺	洪梓	洪樂信		
1770.10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慶興君 李旂	宋滢中	李命彬		
1771.5	陳奏兼謝恩使	金尚喆	尹東暉	沈頤之		
1771.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海溪君 李嶠	趙榮順	李宅鎮		
1772.9	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順義君 李烜	尹東昇	李致中		
1773.11	謝恩兼三節年貢使	樂林君 李埏	嚴璫		嚴璫：《燕行錄》；任希簡	
1774.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海溪君 李嶠	趙德成		李世奭	
1775.11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樂林君 李埏	林海重	林得浩		
1776.4	告訃奏請兼陳奏使	金致仁	鄭昌順	李鎮衡		
1776.11	進賀兼謝恩使	李澥	徐浩修	吳大益		玄啟百
	三節年貢兼謝恩使	朴明源	鄭好仁	申思運		
1777.4	陳慰兼進香使	鄭尚淳	宋載經	姜忱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77.10	進賀謝恩 陳奏兼冬 至使	河恩君 李堉	李押	李在學	李押：《燕行記 事》	
1778.3	謝恩兼陳 奏使	蔡濟恭	鄭一祥	沈念祖	李德懋：《入燕 記》	
1778 閏 6	問安使	李激		南鶴聞		
1778.9	謝恩使	河恩君 李堉	尹坊	鄭宇淳		
1778.11	三節年貢 使	鄭光漢	李秉模	趙時偉		
1779.10	冬至兼謝 恩使	黃仁點	洪檢	洪明浩		
1780.10	進賀兼謝 恩使	朴明源	鄭元始	趙鼎鎮	朴趾源：《熱河 日記》	尹甲宗
1780.10	謝恩使	茂林君 塘	李崇祐	尹長烈		
1780.11	三節年貢 使	徐有慶	申大升	林濟遠		
1781.11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黃仁點	洪秀輔	林錫喆		
1782.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鄭在謙	洪良浩	洪文泳	洪良浩：《燕雲 紀行》	
1783.6	聖節兼問 安使	李福源	吳載純	尹曠	吳載純：《航海 朝天圖跋》	
1783.10	謝恩使	洪樂性	尹師國	李魯春	李魯春：《北燕 紀行》	
1783.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黃仁點	柳義養	李東郁		洪宅憲
1784.7	謝恩兼陳 奏奏請使	金煜	金尚集	李兢淵		
1784.10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 貢使	李徽之	姜世晃	李泰永		張濂
1784.12	謝恩使	朴明源	尹承烈	李鼎運	李鼎運：《燕行 錄》	洪命福
1785.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安春君 李彬	李致中	宋銓		
1786.9	謝恩兼三 節年貢使	黃仁點	尹尚東	李勉兢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787.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俞彥鎬	趙瓊	鄭致淳	俞彥鎬：《燕行 錄》	
1788.11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李在協	魚錫定	俞漢謨		
1789.10	進賀謝恩 兼三節年 貢使	李性源	趙宗鉉	成種仁		
1790.5	進賀兼謝 恩使	黃仁點	徐浩修	李百亨	徐浩修：《燕行 記》、《燕行日 記》	洪命福
1790.10	冬至兼謝 恩使	金箕性	閔台赫	李祉永	金箕性：《燕行 日記・坤》	
1791.10	冬至兼謝 恩使	金履素	李祖源	沈能翼	金正中：《燕行 錄》	
1792.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朴宗岳	徐龍輔	金祖淳		
1793.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黃仁點	李在學	鄭東觀	李在學：《燕行 日記》、《癸丑燕 行詩》、《燕行記 事：元・亨・ 利・貞》	
1794.10	進賀使	朴宗岳	鄭大容	鄭尚愚		
1794.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洪良浩	李義弼	沈興永	洪良浩：《燕雲 續詠》	
1795.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閔鍾顯	李亨元	趙德潤		
1795.11	進賀兼謝 恩使	李秉模	徐有防	柳畊		
1796.10	清恩兼三 節年貢使	金思穆	柳炯	李翊模		
1797.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金文淳	申耆	洪樂游		
1798.10	三節年貢 兼謝恩使	李祖源	金勉柱	徐有聞	徐有聞：《戊午 燕行錄》	
1799.3	陳慰兼進 香使	具敏和	金履翼	曹錫中		
1799.7	進賀兼謝 恩使	趙尚鎮	徐滢修	韓致應		
1799.10	謝恩兼歲 幣使	金載瓚	李基讓	具得魯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00.1	進賀兼謝恩使	具敏和	韓用龜	柳畊		
1800.閏 4	陳奏兼奏請使	李秉模	李集斗	朴鍾淳		
1800.8	告訃兼請諡使	具敏和	鄭大容	張至冕		
1800.11	歲寒兼謝恩使	李得臣	李著喆	尹羽烈		
1801.2	謝恩使	趙尚鎮	申獻朝	申絢	柳得恭：《燕臺再遊錄》、《熱河紀行詩》、《竝世集》、《遼野車中雜咏》、《燕臺錄》	
1801.8	進賀兼謝恩使	沈能建	吳載紹	鄭晚錫	吳載紹：《燕行日記》	
1801.10	冬至兼陳奏使	曹允大	徐美修	李基憲	李基憲：《燕行日記》、《燕行詩軸》、《燕行日記啟本》	
1802.10	奏請兼冬至謝恩使	沈能建	韓晚裕	閔命懌		
1803.7	謝恩使	李晚秀	洪義浩	洪奭周		
1803.10	三節年貢使	閔台懌	權襪	徐長輔		
1804.10	謝恩兼冬至使	金思穆	宋銓	元在明	元在明：《芝汀燕記》	
1805.2	告訃使	吳鼎源		姜俊欽	姜俊欽：《燕行錄》	
1805.閏 6	問安使	李秉模		洪受浩		
1805.10	進賀兼謝恩使	徐龍輔	李始源	尹尚圭	李始源：《赴燕詩》	
1805.10	謝恩兼冬至使	李時秀	李普天	尹魯東		
1806.10	冬至兼謝恩使	沈能建	吳泰賢	李永老		
1807.10	謝恩兼冬至使	南公轍	林漢浩	金魯應		
1808.10	進賀謝恩兼冬至使	沈能建	趙洪鎮	金啟河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09.7	聖節進賀 兼謝恩使	韓用龜	尹序東	閔致載		
1809.10	冬至兼謝 恩使	朴宗來	金魯敬	李永純	金正喜	
1810.10	冬至兼謝 恩使	李集斗	朴宗京	洪冕燮		李廷稷
1811.10	冬至兼謝 恩使	曹允大	李文會	韓用儀		
1812.7	陳奏兼奏 請使	李時秀	金銑	申緯	申緯：《奏請行 卷》	
1812.10	冬至兼謝 恩使	沈象奎	朴宗正	李光文		
1813.2	謝恩使	李相璜	任希存	洪起燮		
1813.10	冬至兼謝 恩使	韓用鐸	曹允遂	柳鼎養		
1814.10	冬至兼謝 恩使	林漢浩	尹尚圭	李鍾穆		
1815.10	冬至兼謝 恩使	洪義浩	趙鍾永	曹錫正	趙寅永	李廷稷
1816.10	冬至兼謝 恩使	李肇源	李志淵	朴綺壽	李肇源：《續北 征錄》	
1817.10	冬至兼謝 恩使	韓致應	申在明	洪義瑾		
1818.6	瀋陽問安 使	韓用龜		趙鍾永		
1818.10	謝恩使	朴崙壽	趙萬元	李義肇		
1818.10	進賀兼冬 至謝恩使	鄭晚錫	吳翰源	李潞		
1819.10	聖節進賀 兼謝恩使	李魯益	尹鼎烈	金敬淵		
1819.10	冬至使	洪義臣	李鶴秀	權敦仁		
1820.10	冬至謝恩 使	李義甲	尹行直	李沆		
1820.11	陳慰兼進 香使	韓致應	徐能輔	朴台壽		
1821.1	進賀兼謝 恩使	李肇源	宋冕載	洪益聞		
1821.4	告訃使	洪命周		洪彥謨		
1821.10	進賀兼謝 恩陳奏使	李好民	趙鐘永	李元默	李好民：《北遊 漫錄》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21.10	進賀兼冬至歲幣使	趙萬元	尹命烈	尹秉烈		
1822.7	謝恩使	南履翼	權丕應	林處鎮		
1822.10	冬至兼謝恩使	金魯敬	金啟溫	徐有素	金魯敬：《燕行錄》；徐有素：《燕行錄》	
1823.7	進賀兼謝恩使	朴宗薰	徐俊輔	洪赫		
1823.10	冬至兼謝恩使	洪義浩	李龍秀	曹龍振		
1824.10	冬至兼謝恩使	權尚慎	李光憲	李鎮華		
1825.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勉昇	李錫祐	朴宗學		
1826.10	冬至兼謝恩使	洪義俊	申在植	鄭禮容		
1827.10	冬至兼謝恩使	宋冕載	李愚在	洪遠謨		
1828.4	進賀兼謝恩使	南延君 李球	李奎鉉	趙基謙	金芝叟：《西行錄》	
1828.10	謝恩兼冬至使	洪起燮	柳鼎養	朴宗吉	朴思浩：《心田稿》、《燕行紀天・地・人》	
1829.4	進賀兼謝恩使	徐能輔	呂東植	俞章煥		
1829.7	問安使	李相瓚		朴來謙		
1829.10	冬至兼謝恩使	柳相祚	洪義瑾	趙秉龜		李尚迪
1829.11	進賀兼謝恩使	李光文	韓耆裕	姜時永	姜時永：《輶軒續錄》	
1830.10	謝恩兼冬至使	徐俊輔	洪敬謨	李南翼		
1831.11	陳奏兼奏請使	李相瓚	李志淵	尹心圭		
1831.7	謝恩使	洪奭周	俞應煥	李遠翊		李尚迪
1831.10	冬至兼謝恩使	鄭元容	金宏根	李鼎在	鄭元容：《燕槎錄》、《燕行日記》	
1832.10	冬至兼謝恩使	徐畊輔	尹致謙	金景善	金景善：《燕輶直指》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33.7	陳慰兼進香使	李止淵	朴晦壽	李竣祐		
1833.10	謝恩兼冬至使	曹鳳振	朴來謙	李在鶴		
1834.2	進賀兼謝恩使	洪敬謨	李光正	金鼎集		
1834.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翊會	朴齊聞	黃秧		
1835.4	進賀兼謝恩使	洪命周	尹聲大	趙鶴年		
1835.8	謝恩使	金鏐	李彥淳	鄭在綱		
1835.10	冬至使	朴晦壽	趙斗淳	韓鎮庭		
1836.2	進賀兼謝恩使	韓敦仁	安光直	宋應龍		
1836.10	冬至兼謝恩使	申在植	李魯集	趙啟昇		李尚迪
1837.4	奏請兼謝恩使	金賢根	趙秉鉉	李源益	金賢根：《玉河日記》	李尚迪
1837.10	冬至兼謝恩使	朴綺壽	金興根	李光載		
1838.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義準	尹秉烈	李時在		
1839.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若愚	李魯秉	李正履	韓弼教：《隨槎錄》；崔浩溥：《四養齋外集桑蓬錄》	李尚迪
1840.3	陳慰進香兼謝恩使	完昌君 李時仁	尹命圭	韓啟源		
1840.10	進賀謝恩兼冬至使	朴晦垂	趙冀永	李繪九		
1841.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若愚	金東健	韓宓履		
1842.10	冬至兼謝恩使	興寅君 李最應	李圭昉	趙鳳夏	趙鳳夏：《燕薊紀略一・三・四》	李尚迪
1843.10	告訃使	沈宜昇		徐相教		
1843.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穆淵	俞星煥	金弼		
1844.10	奏請兼謝恩冬至使	興元君 李最應	權大肯	尹欖		李尚迪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45.10	謝恩兼冬至使	李憲球	李同淳	李裕元		
1846.3	進賀兼謝恩使	朴永元	趙亨復	沈熙淳	朴永元：《燕行日錄》	
1846.10	冬至兼謝恩使	金賢根	朴容壽	宋柱獻		
1847.10	冬至兼謝恩使	成遂默	尹致定	朴商壽		李尚迪
1848.10	冬至兼謝恩使	姜時永	宋持茫	尹哲求		
1849.8	冬至兼謝恩使	朴晦壽	李根友	沈敦永		
1849.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啟朝	韓正教	沈膺泰	李啟朝：《燕行日記》	
1850.1	謝恩使	趙鶴年	南獻教	鄭滄		
1850.3	陳慰進香兼謝恩使	徐左輔	洪義錫	金會明		
1850.3	陳慰兼進香使	成遂默	李明迪	尹行福		
1850.7	進賀兼謝恩使	李景在	徐憲淳	尹埴		
1850.10	進香兼謝恩歲幣使	權大肯	金德善	閔致庠		
1851.1	陳奏兼謝恩使	金景善	李圭昉	李升洙	金景善：《出疆錄》	
1851.10	進賀謝恩奏請兼歲幣使	益平君 李曦	成原默	俞錫煥		
1852.6	謝恩使	徐念淳	趙忠植	崔遇亨		
1852.10	進賀謝恩兼冬至使	徐有薰	李寅臯	宋謙洙		
1853.4	進賀兼謝恩使	姜時永	李謙在	趙雲卿	姜時永：《輶軒三錄》	李尚迪、 吳慶錫
1853.10	進賀謝恩兼冬至使	尹致秀	李元緒	林綱峻		
1854.10	冬至兼謝恩使	金緯	鄭德和	朴宏陽	鄭德和：《燕槎日錄》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55.10	陳慰進香 兼謝恩使	徐熹淳	趙秉恆	申佐模	徐慶淳：《夢經 堂日史》；申佐 模：《燕行雜 記》、《燕槎紀 行》	
1855.10	冬至兼謝 恩使	趙得林	俞得煥	姜長煥	姜長煥：《北轅 錄》	吳慶錫
1856.2	進賀兼謝 恩使	朴齊憲	林肯洙	趙翼東		
1856.10	冬至兼謝 恩使	徐載淳	任百經	李容佐		吳慶錫
1857.10	告訃使	李維謙		安喜壽		
1857.10	冬至兼謝 恩使	慶平君 李皓	任百秀	金昌秀		吳慶錫
1858.10	謝恩兼冬 至使	李根友	金永爵	金直淵	金直淵：《燕槎 日錄》	李尚迪
1859.10	冬至兼謝 恩使	李埵	林永洙	高時鴻		
1860.閏 3	聖節進賀 兼謝恩使	李珀經	朴齊寅	李後善	朴齊寅：《燕行 日記》、《燕槎 錄》	
1860.10	冬至兼謝 恩使	申錫愚	徐衡淳	趙雲周	申錫愚：《入燕 記》	吳慶錫
1861.1	問安使	趙徽林	朴珪壽	申轍求		
1861.10	謝恩兼冬 至使	李源命	南性教	閔達鏞		
1861.12	陳慰兼進 香使	李謙在	俞鎮五	宋敦玉		
1862.1	進賀兼謝 恩使	徐憲淳	俞致崇	寄慶鉉		
1862.10	進賀兼謝 恩歲幣使	李宜翼	朴永輔	李在聞		吳慶錫
1863.2	陳奏使	尹致秀	李容殷	李寅命		李尚迪
1863.10	進賀謝恩 兼冬至使	趙然昌	閔泳緯	尹顯岐		吳慶錫
1864.1	告訃請謚 兼承襲奏 請使	李景在	林肯洙	洪必謨		李尚迪
1864.9	謝恩使	徐衡淳	趙熙哲	鄭顯德		
1864.10	謝恩兼冬 至使	俞章煥	尹正求	張錫駿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65.10	謝恩兼冬至使	李興敏	李鍾淳	金昌熙		
1866.4	進賀謝恩兼奏請使	柳厚祚	徐堂輔	洪淳學	柳厚祚下屬：《燕行日記》；柳寅睦：《北行歌》；洪淳學：《燕行錄》、《燕行歌》	吳慶錫
1866.10	謝恩兼冬至使	李豐翼	李世器	喫世永		
1867.10	冬至兼謝恩使	金益文	趙性教	洪大鍾		
1868.11	冬至兼謝恩使	金有淵	南廷順	趙秉鎬		
1869.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承輔	趙寧夏	趙定熙	李承輔：《燕行詩》、成仁浩：《遊燕錄》	吳慶錫、李容肅、卞元圭
1870.閏10	冬至兼謝恩使	姜洌	徐相鼎	權應善		
1871.10	冬至兼謝恩使	閔致庠	李建弼	朴鳳彬		
1872.7	進賀兼謝恩使	朴珪壽	成彝鎬	姜文馨		吳慶錫
1872.11	冬至兼謝恩使	金壽鉉	南延益	閔泳穆		
1873.3	進賀兼謝恩使	李根弼	韓敬源	趙宇熙		
1873.10	謝恩兼冬至使	鄭建朝	洪遠植	李鎬翼	鄭建朝：《北渣談草》	吳慶錫
1874.10	冬至兼謝恩使	李會正	沈履澤	李建昌	沈履澤：《燕行錄 乾・坤》	吳慶錫
1875.4	陳慰兼進香使	姜蘭馨	洪兢周	姜簪		
1875.5	進賀兼謝恩使	李昇應	李諄翼	沈東獻		
1875.7	陳奏兼奏請使	李裕元	金始淵	朴周陽	李裕元：《薊槎日錄》。	
1875.10	陳慰進香兼謝恩使	李秉文	趙寅熙	鄭元和		
1875.10	進賀謝恩兼歲幣使	南廷順	李寅命	尹致聘		

日期	使行目的	正使	副使	書狀官	燕行錄書寫者 ／重要參與者	涉及譯官
1876.5	進賀兼謝恩使	韓敦源	林漢洙	閔種默	林漢洙：《燕行錄》	
1876.10	謝恩兼歲幣使	沈承澤	李容學	尹升求	李容學：《燕薊紀略》	
1877.10	冬至兼謝恩使	曹錫輿	李珪永	李敏榮		
1878.6	告訃使	趙翼永		洪在瓚		
1878.10	冬至兼謝恩使	沈舜澤	趙秉世	鄭元夏		
1879.11	謝恩兼冬至使	韓敬源	南一祐	李萬教	南一祐：《燕記》	
1880.11	進賀兼冬至謝恩使	任應準	鄭稷朝	洪種永		
1881.6	陳慰兼進香使	洪祐昌	趙昌永	柳宗植		
1881.9	領選使	金允植			金允植：《天津談草》	卞元圭
1881.10	進賀謝恩兼歲幣使	洪鍾軒	金益容	曹寅承		
1887	進賀使	李承五			李承五：《燕槎日記》	
1880.5	告訃使	洪鍾永		趙秉聖	洪鍾永：《燕行錄》	
1890.10	謝恩兼冬至使	李珪永	曹寅承	鄭雲景		
1891.4	進賀兼謝恩使	徐正淳	趙東萬	李範贊		
1891.10	冬至使	李鎬翼	沈埈澤	鄭翰謨		
1892.10	冬至使	李乾夏	李暉	沈遠翼		
1893.10	冬至使	李正魯	李冑榮	黃章淵		
1893.10	進賀使	李承純	閔泳喆	李裕宰		

參考文獻

1. 史料與古籍*

《老乞大》(서울[首爾]: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 1997 年)。

《明實錄》(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6 年)。

《海鄰書屋收藏中州詩》(서울[首爾]: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古 3441-40)。

《清實錄》(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年)。

丁若鏞:《事大考例》(서울[首爾]: 成均館大學校동아시아學術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2008 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朝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 1996 年)。

司馬遷:《史記》(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年)。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서울[首爾]: 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古 4650-4)。

成大中:《青城先生文集》, 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 景仁出版社, 1999 年), 冊 2733-2734。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서울[首爾]: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1960 年)。

朱熹:《孟子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朴永元:《梧墅集》, 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 民族文化促進會, 2003 年), 冊 302。

朴趾源:《燕巖集》, 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 民族文化促進會, 2003 年), 冊 252。

* 本文的參考文獻中史料部份以按著作作者或編者的筆劃為順, 如該材料沒有作編者則以書名筆劃為先。而參考著作、單篇論文等的排序按書寫的文字排次, 分別是中文、韓文、日文與西方語文。中文則以作者姓名的筆劃順序, 如同一作者的文獻, 則按年份排序。而韓文、日文、西方語文等則按當地字典的拼音按其作者姓名排序。

- 朴齊家：《貞蕤集》（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 年）。
- 宋近洙：《龍湖閒錄》（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9 年）。
- 宋時烈：《宋子大全》，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108-116。
- 李正臣：《櫟翁遺稿》，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8 年），續冊 53。
- 李民宥：《敬亭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901-903。
-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 年）。
-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35。
- 李宜顯：《陶谷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972。
-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2707。
- 李承召：《三灘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11。
-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 李晬光：《芝峰類說》（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4 年）。
- 李頤命：《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34。
- 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沈象圭、徐榮輔編：《萬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8 年）。
- 來保等編：《欽定大清通禮》（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 承文院編：《同文彙考》（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 年）。
- 東北亞歷史財團編：《近代韓國外交文書》（서울[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 年）。
-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果川：果川市秋史博物館，2014 年）。
- 金元行：《溪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169-171。
- 金正喜：《阮堂全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301。
- 金地粹：《苔川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7 年），冊續 21。
- 金尚憲：《清陰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77。
- 金昌協：《農巖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248-252。
- 金昌祚等注解：《朴通事新解》（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年）
- 金昌翁：《三淵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253-257。
-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31。
- 金指南、金顯門、李湛編：《通文館志》（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 年）
- 金指南：《北征錄》（壬辰年 5 月初 5 日丁亥）。
- 金指南編譯：《諺解新傳煮硝方》（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 662.2-G421s）。
- 金貞益：《辛丑北征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서울[首爾]：尚書院，2008 年），冊 135。

-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70。
- 金履安：《三山齋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首爾]：景仁出版社，1999 年），冊 182。
- 金德承：《少痊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7 年），冊續 27。
- 俞拓基：《瀋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38。
- 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永和：文海出版社，1963 年）。
- 柳厚祚：《洛坡先生文集》（서울[首爾]：大譜社，1994 年）。
- 柳得恭：《瀋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60。
-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248。
- 洪世泰：《柳下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167。
- 洪萬朝：《燕槎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서울[首爾]：尚書院，2008 年），冊 110。
- 孫詒讓注：《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 徐居正：《四佳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 年），冊 10-11。
- 徐浩修：《燕行紀》，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冊 52。
-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
- 高時彥：《伍倫全備諺解》（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5 年）。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4

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

崔恆、盧思慎、徐居正編：《經國大典》(서울[首爾]：서울[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年)。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張登桂等編纂：《大南實錄》(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1981年)。

張曜孫：《謹言慎好之居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藏清光緒30年(1904年)刻本。

張曜孫：《續紅樓夢未竟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中央研究院藏清咸豐6-7年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

郭廷以、李毓澍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

魚叔權：《稗官雜記》(臺北：東文文化書局，1971年)。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朝鮮正祖：《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年)，冊262-267。

黃宅厚：《華谷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年)，冊209。

黃梓：《甲寅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서울[首爾]：尚書院，2008年)，

董文煥編，李豫、崔永禧輯校：《韓客詩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

董越：《朝鮮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94冊。

董壽平、李豫編：《清季洪治董氏日記六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

福沢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文庫，1993年）。

趙文命：《鶴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年），冊192。

趙泰采：《二憂堂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서울[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3年），冊176。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年）。

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平燕京圖書館收藏手抄本。

2. 專書

中國孔子基金會、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編：《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暨韓國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會編：《韓國學研究論文集（四）》（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5年）。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觀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

王國璦：《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2014年）。

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付伯臣編：《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Pierre Nora（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

- 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年）。
- 石源華、胡禮忠編：《東亞漢文化圈與中國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臺北：聯經出版，2016年）。
- 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全海宗：《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
-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
-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
-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
-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
- 李宇平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年）。
- 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年）。
- 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
- 李英順：《朝鮮北學派實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李基白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61年）。

- 李基白著，厲帆、厲以平譯：《韓國史新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4年）。
- 李焯然：《丘濬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李焯然：《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李隆生：《清代的國際貿易：白銀流入、貨幣危機和晚清工業化》（臺北：秀威資訊，2010年）。
-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
- 沈寶春：《桂馥的六書學》（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周佳榮、丁潔：《天下名士有部落：常州人物與文化群體》（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
- 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 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編輯組編：《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松浦章著，鄭潔西譯：《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林子候：《朝鮮開國史研究》（臺北：玉山書局，1984年）。
- 林亨芬：《從封貢到平行——甲午戰爭前後的中韓關係(1894-1898)》（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年）
-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
-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2009年）。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 韋旭昇：《韓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孫雅芬：《桂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徐東日：《李德懋文學研究》（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中的中國形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徐耿胤、石之瑜：《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
- 烏雲高娃：《元朝與高麗關係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內秩序與國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1978年）
-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年）。
- 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張禮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1626-1894年間的中朝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 莊吉發：《清史論集》（二十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
- 許逸之：《中國文字結構說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
- 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 陳成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陳維新：《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
- 陳慧：《穆克登碑問題研究——清代中朝圖們江界務考證》（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 麥勁生：《中國史上的著名戰役》（香港：天地圖書，2012年）。
- 傅德元：《丁韞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
- 彭林：《三禮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曾光光：《桐城派與清代學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朝鮮史研究会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東京：綠陰書房，1990年）
-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
- 黃時鑒編：《韓國傳統文化・歷史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
- 楊旭輝：《清代經學與文學：以常州文人群體為典範的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
-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葛榮晉：《韓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趙興元：《燕行使視域中的清代北方社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 遠藤光曉等編：《譯學書文獻目錄》（서울[首爾]：박문사[博文社]，2009年）。
-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年)。

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劉述先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劉詠聰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 年）。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90 年）。

鄭光：《朝鮮朝譯科試卷研究》（서울[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75 年）。

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第五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1 年）。

韓衛星：《洪大容文學與中國之關聯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臺北：五南圖書，2002 年）。

簡江作：《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臺北：商務印書館，2005 年）。

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姜信沆：《李朝時代의 譯學政策과 譯學者》（李朝時代的譯學政與譯學者）（서울[首爾]：塔出版社，1978 年）。

高柄翊：《東亞交涉史의 研究》（東亞交涉史的研究）（서울：서울大學校出版部，1980 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한국사》（韓國史）（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2002 年）。

金良洙：《조선후기 中人집안의 발전：金指南、金慶門등 牛峰金氏事例》（朝鮮後期中人家族的發展——金指南、金慶門等牛峰金氏事例）

- (서울[首爾]:白山資料院, 2008年)。
- 김문식(金文植):《조선왕실의 외교의례》(朝鮮王朝的外交儀禮)(서울[首爾]:世昌出版社, 2017年)
- 柳永益:《甲午更張研究》(서울[首爾]:一潮閣, 1990年)。
- 李成茂:《韓國의 科擧制度》(韓國的科擧制度)(서울[首爾]:集文堂, 2000年)。
- 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淸貿易史研究》(서울[首爾]:國學資料院, 2000年)。
- 李春姬:《19世紀 韓·中 文學文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19世紀韓中文學交流——以李尚迪為研究中心)(서울[首爾]:세문사[思文社], 2009年)。
- 李賢珠:《역관상언등록 연구——17세기 조선 외교사를 담당한 역관들의 생생한 기록》(譯官上言謄錄研究——17世紀負擔朝鮮外交史的譯官們的活現紀錄)(坡州:글항아리[字瓮], 2016年)。
- 李花子:《朝淸國境問題研究》(서울[首爾]:集文堂, 2008年)。
-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서울[首爾]:一志社, 2006年)
-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層位》(서울[首爾]:學古房, 2014年)。
- 林東錫:《朝鮮譯學考》(서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 1983年)。
- 白玉敬:《朝鮮前期譯官研究》, (서울[首爾]:韓國研究院, 2000年)。
- 申翼澈編譯:《연행사와 북경천주당——연행록 소재 북경 천주당 기사집정》(燕行錄與北京天主堂——以燕行錄所載天主堂記事為中心)(서울[首爾]:보고사[寶庫社], 2008年)。
- 양오진(梁伍鎭):《(漢學書)老乞大 朴通事 研究》(서울[首爾]:제이앤씨[J&C], 2008年)。
- 양오진(梁伍鎭):《漢學書研究》(서울[首爾]:박문사[博文社], 2010年)。
- 李殷羽:《臨時政府와 李始榮》(臨時政府與李始榮)(서울[首爾]:汎友社, 1997年)。
- 鄭光、藤本幸夫、金文京編:《燕行使와 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에 관한

- 韓中日 三國의 國際워크숍》(燕行使和通信使—燕行、通信使行中關於中韓中日三國的國際工作坊)(서울[首爾]: 박문사[博文社], 2014年)
- 中國學論叢刊行委員會編:《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서울[首爾]: 中國學論叢刊行委員會, 1983年)。
- 崔韶子:《18세기 연행록과 중국사회》(18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서울[首爾]: 혜안[慧眼], 2007年)。
- 許敬震:《朝鮮委巷文學史》(서울[首爾]: 太學社, 1997)。
- 黃元九:《東亞細亞史研究》(서울[首爾]: 一潮閣, 1976年)。
- 후마 스스무(夫馬進)著, 정태섭譯:《연행사와 통신사》(燕行使與通信使)(서울[首爾]: 신서원[新書院], 2008年)
-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 近代清韓關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4年)。
- 金泰俊:《虛學から実學へ: 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8年)。
- 高橋弘通:《福沢諭吉の思想と現代》(福沢諭吉的思想與現代)(福岡: 海鳥社, 1997年)
- 青木保:《儀礼の象徴性》(儀禮的象徴性)(東京: 岩波書店, 1983年)。
-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69年)
- 藤塚鄰著, 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 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 国書刊行会, 1975年)。
-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京都: 同朋社, 1997年)。
-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名古屋: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15年)。
- 文玉柱:《朝鮮派閥鬭爭史》(東京: 成甲書房, 1992年)
- 劉建輝編:《前近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三国の文化交流と表象—朝鮮通信使と燕行使を中心に—》(前近代東亞三國的文化交流與表象——以朝鮮

- 通信使和燕行使為中心)(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国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
- 林毅陸編：《金玉均傳》(東京：慶應出版社，1944年)，
- 姜在彦：《朝鮮の開化思想》(東京：明石書店，1996年)。
- Alvarez, R. and M. Carmen Africa Vidal. ed.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 Baigorri-Jalón, Jesús and Kayoko Takeda. ed.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 Bayly, C. A..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I.1: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haudhuri, K. N.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hesterman, Andres.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1997.
- Cheung, Martha P.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6.
- Cheung, Martha P.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2):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 London: Routledge, 2016.
-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yer,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Dyer,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Pak the Interpreter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Cultural Evaluation of the Piao Tongshi*.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6.
- Elman, Benjamin A. (ed.)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 Literacies, 1000–1919*.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4.
-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Gentzler, Edward.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Gordon, Andrew.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evia, James.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su, Immanuel C. 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0.
- Huang, Martin W.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Kim Haboush, Jahyun & Martina Deuchler. ed.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oson Kor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 Kim, Yongkoo. *The Five years' Crisis, 1866-1871: Korea in the Maelstro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ncheon: Circle, 2001.
- Lary, Daana.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Leiden: Brill, 2007.
-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nn, Susa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 University

-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Matten, Marc.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11.
-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Nora, Pierre.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 Pöchhacker, Franz.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 Ruth, A. Roland. *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World Politic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2.
- Schmid, Andre.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Wei, Betty Peh-T'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Woolf, D.R.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單篇論文

- Roger Charti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2008 年 6 月），頁 199-214。

- 丁崑健：〈元代征東行省之研究〉，《史學彙刊》，第 10 期（1980 年 6 月），頁 157-190。
- 刁書仁：〈論薩爾滸之戰前後金與朝鮮的關係〉，《清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11 月），頁 43-50。
- 孔慧怡：〈重寫翻譯史〉，《二十一世紀》，第 71 期（2002 年 6 月），頁 46-53。
- 尤淑君：〈甲午戰爭後的中朝關係〉，《山東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26-35。
- 尹鉉哲、劉吉國：〈試論光海君的世子身份問題與即位初期的政策〉，《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1 期（2012 年 2 月），頁 136-140。
- 文炳贊：〈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為主〉，《船山學刊》，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177-180。
- 王元周：〈夷齊論與朝鮮朝後期政治〉，《韓國研究論叢》，第 25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28-147。
- 王元周：〈論「朝鮮中華主義」的實與虛〉，《史學集刊》，第 3 期（2009 年 5 月），頁 47-55。
- 王永一：〈朝鮮初期女真族裔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中國邊政》，第 177 期（2009 年 3 月），頁 45-58。
- 王永超：〈《朴通事》所見元末北方官話區民俗〉，《民俗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23-144。
- 王宏志：〈「叛逆」的譯者：中國交代翻譯史所見統治者對翻譯的焦慮〉，《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3 輯（2010 年），頁 3-4。
-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2011 年 11 月），頁 136-147。
- 王政堯：〈《燕行錄》初探〉，《清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1997 年 8 月），頁 1-8。
- 王恩美：〈朝鮮知識階層「文明觀」的轉變與對「基督新教」信仰的接受——以《皇城新聞》與「皇城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心的討論〉，《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 59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63-94。

- 王振忠：〈朝鮮燕行 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下）〉，《韓國研究論叢》，第 24 期（2012 年 8 月），頁 340-357。
-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第 22 期（2010 年 12 月），頁 60-85
- 王鍾翰：〈論袁崇煥與皇太極〉，《社會科學戰線》，1985 年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126-134。
- 王鑫磊：〈從 16 世紀末中、朝士人的陽明學辨論看東亞儒學資料——以許筠〈朝天記〉為中心〉，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 27 輯（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181-192。
- 白新良：〈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出兵〉，《清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1997 年 8 月），頁 9-15。
- 朱明愛：〈朝鮮開化思想詮論——以穩健開化派為主的探索〉，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107-112。
-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實禮的禮儀空間〉，《成大歷史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195-241。
- 朴現圭：〈《朝鮮書目》介紹及關於劉喜海與朝鮮學者之間文遊的研究〉，《慕山學報》，第 8 輯（1999 年月份缺），頁 59-104。
- 朴勝顯：〈巍巖李東人物性同論與心性一致論的研究〉，《哲學與文化》，第 41 卷第 8 期（2014 年 8 月），頁 63-80。
- 衣若芬：〈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與《韓國文集叢刊》的編纂與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203-208。
- 衣若芬：〈漂流到澎湖：朝鮮人李邦翼的意外之旅及其相關書寫〉，《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2008 年 5 月），頁 131-156。
- 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1920-30 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台大東亞文化研究》（2015 年 10 月），頁 161-194。
-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域外漢學研究》，第 11 輯（2015 年 10 月），頁 344-367。
- 衣若芬：〈睹畫思人：15 至 19 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

- 刊》，第 33 卷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51-82。
- 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14 年 6 月），頁 209-242。
- 吳政緯：〈評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99-205。
- 吳恩榮：〈元代禮失百年與明初禮制變革〉，《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101-109。
-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史學集刊》，1991 年第 3 期（1991 年 8 月），頁 20-29。
- 宋慧娟：〈清代中朝關係中的司法制度〉，《東北亞論壇》，第 15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5-129。
- 折輔民：〈《五禮通考·賓禮》校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 年第 3 期（1994 年 6 月），頁 43-45。
- 李永春：〈試論大院君時期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丙寅洋擾」、「辛未洋擾」及朝鮮的對應為中心〉，《當代韓國》，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63-75。
- 李永春：〈試論大院君時期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丙寅洋擾」、「辛未洋擾」及朝鮮的對應為中心〉，《當代韓國》，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63-75。
- 李孟衡：〈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戰後韓國學界的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特徵與論爭〉，《台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3 期（2015 年 10 月），頁 61-100。
- 李花子：〈清代長白山踏查活動及對三江源的記述〉，《韓國研究論叢》，第 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425-465。
- 李花子：〈康熙年間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會科學輯刊》，第 197 期（2011 年 12 月），頁 189-198。
- 李春姬：〈貧窮和憤懣的和弦——十八世紀朝鮮李彥瑱之詩歌〉，《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192-194。

- 李紀祥：〈輿圖史與接受史中的海國與大地－清季世界新圖之分型〉，《輔仁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9 年 1 月），頁 27-94。
- 李善洪：〈明清時期朝鮮對華外交使節初探〉，《歷史檔案》，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55-62。
- 李雲泉：〈賓禮的演變與明清朝貢禮儀〉，《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39-145。
- 李銀順：〈李景奭의 政治의 生涯와 三田渡碑文 是非〉（李景奭的政治生涯與三田渡碑文是非），《韓國史研究》，第 60 號（1988 年 3 月），頁 57-102。
- 李德超：〈從實錄考朝鮮東學黨之亂與中韓兩國之關係〉，《韓國學報》，第 10 期（1991 年 5 月），頁 229-236。
- Benjamin Elman（艾爾曼）、Theodore Hutters（胡志德）著，趙剛、孟悅譯：〈馬嘎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44 期（1997 年 12 月），頁 118-130。
-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世界漢學》，第 14 卷（2014 年 12 月），頁 35-48。
-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55-190。
-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2 年 12 月），頁 109-153。
- 周晏菱：〈《老乞大》與《朴通事》中的民俗文化探究〉，《台灣首府大學學報》，第 1 期（2010 年 9 月），頁 77-100。
-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44 期（1997 年 12 月），頁 105-117。
- 奇修延：〈中國學界의 漢四郡 研究 동향과 분석〉（中國學界的漢四郡研究動向與分析），《문화사학》（文化史學），第 27 輯（2007 年 6 月），頁 1143-1160。
- 岳嵐：〈晚清社會變遷與西洋人的漢語學習〉，《清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5 月），頁 122-129。

- 岳輝：〈朝鮮時代漢學師生的構成及特徵分析〉，《學習與探索》，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2-173。
- 林子候：〈日韓江華島事件的檢討（上）〉，《食貨月刊》，第 14 期第 3/4 期（1984 年 7 月），頁 158-173。
- 林子候：〈日韓江華島事件的檢討（下）〉，《食貨月刊》，第 14 期第 5/6 期（1984 年 9 月），頁 250-264。
- 林子候：〈關於「東學之亂」之再檢視〉，《韓國學報》，第 15 期（1998 年月），頁 231-236。
- 林亨芬：〈近四十年來有關「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的研究回顧〉，《歷史教育》，第 18 期（2011 年 6 月），頁 135-166。
- 林孝庭：〈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4 期（2011 年 12 月），頁 41-46。
- 林侑毅：〈由《同文彙考》「使臣別單」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35(2016.11): 343-371
- 金柄珉：〈朝鮮詩人朴齊家與清代文壇〉，《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100-104。
- 金宣旼：〈雍正——乾隆年間葬牛哨事件與清朝——朝鮮國境地帶〉，《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65。
- 河惠丁：〈韓國漢學文獻收藏及資料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 118 期（2011 年 5 月），頁 31-39。
- 南炳文、魏淑賢：〈張廷玉《明史》重要擬稿徐氏《明史》試探之一——序言作者韓方卓乃沈朝初之號說〉，《史學集刊》，2016 年第 3 期（2016 年 5 月），頁 81-86。
- 姚小鷗、李文慧：〈《周頌·有客》與周代賓禮〉，《學術研究》，2011 年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142-146。
- 姜智恩：〈東亞學術史觀的殖民扭曲與重塑——以韓國「朝鮮儒學創見模式」的經學論述為核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4 期（2014 年 3 月），頁 173-211。

- 范永聰：〈明代土木之變與朝鮮的對應〉，《當代史學》，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64-70。
- 范永聰：〈朝鮮大院君與壬午軍亂〉，《歷史與文化》，第 3 卷（2007 年 5 月），頁 1-41。
- 孫德彪：〈朝鮮四家詩人與李調元的詩文友誼〉，《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 10 期（2010 年 10 月），頁 164-167。
- 孫衛國：〈試說明代的行人〉，《史學集刊》，1994 年 1 期（1994 年月份缺），頁 11-16。
- 孫衛國：〈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66-72。
- 孫衛國：〈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98-107。
- 孫衛國：〈清修《明史》與朝鮮之反應〉，《學術月刊》，第 40 卷第 4 號（2008 年 4 月），頁 124-133。
-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友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95-113。
- 徐炯遙：〈18 世紀韓國儒學與考證學〉，《儒教文化研究》，第 9 輯（2006 年 2 月），頁 96-106。
- 徐毅：〈洪大容與清代文士來往書信考論〉，《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集），第 46 輯（2012 年 3 月），頁 289-324。
- 栾凡：〈明代中朝朝貢禮儀的制度化〉，《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12 期（2008 年 12 月），頁 109-112。
- 烏雲高娃、特木勒：〈朝鮮司譯院「漢學」研究〉，《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6 輯（2003 年 9 月），頁 228-235。
- 秦麗：〈評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311-318。
- 馬孟龍：〈穆克登查邊與《皇輿全覽圖》編繪——兼對穆克登「審視碑」初

- 立位置的考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85-99。
- 高王凌：〈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11 月），頁 166-173。
- 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劉松齡研究之二〉，《清史研究》，第 3 期（2008 年 8 月），頁 93-100。
- 高在旭：〈導論：人物性同異論爭在韓國儒學史上的意義——人物性同異論之發生、展開及意義〉，《哲學與文化》，第 41 卷第 8 期（2014 年 8 月），頁 3-21。
- 高志超：〈試論薩爾滸戰後朝鮮與後金的關係——以姜弘立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49-52。
- 高建旺：〈意識形態的戲曲樂化——《伍倫全備記》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84 期（2014 年 11 月），頁 152-158。
-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避地景觀〉，《臺大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3 年 6 月），頁 277-279，281-316。
- 高艷林：〈朝鮮王朝對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義〉，《求是學刊》，第 38 卷第 4 期（2011 年 7 月），頁 141-147。
- 崔溶澈：〈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中正漢學研究》，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333-351。
-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의國際秩序에서〉，《梨花史學研究》，第 22 輯（1995 年月份缺），頁 183-196。
- 張士尊：〈盛京「堂子」考——以朝鮮文獻為中心〉，《鞍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2013 年 2 月），頁 22-28。
-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第 5 期（1967 年 1 月），頁 41-42。
- 張存武：〈「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評介〉，《思與言》，第 5 卷第 6 期（1968 年 3 月），頁 48-49、51。
- 張存武：〈清韓封貢關係之制度性分析〉，《食貨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71

- 年7月)，頁11-17。
- 張存武：〈清韓關係，1636-1644〉，《故宮文獻》，第4卷第1期（1972年12月），頁15-37。
- 張存武：〈清入關前與朝鮮的貿易，1627-1636〉，《東方學志》，第21期（1979年3月），頁187-193。
-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之變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頁105-125。
- 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文學遺產》，2008年第1期（2008年2月），頁114-131。
-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南國學術》，2015年第2期（2015年4月），頁76-89。
- 張佩瑤：〈從二元對立到相反相濟：談翻譯史研究的關鍵問題與太極推手的翻譯史研究路向〉，《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2卷第2期（2010年6月），頁21-40。
- 張亮：〈考霸孟銘文釋西周賓禮〉，《求索》，2013年第2期（2013年2月），頁81-83。
- 張春海：〈論明亡後《大明律》在朝鮮地位的動搖——以「禮訟」為中心的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2011年6月），頁148-156年。
- 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以許筠與袁黃為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0期（2009年），頁55-84。
- 曹虹：〈《燕轅直指》的清朝觀〉，《嶺南學報》，復刊第6輯（2016年7月），頁231-245。
- 曹悅：〈清代中國書法對朝鮮王朝的影響——以金阮堂為中心〉，《或問》，第29期（2016年月份缺），頁119-130。
- 曹悅：〈清朝與朝鮮王朝的書法交流——以金正喜隨父入燕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年第2期（2017年1月），頁180-182。
- 莊吉發：〈身穿清朝衣 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歷史月

- 刊》，第 153 期（2000 年 10 月），頁 64-70。
- 許怡齡：〈從「儒學」到「儒教」的脈絡性轉換：「西學」與朝鮮思想史的轉換點〉，《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01-126。
- 許齊雄：〈事大至誠——從十六世紀末「昭雪國疑」和「壬辰請援」看朝鮮李朝政治核心對中國的想像和期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334-345。
- 郭嘉輝：〈明代「行人」於外交體制上之作用——以「壬辰倭禍（1592-1598）」兩次宣諭為例〉，《中國學報》，第 70 輯（2014 年 12 月），頁 319-343。
- 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陳東輝：〈阮元在中朝關係史的若干事跡考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43-46。
- 陳紅民：〈晚清外交的另一種困境：以 1887 年朝鮮遣使事件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119-131。
- 陳瑋芳：〈西學之子——容闥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223-265。
- 陳遼：〈《朴通事》：元明兩代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中華文化論壇》，2004 年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76-81。
- 彭明輝：〈外國史地引介與晚清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0 年 5 月），頁 197-228。
- 黃卓明：〈李圭景《說文辨證說》探微〉，《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第 35 卷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65-67。
-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187-218。
-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55-77。
- 黃修志：〈「書籍外交：明清時期朝鮮的「書籍辨誣」〉，《史學月刊》，2013

- 年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81-95。
- 黃普基：〈明清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4 期（2013 年 7 月），頁 81-85。
- 廉松心：〈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結晶——《奉使圖》〉，《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35-39。
- 楊雨蕾：〈18 世紀朝鮮北學思想探源〉，《浙江大學學報》第 37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88-93。
- 楊聯陞：〈中國文化的媒介人物——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〇次座談會紀要〉，《大陸雜誌》，第 15 卷第 4 期（1957 年 8 月），頁 29-36。
- 楊艷秋：〈《大明會典》《明史》與朝鮮辨誣——以朝鮮王朝宗系辨誣和「仁祖反正」辨誣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2010 年 3 月），頁 79-91。
- 葉泉宏：〈楔氏家族與麗末鮮初之中韓關係〉，《韓國學報》，第 12 期（1993 年 11 月），頁 59-79。
- 葉泉宏：〈鄭夢周與朝鮮事大交鄰政策的淵源〉，《韓國學報》，第 15 期（1998 年 2 月），頁 97-114。
- 葉泉宏：〈權近與朱元璋——朝鮮事大外交的重要轉折〉，《韓國學報》，第 16 輯（2000 年 6 月），頁 69-86。
- 葉泉宏：〈乾隆千叟宴與清朝宗藩關係（1785 年）〉，《韓國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6 月），頁 283-297。
- 葉泉宏：〈瀋館幽囚記（1637-1645）：清鮮宗藩關係建立時的人質問題〉，《韓國學報》，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284-299。
- 葉高樹：〈大陸學者對吳三桂「降清」問題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2 期（1991 年 9 月），頁 114-120。
- 葉高樹：〈清代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與評價〉，《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2000 年 6 月），頁 85-108。
- 葉高樹：〈從《李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對「三藩之亂」的反應〉，《慕山學報》，第 8 輯（1999 年月份缺），頁 385-416。

- 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21-196。
- 葉嘉：〈從「不忠」到「忠實」：從民初上海雜誌文本看翻譯規範的流變〉，《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3。
-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 10 期（2005 年 10 月），頁 41-48。
-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8-58。
- 葛兆光：〈亂臣、英雄抑或叛賊——從清初朝鮮對吳三桂的各種評價說起〉，《中國文化研究》，2012 年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22-31。
-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2010 年 9 月），頁 60-65。
-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年）〉，《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219-255。
- 趙太順：〈書法家跨越時空之相遇——略論蘇軾對翁方綱及金正喜之影響〉，《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 27 期（2007 年 6 月），頁 67-100。
- 趙冬梅：〈朝鮮時代漢語教本《象語題語》的編寫特色〉，《中國學論叢》，第 33 期（2011 年 8 月），頁 1-17。
- 趙旻祐：〈張曜孫『續紅樓夢』중 “歲寒樓”와 秋史 金正喜〉（張曜孫《續紅樓夢》中的「歲寒圖」和秋史金正喜），《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102 輯（2017 年 2 月），頁 269-292。
- 趙亮：〈論東江軍將領降（後）金及其影響——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為中心〉，《理論界》，2006 年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70-172。
- 趙紅海：〈漢四郡設置述評〉，《北方文物》，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46-48、77。
- 趙微：〈論金正喜與翁方綱的學術交流〉，《漢字漢文研究》，第 8 期（2012 年 12 月），頁 31-47。

- 劉宜霖：〈「格義」之成住壞易——一個翻譯規範的考察〉，《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7 期（2014 年 6 月），頁 93-126。
- 劉為：〈清代朝鮮使團貿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貢貿易研究之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2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36-42。
- 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考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東亞人文學》，第 12 輯（2007 年 12 月），頁 255-276。
- 劉琳：〈洪大容與清王子“兩渾”的友情及“兩渾”的真實身份考〉，《中國史研究》，第 95 輯（2015 年 4 月），頁 65-86。
- 劉寶全：〈王辰亂 後 朝鮮 對明 認識의 變化——「再造之恩」을 중심으로〉（王辰亂後朝鮮對明認識的變化——以「再造之恩」為中心），《亞細亞文化研究》，第 11 輯（2006 年 12 月），頁 141-161。
- 潘建國：〈《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嶺南學報》，復刊號第 6 輯（2016 年 7 月），頁 211-229。
- 潘斌：〈近二十多年來鄭玄《三禮注》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87-90。
- 潘曉偉：〈略論 1895—1898 年俄日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博弈〉，《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7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88-92。
- 鄭仁在：〈韓國現代實學者為堂鄭寅普的實心思想〉，《鵝湖》，第 38 卷第 8 期（2010 年 2 月），頁 14-22。
- 魯學海：〈略論朝鮮開化派基本思想〉，《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1985 年月份缺），頁 95-103。
- 賴貴三：〈考古証今 山海崇深——韓儒金正喜與翁方綱、阮元的書法與經學交流〉，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74-82。
- 錢志熙：〈從《韓客詩存》看近代的韓國漢詩創作及中韓文學交流〉，《동북아 문화연구》（東北亞文化研究），第 2 輯（2002 年 4 月），頁 97-119。
- 錢志熙：〈從《韓客詩存》看近代的韓國漢詩創作及中韓文學交流〉，《동북아시아문화학회 국제학술대회 발표자료집》（東北亞文化學會國際學術大會發表資料集），（2001 年 10 月），頁 61-76。

- 錢穆：〈朱子學流衍韓國考〉，《新亞學報》，第 12 卷(1977 年 8 月)，頁 1-70。
- 韓翠花，〈一部研究中、朝關係史的珍貴資料——《同文彙考中朝史料》評介〉，《東北史地》，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80-81。
- 魏志江：〈論後金努爾哈赤政權與朝鮮王朝的交涉及其影響〉，《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56-62。
- 羅志田：〈十八世紀清代「多主制」與《賓禮》的關聯與牴牾〉，《清史研究》，第 4 期(2001 年 11 月)，頁 51-55。
- 羅樂然：〈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中國史研究》，第 82 期(2013 年 2 月)，頁 93-114。
- 羅樂然：〈書評：Mitje Saje, ed.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 劉松齡：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漢學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13 年 3 月)，頁 333-339。
-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0 卷第 1 期(2013 年 6 月)，頁 299-345。
- 羅樂然：〈作為媒介的燕行使：柳厚祚 1866 年的燕行與朝鮮開港前的東北亞資訊認知〉，《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集)，第 53 輯(2013 年 12 月)，頁 393-418。
- 羅樂然：〈開港前朝鮮知識份子對西洋地理的認知與考辨——以李圭景和其《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為研究中心〉，《동서인문》(東西人文)，第 2 輯(2014 年 10 月)，頁 105-130。
- 羅樂然：〈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才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漢學研究集刊》，第 19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9-136。
- 羅樂然：〈朝鮮燕行使視野下的乾隆禁教期間耶穌會士——以洪大容的《湛軒燕記》為研究對象〉，《明清研究》，第 19 期(2015 年 12 月)，頁 101-134。
- 羅樂然：〈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345-378。
- 羅樂然：〈東亞文化圈視野下朝鮮後期對澳門的認知〉，《成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6 年 6 月)，頁 1-36。

- 權赫秀：〈近代朝鮮開化派金玉均的日本觀及其東亞史意義〉，《日本研究》，2012年第4期（2012年12月），頁96-103。
- 姜世求：〈운양호사건에 관한 고찰〉（關於雲揚號事件的考察），《軍史》，第15輯（1987年12月），頁89-134。
- 姜信沆：〈李朝時代의 譯學政策에 관한 考察——司譯院, 承文院設置를 中心으로 하여〉（李朝時代譯學政策的相關考察——以司譯院、承文院設置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第2卷（1965年月份缺），頁1-31。
- 姜信沆：〈李朝中期以後의 譯學者에 對한 考察〉（對李朝中期以後的譯學者的考察），《成均館大學校論文集》，第11期（1966年月份缺），頁43-58。
- 구도영（譯：丘洵榮）：〈조선 전기 조명의교관계의 함수："예의지국"〉（朝鮮前期朝明外交關係的功能——禮義之國），《大東文化研究》，第89輯（2015年3月），頁159-203。
- 丘凡真：〈1780년 열하의 칠순 만수절과 건륭의 '제국'〉（1780年熱河的七旬萬壽節與乾隆的「帝國」），《明清史研究》，第40期（2013年10月），頁177-217。
- 丘凡真：〈清的 朝鮮使行人選과 大清帝國體制〉（清的朝鮮使行人選與大清帝國體制），《인문논총》（人文論叢），第59期（2008年6月），頁179-228。
- 金開元：〈초기 개화파의 대외 인식〉（初期開化派的對外認識——以吳慶錫為中心），《釜山史學》，第17輯（1993年6月），頁467-497。
- 김경록（金暉綠）：〈朝鮮時代 使行과 使行記錄〉（朝鮮時代使行與使行記錄），《韓國文化》，第38輯（2006年12月），頁193-230。
- 김남운（金南允）：〈병자호란 직후(1637-1644) 朝淸관계에서 「淸譯」의 존재〉（丙子胡亂以後朝鮮關係中的淸譯之存在），《韓國文化》，第40期（2007年12月），頁249-282。
- 金良洙：〈朝鮮前期의 譯官活動(上)〉（朝鮮前期的譯官活動[上]（上）），《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7輯（1996年1月），頁33-86。
- 金良洙：〈朝鮮前期의 譯官活動(下)〉（朝鮮前期的譯官活動[下]），《역사와

- 실학》(歷史與實學), 第 8 輯 (1996 年 1 月), 頁 5-66。
- 金東珍:〈許篈의 大明使行과 陽明學 變斥〉(許篈의 大明使行與陽明學變斥), 《문화사학》(文化史學), 第 21 輯 (2004 年 6 月), 頁 825-853
- 김동환 (金東煥):〈尤庵 宋時烈的 著述과 刊行에 관한 一考察〉(關於尤庵宋時烈的著述與刊行的考察), 《서지학연구》(書誌學研究), 第 37 輯 (2007 年 9 月), 頁 5-21。
- 金良洙:〈朝鮮後期 中人집안의 活動研究 (上) —張炫과 張禧嬪등 仁同張氏 譯官家系를 중심으로〉(朝鮮後期中人家族的活動研究 (上) —以張炫與張禧嬪等仁同張氏譯官家系為研究中心), 《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 (1990 年 9 月), 頁 28-34。
- 金良洙:〈朝鮮開港前後 中人的 政治外交:譯官 卞元圭 등의 東北亞 및 美國과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朝鮮開港前後中人的政治外交——以卞元圭等譯官於東北亞與美國相關活動為中心), 《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 第 12 輯 (1991 年 1 月), 頁 311-366。
- 金良洙:〈朝鮮後期 譯官들의 軍備講究〉(朝鮮後期譯官們的軍備講究), 《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 第 19-20 輯 (2001 年 1 月), 頁 364-365。
- 金良洙:〈朝鮮後期牛峰金氏의 成立과 發展——繼全公派의 金指南等中人を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牛峰金氏的成立與發展——以繼全公派的 金指南等中人為研究中心), 《歷史와 實學》(歷史與實學), 第 33 輯 (2007 年), 頁 5-74
- 金良洙:〈조선시대의 譯官등 中人活動을 찾아서〉(探索朝鮮時代的譯官等中人活動), 《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 第 39 輯 (2009 年 9 月), 頁 203-222。
- 金麗華:〈조선후기 역관 李容肅의 行적과 작품 개관〉(朝鮮後期譯官李容肅的行蹟與作品概況), 《민족문화》(民族文化), 第 49 輯 (2017 年 6 月), 頁 261-291。
- 김문식 (金文植):〈조선시대 外交儀禮의 특징〉(朝鮮時代外交儀禮的特徵), 《東洋學》, 第 62 輯 (2016 年 1 月), 頁 77-98。
- 金宣旻:〈人蔘과 疆域 - 後金-淸의 강역인식과 대외관계의 변화〉(人蔘與疆域——後金—淸的疆域認識與對外關係的變化), 《명청사연구》

- (明清史研究), 第 30 輯 (2008 年 10 月), 頁 227-257。
- 金宣旼:〈朝鮮通事 굴마흔, 淸譯 鄭命壽〉(朝鮮通事古兒馬紅, 淸譯鄭命壽),《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第 41 輯 (2014 年 4 月), 頁 37-65。
- 金成奎:〈宋代 東아시아에서 賓禮의 成立과 그 性格〉(宋代的東亞賓禮形成與內容),《동양사학연구》(東洋史學研究), 第 72 輯 (2000 年 10 月), 頁 53-87。
- 金聖七:〈燕行小攷: 朝中交涉史의 일작〉(燕行小考——朝中交涉史的一察),《歷史學報》, 第 12 期 (1960 年月份缺), 頁 1-79
- 金信在:〈金玉均의 正體改革論〉(金玉均的正體改革論),《경주사학》(慶州史學), 第 14 輯 (1995 年 12 月), 頁 79-107。
- 金英淑:〈譯官 洪純彦과 朝明外交〉(譯官洪純彦與朝明外交),《中國史研究》, 第 70 輯 (2011 年 2 月), 頁 195-221。
- 金榮鎮:〈韓中文學交流資料의 總集《華東唱酬集》〉(韓中文學交流資料的總集《華東唱酬集》),《漢文學論集》, 第 44 輯 (2016 年月份缺), 頁 371-393。
- 金一煥:〈燕行錄에 나타난 ‘嘔血臺’의 의미 연구〉(「嘔血臺」呈現在燕行錄的意義研究),《한국문학연구》(韓國文學研究), 第 43 期 (2012 年 12 月), 頁 197-233。
- 金正義:〈위화도회군에 관한 고찰〉(有關威化島回軍的考察),《군사지》(軍事志), 第 16 號 (1988 年 8 月), 頁 55-79。
- 金鍾圓:〈丁卯胡亂時의 後金의 出兵動機 - 後金의 社會發展過程에서의 社會經濟的 諸問題와 관련하여〉(丁卯胡亂時的後金出兵動機——後金的社會發展經過與社會經濟等問題的關聯性),《동양사학연구》(東洋史學研究), 第 12、13 輯 (1978 年 8 月), 頁 55-93
- 金河元:〈초기 개화파의 대외 인식 : 오경석을 중심으로〉(初期開化派的對外認識——以吳慶錫為中心),《역사와 세계》(歷史與世界), 第 17 輯 (1993 年 6 月), 頁 467-497。
- 김현권 (金炫權):〈秋史 金正喜의 산수화〉(秋史金正喜的山水畫),《미술사학연구》(美術史學研究), 2003 年第 12 期 (2003 年 12 月),

頁 181-219。

김현권 (金炫權):〈추사 김정희의 묵란화〉(秋史金正喜의墨蘭畫),
《미술사학》(美術史學), 第 19 期 (2005 年 8 月), 頁 35-67。

남호현(南浩鉉):〈朝淸關係의 초기 형성단계에서 「盟約」의 역할 - 丁卯胡亂期 朝鮮과 後金의 講和過程을 중심으로〉(朝淸關係의初期形成階段中盟約的作用——以丁卯胡亂期朝鮮與後金的講和過程為中心),
《조선시대사학보》(朝鮮時代史學報), 第 78 輯 (2016 年 9 月), 頁 51-85。

梁伍鎮:〈原本《老乞大》의 文化史的 價値에 대하여〉(探析原文《老乞大》的文化史價值研究),《中國學報》, 第 47 輯 (2003 年), 頁 43-65。

劉婧:〈조선 역관 6 인의 시선집 『海客詩抄(해객시초)』에 대한 고찰——3 종 필사본을 중심으로〉(6 名朝鮮譯官의詩集《海客詩抄》的考察——以 3 種手稿為中心),《漢文學報》, 第 28 輯 (2013 年), 頁 229-270。

李康七:〈朝鮮孝宗朝羅禪征伐과 被我鳥銃에對한小考〉(朝鮮孝宗朝羅禪征伐與被我鳥銃相關小考),《古文化》, 第 20 輯 (1982 年月份缺), 頁 15-28。

李建衡:〈朝鮮王朝의 譯學教育〉,《大邱教育大論文集》, 第 16 輯 (1980 年月份缺), 頁 241-363。

李成茂:〈朝鮮前期 中人層의 成立問題〉(朝鮮期中人層的成立問題),《東洋學》, 第 8 輯 (1978 年), 頁 272-284。

李英淑:〈高麗時代의 譯官 研究〉(高麗時代的譯官研究),《韓國思想과 文化》(韓國思想與文化), 第 46 輯 (2009 年 1 月), 頁 201-234。

李哲成:〈18 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對淸貿易 實態와 私商層의 성장〉(18 世紀後期朝鮮的對淸貿易實況與私商層的成長),《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 第 94 輯 (1996 年 9 月), 頁 113-150。

李泰鎮:〈‘海外’를 바라보는 北學 - 『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俯瞰「海外」的北學。——以熱河日記為研究中心),《한국사 시민강좌》(韓國史市民講座), 第 48 輯 (2011 年 2 月), 頁 185-209。

閔斗基：〈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의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第二次中英戰爭과 異樣船出沒에의 對應〉（19 世紀後半葉朝鮮王朝的對外危機意識——第一、二次中英戰爭與異樣船出沒的對應），《東方學志》，第 52 輯（1986 年月份缺），頁 259-279 年。

閔丙秀：〈朝鮮後期 中人層의 漢詩研究〉（朝鮮後期中人群體的漢詩研究），《東洋學》，第 21 輯（1991 年 10 月），頁 155-174。

朴星來：〈朝鮮 儒教社會의 中人技術教育〉（朝鮮儒教社會的中人技術教育），《大東文化研究》，第 17 輯（1983 年月份缺），頁 267-290。

朴成柱：〈朝鮮前期 對明 御前通事〉，《慶州史學》，第 29 輯（2009 年 6 月），頁 27-51。

朴元燬：〈明初文字獄과 朝鮮表箋問題〉（明初文字獄與朝鮮表箋問題），《史學研究》，第 25 輯（1975 年 6 月），頁 83-101。

박종연 (朴鍾淵)：〈高麗시대의 中國語 通譯에 관한 연구——通譯官 選拔 養成과 名稱 問題를 中心으로〉（高麗時代的中國語通譯相關研究——以通譯官選拔養成與名稱問題為中心），《中國語文學》，第 62 輯（2013 年 4 月），頁 291-314。

반윤홍：〈備邊司의 羅禪征伐 籌劃에 대하여——효종조 寧古塔과병절목을 중심으로〉（備邊司的羅禪征伐籌劃——以孝宗朝寧古塔派兵條目為中心），《韓國史學報》，第 11 號（2001 年 9 月），頁 123-143。

白玉敬：〈仁祖朝 淸의 譯官 鄭命守〉（仁祖朝淸的譯官鄭命守），《이화여자대학교 대학원 연구논총》（梨花女子大學校大學院研究論叢），第 22 輯，（1992 年月份缺），頁 5-21。

백옥경 (白玉敬)：〈역관 김지남의 일본 체험과 일본 인식：《동사일록》을 중심으로〉（譯官金指南的日本經驗與日本認識——以《東槎日錄》為研究中心），《한국문화연구》（韓國文化研究），第 10 期（2006 年 10 月），頁 169-198。

白玉敬：〈麗末 鮮初 僣長壽의 政治活動과 現實認識〉（麗末鮮初僣長壽的政治活動與現實），《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46 輯（2008 年 9 月），頁 5-40

白玉敬，〈18 세기 연행사의 정보수집 활동〉（18 世紀燕行使的情報收集

活動),《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38期(2012年10月),頁201-229。

白玉敬:〈朝鮮後期 譯官의 政治的 動向研究——明・清交替期를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譯官的政治動向研究——明・清交替期為研究中心),《國史館論叢》,第72輯(1996年12月),頁127-149。

白玉敬:〈朝鮮前期譯官養成策과 制度의 整備〉(朝鮮前期譯官養成策與制度的整備),《역사문화연구》(歷史文化研究),第12輯(2000年11月),頁135-164。

孫蕙莉:〈青城 成大中の 史論 散文 研究 — 青城雜記——「揣言」을 중심으로〉(青城成大中的史論散文——以青城雜記的「揣言」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第80卷(2012年12月),頁367-399。

宋康鎬:〈三田渡 大清皇帝功德碑의 研究 - 滿漢文 對譯을 中心으로〉(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研究——以滿漢文對譯為中心),《만주연구》(滿州研究),第11期(2011年6月),頁293-358。

愼鏞廈:〈吳慶錫의 開化思想과 開化活動〉(吳慶錫的開化思想與開化活動),《역사학보》(歷史學報),第107期(1985年9月),頁107-187。

연갑수(延甲洙):〈丙寅洋擾와 興宣大院君 政權의 對應 - 《巡撫營膳錄》을 중심으로〉(丙寅洋擾和興宣大院君政權的對應——以《巡撫營膳錄》為研究中心),《軍史志》,第33號(1996年12月),頁189-214。

우경섭(禹慶燮):〈朝鮮中華主義에 대한 학설사적 검토〉(朝鮮中華主義中的學術史的傳統),《한국사연구》(韓國史研究),第159輯(2012年12月),頁237-263。

于晨:〈1885년 淸・日 天津條約의 재검토〉(1885年淸、日天津條約的再檢討),《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第43輯(2015年4月),頁257-289。

元珠淵:〈박죽서 시에 나타난 그리움의 세계〉(朴竹西詩中的懷念的世界),《한문고전연구》(漢文古典研究),第22卷(2011年),頁149-168。

이규필(李奎泌):〈오경석의 『삼한금석록』에 대한 연구〉(吳慶錫的《三韓金石錄》研究),《민족문화》(民族文化),第29輯(2006年12月),頁341-374。

- 李垌丘：〈金元行的 實心 강조와 石室書院에서의 교육 활동〉(金元行的 實心強調與石室書院中的教育活動)，《진단학보》(震檀學報)，第 88 期 (1999 年 12 月)，頁 231-248。
- 이상규 (李尚奎)：〈17 세기 전반 왜학역관 康遇聖의 활동〉(17 世紀前期倭學譯官康遇聖的活動)，《한일관계사연구》(韓日關係史研究)，第 24 期 (2006 年 4 月)，頁 101-141。
- 이상규 (李尚奎)：〈17 세기 전반의 조일관계 전개와 왜학역관 제도의 변화〉(17 世紀前期的朝日關係展開與倭學譯官制度與變化)，《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62 卷 (2012 年 8 月)，頁 251-296。
- 이상규 (李尚奎)：〈17 세기 초중반 왜학역관 洪喜男의 활동：통신사 파견시 수행역관 활동을 중심으로〉(17 世紀前期倭學譯官洪喜男的活動——以通信使派遣時隨行譯官活動為研究中心)，《한일관계사연구》(韓日關係史研究)，第 26 期 (2007 年 4 月)，頁 233-272。
- 李相益：〈洛學에서 北學으로의 思想的 發展〉(由洛學到北學的思想的發展)，《철학》(哲學)，第 46 輯 (1996 年 3 月)，頁 5-34。
- 이상태 (李尚泰)：〈백두산정계비 설치와 김지남의 역할〉(白頭山定界碑的設置與金指南的角色)，《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實學)，第 33 輯 (2007 年 9 月)，頁 75-119。
- 이연숙 (李娟淑)：〈17~18 세기 영남지역 노론의 동향 - 송시열 문인가문을 중심으로〉(17-18 世紀嶺南地域老論的動向——以宋時烈學派為研究中心)，《역사와 실학》(歷史與史學)，第 23 輯 (2002 年 1 月)，頁 81-116。
- 이은자 (李銀子)：〈韓·中 近代 外交의 실험, 1895-1905 年〉(韓中近代外交的試驗)，《중국근현대사연구》(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8 輯 (2013 年 6 月)，頁 1-25。
- 이정신(李貞信)：〈高麗後期の 譯官 X 高麗後期の譯官〉，《한국중세사연구》(韓國中世史研究)，第 38 期 (2014 年 4 月)，頁 373—401。
- 吳宗祿：〈壬辰倭亂~丙丁胡亂時期 軍事史研究의 現況과 課題〉(壬辰倭亂~丙丁胡亂時期軍事史研究的現況與課題)，《군사》(軍史)，第

38 輯 (1999 年 10 月), 頁 135-160。

장안영 (張安榮):〈18 세기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역관 통역의 문제점 고찰——『노가재언행일기』·『을병언행록』·『열하일기』를 중심으로〉(18 世紀知識人們眼中所反映的譯官通譯的問題考察——以《老稼齋燕行日記》、《乙丙燕行錄》、《熱河日記》為研究中心),《語文論集》, 第 62 輯 (2015 年 6 月), 頁 349-372。

全用宇:〈華陽書院과 萬東廟에 대한 一 研究〉,《湖西史學》, 第 18 輯 (1990 年 12 月), 頁 135-176。

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震檀學報》, 第 29 期 (1966 年 12 月), 頁 435-480。

全海宗:〈韓中朝貢關係考: 韓中關係史의 鳥瞰을 위한 導論〉(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的概況導論),《동양사학연구》(東亞史學研究), 第 1 輯 (1966 年 10 月), 頁 10-41。

鄭光:〈譯科試券研究의 諸問題——朝鮮朝後期の 譯科試券을 中心으로〉(譯科試券的諸問題——以朝鮮朝後期的譯科試券為研究中心),《精神文化研究》, 第 15 卷第 1 號 (1992 年 3 月), 頁 110-122。

정석원 (鄭錫元):〈丁卯胡亂時 反清思想의 展開와 그 原因〉(丁卯胡亂時反清思想的展開與其原因),《중국어문학논집》(中國語文學論集), 第 5 輯 (1993 年 8 月) 頁 1-18。

정성식 (譯: 鄭成植):〈경국대전의 성립배경과 체제〉(經國大典的成立背景與系統),《동양문화연구》(東洋文化研究), 第 13 卷 (2013 年 月份缺), 頁 35-61。

鄭玉子:〈紳士遊覽團考〉,《歷史學報》, 第 27 輯 (1965 年 4 月), 頁 105-142。

趙誠乙:〈洪大容 역사 인식 - 華夷觀을 중심으로〉(洪大容的歷史認識——以其華夷觀為研究中心),《진단학보》(震檀學報), 1995 年 6 月 (第 79 號), 頁 215-231。

조준호 (趙峻皓):〈朝鮮後期 石室書院의 位相과 學風〉(朝鮮後期石室書院的地位與學風),《朝鮮時代史學報》, 第 11 卷 (1999 年), 頁 65-95。

何淑宜著、박미애 (朴美愛) 譯:〈17-18 세기 조선사절의 중국 예속 관찰〉

(17至18世紀朝鮮使節的中國禮俗觀察),《국학연구》(國史研究),第16輯(2010年6月),頁537-574。

한명기(韓明基):〈朝中關係의 觀點에서 본 仁祖反正의 역사적 의미——明의 조선에 대한 ‘擬制的支配力’과 관련하여〉(從朝中關係的觀點看仁祖反正之歷史意義——關於明對朝鮮之 擬制的支配力),《南溟學研究論叢》,第16輯(2011年月份缺),頁239-279。

韓明基:〈17・8세기 韓中關係와 仁祖反正: 조선후기의 「仁祖反正 辨誣」 문제〉(17至18世紀韓中關係與仁祖反正——朝鮮後期的「仁祖反正辨誣」問題),《한국사학보》(韓國史學報),第13輯(2002年9月),頁9-41。

허지은(許智恩):〈조선후기 왜관에서 倭學譯官의 정보수집〉(朝鮮後期倭學譯官在倭館中的情報收集),《일본역사연구》(日本歷史研究),第36卷(2012年12月),頁63-96。

허태구(譯:許台九):〈임진왜란과 지도・지리지의 군사적 활용〉(壬辰倭亂與地圖、地理志的軍事運用),《사학연구》(史學研究),第113號(2014年3月),頁167-198。

洪瑀欽:〈11世紀 高麗와 北宋關係에 대한 蘇軾의 上疏文〉(11世紀高麗與北宋關係中的蘇軾的上疏文),《모산학보》(慕山學報),第13輯(2001年10月),頁149-166。

伊藤英人:〈高宗代司訳院漢字書字音改正について—「華語類抄」の字音を通して—〉(關於高宗時期司譯院的漢字書字音改正——以《華語類抄》的字音為中心),《朝鮮語研究》,第1期(2002年3月),頁129-146。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燕行使關於鴉片戰爭的情報源),《寧樂史苑》,第35號(1990年2月),頁21-32。

三好千春:〈アヘン戦争に関する燕行使情報〉(燕行使關於鴉片戰爭的情報),《史艸》,第30號(1989年11月),頁28-62。

三好千春:〈燕行使のロシア認識〉(燕行使的俄羅斯認識),《駿台史學》,第96號(1996年1月),頁117-144。

山口正之:〈昭顯世子と湯若望—朝鮮基督教史研究其四〉(昭顯世子與湯若望——朝鮮基督教史研究其四),《青岳學叢》,第5號(1933年8月),

頁 101-117。

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歐人と朝鮮使臣：西歐キリスト教文化の半島流傳について》（清朝裡的歐洲人與朝鮮使臣——關於西歐基督教文化在朝鮮半島的流傳），《史學雜誌》，第 44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頁 1-30。

孫承喆：〈朝鮮後期実学思想の對外認識〉（朝鮮後期實學思想的對外認識），《朝鮮學報》，第 122 期（1987 年 1 月），頁 117-122。

程永超：〈通信使關係倭情咨文と明清中国〉（通信使關係的倭情咨文與明清中國），《史林》，第 99 卷第 6 號（2016 年 11 月），頁 803-836。

鄭光：〈司訳院訳書の外国語の発音転写に就いて〉，《朝鮮學報》，第 89 期（1978 年 3 月），頁 95-131。

鄭光：〈朝鮮司訳院の倭学における仮名文字教育—バチカン図書館所蔵の「伊呂波」を中心に〉，《朝鮮學報》，第 231 期（2014 年 4 月），頁 35-87。

鄭光：〈朝鮮朝における訳科の蒙学とその蒙学書—来甲午式年の訳料初試の蒙学試差を中心として〉，《朝鮮學報》，第 124 期（1987 年 7 月），頁 49-82。

鄭光：〈朝鮮朝の外国語教育と訳科倭学について〉，《紀要〈関西大・東西学術研究所〉》，第 23 期（1990 年 3 月），頁 57-84。

An, Pyong-uk and Chan-seung Park.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asant War of 1894." *Korea Journal* 34:4(1994): 101-113.

Choe, Yongchul. "Manchu Studies in Korea."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3(2012): 89-101.

Ch'oe, Yong-ho. "The Kapsin Coup of 1884: A Reassessment." *Korean Studies* 6(1982): 105-124.

Choi, Young-Jin. "The Horak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Joseon." *Korea Journal* 51:1 (2011): 5-13.

Chun, Hae-jongn. "Notes on th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Remarks on Mr. Chang's Review Article." 《歷史學報》，第 37 輯（1968 年 6 月），頁 127-129。

- de Vries, Jan. "The Limite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3(2010): 710-733.
- Han, Myung-gi. "A Study of Research Trends in Korea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Korea in 1592(Imjin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8.2(2013): 1-29.
- Hong, Sunpyo. "O Sech'ang's Compil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sa 權域 書畫史 (History of Korea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Kŭnyŏk sŏhwa ching 權域 書畫徵 (Biographical records of Korean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trans. Jungsil Jenny Lee & Nathaniel Kingdom. *Archives of Asian Art* 63.2(2013): 155-163.
- Hur, Nam-lin. "Works in English on the Imjin War and the Challenge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 History* 18.2(2013): 53-80.
- Jo, Yoong-hee.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d the Tradition of *Yeonhaengrok*."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13:2(2010): 135-157
- Jung, Jae-hoon. "Meeting the World through Eighteenth-century *Yonhaeng*."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3.1(2010): 51-69.
- Kang, Hyeok Hweon. "Big Heads and Buddhist Demons: The Korean Musketry Revolution a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s of 1654 and 1658."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2:2(2013): 127-189.
- Kim, Bongjin. "Rethinking of the Pre-Modern East Asian Region Order."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2(2002): 67-101
- Kim, Choonsung. "Donghak: Towards Life and Spirituality." *Korea Journal* 42:4 (Winter 2002): 158-186.
- Kim, Seonmin.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1(2007): 33-61
- Kim, Sunglim. "Kim Chŏ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ŏn Korean Masterpiece." *Archives of Asian Art* 56(2006): 31-60.
- Kye, Seung B.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5.1(2010):

41-66.

Lee, Hyung-dae. "Hong Dae-yong's Beijing Travels and His Changing Perception of the West-Focusing on Eulbyeong yeonhaengnok and Uisan mundap."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9.4(2006): 45-62.

Lew, Young-ick. "Yuan Shih-kai's Residency and the Korea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1885-94."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5(1984): 63-108.

Lo, Chin T'ang. "Clues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Hsi Yu Chi P'ing-hu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7.2(1969): 176-194.

Mende, Erling. "Korea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anchu."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3(2003): 45-61.

Noh, Daehwan. "The Eclectic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Statecraft from the 18th to the 19th Century." *Korea Journal* 43.4(2003): 87-112.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1989): 7-24.

Rhim, Hyun-Nyo. "Yun Ch'i-ho and the Independence Club." *Korea Journal* 30:10(1990): 27-43.

4. 學位論文

李孟衡：《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岳陽：《清代朝鮮賚咨行初探》（濟南：山東大學中外關係史專業碩士論文，2010年）。

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林東錫：《朝鮮譯學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

金研希：《十八世紀清朝與朝鮮文士交流 — 以洪大容與杭州文士的互動為

- 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徐佳圓：《朝鮮王朝後期「事大」與「保國」政策的游移——以光海君到孝宗為中心(1608-1659)》(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郭嘉輝：《明洪武(1368-1398)「朝貢制度」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
-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 蔡至哲：《東亞基督宗教歷史意識的建構——韓國天主教歷史初探》(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高光一：《朝鮮時代 中國語 教育 研究：譯官 養成 및 教材를 中心으로》(朝鮮時代中國語教育研究：譯官培養與教材為中心)(서울[首爾]：東國大學校教科教育學科碩士論文，2007年)。
- 김남경(金南京)：《朝鮮時代 譯官과 翻譯史에 관한 研究：過舉의 譯官 考察과 近代 翻譯史를 中心으로》(朝鮮時代譯官與翻譯史相關研究：以過去的譯官考察與近代翻譯史為中心)(서울[首爾]：高麗大學校中國語翻譯學科碩士，2006年)。
- 金良洙：《朝鮮後期の 譯官身分에 關한 研究》(朝鮮後期的譯官身份研究)(서울[首爾]：延世大學校大學院歷史學科博士論文，1986年)。
- 金菜植：《이규경의 『오주연문장전산고』 연구》(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研究)(서울：成均館大學校韓文學科博士論文，2009年)。
- 白玉敬：《조선전기 역관 연구》(朝鮮前期譯官研究)(서울[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大學院史學科博士論文，2000年)。
- 이문호(李文豪)：《吳慶錫의 韓中 交流 研究：『中土簡牘帖』을 中心으로》(서울[首爾]：漢城大學校大學院韓國語文學科國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 이연숙(李娟淑)：《尤菴學派 研究》(大田：忠南大學校史學科博士論文，2003年)。

이현주 (李賢珠): 《譯官上言謄錄譯注》(서울[首爾]: 高麗大學校大學院
古典翻譯協同科程碩士論文, 2014 年)。

林善英: 《五洲 李圭景의 實學思想 研究》(五洲李圭景的實學思想)
(서울[首爾]: 成均館大學校韓國哲學科韓國哲學專攻碩士論文, 1992
年)。

鄭俊洙: 《李尚迪 詩學研究》(李尚迪的詩文學究)(서울[首爾]: 東國大
學校博士論文, 1987 年)。

Dyer,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